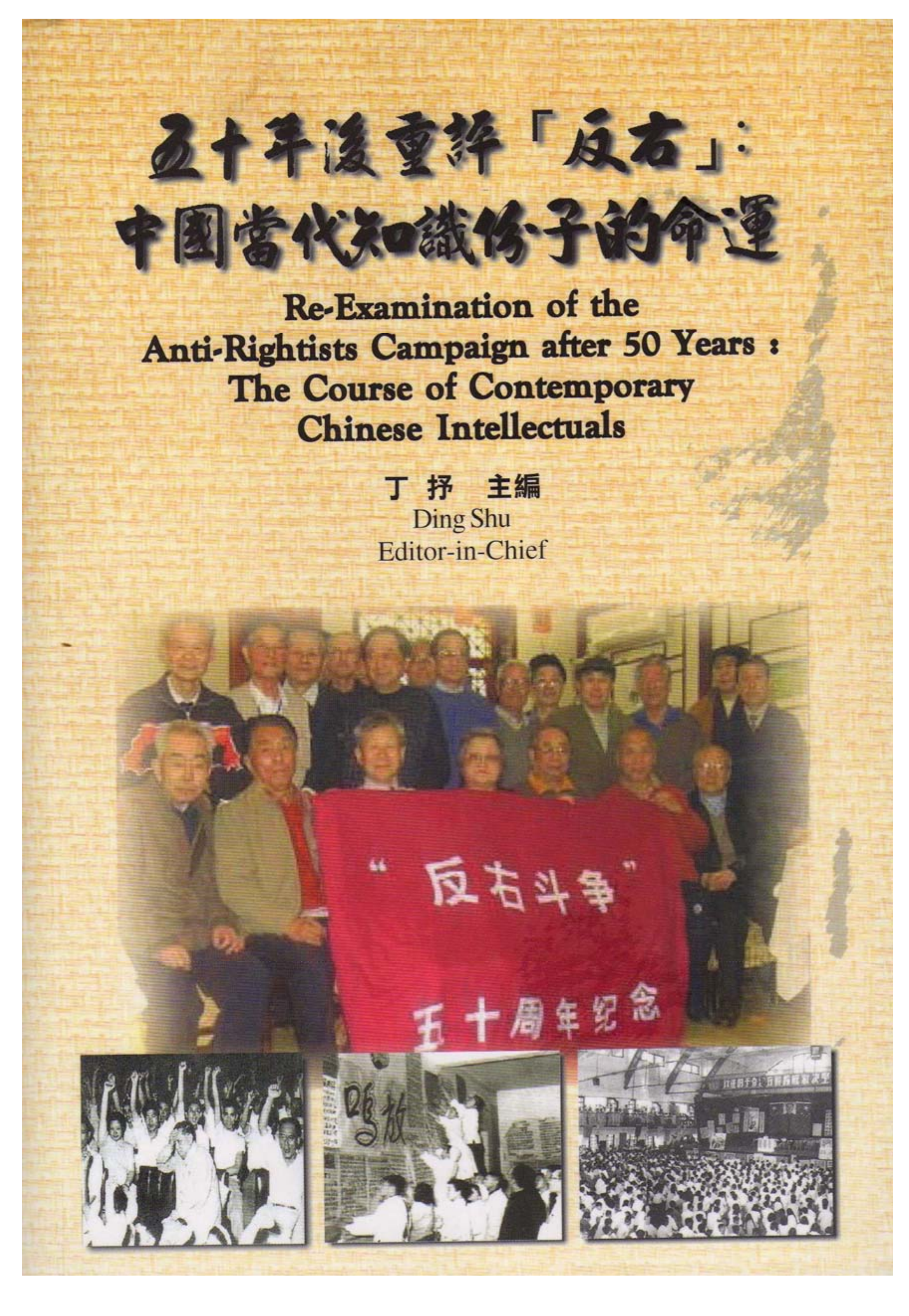
五十年後重評「反右」


五十年後重評「反右」：
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
Re-Examination of the
Anti-Rightists Campaign after 50 Years :
The Cour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丁 抒 主編
Ding Shu
Editor-in-Chief
“反右斗争”
五十周年纪念

目 錄

《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新版說明　　宋永毅

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决定出版一套新版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囑我寫這個出版說明。提筆之際，我首先感到由香港《開放》雜志社、美國博大出版社等民間出版機構協助出版這樣一套叢書，對我們已經身置于其中的二十一世紀有一種自然而然的“顧名思義”之理：因爲“二十一世紀”應當是一個最爲“開放”的“博大”兼容的新世紀。如果說“邪惡帝國”在歐洲的徹底垮臺的二十世紀和電視、電臺、電腦科技的崛起所帶來的資訊滲透有極大的關係；那麽，以開放的互聯網對全球的覆蓋爲標志的二十一世紀，是一定會崩坍所剩不多的那幾個專制堡壘的。追求自由和民主，要求一個開放的社會，這已經爲歷史證明是人類的天性。這裏便是一個有趣的例證。文化大革命中曾經有過風雲一時的“四大民主”，在這樣一種被扭曲了的民主形式下，群衆可以以大字報的形式變相地發泄對中共官僚階層的不滿。文革剛一結束，鄧小平便迫不及待地從憲法中取消了有關“四大民主”的條款，因爲他們懼怕這種開放的形式，哪怕只是一種囚籠中的“民主”。歷史又似乎在頑强地重複，今天在互聯網這個“虛擬的中國”裏的民意—數以千萬計的“電子大字報”，無論是對貪官污吏的揭露還是對公民權利的維護，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已經遠遠地超過了當年“四大民主”下的紙質大字報，而且正獨立地影響著中國的民主進程。然而，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套傳統的印刷出版物。是否在這一新的開放的世紀裏，傳統的資訊傳播手段就不那麽重要了呢？這顯然是一管之見。二十一世紀的開放性還高度地體現在它的博大兼容的多元性上。如同電視沒有消滅電臺，飛機沒有取代汽車一樣，傳統的書籍在以互聯網爲旗幟的二十一世紀中仍然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一套嚴肅的、以其思想和學術深度區別于一般通俗政治文化讀物的叢書，不僅爲海內外學者提供了一個傳播資訊的平臺，對中國的民主進程也會有一定的影響力。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曾經把它的指導方針歸結爲這樣四句話：“突破資訊封鎖，推動民主變革，促進族群和解，建立憲政民主”。我想，這大概也是這套新叢書的出版宗旨吧。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

于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

「57 右派」已成爲極高的榮譽　　林培瑞 / Perry Link

歡迎大家，尤其是遠道來的朋友，來參加今天的會。宋永毅先生讓我說幾句「開場白」，頗有班門弄斧之感。我沒有在場很多朋友對「反右運動」的切身經歷，與其說什麼「開場白」，我倒不如提兩個問題，拋磚引玉。

中國文化中語言和價值觀的關係

第一個問題：我們爲什麼覺得毛澤東的反右運動在中國現代歷史上起了「關鍵」作用？從這一次會議的論文和發言題目來看，好像許多人都有這種感覺。我也有。但究竟爲什麼？「關鍵」的感覺從哪裏來？

反右以前，中國已經經歷過土改，鎮反，肅反，都是血淋淋的事情，夠殘酷的了。反右以後還更可怕。文革受迫害的人數要比反右多好幾倍。最可怕的數字當然是「大躍進」的大飢荒的；那三年的死亡率至少要比反右多一百倍。既然如此，我們爲什麼覺得反右那麼重要，那麼「關鍵」？

我覺得是因爲反右毀滅了一代人的語言和信仰。也許是因爲我是個外國漢學家，從局外看覺得中國的文化特別看重語言和價值觀的關係問題。在古代中國，語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語言一顛覆，禍害便會來臨。我覺得從「百花齊放」的揭露真相過渡到「大躍進」的謊言就是這麼個過程。

劉賓雁先生生前曾經告訴過我，他划右派以前很相信共產主義的理想語言，被划成右派以後，雖然不能接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說法，但心裏的第一個反應是覺得，「我可能真的有什麼問題；毛澤東不可能不對。」在這一點上，我想賓雁先生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划了右派以後，賓雁去跟中國的最窮的老百姓一塊住了幾年，經過了一個在一輩子里有決定性的轉折，這也能算「語言變化」：他發現中國社會上有「兩種真理」。宣傳部的官方真理在報紙上從上往下一層一層地傳達下來；同時有另一種真

理，是由老百姓的艱難生活長出來的，從下往上。兩種「真理」之間似乎毫無關係。兩者之間，賓雁決定要接受後者。

我個人覺得這種「語言分野」是一個關鍵和要命的問題。以前，在土改，鎮反，和肅反的時候，雖然殘酷，但理想語言還是有「能夠信」的可能性。運動的參與者還是能對自己說「我是爲了理想……」。但以後，在反右和大躍進期間，理想語言變成語言遊戲，而且是一種非參加不可的遊戲。以前，你也許不能說真話；以後，你不能不說假話。

我以爲這個深刻的變化一直影響到現在的中國社會上的「犬儒主義」：說假話，造假貨，賣假藥，說一套做一套，等等。這個浪潮的出現當然跟後來鄧江胡時代的「不講政治，只向錢看」的政策有關。但是 1957 以後的「語言分野」和「兩种真理」的作用顯然是關鍵。

帽子的變化：從「反黨」到「反華」

今天想提的第二個問題是：從 57 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帽子」的變化是什麼？當時「右派」的正式罪名叫「反黨反社會主義」。把這個模式帶到今天來看，非常有趣。今天的中南海不提「反黨」兩個字，這可能是因爲不願意公開承認真的能有人反黨。同時也不提「反社會主義」了，這大概是因爲自己放棄了社會主義。太子黨撈魚的經濟池子裏，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種野蠻的資本主義，要是現在埋怨別人反對「社會主義」免不了帶來一點自嘲的味道。

中南海現在不喜歡你，說你「反」什麼呢？有時候還用「反動」兩個字，但更有趣的是說你「反華」。把原來的「反黨」擴大到「反華」 ，又是爲什麼呢？顯然是爲了刺激中國人的民族情緒，共產黨把自己說成民族尊嚴的代表。在國際上，只要是對中國政府有批評的人，那就自然屬於「反華人士」。國內的中國人，雖然是公民，一旦跟「不懷好意的國際勢力」挂鈎，那也算染上了「反華色彩」。今天與會的中國朋友，在中南海看來，恐怕已經有點「反華」了吧？

我對這個問題有點敏感是因爲我自己也被戴上了「反華」的帽子。林培瑞花了一輩子研究中國文化，幾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是中國人，這都不要緊。在中共的語言裏，林也是「反華」的。

我們這個會議的目標之一應該是對中南海，乃至全世界，說清楚：對不起，

我們不反華，而且我們要求進一步地問：在最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上，到底是誰在副其實地反華？到底是誰害了中國？

誰帶來了世界破紀錄的大飢荒？誰製造了「兩種真理」？誰把說假話，造假貨，賣假藥，自欺欺人的犬儒主義帶給了中國人？這些都是老百姓一手創造出來的嗎？還是責任在中南海？

到底誰反華：毛澤東反華還是劉賓雁反華？丁子霖反華還是殺他的兒子的人反華？是中國民主黨反華還是中國太子黨反華？是羅幹反華還是在座的幾位在出國開這個會以前必須跟國安警察「談話」的人反華？到底誰代表中國文明的利益？

在我看來，「右派」早不是個帽子，不是貶義辭，而是極高的榮譽。

歡迎大家！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

前 言　　丁抒

1957 年夏季，由毛澤東親自策劃和指揮的「反右派鬥爭」，是一場大規模鎮壓言論自由的政治運動。運動採取卑鄙的誘騙方式，宣稱「言者無罪」，號召知識份子「大鳴大放」，而後將其定爲「右派分子」，使百萬人淪為「專政對象」家破人亡。這是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也是一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酷烈的運動。中國科學院科學史專家許良英指出，當代中國有四大災難：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而綜觀四次大災難，後面三次都與第一次反右有因果關係。要了解和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反右運動是關鍵。

對 1957 年的「反右派鬥爭」，毛澤東曾這樣作總結：

「在我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有人認為在 1956 年，我看實際是在 1957 年。」1

「鎮壓反革命，殺一百萬，極有必要。1957 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2

「1957 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勝仗啊！一個肅反，一個反右。」3

這個「勝仗」使毛澤東獲得了歷代統治者從未得到過的自由，得以按照他的意志去改造中國。用他的話說，在中國這「一張白紙」上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反右之後，他送給中國人民的第一件作品，便是「大躍進運動」，其直接後果是三千餘萬人死于飢饉，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他的第二件作品就是那號稱「史無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

當年被毛澤東點名而成爲「右派分子」的詩人流沙河說：「如果 1957 年不搞這個反右鬥爭，第二年的大躍進的胡亂搞絕對搞不下去，上千萬人就不會餓死了。若敢那樣搞，就會有很多知識份子出來說那樣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樣整了，愛叫的雞公都殺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澤東要怎樣搞大躍進，沒得人敢出來說了。這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41957 年被毛澤東點名而成爲「極右分子」的李慎之先生也認為，反右派運動直接孕育了大躍進。大躍進的失敗則導致了 1959 年初的反右傾鬥爭，和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如原上海文匯報社長徐鑄成所說：「從那次『陽謀』後，知識份子從此閉口不言，真是萬馬齊喑了。這大概是『殺雞儆猴』的戰略部署吧。這次『陽謀』的如愿以償，為以後的『史無前例』作了準備。」5

2007 年是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五十周年。6 月 29 至 30 日，由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和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主辦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紀念反右運動 5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洛杉磯舉行。本書即該會議的論文專集。由於各種原因無法與會的一些學者提交的論文也收入在內。此外，編者還採用了已經故去的李慎之和劉賓雁先生的兩篇文章。

在本書編輯的過程中，叢書主編宋永毅先生為本書的中英文署名和分類標題等撰寫花了不少的心血，張成覺先生參與了全書的校對工作，僅在此一併致謝。

註 釋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 651 頁。

2 1959.7.31 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的講話，李銳《廬山會議實錄》（1996）第 182 頁。

3 1959.8.11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296 頁。
4 《曾經滄海身猶在 —— 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詩案」》。
5 徐鑄成《陽謀親歷記》，《中國之春》（紐約）1987 年 12 月號第 30 頁。

當代中國大災難的開端：反右運動
——紀念反右 50 周年　　許良英

一、當代中國四大災難

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國共內戰之後，中國人民渴望一個安居樂業的和平建設時期。可是，在毛澤東獨攬大權的「人民共和國」，人民得不到喘息的機會。內戰結束後不到一年，就參加了朝鮮戰爭。隨後在國內每年都開展一次甚至兩次整人的政治運動。如 1951 年電影《武訓傳》的批判，1951～52 年「三反、五反」運動和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1953 年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1954 年胡適思想的批判，1955 年「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和「肅反運動」。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是毛澤東一手製造的冤案，波及 2,000 多人。我因 1952 年介紹胡風朋友方然入黨而受到歷時一年的批判和停職審查。

1956 年是難得的平靜的一年。這要歸功於赫魯曉夫在蘇共 20 大所作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關於斯大林個人迷信及其惡果的揭露，震撼了所有由共產黨專政的國家，毛澤東不得不暫時有所收斂。但一年後他即瘋狂反撲，發動了以打擊知識份子為主要目標的反右運動（即反右派鬥爭），把當時全國五百萬知識份子中的 11%（55 萬）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屬於「階級敵人」，「專政對象」。實際上當時被打成右派的，不止 55 萬人，而是一百萬人左右。由於反右運動後期，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在小學教師和鄉鎮幹部中不劃右派，那些已劃為「右派」的，改劃成「地主」或「壞分子」，他們以後的遭遇比右派還要慘。他們的總人數估計約 50 萬人。在一次運動中把全國 20%的知識份子定為「敵人」，這是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不僅如此，由於反右運動前後毛澤東使盡陰謀詭計，「反右」勝利後又衝昏頭

腦，自詡為暴君秦始皇，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一百倍。於是是非、真假完全顛倒，謊話、假話滿天飛，人人在謊言中生活。毛澤東更是在謊言中自我膨脹，反右尚未結束，就提出「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幻想三年實現共產主義，結果餓死了四千萬人，造成了又一個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為醫治由「大躍進」所引發的三年大饑荒，在 1962 年七千人大會上，一向逢迎毛澤東並被指定為接班人的劉少奇說了一句「三年困難」是由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由此認定劉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經過四年的精心策劃，于 1966 年發動了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以「除四舊」、打殺中學校長開始的十年浩劫，是中華民族最荒唐而血腥的大災難，最後也葬送了毛澤東的神話。

承襲毛澤東衣缽的鄧小平，對直接傷害他的文化大革命當然完全否定，但對他自己負執行總責的反右運動（當時他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卻斷言「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並於 1981 年 9 月作過如此危言：目前形勢比 1957 年還嚴重，知識份子要向我們奪權！顯然他是想再搞一次反右運動，可惜力不從心，只能每隔一年搞一次冷冷清清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或「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1989 年 4 月，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他罷黜的胡耀邦含冤去世，幾十萬學生到天安門廣場悼念，稱胡耀邦為「中國魂」，招致鄧小平忌恨，揚言要以「流血」來鎮壓。結果就是六・四大屠殺。這是鄧小平繼毛澤東之後所創造的第四個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縱觀四次大災難，後面三次與第一次反右災難都有因果關係，因此，要瞭解和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反右運動史應該是關鍵。

二、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反右運動？

在毛澤東心目中，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是妨礙他統治的禍患，但國家建設又離不開知識，於是建國伊始就發動改造知識份子運動，要把他們改造成馴服工具。對那些他認為不完全馴服的人，就饗以鐵拳。反右運動就是這樣發生的。其根源在於毛澤東敵視知識份子的心態。對於這個問題，王來棣 2003 年的論文〈一貫敵視知識份子的毛澤東〉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此處介紹兩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史實。

在國共合作時期的 1925 年，任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發表論文〈中

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把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一部分定為「極端的反革命派」，大部分定為「半反革命派」。此文同時在三個刊物上刊出，並出過單行本。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此文是開篇，但文字刪去近半，上述這些話全不見了，卻又加上原文所沒有的「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這一公然偽造歷史的鐵證，以前未引起學界注意，連王若水的〈新發現的毛澤東〉也未發現。

1957年7月7日，毛澤東沉醉於反右運動的勝利，在上海接見三十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壯著膽問毛澤東：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這個曾被毛澤東讚譽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勇敢的旗手」的魯迅，在1957年必然也會成為右派，並且還要坐牢！

三、毛澤東是怎樣發動反右運動的？

這個問題，在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可以找到基本答案。請聽：

「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

為了引螞蟻出洞（以後改稱「引蛇出洞」），毛澤東於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雙百」）方針。一個月後，我還聽到中宣部長陸定一向知識界的報告。他強調，要貫徹「雙百」方針，必須「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有宣傳唯心論的自由」。我都信以為真，並深受鼓舞，以為中國的思想自由、學術繁榮的黃金時代即將來臨。

可是毛澤東1957年1月的這篇講話中，向黨內高級幹部洩露了天機：

「康得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

「百家」中馬克思主義以外的九十九家，原來都必須臣服於馬克思主義的「統治」，這算什麼「爭鳴」？所謂爭鳴，要不是滑稽雙簧的鬧劇，就是冒出洞來遭誅滅。

為了巧設誘敵深入的圈套，2 月 27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歷時四小時的講話，給人一個假象：經歷肅反運動後，靠工資生活的工作人員，都是自己人，可以享有人民的自由權利，可以自由地鳴放。隨後又召開了歷時八天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他召開了五次各界知識份子的座談會，並對全體作了一次長篇講話，反復重申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的精神。最後提出共產黨準備整風，懇切地希望黨外人士提批評意見，即所謂「整風鳴放」。

3 月 17 日，毛澤東啟程去杭州。路過天津、濟南、南京、上海時，他都召集當地幹部講話，交代鳴放政策的底細。4 月 27 日，中共中央發出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

為了顯示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誠意」，毛澤東於 4 月 30 日又召開了一次最高國務會議，拋出不少誘人的釣餌，如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但附和這一意見的人，40 天後統統被打成右派。

經毛澤東和全黨組織「誠懇」的動員，並在「言者無罪」的保證下，鳴放開始了。黨報天天整版刊載對共產黨的批評意見。不到半個月，毛澤東向黨內中層以上幹部打招呼，通報 4 個月前向高級幹部部署的計畫，用一個障人耳目的題目〈事情正在起變化〉，說即將可以「聚而殲之」了。他自欺欺人地斥責「右派猖狂進攻」，並估計：「右派大約占 1%、3%、5%到 10%，依情況而不同。」

6 月 8 日，反右鬥爭終於出籠了，《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假惺惺的社論〈這是為什麼？〉

這對於沉浸於由「雙百」方針產生黃金時代的幻想之中的我來說，是一個晴天霹靂。我無法容忍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公開反對反右運動，於是成為科學院第一個受全院批判的右派，後被定為「極右分子」，回老家當了二十年農民。

四、反右運動的惡果

反右運動，策劃準備了五個月，正式演出了十個月。正式定為右派的 55 萬人，占當時知識份子總數的 11%，超額完成了毛澤東估計的 10%的指標。實際上當時被劃為右派的大約比此數多一倍，只因為小學教師和鄉鎮幹部中的右派改稱為「壞分子」或「地主」。

由於共產黨的株連政策，一個人被劃為右派，全家和所有親屬都連帶遭殃。我的妻子就被開除黨籍，控制使用；弟弟也被劃為右派；一個哥哥被撤銷公職；高中畢業的侄兒不准考大學。以此類推，反右運動受害者至少五百萬。

為了處置右派，毛澤東創立了勞動教養制度，不經法律程式，可以隨意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進行無限期關押，並強迫勞動。大饑荒年代，各地勞教所都有人餓死。例如 1960 年甘肅省酒泉縣的夾邊溝農場 2,400 名右派餓死了 1,300 人。

除了對右派及其親屬進行非人的精神摧殘和人身摧殘以外，反右運動另一個惡果是，摧毀了人類文明賴以生存的道德準則，毒害了全國人民。精於權術詭計的毛澤東，用信誓旦旦的許諾和甜言蜜語引誘「鳴放」，即所謂引蛇（或螞蟻）出洞，然後聚而殲之。他得意地稱為「陽謀」，實際上是最卑鄙陰險的陰謀。他為自己的勝利而陶醉，得意忘形，毫無顧忌地兜出自己醜惡的暴君心態。他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甚至炫耀自己比秦始皇還兇殘一百倍。不僅如此，他還公然挑戰人類的良心，說什麼對待資產階級，良心還是少些好。這無異于供認，他策劃的反右運動，就是昧著良心幹的陰謀。在他的慫恿和威逼利誘下，背信棄義成為時尚，說假話受獎，說真話遭罪。整個社會道德淪喪，是非顛倒，黑白混淆，良心被鄙棄，人性遭踐踏，是人類歷史上一次罕見的精神浩劫。

反右運動所導致的不講誠信，好說假話、空話、大話的風氣，造成隨後「大躍進」中的神話：「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畝產幾十萬斤的「衛星田」；「三年實現共產主義」。這類自欺欺人的謊言，「文革」中又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因此可以說，「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反右運動的惡果。

五、關於二十年前的「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

1986 年 11 月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的這個設想是方勵之首先提出來的。他想與我、劉賓雁三人共同發起。1986 年 11 月 14 日方勵之夫婦和劉賓雁來我家聚會，討論此事。我與方、劉都有將近十年的交往。

至於錢偉長，劉賓雁並不熟悉，而我在 1953 年就認識，方勵之對他也很熟悉。我們三人在討論邀請名單時就有他的名字。參加會議的通知是我郵寄給他的。想不到他出賣了我們。作為獎賞，鄧小平賜給他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官位。

這裏不妨順便說明一下，1987 年 1 月隨著胡耀邦被迫下臺，方勵之、劉賓雁都被開除黨籍，我為何得以倖免。

1986 年 12 月，合肥、武漢、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繼出現學生上街要求民主的遊行，當局認為是受了方勵之的影響。12 月 30 日上午，鄧小平召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等人訓話，嚴厲批評胡耀邦反對自由化和制止學潮不力。當他批評方勵之的「自由化」言論時，趙紫陽插話：方勵之和劉賓雁、王若望要開反右三十周年紀念大會。於是鄧說，要把這三人立即開除出黨。趙紫陽把我誤為王若望，把「歷史學術討論會」誤為紀念大會。方、劉、王三人受公開批判時，官方都為各人印發了言論摘編。《劉賓雁言論摘編》中最後一篇竟是〈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全文。要劉賓雁對這個會負主要責任，實在冤枉。因為這件事是方勵之創意的，通知也由他執筆；三人名字的排序又以我在先；而劉賓雁已在中途宣佈退出。在鄧小平宣佈開除方、劉、王三人黨籍後，還準備再開除十人，王震在中央黨校宣佈了。這十人中，我首當其衝。大概由於趙紫陽發了善心，我們得以暫時倖免。　（2007 年 5 月 11 日）

——為 2007 年 6 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

從 1957 到 2007　　　　邵燕祥

整整五十年前，1957 年《中國青年報》的新年社論，是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出的點子：從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以來，歷數 1927、1937、1947 中國歷史的進程，直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 1957，號召在中共「八大」路線指引下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這篇社論對當時一心跟著共產黨想要建設一個繁榮幸福的社

會主義中國的青年讀者，帶來歡欣鼓舞的力量。

然而，不但數以千百萬計的讀者，而且社論的執筆者，連同創意者胡耀邦大概都沒有想到，在剛剛迎來的這一年，毛澤東以他後來自解的「陽謀」，實施了從黨內整風到全民反右的策略大轉變，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領域的所謂頭面人物，兼及一般知識份子，青年學生以至不問政治的其他平民，或撤職降級，或監督勞動，或收容「勞（動）教（養）」，以至在嗣後判刑加刑。「戴帽子」人數超過五六十萬，涉及親屬面達數百萬。當時的黨內文件和公開宣傳，還有後來若干年的歷史教科書，都稱這一次運動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並且獲得了偉大勝利，云云。

早在 1947 年秋的內戰中，中共轉入反攻不久，毛澤東 11 月 30 日致斯大林的一份電報，就曾提出「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所有政黨，除中共外，都應離開政治舞臺，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也就是鞏固列寧所指的「不與別人分享」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當時，該是出於某種實際的考慮，斯大林以中國的民主黨派不同于蘇聯和東歐的非共產黨，否決了毛澤東的這一意見。不過，毛澤東終於在十年後的反右派鬥爭中，達到了把原先的民主黨派徹底馴化的目的。

對於廣大知識份子來說，反右派鬥爭其實也並非突如其來。1949 年後，一方面大量吸收知識份子，一方面在所有場合強調和實行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即政治再教育，配合對外的朝鮮戰爭（「抗美援朝」），在「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高校和各級機關團體學校，發動與「審幹」相結合的「忠誠老實學習」（很像美國麥卡錫搞的「忠誠宣誓」），認定知識份子群在階級出身、本人成份（經濟）、學歷職業（文化）、黨派歸屬（政治）、社會關係（國內外親友的家產和政治面目）種種原罪，做「包下來」以後的第一次篩選，也便於在追查、批判和組織處理後控制使用。不是呼喚「為國（國家，民族，社會）所用」的人才，而是招攬「為我（共產黨和毛澤東）所用」的奴才(彭真 1958 年公然號召「做黨的馴服工具是共產黨員的最大志願」，據說此語首發權屬劉少奇；這實際上從對黨內擴大為對全民的要求)，不肯馴服為奴的，即使賢才也不能用，至少不能重用，有機會就打下去。有些人才能夠在夾縫中存活下來，並有所作為，是靠一些良知未泯、人性未泯乃至常識未泯的幹部的保護，這些幹部在歷次運動中難免都蒙「右傾」之名，有的在反右派鬥爭中就也被打成右派，少數在文革中受到打擊。而在 1957 年，則是在不

斷「反對右傾」的過程中，一步步擴大戰果的。

中共有關決議認定毛澤東晚年的左傾路線乃自 1957 年始。當年確是他躊躇滿志之時。其實從 1953 年斯大林逝世，毛就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他拋掉四年前新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拋掉他曾信誓旦旦的關於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的承諾，同年底就公佈「（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到 1956 年初即已宣佈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通過敲鑼打鼓的「高級（農業合作）化」，把土改後農民所有的土地收歸「公」有，把個體手工業者的作坊、擔子收歸「公」有，通過敲鑼打鼓的「公私合營」，把工商業者的工廠企業收歸「合營」，這樣大規模的經濟剝奪，不費一兵一卒，不戰而勝，而被剝奪者的農民、手工業者和資本家們不但像已打倒的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一樣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而且還到處發出一片感恩戴德的頌聖之聲。於是，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剩下一個資本主義陣地沒有攻克，那就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盤踞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思想各界了。毛澤東把他們即少數高級知識份子和他認為受其影響的一般知識份子及青年學生看作威脅其政權的敵對勢力，是一旦西方帝國主義陣營入侵時「裏通外國」的內應，更是當前可能呼應「波匈事件」，利用國內黨政幹部的官僚主義等缺點錯誤「鬧事」危及政權的主導力量。因此，必須防患於未然，「我們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為變被動為主動，一方面，要讓黨政幹部「整風」，整掉一些容易授人以柄的缺點錯誤，增長執政和應變能力，就不怕工農群眾「打扁擔」，更不怕「秀才造反」；另一方面，則在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中，欲抑先揚，利用知識份子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誤讀，突出號召「鳴」「放」，「幫助黨整風」。這是一箭雙雕乃至一石三鳥之計：這些批評意見可能鍛煉基層幹部黨員，一也；如果矛頭向上，哪怕指向高層，也可敲打他的同僚（後來針對毛本人的意見出來，這才打住，並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言），二也；而在「鳴放」期間，鼓動群眾「暢所欲言」，以期把隱患引發出來，造成分隔在不同單位的「小匈牙利事件」，各個擊破，三也。毛澤東運籌帷幄，重點在第三的這一預防性戰役大獲全勝，促成這一局面的，自然也有前兩項中的各級幹部，他們樂得因勢利導，讓上了鉤提意見的群眾承擔全部災難性後果。這一次毛澤東「發動群眾」推翻了他心目中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他所謂的章羅同盟實指民主同盟），而未竟之功就有待於九年後的文化大革命

了。

這一套形同誘捕的戰略戰術，在毛澤東是駕輕就熟的。1940 年代在延安「整風」「審幹（包括「搶救失足者」）」當中，就這麼幹過。而製造恐怖氣氛，利用群眾的恐懼和從眾心理，圍剿獵物，則在 1955 年的反胡風和「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中，一再試驗成功。於是在 1957 年的全民整風和反右派中，便以空前的規模，上自全國人大和政協會場，下至窮鄉僻壤的民辦小學，都以「群眾運動」方式「揪」出右派分子來。而所有這些施為，其前提都是「不受法律的約束」這一無產階級專政原則（且不說當時幾乎無法可依），「党是領導一切的」這一以党治國原則（對基層黨組織或幹部有意見就是反黨，基層有權處置），到處可見以批判鬥爭會甚至是「幫助會」形式出現的「私設公堂」，「逼，供，信」成為通例，「隔離反省」，勒令「檢查交代」，則是以辦公室或宿舍替代公檢法部門的看守所、預審處了。

到 1957 年反右派鬥爭時，全黨全國已經形成一套對知識份子進行集體迫害的理論體系和實施機制。一年多前周恩來所作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對改善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的政治處境和工作生活條件做出某些許諾，其後也有部分付諸實現，但不到一年後就遭到毛澤東指責，說對知識份子不敢講改造了，就是說「右」了。周恩來和決策層中有識之士包括一些高級將帥，看待知識份子，也是從使人盡其才用於社會主義建設這一點出發，其中一些知識份子幹部也許還不無惺惺相惜之意，但他們不能違拗毛的意志。於是出現了全黨動員對付知識份子的局面，不但反右派鬥爭後期後不得按過去運動常規搞一下「甄別」，而且在處理右派分子時猛下狠手，首用「戴帽子」辦法加強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懾，並發明「勞動教養」新規，將半數左右的落難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監禁勞改，許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毛澤東在一派得勝還朝的氣氛中，「乘風破浪」，把這一大兵團作戰的群眾運動方式施之於經濟生產生活領域，發動破壞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大躍進」包括所謂大煉鋼鐵，發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及公共食堂化，造成全國普遍的大饑荒和生活資料嚴重匱乏，導致兩三千萬至三四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這是在至今沒有正式公佈資料情況下的保守估計）。

1962 年初中共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被迫作了一次承擔責任的簡單表態，隨

後在同年夏秋的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他以重提階級鬥爭的「基本路線」發動反擊，為三四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伏線鋪墊，就不必多說了。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在此前後的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文革結束後，有過力求取信於民，爭取民族和解的意願，雖然這在決策意識中更多地是為了重新取得執政合法性基礎，但並不排除許多經過文革災難有所反省的幹部，突破了這一狹隘功利性的邊界，為恢復歷史的真相，並在實踐中追求並檢驗真理的天真願望。胡耀邦就屬於這樣的領導人之一。他在那一代覺悟到歷史不可欺、人民不可欺的共產黨人中有相當的代表性。

對於他們來說，我是後來者。同樣經歷了1949年後的歷次運動，論覺悟我也是「後覺者」。我在1982年初的一篇《代自傳》中，才寫了這樣一段話：

「談到二十多年前的『反右鬥爭擴大化』，難道能夠只是戚戚於個人的遭遇，而不捫心自問：對於當時已肇其端的，不僅給首當其衝的幾十萬『右派分子』，而且給五百萬知識份子、億萬勞動群眾、整個社會主義事業造成深重的痛苦與危害的左傾災難，作為一九五七年以前入黨的共產黨員，我就沒有一份應該承擔的責任嗎？」

這篇東西在《文學報》發表的當時，就有人向我直率指出，誰要你承擔這份責任？你承擔得起嗎？一個普通黨員，又淪於右派深淵的邊緣，不用說你不瞭解必要的資訊，也沒有必要的覺悟，就是你想建言，誰聽你的？在黨內沒有民主的情況下，你若真有所見，發為議論，那不是更要增添你的右派罪行嗎？你承擔哪家的責任！是不是把自己放到一個不適當的位置上了？

這無異一瓢理性的冷水。然而，我沒有聽到誰應該承擔歷史責任，耳邊只有所謂「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的老生常談，文革也漸成諱莫如深的禁區。一直到世紀末，楊憲益夫人、英籍翻譯家戴乃迭逝世時，楊憲益之妹楊敏如教授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說到了戴乃迭文革期間的牢獄之災和喪子之痛，最後說了一句話：「我要替我的國家向你說一聲『對不起』！」看到這裏我忍不住兩行老淚。這句話是應該由楊敏如來說的嗎？我雖也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衝擊，但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來，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我能不能代替一直不做聲的中國共產黨，向所有1949年後的無辜死難者說一聲「對不起」！？但我深知，沒有哪一級黨組織授權，讓我來履行這一個道歉的義務，

並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我這不又是沒有「擺好自己位置」的嚴重越權嗎？我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對於受迫害的死者和他們的親人後代，這有什麼意義？我一個個體的再深重的負疚之情，與一個以千百萬人的名義行使生殺予奪之權的群體應有的歷史懺悔比起來，又有多大的份量？

前不久報導了北京法院的一個判例，即某富人雇兇殺人已處死刑。他生前欠款數百萬元的債務，經債權人起訴其遺屬後，法院判決，既然死刑犯的妻子和兒子繼承了他的遺產，依法就應該繼承他的「遺債」，其生前所欠由他的遺產繼承者償還。在這裏，情理法也是統一的。

根據這一常識以下的原則，其普遍的適用性不言而喻。國民黨在 1947 年在臺灣製造了「二・二八」事件，欠下臺灣人民一筆血債。半個世紀之後，臺灣當局為那次事件有關的死難者平反昭雪，發放了撫恤金。已經在野的國民黨負責人馬英九也向死難者家屬表示哀悼和道歉。這表明了臺灣政權的延續性，其執事者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時代精神和歷史潮流面前的明智選擇，至少他們懂得如魯迅所說「背上的死屍」有多麼沉，更不願再為千古罵名的前人背黑鍋，且避免以賴賬者的形象面世，總之這是應該得到肯定評價的。

這是海峽那邊的事情。在海峽這邊，如上所述，即以毛澤東當政的 1949 至 1976 這個時段來說，對中國人民首先是大陸人民也欠了債，數額的大小和時限的長短都是不容忽視的。

劉少奇是為毛澤東樹立個人權威，推行極左路線的得力助手之一。但到了 1962 年初，面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餓死成千萬人的慘酷局面，他開始懼怕歷史的譴責，對毛說：「餓死人是要上書的。」而毛則行若無事，他說「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劉少奇並因這一碰撞而失寵。

毛澤東在回顧平生時，把他親自發動的文革，跟奪取全國政權並列為自己的不朽貢獻。他在反右派前後著作和講話的文字定稿，大部都已收入《毛選》第五卷，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鄧小平的有關言論也是「鄧小平理論」的組成部分。時至今日，這都有待歷史的核對總和評判。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這裏，長期都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因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度宣佈「徹底否定文革」之後，「為尊者諱」，文革以至反右派等歷史事件，全都變成所謂敏感

問題不許重提了。據說新聞出版方面的禁令三令五申，連文化學術界提出「如果魯迅活著」的話題，都被有關部門指為挑撥中共與知識份子的關係，而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不但在九十年代的巴金書中開了天窗，到新世紀巴金身後的悼念文字裏，依然遭到刪除和封殺。可見，從毛澤東時代以來，包括文革時期控制輿論、掩蓋真相、歪曲歷史的思路和操作經驗，是何等積重難返。

這就是說，曾經對人民欠債的歷史，連同當時的若干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不絕如縷地影響到今天。這裏固然有人的意志的因素，但不能不看到體制一經由一代以至兩代人確立以後，它就會在慣性的軌道上運行不止，直到滲透于體制中人的思想、感情、日常生活的細節中去。

就如毛澤東，他以申、韓為師，至少是在權術層面取法歷代帝王，于現代則以《聯共黨史》為必讀教材，承認自己是列寧、斯大林的學生。他不僅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且要在專政架構下做他自稱「大權獨攬」的統治者。他自己在 1950 年的「五•一」口號中添加了「毛澤東萬歲」，他欣然接受胡喬木以「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三個定語歌頌中國共產黨，因為歌頌黨就是歌頌他。由於完全沒有監督和制衡機制，他自命絕對正確，一貫正確，誰有一點疑似不同意見的表示，誰就是反對他。他甚至不能容忍多年戰友的苦苦「諍諫」。這還侈談什麼黨內民主，更談什麼人民民主？他不可能實行他所號召的「自我批評」，他怎麼可能承認自己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他一意孤行，不讓人講話，聽不得批評，更絕不認錯。因此只能用新的錯誤去掩蓋舊的錯誤，讓別人甚至是批評他的人去作他的錯誤的替罪羊。他只能在積欠人民的舊債上加上新債，而他從不會有任何欠債感。他在餓殍滿地的大饑荒時沒有欠債感，他在全國大折騰民不聊生時沒有欠債感，相反的，他認定自己是革命的代表和真理的化身，領導全國「從勝利走向勝利」，執政後又給億萬人民恩賜了「鶯歌燕舞」，理應接受全民的膜拜。「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反革命」，黨內黨外，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他是唯一的核心，至尊至上。

今年，是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提出索賠的要求。據說他們寫給各級黨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信函沒有得到答復，這是本來可以預見的。所謂索賠，主要指當年扣發的工資，還有「改正」後安排不當以致晚年生活困難等。有的已成燃眉之急，按說都是應該及時解決的。但為什麼說一時不會有像樣的結果呢？因為這一索賠看似經濟問題，實際是政治問題；需要償還的是經

濟債，更是政治債。而毛澤東時代以來，眾所周知的政治債，決不限於「反右」一案，在這之前，在這之後，積欠太多太多。現在的問題所在，不系於國庫的支付能力，而系於當局對既往歷史的認識——如何對待歷史，如何對待歷史上的負面經驗，如何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由此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一是繞不開，躲不過，二是事不宜遲，早搞比晚搞代價小）達到清醒的共識，才談得到實事求是地負責任地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隨著真理標準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好不容易發韌的對歷史的再認識，從上而下又從下而上，使人們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這一努力不幸中斷，如今要重新啟動，卻遠不是輕而易舉的了。如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出版重版重印過的《廬山會議真相》（李銳著），據聞在新世紀竟登上了禁印的書目，一本書的遭遇傳達了不止是一本書的資訊。歷次政治運動的親歷者、受害者都不能違抗自然規律而必然老去，但歷史債會因當事人和見證人的逐漸消逝而一筆鉤銷麼？

如果對歷史的認識不能與時俱進，那就不可能有歷史的進步。由於種種局限而不能從汲取歷史教訓的角度進入政治體制改革的思維和實踐，那就不但不能清理舊債，搞不好還要欠下新債。從 1980 年鄧小平做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許諾，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一而再地失去機遇，一而再地推遲延期，應該看到，歷史留下的時限已經不多了。(2007 年 1 月 1 日)

——為 2007 年 6 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

反右運動與民主革命——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　杜光

反右運動已經過去五十年了。作為曾經經歷那個膽戰心驚的歲月，最終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受難者，我對這個運動有著刻骨銘心的感受。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使我獲得了批判這個違法運動的權利，也背負著總結這個慘痛教訓的義務。特別是當我想起那些在暗無天日的勞教場所裏被過度勞動和饑餓奪去了生命的成千上萬不幸難友時，便感到分外的沉重。我們這些有幸生存下來的人，有責任承受著

他們的囑託，在為他們討回公道的同時，對這個剝奪了他們和我們的青春和壯志的罪惡行徑，作出應有的評判和譴責。為了歷史的公正，為了社會的發展，為了民族的前途，為了安慰殉難者的在天之靈，我們應當從這場劫難中提取應有的教訓，把這場深重的災難轉化成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遺憾的是，在這個號稱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年代裏，我們卻無法對反右運動進行正常的必要的反思和評論。我們不得不面對不許回憶、不許討論、不許開會、不許發表文章的禁令，以致廣大民眾不能從廣泛深入的反思和討論中獲取有價值的教益。這種違反民眾要求、違背民族利益、違憲違法的倒行逆施，使我更加感到有責任來批判與總結反右運動。本文擬從民主革命的角度，對反右運動做一些簡略的回顧與透視。

（一）

要對反右運動獲得更深刻的認識，就必須把反右運動和民主革命聯繫起來，從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高度來考察。

中國近代的歷史是民主主義呼求不斷突破封建專制主義，並且不斷受到封建專制主義壓制和摧殘的歷史。從戊戌政變、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五四運動，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展現出一條民主與專制的矛盾與消長的曲線。與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相比，自由、民主、人權、平等這些現代的民主主義理念在中國的傳播只不過一百多年。因此，在兩者的矛盾與鬥爭中，民主主義經常處於劣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五十多年裏，這個跡象尤其明顯。

中國共產黨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一直標榜新民主主義，要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11949 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意味著一個民主主義新階段的到來。在經濟上，五種經濟成分同時並存，依據「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建設根本方針，各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具有合法的地位。在政治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在政府機構裏，共產黨外的民主人士佔有了相當的比例：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裏，有三位非党人士；政務院四位副總理中，有兩位非党人士；十六位政務委員中，有九位非党人士；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長和兩位副院長中

的一位副院長，都是非党人士；最高人民檢察署的兩位副署長中，也有一位非党人士；在政務院的二十二個部裏，有十個部的正部長是非党人士。這是比較符合于當時的現實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經濟格局。2

但是，中國的民主主義社會建立才不過四年，毛澤東便在 1953 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4 年 9 月 15 日，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裏宣佈要「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在按照這次會議通過的憲法改組的政府機構裏，國家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都清一色由共產黨員擔任。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通過思想改造、批判《武訓傳》和《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思想、反胡風等等方式，樹立起名為馬克思主義實為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1956 年 9 月 15 日，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劉少奇在政治報告裏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標誌著我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開始。」3 這樣，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民主主義階段的存在。

這一發展完全離開了毛澤東自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也違背了他向全國人民許下的諾言。毛澤東在 1945 年曾經信誓旦旦地表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4 他在同年 9 月 27 日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時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5 可是，1953 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後的「社會主義改造」，卻把這個承諾完全棄之不顧。

通過這一系列變革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經濟上壟斷生產資料所有權，政治上壟斷國家權力，文化上壟斷真理裁判權，在社會領域則壟斷公民權利。這「四壟斷」的國家性質和社會性質，同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相反卻具有封建專制主義的一切特徵。看來，通過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而是封建專制主義；實現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中國，不是從民主主義前進到社會主義，而是從民主主義倒退到封建專制主義。中國進入了一個嚴峻的歷史時期，中國人民不得不再一次地面臨著反封建反專制反壟斷的民主革

命的歷史任務。

（二）

經過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社會的階級力量對比起了很大的變化。資產階級在公私合營中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經營權，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已經不復存在，這個階級留在政府機構裏的政治代表人物，只是為了點綴過於單調的一黨專政而設置的擺設。工人階級名義上是國家的領導階級，但是由於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實際上仍然處於雇傭勞動者的地位。這個階級的代表權為共產黨所壟斷，甚至它自己的群眾性組織——工會，也置於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後兩位領導人李立三和賴若愚，都是因為強調工會的獨立性而被免職的。至於為解放戰爭作出了特殊貢獻的農民階級，他們雖然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土地，但只歡喜了兩三年，便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和「四大自由」（借貸、租佃、雇工和貿易的自由）；由於糧食實行統購統銷，他們連處置糧食的自由權利都喪失了。農民以「大批出賣耕畜、殺羊、砍樹等」方式表示抗爭，但無力回天，到 1956 年底，全國農村入社的農戶已達總農戶的 96.3%。6 農民階級正在沿著初級社、高級社（後來還有公社化）的道路，從佔有土地的自由農民，淪落成為雇農（公社化後則成為農奴）。

這樣，中國社會在反右運動以前的階級圖譜上，佔有顯著位置的就只有兩個階級或階層了。

一個是知識份子階層，它代表著社會的民主力量。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知識份子是最先接受西方文明的階層，因而就成了傳播民主思想和興辦實業的先鋒。在解放戰爭時期，在貪賄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和鼓吹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共產黨之間，他們選擇了共產黨，這是很合乎情理的。建國之初，儘管改造思想和院系調整、鎮反肅反等措施，曾經嚴重地傷害了他們的自我尊嚴和文明理念；一系列批判運動，從批《武訓傳》到批俞平伯，更是挫傷了他們對共產黨和政府的信賴。但是，他們的多數仍然相信並且希望黨和政府會選擇民主自由的發展道路，對民主自由的前途還是滿懷期待。這就使他們同那個強大的統治集團及他們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處於既統一又對立的地位。因為新建立的社會制度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制度，而是以專制特權和高度壟斷為特

徵的新專制主義制度。如果真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話，那麼，民主自由都是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要求民主自由，絕不會構成對現有制度的威脅。封建專制制度則不然，民主自由本來就是反封建反專制的利器，它同專制制度的互不相容是十分明顯的。因此，新專制制度一旦確立，便不可避免地同胸懷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識份子階層處於對立的地位。

另一個階級或階層是佔據統治地位、並且體現著封建專制力量的強勢集團，它掌握著全部國家機器，佔有了幾乎是所有的社會資源，領導著強大的軍隊，還擁有雄厚的意識形態儲備。它在民主革命時期以民主自由相標榜相號召，初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之後，卻不等這個制度完善鞏固便急急忙忙地發動「社會主義改造」。但歷史始終是按照自己的規律行事的。當時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文明程度，遠遠沒有達到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水平，而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意識形態，卻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因此，對民主制度的否定，不論打著什麼旗號，都必然會導致封建專制主義的復辟。為了維護這個被他們稱為社會主義的封建專制體制，他們警惕地注視著知識份子的動向。因為這個既承襲了古老中華的文化傳統，又具有現代意識的階層，是當時唯一有能量有條件向專制制度挑戰的社會力量。只有迫使這個階層完全臣服於自己，才能鞏固、完善建立未久的專制制度，才能維持和擴大作為這個制度體現者的官僚特權階級的利益。因此，在經濟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即剷除了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完成了經濟領域的壟斷化專制化之後，很需要繼之以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即剷除民主主義的政治基礎和思想基礎，完成政治思想領域的專制化極權化。

由此可見，在完成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完成經濟基礎的壟斷化專制化之後，這兩大社會力量之間的衝突已經勢不可免。一個要求民主自由，一個執意加強專制統治，使它們之間的衝突與鬥爭，成為繼續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由於實力懸殊，加上專制集團早就佈陣以待，而知識份子卻墮入圈套而不自知。這場衝突的勝負，在開始發生以前，就已經判然分明了。

知識份子必須獨力面對專制制度的格局，是中國民主革命進程的特定階段的產物。只有到了九十年代，社會孕育了中產階層之後，才出現了改變這種格局的前景。

（三）

國際國內的客觀形勢，促成了兩個社會力量的對決。1956 年 2 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了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隨後又先後發生了波匈事件。根據薄一波的判斷，「波匈事件、特別是匈牙利事件，對毛主席和我們党的震動太大了，仿佛中國也存在這種現實的危險」。「僅僅從 1956 年 10 月 21 日到 11 月 9 日的 20 天時間內，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十三四次會議，討論波匈事件及有關問題」，「往往是通宵達旦，不分晝夜。」7 國內情況也很值得注意。「據不完全統計，從 1956 年 9 月到 1957 年 3 月半年時間內，全國發生數十起罷工、請願事件，每起人數一般有十多人至數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約一萬多人……在農村也連續發生了鬧社的風潮，如浙江省農村發生請願、毆打、哄鬧事件 1100 多起，廣東省農村先後退社的有十一二萬戶，等等。」8 在這些國內外政治地震的震波衝擊下，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對於這個包藏禍心的方針和理論，善良的人民只看到了它表面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趨向，認真地學習討論，構想著文化繁榮和政治寬鬆的前景。有的人甚至歡欣鼓舞地認為，中國社會已進入了一個春暖花開的解凍時期，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探尋民主自由的觸角。鍾惦斐的〈電影的鑼鼓〉、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劉賓雁的〈本報內部消息〉、流沙河的〈草木篇〉等等，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現行制度的專制本質，或呼喚著民主自由。費孝通的〈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則是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施放的政治氣球。這篇文章在對知識份子的前景表示了謹慎的樂觀的同時，還反映了知識份子對百家爭鳴的心態：「不肯敞開暴露思想的人還是占多數」，「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9 但總的說來，在國內外新形勢的鼓舞下，呼求民主自由的進步力量雖然還是顧慮重重，卻已經蓄勢待發；而處心積慮要打擊、壓服知識份子的統治者，也早已謀劃佈局，張網以待。需要的是一個足以引起變化的觸媒。這個觸媒就是整風運動。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隨即由《人民日報》在 5 月 1 日公佈於眾。這個指示宣告要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接

著，報刊媒體、大會小會，都大張旗鼓地展開宣傳，要求各界對黨和政府的缺點錯誤提出批評建議，幫助黨整風。這才出現了大鳴大放和所謂「右派進攻」的局面。

這次整風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為主要內容，而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卻是封建專制主義。這就使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行動，帶有民主主義的色彩。當然，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但由於他們有權力制衡的機制，還有強有力的輿論監督。執政的權力機構一出現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或主觀主義，就會受到有效的制約與監督，不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的損害。而在強化了一黨專政的中國，由於權力缺乏制約與監督，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便得以暢行無阻。它們的政治基礎就是專制制度。因此，要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就勢必觸及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民盟中央候補委員陳新桂在 6 月初的一次座談會上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個『根』。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愈反愈多。」10 這是很中肯的分析。因此，這個整風運動從一開始就面臨著一個無法擺脫的悖論：提出整風的原由是因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破壞了黨群關係，因而影響了新建立的專制制度的鞏固；但徹底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問題，卻又必須革除一黨專政的封建專制體制。正是這個尖銳的矛盾，一方面使幫助黨整風的群眾運動具有了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革命性質；另一方面，它最終難以避免由整風轉為反右的結局。

對於這個整風運動，有人認為是引蛇出洞的誘餌，因為毛澤東在發佈整風指示的三個月以前，就說過波匈事件「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11 這一類話，明顯地表露出他的用心。也有人認為不能排除共產黨真的是要整風的可能。因為毛澤東在 1956 年 11 月 15 日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曾明確表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12 但是，我寧願相信前一種看法。如前所述，毛澤東之所以提出整風，目的在於鞏固他的專制統治，就像延安整風是為了批倒批臭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確立他個人的絕對權威那樣，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提出整風，則是為了削弱那些足以影響他的專制統治的「消極因素」，鞏固一黨專政，

鞏固他的個人獨裁。但這個問題一旦提出，勢必激起對一黨專政的專制制度的批判，而這是他難以容忍的。所以，整風實際上只是開了一個頭，有些地區和單位甚至還沒有開始便轉入反右派了。而在反右運動結束後，整風運動也就不了了之，最多只是走走過場，草草收兵。所謂的整風運動，不但欺騙了知識份子，而且也耍弄了廣大黨員。它的最大作用，便是促成了大鳴大放，「右派進攻」。更正確地說，是促進了群眾性的民主運動的高漲。

整風運動既是民主運動的推進器，也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大羅網。說它是民主運動的推進器，是因為許多針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批評，是在「幫助黨整風」的名義下，經過再三動員才提出來的。1957 年 4 月 30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開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到會的有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知名的無黨派人士及劉少奇、朱德等人。會上毛澤東向黨外人士說明共產黨開門整風的目的和意義，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提出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13 在毛澤東親自示範的推動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都奉命舉行規模不等的座談會，動員與會者大膽發言，幫助黨整風。中共中央統戰部在 5 月初到 6 月初的一個月裏，連續召開了 38 次黨外人士座談會。其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座談會 13 次，有 70 餘人發言；工商界人士座談會 25 次，發言者有 108 人。14 由於建國以來在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鎮反肅反、三大改造等運動中都曾因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作祟而使許多人受到傷害，不但這些人自己有一肚子冤氣，甚至連他們的親屬好友也為之不平。所以，在連續的動員鼓勵之下，許多座談會開得熱烈而緊張。人們在會上傾訴了自己或親友的委屈，揭露了某些單位濫用權力、迫害無辜的違法行徑，還提出了很多改善工作、避免重犯類似失誤的建議。這些發言既是對專制制度的控訴，也表現了對執政者的希望和期待，涉及問題之多，範圍之廣，不但空前，大概也是絕後的。沒有整風運動和「幫助黨整風」的大發動，就不會出現這樣一個全國範圍的民主運動的高潮。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整風完全是一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大羅網，是毛澤東親自設計、親自指揮的一場殲滅知識份子的大戰。這一點將在下面另作探討。

（四）

對於大多數「右派分子」來說，被捲進這場民主運動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自覺地、有意識地鼓吹民主自由、改革專制政體的言論較少。在後來被劃為右派分子的知識份子中，比較自覺地主張改革政治體制，倡導民主自由的只有兩個群體：一是感知自己的政治力量，因而敢於衝擊專制政體的民主黨派；二是意識到自己投身于一場民主運動，因而公然宣揚民主自由、批判現行體制的青年學生。這兩個在「幫助黨整風」的鳴放期間最為活躍的群體，構成了這次民主革命的主力。毛澤東是看到了這一點的，他在 6 月 10 日起草的《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裏，就指出：「無論民主黨派、大學教授、大學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動分子，在此次運動中鬧得最凶的就是他們。」15 因此，他們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反右運動中受打擊最為嚴重的群體。

在幾個民主黨派裏，知識份子最集中的是民主同盟。它的成員多為教授、專家一類的大知識份子，受西方的民主主義思想的薰染很深，看不慣一黨專政的專制政體。所以，他們在鳴放期間提出的意見，往往涉及專制政體的本質，而為毛澤東所無法容忍。如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以及由曾昭掄等起草、後來被批為「科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綱領」的《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的幾點意見》，都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政治的小小的嘗試。至於章伯鈞在 6 月 6 日召開的民盟 6 教授會議，主要只是對鳴放的形勢作了一些分析，認為民主黨派應該在這次運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毛澤東卻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估計。他在為《人民日報》寫的七一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裏，形容他們「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利』者奪取權力也。」16 這與其說是章伯鈞的估計，不如說是毛澤東強加於他的估計。在同一篇社論裏，毛澤東還指責「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他說民盟和農工民主黨的一些人「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于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17 毛澤東如此荒唐地把民盟的改革建言歪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危言聳

聽，就是為了挑起人民群眾對民主黨派的不滿，借此徹底清除以民盟為據點的高級知識份子對專制制度的威脅，消解知識份子對民主自由的呼喚和宣傳。這一手狠毒的招式果然十分有效。不但民盟從此一蹶不振，其他民主黨派、甚至整體知識份子階層都俯首貼耳，噤若寒蟬，再也無人敢於鼓吹民主自由，對專制體制說三道四，直到毛澤東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結束。

青年學生是另一個意識到自己投身于民主運動的社會群體，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有著五四運動光榮傳統的北大學生，從 5 月 19 日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很快便掀起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高潮。他們不無理由地把 5 月 19 日開始的二十多天的「四大」熱潮，稱為「五・一九民主運動」。錢理群在《面對血寫的文字：初讀林昭》裏指出：「北京大學的五・一九民主運動是五四精神的繼承與發展，在中國現代民主運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五・一九民主運動」的歷史意義，在於它突出地展現了五十年前的那一場為「反右運動」所淹沒的民主革命運動的特質。在那些日子裏，北大校園內貼滿了大字報小字報，數以千計，內容遍及當時人們關心的有關國內國際的所有問題。其中既有感性的熱烈鼓吹，也有理性的冷靜分析。而最核心的主題，便是對民主自由的呼求。5 月 19 日最先出現的是一張大幅標語，抗議剝奪廣大團員的民主權利，接著是一張要求設置「民主園地」的小字報和沈澤宜、張元勳的大字報長詩《是時候了》。這首長詩宣稱：「我的詩/是一支火炬」，「它的火種來自——五・四！！」長詩呼喚人們「快將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張大字報則提出「開闢民主論壇，確保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到第二天，張貼的大字報已有一百六十多張。在運動日益高漲的這些日子裏，民主自由是最強烈的呼聲。有的大字報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個社會制度好還是不好的標準。」（王存心）「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賜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劉奇第）中文系王國鄉在大字報裏說：「我們當前的任務正是要為改革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而鬥爭，首先就是要爭取真正的人民自由民主。」「我們要求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制，擴大民主，保障人權和人格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18 生物系蔣興仁則認為：「美國英國有充分的討論競爭，有辯論和不信任票，是真民主；我國由党領導一切事務，先已決定，不許反對，沒有競爭，是假民主。」19 學生自辦的刊物《廣場》的發刊詞號召大家「發揚五四精神，去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

與文化」。並表示期待著新的文藝復興的到來。物理系女生燕遯符在大字報〈怎麼辦？〉裏，一開篇便宣告：作為五四的繼承人，光榮的北大學生「再次舉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幟戰鬥。」她要求「大力宣揚民主、自由、人道，並且從法律上、組織上、制度上確保人民的民主權利。」譚天榮在他的大字報〈幾句人情話〉的最後高呼：「自由、民主理性萬歲！」20 體現了運動的最強音。

很多大字報在在分析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時，都明確地指出：不民主的制度是產生「三害」的根源。物理系岑超南的大字報說：「斯大林的錯誤，波匈事件，我國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嗎？不，都是一個根源：不民主。」「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一掃空！」葉于泩也說：「法制不健全不嚴肅，民主權利沒有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產生的溫床。」21 蔣興仁更是直指共產黨是「宗派主義的鼻祖，官僚主義的根基」。22

在這些呼喚民主自由的大字報裏，值得注意的是，王國鄉和燕遯符的大字報裏分別提到「鬥爭」和「戰鬥」這樣的字眼，說明他們已經初步意識到，這場從「幫助黨整風」出發的群眾運動，已經超出一般的提出批評建議的範圍，而成了一場為民主自由而戰的鬥爭。當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許多大字報像《廣場》發刊詞那樣，把民主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爭取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化。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只是一個虛幻的招牌，它掩蓋著封建專制主義的本質。而民主自由，卻是反封建反專制的武器。爭取民主自由的口號不可能針對社會主義，只能指向封建專制主義。北大學生的「五•一九民主運動」的主題和主流的反封建反專制的特徵，足以表明它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

不但北大的「五•一九民主運動」體現著中國的民主革命進程，而且全國被鼓勵和推動起來的幫助黨整風提出的批評建議，一般也都帶有民主主義色彩。從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肅反鎮反、統購統銷、工業化、合作化、反胡風，到教育體制、科技體制、人事制度、統戰政策、黨群關係、官民關係等等各種問題的批判，無不牽涉到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當然，就五十余萬被劃為「右派分子」的知識份子的主流來說，他們的主觀願望是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他們或主動或被動地提出的批評建議，無一不是希望共產黨正視當政以來的種種錯誤，希望在中國建成一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社會。但是，專制體制以極權獨裁為特徵，它容不得任何力量對它的權威進行挑戰。所以，在幫助黨整風

的號召下出現的那些批評建議，都被視為對執政黨的權威的藐視，和對專制制度的侵害。它並不反黨，卻企圖削弱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它不反對社會主義，因為當時的中國社會根本不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它反對的只是假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專制主義之實的社會制度。這就使大鳴大放、「右派進攻」帶有反封建反專制的性質，成為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它是中國人民對經由「社會主義改造」而建立起來的專制制度的第一波衝擊。

1957 年 6 月 8 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向全國發出了「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號令，一時風雲變色。報刊上隨之出現了大量對那些善意批評建議的撻伐。直到 10 月中旬，毛澤東認為已經到了可以收網的時候了，於是由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這個文件所提出的六條標準，幾乎涵蓋了政治生活的全部領域。只要你對這些問題有所不滿，有所反應，都可以從這六條中找出相應的條款，把你劃成右派分子。

（五）

作為新專制體制確立後的第一波民主革命高潮，五十年前的「右派進攻」具有一個最為獨特的歷史現象：民主力量面對的是一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專制暴君。他仗恃著高度集權的政黨和一黨專政的國家機器，從誘使知識份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始，通過整風運動，一步一步地把知識份子推向鳴放的高潮，然後「聚而殲之」，把足以威脅專制制度的民主力量一網打盡。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場專制統治者為了撲滅民主革命而有意挑動起來的民主革命。這個奇特的歷史記錄，構成了五十年前的那一次民主革命的最主要的特徵。

從毛澤東這一時期的講話和他所寫的文件、文章裏，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起意設局、一手操控這場群眾運動的。從設置圈套和陷阱，到瘋狂反撲，嚴厲處治，每一步都表現出他的陰險狠毒的用心。

在 1957 年 1 月裏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先後作了兩次講話。在 1 月 18 日的講話裏，他說：一些教授有各種怪議論，「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並且別有用心地點撥：他們現在出來，「是不是想復辟？」他把人們鳴放要求民主，比喻為「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

了。」主張讓那些要大民主的「壞人」「做出錯誤的行動，講出錯誤的話，暴露和孤立他們自己。」在1月27日的講話裏，他告誡與會的領導人：「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23 這兩次講話，赤裸裸地表現出毛澤東的用心歹毒的圖謀。它充分說明，反右運動不是先有右派進攻，他們才起而反擊，而是早就設下圈套，誘使知識份子自投羅網。

5月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要各地黨組織「邀請黨外人士開座談會，請他們暢所欲言地對工作上的缺點錯誤提出意見。」24

5月15日，他為黨內幹部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其中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要「誘敵深入，聚而殲之。」25

5月16日，他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指示各地黨組織對「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26

6月6日，他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要各地「注意爭取中間派，團結左派，以便時機一成熟，即動員他們反擊右派和反動分子。」「在運動中，按左中右標準，排一下隊，使自己心中有數。」27

6月7日，他從報上發現了一個反擊右派的藉口。據吳冷西回憶：「我們剛坐下來，毛主席就興高采烈地說，今天報上登了盧郁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說他收到匿名信，對他攻擊、辱罵和恫嚇。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毛澤東告訴吳冷西，要抓住這個機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他連社論的題目都想好了：〈這是為什麼？〉28

6月8日，在《人民日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的同一天，他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提出「注意各民主黨派中反動分子的猖狂進攻。要組織每個黨派自己開座談會」。「高

等學校組織教授座談，向黨提意見，儘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來，登在報上。」「最好讓反動的教授、講師、助教及學生大吐毒素，暢所欲言。」29

6 月 10 日，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他指出：北京已經開始反擊右派，「各地地情況不同，何時開始反擊，要看當地情況決定。目前應著重組織各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開座談會，推動左中右三派人物展開爭論，最為重要。」「在這次運動中，一定要使反動分子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30

6 月 14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在一個時間內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並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導。」「其他有些報紙的一些編輯和記者也有這種情形，一些大學的新聞系教師也有這種情形。」31

6 月 29 日，他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於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增加了北京「需要在各種範圍點名批判的，大約有 400 人左右，全國大約有 4000 人左右」等內容。32

7 月 1 日，他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批判的矛頭主要指向民盟。除前面引述的指責民盟「反共反社會主義」，「呼風喚雨，推濤作浪」等內容外，還點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他在這篇社論裏還給右派下了明確的定義:「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33

7 月 9 日，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等問題的通知》，內容有二：1、「右派骨幹名單擴大了一倍」，應當增加在報上批判的人數；2、北京的社會科學家已經向右派舉行反攻，各地應當回應，在自然科學家中也應組織反擊。34

7 月 9 日，在上海幹部會議上講話，繼續鼓吹「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給右派一點小鞋穿是必要的」。35

7 月 17—21 日，26—30 日，毛澤東在青島先後兩次主持召開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寫出《1957 年夏季的形勢》，經過 11 次修改，於 8 月 3 日作為黨內文件印發。文章一開頭就說:「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

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澤東強調反右運動「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他說:「單有 1956 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36

8 月 1 日，起草《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除了還要增加登報批判的人數等內容外，特別提出:「黨內團內右派分子，只要是同黨外團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的，必須一視同仁，一律批判。該登報的，即應登報。」37

9 月 12 日、15 日，先後審閱修改《人民日報》的社論〈為什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和〈這是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38

在 10 月 9 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上，13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都大談反右派的政策和策略。39

從這個日程可以看出，反右運動這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鎮壓知識份子的政治大迫害，完全是毛澤東一手策劃、直接牽引著的。毛澤東的個人獨裁，他對民主與法制的蔑視，在這個政治運動中得到充分的演練。他是推動反右運動、鎮壓民主革命的罪魁禍首。這個大獨裁者為了翦除民主力量，竟調動了他所掌控的全部政治資源，挑起了一場民主革命的高潮，把全國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中，最終撲滅了這場民主革命。這是五十年前的反右運動的最大特色。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上，像這樣的歷史現象，過去沒有發生過，以後也不會再有了。

（六）

但是，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考察，民主革命所必須面對的，畢竟不是個人，而是違背理性、違反人道的專制制度。在反右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專制主義特徵，並不因反右運動的結束而終止，它一直延續到五十年後的今天。因此，探討反右期間的專制主義特點，對於正確認識現階段的民主革命任務，仍有著十分現實的意義。

反右運動的一個明顯特點是以黨代法。整個反右過程，都是通過黨內文件來推進的。1954 年 9 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心目中，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在那部由共產黨主持制定的國家根本大法第八十七條

裏，明明白白地規定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40 可是，憲法通過還不到三年，就遭到共產黨自己的粗暴踐踏。凡是試圖行使這些權利的公民，無不遭到沒頂之災。為什麼會這樣呢？

在我國古代，法律是用來管治百姓、維護統治秩序、保持社會穩定的工具。從《尚書·堯典》記載的「象以典刑」，到清朝的《大清律例》，無不如此。西方興起的資產階級革命，倡導自由，宏揚個性，珍視人權，保護私有財產。與此相應的法律，是以保障公民權利為主旨。我國早年仿效西方，制定憲法，從 1912 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開始，就已經初具現代憲法的規模。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一方面繼承了民國以來的憲法的民主傳統，同時又學習蘇聯，以序言的方式，規定了共產黨領導的合法性，並且把一些沒有明確內涵，理論上模糊不清，因而可以隨便解釋、任意利用的概念，如社會主義制度、人民民主專政等寫入憲法。這就使現行憲法帶有兩面性：既有保護公民權利的條文，也有鞏固專制制度的內容。長期以來，執政者往往以後者來否定前者，或者乾脆撇開憲法和法律，用黨內文件來宣佈政策，推進運動。反右運動就是這樣做的。

公民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權利，是民主主義的核心與靈魂，從中國民主革命的萌芽時期開始，就是憲法始終堅持的基本原則。早在 1908 年即光緒 34 年 8 月初一頒發的《憲法大綱》，就列有「臣民於法律範圍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中華民國成立後，歷次憲法都有類似條文。如 1911 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 1914 年的《中華民國約法》都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1913 年的《天壇憲法草案》和 1923 年的《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是:「中華民國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集會、結社的自由則另立一條。1931 年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和 1934 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提法分別是「人民有發表言論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集會結社的自由也是另立一條。411954 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關於公民自由權利的條文，正是對中國民主革命的憲政原則的繼承。沒有這一條，憲法就喪失了它的存在意義。以違憲違法的黨內文件來指導運動，正是對人民自由權利的公然蹂躪。這是以黨代法、以党

治國所帶來的必然後果。

另一個特徵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這是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的一貫手法。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上，從秦始皇藉口「為妖言以亂黔首」，坑埋四百余名儒生 42，到「康乾盛世」的文字獄，可謂史不絕書。但 1949 年以後卻有了新的特色。那就是「以革命的名義」，而革命又是一個看似明確、實際上非常模糊的概念。所謂「反人民」、「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都沒有確定性的內涵，但憑統治者的好惡，便可以隨心所欲地給人定罪作結論。在中共中央發佈的〈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六條標準〉裏，沒有一條具有明確的量和質的標準。結果，凡是對三反五反、院系調整、合作化、工商業合營、統購統銷等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提出批評，或是宣傳民主、自由、人權的，都被認為是反對社會主義；對思想改造、肅反鎮反、反胡風、批判胡適俞平伯及人事制度、幹部政策有看法的，則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至於主張教授治校、黨委退出學校，堅持司法獨立、無罪推定，以至批評各級黨組織領導人、包括基層黨支部書記的，都被加上反對黨的領導的罪名；有些人提出黨和群眾有距離，某些黨員脫離群眾，盛氣淩人，群眾對黨員敬而遠之，或認為農民生活苦，城鄉生活有差距，那就成了挑撥黨和群眾的關係，破壞團結；還有就是對「一面倒」的政策略有微詞，或對 1945 年蘇聯紅軍在東北強姦婦女、拆運機器表示不滿，或翻譯、傳播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那就是污蔑社會主義陣營，煽動分裂；如果有幾個人湊在一起，議論國是，發發牢騷，或商量怎樣寫大字報，最後往往就成為反革命小集團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言定罪、以文定罪，當然不是從反右運動開始的，它是戰爭時期党領導一切的傳統遺存的發展和擴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次運動都有許多因言或因文獲罪的實例。反右運動期間，在座談會或學習會上的發言，和發表出來的文章、小說，既是批判專制主義、宣揚民主自由的主要形式，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也是很多知識份子被劃為右派、打入社會最底層的主要依據。文化大革命後，經過思想解放運動，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文網漸寬，加上有胡耀邦、趙紫陽這樣一些具有民主意識的人當政，使八十年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為自由寬鬆的年代，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大發揚的年代。但由於一黨專政的專制制度沒有根本改變，民主自由的觀念仍然遭到文化專制主義的壓制，不時還有「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一類帽子飛來。1989 年鎮壓學生民主運動後，一方

面是專制主義的統治日益加強，另一方面，民間的民主主義潛流也在不斷積聚。近幾年來，文網更密，網站、報刊被封閉，書籍、文章遭查禁的消息，時有所聞。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還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依然是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矛盾和鬥爭的焦點。

以党代法、以文定罪，都是專制主義制度在反右運動中展現出來的基本特徵，也是鎮壓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在總結反右運動的教訓的時候，毫無疑問，依法治國、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都應當成為現階段繼續民主革命的重要內容。

（七）

反右運動是中國民主革命力量同新專制主義政權的第一次對決。它採取了反右運動的形式是帶有一定的偶然性的，但兩種社會力量的對抗和衝突則屬不可避免。1953 年，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張揭民主自由的中國共產黨放棄了繼續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革命任務，採取了反對以至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方針。而就當時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來說，放棄繼續完成民主革命，消滅還沒有充分發育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就只能向封建專制主義倒退，這個倒退過程，即封建專制主義的復辟過程，首先是在經濟上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私有制和個人所有制。在此之後，必然要在政治上鎮壓足以威脅專制政權的社會力量，剝奪他們宣傳民主自由的權利和條件。反右運動就是從政治上鞏固專制制度、撲滅對抗勢力的具體形式。毛澤東 1957 年 11 月 7 日在莫斯科會見中國留學生時，曾得意洋洋地說：「在我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有人認為是在 1956 年，我看實際上是在 1957 年。1956 年改變了所有制，這是比較容易的。1957 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43 他在這裏坦露心跡，認為反右運動比改變所有制的「三大改造」還艱巨，還重要。因為他深知，對付知識份子要比對付資本家和農民困難得多。只有徹底壓服知識份子，撲滅在中國宣傳和實行民主自由的條件，他的「社會主義制度」即新專制主義制度才能江山永固。果然，反右運動之後，知識份子成了驚弓之鳥，噤若寒蟬。毛澤東這才轉而對付黨內威脅他的獨裁統治的力量，於是便有了廬山會議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幫，為中國民主革命帶來轉機。首先是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農民突破人民公社的農奴制，實行包產到戶。這種從求生本能出發的革

命要求和革命行動，為改革打開了大門，為民主革命的繼續開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從小崗村發軔的經濟體制改革，突破了國家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壟斷；民有經濟和個體經濟有如雨後春筍，沛然叢生，動搖了專制統治的經濟基礎，成為繼續民主革命的重要形式。但是，佔據著統治地位的特權階級卻千方百計地阻撓政治體制改革。因為，正是依靠著政治的特權，他們才得以借經濟體制改革之機，撈取不法不義之財。這樣，民主革命就不得不面臨雙重的改革任務：經濟上繼續向壟斷領域進軍，把壟斷企業推入市場，根除專制統治的經濟基礎。在政治上，大力宣傳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促進上層建築領域的民主革命——改革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使中國能更快地融入全球化現代化的世界文明發展進程。二十多年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西單牆等民主論壇，《苦戀》及其它「傷痕文學」，1986 年的學生民主運動，《河殤》，1989 年天安門的民主高潮，都是民主革命力求突破新專制主義的嘗試。統治者則利用了文武兩手——從「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到坦克機槍，進行了無理的批判和殘酷的鎮壓。

五十年前由知識份子掀起的民主運動，被反右運動所摧毀，造成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長達二十年的沉寂。由粉碎「四人幫」帶來民主運動的十年高漲，被血洗長街的野蠻暴行所鎮壓，到現在已經十八年了。我們略加對比就可以發現，反右運動徹底壓制了人民的民主要求，民主革命銷聲匿跡達二十年之久；而八九鎮壓不過十多年，便出現了民主革命的新形勢：一方面，經濟領域的民主革命——經濟體制改革仍在繼續，全球化現代化的洪流不可阻擋地把中國推向民主革命；另一方面，人們在思想意識領域打破了個人迷信的禁錮，有可能進行獨立的自由的思考，為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條件。這種狀況，同反右運動後的那種萬馬齊喑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語。我們沒有理由悲觀。

目前，中國的民主革命正面臨著文化上反封建、政治上反專制、經濟上反壟斷的嚴重任務。在一百多年民主革命的歷史中，最慘痛的教訓，無過於對文化意識形態的封建主義的忽視。中國共產黨從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鬥爭的目標放在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上，卻沒有把反封建的任務提上日程。後來提出了反封建，只把它看作是政治上打倒國民黨專制政權，經濟上實行土地改革，消滅地主，卻放鬆了對文化意識形態的封建主義的警惕和鬥爭。結果在取得政權不過幾年之後，便出現了封建專制主義的復辟，導致幾千萬人死於非命，社會道德大滑坡。

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後，經濟迅速發展而政治專制極權，文化畸形繁榮而了無創新。這一切都是專制主義復辟的惡果。只有把反封建、反專制、反壟斷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中華民族才會有光明的前途。

我國現階段的民主革命主要依託三種具體形式：改革，維權運動，啟蒙運動。經濟體制改革正在進一步地突破壟斷領域，民有經濟開始艱難地曲折地向壟斷領域進軍。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不斷高漲，特別是加強監督機制，開放輿論監督，推行政治民主，轉換政府職能等，已經成了公眾關心的普遍呼聲和熱門議題。由占地、拆遷、下崗等引起的維權運動，由於一些律師和公眾人物的介入，正在由感性向理性發展，成為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節的民主革命運動的新形式。至於啟蒙運動，雖然新聞檢查制度空前嚴酷，輿論導向挖空心思地進行控制，但由於互聯網的發達，資訊和知識的傳播迅速而廣泛，從而創造出民主啟蒙的空前未有的大好條件。傳播歷史和現狀的事實真相，各抒己見地探討真理，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內容。它將有力地促進民主革命的開展。

簡短的結語

五十年前的反右運動是中國民主革命進程的一個重要環節。它的精神和意義，上承五四運動和 1949 年取得初步勝利的民主革命，下接八十年代的民主意識和民主運動的高漲，甚至可以延續到現階段已初現端倪的民主革命高潮。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最重要的歷史意義，就是要繼續和發揚、發展五十年前爭取自由民主、反對封建專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當然，由於專制勢力的強大，民主革命的發展將是十分困難、十分曲折的，我們應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是，我們是歷史主義者，深信歷史將按照它自己的規律闊步前進，民主革命必將在中國徹底完成它的歷史使命。我們有理由深信不疑。(2007 年 4 月 11 日完稿，5 月 19 日改定。)

——為 2007 年 6 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發表於《當代中國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注 釋

1 《毛澤東選集》》第 3 卷第 1048 頁、1076 頁，人民出版社 1953 年 2 月直排版。

2　見於《人民政協文件》，新華書店 1950 年 7 月發行。

3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 6 月）第 14 頁。

4　《毛澤東選集》第 3 卷第 1083 頁。

5　《毛澤東選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 27 頁。

6　《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 258、265、279 頁。

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第 631 頁、575 頁。

8　同上，第 569 頁。

9　1957 年 3 月 24 日〈人民日報〉。

10 1957 年 6 月 8 日〈光明日報〉。

11 《毛澤東選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38、334、335 頁。

12 同上，第 327 頁。

13 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 117 頁。

14 同上，第 130 頁。

1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 503 頁。

16 《毛澤東選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37 頁。

17 同上，第 435 頁。

18 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第 95、119、150 頁。

19 《校內外右派言論彙集》（北京：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1957 年 8 月）第 175 頁。

20 《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第 20、263、264、52 頁。

21 同上，第 209 頁、142 頁。

22 《校內外右派言論彙集》（北京：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1957 年 8 月）第 108 頁。

23 《毛澤東選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33、334、337、355 頁。

2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 456 頁。

25 《毛澤東選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24-425 頁。
2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 478 頁。
27 同上，第 491 頁、492 頁。
28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第 39、40 頁。
29 《毛澤東選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31 頁、432 頁。
3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 502 頁、503 頁。
31 同上，第 508 頁。
32 同上，第 528 頁。
33 《毛澤東選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35 頁、438 頁。
3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 537-538 頁。
35 《毛澤東選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51 頁。
36 同上，第 456、461 頁。
3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 557 頁。
38 同上，第 576 頁、579 頁。
39 《毛澤東選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66-468、480-493 頁。
40 戴學正等《中外憲法選編》（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第 29 頁。
41 同上，第 103、107、121、112、129、144、151 頁。
42 《史記·秦始皇本紀》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 258 頁。
4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 651 頁。

審視反右五十年　　　郭羅基

從 1957 年往前看五十年，1907 年的事似乎非常遙遠。從現在往前看五十年，1957 年的事，似乎幷不遙遠，因爲從那時到現在，茫茫世事一綫牽。

1957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發生了一場大悲劇，那就是共産黨發動的整風運動轉向了反右運動，當時作爲「右派分子」遭到政治上打擊的直接受害者達五十五萬多人；株連所及，超過百萬。更爲嚴重的是事後，從此中國歷史走入歧路，禍害衆生數十年。

任何歷史事件都是前事之果、後事之因。

1957年的大悲劇的發生，是以1953年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爲原因；向社會主義過渡又是以1949年的共産黨政權的建立爲原因。1957年的大悲劇的收場，引出1958年的大躍進爲結果；大躍進的失敗，又引出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爲結果。因果的鏈條一環扣一環，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關鍵的一環。

禍起總路綫

按當時的說法，反右運動是在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由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必然引起的。所以，考察反右運動的由來，必須追溯到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所謂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生産資料所有制的革命，改造農業、手工業的個體所有制和工商業的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建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消滅資産階級和城鄉小資産階級。

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始于1953年。這一年，在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同時，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綫。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李維漢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調查報告時，毛即席發言，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

「過渡時期」從什麼時候開始？當然應是從他講話的時候開始。後來他却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過渡時期」就開始了。2即便如此，至少還應當用六年到十一年的時間，「逐步過渡」。實際上，三年就「全部過渡完」。按照毛澤東自定的標準也「走得太快」了！

毛澤東說：「本來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時間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3結果快馬加鞭，三年到頭，完全脫離實際。毛澤東用的還是老辦法：農村

包圍城市。1955 年，反對「小脚女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掀起農業合作化的高潮。他說，就是爲了造成「鄉下壓城市」的形勢。第二年，「鄉下」的形勢逼迫城市的社會主義改造提前完成。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之上的。當時的中國，是十足的農業社會。建立在農業社會基礎之上的主觀社會主義，只能是「農業社會主義」。從政治文化方面來說，缺乏民主、文盲衆多，與此相應的農業社會主義，又只能是「封建社會主義」。

毛澤東提出一條總路綫，强制推行，向社會主義過渡，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的。開國以後的憲法性文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幷沒有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憲法明確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行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義制度」。過了兩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違反憲法，未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討論，擅自宣布：「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所以，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非但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

中共八大提出今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即轉向經濟建設，人們是高興的。但一年以後，毛澤東推翻中共八大的决議，代之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4 在客觀條件不具備的情况下向社會主義過渡，結果不是歷史的前進而是倒退，倒退到控制經濟、控制政治、控制思想的專制主義。

鄧小平曾說：中國的社會主義「事實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二十一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5「不够格」的社會主義整整提前了一個世紀。二十世紀中葉三大改造完成以後出現的「反社會主義思潮」，正是反對社會主義「不够格」，反對將「不够格」的社會主義强加于人民。從主觀、客觀條件來說反對的是主觀社會主義，從生產力水平來說反對的是農業社會主義，從上層建築來說反對的是封建社會主義。1957 年反對封建社會主義的言論，以林希翎在北京大學的演說爲代表。6

民主反黨主

社會制度的改變，從新民主主義制度改變爲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性質的改變，從人民民主國家改變爲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由共產黨說了算。說起來中華人民共

和國是人民當家作主，實際上是共產黨當家作主。黨主代替了民主。

從中國共產黨的决策程序來說，又是由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1953 年 6 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綫。事關黨的總路綫的提出，中共中央竟沒有一個正式文件，只有毛澤東的一次講話、兩次批示。1954 年 2 月 10 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批准了這條總路綫。這是在宣傳和執行了將近一年之後，對既成事實不得不加以追認。

1949 年 9 月 30 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中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按照新民主主義的原則」宣告成立。7 問題在于，毛澤東本人的設想改變了，而堅持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中央其它領導同志」（尤其是劉少奇），却被指責爲「右傾」。作爲「右傾」而遭到批判的三句話：「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8，實際上都是毛澤東自己原來的主張。

中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不是自然歷史過程，而是運用政權的力量强制推行。這個政權之所以能够强制推行，因爲它是共產黨一黨專權，一黨專權又便于一人獨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建立的不是民主聯合政府，而是黨主專權政府，民主黨派成了「花瓶」，他們的代表人物參政不過是客卿。

共產黨的一黨專權是不合法的，不但違反了現代文明社會的法治原則，也違反了共產黨自己領導制定的《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到現行憲法。

1949 年產生的憲法性文件《共同綱領》，既沒有「社會主義」也沒有「共產黨的領導」。

1954 年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在序言中有兩處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一處是說中國人民「終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另一處是說我國人民已經結成「以中國共產黨爲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這些都是叙述事實，不是法律規定。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種條文雖然沒有可操作性，但具有否定性的價值。既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那就不是屬于任何政黨；共產黨的一黨專權應在違憲之列。

以「黨的領導」的名義實行的是淩駕于國家權力機構之上的「黨的專權」。從憲法條文來說，共産黨的一黨專權是違憲的，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一總綱。

共産黨一黨專權，不僅違反憲法，也違反了馬克思主義。一黨專權的共産黨不是《共産黨宣言》的共産黨。《共産黨宣言》是反對「天然首長」的。而在一黨專權下的各級首長，正是毋須授權、不用選舉、無法撤換的「天然首長」。

1957 年的「大鳴大放」中，作爲「反黨」思潮，正是反對黨主，反對黨天下，反對一黨專權。這方面的言論以儲安平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爲代表。[9]1957 年的「反黨」思潮，正是站在四十年代主張民主聯合政府的共産黨的立場上，反對五十年代實行黨主專權政府的共産黨。這正是幫助黨整風，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

就算是真正的反黨，也不能成爲鎮壓的理由。民主社會裏，沒有一個政黨是不可以反對的。反黨行爲是受法律保護的。這些，都是公民的常識。「反黨」之所以成爲罪名，只能說明中國不是民主社會，也說明共産黨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類似于家天下的黨天下，就像專制皇權那樣，是一個人莫予毒的强權統治集團。

鄧小平提出一個問題：「1957 年的問題是個甚麼問題呢？」他的回答是：「這個時候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10] 所謂「反對社會主義」，是反對主觀社會主義；所謂「反對黨的領導」，是反對黨的專權。主觀社會主義和一黨專權，按照「党的領導」制定的憲法，也是不合法的。1957 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是以民主反對黨主，呼喚和促成共産黨在執政條件下的轉變。可惜，共産黨喪失了拯救自己的機會。

鄧小平一再講，反擊是必要的，錯在擴大化。鄧小平不說正確不正確，却說必要不必要，這就走題了。即使認爲「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也只能以思潮來反擊思潮，那就是進行平等的辯論。事實上不是反擊思潮，而是迫害人身。而且是共産黨運用僭越了的國家政權的力量，由黨委定案，將五十五萬多人搞成「敵我矛盾」，幷采取降職、降薪、撤職、開除、勞動教養等等的懲罰措施。用一句話來回答，1957 年的問題是個什麼問題呢？那就是以非法的手段維護非法的存在。

錯在整風 不思改革

1957 年的事情，人們往往以爲錯在整風轉爲反右，我却認爲根本是錯在整風。1956 年以後的形勢，根據客觀上提出的任務，正確的决策不是整風，而是改革。選擇整風，走向反右，勢不可免。

1956 年，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問題，引起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動蕩。波蘭、匈牙利事件之後，蘇聯和東歐各國所進行的探索是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雖然剛剛建立，因爲它是追隨蘇聯模式，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弊病，已經充分暴露。在國際上，改革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勢所趨。面臨同樣的形勢，中國不思改革，却迷戀整風。

中國之所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出現突發性的社會矛盾，就是因爲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時間上提早了，規格上走樣了，建立了一種「不够格」的社會主義、扭曲的社會主義。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不是出于人民的願望，而是共産黨的意志。這種社會主義一旦建立，也不可能立即取消。所以緩和、解决社會矛盾的出路就在于改革主觀社會主義，以及改革將主觀社會主義强加于人民的共産黨集權制。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是社會的代言人。他們在「大鳴大放」中被指責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其實質就是改革主觀社會主義、改革共産黨集權制。北京大學的大字報直接發出了改革的呼籲。11

共産黨爲什麽提出整風？因爲他們把社會矛盾的産生歸結爲思想作風問題。對國內問題的認識與對國際問題的看法是相關的。由斯大林問題引起的大論戰，國際上的主流意見認爲是社會主義制度出了毛病，代表中國共産黨立場的《再論無産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卻認爲「决定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狀况」。認爲是制度問題，所以就要改革制度；認爲是「思想狀况」，所以就來搞整風。而且還說：「斯大林的錯誤幷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爲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這就完全拒絕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而「思想狀况」又是外來的，不是共産黨自身産生的。毛澤東說：「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産階級的東西，我們黨內存在這三個東西，這個帳要挂在資産階級身上。」12 中共領導人以爲只要整掉資産階級傳播到共産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就萬事大吉了。

在中共的領導人中，只有周恩來注意到了制度問題。他認爲，嚴重的官僚主義來自脫離群衆、脫離實際，脫離群衆、脫離實際的原因是缺乏民主、忽視民主，

缺乏民主、忽視民主的根源是集權的制度。所以他指出:「專政的權力雖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但這個權力是相當集中相當强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蘇聯的歷史經驗可以借鑒。所以我們要時常警惕，要經常注意擴大民主，這一點更帶有本質的意義。」爲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强調:「就要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上想一些辦法」。131956 年 5 月，國務院召開了全國體制會議，檢查中央集權過多的現象，提出關于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的決議草案。但是，周恩來的語調過于溫和，呼聲過于微弱，事實上在共產黨內根本不起作用；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的集權，也絲毫不能觸動共產黨的集權。

在改革和整風之間作選擇，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思維定勢在起作用。經過延安整風以後，整風似乎成了傳家寶，每臨大事說整風。1950 年，爲了渡過財政經濟的困難，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決定進行一次全黨整風。1951 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文藝界開展了一場以改造思想爲內容的整風。1952 年的「三反」運動，開始時也是叫做整風。從 1956 年的「多事之秋」到 1957 年的「不平常的春天」，國內外呈現出錯綜複雜的矛盾。毛澤東祭出整風的法寶，以爲整風就能解決一切問題，還說「現在要整風，將來還要整風」。

有因必有果。同一原因可以引出不同的結果，幷非注定只能出現一種結果。以主觀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集權制爲原因，可以導致改革，也可以導致整風。因果性不等于必然性。但必然性一定會在歷史上頑强地表現自己。改革就是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的必然性。中國共產黨可以在 1957 年不選擇改革，但二十多年後不得不選擇改革，只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選擇改革，就是修補和挽救主觀社會主義，削弱以至放弃一黨專權。選擇整風，則是相反，正是堅持和維護主觀社會主義，保衛和鞏固一黨專權。反右也是一樣，整風和反右的目的是一脉相通的，從整風到反右是順理成章的，當時只有進行改革才能避免反右的歷史大悲劇。一黨專權的正式名稱叫做「黨的領導」。整風的目的，正是爲了加强「黨的領導」。實際上是加强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而又要消除由于壟斷權力所產生的弊病，難矣哉！以加强「黨的領導」來整頓黨自身的運動，不過是飲鴆止渴而已。

轉向反右 策劃「陽謀」

進行整風，結果走向反右。毛澤東說是「陽謀」。「陽謀」之說不可信，有人就說是「陰謀」。「陰謀」之說也是膚淺的。毛澤東不是預先按照「陽謀」來設計整風和反右，而是在整風中見風轉舵，轉向反右，才策劃「陽謀」。

毛澤東的本意不是以整風來「引蛇出洞」，他有更大的抱負，那就是以整風來證實他的創造性理論，爲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樹立樣板。

毛澤東的得意之作是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被吹噓爲「馬克思主義發展到毛澤東思想階段的一個重要標志」。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對于區分兩類矛盾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了系統闡述。六月十九日公開發表，題爲《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整風就是以「鳴放」爲手段，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是有眼光的。他說：「人們還不能斷定毛澤東關于百花齊放的講話究竟是標志著自由主義的開端，還是誘人陷入羅網的方法。」14 這就是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既可以是「自由主義的開端」，也可以是「誘人陷入羅網的方法」。事實上，「鳴放」先是「自由主義的開端」，後來又轉爲「誘人陷入羅網的方法」。

爲什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可以正反兩用？本來 1954 年憲法已經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障公民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它文化活動的自由。」還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的自由。因爲事實上憲法不起作用，所以才需要提出一個黨的方針。以黨的方針代替憲法的規定，表明党的權威高于憲法的權威。黨的方針的執行，當然必須體現黨的意志。毛澤東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既然有權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也有權束手不讓大家講意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好像放風箏，看起來風箏可以在空中自由飄蕩，它的牽綫的另一端掌握在黨的手中，可上可下，可放可收。

1957 年 1 月 7 日，陳其通（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長）、陳亞丁、馬寒冰、魯勒四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他們以文藝爲工農兵服務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責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文藝界的形勢表示憂慮和反感。九家省級報紙紛紛轉載，表示支持。毛澤東對此極爲重視，指示中央辦公廳將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印發給中央政治局成員和省市委書記討論。他批評陳其通等人是教條主義，「無非是來阻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15 他還一

再說，党的高級幹部中，贊成雙百方針的是少數，不贊成的是多數。以《人民日報》爲首的黨報，對于貫徹雙百方針按兵不動；倒是《文匯報》、《新民晚報》、《光明日報》等非黨報紙熱烈響應。毛澤東在外地說，回去要責問《人民日報》。《人民日報》聞訊，趕緊在四月十日發表一篇社論，題爲《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王若水起草），指出：「黨內還有不少同志對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不同意的。……『勸告』黨趕快改變自己的方針。」批評陳其通等人就是代表這種傾向。毛澤東對這篇社論大爲贊賞。當天，他找《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鄧拓等談話，指名讓王若水參加。毛在表揚王若水的同時，責問：《人民日報》爲什麼在五十多天裏沒有發表反駁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幷嚴厲批評：「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16

毛澤東大力推動「鳴放」；「鳴放」的結果，却始料所不及。「鳴放」中觸犯了他設置的前提，前提是加强「党的領導」，「鳴放」中却追究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矛頭指向「黨天下」。于是，「鳴放」從「自由主義的開端」變成「誘人陷入羅網的方法」，從反對教條主義變成「引蛇出洞」。

根據李維漢、胡耀邦等人公開表示的看法，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是發生在五月中，標志是毛澤東寫作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原題爲《走向反面（未定稿）》）。《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標明，這篇文章寫作的日期是五月十五日，實際上經多次修改，直到六月十二日才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真正起轉折作用的是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毛澤東起草）。這個文件，一方面表示對善意的批評采取歡迎態度，同時又說整風中已經出現反共的苗頭。一方面肯定基本上是誠懇的批評占百分之九十，又說：「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要放手讓他們發表，暫時（幾個星期內）不予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研究反駁的問題」。17

「陽謀」，是從這時開始的；不是按照「陽謀」將整風轉向反右，而是决定了轉向反右才產生「陽謀」。放手讓反動言論發表以後怎麼辦？「陽謀」還是不具體的。如何反駁，過一個時期再研究，而且「帽子」也沒有定型，只是泛稱「右翼分子」。直到六月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毛澤東起草），

才作出决定，不是反駁而是反擊，反擊的時間定在六月十五日左右。六月八日，抓住戰機提前出擊，《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社論《這是爲什麼？》，打響了反擊右派分子的第一槍。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黨內指示《關于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反右運動以資產階級右派作爲鬥爭的對象。毛澤東說：「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18

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資產階級是人民。即使資產階級右派也仍然是人民中的一個派別。1957 年却把右派當作反動派，把人民內部的一個派別當作敵我矛盾。本來左派和右派都是群體性的政治傾向。右派而落實爲「分子」，「右派分子」就成了一頂「帽子」、一個標簽、一種身份。一旦戴了這頂「帽子」、貼上這個標簽、具有這種身份，不但是敵我矛盾，而且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并列，成爲永世的罪人。

整風是爲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轉向反右却將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嚴重混淆兩類矛盾，比起蘇聯和東歐來有過之無不及。毛澤東提出的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抽象來說，似乎很有道理；實行起來，總是站在「我」的立場上來論「敵」、判「敵」、制「敵」。一黨專權的體制不變，造成的結果與斯大林主義沒有區別。斯大林也可以斷然說：「我在肅反中消滅的都是敵人。」「正確處理」的主體是人，而且是有權處理矛盾的人，這一理論的前提是人治。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只有在法治的框架內才能得到有效貫徹。

整風轉向也不是第一次了，1942 年的延安整風就是如此。開始是反對教條主義的思想運動，繼而轉向「審幹運動」，最後成了「搶救運動」（即肅反運動）。整風總是從整思想轉到整人。這與共產黨、毛澤東的民主觀有關。毛澤東認爲，「發揚民主」就是「讓人講話」、「讓群衆講話」。既然是「讓人講話」，同樣也可以不讓人講話。整風就是從讓人講話轉向不讓人講話。「讓人講話」當然是讓人講願意聽的話，但講話的人總是要講自己願意講的話。這就是「發揚民主」的內在矛盾。不讓人講話，積怨日久，難免爆發。一旦讓人講話，不可能都是願意聽的話，所以「讓人講話」之後勢必不讓人講話。只有實行以憲法爲保障的民主制度，才能徹底改變從讓人講話到不讓人講話的轉向。人人有權講話，不需要當權者開恩；

當權者無權不讓人講話，而是必須恭恭敬敬地聽人講話。

1957 年從反「左」到反右的轉向，不僅是策略性的，而且是戰略性的。從此，口號不斷地反右，脚步不斷地向「左」，至文化大革命而達于極左。毛澤東一再在正當反「左」的時候强扭爲反右。他本人就有「左」的偏愛。

毛澤東是反左傾上臺的。但他自己又成爲左傾和極左的代表人物，值得深長思之。這說明，左傾是共産黨的痼疾，只要氣候適宜，立即舊病復發。同時也說明，共産黨所立足的中國的這塊黃土地，具有滋生左傾的社會歷史根源。反「左」以及鏟除它的社會歷史根源，是全民的長期的艱巨任務。

事與願違 三種轉向

看起來毛澤東在那裏指揮一切、决定一切，實際上，許多時候，許多事情，都不以他的意志爲轉移，行爲的動機和實踐的結果常常是背反的。他也是「本來要走進這個房間，結果走進了另一個房間」，成了歷史的玩偶。1957 年，毛澤東發生了三種轉向。

從 1956 年 11 月到 1957 年 5 月上半月，毛澤東公開談到整風的目的都是針對共産黨自身，以民主黨派和人民群衆爲借用力量，來解决共産黨内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以及幹部中的國民黨作風。他也談到螞蟻出洞了，要防止匈牙利事件等等，但這不是在共産黨的整風中所要解决的問題。

最初提出進行一次新的整風運動，是 1956 年 11 月 15 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大發議論，講什麽大民主和小民主。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有西方資産階級式的大民主，也有波匈事件式的大民主，「我們愛好的是無産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共産黨的整風是小民主，甚至是小小民主。毛澤東的民主概念是極其混亂的。民主分成兩種：大民主和小民主；大民主又分成兩種：資産階級大民主和無産階級大民主。小民主是否也可以分成兩種？沒有說。大民主和小民主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質？也沒有說。却說兩種大民主是互相反對的。姑且按毛澤東的原意，大民主和小民主是兩條平行綫，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1957 年 3 月 12 日，在有一百六十多名黨外人士參加的中國共産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正式宣布：「現在共産黨中央作出决定，準備黨内在今年開始整風。」幷第一次提出「黨外人士可自由參加，不願意的就不參加。」19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毛澤東一路南下，風塵僕僕，三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連日在濟南、南京、上海的黨員幹部大會上發表講話，談到整風的目的是：「要經過整風，把我們党艱苦奮鬥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20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也在全國各地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論述整風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關係。與此同時，民主黨派各自召開全國性會議，討論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兩次講話。

由于全國範圍出現了討論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熱潮，中共中央認爲整風的局面客觀上已經出現，不得不改變原來的計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中指出：「這兩個報告（指毛澤東二月二十七日和三月十二日的兩次講話）的傳達引起了黨內外的熱烈討論，就我們黨來說，實際上，這就是整風運動的開始。」

整風運動正式開始以後，五月四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開展批評的指示》（毛澤東起草）。這一文件值得注意的是：

一，歡迎黨外人士對共產黨的批評，强調它的積極意義。

二，對于不正確的批評，或批評中的有些不正確的觀點，當然應予反批評。但是，「要研究回答的時機并采取分析的態度，要有充分說服力」。

三，與民主黨派已達成協議，不要在民主黨派內和社會上號召整風，而是要對共產黨形成社會壓力。

四，黨外人士參加整風，「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要他們批評他們自己」。21

在一個時期中，中共中央統戰部千方百計動員黨外人士投入「鳴放」。有人不願參加座談會，或參加了不發言，還打電話、登門拜訪，好言相勸。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出反擊右派的信號後，整風完全變調了。毛澤東爲中共中央起草了黨內指示《關于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本來說黨外人士的批評對共產黨「極爲有益」，現在却說那是向黨「猖狂進攻」。本來說要對共產黨的整風形成「社會壓力」，現在却說要「組織力量反擊」。他還寫道：「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22 本來說對付「匈牙利事件」是大民主，共產黨的整風是小民主。現在大民主、小民主兩條綫并成一條綫了。如果現在的指示是正確的，那麼以前的指示就有問題了。毛澤東說，沒有問題，那是「陽謀」，爲了「引

蛇出洞」。這表明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洞察一切，他又是一貫正確的了。毛澤東有兩個沒有料到：第一，沒有料到黨外人士在「鳴放」中的批評如此尖銳；第二，沒有料到黨內幹部對「鳴放」的抵觸如此强烈。「陽謀」之說正是一箭雙雕，在反擊黨外人士的同時安撫黨內幹部。目的是爲了掩飾前後的自相矛盾，對急轉彎作一種自圓其說的解釋。一時頗爲得計，但從此共產黨失信于民，喪盡道義。某些批評毛澤東的人們，以爲事情都是按照「陽謀」（應讀作陰謀）進行的，把他的事與願違當作心想事成了，反而抬高了毛澤東。

從黨內整風到全民反右的轉向，又引發另外兩種轉向。

毛澤東最初提出整風是真心誠意，還是虛心假意？僅僅從主觀意圖來說，他是真心誠意的。但是，他的真心誠意是整下不整上，或借用儲安平的語言來說，是只整「小和尚」不整「老和尚」。相反，通過整風正是爲了加强自下而上的集權，「增加党的威信」（也就是「老和尚」的威信）。毛澤東爲中共中央起草的一個文件，《限期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況報告中央》中，提出十多個問題，限在十五天內書面報告中央。其中列出：「你們對人民鬧事采取了什麼態度」，「党和黨外人士（主要是知識界）間的不正常的緊張氣氛是否有了一些緩和」，「黨內某些人中存在的國民黨作風是否開始有所變化」，等等，都是矛頭指向「你們」，絲毫沒有涉及他自己所代表的共產黨集權體制。23

毛澤東之所以痛恨官僚主義，因爲它也會腐蝕共產黨的集權體制，敗壞威信。但「鳴放」中出現了矛頭對著「老和尚」，質疑共產黨的集權體制，這就違反了毛澤東的意圖。于是，他就要團結全黨，一致對外，又從整「小和尚」轉爲保「小和尚」。本來，他對黨外人士批評「小和尚」是興高采烈的，現在却說那都是「反黨」。「党」是一個集合概念。反右以後，本單位的負責人，甚至某些黨員都成了「黨」，反對（實際上或許是正當的批評）他就是「反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人吸取了反右運動的教訓，死保本單位的負責人，又成了「保皇派」。此一時彼一時也。

毛澤東的意圖中還有隱秘的成分，也像後來的「炮打司令部」一樣，他想利用整風來解决共產黨上層的分歧。這一次的目標不是劉少奇，而是周恩來。正是要聯合劉少奇來反對周恩來。他就撤換周恩來的總理職務徵求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沒有表示同意。24

毛澤東爲什麼以周恩來爲目標？因爲周恩來是「反冒進」的代表人物。

毛澤東在農業合作化的高潮中寫道：「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加快。」25 毛澤東處于亢奮之中，只管抒發他的浪漫情懷。但從事實際工作的務實的領導人周恩來、陳雲等人却陷入了財政透支、原材料緊缺的困境，不得不提出「反冒進」。毛澤東認爲，「反冒進」就是反對他。

1956 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冒進》，指出：急躁冒進已經成了「嚴重的問題」，「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要求計劃「符合于客觀實際的可能性」。毛澤東看了大爲震怒，在當天的報紙上批道：「尖銳地針對我」。

李志綏最先指出：「毛開始時是想藉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26 他可能是在中南海裏面聽到的私下議論，沒有什麼論證。

毛澤東怎樣煽動黨外人士來攻周恩來？

王若水認爲：「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一段話是意味深長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們希望一切同我們共同奮鬥的人能够勇敢地負起責任，克服困難，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27

「皇帝」是指誰？王若水認爲是指周恩來。這句話如果由別人講出來，「皇帝」可能是指毛澤東；由毛澤東講出來，决不會是指他自己。誰來「拉下馬」？如果向共產黨員發出號召，可能是針對共產黨的「皇帝」；毛澤東是寄希望于黨外「同我們共同奮鬥的人」，那就不是把共產黨的「皇帝」拉下馬了。毛澤東講話一貫是皮裏陽秋的。他說：「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他本人是高貴者還是卑賤者？事實上他是高貴者，但他决不會自認爲最愚蠢。他又是以卑賤者的代言人的身分來反對別的高貴者。他指揮「炮打司令部」，在別人看來，司令部裏的總司令就是他，他却站在司令部之外來炮打。「敢把皇帝拉下馬」與「炮打司令部」確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還可以補充一個事實。《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公布的前一天，1957 年 4

月 30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開會議，除了「党和國家領導人」，還邀請一大批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座談整風。據會議的參加者周培源先生告訴我，毛澤東特別强調，各方面批評意見最多的是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衛生部等部門，提出的問題最多，矛盾最突出，應該攻一下，多攻一下，切實攻一下。一連說三個「攻」字，可見心情之急切。雖說是共産黨的整風，毛澤東却號召大家去「攻」政府部門，下一步火就會燒到國務院，燒到周恩來。

毛澤東的玄機，人們參不透。儲安平批評「老和尚」的發言還將「毛主席和周總理」幷提。「鳴放」中沒有人批評「反冒進」，反而附和、支持「反冒進」。五月十六日的統戰部座談會上，陳叔通的發言中說，希望中央檢查一下，八年以來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損失和由于冒進所造成的損失，究竟哪方面大？他的意思顯然是冒進所造成的損失大。張奚若批評共産黨的「四大偏差」，頭兩條偏差就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馬寅初在五月十一、十二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長文，討論經濟建設。他的結論是：「必須根據財力、物力的可能放慢一步」。

毛澤東不得不作出妥協。整風轉爲反右以後，毛澤東的目標對準周恩來的意圖，轉爲團結黨內的异議者，槍口對外，一致反右。

反右後續 通向文革

反右運動取得了决定性勝利，毛澤東就來收拾「反冒進」的人們了。

本來是團結「反冒進」的人們共同對付右派，右派被搞臭了，毛澤東又將「反冒進」的人們與右派挂上鈎。

毛澤東說：「我們沒有預料到 1956 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預料到 1956 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衆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28 這是說「反冒進」影響了右派，又說右派影響了「反冒進」。薄一波的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在 1958 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上，針對周恩來等人說：「右派把你們一拋，拋得跟他們相距不遠，大概五十米遠。」不但如此，「毛主席認爲，反冒進在前，右派進攻在後。反冒進的人說 1956 年是『冒進』，右派攻擊 1956 年是『全面冒進』，二者之間是相互關聯的。」29 左挂右挂，横挂竪挂，反正要把「反冒進」的人們與右派捆綁在一起。

早在 1957 年十月，反右運動的高潮剛過，毛澤東在中共八届三中全會上，即

開始批評「反冒進」，說他們是「促退委員會」。當年年底，毛在杭州會議上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周恩來。到 1958 年一月的南寧會議，批判「反冒進」到達了高潮。會上印發了二十二個供批判的參考文件，居然包括周恩來在中共八届二中全會上所作的《1957 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的報告。毛在會上多次講話和聽取彙報時的插話，都是集中批評「反冒進」的。會上氣氛緊張。30 三月份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對「反冒進」的問題又講了兩次。直到 1958 年 4 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在周恩來、陳雲、李先念再次作了檢討後，歷時半年多之久的反對「反冒進」的浪潮才告平息。爾後不許再提「反冒進」，只能提「反保守」。政治局中，「反冒進」的人們是多數，最後，多數人屈服于毛澤東一個人。强迫多數人屈服的一個人，和甘願屈服于一個人的多數人，對于事件的結果負有共同的責任。從此，在中共領導集團中，黨內生活極不正常，毛澤東獨斷朝綱，定奪乾坤，這是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條件。

反對「反冒進」，就是回歸冒進，而且是更大規模的冒進，成了大躍進。毛澤東認爲，以「躍進」代替「冒進」，這就徹底戰勝了「反冒進」。他在給中央和各省市委負責人的一封信中說：「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31

在 1957 年 11 月的莫斯科會議上，赫魯曉夫提出十五年後蘇聯趕上美國。毛澤東起而響應，十五年後中國趕上英國。從莫斯科又帶回來一股躍進風。

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也是爲了證明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確性。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一條「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綫：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綫既沒有目標，也沒有達到目標的途徑，不過是一個宣傳鼓動的口號。在總路綫的指導下，推行經濟建設的大躍進運動，追求生產力的飛躍發展。在總路綫的指導下，又推行人民公社化運動，追求生產關係的飛躍發展。進入社會主義才兩年，又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了。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統帥二者的總路綫，就成了神聖的「三面紅旗」。

高舉「三面紅旗」，全民走向狂熱。農業以糧爲綱，工業以鋼爲綱，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各行各業都奔騰起來了。報紙上報道，糧食畝產萬斤至十幾萬斤，鼓

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鋼産量當年翻一番。到處刮浮誇風，看起來大躍進中人民群衆意氣風發，實質上還是「官大，權大，膽大」的體制病的發作。高指標、高速度破壞了經濟的綜合平衡，從生産到生活出現全面緊張。

大躍進的任務的提出，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大躍進的偏差得不到抵制，也是反右的後遺症。人們怕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不敢提意見了。下面迎合「上意」，上面煽動「下情」，上下交互作用，一片荒唐，暢行無阻。反右運動中，批判了「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毛澤東說：「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于是，大躍進中外行們就大顯身手了，而內行們居然也聞風起舞。著名農學家殷宏章（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說，他親眼看到了畝産萬斤水稻「衛星」上天的經過。32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說：「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 30%作爲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 1/5 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産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 2000 多斤或 3000 多斤，而是 2000 多斤的 20 多倍。」33 毛澤東說，他看了錢學森的文章就相信糧食可以高産了，甚至提出:「糧食多了，吃不完怎麼辦？」權傾一方的陶鑄更是大膽，他居然在《紅旗》雜志上發表一篇文章《駁「糧食增産有限論」》，那就是說糧食增産是無限的，何止幾萬、十幾萬斤！只有一位不懂科學、不管經濟的彭大將軍，挺身而出，說破謊言。34 中國畢竟還有一個半個剛正不阿的人。

1959 年 7 月的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大躍進的「左」的，毛澤東提出十九個問題，請大家討論。但毛澤東自己糾「左」是可以的，別人來糾他的「左」就不行了。及至彭德懷提出萬言書，認爲大躍進「有失有得，得不償失」，批評「小資産階級狂熱性」，他就對彭德懷進行了激烈的反駁，會議的形勢由此急轉直下，從糾「左」又轉爲反右。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劉仁，上廬山的時候公文包裏帶的是反「左」的材料。毛澤東講話後，趕緊打電話回去，要秘書們急送反右的材料。最後，彭德懷以及他的支持者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集團」。

廬山會議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被重點批判和戴「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幹部多達三百多萬人。大躍進的偏差變本加厲，反右運動的遺風愈益嚴重。1959 年底、1960 年初，大躍進即難以爲繼，接著

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糧食减産，要恢復到 1957 年的水平，沒有六年也得五年，35 工業在 1961 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36 違反客觀規律的大躍進，得到的懲罰是大倒退。在所謂「三年困難」時期，農村中發生大饑荒，餓死的人達數千萬之衆。

經濟上的危機又帶來政治上的危機。1962 年一月，在北京舉行由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簡稱七千人大會），讓各級幹部「出氣」。人們在檢查各種錯誤時，還提出：誰爲這些錯誤負責？彭真在一月十八日的會上發言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彭真還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37 彭真雖然點到毛，還是小心翼翼的。爲了安撫幹部的不滿情緒，毛不得不作一些象徵性的檢討。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爲我是中央主席。」究竟中央犯的是什麼錯誤？毛直接負責的又是什麼？他沒有說。毛澤東是决不下「罪己詔」的。作了幾句敷衍的自我檢討，于是就長篇大論地教導別人如何正確對待錯誤。38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說：在七千人大會上我們咽下了一口氣，現在總算出了這口氣。注意，她說的是「我們」。她是代替毛澤東講了心裏話，也透露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實動機。七千人大會出了毛澤東的氣，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爲了出七千人大會的氣。

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認爲：「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他針對毛澤東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公式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于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方還可以這樣講。」毛澤東立即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劉少奇反駁道：「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農民說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彭真也認爲：「總路綫還好解釋，大躍進不好解釋。」

這些人在懷疑大躍進了。特別是劉少奇談到「廬山會議是個關鍵。會議的下半段否定了上半段。」39 所以毛澤東認定，劉少奇就是將來爲彭德懷翻案的「中國的赫魯曉夫」。

林彪在會上獨樹一幟，大唱贊歌。他說成績很大很大，缺點很小很小。「三面紅旗」——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党的創造」。困難之所以產生，「恰恰是由于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毛澤東對他的發言帶頭鼓掌。這時，毛已經下定聯合林彪廢黜劉少奇的决心。

但七千人大會上，形勢對毛不利，他只好隱忍不發，暗藏殺機。1967 年 2 月 3 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卡博・巴盧庫時終于說出來了：「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在「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401970 年 12 月 18 日，正在訪問中國的斯諾問毛澤東，是什麼時候决定搞掉劉少奇的？他就說是 1962 年七千人大會之後。

彭德懷案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他對彭德懷本人也講過：可能真理在你一邊。但如果彭德懷的案一翻，大躍進就站不住了；大躍進的案一翻，反對「反冒進」又站不住了。一路翻過去，反右運動以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綫都站不住了。毛澤東的半生功業將付東流。他自己也很心虛，所以他向胡喬木交待，《毛澤東選集》只編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爲止。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以批判《海瑞罷官》爲導火綫，就是從防止彭德懷翻案到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1957 年以後，毛澤東總是製造一個新的錯誤來掩蓋一個老的錯誤，在懸崖上冒險攀登，至文化大革命而達于登峰造極，終于跌落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毛澤東的自我評估是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是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去了；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擁護的不少、反對的不多，後一件事擁護的不多、反對的不少。爲什麼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只做了一件事？因爲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正是一步又一步地走向文化大革命，其中决定性的一步就是反右。所以，無論做了多少事，最後都歸結爲文化大革命這一件事。這一件事，使中國人民遭受一場浩劫，也使毛澤東本人身敗名裂。

1969 年，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彪在政治報告中就說:毛澤

東 1957 年的偉大著作「爲這次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被說成「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源頭。1957 年反右運動所確立的「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命題，是對「革命」概念的濫用。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不是再一次革命，而是和平的轉變。1957 年的革命，後來就演化爲「無産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和「上層建築領域的全面專政」。從反右到文革，都是用革命的手段來解決思想領域和文化領域的問題，結果遠離了思想和文化，成爲對人身的壓服和强制，思想自由、表達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創作自由等等蕩然無存。這種「革命」，與中國歷史上個案性的「文字獄」還有所不同，而是群體性的壓制；「革命」的高潮，就是整個知識分子群體成爲類似賤民的「臭老九」，驅使有知識的人去接受無知識的人的「再教育」。

鄧小平說：「總起來說，1957 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 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41]1957 年以前是正確的？不見得。至少，1953 年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綫，毛的領導就不正確了。沒有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個前提，就不會發生「反社會主義思潮」，也就沒有必要反右派。鄧小平忘記了自己的另一個論斷。他一再强調 1957 年的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如果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那麼，反右以後引起的「錯誤越來越多」也是必要的；如果 1957 年以後的「錯誤越來越多」必須否定，那就不能不否定引起「錯誤越來越多」的反右派鬥爭。

鄧式改革 走向死亡

毛澤東逝世後，中國政治上的最高權力發生了兩次轉移。第一次，通過抓「四人幫」，以宮廷政變的方式，最高權力轉移到華國鋒手中。第二次，通過黨內鬥爭，以和平過渡的方式，最高權力轉移到鄧小平手中。

華國鋒是毛的忠實繼承人，繼續延伸文化大革命的路綫，堵塞了中國前進的道路。在民意的支持下，鄧小平奪取最高權力，將其趕下了台。

人們都要求改革。不改革是不行了，但改什麼？怎樣改？很不一致。改革的光譜，從右到左，七彩紛呈。大體上可分爲三派：一派，主張消除文化大革命的

後果，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陳雲認爲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樣板。教育部長蔣南翔則大力推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經驗，要求「在『十七年』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從「十七年」繼續前進不還是文化大革命嗎？另一派認爲，改革是爲了走向現代化，但堅持用共產黨傳統的壓制人民的方式來進行改革。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鄧小平。還有一派認爲，不但改革的目標是現代化，改革的進行也必須采取現代的方式，走向現代化的同時必須實行民主化。這一派的主要力量是在中下層，上層只有一個不充分、不堅定的代表——胡耀邦。

鄧小平自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的口號是「既反左又反右」，左右逢源。確實，他是中間派、動搖派、不徹底的改革派。不幸，他代表了改革的主流派，還被加冕爲改革的「總設計師」。

1957 年鎮壓右派、反對改革的鄧小平，在 1978 年到 1980 年之間的許多講話，按照 1957 年的標準，都是右派言論。歷史强迫他扮演了一個反對自己的角色，不得不執行右派的遺囑。鄧小平追隨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前的罪錯負有政治、法律和道義的責任，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是應當受到追究的。他却搖身一變，又成了正確路綫的代表。共產黨常常自豪地說「黨的錯誤都是我們自己糾正的」。因爲共產黨不允許別人來糾正它的錯誤。所以，糾正反對改革的錯誤還是只能由反對改革的人來擔當。但是，反對改革的人究竟能否徹底糾正反對改革的錯誤？

1979 年 1 月到 3 月，在胡耀邦的主持下，集中了一批共產黨內的理論精英，召開了一個理論工作務虛會。這是一次解放思想，大膽探索的會議。會上，多數人主張對 1949 年後三十年的歷史作一番徹底的清理，認爲中國的社會主義是「早產兒」，先天不足。如果不進行改革，又是後天失調，死路一條。還有人認爲，說社會主義是「早產兒」也不够資格。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的母體內孕育、誕生的，中國的資本主義母體還沒有充分成長。因此，應當退回到新民主主義重頭再來。但中國是一個口號治國的國家，將社會主義改爲新民主主義，城頭換旗，震動太大。爲照顧現實，可以保留社會主義的口號，重新解釋。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國之所以是社會主義國家，因爲它走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處在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的過渡時期。重要的是在社會主義的口號下進行改革。改革的目標是三方面：

經濟上補資本主義發展不足的課；

政治上民主化、法制化；

思想文化上自由化、多樣化。

3 月 30 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一篇題爲〈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否定了前一階段討論的基調。「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是四個「凡是」（李洪林語），成爲整人的四條棍子。鄧小平本來對理論工作務虛會極爲贊賞，還要胡耀邦組織人馬寫一篇大文章，論述民主問題，準備在「五・四」六十周年時發表。但他的思想說變就變，除了外在的刺激（魏京生大字報），也是出于他的本性。鄧小平對改革的態度是一步三搖。1980 年他又搖過來了。

鄧小平行進在改革之路上，不但是搖擺的，而且是跛足的，只改經濟不改政治。1980 年 8 月 18 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曾指出：「我們長期認爲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管理體制」，這是「目前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還說「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也有關。這比過去只承認官僚主義是外來的資産階級思想影響，大有進步了。當時理論界大造反封建的輿論，推動了鄧小平。鄧小平的診斷沒有錯，但處方開錯了。既然「特有的官僚主義」是從制度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當然就必須徹底改革制度，鄧小平下的藥却是「權力不宜過分集中」、「反對個人過分集權」，一切歸結爲「問題都在于『過分』」。42 他不反對共産黨的集權和領袖人物的集權，只反對過分。什麼叫「過分」？沒有客觀的標準，還是由他說了算！

不到半年，鄧小平又大步後退。1980 年 12 月 25 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重提批判和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的傾向」。43 有些人跟著起哄，指責理論工作務虛會是「資産階級自由化之源」。客觀上的原因是波蘭出現了團結工會，胡喬木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分析團結工會出現的條件，并建議在中國防止團結工會的出現，特別要割斷工人和知識分子的聯繫。所以鄧小平又把針對知識分子的「反自由化」的老式武器搬出來了。從此，「反自由化」的波濤起伏，從文藝、理論、新聞等戰綫一直延伸到政治戰綫，兩任力主改革的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被反下了台。1989 年鄧小平居然調動軍隊來「反自由化」，「六四」北京街頭的槍聲，向全世界宣告：改革的「總設計師」變臉爲屠夫，鎮壓要求改革和反對腐敗的人民。

1953 年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開始了烏托邦試驗。1957 年，歷史提出了改革

社會主義的任務。中國共產黨却將改革思潮、改革勢力打入十八層地獄。這才真正是「事情正在起變化」。你不接受我的社會主義，我就把你打成「右派分子」；你反對我的專權，我就把你搞成「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這就是邪惡了。中國共產黨走上了邪惡的道路，彈指五十年，至今不回頭。非但自己不悔改，還要强迫別人遺忘，反右、文革都不能討論、不能研究、不能發表著作。

因共產黨拒絕改革，中國人民度過了二十多年苦難的歷程。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絕境，共產黨不得不進行改革了。1957 年進行改革是順應人民的願望；1978 年進行改革就是挽救黨了。爲了維護一黨專權而興起了改革，同樣，又因不願觸動一黨專權而扼殺了改革。1989 年，結束了改革的一個周期，鄧式改革已經死亡。

歷史的啓示

1957 年名曰「反右」或「反右派」的運動，并沒有揭示歷史事件的實質。

任何社會都有左派和右派，左派可以反對右派，右派也可以反對左派，彼此是平等的。只有在中國，右派成爲一種罪名，左派可以爲右派定罪，而且還可以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來鎮壓右派。「反右派」、「反右運動」這些名稱正是不民主的產物，必須推翻。

1953 年斯大林逝世，蘇聯解凍。要求擺脫蘇聯控制的東歐，出現了自由化。自由化運動在波蘭和匈牙利遭到血腥鎮壓。1957 年中國的「大鳴大放」同樣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動蕩之際出現的自由化。反右運動也是對自由化的鎮壓，只是鎮壓的方式與波蘭、匈牙利有所不同。因此，所謂的「反右運動」，應當正名爲「反自由化運動」；1957 年的歷史事件的實質是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較量。

毛澤東逝世後，斯大林現象重演。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出現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又一次自由化。同樣也遭到反自由化運動的批判、壓制和打擊，最後走向與五十年代波蘭、匈牙利事件相同的結局——血腥鎮壓。這一回，鄧小平取代毛澤東，唱了主角。鄧小平自稱「反自由化最堅决」。本來，五十年代鄧小平操辦的反右運動就是反自由化運動，八十年代的反自由化運動無非是變相的反右運動。有些五十年代的右派分子，八十年代又成爲自由化分子，三十年滄桑只是換了一頂「帽子」。

自由化是改革的前奏和伴奏，反自由化就是反改革。鄧小平扮演了一個滑稽

可笑的角色。他既要改革，又要反自由化，結果改革荒腔走板，大失其形。

審視 1957 年以來的五十年，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啓示：

第一，不改革走向動亂。

第二，不徹底的改革走向腐敗。

第三，自然的結論就是：不但要堅持改革，而且必須是徹底的、全面的改革，才能殺出腐敗的重圍，尋求生路。

本來是不需要改革的，因爲走錯了路。歷史的行程，好像在高速公路上開車，即使發現走錯了路，也不能立即掉頭，只能尋找出口繞到正確的方向上來。改革就是從錯誤中選擇正確的方向。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以往沒有成功的先例，但不等于未來沒有成功的希望。蘇聯和東歐還是在兩大陣營對立的封閉的環境中進行改革，沒有出路，所以失敗了。現在，中國和越南是在全球化的環境中進行改革，外部條件大不相同了。成敗的關鍵端在內部的决策。

中國改革的目標，依然是 1957 年提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

鄧小平的改革之所以有某些成效，就因爲他在反自由化的同時偷用了一些自由化的理論，悄悄地走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已經變成「四不像」了。鄧小平爲了堅持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必要的，還把「四不像」叫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最大的假冒僞劣商品。連社會主義都是假的，還有什麼不能造假？所以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假冒僞劣商品才會層出不窮。

2007 年 3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保障公民財産權的物權法。可見，當年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不僅違反了憲法，所謂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違反了保障公民財産權的法律。當然，法律不能追溯，但人民可以追問：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教科書應當改寫了。

社會主義已經變了，共産黨的一黨專權却是一成不變。進一步改革社會主義的主要障礙也在于一黨專權。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配套的。中國只要市場經濟，不要民主政治，結果市場經濟被扭曲。改革的攻堅戰應當突破一黨專權這個最後的頑固堡壘，建立憲政民主制度。

從一党專權到憲政民主的轉型，不是沒有辦法，而是沒有决心。首先必須是

共産黨願意放弃一黨專權，才能討論轉型的辦法。共産黨會自願放弃嗎？很難。只有人民發出强烈的呼聲、顯示巨大的力量，迫使共産黨不得不放弃。

中國的改革已經一再錯失良機，但還可以「作一次最後的鬥爭」。也僅僅是最後的鬥爭了，如果最後的鬥爭成爲最後的失敗，歷史必將掃除一切障礙，重新開闢一條新路。

注 釋

1 《批判離開總路綫的右傾觀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81、82 頁。

2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89 頁。

3 《在中國共産黨第八届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315 頁。

4 《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478 頁。

5 《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225 頁。

6 见《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第 94-95，197-199 页。

7 《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9 頁。

8 《批判離開總路綫的右傾觀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82 頁。

9 見《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第 116-117 页。

10 《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207 頁。

11 見《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第 74-87，180-189 页。

12 《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476 頁。

13 《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207 頁。

14 林克《回憶毛澤東對杜勒斯和平演變言論的評論》，《黨的文獻》一九九〇年第六期；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371 頁。

15 《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249 頁。

16 胡績偉《從「書生辦報」到「死人辦報」》，《星島日報》2000 年 12 月 14-21 日。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鑒》第二卷第 36 頁；《中國共産黨執政四十年》（北

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第 128 頁。

18 《1957 年夏季的形勢》，《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456 頁。

19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410 頁。

20 《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衆》，《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284-285 頁。

21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296-297 頁。題目改爲《組織黨外人士繼續對党的缺點錯誤展開批評》。

22 《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432 頁。

23 《限期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况報告中央》，《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292-293 頁。

24 王若水《王道乎？霸道乎？》，www.wangruoshui.net。王若水沒有提供消息的來源。他是一個嚴肅的學者，我相信他所說的是有根據的。

25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223 頁。

26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 195 頁。

27 王若水《王道乎？霸道乎？》，www.wangruoshui.net 毛澤東的話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412 頁。

28 《重印<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的說明》，《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226 頁。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645 頁。

3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637 頁。

31 《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 142 頁。

32 殷宏章《科學研究要奮起直追》，《人民日報》1958 年 6 月 19 日。

33 錢學森《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中國青年報》1958 年 4 月 29 日。

34 彭德懷罷官後，被軟禁在北京西郊的挂甲屯。那是在北京大學承澤園旁邊的一個小院。一天，我從門口經過，看見院子裏有一片小麥，好奇，問門口的警衛人員：「彭老總的院子裏怎麼會有麥地？」他說：「彭老總不服氣呀！」我更好奇了：「這麥地和服氣不服氣有什麼關係呀？」「彭老總丈量了一塊地，不多不少，正好一分。用上小麥良種，多施肥，多澆水，看看到底能打多少糧食。不是說畝產萬斤嗎？嘿嘿……」

35 陳雲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見《中國共産黨重大事件紀實》第三卷第1350 頁。
36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口頭報告中提供的數據。見《中國共産黨重大事件紀實》第三卷第 1336 頁。
3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59 頁;《中國共産黨重大事件紀實》第三卷第 1334 頁。
38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 296 頁。
39《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421 頁;《中國共産黨重大事件紀實》第三卷第 1334-1346 頁。
40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 1469 頁。
41 《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258-259 頁。
42 《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287-294 頁。
43 《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328 頁。

紀念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五十周年　　陳奉孝

「五・一九」是一場自發的爭民主自由的運動

說「五・一九」是一場自發的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應從它的起始和全過程來分析和認定。

首先,運動是由當時北大歷史系三年級學生許南亭的一張大字報引起的。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很簡單:開全國團代會,清華有代表,北大有沒有?是誰?誰選的?緊接著第二張大字報是哲學系學生龍英華貼出的,內容是號召成立自由論壇。第三張大字報是數學系三年級學生陳奉孝、張景中、楊路、張世林貼出的,題目是自由論壇成立宣言,內容提出了四項主張:一.取消黨委負責制,成立校務委員會,實行民主辦校,二.取消政治課必修制度,改為政治課選修,三.取消留

學生內部選派制度，實行考試選拔制度，四.開闢自由論壇，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同天晚上，中文系的同學沈澤宜、張元勳聯名貼出了一首長詩「是時候了！」。這首詩充滿激情，號召人們是時候了，去參加戰鬥，向「三害」（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發起猛攻！這張大字報一下就在北大掀起了十二級巨浪。第二天上萬張大字報一下就貼滿了整個北大校園，北大沸騰了！緊接著出現了譚天榮的數張大字報，從哲學的角度批判教條主義。劉奇弟同學貼出大字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劉奇弟是敢於挑戰毛澤東要求為胡風平反的第一人。蔣興仁同學貼出大字報「論現行選舉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實行」，號召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張錫錕同學貼出大字報「三害根源」，指出「三害」的根源在於制度，必須改變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葉于泩貼出的大字報「我看民主」，指出「民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王書瑤同學貼出大字報「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內容有「……，六億人民的生活決不應該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黨員占 1.6%，而決定國家大事的人又占 1.6%中的極少數）。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中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弄，就更加百倍的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我所愛的六億人民應該及早起來，結束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當家作主，真正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類似的大字報還有許多許多。以上大字報的內容與文革後不少理論家（包括鄧小平）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的內容相比，早了整整三十至五十年！西語系的同學在賀永增、周鐸等人的帶領下，自發的召開了控訴會，控訴五五年肅反運動的擴大化，與會的同學聽後無不聲淚俱下。另外，到北大演講的人大學生林希翎在她的第一次演講中就公開指出「給胡風加上反革命的罪名是很荒謬的。胡風是對中央提意見書，怎能說這個意見書就是反革命的綱領呢？這是斯大林主義的方法」。她還公開反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認為這個講話已經過時。公然講出「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麼不能反對呢？」這些大字報的出現，事先並沒有任何人進行組織和策劃，而是長期被壓抑的心聲的迸發。

不僅如此，北大的右派同學為了打破當局的封鎖，還通過到各個大學去演講的方式或通過同學關係用郵寄的方式將北大同學爭取民主自由的資訊傳遞出去。

西語系的黃繼忠老師就親自帶領二十多名同學到清華大學去演講，介紹北大同學幫助共產黨整風運動的情況。譚天榮、沈澤宜、劉奇弟、楊路等同學到天津的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去演講，介紹北大同學爭取民主自由鬥爭的情況。

出現這麼多的「不同聲音」後，不少人意識到需要成立一個組織，把這些「不同的聲音」團結起來，用一個聲音說話，這樣更有力量，更能爭取更多同學的支持，更能引起當局的重視。於是，便由譚天榮、陳奉孝、張景中、楊路、王國鄉、龍英華六人倡議成立了「百花學社」，再由陳奉孝、王國鄉等人聯絡中文系的張元勳、沈澤宜、崔德甫、張志華等人，組織創辦了刊物《廣場》，作為「百花學社」的言論陣地。主編張元勳在《廣場》的發刊詞裏這樣寫道：「……北京大學是『五・四』的故鄉，北大的兒女是『五・四』的後裔，我們的血管裏流著『五・四』的血液，在社會主義的『五・四』時代，我們要學會『五・四』先輩們的大膽提問，大膽創造的精神，去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文化！我們的刊物《廣場》便為此而誕生。《廣場》的含義在於：北大民主廣場曾是舉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輩曾在民主廣場上集會點火與誓師高歌！先輩的廣場已經荒蕪了，我們艱難地把它打掃乾淨，我們願愛講話愛唱歌的人們一起來打掃它、整理它，使它開出一萬朵美麗的花！來吧！朋友們！到《廣場》上來！這裏有自由而新鮮的空氣，它可以震動你的聲帶，唱出你願意唱的個性的歌！我們的廣場期待著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文藝復興的到來！」

從以上對「五・一九」運動全過程的記述和分析來看，將這場運動定性為繼承「五・四」的一場自發的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應是沒有異議的。眾所周知，北大同學這場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被毛澤東領導的反右運動殘酷的鎮壓了下去。僅北大就有七百五十多名師生被打成右派，八百一十多名師生被打成「中右」，幾百名師生被送到勞改營和勞教營遭受殘酷的折磨（這其中主要是學生）。黃中奇、顧文選、張錫錕、林昭等同學和任大熊、沈元老師被殘酷地殺害，劉奇弟、賀永增、敖乃松等多名同學被殘酷折磨死在了勞改勞教隊裏。北大學生的這次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雖然被鎮壓了下去，但爭取民主自由的種子已經播下，總有一天，它會開花結果的。

西單民主牆和「六・四」是「五・一九」爭民主自由運動的繼續和深化

「五・一九」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被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殘酷的鎮壓了下去。幾十萬右派分子被關進了勞教、勞改營，受株連者達數百萬，眾多家庭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眾多右派分子身受二十多年的折磨，死在了勞改、勞教營中，更有黃宗奇、顧文選、張錫錕、林昭等同學和任大熊、沈元老師慘遭殺害！聖女林昭在監獄裏用自己的鮮血寫下了幾十萬字的日記和詩篇，記下了中國監獄的殘暴和黑暗，中國從此進入了最黑暗最殘暴的年代！但是，民主自由的種子已經播下，總有一天它會發芽開花結果的。一九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和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正是「五・一九」爭取民主自由運動的繼續深化和發展。當時僅僅是作為一名中學生水平的魏京生以他敏銳的政治眼光第一個大膽地提出了「要警惕鄧小平的個人獨裁」並提出中國不僅需要實行四個現代化，更需要實行「政治民主化」這一驚世之言，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撼和敬佩！與五七年的右派相比，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啊！

北大是中國的思想庫。中國近百年來的歷次政治運動無不發源於北大。起源于北大學生王丹等人組織的「沙龍」，要求中共開放黨禁、報禁，實現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正是繼承了「五・一九」爭取民主自由運動的主張，最後發展成了席捲全國震驚世界的一場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共當局為了維護其獨裁統治，出動幾十萬軍隊用坦克和機槍血腥鎮壓了這次數百萬人參加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在中外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東方的中國這次運動雖然暫時被鎮壓了下去，但它卻促使蘇聯和東歐人民認清了共產黨統治的殘暴本質，從而促成了蘇聯東歐共產統治政權的瓦解，正所謂東方開花，西方結果！中共當局至今一提到「六・四」仍然嚇得顫顫驚驚，使得今天中共無論哪個領導人再也不敢公開出面否定「六・四」！使得今天中共無論那一個領導人也不敢否定「六・四」民主運動提出的「反腐敗、反官倒」的口號。如果當年中共接收了同學們提出的「反腐敗、反官倒」的主張，何至於發展到今天中共官員無官不貪的程度！從五七年的爭取民主自由的「五・一九」運動，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到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是一脈相承的。這三場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在中國當代史上發出的燦爛光芒將繼續照亮中國走向未來的道路！

中國爭取民主自由運動的現狀和未來

中國歷次的民主運動無一不是由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帶頭的。為了防止象「六・四」這樣的大規模民主運動的再次爆發，鄧小平對知識份子採取了胡蘿蔔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給知識份子大幅度提高工資，將知識份子的嘴堵住，另一方面對各種媒體嚴加控制，採取文化法西斯主義，不允許不同聲音的發出。與此同時，對青年學生全面掩蓋歷史，不讓青年學生知道當年「五・一九」、西單民主牆、「六・四」民主運動的真象，並且引導大學生下海經商。今天打開電視，除了廣告，全是一些娛樂節目，再就是一些歪曲歷史歌頌封建帝王的歷史劇，向人們宣傳歌頌封建專制主義，引導青年學生去追求享樂。八十年代大學生那種關心國家民族的前途的熱情消退了，那種關心國家民族的前途的激烈辯論的場面不見了。面對中共官員腐敗的大規模蔓延，人民群眾感到無奈。中共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貪污受賄，目的是為了一個「錢」字，老百姓手中無權，於是制假販假、坑蒙拐騙、偷盜搶劫、賣淫嫖娼等現象在整個社會迅速蔓延開來。目前中國社會已經成了一個沒有道德信仰物欲橫流的社會。整個社會風氣被大大小小的中共貪官帶壞了。人們除了相信一個「錢」字，什麼也不相信了！

但是，面對大多數知識份子對中共政權大規模腐敗沉默的同時，大批下崗失業工人、失地農民和拆遷戶的維權運動卻迅速蔓延開來，社會各種矛盾在激化。少數良知未泯的知識份子也在大力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新聞自由、開放黨禁和司法獨立。儘管這種聲音受到嚴密的監控和打壓，但仍然能夠繞過報刊雜誌，通過互聯網，從夾縫中發出聲來。現在大多數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了目前一切社會矛盾的總根源在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党權高於法律，党權高於憲法，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要想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就無從談起，這給中國未來的變革打下了社會基礎。現在中國每年有一百多萬大學生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這一情況必然會傳遞到今後各大學中間去，尤其是象北大這樣思想活躍的大學。只要失業的大學生、在校的大學生和失業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的維權運動結合起來，再次爆發象「六・四」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完全有可能的。

推動中國走向政治民主化需要三股力量的結合，即國內的爭民主維權運動、共產黨內具有遠大政治眼光的高層人士和國際上的呼籲和支援。這其中國內爭民主維權運動將是主要的力量，這就責無旁貸地落到了中國良知未泯的知識份子和大學生身上。

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號召擴大黨內民主的呼聲又起。胡錦濤智囊團成員之一俞可平先生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這已經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這說明什麼？這說明中共上層也認識到，政治民主化這條路，在中國遲早是要走的。不過為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他們目前還邁不開步子，今後的幾年在這個問題上很可能採取「摸著石頭過河」的辦法。

目前執政的共產黨的腐敗已成了無法治癒的癌症，各種社會矛盾在積累和逐漸深化，中國正處於社會大變革的前夜，「五·一九」撒下的爭取民主自由的火種再次燃燒起來的日子已經為時不遠了。一切關心國家民族前途的人士和共產黨內具有遠大政治眼光的開明人士到了該做出自己正確選擇的時候了。（二〇〇七年一月）

——為 2007 年 6 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

1957：中國當代史大逆轉　　劉賓雁

1957 年反右派運動，我曾稱之爲中國當代史中的一大逆轉。這並非說那以前就是一個黃金時代，恰好相反。最晚從 1953 年起，那場四年前才取得勝利的革命，已經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但 1956 到 57 年還是出現了一個轉機，那是二十世紀下一半歷史給與的第一個轉機，不幸被我們錯失了。但隨之而來的災難，也曾經提供另一些轉機，比如 1953 年便已開始、1959 年由彭德懷推向高峰的黨內反對毛澤東農業路綫的鬥爭，和伴隨大饑荒而來的 1959 至 62 年反對毛澤東錯誤的社會思潮和農村的包産到戶運動，可惜又一一失敗了。還要等上二十幾年，那便是 1979 年開始的改革了。但 1979 至 87 年和 1989 年，我們又錯過了兩次機會，從而出現了九十年代至今的全民族、全方位的大倒退。

1953 年斯大林之死，爲社會主義國家走上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一個契機。1956 年爆發了布達佩斯起義。1968 年布拉格之春，由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領袖杜布切克發動，全黨决定把斯大林式社會主義變爲人道主義社會主義。1980 到 81

年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幾近推翻了共産黨政府。雖都一一失敗，却無不是蘇聯武裝鎮壓（波蘭則是由于爲避免蘇聯的鎮壓而實行戒嚴，解散團結工會）的結果。但是倘若類似事態發生在中國，蘇聯就絕對無力干涉了，二十世紀的歷史便將會是另一個樣子，而中國也就對人類做出一大貢獻了。然而中國却失敗得更慘、倒退得更遠，這能怪誰呢？只能算到自己的帳上。

難道還不該做一點自省嗎？我曾寫過「苦難之樹，必定會結出幸福之果」，此言謬矣。我們還活著，就見證了相反的事實：苦難也會繁殖出更多、更大的苦難。那就看它是在哪塊地上生長出來的了。荒謬絕倫創下歷史記錄的 1955 年的反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冤案，不是就引向反右派運動，而後者又引向文化大革命嗎？「六・四」之變把中國和民主的距離拉得更遠，也有目共睹了。然而這一切又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知識分子欠缺探求真理的深入思索

反右派運動，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歷史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報復。二十餘年來連篇累牘的批判知識分子之軟弱的文章，忽視了一個巨大的事實，那就是廣大工農群衆的蒙昧在五十年代成爲毛澤東暴政的强大後盾。對于我本人的低頭認罪，全國工農「憤怒聲討」右派震耳欲聾的吼聲就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五?四運動」後三十年知識分子在人民大衆的啓蒙上未盡到責任，難辭其咎。只有胡風一人堅持作家必須發揮「主觀戰鬥精神」、直面人民「精神奴役的創傷」，因而站到了同毛澤東那個把作家和人民變爲黨的工具的路綫的反對方面。而毛澤東一聲令下，同代作家、批評家、文藝理論家竟一擁而上，對那位偉大思想家和他的同道落井下石！「五?四」後前三十年文學的貧弱和 1949 年後三十年精神、思想和文學的沙漠化，甚而至于 1989 年天安門運動之葬身血泊，究其原因，無不是由于知識分子未能真正把自己的心放在苦難的勞苦大衆身上，同時，也欠缺刻骨椎心地探求真理和窮其究竟地深入思索的精神和習慣。而正是這兩點，使胡風以難以想像的頑强堅持其立場，并因而陷于孤立。

1957 年春季會有那麽多人輕信毛澤東，就和我們的文化基因中欠缺思考的習慣有關。1956 年兩篇《無産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于是毛親手所寫，其中對斯大林的極力維護和對蘇共否定斯大林的不滿，曾令我極爲反感。但是兩個月後

聽到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却又立即歡欣若狂，心花怒放！既然前一些話言猶在耳，有甚麼理由相信毛澤東會在兩個月內（而且是在布達佩斯起義之後）翻然悔悟，真心要聽取异議、糾正他的那條比斯大林還要斯大林的路綫呢？不僅是太天真，也太不善于思索了。

毛澤東有比斯大林高明之處。他對自己的政敵一個不殺，也很少逮捕，甚至還要把「屬于敵我矛盾」的右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其實，毛澤東及其同夥刻意營造的那種特殊環境裡長年的賤民地位與非人的生活條件，是對「右派」的慢性槍决。事實証明，這種「慢性槍决」並不比斯大林處置政敵的手段更人道；對于最終仍然死于非命的許多右派分子來說反而要痛得多，對于統治者卻更為有利。毛澤東說過「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員。」一百餘萬名「反面教員」散布在全國各地，朝夕出沒于數以億計的人們面前，無疑是對所有中國人的無言的警告：哪一個膽敢對中共稍發異議，便必定會得到同樣的下場！而那個下場是令人不寒而慄的。

被剝奪一切而又身敗名裂卻苟且生存下來的那些右派分子，時時刻刻起著反面教員的作用，向人們昭示著：在中國做人，切不可誠實坦率，切不可過問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惡感，切不可違抗當權者的意旨，切不可對任何人寄予同情與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將把這些戒條牢記心間，並傳給自己的子女。

毛澤東的打擊是雙向的。他在清除異己時，也就清除了黨內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于革命理想的黨員。中共黨內早已存在的左傾勢力，以及中共執政後為追逐個人利益而涌入入黨內的新黨員則糾集在一起。這些人政治投機，唯命是從，不問是非，打擊異己時不擇手段，對人民疾苦無動于衷。反右派運動使這些人如魚得水，逐漸在中共內取得主導地位，使這個黨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強。

中國的年輕人或外國人恐怕很難理解，被稱為右派的人當年所揭示、所抨擊的種種現象都是事實，所提出的主張也能証明是遠見卓識。那麼，為甚麼除極少數人外，所有右派分子都認了罪，順從地接受了長達二十餘年悲苦的賤民命運呢？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1957 年那場為時雖然很短的「鳴放」浪潮（不到一個月），是 1949 年以來中國人第一次見到的言論自由。那些對中共的批評和這種難得的自由氣氛，曾在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的心中喚起一種希望，廣大工人和學生甚至以行動——罷工、罷課和請愿示威等來呼應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批評。1957

年五月下旬我在上海，那一個城市便有三十餘家工廠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請愿。然而毛澤東一旦發動反擊，全國宣傳機器一旦以一個調子鼓噪起來，特別是全國各地工人群眾在黨委和官辦工會操縱下紛紛舉行大規集會「聲討」右派分子，一時間便形成鋪天蓋地的浪潮，似乎全國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還被視為真理而受到熱烈歡迎的種種勇敢的真知灼見，立刻成為「射向黨和社會主義的毒箭」；因大膽為民代言而被視作英雄的人物，頃刻間便成了「一小撮敵人」和「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宣傳機器的鼓噪和周圍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親人）的敵意，造成一種難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們知道，黨既看中了你，一個不可更改的結論便已在那裏等著你；況且「態度」非常重要，「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只能招來更壞的厄運。假使你已成家，就還要考慮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兒女少受一點牽累的問題。這樣，你便不能不逐漸軟下來，直至在一份結論上簽字，接受一個政治死刑的判決，從此便開始你漫長的暗無天日的賤民歲月。

各類「分子」在一百五十萬以上

究竟 1957 年至 58 年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官方宣稱為五十五萬，但我從一位掌握當年內部機密文件的人士處獲悉，實際數字比這高。此外還有不算右派、但「實際上按敵我矛盾處理」的「中右分子」。僅四川省的「中右分子」就有六萬多。至於大量不算右派、實際上被作為右派處理的人，如「疑似分子」、「爛言分子」、「右言分子」、以及以所謂「右派言論」戴上其他帽子的，就難以統計了。

況且，當年還有屬于依政策不得打成右派的社會集團，如中學生、工人或農民。中共沒給他們戴上右派帽子，只說他們是「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壞分子」。全國幾十萬「反社會主義分子」也是「按敵我矛盾處理」的。他們在隨後二十餘年中的境遇，也與右派分子無異。

若將在「反右鬥爭」期間被中共當局定成各類「分子」的人數匯總，當在一百五十萬與二百萬之間。

在中國城市裏，幾乎沒有哪個家庭其親屬與友人中沒有甚麼人是右派的。我和我的朋友們常常驚異地發現，一個小小的聚會中往往就有幾個人是 1957 年的「難友」。一個家庭中夫婦同是右派，或兄弟姊妹中有二、三人都被定為右派者，

也屢見不鮮。我在香港和美國每作一次演講，聽眾中自動上來向我自報身世的右派，總不下數人。而這種演講，我三年多來在美國三十幾個州已做了不下二百餘場。

賤民歲月廿二年

沒有哪個右派分子當時會料到厄運會延續那麼久。所有被他打倒的敵人中，毛澤東似乎特別鍾情于右派。1962年，當毛澤東因他發動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導致三千萬人餓死，以致不得不同意對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平反時，黨內出現了也應為右派平反的呼聲。安徽省作為試點，甚至已經給不少人平了反；北京各機關也開始進行。毛澤東趕忙出來制止，說：「對于1957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別平反的問題。」于是全國立即剎車。一些已被本單位領導列入平反議程，遵命寫了要求平反的材料的右派分子，則一概被視作「妄圖為自己翻案」的死不悔改的右派，處境更加惡化。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許許多多右派分子，包括早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又一次成為階級鬥爭的對象。但是，在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號召下，一些人忽然發現，原來1957年的右派分子便是今日造反派的先驅；而當年主持反右派運動、把這些人打成右派的人，正是今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對象——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越發証明了右派是冤枉的。而中共黨組織這時又已停止活動，在一些地區和部門，一度出現了為一些右派平反的機會。不過，這種苗頭很快就被壓了下去。

到七十年代末期，僥幸沒有在勞動中凍餓而死，未在屈辱與絕望中含恨自盡的右派分子，大約沒有一個對于自己的右派問題有一天會翻案再抱甚麼希望了。因而，當1978年底風傳中共中央準備給1957年的右派平反時，很多人不肯信以為真。中共中央五十五號文件不過是給1957年右派中「結論做錯的」少數人「改正」結論，並不含有任何大規模平反的意圖。顯然是經過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的極大努力，並經過鄧小平的默許，這個文件在實行中才一變而為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全部平反——承認劃錯，恢復當年的級別、薪金，共產黨員則恢復黨藉。

二十二年中間，從基層到中央，很多當權者是靠1957年後賣力推行左傾路線

爬上去的。因而，給右派平反遇到極大阻力就不足奇了。毛澤東的「宦官」汪東興首先反對，拿出毛澤東 1962 年的講話——「1957 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別平反問題」。鄧小平隨即回答：「不是給右派平反，不過是給結論做錯了的人改正而已。」這就是為什麼明明是平反，卻稱做「改正」的來由。大勢所趨，即使那些當年在反右運動中大顯身手的人，最終也不得不同意給這些人平反。不過，他們仍然竭力阻止給平反了的右派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恢復其原有地位。五十五號文件本來規定平反後右派應回到原先的單位中工作，但由于遭到黨內強力反對，不出兩個月，這一條就被改為「就地安置」了。所謂「就地」，對於許多右派說來便是留在當年他們戴著右派帽子被發配去勞動改造的農場或農村，或坐牢期滿後就業的勞改工廠或農場，可能會給一份領幹部工資的差事，也就是到所在縣的縣城文化館當一個幹事或中、小學做一名教員。江蘇省的新華日報社和黑龍江省的哈爾濱日報社竟不許一個右派編輯、記者回歸本單位。原因很簡單，1957 年反右派運動中的打手們已飛黃騰達，占據要津，允許右派回到本處工作，則等于使自己的活動的罪証每天展示在所有人面前。況且那些右派在能力和品德上一般都比打手們高出一籌，甚至當年就是後者的領導人，一旦歸來，怎麼安排他們的地位呢？

且說那些右派，除極少數人外，二十二年來不是被剝奪了全部工資，也是降了幾級，絕大多數人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胡耀邦曾提出要給他們補發工資，主管財政的李先念一口回絕：「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由于許多右派與海外華僑有親屬關系，大約在 1980 年，宋慶齡（孫中山夫人）代表海外華僑向中共領導人提出：「你們若真的沒有錢，我可以建議華僑在海外募捐，用以補發右派的工資如何？我本人也可從我的財產中拿出錢來，如何？」這時，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再次考慮這個問題，連續提出過幾個方案，但結果都因遭到抵制而擱置。

鄧小平對「反右」無懺悔之心

這不僅單是一個對政治受害者給不給予經濟補償的問題，它反映了中共既得利益集團中許多人對反右派運動負有罪責而無懺悔之心。鄧小平本人的態度就是一種代表。儘管他同意給絕大多數右派「改正」，但仍頑固地認定 1957 年的反右派運動是「必要的」，因為確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進攻」，那場運動的問題無非是「擴大化」，即打擊人過多而已。為了給這種論點提供依據，甚至不得不留

下幾個當年的重要人物（民主黨派的首腦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不予「改正」。又明知理虧，不得不派人去安撫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屬，私下承認這些人也屬無辜，但請他們「顧全大局」，即為了黨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繼續將右派帽子戴下去。

鄧小平是反右派運動期間黨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比毛澤東本人還積極地主張擴大打擊面，因而自知罪責重大。從中央到基層，這種「用右派分子的鮮血染紅自己頂子」的大有人在。那些一貫左傾的老黨員和 1957 年後靠整人起家的幹部，自然也是以左傾路線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右派在他們眼中便始終是異類。

1981 年黨和軍方保守派發動的第一次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以過去的「右派」作家白樺為首要打擊對象。1987 年的第三次「反自由化」運動，最先開除的三名知識分子就有兩名是 1957 年的右派（王若望、劉賓雁），一位是反右派運動中被開除黨籍的人（方勵之）。這絕不是偶然的。中共中央領導集團甚至一度決定把 1981 年那場「反自由化」運動發展為第二次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運動，只因阻力太大、後果不堪設想才作罷。

歷史不會被遺忘

反右派運動給中國造成的傷痛與災難是至深至巨的。它葬送了中國一度出現的走向民主化道路的機會。它使中國喪失了埋葬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而另辟蹊徑的歷史良機，走上一條邪路，不僅失去了二十年寶貴時間，並且為以後的中國留下了永遠無法治愈或很難愈合的創傷；一個歷史上空前龐大、貪婪的官僚集團章魚般附著在中國的肌體之上吮吸著人民的鮮血；又因權力之集中而無能，法紀之闕如和傳統道德之敗壞，而使社會失去了對于邪惡的任何有效的制約機制。遂使種種罪惡現象洪水般在中國大地上泛濫開來。

這四十餘年來中國歷史的惟一尚可稱道之處，便是中國人作爲人的覺醒。他們再不那麼愚昧可欺。雖然中共當權者正在以加倍努力阻止人民在政治上的覺醒，其手段之一便是使人們忘掉歷史，歷史是不會被遺忘的，毛澤東所締造的那個制度終將被埋葬。

——本文原為《賤民歲月廿二年》，寫於 1991 年。本書編輯有所刪節。

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　　吳國光

1956 年 9 月 15 日，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落成不久的北京政協禮堂開幕。劉少奇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報告全文約 45,000 字，其中僅四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1 一年多之後，1958 年 5 月，八大又召開了第二次會議。還是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報告。這次的報告，篇幅是上次的一半，大約 22,500 字。但是，在這短短的篇幅內，報告二十三次提到了毛澤東的名字。2

與此相應的，還有更爲重要的變化。八大一次會議認定，在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决定性勝利」之後，中國國內「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决」，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况之間的矛盾」。用八大一次會議政治决議的話來說，這一矛盾的實質，「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産力之間的矛盾」；3 而中共的主要任務，就理應轉變爲集中解决這一矛盾。但是，時隔一年多之後的八大二次會議，却轉而聚焦于階級鬥爭。劉少奇在報告中强調，「無産階級同資産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他甚至說，「這個矛盾，在某些範圍内表現爲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4

劉少奇和整個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對于毛澤東，爲什麽如此前踞後恭？中共對于中國主要矛盾的判斷，爲什麽在短短的一年多一些的時間裏，發生了這樣南轅北轍的突然轉彎？從 1956 年秋季的八大一次會議，到 1958 年春季的八大二次會議，中間發生了什麽事情，導致中國政治出現如此鮮明、急劇的變化？

八大兩次會議之間，是 1957 年；1957 年的中國最爲重要的事件，是反右運動。換句話說，反右運動發生在八大兩次會議之間，而八大的這兩次會議則明顯地代表了中國政治的轉向。那麽，理解反右運動，就有必要把它放到這一歷史發展背景中來考察。本文所做的，正是這樣一種嘗試，即把反右運動還置到中共八

大的兩次會議之間的歷史脉絡之中，研究反右運動與八大兩次會議不同調門之間的關係。在以下的正文中，我們將詳細研究 1956 年和 1957 年的中國政治發展，分析毛澤東怎樣從他自己所說的「心情壓抑」轉爲鬥志高昂，幷如何達成以他自己的意志來壓倒黨內另外的意見，從而主導中共路綫和中國政治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反右當然是關鍵的一環。不過，這一環與此前的農業合作化高潮、「反冒進」、群衆「鬧事」及所謂整風，是環環相扣的。在這綿密、緊凑、短促而多變的 1956 年到 1957 年的政治過程中，我們看到，毛自始至終著眼于掌握中共决策和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要以他的意志改造中國。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發現，禍及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只是毛澤東要奪回他在 1956 年失去的對于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而展開的一場政治鬥爭。通過反右，他達成了目的，于是有了與八大一次會議調門截然不同的八大二次會議。

現在，讓我們進入本文的主要內容，也就是梳理和分析八大一次會議經由反右運動到八大二次會議之間的發展脉絡。

1956：毛澤東「心情壓抑」

1956 年，毛澤東與他親手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進入「七年之癢」。用毛自己的話來說，這一年，他的心情受到壓抑，整個一年心情不舒暢。5

爲什麼呢？因爲反急躁冒進。這是毛後來挑明瞭的他感覺受到壓抑的根本原因。6 本來，1955 年 12 月，毛爲計劃于次年召開的中共八大確定了反對右傾保守、加快經濟建設的方針。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樓召開包括了黨政軍各部門和省市負責人一百二十多人的座談會，劉少奇在會上傳達了毛關于召開八大的指示精神。毛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十五年同時爭取十五年以前超額完成。7 毛强調，八大的準備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毛還說：可以設想，如果不加快建設，農業和私營工商業未改造，工業未發展，將來一旦打起仗來，我們的困難就會更大。8 官方記載顯示，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出决定，要把反對右傾保守思想作爲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問題，要求全黨在一切部門展開這個鬥爭。9

多種資料證明，在毛的心目中，這時正在勾畫一幅迅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藍圖。爲 1955 年實現的所謂三大改造、特別是所謂農業合作化的迅速實現所激勵，毛雄心滿懷地認爲經濟高速發展將是接下來的題中應有之義。按照杜潤生的說法，「取得 1956 年合作化的勝利，毛主席認爲農業已經過關了，原來是小農經濟扯工業的後腿，現在是工業扯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腿了，因此他的注意力轉向了工業，搞起了『促進』運動。」「毛澤東預測，所有制改變以後，一定有一個生產力的大發展。」10 毛信心十足地告訴他的同志，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11——也就是不比打仗更難的意思。 1955 年底，在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時候，毛在序言和按語中多次强調，要批判各個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認爲「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認爲做不到」。毛强調，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迅速完成，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發展。」12 此前，毛還準備了《農業十七條》幷將之發展爲《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毛認爲，「以前在農業方面存在的許多困難情况現在已經基本上改變了，許多曾經被認爲辦不到的事情現在也可以辦了。」因此，就像《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這樣，「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况，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131956 年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以《爲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作標題，提出多快好省地全面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爭取實現更高的發展速度」，把「潛在能力發掘起來」，「把我們的國家變成爲富强的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毛《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爲思想主綫，社論批評「我們領導者中間有些人思想落後于實際」，「安心于一種落後的發展速度」，「犯了右傾的保守主義的錯誤」。社論要求采取「使廣大群衆振奮起來」的領導方法，批評了「按常規走路，拖拖沓沓，害怕困難，看不見新鮮事物，看不見新問題，看不見先進經驗」的「保守主義的領導方法」。14

爲自己這樣的毛式多快好省的思路所激勵，毛把蘇聯的那一套經濟建設方式看作是「緊箍咒」。借著蘇共二十大對于斯大林的批判，毛强調要走中國自己的不同于蘇聯的加快建設的路子。他說，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這樣也有好處，打破

「緊箍咒」，破除迷信，搞社會主義建設不一定完全按照蘇聯那一套。「應當更加强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强調開動腦筋，强調創造性，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151956 年 3 月，在主持起草〈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章的政治局會議上，毛强調:「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16 在這個背景下，四月間毛的著名講話《論十大關係》，應該看作是毛試圖總結他的經濟建設思路的一種努力。這篇講話開宗明義即强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17 雖然這篇講話比較符合當時經濟發展的實際，但是，毛的落脚點還是在于「鼓勁」，强調要「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18

從這些講話中，我們看不到毛有什麼心情壓抑。相反，這時的毛雄心萬丈，準備在經濟建設上大顯身手，準備創造出不同于蘇聯經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問題是，好景不長，毛很快就遇到了挫折。在毛的冒進路綫主導下，1956 年開年不久，中國經濟即呈現「全面緊張」的局面，表現爲各個行業盲目發展、基本建設規模過大、職工總數增長過快、生產秩序混亂、資金供應緊缺、貨幣發行量劇增等現象。爲了應對這種局面，負責經濟工作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陳雲等，提出要反對急躁冒進。這種主張得到了劉少奇的支持。6 月 10 日，劉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了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進的方針，并通過 6 月 20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傳達全國。191956 年下半年，因此成爲反冒進的半年。這個時候，毛落了下風。在這種狀態下，毛不是不善于采取守勢。我們知道，毛對這篇社論「很不滿意」。20 但是，他當時僅僅表態「不看了」。21 無疑，他憋了一肚子氣。直到 1958 年 1 月，也就是在反右之後，只有當毛重新奪得了主導權之後，在南寧會議上，他不僅公開了自己對這篇社論的不滿，而且采取了激烈的反擊行動，「把這篇社論當作靶子，系統地批，嚴厲地批，一段一段地批」。22

9 月份，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的時候，正是劉少奇等人的主張占據主導地位的階段，而毛當初所確定的八大要「反對右傾保守」的基調，已經不見踪影了。劉等人對于八大一次會議的這種主導力量，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速度和建設方式上，而且表現到政治路綫和權力架構上。在蘇共二十大之後整

個世界共産主義陣營「解凍」潮流的影響下，中共八大黨章取消了七大黨章中有關「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强化了黨員權利和黨內民主的因素。在政治路綫的確定上，儘管毛對八大有關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界定提出异議，但是整個中共領導層對此似乎并沒有認真對待。在權力架構上，毛退居二綫，而且下一步更有僅作「榮譽主席」的安排。從 1935 年遵義會議之後，二十年來，毛的威望、地位、權力和影響，在中共內部乃至中國政治中，總是在不斷增長，現在却第一次出現了衰退。

當然，退居二綫是毛主動提出的，從黨章中取消「毛澤東思想」的說法也得到了毛的同意。中共的官方人士和桂冠學者，以此論證當時毛和他的政治局同志如劉少奇等之間并沒有權力鬥爭。23 但是，主動提出，可以是一種試探；而劉少奇們當仁不讓，毛的心中如何滋味，恐怕即使是官方人士和桂冠學者們也并不知道的。毛本人倒是透露了一點想法。1956 年 11 月 15 日，八屆二中全會上，毛在講話中說到：「象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鬥不贏，被別人推下去。」24 顯然，毛在擔心自己的權力地位。如果毛對八大一次會議的看法，也像中共官方史學那樣，認爲是什麼「偉大勝利」，他怎麼會說整個 1956 年自己心情壓抑、不舒暢呢？

1957（上）：從「鬧事」到整風

這就來到了多事的 1957 年。毛不怕多事。毛在這一年的政治運程，與 1956 年形成鮮明對比。1956 年，以六月份爲轉折點，毛是開高走低，從豪情萬丈到心情壓抑；1957 年，也是以六月份爲分界綫，他却開低走高，反手重新取得了中共決策與中國政治的主導權。毛是怎樣做到呢？本文發現了兩個轉折：一個是從「鬧事」到「鳴放」的轉折，一個是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通過這兩個轉折，毛實現了他的勝利。本節討論前一個轉折，下一節分析後一個轉折。

1）「鬧事」：

1957 年開初，形勢對毛、乃至對整個中共并不有利。1956 年冬季到 1957 年春季這大約半年的時間裏，據中共官方文件透露，「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衆性的游行請願和其他類似事件，比以前有了顯著的增加」，全國共有一萬多起罷工和一萬多起罷課。25 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些問題？在 1 月 18 日至 27 日舉行的省市自

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對此有一番議論。他說，好多地方學生鬧事，一些教授中出現了「不要共産黨」、「社會主義不好」等怪議論。毛把這些現象和蘇共二十大挂起鈎來，幷且認爲可能出現相當嚴重的局面。他說：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要從最壞的可能設想，準備出「匈牙利事件」，要注意繼續暴露出來的各種思想。26 按照毛這些講法，顯然是把這些所謂「鬧事」看成敵對事態。他當時也確實談到了「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新問題」，意味著把這些事態看作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根據鄧力群的回憶，毛在那個時候開始强調，三大改造完成以後，階級矛盾幷沒有完全消滅。27

不過，事情的蹊蹺在于，毛澤東隨後所確定的對待所謂「鬧事」的公開口徑與處理方式，却與這種看到「螞蟻出洞」、强調階級鬥爭的判斷很不一致。二月間，毛提出了他的所謂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理論。2 月 27 日，也就是省委書記會議之後整整一個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其中第九節專門討論了「少數人鬧事」的問題。這裏，毛的判斷與一個月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現在，毛認爲，發生鬧事的最爲重要的因素，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對于群衆缺乏教育。因此，相應的對策就是：「爲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一個月前，他憂心忡忡地設想「最壞的可能」和在中國出匈牙利事件；現在，他却說：「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裏，有少數人鬧事，幷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28 毛爲什麼忽然變得這樣開明了呢？也許，同一篇講話接下來的一節，透露了某種消息。那裏，毛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壞事變好事」的說法，提到因爲這些壞事而「無權將變爲有權」29——當然，明裏是就國際形勢而言，沒有說這也適用于黨內的權力鬥爭。

在民衆「鬧事」的同時，毛也試圖「鬧事」，開始尋找機會發泄自己 1956 年的那種壓抑心情。也是在一月的省委書記會議上，毛在十八日會議開幕講話時，第一次在党的高級幹部範圍內公開表達了他對于「反冒進」的不滿。當然，這時他的表達還是相當溫和、委婉的。毛說：前年反右傾，去年反冒進，反冒進的結果又出了右傾，這主要是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的右傾。30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這同一個會議上，頭裏，毛在那裏對于「反冒進」發他的牢騷，後頭，黨內

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却對于毛幷不給予多少理會，而是繼續講他們的「反冒進」思路，幷按照這一思路布置經濟工作。也是在 1 月 18 日的會上，緊接著毛的講話之後，陳雲作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講話，試圖總結 1956 年財政經濟工作的情况和經驗教訓，大談「經濟穩定」和「比例關係」的重要性，提出了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物資供需三大平衡的思想。31 陳雲强調「適當壓縮基本建設的投資」等措施。根據中共官方史學家的看法，這些措施對于 1957 年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起了重要作用。32 在此之前，1 月 8、9、10 日，連續三個晚上，毛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了小範圍的會議，座談 1956 年的經濟工作，陳雲在發言中大體陳述了他 1 月 18 日講話的基本內容。331 月 10 日，陳雲就任新成立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該小組被賦予「統一領導全國經濟工作」的權力和職責。34

上述情况，提出了兩個問題。首先，從 1 月 27 日到 2 月 27 日，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爲什麼毛澤東改變了他對于「鬧事」的看法和對策？其次，毛澤東對于 1956 年「反冒進」的不滿，已經在公開場合有明確的表達，爲什麼他的政治局同事們幷不重視？目前所能看到的歷史材料，還不足以完全回答這兩個問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個問題，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可以聯繫起來考察的。根據幷不充足的相關歷史材料，本文對此提出三點推測：

第一，陳雲對于 1956 年經濟工作的看法和相應的經驗總結，在中央領導層中有相當普遍的共識；另一方面，毛的看法則與這些共識很有距離，他的權威因此被領導層的共識所壓倒。也是在毛召開的頤年堂會議上，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四人，在各自的發言中，一致認爲 1956 年「冒了」。陳雲講話即前述意思，李富春使用了「衝昏頭腦」的話，薄一波列舉了 1956 年經濟生活中的十個問題，李先念則從財政的角度認爲 1956 年「冒了」三十到三十五億。35 毛對這四人的發言作了詳細筆記，還把薄一波的看法總結爲「薄十條」，36 說明他無法輕忽這些財經重臣的看法。必須指出，這距離中共八大一次會議結束才剛剛三個來月，毛對于中共中央的高層政治生活比較不那麼具有權威。毛在經濟問題上的發言，在 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上半年這一段期間，顯然比較不受他的同志們的重視。這就可以至少部分地解釋，爲什麼儘管毛對「反冒進」不以爲然，陳雲他們還是照樣講話，幷且被賦予統管全國經濟的重大權力。

第二，既然陳雲們可以在毛有牢騷的情况下照樣表達自己的意見，反過來，

陳雲們有表達機會和領導權力，也并不表示毛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了他們的觀點。相反，毛堅持自己的看法。所以，在頤年堂座談之後，他于 1 月 18 日反而公開了自己對于反冒進的不滿。按照毛的思維方式，在居于少數的時候，他會認爲自己是在「反潮流」，「真理在少數人手中」；而按照他的行事邏輯，有這麼多的領導人反對他的觀點，正說明問題嚴重，必須采取非常手段來解决問題。事實上，歷史資料說明，毛一直堅持認爲這些財經事務領導人是右傾保守的，雖然他在 1957 年 1 月并不直接表達這個看法。直到 1958 年 1 月，也就是經過了以反右爲軸心的一系列政治事態發展之後，到了毛已經掌握政治主導權的南寧會議上，毛才對他們算舊帳。他說，1955 年 12 月，我寫了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會上，周恩來受到嚴厲批評，以至打算辭職。37 陳雲則此後基本賦閑。毛還在會上指著薄一波的鼻子說：「我看你不是右傾的話，至少也是中間偏右！」38 南寧會議之後的 1958 年 2 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的批評繼續加碼，說所有那些主張反冒進的中共領導人「跟右派相距不遠了」，「大概五十米遠」。39 這裏，毛直接用「右派」作爲基本的政治坐標，來把他對于 1956 年反冒進的反攻倒算合法化，來在政治上壓倒他的政治局同事。一年以前，1957 年春季，也就是反右運動之前，有同樣看法的毛，也同樣試圖表達了，但却不能這樣痛快地表達，也不可能因此改變中央的經濟工作方針和經濟工作權力架構，更不可能是自己的看法占據至高的政治優勢。在劣勢的情況下，如果毛因此會思考通過什麼手段，才能取得對薄一波們說這個話的優勢地位，恐怕也是一個所謂政治家很正常的反應吧？

第三，利用群衆「鬧事」所表達的不滿，打擊一下這些「當權派」的「官僚主義」，恐怕就成爲毛的一種戰略選擇了。按照他的政治思維，毛從「鬧事」中發現了「階級鬥爭的新問題」；按照他的權力思維，毛要利用一下這些「階級鬥爭的新問題」來爲實現自己的政治和權力目的服務。可以推測，當毛柳暗花明地思考到這裏時，他豁然發現，群衆「鬧事」不僅不可怕，而且可以「壞事變好事」了。怎樣把它變成好事呢？毛有他的「我們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即整風。「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個話，是毛在 1956 年 11 月八屆二中全會期間講的。40 而那次全會，正是反冒進的高峰。可以想像，毛從他感到壓抑的時候，就開始思考如何改變這種壓抑狀態，也就是思考如何掌握政治主導權了。1956 年冬天，他已

經有了初步的思路，就是重施延安整風的故伎；而到 1957 年初，他的戰略戰術隨著「鬧事」等事態的發展而逐漸在頭腦中清晰了，這就是：借助社會壓力，實行黨內整風。

2）整風：

毛馬上行動了起來。1957 年 3 月，毛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開始布置整風，針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張「放」。41 然後，毛就「南巡」了，到了南京、上海等地，并在杭州住了一段時間。在當地的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時，毛把他自己在一月份看作風雨將至、「螞蟻出洞」的那些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願，統統「看作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并豪邁地發問：共産黨、國民黨、民主黨派，誰怕批評？42 對毛和他的聽衆來說，答案當然是毫無爭議的。

四月底，中共中央正式發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43 原定 1958 年進行整風，1957 年僅是進行準備并在適當範圍試行。44 但是，毛已經迫不及待。在 4 月 27 日黨內發布整風指示之前，4 月 19 日，毛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在十五天內用電報報告：「你們對人民鬧事采取了什麽態度，黨內某些人存在的國民黨作風（即把人民當敵人，采取打擊壓迫方法，所謂人民民主，所謂群衆路綫，所謂和群衆打成一片，所謂關心群衆疾苦，對于這些人說來，只是騙人的空話，即是說黨內有一部分人存在著反動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風）是否開始有所變化。」45 把那些忠心耿耿維護他的共産黨政權、因而敵視乃至鎮壓群衆表達自己意願的罷工罷課等行動的官僚們，放到這樣的問題下質問，毛的意圖，對于我們已經瞭解他早些時候對于所謂「鬧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判斷的後來者來說，一下子就變得十分清楚了：爲了打鬼，借助鍾馗，這是毛的一貫手法。「鬼」總是那些人，就是黨內并不亦步亦趨跟隨毛的人；「鍾馗」很多，這一次是「鬧事」的民衆。

但是，「鬧事」鬧過之後，不能繼續鼓勵。這是一位不好使喚的鍾馗，難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弄于股掌，指揮如意。爲了更好地達到「打鬼」的目的，毛還要請新的「鍾馗」。5 月 4 日，毛再次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黨委「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指示說，「現在整風開始，中央已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領導人士商好，他們暫時（至少幾個月內）不要表示態度，不要在各民主黨派內和社會上號召整風，而要繼續展開對我黨缺點錯誤的批判，以利于我黨整風，否則對于我黨整風是不利的。」毛强調，「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46 于是，轟

轟烈烈的鳴放運動開始了。

恰恰在這個時候，毛又提出了一個甚爲敏感的問題。他提出不再當下屆國家主席，并且首先是面對所謂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提出的。4 月 30 日，毛對陳叔通、黃炎培談了這個想法，并「囑我們（即陳、黃—引者注）透露消息」。47 這個消息產生了複雜的政治效應。陳、黃等人，馬上誠惶誠恐，要求毛留任；相比之下，黨內那些早就同意毛退居二綫、也贊成毛卸任國家主席、甚至贊成毛在適當的時候卸任党的主席的政治局同事們，在毛看來，是更加體恤毛呢，還是有些不够意思呢？社會上有傳言，說黨中央開始分裂，毛的鳴放方針遭到了黨內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對和黨內保守勢力的反擊，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臺。48 當然，毛後來確實辭去了國家主席，但是，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這一舉動及其效應，不是產生了一些微妙的政治後果嗎？第一，這就爲整風注入了有關高層權力鬥爭的想像；第二，造成了毛是開明的、而另有領導人是官僚主義後臺的印象，而那些領導人甚至要逼迫毛下臺！就是民主黨派領導人的勸進表態，不是也有助于讓人在對比中看出那些剛剛在八大取得治國大權的中共領導人的一些問題嗎？整風鳴放的矛頭應該指向哪里，難道毛沒有給出暗示和指引嗎？

1957（下）：從整風到反右

不過，對于那類寄希望于開明偉大的毛而針對黨內「有人」的所謂群衆好意，毛却認爲是「完全造謠」。49 利用歸利用，階級鬥爭歸階級鬥爭。由于存在階級鬥爭，毛很快就覺察到，整風中大鳴大放的矛頭所向，并不只是針對他認爲是官僚主義的現象及其權力代表，更不僅是針對「小和尚」，而往往會針對「老和尚」，針對毛本人，針對毛所領導的這個党和毛所創建的這套制度。50 有的批評意見明確說，「三害」(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51　就是辭去國家主席這件事，一些知識分子也有另外的看法。在決定展開對于所謂右派的反擊的時候，毛在爲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特意提到了右派分子的這種看法:「毛澤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辭職。」52

就是否害怕批評而言，毛其實是紙老虎。從 5 月 4 日毛替中共中央發布指示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算起，黨外人士發表意見不過十天而已，毛就已經受不了了。5 月 15 日，毛起草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說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黨

外人士中發現了「右派猖狂進攻」。可是，這篇文章當時秘而不宣。53 因爲毛認爲「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所以，在做出「右派猖狂進攻」這樣一個判斷的同時，毛依然在 5 月 16 日指示全黨，「放手讓他們發表，并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54 大約是根據這一指示，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官員，在五月底，還三番五次動員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發表鳴放意見。55 動員成功的結果，就是那篇以批評「黨天下」而名留青史的〈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最遲，到 6 月 6 日，也就是反右運動正式開始的隔天之前，毛還爲中共中央起草了最後一個要求「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56 爲了下一步的輝煌戰果，毛要中共黨員幹部、也要自己「硬著頭皮頂住」。

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時候，毛還沒有忘記「一鷄兩吃」地利用「右派進攻」的「剩餘價值」，即通過這樣的「整風」來「揭露」黨員幹部的「缺點錯誤」。57

另一方面，在「誘敵深入」的同時，毛也耐不住要送出一些「殲敵」的信號。5 月 25 日，在接見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時候，毛在簡短的講話中，强調「中國共産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而「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58 在短短一百多字之中，毛已經鮮明地把他的所謂辨別香花與毒草的兩條根本標準突出了出來。30 日，毛要求胡喬木轉載一篇批判章乃器的文章，但特意提出「何時轉載適宜」的問題。59《人民日報》是 6 月 8 日轉載這篇文章的，也就是毛指示中共各地黨委「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那一天，《人民日報》發表毛撰寫的社論《這是爲什麼》的那一天，反右運動正式登臺的那一天。

與 1956 年 6 月毛對《人民日報》有關反冒進的社論送審稿采取「不看了」的消極態度相比較，1957 年 6 月的毛异常亢奮。繼六月八日《這是爲什麼》的《人民日報社論》之後，6 月 10 日，毛親自部署「關于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6 月 14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撰寫的「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産階級方向》；6 月 22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不平常的春天》，這也是經過毛親自修改的；7 月 1 日，毛再次親自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産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在《人民日報》發表。然後，毛就出巡了，而且打算在長江三峽游泳。607 月 9 日，毛從外地通知中央，「反攻應當擴大」。61

顯然，自從開始整風，毛就增加了對于中央决策權的掌控；而反右一旦展開，

毛就完全掌握了主導權，很有高枕無憂的感覺了。到十月的八届三中全會，即八大開過整整一年之後，毛即修正了八大的路綫，提出「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62 而在上一次中央全會上，即 1956 年 11 月的八届二中全會上，毛還附和八大對于社會矛盾的判斷，說「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决」，雖然那時他也强調「但是應該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63

在三中全會的講話提綱中，毛還提出了實現現代化的「兩種方法」的問題，即「一種慢一點、差一點，一種快一點、好一點」。64 毛的主張，只能是「快一點、好一點」的那一種。那麼，有人主張「慢一點、差一點」的方法嗎？是什麼人在主張這種方法呢？當然不是右派分子。事實上，1957 年早些時候，在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毛也含蓄地但是頗爲理論化地談到了這個問題。他强調，經濟建設方面存在著客觀規律和主觀認識的矛盾，而「這個矛盾，也將表現爲人同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65 當然，毛不會認爲自己屬于「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誰是這些人呢？當然也不是右派分子，因爲他們已經屬于敵人，而在那個時候，毛還認爲那「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要等到七、八年之後，在毛的理論又有了新的發展的時候，那些「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人，就成爲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

概括地說，通過反右，毛在兩個層面上奪回了對于中國政治的主導權。第一層，關乎如何界定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如何確定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方位，判斷中國的根本問題，從而制定中國共産黨的基本路綫和政策；第二層，關乎如何進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也就是采取什麼樣的道路、方法和步驟來推動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在這兩層背後，就是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從來不是空洞的東西；在中國共産黨的政治中，它首先就體現爲這兩個層面的影響力。在掌握了這樣的影響力之後，毛對于他的政治局同事的權威，就今非昔比了。按照薄一波多年之後轉述的「同志」們的看法，從南寧會議前後開始，「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難像以往那樣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討問題」。薄一波認爲，這「標志著建國以後黨內的民主生活開始由正常或比較正常向不正常轉變」。66 如前所

述，毛把反冒進和右派聯繫到一起，他認爲反冒進與所謂右派進攻是互相關聯的，前者爲後者鋪路。這樣，在 1957 年夏季及此後，那些一年之前還在積極地反冒進的中共領導人，爲了顯示自己與右派幷沒有政治上的關聯，就不得不特別拉高反右的調子。也如薄一波所回憶，這「表現在去年（1957 年——引者注）6 月 23 日周恩來同志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的那一篇報告，痛駁右派，壯人民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67

這裏，一個可能引起興趣的問題是：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是毛蓄意「引導」所謂右派「向黨進攻」而造成，還是整風失控所引起的？按照毛的「引蛇出洞」的說法，按照常見的對于反右運動的分析，似乎應該是前者；而本文提出的先有從「鬧事」到整風的轉折、再有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的看法，特別是强調這兩個轉折的著眼點都在于毛從他的那些經濟現實主義派的黨內領導同志手裏爭奪政治權力的論點，則似乎容易導向後一種結論。但是，實際上，本文對此沒有定見。這首先是因爲我們沒有足够的史料來回答這個問題。從現有的資料看，應該說，前一種看法可以得到較多歷史資料的支持。毛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由來已久。整風伊始，毛就說過，「只要我黨整風成功，我黨就會取得完全的主動，那時就可以推動社會各界整風了（這裏首先指知識界）。」 68 其中，可以看得出已經有了對知識界下手的打算。到了判定「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時候，毛更明確地寫道，「共產黨整風告一段落之後，我們將建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實行整風」，「現在是黨外人士幫助我們整風，過一會我們幫助黨外人士整風」，69 顯然要轉過頭來對付黨外人士了。整風對于毛來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1957 年 6 月，毛强調過，整風是「天下第一大事」。70 這可以幫助說明，毛在構思、部署和發動整風之際，應該是有所謂「一盤棋」在胸的。在這個意義上，本文傾向于認爲，第二個轉折，即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是毛在决定第一個轉折（即從「鬧事」到整風的轉折）的時候有所前瞻幷有所預謀的。因此，反右可以說是一個陰謀連環套，「陰謀後的陰謀」，「陰謀中的陰謀」，陰陰爲陽，是爲「陽謀」。

不過，本文幷不願意把這種看法推到某種比較極端的程度，認爲毛自始至終成竹在胸、操縱全局、指揮如意、節節推進。誠如赫魯曉夫所言，「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71 換句話說，毛從來都是一個陰謀家、戰略家、權術高手。但是，這幷不意味著毛能够未卜先知。相反，毛總是隨時根據形勢調

整自己的戰略，同時保持他的目標不變。正是因爲這樣，毛在 1957 年製造了兩次轉折，得以反手爲雲、覆手爲雨：在「鬧事」不危及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政治利益的時候，借助群衆尤其是「民主人士」的批評來打擊和壓制黨內有不同意見的領導人；而在這種批評質疑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的時候，又反過來强調階級鬥爭，以此壓倒中共八大集體確立的政治路綫而代之以自己的政治路綫。從「鬧事」到整風，借助鍾馗可以打鬼；從整風到反右，借鬼也可以打擊鍾馗。形勢歷經轉折，毛的目的只有一個：奪回權力；知識分子和經濟務實派領導人兩敗俱傷（當然，這一次，後者比前者傷得輕多了；真正的兩敗俱傷要等到七、八年之後），而唯有毛取得了勝利。

1957-1958：從反右到「大躍進」

一旦毛的政治主張通過反右而占據了中共的主導地位，毛就要實施自己的主張了。必須指出的是，毛這時的主張，固然强調階級鬥爭，但是并不因此排斥經濟建設。如前所述，只是毛有自己那一套經濟建設的主張和路數就是了。結果是，毛一旦取得政治勝利，我們就可以嗅到大躍進的氣味了。因此，1958 年，從政治上說，是從反右運動取得所謂勝利的時候就開始了。

1957 年 10 月起，八屆三中全會起，毛在自從反冒進之後的一年多不怎麼談經濟問題之後，又開始大談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業問題了。10 月 9 日，毛在山東莒南縣厲家寨大山農業社爭取豐收的報告上批道：「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厲家寨是一個好例。」72 九月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毛在 1955 年底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毛本人則在十月中再次親自修改這份文件，并要求很快把《綱要》在報上公布。731958 年 1 月，毛召集南寧會議，大肆批評反冒進，并在這之後，親自統攬了經濟工作的大權。74 這等于說，毛澤東不僅從二綫殺了一個回馬槍，再次站到「一綫」，而且在「一綫」特意選擇了經濟工作的領導權——這項兩年之後他自己承認「我就不大懂」的領域。75 然後，就是「大躍進」了。在「大躍進」高潮中舉行的八大二次會議，其政治結論和政治意義，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那種內容了。按照毛自己的總結，是個馬鞍型，兩個「高潮」之間一個低潮，低潮就是反冒進。76 換句話說，反冒進和反冒進過程中舉行的八大一次會議，使毛的權力進入低潮；而整風、反右則改變了這種狀態，把毛再次送上了專制權力

的高峰。

結論：動態的歷史，政治的樞紐

經過以上對于歷史發展脉絡的梳理和分析之後，可以說本文有兩個發現。第一個發現是，從「鬧事」到整風、從整風到反右，有兩次轉折：毛先是企圖利用知識分子特別是民主黨派來反對黨的官僚，用所謂「整風」打一下劉少奇們；但是，很快他就發現這一戰略并不奏效，相反，知識分子的矛頭對準了整個党國制度，包括毛本人。于是，毛就反過來，對知識分子痛下殺手，用這個血淋林的鎮壓凸現所謂階級鬥爭的激烈、殘酷、你死我活，同樣勝利占據了中共路綫和權力主導的制高點。對第二個轉折，過往的研究都清楚地看到了，但第一個轉折則往往被忽略了。由于這種忽略，鳴放運動的出現就顯得突兀而缺少邏輯，或者容易被理解爲毛和中共有其開明、民主的一面，只是在「民主」觸及到制度根本的時候才被迫還擊，或者被完全看作毛所自詡的「引蛇出洞」，好像一切都在毛的掌握之中。而從上文的叙述和分析中我們看到，「引蛇出洞」僅僅是 5 月 15 日到 6 月 8 日之間毛的戰略，并不能完全解釋此前毛爲什麼發動鳴放運動。只有看到第一個轉折，事情的脉絡才變得比較清晰一些了。可以說，看到了這兩個轉折，在歷史層面，才能够較爲清楚地展現歷史的動態，而在概念層面，也才能較爲清楚地看到中共極權制度下專制權力運作和專制制度運行相互作用的深刻圖景。

本文的第二個發現，也展現了歷史的動態，那就是：毛澤東并不是從來不要搞經濟建設。恰恰相反，毛在五十年代中期熱衷于所謂「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鼓吹提早實現現代化，「十五年趕上英國」。但是，毛并不尊重經濟規律，更不懂得現代化建設。這就導致了毛與他的那些試圖瞭解經濟規律、學習如何搞現代化建設的同志們之間出現了分歧。這種分歧在政治上就表現爲對于國家决策和治理權力的爭奪。毛的許多聽起來很具有進步性的看法，比如對于官僚主義的反感、對于蘇聯經驗的不滿、對于所謂群衆首創精神的尊重，其實都是和他的經濟冒進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是爲了維護和推展他的經濟冒進主義而提出來的，因此并不具有真正的進步意義。反過來，他的那些自以爲掌握了經濟規律的黨內不同意見持有者們，比如陳雲，也不過是在與毛的對比中比較具有接近實際、階級真理的品質，而放到另外的歷史和制度環境下也就不一定具備這種品質了。

毛的完全放弃經濟建設、一心專注階級鬥爭，是經過了本文所研究的歷史階段之後又一個回合的鬥爭和起伏才形成的。那就是 1958 年的「大躍進」、「大躍進」所帶來的灾難、以及此後經濟務實派領導人一度主導政局的那段故事了。這已經超出了本文的研究範圍。但是，歷史有時候驚人的相似，歷史更總是有其千里灰綫的聯繫和脉絡。1958 年起的「大躍進」，可以說是 1956 年毛澤東經濟冒進的放大；而一九六零年代初的形勢，則很像八大一次會議前後的情景。至于「文化大革命」，則就是反右運動的轉胎和其登峰造極的發展了。比如說，1957 年的時候，大學生們還主要是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年輕人，毛不想使用；但經過鳴放運動，毛也領教了知識分子是如何不好使喚，于是「文革」伊始毛改爲發動青年學生大鳴大放。又比如說，中共經濟務實派的領導人，仍然是鬥爭的目標所在，不過，從反右到文革，毛已經把他們從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看成爲敵我矛盾了。還比如說，從反右到「文革」，知識分子都一同遭殃，因爲他們與經濟務實派領導人一樣，對毛來說，同是在政治主張和政治權力上的兩個心腹大敵。可以說，毛生活在兩個「權力場」之中，一方面面對所謂階級敵人，包括所謂「右派」，另一方面則面對黨內的潛在的對于自己主張和權力的挑戰者，即五十年代的所謂「右傾保守分子」和六十年代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權力鬥爭、路綫鬥爭和階級鬥爭，在毛這裏都是交織在一起的。而對毛來說，只有掌握無人能够質疑和挑戰的權力，才能取得所有這些鬥爭的勝利。爲了這樣的勝利，毛權謀百出。不過，如果我們有歷史的眼光，并不難發現，毛亦不過「技止此耳」。甚至包括毛在「文革」中使用的政治伎倆，乃至一些細節，也有很深的脫胎于反右伎倆的痕迹，包括「出巡」時機的掌握、安排在長江游泳等等，都如出一轍。可以說，從宏觀的歷史眼光來看，反右運動不僅决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毛時代的命運，而且决定了毛時代的中國的基本政治走向。在這個意義上，反右運動是理解毛時代中國政治的樞紐事件。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發表於《當代中國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注 釋

1 劉少奇，〈在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載中共中央文獻

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 38—117。

2 劉少奇，〈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届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 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 285—325。

3 〈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决議〉，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 340—355。引文見頁 341。

4 劉少奇，〈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届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頁 288。

5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載楊勝群、陳晋主編，《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紀實》，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24。

6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 24。根據鄧力群的回憶，1957 年，毛在杭州，對周恩來、彭真和胡喬木講了這個話。

7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 18；石仲泉、沈正樂、楊先材、韓鋼主編，《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 117。

8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 18；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頁 117。

9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頁 4。

10 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决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75-6。

11 毛澤東 1955 年十一月十七日給劉少奇、鄧小平的信。轉引自張家敏，《建國以來，1949-1997》，香港：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頁 198。

1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册），頁 487、485。

13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産力〉（1956 年一月二十五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 23。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 1-10。引文見頁 6、10、9。

15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 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9，頁 14-5、24。

16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頁 9。

1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 82。

1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104。

19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頁 4—5。

20 此處引語來自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 23。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 538。

22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 23。

23 例見，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

24 轉引自葉永烈，《歷史悲歌：「反右派「內幕》，香港：天地圖書，1995，頁 58。

25 〈中共中央關于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1957 年三月二十五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册），頁 154-63。引文見頁 154。

26 姜華宣、張蔚萍、肖蘇主編，《中國共産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 265。

27 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 27。

2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351-2。

2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354。

3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 363。

31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册），頁 1-11。

32 姜華宣等，《中國共産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增訂本），頁 265。

3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上卷，頁 541。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雲年譜》（中卷），頁 360-1。小組的其他四名成員是：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

3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 541。

36 同上。

3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639。

3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555。

39 《陳雲年譜》（中卷），頁 410。

40 姜華宣、張蔚萍、肖蘇主編，《中國共産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 263。

41 〈在中國共産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 年三月十二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378-95。

42 毛三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別在南京、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相關講話提綱，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03-5。

43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册），頁 222-6。

4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22，注 2。

4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32-3。

4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55-6。

4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58。

4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93。

4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93。

50 「小和尚「和「老和尚「是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中的用語。見下文。

51 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612。

5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503。

5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75-6，注 1。

5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78。

55 穆欣，《述學譚往：追憶在〈光明日報〉十年》，北京：東方産社，2006，頁 38。

5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91-2。

5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78。

5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88。

5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89。

60 〈關于擬在三峽游泳給中央的電報〉（1957 年七月七日），載《建國以來毛澤

東文稿》（第六册），頁 535。這次游泳未能實現，因爲「根據試水情況，中央常委沒有同意「（注 2）。

61 〈中央關于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等問題的通知〉（1957 年七月九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537-8。

6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595。

6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245。

6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594。

6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357。

6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653。

6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645。

6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55-6。

6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75。

70 〈關于注意閱讀整風消息的批語〉（1957 年五月十四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468。

71 《赫魯曉夫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頁 659。

7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599。

7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頁 604。

74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 226。

75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 167。

7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641。

從八大的懸案看整風到反右的「轉向」　　齊　戈

對於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研究者甚多，對於整風到反右的具體過程，出入不大。但對「整風」到「反右」的突然轉向，始終讓人疑惑不解，眾說紛紜。事情過去五十年了，這個突然轉向的原因何在？還是不得要領。陰謀也好，陽謀也罷，只要我們就事論事，這個爭論多半沒有什麼結果。不過，當我們把「反右」運動

置於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置於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的反對個人崇拜，並由此將黨章中刪除涉及毛澤東思想的相關部分，以及緊接其後的匈牙利事件，八屆二中全會大講階級鬥爭的政治背景中，這個從整風到「反右」的所謂陽謀，反倒更加真實地顯現在我們面前。而對這個背景的解讀，就不得不從胡繩所說的八大的一樁懸案說起。

所謂八大的這樁懸案，是指毛澤東在八大之後不久，出爾反爾，否定八大政治決議案，其理由令人啼笑皆非。這個理由是什麼呢？「是被迫簽字，臨時匆忙簽的字」。如此天大的事情，自己參與修改達 21 次並親自定稿的決議，偉大領袖竟能以如此理由來否定，無賴嘴臉可見一斑。對黨內尚且如此，對黨外那些民主人士無論如何對付都在情理之中。這件事發生在八大之後、八屆二中全會之前，時間大約在 56 年的 10 月左右。

中國共產黨在「八大」第一次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並把發展生產力的經濟建設作為今後黨的主要任務。為了避免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錯誤，「八大」決定加強黨內民主，反對個人迷信和專斷。並以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為契機，在黨內提倡集體領導，淡化具有個人崇拜色彩的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共產國際也好，之後的蘇聯老大哥也好（包括斯大林），從來就是不予理睬。在中共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正式文件的交往中，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一般都不會出現，即使是毛本人批發的文件也是如此。對此，胡喬木解釋說:「這與蘇聯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不感興趣有關。」1 因此，在八大通過的黨章裏刪除了與毛澤東思想有關的章節，可以把它解釋為考慮到與社會主義陣營的關係，吸取斯大林的教訓，加強集體領導等等。總之，只要在面子上說得過去，既無傷大雅，又得到實際效用，應該是相安無事的。

問題是，毛澤東是信奉「不搞一個主義，即使當上了領袖，在其活著的時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2 的人。在延安整風花了多大的力氣才樹起的毛澤東思想的權威，這八大一開，這個權威就不提了？在七大時為什麼要提毛澤東思想？是因為「有這個需要。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提毛澤東思想，很難在全黨形成思想上的統一。」3 那麼現在就沒有這個需要了？沒有毛澤東思想全黨的思想也能統一了？因此在八大討論時，一些代表對此有些議論，劉少奇這樣解釋道:「毛主席對全黨

的領導是在七大上確立的，現在即使我們不談它(意指毛澤東思想)，每個人也都清楚。」4

事情真如劉少奇講的那樣？其實不然。在 1956 年 7 月《人民日報》公佈了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以後，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則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話題。這股「逆流」對毛澤東本人的衝擊不可低估，並成為緊接其後相關事件的一個重要誘因。雖然他在公開場合對斯大林問題不得不敷衍幾句，在背後他講得更多的則是對斯大林要三七開，「這把刀子不能丟」之類的東西。而新華社編輯的內部參考，卻大量登載了中國社會各界的種種議論。人們不僅為赫魯曉夫揭露出來的斯大林的錯誤感到震驚和不解，而且已經有人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中國黨內有沒有個人崇拜？天津市幹部提出，「今後歌頌領袖時應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詞句，應考慮改變一下」。5 廣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說，「蘇共能夠這樣暴露缺點，才是發揮民主精神。」「我們過去有時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是不夠恰當的，帶有封建色彩，也是個人崇拜，忘記了党的集體領導的力量！」

對於與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互動的國內動態，毛澤東的惱怒可想而知，但他卻能深藏不露，裝出一副勝似閒庭信步坦蕩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背景下，雙百方針竟由毛澤東認可正式出臺了！對於雙百方針，國內多以正面的評價為主；國外的政治家和研究者恰好相反，始終是把雙百方針與反右運動看作是個互動的整體，而並不太關注整風與反右的關係。在毛澤東公開場合大講雙百方針之時，他背後卻是念念不忘斯大林主義這把刀子。他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就突然冒出一句：「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6 就是一個明證。這次講話的時間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與他提倡雙百方針是同一時間。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兩面三刀可見一斑。由此可知，八大通過修改黨章刪去與毛澤東思想相關的部分，無論毛澤東表面上怎麼講，同意也罷，贊成也好，都不過是違心之論。不但「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的說法可以說明這點，緊接其後的這樁「懸案」更能證明這點。

胡繩在《談黨的「八大懸案」》一文中寫到：「党的八大時發生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大會通過一個政治決議案。可是過不久，毛主席說不行，是錯誤的，

他不能接受。說當時他是被迫簽字，臨時匆忙簽的字。」八大政治決議案哪里錯了呢？既然這是不對的，那對的又如何呢？胡繩說：「在決議上主要矛盾提了三點。毛主席似乎主要攻最後一點，為什麼不攻前面兩點？可以說是攻其要害，因為第三點帶點理論性。……所以毛主席在這時候有些想法，和起草決議的人處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下。這個歷史背景是什麼呢？都是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但在這個前提下，毛主席還有點保留，就是階級、階級鬥爭還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還沒有完全解決。所以後來他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還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這在決議中沒看到。」7 作為理論家，胡繩把這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理解，情理之中。但真是理論問題？

對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還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這段話，有必要多說幾句，因為這句話後來濃縮、演變成我們再熟悉不過的「階級鬥爭」。講階級鬥爭，就要講無產階級專政，於是這就成了一對概念，一個範疇。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事實上也在提醒諸位千萬不要忘記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是什麼？是暴力，是國家機器。懂得這一點，就懂得了毛澤東理論之爭背後的實質。那麼，階級鬥爭在我們政治生活中是理論問題嗎？不是。從廬山會議到文化大革命，其間政治運動無數，哪一次不是講的「階級鬥爭」？從黨外到黨內，從地主、資本家到知識份子，最後乾脆整到農民頭上。農民算什麼資產階級？算！算資本主義的尾巴，有了這根資本主義的尾巴，當然就能割到農民那裏去。當年那些農民已經討口要飯了，也能稱作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潛臺詞就是要專政！

所以，階級鬥爭在我們那個年代裏，沒有什麼理論的含義，不過是根打人的棍子、暴力鎮壓的武器。就如同延安整風時期，所謂教條主義一樣，就是拿來制服張聞天等人的棍子。只不過階級鬥爭這個棍子，比教條主義這根棍子更血腥！打遍中國無敵手，一直打到繼續革命那裏去。有階級鬥爭作先鋒，有無產階級專政為後盾，這天下豈有不服之理？而這根棍子，恰好是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個人崇拜，八大在黨章中刪去與毛澤東思想相關章節這個背景下，最能維護毛澤東皇權政治的法寶。

前面我們已經說明了毛澤東對八大政治報告的態度，但要把八大的政治決議

反掉，憑「他是被迫簽字，臨時匆忙簽的字」這個理由，確實是拿不出手的無賴說法，不過毛澤東自有他的辦法。事情也很湊巧，東歐的政治反抗加劇了，這無疑給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大講階級鬥爭、大批八大政治決議提供了依據。二中全會是 56 年 11 月 10 日召開的，距離八屆一中全會不過 42 天。11 月 14 日，毛澤東作臨時發言就明明白白地說了:「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這才是他推行雙百方針、整風的大鳴大放背後的真實。顯然，這才符合毛澤東本人一貫的政治本色；而所謂雙百方針、幫助中共整風，對熱衷於一黨專制的毛澤東來說，卻是一個反常、一個真正的 180 度的大轉彎。與此同時，毛澤東通過八屆二中全會公報發出另一個信號：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確定從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這就是 57 年整風運動的由來。對於「整風」這個概念，黨外人士未必明白就裏，而對黨內人士來說，豈有不與延安整風聯繫起來的道理？這個「整風」的厲害，劉少奇清楚，周恩來也清楚，毛澤東就是靠延安整風，整倒了黨內反對派，成就了以他為核心的大一統。其鬥爭之殘酷、血腥，不是過來人是不可能理解的。毛澤東整風提議的動機何在、目的何在，這對黨內的諸君來說，沒有哪個不清楚。

整風運動有沒有針對黨內政敵的動機？當然是有的。不過，由於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特殊地位，以及黨內體制的原因，黨內的各派力量，尚不足以撼動毛澤東。因此，即使毛澤東對黨內擺出一副攻擊的姿態，不過是敲山震虎，提個醒、嚇唬嚇唬而已。即使要整，也是少數、個別的，尤其是那些對一黨專制毫無感覺，也沒有經歷過延安整風的那些愣頭青。如此一來，那些跟著反個人崇拜轉的、甚至想借此出徐州的人來說，不說是心驚肉跳，至少也知難而退了。毛一提出要搞整風運動，對黨內的威懾足矣；對黨內而言，提出整風之日，就是整風結束之時。既然如此，這個整風為什麼還要搞下去呢？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個沛公不在黨內，而是在黨外的民主黨派。

對於整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重要的只有一條：即整風是關門還是開門。毛主張要黨外人士對党提意見，而劉少奇則主張在黨內關起門來整風；除此之外，在研究從整風——反右運動的大量文獻和資料裏，面上的東西歧見並不多。而這

個「岐見」，恰好是說明整風是假，反右是真的關鍵所在，也是證明從整風到反右的突然轉向是個偽命題的關鍵所在。在眾多的研究中，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所謂中國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還有章乃器、黃紹竑、龍雲、費孝通、浦熙修等人的諸多「反黨」言論，如輪流坐莊這類「野心」激怒了毛；還有人考證說，正是因為羅隆基諷刺毛澤東是「小知識份子領導大知識份子」的時候，毛內心深埋的屈辱感再度勾發。並把這當成毛澤東從整風突然 180 度轉向而「反右」。還說從此不但中國的知識份子們開始走入深淵，連帶著數億中國人開始幾十年的災難。如此說來，這個羅隆基才是一言而興亡天下的活神仙，比毛澤東的一句頂一萬句還厲害？無稽之談！從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之後，國內的反個人崇拜、直接針對毛本人的激烈言詞，天天都由新華社的《內部參考》送到毛的桌子上。前面提到的那些言論，比羅隆基偏激者有的是。毛澤東聽到的多得很，豈在乎羅隆基的一句話？而我們在上面提到的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是要不要黨外人士介入整風，而這才是問題的要害。試想，如果沒有邀請黨外人士來幫助整風，沒有黨外人士提意見，哪里還有反右不反右的問題。看來，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還真是花費了一番心計；正是因為這條暗藏殺機的意見，才可能把那些與中共整風本無任何關係的黨外人士聯繫起來；黨外人士，自然也包括民主黨派。

對於民主黨派，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無論如何都是瞭解的。尤其是對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這樣的頭面人物，對他們的政治態度不會不知道。要他們來幫助中共整風，無疑是自找麻煩。但毛澤東偏要這樣做，以至他不惜和黨內高層產生分歧。毛澤東的動機何在？在反右運動沒有開始之前，這姑且算是謎，但反右運動開始後，毛的動機昭然若揭。對於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的政治理念，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毛澤東心裏當然是清清楚楚的。這與他通過延安整風運動「為黨和國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體制和模式。這就是在個人崇拜的旗號下，意識形態上的嚴格管理和輿論一律，政治體制上的一元化領導和人治」8 的政治理念分明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根本就是水火不容。對黨內，與毛澤東思想不一致他都不能容，何況你黨外？能容你一時，也不過是策略罷了，要修理諸位，不過是個時間問題。況且，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已經打造好了「階級鬥爭」的金棍子，至於何時下手，那就看他如何造勢了。而眼前，反個人崇拜的國際背景，

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強調集體領導，政治決議講國內主要矛盾的轉變，這些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就會無動於衷？那好，我就讓你們來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你們還心有餘悸，那就請你們來幫助黨整風。其實，象章伯鈞、羅隆基這種政治思想的人，要麼他不說，要說，不外就是民主法制、反對一黨專制、外行領導內行那一套。對於讓他們徹底臣服、成為政治花瓶的目標來說，這正是毛澤東希望聽到的。

除此之外，請黨外人士來幫助共產黨整風，則是毛澤東整人慣用的一個狠毒的伎倆，這就是借力打力、挑起群眾鬥群眾。我們現在看到的多是在高層對整風的鳴放，其實更多的則是基層對各級党的領導的鳴放；提得最多的是對基層黨組織的官僚作風、外行領導內行這類的問題。而這些恰好是基層幹部最不願意聽到、最反感的。當毛澤東一說要反右，基層幹部在整風時的那口惡氣當然就撒在右派們的身上。要不然這幾十萬、上百萬的右派是如何被整治下來的？而且被整得那樣的血腥、那樣的惡劣、那樣的悲慘？在這個意義上講，整風同時也是他發動基層幹部參與整治民主黨派的一個手段；這種因提意見在基層形成的對立，使基層幹部自覺地成為了一黨專制的當然打手。這種伎倆，毛澤東在黨內屢試不爽，一直用到文革的各派群眾組織之間。而在反右時，他利用黨外人士幫助党整風、大鳴大放而挑起黨內與黨外人際之間的矛盾，並利用這個矛盾圍剿知識界卻被人們忽視了。

57 年 2 月 27 日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做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講話強調的就是要堅決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他的英明睿智、幽默風趣，溫熱了知識份子因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而灰冷的心，也扭轉了民主黨派當于建國後壽終正寢的看法。費孝通的《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這樣寫到：「近年來，經過了狂風暴雨般的運動，受到了多次社會主義勝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積月累的學習，知識份子原本已起了變化。去年一月，周總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份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而著名翻譯家傅雷在聽了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之後，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 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

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9 這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兩千年的皇權政治，封建文化在他們的內心刻下了一道難以磨滅的痕跡。看了好些年的臉色，思想改造整得一個個灰頭土臉，今天幾句好話，就如天籟之音，一個個已不能自已。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對此回憶說:「父親興奮異常，立即在民盟以個人的身份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民盟印發了講話記錄稿。儲安平看到父親在民盟的傳達稿，也異常興奮，立即建議九三學社中央轉發。」如果說傅雷是一介不懂政治的書生，章伯鈞可是在近代中國政治中摸爬滾打過的政治家。看來他們都不是毛的對手，他們哪里知道，在 56 年 11 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在黨內講了:「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 一邊大講階級鬥爭沒有搞好，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暗藏殺機、磨刀霍霍;一方面大講雙百方針、講人民內部矛盾、請你們幫助整風，一臉的春風和煦;你說他那句話是真的？凡是讀過八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講話的人，沒有人會認為從整風到反右有個突然轉向的問題;讀過 56 年 4 月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1 月《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及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對斯大林問題的一系列講話，諸如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三七開、斯大林這把刀子不能丟等等，更沒有人會提出所謂從整風到反右是陰謀還是「陽謀」和突然轉向這樣的命題。

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用教條主義這根棍子把張聞天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趕將下來，而在他得到整個中國後，本以為有了這個毛澤東思想，自己又在 50 年五一節的口號裏把毛主席萬歲添進去，這尊神應該安然無恙。哪知天有不測風雲，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反個人崇拜引起一片混亂，毛澤東就不得不把維護他在延安整風時爭得的個人崇拜地位提到日程上來。對八大政治報告反對的真實動機，就是要為維護他的神聖地位死死抓住一個武器，這個武器就是那個階級鬥爭。階級鬥爭這根棍子，在中國橫衝直撞二十年，是他歷來克敵制勝的法寶。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哪里還有鬆手的道理？在八大之後不久，更是不顧一切地捏在他的手上，並在八大二次會議再次確認後，成為中國皇權政治最大的家法。

綜上所述，從整風到反右根本沒有突然轉向的問題。要說突然轉向，這個一言堂主從雙百方針到整風的這段時間才是——從輿論一律的專制主義，搖身一變成了虛懷若谷的民主戰士，這才是天大的怪事、包藏禍心的表演而已。整風的大

鳴大放，就是為修理民主黨派製造一個口實。之所以要製造這個口實，是在雙百方針後，民主黨派不是沒有、而是不敢上當，繼續默默地接受中共無視共同綱領，從聯合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向一黨專制的政治現實。從 54 憲法的出籠，到民主黨派被趕出政府，到那個所謂的人民代表大會，以及政協的邊緣化，一切都從側面證實了：早在 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澤東就曾在致斯大林的一個電報中如此描繪他的建國方案：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了。而民主黨派該如何遠離政治權利中心，除了把他們從政府趕到人大，把他們虛擬化——即所謂的政治花瓶，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大計。而整風的大鳴大放，不過是雙百方針的一計不成，再生一計。最終的目的就是製造一個口實，而且這個口實一定是民主黨派自己說出來的。終於，他們都上當了！

這不由得使人想起匈牙利事件。當中共看到在東歐受威脅的不但是蘇聯對衛星國的操縱、而且是共產黨對國家的控制時，其態度就是堅決鎮壓。當時應邀到莫斯科和蘇共協商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在蘇聯領導集團舉棋不定時堅決要求蘇聯出兵。而毛澤東也同意出兵鎮壓，但他要求蘇聯再給匈牙利的所謂「反革命」一點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再一網打盡，而這個時間點正是八大之後不到一個月。匈牙利事件的血跡未幹，他居然能在國內提倡雙百方針，號召幫助中共整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要說轉向，這才是他突然轉向——從鎮壓、改造的暴力專政轉到雙百方針、大鳴大放的開明政治；但，這不過是個表演而已。其實，在這點上，他和處理匈牙利事件的策略一樣：「再給「反革命」一點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再一網打盡。」要不然他在 57 年 5 月 15 號已經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並在黨內高層秘密傳達，5 月 21 日，李維漢還生拉死拽將章伯鈞「請」到統戰部去「幫助黨整風」？明明是誘人進入白虎堂，還倒打一扒說人家是闖入軍機重地，圖謀不軌。這真算得是天下最不講道理的道理了！

在此之前，通過鎮反、土改這些充滿暴力的威懾，再有思想改造、院系調整，中國知識份子不光是在精神上被摧毀，就連安身立命的基礎已不復存在。知識份子這堆毛還能依附哪張皮上呢？當然只能寄人籬下，依附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那張皮上去了。什麼「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統統都成了屁話，活命是真，思想是假；吃飯是真，學問是假。章伯鈞先生做官去了，羅隆基先生做官去了，

成員們也紛紛吃上了官飯。據說，羅隆基先生說起政治來口若懸河，一套一套的，他怎麼就不明白吃人嘴軟的道理呢？吃飯還是自由，這是個問題，57 年反右時，多數成員都用自己的行動回答了。誰管飯誰就是老闆，院系調整後，毛澤東在給他們開飯，當然毛就是真正的老闆。更何況，你自己的章程裏就明明白白的寫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章伯鈞、羅隆基先生們已在不知不覺中由老闆成了掌櫃，這些民主黨派早就在懵懵懂懂中名存實亡了。即便如此，毛澤東還是按照他報告斯大林的建國目標，把這些民主黨派通通修理成名副其實、不敢多說半句的政治花瓶。這大概就是他自稱秦始皇加馬克思的真正嘴臉吧！

對於政權來說，毛澤東說得很明白，打江山坐江山要靠兩杆子，一是槍桿子，二是筆桿子。在建國以後，毛澤東對筆桿子的重視勝過槍桿子，所謂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改造運動，對輿論的控制，其力度可謂前無古人。照毛澤東的說法，這叫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這些都說明了毛澤東政治戰略的轉移，即他一定要把他所謂統一戰線的盟友們，從政治權利中趕得遠遠的。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這是東方專制政治遊戲的鐵律，習慣民主制的西方人豈能明白？院系調整完成了對知識界的包圍，57 年就成了向知識界決戰的最後時刻。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整個知識界必須向他俯首稱臣。而之前的雙百方針、大鳴大放，都不過是暴風雪前的一縷亮光，而我國的知識份子卻把這當成了春的消息。

總之，中國知識界從此被置身於精神的蠶室任其閹割，獨立意義上的知識份子在中國已不復存在。在此之前中國社會已經高度統一在中共的旗幟下，這就是儲安平所說的「黨天下」。整風運動之初，這些民主人士在幫助党整風的引誘下，終於說出了「政治設計院」、「黨天下」這類的言論，這看似犯了毛的大忌，壞了一言堂的規矩，其實這恰好是毛澤東最希望聽到的。有了這個口實，毛澤東就可以說事情正在起變化，工人階級說話了。於是就反右，就講階級鬥爭，一點民主的希望都不能留給你。從此，中國更是中共說了算，而中共則是毛澤東說了算。中國向後退了一大步，而毛澤東卻向一個更大的神壇邁了一大步。這哪里是什麼從整風到反右的突然轉向呢？從雙百方針到整風的大鳴大放，不過是為中國知識界向他俯首稱臣做的一場民主秀，這才是毛澤東的暴力革命史上一次最令人吃驚的突然轉向。而整風到反右反而不是什麼突然轉向，而是他一以貫之的皇權專制的根本立場，是他「黨天下」政治理念的必然結果。因此，反右轉向之說不過是

個假象，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他需要一個口實，於是就邀請諸位一起來製造這個個口實；而整風的大鳴大放，則是觸發一場將知識界炸得粉碎的大爆炸的引信。而這一切，都是他定自己為一尊，容不得人的皇權政治、現代造神運動的必然。至於整風對黨內的意義，他在八屆二中全會就已經達到了，之後所謂和風細雨的整風，對黨內不外是敲敲打打而已，免得他們再生出窺視毛澤東權位的二心來。而民主黨派被誘幫助整風，結果誤入白虎堂，被修理成貨真價實的政治花瓶，成就了毛澤東一黨專制的大業，這才是從整風到反右的「陽謀」的真相。

（本文提到的八屆二中全會和八大二次會議是不同時間召開的兩次會議。八屆二中全會 1956 年 11 月 10～15 日在北京舉行，會議涉及埃及問題、波蘭問題、匈牙利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所採取的政策和應記取的教訓。八大二次會議 1958 年 5 月 5～23 日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同時也否定了八大的政治決議。）

注 釋

1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 329 頁。

2　王明《中共五十年》（東方出版社，2004）第 16 頁。

3　胡喬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73 頁。

4　《打倒劉少奇－——反革命劉少奇的一生》，北京第四人民醫院井岡山戰鬥隊，1967 年 5 月。

5　《內部參考》1956 年 2 月 28 日第 37 號，第 293-295 頁。

6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42 頁。

7　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中共黨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

8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9　《傅雷家書》增補本（三聯書店，1994）第 158 頁。

「引蛇出洞」考　　　　李慎之

孔子：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1957 年，中國的大逆轉

1957 年的反右派運動被稱為中國的大逆轉，但是這個「逆轉」的轉折點到底在哪里呢？從表面上看，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同日，毛主席在共產黨內部發出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使一場開始了才一個多月的「鳴放」頓時夭折。緊接著，討伐右派分子的運動就一步緊似一步地開展，運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到 1956 年底才算基本結束，到 1958 年底才最後封刀。真是「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6 月 8 日可以算是轉折點了，對這一點，史家是不會有異議的。但是，引人尋思的是，毛主席在上半年一而再，再而三，可以說是幾十上百次地號召人家鳴放，鼓勵人家鳴放，而且一再批評黨內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思想不通，為什麼會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呢？這是「簡在帝心、乾綱獨斷」的事情，除他本人以外，也許不會有第二個人能確切地知道這個最高機密。

當代史家對此多有探討，甚至有人說，這是毛主席 4 月 30 日請民主人士幫助党整風以後，沒有料到鳴放如此放肆，忍無可忍，才在 5 月 15 日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通訊，這才是形勢真正的轉折點。然而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樣人物！平生軍事的、政治的，大戰場、小戰場經歷過不知其數。就以我所知的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單是從《內部參考》和《參考消息》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國內外批判共產黨的話就不知有多少，他怎麼能為羅隆基的一句「小知識份子領導大知識份子」就沉不住氣而龍顏大怒呢？毋寧說為大魚遊入網內而高興的可能性還更大些。毛主席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正如陳毅在解放戰爭勝利前夕的詩裏所說「從來能兵觀遠略，於今籌畫賴雄才」，他就是這樣一位罕見的善於籌畫遠略的雄才。

《人民日報》的六・八社論和中共中央的六・八指示都是執行了毛主席將近半年以前的既定決策。這個決策才是從鳴放到反右真正的轉折點，才是中國命運的大轉折的轉折點。

1957 年 1 月的決策才是中國命運的大轉折的轉折點

這裏指的是 1957 年 1 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8 日、27 日兩次講話，共兩萬字，可以說已經十分清楚地闡明了他關於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以及如何對付的理論了。這兩萬字中，可圈可點可摘的東西實在太多。但是至少下面這一段比較最充分地說明了鳴放的意圖以及它與以後反右派鬥爭的關係：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不錯的可以彌補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1

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凡聽到或看到的無不毛骨悚然。連毛主席也第一次發明了一個詞，說這是社會主義的「陰暗面」。但是毛主席是以中國的斯大林自居的人物，要他承認他以為」無比美妙」的社會主義社會中能有這樣的陰暗面無疑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他對赫魯曉夫的報告作了兩點評議：「揭了蓋子，捅了漏子」，當時，新華社副社長陳適五就跟我說：「毛主席此刻的心情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說毛主席「一則以喜」，是指斯大林的錯誤公開了。中共和蘇共歷史上爭論的是非也可以公開了。中共受蘇共的委屈可以一抒憤懣了。現在世界上再也沒有人可以壓在中共頭上指手劃腳、說三道四了。毛主席現在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了。說毛主席「一則以懼」，是指過去歷來被認為完全正確的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竟是如此陰森可怖。中國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是不是也會受到同樣的懷疑與指責呢？可以說，從此以後毛主席心裏就形成了一個「二十大情結」，赫魯曉夫成了「萬惡之源」。這塊心病越往後越清楚。

毛主席對蘇共二十大的最初反應是力主對斯大林要「三七開」，即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並且以此思想指導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寫作。同時，看來也確實在探索一條比蘇聯較為寬鬆的道路。這一點，其實在蘇共二十大開始以前就著手了。毛主席在 1956 年 1 月初召集了三十四個部門的負責人彙報情況研究問題 最後在 4 月 25 日在政治局擴大會

議上發表了題為《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這個講話按當時人們的「覺悟」來看，可以說是充滿了新意，可是並未公開發表。現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發表的是 1975 年 7 月鄧小平為了要糾正文革中左的錯誤而由眾位秀才根據 1965 年底的整理稿再作修正後，請毛主席審閱批示「同意」後的定稿，然而鄧小平隨即下臺，講話竟延至 1976 年 12 月 26 日才得以發表，其時距毛主席逝世已三個多月了。當時的政治氣氛與二十年前可稱截然相反，因此文字也已與當初大不相同。不過仍然可以看得出許多十分寬鬆的提法，例如「你對發展重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這樣的話，現在的正式文本上還保存得有一些。我自己手頭上還有一個聽了第一次傳達的記錄，裏面很有一些在反右派以後絕對聽不到的話，抄不勝抄，就舉幾條作為例子吧：

「也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

「人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要有紀律性，也要有無紀律；要有集體主義，也要有自由主義。」

「中央成立一個體制小組，專門研究如何劃分權力。」

「美國發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學習之處。我們反對它，只反對它的帝國主義。」

「蘇聯只有一個黨，到底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看來還是幾個黨好。……共產黨要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

「對犯錯誤的人要看他是否改，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不要學習斯大林，斯大林對犯錯誤的人不讓改正，這是不好的。」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傳出後不久，就聽到胡喬木講述毛主席心情說：「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條比蘇聯好的路子來。」這話，我們聽了都很感動，看來情況大致也確實如此。

1956 年 9 月 5 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這是七大以後十一年才開的大會。中間經過抗日戰爭的勝利，解放戰爭的勝利，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又碰上了蘇共二十大這樣的懊惱事，全黨與全國人民理所當然地希望聽到毛主席的聲音，但是他卻並沒有做什麼大報告，只致了一個簡短的開幕詞，據說還是田家英起草的，其中的兩句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一直是耐人

尋味而又捉摸不透的。

但是，大致可以肯定，毛主席對八大是不會高興的，當時國際輿論的大背景是反對個人崇拜的。不論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實際思想如何，也都不能不反對個人崇拜，不能不把在七大提出的與馬列主義並列的「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刪除。對此，重視權位的毛主席看來是難以滿意的，卻又處於完全無法反對的狀態。此中滋味，外人無法妄測，但是有一點卻可以看出來，即對於從法理上說是八大最權威、最重要的文件的大會決議，他不甚關心，更不贊成。對於其中最重要的結論：「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句話，竟視而不見，要到一年多以後才提出異議。2

這年十月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波、匈事件。其中波蘭因為党的第一把手奧哈布自動讓步而完成了和平過渡。匈牙利則釀成了武力改變政權的暴亂。據每天列席中央常委會會議的吳冷西回憶，為對付波匈事件而討論如何寫《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時候，毛主席又發展出了赫魯曉夫「丟了兩把刀子」的思想，說得最完全的還是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關於蘇共二十大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莫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的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了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規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奪取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3

毛主席以統帥的身份坐鎮中央抓右派

1957 年 6 月 8 日一聲令下，全國形勢就一變而為到處抓右派。毛主席一改三個月以前的到處遊說，而以統帥的身份坐鎮中央，指揮若定。《人民日報》社論與黨內指示一篇接一篇，要求深挖黨內右派、文藝界的右派、新聞界的右派、司法界的右派……。有人比作「十二道金牌」，有人比作「五日一小批，十日一大批」，

戰鬥一年，挖出了 55 萬右派分子，比毛主席最初估計的四千人多了百倍還不至。許多運動初期的積極分子，到後來竟也一樣成為右派分子。毛主席真是鐵面無私。其實，反右派鬥爭一開始就可以說是大獲全勝。用毛主席自己的話說「基本群眾在我們手裏，軍隊在我們手裏」，幾個知識份子豈止不是對手，而且一上來就只有求饒的份兒，可是毛主席不依不饒，非要他們「繳械投降」不可。可憐他們根本沒有什麼「械」又如何「繳」，只好搜索枯腸，挖自己的反動思想，這就是聶紺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的由來。許多自殺的右派分子就大多是實在熬不過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絕於人民」的。我在自己成為右派以前還聽到傳達說，章伯鈞「叩頭如搗蒜」。其實，章伯鈞的頭腦要比許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儲安平被批鬥以後，還說過「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是要成為歷史人物」。無奈他是處在一個完全封閉的體系之中，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除非自殺，也只好「繳械投降」了。毛主席的江山真是鐵打的江山。反右派鬥爭開始不到兩個月，毛主席就給它作了結論：

「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 1956 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和一個思想戰線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共產黨在民主黨派、知識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當然不可能有領導權，因為他是敵人……第一個決定性的戰鬥，在過去幾個月，主要是在最近兩個月內我們已經勝利了。但還需要幾個月深入挖掘的時間，取得全勝，決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這一仗不打勝，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4

甕中捉鱉，雖勝不武！但是毛主席不管這一套，他的自我感覺又回復到兩年以前了。党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在反右運動中不知是由於誰的發明創造，又加上了「絕對」兩個字。「絕對領導」的說法從此風行了二十多年。他現在又是無可爭議的、萬眾膜拜的偉大領袖了。年初他宣佈「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結束」，到年中他就發動了一場規模更大、程度更激烈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一切都按他的神機妙算進行。他的一個信念是：階級鬥爭的勝利還可以大大促進人民戰天鬥地的積極性，後來的「抓革命，促生產」就是從此而來的。他現在可以來對付一年半以前針對他本人的、反「冒進」的傾向了。1958 年元旦剛過

就發出通知，1 月 11 日就開始在南寧開會，著重批判 1956 年 6 月 20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毛主席說它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專門反『左』，而且尖銳地針對我的。」5

有了反右派鬥爭的勝利打底，南寧會議當然是勢如破竹。毛主席批評「這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被批評的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I 主要是周恩來）連檢討都不知道該怎麼做。真是好一派「一鞭在手矜天下，萬眾歸心吻地皮」的氣象。

反右派鬥爭的勝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壯志，直接孕育了大躍進。以後就是農業大放衛星，工業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紅遍全國。大躍進的失敗給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懼，不但直接導致了反右傾的鬥爭，而且促使他到處搜索「躺在身邊的赫魯曉夫」，終於在 1966 年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過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的下一章了。

從反右派開始，開始了二十年的極左路線

總之，從 1957 年的反右派開始，中國開始了二十年的極左路線。一直到毛主席在 1976 年逝世才大體結束。

大躍進的出現是同反右派鬥爭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前所未有的。毛主席到底給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寶庫增加了什麼東西呢？恐怕還是只有「人民內部矛盾」這一個新名詞，所以林彪才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稱作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

被毛主席認為「一萬年都會有」的「人民內部矛盾」曾經牽動過許多人的心（其中不少人後來「墮落」為右派分子)，甚至許多外國人的心。……所謂「兩黨制」、「兩院制」、「文官制度」、「同人辦報」、「司法獨立」、「無罪推定論」……這些「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實際上都是在對毛主席無限信任的前提下放出來的。中國人民中最有頭腦、最有理想的一部分，也就是響應毛主席號召的「志士仁人」，內心想的是：革命政權可以改變為法治政權了，中國從此可以走上民主化、現代化的長治久安的道路了。其中有的人甚至天真到希望毛主席可以利用他的威望與經驗帶領赫魯曉夫、鐵托、哥莫爾卡……走上一條正常化、民主化的道

路，使馬克思的理想進一步實現。但是這些人實在是大錯而特錯了。毛主席在 1957 年 7 月 1 日給《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說的明明白白：

「本報及一切黨報，在 5 月 8 日至 6 月 7 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螭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得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是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丑類。」6

反右鬥爭是怎麼回事，已載入歷史。但是「人民內部矛盾」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個「第三個里程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底增加了哪些新東西呢？「人民內部矛盾」並沒有擺脫階級鬥爭，毋寧說是強化了階級鬥爭。1959 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以後，人們的普遍感慨是「過了一關又一關，關外還是山連山。」唯一有點新意的是，通過提出「人民內部矛盾」，毛主席發明了不以人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劃階級，而以思想劃階級的理論。到後來實際上以附和還是不附和毛澤東思想作劃階級的標準，前者就是無產階級，後者就是資產階級。……這一點可以算是毛主席區別于「斯大林的教條主義」的地方。

階級鬥爭。原來，自從蘇聯在三十年代在城市消滅資本主義，在農村實現集體化以後，社會上就只有工人階級、集體農莊莊員、勞動知識份子三個社會集團，在理論上已不能再說還有階級鬥爭了。但是對斯大林的反對還是層出不窮（作為中國人，實在無法判斷是真的「反對」還是只是斯大林自以為的「反對」）。一旦定罪，往往處於極刑。毛主席則別立新意，認為知識份子在世界觀上是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是對立的，因此可以成為敵對分子。當然批判、鬥爭都是必要的，但是他一再聲明這些人「不是特務」，因此「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些就是我們經歷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實際的人唯一能捉摸出來的特點了。然而這一點，照毛主席在《論十大關係》裏說，起源于延安時代，也算不得有多麼新鮮。基於這樣的理論，右派分子雖然是人民的敵人，戴上帽子即成為不可接觸的賤民（或者如毛主席所說的「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但是在原則上倒是沒有被槍斃的。這點真是要感謝毛主席的如天之仁。……

1956 年，毛主席也曾跟著赫魯曉夫批評過斯大林「在階級鬥爭消滅以後仍然強調階級鬥爭尖銳化」的錯誤（《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但是看來他後

來也沒有逃脫斯大林立下的榜樣。至於斯大林與毛主席關於鬥爭的理論與實踐對於兩國實際的破壞性影響到底孰大孰小，那只好由後人去細細比較研究了。應當說，在一個民主和法制國家裏，司法獨立的國家裏，本來就用不著什麼「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樣的理論。它純粹是多此一舉，無益而有害。

說反右派運動是「中國的大逆轉」是極有道理的，但是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而不是他本人的觀點，恰恰相反，在他看來，他晚年的理論與實踐毋寧是他畢生革命理論與實踐的直線發展。

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報告使聽到的人毛骨悚然。人們一方面慶幸中國在毛主席領導下還沒發生這樣的事情；一方面還慶幸蘇共給中共以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敲起了警鐘，我們可以避免這樣的禍害了。但是，反右派運動改變了這一切。從 1957 年的 6 月 8 日開始，在「人民內部矛盾」的名義下，中國的階級鬥爭綿延二十年不絕，一批又一批的人，越來越多的人，直到党的副主席、共和國的主席劉少奇都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的身份被迫害至死，毛主席聲言可以避免的「全國性的、長期的、嚴重的錯誤」竟成為事實。到他離開人世，亦即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受文革直接間接傷害的人竟上了「億」。

毛澤東製造無數人間悲劇，究其原因只是對一個「權」字的迷戀

這個「大逆轉」已成為歷史的事實，是 1978 年以來黨中央和全國人民共同承認的事實。也許，毛主席發動的反右派運動還推遲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向前發展，它打擊了赫魯曉夫開始的對斯大林的批判，也阻礙甚至扭轉了他開始的改革。毛主席還以 1958 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及他超英趕美的豪言壯語刺激了蘇共二十一大提出要建設共產主義的口號，結果當然不可能成功，又反而引起了毛主席的訕笑，《九評》的最後一篇就是批評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的。

但是，在毛主席心目中，他是不會承認有這樣的逆轉的。反右以後，他的心氣越來越高，他的平生大願逐步實現，而且處於大發展，大躍進之中。從三面紅旗到三個世界，從不斷革命到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也許只有到生命終了的時候，他老人家才感覺到有點不大對勁，這一方面表現在他對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的估計越來越長上（從幾十年到幾百年）；另一方面表現在他的最

後講話上:「我平生幹了兩件事……一件事贊成的不少,反對的不多;一件事贊成的不多,反對的不少。」只不知道他老人家有沒有意識到造成這樣變化的關鍵就在他 1957 年的「引蛇出洞」上。

回頭來看,毛主席的悲劇在許多前現代國家其實並不少見。一種沒有任何制約的權力在完全封閉的環境中無限膨脹,只有「死而後已」。這實在是「理出固然,勢所必至」。即使在當今的世界上,這樣的國家也還有,只是沒有中國、蘇聯這樣的大國,因此造成的災禍至少在規模上總還比不上毛主席而已。據胡喬木說,毛主席曾「認為自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7 毛主席晚年的命運也確實最近似於斯大林,他們都曾領導過億萬人民,受到過億萬人民的愛戴,他們統治下都不乏聰明智慧的人材而且後者都曾把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都曾對他們「進盡忠言」。但是他們自認為、甚至被認為天才蓋世,然而卻甚至不能理解比較自由的環境中一個普通公民的常識,而一概打擊之為毒草,為牛鬼蛇神,為人民公敵,製造了無數的人間悲劇。究其原因,拋開他自己好象洞若觀火的空話大話,其實只是對一個「權」字迷戀上。至少在延安整風確立了毛主席一貫正確地位以後,尤其在 1945 年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以後,他的權威和威權就是絕對不容懷疑、不容挑戰的了。有不少事實足以證明他對權力的敏感:1948 年,吳晗到平山請毛主席對他寫的《朱元璋傳》提意見,毛主席就把中國知識份子歷來公認的朱元璋殘酷暴虐的一面說成是為鞏固其權力之所必需。1957 年,毛主席在自己的臥室裏批評《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沒有積極組織鳴放為「死人辦報」。同時又說「我看你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

這些都證明了毛主席確實是像林彪所說的念念不忘一個「權」字,他自己知道這個權得來不易,因此抓住了就決不放手。如果也有鬆懈的時候,那是有意的,為的是好更牢牢地抓回來。其結果,不但害了國家、社會、人民,也害了自己,當然在他這樣一個唯物主義者來說,那已經是「身後是非誰管得」了。

1956 年蘇共二十大剛結束,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傳入中國以後不久,後來被定為「右派報紙」的上海《文匯報》就急忙組織人翻譯了久居蘇聯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寫的《斯大林時代》,在報上連載發表,一時反應強烈。據吳冷西傳達,它也引起了「中央」的興趣,「大家」特別注意她引用的英國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地使人腐化。」遺憾的是,他老人家自己

最終也沒能逃脫阿克頓的論斷。

在阿克頓的故鄉與許多國家中，專制統治的毒害經過反復的反思已經建立起一套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了。無奈我們中國離這個標準還太遠，至於毛主席本人雖然總是說「權力是人民的」，但是實際上他就是「人民」。至於別的想法，與其說他不可能懂，還不如說他不願意懂。連劉邦都能聽得進去的「天下可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這樣披肝瀝膽的忠言，他都視之為右派的「猖狂進攻」。他的理論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刀槍不入的體系。譬如「人民內部矛盾」本來就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理論，唯一可以講得通的就是如有些右派分子以為的那樣，它是由革命政權轉變為民主政權的標誌。然而這卻正好是毛主席反對的。要真正理解和解決毛主席的問題，必須跳出他那自我迴圈的理論，但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任務了。

這個歷史的逆轉一直逆轉了二十多年。到八十年代中國又開始要走現代化的道路的時候，莫說社會風氣的衰敗和人民道德水平的下降都已不是1957年可比，尤其可惜的是：我們永遠失去了中國上百年來用血汗和淚水培育起來的一批明達之士。這個損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彌補上。

文章寫到這裏，應該可以結束了，但是遺憾的是，「引蛇出洞」這四個字，我竟至今還沒有找到出處。我的印象是：反右開始以後不久這個說法就已流行了，而且好象並沒有什麼忌諱。有人說這話是毛主席自己說的，所以大家才敢說。事實上省委書記一級人物同類說法倒不難找到，不過這就算不得「第一手材料」了。看來只有等將來檔案解密以後，未來的史家再去努力，義山詩不云乎：「武皇內傳分明在，莫謂人間總不知」。

（節引自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注 釋

1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355頁。

2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475頁。

3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321頁。

4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61－462頁。

5 吳冷西《憶毛主席》第49頁。

6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36 頁。

7　《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 147 頁。

論「陽謀」　　　丁抒

反右是「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鬥爭」？

「中國新聞社」是什麼機構？據說它和「新華通訊社」一樣，也是中共的喉舌。中國新聞社編的《共和國五十年大事記》是最新版本的中共對五十年來重大事件的評述。其中關于 1957 年的「反右運動」，僅有以下簡單的文字：

1957 年 6 月 8 日，毛澤東同志爲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爲什麼？》。此後，一場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鬥爭在全國範圍內展開。1958 年夏末，反右派鬥爭結束。1959～1964，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先後五批摘掉了大部份右派分子的帽子。1

這裡，一場舉世空前的大規模政治迫害運動，被輕描淡寫地表述爲一場正義的「反擊……的鬥爭」。而且，右派「罪人」似乎很快就獲得赦免，一風吹了。

國內學界也有人認爲：1957 年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是爲了保持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可惜「一個正確的命題，最終却帶來了一個不幸的結果。」2 而這個不幸結果是鳴放者過激言論造成的。別有用心的傢伙使得毛澤東犯了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片面地强調批評共產黨所犯的錯誤，……五月中旬以後，中央原定的整風方針開始動搖，逐漸地轉向了反右方針，此後的座談會已經背離了最初的旨意，成爲引蛇出洞的一個重要手段。」3 他們說：在鳴放「過程中，有極少數人確實乘機活動，散布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領導的言論。于是，中共中央決定從開始進行反右派的鬥爭。從此，整風運動受到很大衝擊難以進行下去。」4

其實這不過是對中共中央 1981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詮釋。該決議對反右運動作的結論是：「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

共産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决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5 這些學者不過是在爲中共《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作注而已。他們認爲，所謂「陽謀」論，因爲與中共中央《决議》「根本對立」，所以是對毛澤東反右運動的「露骨歪曲」。6

毛澤東從未實行「雙百方針」

1956 年四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伯達首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同日，毛澤東對此表示贊同，在總結會議時說：「文藝上百花齊放，科學上百家爭鳴，應作爲我們的方針。」7 這條被陳伯達濃縮爲「雙百方針」的口號由宣傳部長陸定一于 5 月 26 日在中南海鄭重其事地向科學界、理論界、文藝界人士宣布。陸定一還宣布說中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8

但是，這「雙百方針」從未真正實行過。毛澤東的確說過「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9 但是，對于執政七年間，他掀起的一系列批判運動，從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對梁漱溟「反動思想」的批判，到對建築學家粱思成、歷史學家尚鉞的批判等等，都是粗暴的干涉，他從未承認干涉錯了，從未表示要糾正。

就在提出「雙百」方針之後，毛澤東幷沒有改弦更張。對各種學術思想的干涉沒停止過一天，其粗暴未減一分。這裏有兩個例子。

1956 年 11 月，上海文化界在報刊討論「爲甚麽好的國産片這樣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電影工作者最清楚。據《邊寨烽火》、《蘆笙戀歌》等電影的劇本作者、軍隊作家彭荊風回憶，當時問題的癥結在于領導幹部審查作品：「寫電影劇本要層層送審，我們的劇本在雲南軍內外從下到上，要經過十餘道關卡，那些來自大小官員的意見，有的如『聖旨』全是命令式的，不改就將犯罪；有的如『天書』般玄妙，苦思良久也難解其中奧妙……」10

因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托中宣部分管電影工作的鍾惦棐寫一篇文章參加討論，鍾寫了一篇《電影的鑼鼓》，以《文藝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他寫道：電影事業

管理局掌管一切，連劇本的稿費、導演的酬金等，通通要呈請它批准。演員、導演「只能唯唯聽命于行政負責人員的指揮，尚未進入創作，已經畏首畏尾，如何談得到電影藝術的創造？……藝術創作必須保證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管的人越多，對電影的成長阻礙也越大」。11

可是，毛澤東却認爲這是他們要脫離党的領導的證據，實屬離經叛道。在三月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說「鍾惦棐的文章也是毒草，是機會主義之花。」12 三個月後毛發動反右，鍾惦斐和彭荊風都成了右派。

詩人流沙河是第二個例子。1957 年一月號的四川地方雜志《星星》詩刊上，刊登了流沙河的一組散文詩《草木篇》，結果很快就招來有組織的圍攻。批判者一口咬定詩中「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的藤是指共產黨員和積極份子，所以是「對人類歷史上最民主最先進制度的誣衊」；詩中托物咏懷，說梅花「把自己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指爲有「變天思想」、盼望國民黨回來復辟。四川省文聯的黨委領導甚至說：「對這種反動腐朽的東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13 對這種粗暴的批判，毛澤東大加支持，說：「《星星》的〈草木篇〉是應該批評的，如不批評真是讓毒草長起來了。」14 于是流沙河成了全國批判圍剿的「反動作家」。數月後，毛澤東爲流沙河定性：「大樹是有根的。流沙河就是大地主的兒子。這是新式肅反。」15《星星》詩刊編輯部連他在內四個人，統統被扣上「右派」帽子，分頭遣送農村勞動改造。

政治領域也是一樣。四月間在杭州發動鳴放時，浙江省委曾問毛澤東：「最高國策、最高領袖可以不可以批評。」毛回答說：「不能答不能批評」，但接著就舉例說：「（農業）合作化能不能批評？要批評可以登一篇，然後來一個反駁。一駁就臭了。他反對合作化就有證據，等于照了相。這不是誘敵深入，而是他自己鑽進來的。」16

最高領袖制定的最高國策不能批評，誰批評誰就是反黨、反革命。凡是在鳴放中對農業合作化發表了不同意見的，通通是右派分子。這就是毛澤東的「百家爭鳴」！

反右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曾說：「反右派以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形式上沒有被廢除，但實際上停止執行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百家爭鳴實察上是兩家，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17 反右前和反右後的

幾十年裏，毛澤東都在堅持「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却獨獨在 1957 年前後的一年左右的時間內熱心推銷「百家爭鳴」，玄機何在？

五七年的「鳴放」與「雙百」方針不相干

1957 年五月初至六月初遍及全國的「鳴放」，與文藝、學術毫不相干。這是因爲從 1957 年初開始，毛澤東已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的「鳴」、「放」二字抽出，謂之「鳴放」，并引向政治，將「百家爭鳴」的「鳴」演變成「不平則鳴」的「鳴」，將「百花齊放」的「放」換成了「放言」論政的「放」：

「有選舉權的，憲法就規定他有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應該再放。」18——這裏的「言論自由」顯然與科學、藝術無關，他鼓動「再放」的，顯然不是文藝學術上的「花」，而是政治上的「鳴放」。

「若采取壓服的辦法，不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就會使我們的民族不活潑、簡單化、不講理；……至于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評，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老幹部可不可以批評，我看沒一樣不可以批評的。」19——這也與文藝、學術無涉。

毛澤東一提到「百家爭鳴」就與政治、與批評共產黨聯繫起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的方針，是應該堅持下去，應該『放』，不是『收』。」「讓人家說話的時候，會說出一些不好聽的話來。百花齊放，會放出一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麼罷工、罷課、請願、游行示威……」20「不但在純粹的科學藝術的問題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問題上……也應該讓他們自由說話。」21

所以，當黨外人士、《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試探地問他「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說，是徵求高價的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時，毛直截了當地回答：「你的意見很對、很好」22

那時，毛只要提及「雙百」，指的必定是「鳴放」。那「鳴放」只涉政治，與文藝、學術毫不相干，僅限于黨外人士對中共的「鳴放」，中共不對民主黨派「鳴放」。「花」也罷，「草」也罷，毛澤東似乎誠心誠意地「徵求高價的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

毛澤東的引導終于成功。人們忘記了「雙百」，只記得「鳴放」二字了。共產黨的「開門整風」變成了「大鳴大放」，以致形成了從五月中旬開始，爲時僅不到

一個月的短暫的對共產黨「鳴鼓而攻之」、「大放厥詞」的「鳴放」局面。

可是，半年後，毛澤東却完全不認帳了。他說：

「鳴放是我們發明的。……我們去年五月在這裹講百花齊放……是限于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上是百家爭鳴，就不涉及政治。後頭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甚麼問題都叫鳴放，叫做鳴放時期，而且要大鳴大放……」23「我們說鳴放，右派說大鳴大放，我們說鳴放是指學術上的，他們要用于政治。」24

他不僅將「涉及政治」强加于「右派」頭上，而且後來將上文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删去「鳴放是我們發明的」這句關鍵的話25，乾脆就否認了「鳴放」是他一手策動的結果。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從來就是打擊目標

在「鳴放運動」中被邀請批評共產黨、請其幫助共產黨克服「三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主要是知識分子、民主黨派。說是「開門整風」，工廠工人、農村農民却不受邀請。從「幫助黨整風」而言就說不通。爲什麼這樣安排？爲什麼毛澤東對工人、農民的批評不感興趣？

毛澤東認爲：「國內有四個階級，兩個剝削階級，兩個勞動階級。第一個剝削階級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殘餘……第二個剝削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26 那「第二個剝削階級」，恰恰正是毛澤東邀請鳴放的對象。

在 1957 年一月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他說：「出這麼一點錢買了這麼一個階級（包括它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共約八百萬人）。他們是知識比較高的階級，要把它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辦法一是出錢贖買，二是出位子安排。共產黨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27〖該講話收進《毛澤東選集》時，删去了「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28〗

四月間，他又說：「民主黨派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都要給他事做。……今天他們爬在我們身上吃飯，端我們的飯碗，就要做我們的事。這些人罵你，你把他安（置）好了就好了。」29

當然，毛澤東也有「禮賢下士」的時候。爲解除學者們的疑慮，他于四月十一日將北京大學馮友蘭等十來名教授請到中南海他的住處，說：「我感覺你們這些

當教授的被搞苦了。……我們現在要整風。我們黨對整教條主義是有經驗的，你們有甚麼意見儘管說出來，不會對你們怎麼樣的。」30 他還對馮友蘭說：「好好地爭鳴吧，百家爭鳴，你就是一家嘛。」31 馮友蘭對毛澤東在上述黨內會議上講過的話一無所知，不知道被毛澤東邀請鳴放的對象正是他要剝奪其政治資本的對象，批評某些共產黨員「處處以救世者自居，自命爲萬能的造物者」32，以致被北京大學黨委定成了「內控右派」。

黨內多數不贊成「鳴放」式整風

同發動文化革命前夕暗中策劃的做法雖不完全一樣，毛澤東將「不涉及政治」的「雙百」方針移植到政治層面，不厭其煩地發動黨外人士對共產黨「鳴放」，也是异常現象。「鳴放」式整風，是毛澤東的發明。在很大程度上，毛是在唱獨角戲。中共大多數幹部只是消極應付。他們消極，不是因爲沉溺在「三害」中不自知，而是看出了此次整風「情況不正常」、對毛的用意有所戒備。

1956 年二月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在各共產黨國家造成反個人崇拜的大氣候。感覺受威脅的毛澤東力圖鞏固「毛主席萬歲」的地位，竭力抵抗對斯大林的批判浪潮。1956 年四月間，他先後與蘇共主席團成員米高揚、蘇聯駐華大使談話時都說：斯大林「功大于過」，對斯大林「要具體分析」，「要有全面估價」。十月二十三日，他又接見蘇聯大使，明確表示對蘇共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有不同意見。還有若干問題，我們是不同意的」。十一月三十日，他再次接見蘇聯駐華大使，說：「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綫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33 十二月，他在人民日報社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稿中特別加上了一段爲「斯大林主義」辯護的文字：「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34

但是，對毛澤東個人專斷有所警惕的劉少奇、鄧小平等却抓住蘇聯老大哥批判斯大林的時機，在九月的中共「八大」上，借反個人崇拜的東風，强調集體領導，以「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35。在新黨章中删去了「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中的「毛澤東思想」。在「黨員義務」那一款中的「學習毛澤東思想」也被删。

那個「毛澤東思想」，顯然就是毛澤東的思想。1953 年，毛澤東曾作過一個

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爲『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36 可是後來他又覺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使人以爲二者是不同的東西，于是在 1954 年批發文件通知全黨：毛澤東思想的內容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37 所以要改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38 可見毛幷不認爲「毛澤東思想」有別人的份，不是後來鄧小平所解釋的中共領導人大家（包括鄧小平）的思想。

修改黨章，毛澤東不好啓齒反對。他不得不將這苦果吞下，違心地表態說日後適當時不再擔任党的主席。劉、鄧信以爲真，在新黨章里加了一條：「中央委員會認爲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39

毛對「八大」的不滿馬上就流露了出來。在十二月的一次會議上，他裝出半打趣的樣子說：「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40 不過，由于大家都認爲請毛擔任名譽主席是遙遠的事，對此未作具體安排，時間一長，此事似乎被遺忘了。

黨內高級同僚對毛搞「開門整風」、策動黨外人士批評共産黨的真實用意可能不十分明白。消極應付的多，積極配合的少。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對毛澤東策動鳴放的异常做法却有所戒備。按副總編輯胡績偉的說法：

「（鄧拓）比我們更有遠見，更了解這位偉大領袖。他不僅看出毛主席這番話很快會變，而且還很可能潛伏著一場『引蛇出洞』的災難。因而，他當時用自己的腦子進行了一些獨立思考。」「他的政治經驗比我們豐富，政治警覺性也高。鄧拓可以稱得上是對「引蛇出洞」的「陰謀」有預見的人物之一。」41

由于中共中央對人民日報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毛澤東的講話未經公開發表不得引用，人民日報沒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鄧拓有理由對毛澤東的講話不作宣傳，幷警告部屬「不要鑼鼓一響就出來」。鄧拓的上級、代表毛澤東領導人民日報的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也支持鄧拓按中央的規定辦，對黨內會議和毛澤東的內部講話不作宣傳。

對此毛澤東甚爲憤怒，1957 年四月十日，他將總編輯鄧拓、副總編胡績偉等人召到自己的臥室裏訓話。他躺在床上，「像訓斥孫子似地」（胡績偉語）訓斥他們：「共産黨的報紙沒有聲音。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他又罵鄧拓「占

著茅坑不拉屎」,「我看你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同時，還斥責幾位副總編輯「不敢起來革鄧拓的命。」42

從此，人民日報編輯李莊向鄧拓請示，是否刊登記者采訪的人民鳴放、批評共產黨的文章時，鄧說:「登，登，一字不改都登。把記者都派出去，這一段就寫這種稿子。」從來沒見過人民日報發表「反動言論」的李莊「預感到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43

四月上海局杭州會議上，上海市委書記石西民曾向毛彙報，說:「有人說這是釣大魚，是誘敵深入。」毛回答:「天下（哪）有這回事，不是誘敵深入。」44 就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責罵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是什麼人的報紙？要整一整。」「開了許多會議，不發消息。人民日報還是國民日報。」對黨內多數不熱心鼓動鳴放的局面，他十分不滿:「一定要放。怕放是道理沒有講通，或沒有說服。」「一家獨鳴了多少年，讓他亂一下子看看。」「我不是鼓勵人民鬧事，搞鬧事促進會。」「陳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黨內同志，我就沒有群衆基礎。」45

二三月間毛澤東曾幾次批評陳其通等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對推行「雙百」方針表示憂慮、疑惑的文章。而在杭州會議上，陳其通幷不在場。他此時說的「陳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黨內同志」明顯是氣話，而且是針對中央高層多數同志的。

許多黨內同志雖不籠統反對整風，對毛鼓動「鳴放」式整風的做法卻有保留。毛澤東四月間在杭州會議上曾說:「黨內高級幹部對『放』思想不同的占百分之九十。」46 這話傳到下面變了樣，成了「黨中央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同意鳴放。」

五月二十七日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主持鳴放座談會，物理教員何玉騏在會上說:「黨中央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同意放，你就是其中一個。」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報送毛澤東的《高等學校整風情況簡報》也說:「北京大學有個學生寫了篇大字報，說中共黨內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贊成鳴放。」此時反右即將開始，毛便批示說:「完全造謠」47。不過，直到 1958 年初，他仍然對去年策動「鳴放」時黨內不緊跟一事耿耿于懷、怒氣未消。冷嘲熱諷:「一月省委書記會議，三月宣傳會議，還有頤年堂會議，都說了人民內部矛盾。不必憂慮，是可以解決的。可是打不動×××同志的心。我說十個幹部一個擁護我就好了。他也不說反對，就是不執行。地委副書記以上一萬人，有一千擁護我就好了。北京的學校哪個（鳴放）放得開？」48

毛澤東說一萬人裏九千個不擁護他或許是誇大，但若說一萬人裏九千個不贊成他策動黨外「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的做法，却大致不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贊成鳴放」就離事實不遠，談何「完全造謠」！

毛澤東發動鳴放運動的深層動機

1956 年 10 月波蘭、匈牙利的人民起義告訴毛澤東，知識份子鼓動工農造反，推翻一個昨日還貌似强大的共産黨政權轉眼之間被推翻是可能的。要不是中共施加壓力，催迫猶豫不决的赫魯曉夫出兵鎮壓匈牙利人民，處死納吉，匈牙利共産黨政權已不復存在。他總結的教訓是殺人殺得不够多。11 月 15 日中共召開八届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49

從 1956 年 10 月匈牙利事件到 1957 年 1 月，占據毛的頭腦的主要是政權鞏固與否的問題。1958 年毛澤東說的一段話可以爲他的思想作一注解：「民族資産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大多數是中間分子，他們是剝削者……是個動搖的階級。……去年右派進攻，如果我們不堅决打下去，中國出了納吉，右派登臺，這些人一股風都上來了。打倒共産黨，他們都幹……」50

毛澤東在 1957 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和四月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對此講得很明白：

「去年下半年以來，有一股右傾機會主義的風，在地面之上雲層之下流動，黨內外有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51

「準備出大事，我們從延安來，準備再回延安。過去沒有看過梅蘭芳的戲，現在看了七年，第八年準備回延安。無非是打原子彈，打世界大戰，犯錯誤，出匈牙利事件。」52

「小資産階級專政，把你搞下來他專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開群衆大會、演講會、辯論會，展開爭論，看誰勝利。小會他神氣大，大會他沒辦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辦。有屁讓它放，不放對我不利，放出來讓大家鑒別香臭。社會發生分化，我們爭取大家，大家認爲臭，他就被孤立了。」53

「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後，我們黨內大多數人是正常的、穩定的，少數人有

波動。下雨之前總會有螞蟻出動。中國也有少數螞蟻想出洞活動。現在赫魯曉夫改變了〖丁注：稱贊赫氏由批判斯大林到鎮壓匈牙利人民暴動的改變〗，螞蟻也縮回去了。」54

「百家爭鳴有好處，讓那些牛頭蛇身鬼子王八都出來。」55

「批評不過兩種，對的，補我們的短處，錯的，越錯越好，上臺一講就揭露了。梁漱溟、彭一湖、黃炎培也叫過，以後又檢討。章乃器批評我們統戰部，放手讓他們批評，一批評反倒把他們孤立了。」56

「不要怕鬧，鬧的越大越長越好。……全國大鬧不可能。哪里有膿包，有細菌，總是要爆發的。大省五萬，中省三萬，小省一萬。準備鬧事，年終結賬。」57

「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的。……我們要放，要硬著頭皮，讓他們攻！攻一年。誰讓我們有教條主義，攻掉就好，攻得過火，就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共產黨要讓罵一下子，讓他們罵幾個月。……有人說放長綫釣大魚，也有一些道理。」「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評，不對（的批評）可以不聽，對的要接受。反對肅反、反對合作化的文章，可以駁一駁。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58

那「膿包」、「細菌」，就是後來的「右派分子」。「五萬」、「三萬」、「一萬」是他當時設想的各省的右派數目，後來各省所抓的右派數果然與此不相上下。不過不是「年終結賬」，而是六月就結賬了。甚至連誰是右派，毛澤東也已經有了點譜。一九五五年肅反時，文學講習所所長丁玲和《文藝報》副主編陳企霞無端被肅，成「丁陳反黨集團」。蕭軍、丁玲就是他心裏已認定的右派。在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上，他說「對于蕭軍、丁玲之類的人，殺、關、管都不好，要抓他許多小辮子，在社會上把他搞臭。」59 反右時他們的確都成了舉國聲討的「大右派」。

毛澤東要的是給共產黨當表决機器的民主花瓶，要的是服從命令聽指揮、該舉手時舉手的附庸，「不舉手就沒有飯吃。」既然「要把它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就不可能真心徵求他們的批評，更不可能懇請他們幫助共產黨跳出興而覆亡的「周期率」了。

不過，毛澤東是個好演員。三月二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他對黨外人士談吐溫和地說：

「批評對了當然很好，批評不對當然沒有事，言者無罪嘛！」

「人民是有批評的權利的。」

「憲法是應該實行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言論出版。」

「蔣介石他講了很多東西……我就贊成出全集。」60

他將全國文化界、知識界知名人士請到北京，聽取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的錄音，聽他說：

「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還很嚴重，希望黨外朋友幫助。」

「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和風細雨。」61

人們解除了戒心。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派車去劇作家吳祖光家出席鳴放座談會時，妻子新鳳霞怕他因言賈禍而阻攔，吳告訴妻子：「這回是共產黨要大家提意見的，為了改進工作，又是毛主席讓提的。」上海電影女演員吳茵到北京聆聽過毛澤東的報告。她深信毛要傾聽人民聲音的誠意，對還打算看看風向的伙伴說：「怕什麼？什麼都可以說，什麼都可以寫，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62

吳祖光、吳茵哪裡知道，不到一個月毛澤東就跟他們「結賬」了。兩人都成了右派。由於毛澤東指示，「搞個勞動教養條例」，「除了少數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63]知名度尚不夠高的吳茵便被送到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吳祖光則去了北大荒。

五月間全黨接受「引蛇出洞」術

從四月下旬開始，各種鳴放座談會在全國各地、各部門、各級機關舉行。但在五月十五日，絕大多數人還沒有鳴放時，毛就已經寫下給全黨高級幹部看的《事情正在起變化》。文中，他解釋道：「大量的反動的烏烟瘴氣的言論爲什麽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爲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除掉它、滅掉它。」他的策略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其「誘」的對象就是右派知識份子。「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64

當時的副總理薄一波稱《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爲「反右派的信號」65。當

時的中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也說:「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决心。」66

第二天，毛澤東又起草了一個名爲《中央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的黨內文件，要各級幹部繼續鼓勵人民鳴放。毛指示全黨：對「帶有反共情緒的人」「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67 據薄一波回憶，「從五月中旬到六月初，中央接連發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次開會，制定反擊右派鬥爭的策略；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讓右派進一步暴露……『愈囂張愈好』。」68 當然，這些「絕密文件」連「級別較低的黨員幹部都不知道」（薄一波語），一般老百姓當然更不知底細了。

應當指出，這時鳴放其實還剛剛開始，「反共分子」尚未來得及「向党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這裏有張時間表：

5 月 17 日：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在北京航空學院出現

5 月 19 日：北京大學學生貼出首份大字報

5 月 21 日：章伯鈞提出「政治設計院」的設想

5 月 22 日：龍雲發表「反蘇謬論」

5 月 22 日：羅隆基提議設立「平反委員會」

5 月 23 日：林希翎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

5 月 24 日：清華大學學生貼出第一張大字報，要求開闢民主墻

5 月 28 日：華東師範大學出現第一張大字報《向北大同學學習》

5 月 30 日：葛佩琦鳴放發言，「殺共産黨人」字樣見報

6 月 1 日： 儲安平抨擊中共「黨天下」

這些中共事後用以證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惡活動」，全是在毛澤東寫下「反右派的信號」後，在不知中共幕後部署的情况下，爲中共反覆邀請而「放」出來的。

「反右派的信號」至遲是在 5 月 18 日發出的。那天晚上，主持《文藝學習》雜志編務的黃秋耘到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家中聊天。邵正鼓勵他「大膽地放」時，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來了電話。聽了電話，邵「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沈」，放下話筒對黃說道:「唔，轉了！」幷囑咐道:「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69

周揚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意識形態的主管，邵荃麟則是中國作家

協會的黨組書記。我們雖沒有毛給周揚下達指令的史料，却完全可以推斷：若無從毛處或其他最高領導人的指示或暗示，周揚絕無斗膽破壞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向其下屬邵荃麟布置。

戴晴認爲：「五月上中旬，相當一批親隨已經窺知了毛澤東的意圖。黨內文章一下達，高級幹部們心裏都有了數。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于是東施效顰，也殘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級知識分子』來。」學界卻有人認爲中共高層不知道毛澤東悶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因爲毛還沒有將〈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他們：「〈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在五月中旬幷沒有下達黨內。……直至 6 月 11 日，毛澤東才在這篇文章的清樣稿上寫下了印發中央一級和省市一級負責同志的批語。」70 至于〈事情正在起變化〉中所說的「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71 他輕描淡寫地說，毛澤東幷未改變整風决策，此時的毛澤東不過「有了反擊右派的思想準備」72 而已！因此戴晴的論斷「背離了最基本的事實。」

然而「最基本的事實」是，在 5 月 25 日，這篇文章已經放在清華大學黨委辦公室的桌子上了。73

5 月 20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要點是：

「有些人的反動面目還沒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夠……在一短期內，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但是各省市黨委必須指導宣傳部門和黨報立即著手分類研究右翼的反動言論和其他資產階級觀點，準備在適當時機（中央屆時通知）發表一批論文和社論，予以反駁和批判。」74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示各省市委書記：「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你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們的言論，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75

起初對「鳴放」消極應付的各級黨委書記們得到「引蛇出洞」的玄機後，一下子放了心，也一下子積極起來。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就是在 5 月 21 日給全校作報告鼓勵大鳴大放的。黨委書記們大會小會引導「鳴放」，甚至軟硬兼施、壓迫群衆參加鳴放。「誰不參加鳴放，誰就是對黨不關心、不愛護，不愛社會主義……」這是當時各單位壓迫群衆鳴放時最常用的詞語。他們唯恐鳴放會開得不够熱烈、鳴放的內容不够廣泛、對共產黨的批評不够激烈，參加鳴放的人的「類

別」不够多樣性；也就是說，唯恐「秋後算帳」時材料不够充足。

5 月 29、30 日連續兩天，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把清華大學黨委、團委、各系的負責人召去，布置繼續鳴放：「讓他們出大字報，引蛇出洞，將來我們出他們的大字報……」76

當時北京師範大學黨委書記施平的回憶也可爲此作注：「反右正式開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多次召開大學黨委書記會……動員鳴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負責同志找了清華、北大、師大和北農大四所重點大學的黨委書記去談話……說：你們……要用各種辦法，製造適當氣氛，引蛇出洞，讓他們把毒都吐出來……黨委書記要示弱……讓他們敢于盡情鳴放，無所顧忌。……時間不多了，很快就要發動全面反擊，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77

明明是全黨接受了毛澤東的「引蛇出洞」，卻有人斷言：「由于毛澤東此時的注意力已經返回到階級鬥爭問題上，所以他對這種戰術也給以了肯定和支持。」78 好象發明「引蛇出洞」戰術的是鄧小平、彭真等人，毛澤東只不過「給以了肯定和支持」而已！

爲耍「陽謀」毛澤東不惜出爾反爾

由於毛澤東說過要檢查肅反的偏差，反右開始後，他又下指示說：「在過去三反肅反中被整的人」，屬於「在這次運動中鬧得最兇的」。[79]所以，凡對以往運動鳴了幾句不平的人，都是右派。

4 月 30 日毛將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請到天安門城樓開座談會時，曾蓄意迎合那些人士的心理，說：「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確是不好當……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職權）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80

幾個月後，他却轉了一百八十度，說：「章伯鈞、羅隆基等……他們要取消學校黨委制，要同共産黨輪流坐莊。」81 凡鳴放時對學校黨委制發了一點議論的人統統成了右派。毛澤東從未打算「改一下」學校黨委制，更未贊成過教授治校。

四月間發動鳴放運動時，毛澤東曾說：「我看每省辦兩個報紙比較好，一個黨

外辦，唱對臺戲。」82 毫無疑問，毛澤東說的是假話。問題是他爲什麼說假話？如果發起整風運動只是爲了跳出執政黨覆亡的「周期率」，「重新鍛造黨，使它從根本上擺脫周期率的支配」，他完全沒有必要口是心非，迎合那班「資產階級右派」，講什麼「教授治校」、「黨外辦報」。「誘敵深入」也罷，「引蛇出洞」也罷，「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也罷，若不是爲了策動「鳴放」，毛澤東將保持一貫堅持黨委治校、一貫堅持報刊壟斷、一貫堅持新華社獨家新聞的記錄，絕不會把出爾反爾、言而無信的嘴臉暴露于中國人民面前的。

「鳴放」期間，八十四歲的江蘇古文家冒廣生赴京省親訪舊，外交部長陳毅聞知，前往探望。交談間，冒氏談了若干看法：「既曰爭鳴，又曰百家，那就人各異鳴……不能只允許肯定，亦不能不允許否定。希望黨內外人站在一條戰線上，把壞的風氣移去，好的風聲樹起來。這才叫做整風，不是整人。」83 陳毅以為冒的意見值得寫下，並推薦給人民日報。

6 月 6 日，冒文發表，毛澤東讓周恩來安排將冒廣生及其子冒舒諲接到中南海相見。

二人有如下一段對話。

毛：老先生講的好啊！我們這次整風，正如你所說的，是「愛人以德，相見以誠。」

冒：人民敢說話是好事，不因其語近偏激而以為忤。

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個方針一定不變。……

送冒廣生出門時，毛問：老先生有何臨別贈言？

冒答：我記得佛經上說過，一頭雄獅也不免為身上幾隻虱子所苦。虱子雖小，害莫大焉，請務必提防！

毛表情嚴肅，右手搭在胸口說：講得好哇！我一定牢記在心上。84

可是兩天後，空前的災難即落到了中國知識份子頭上，連冒老的兒子冒舒諲也沒逃脫。

反右運動大獲全勝後，毛澤東得意地闡述他的戰略道：「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捉它？我們要讓那些王八蛋出臺唱戲，在報紙上放屁，……然後……一鬥一捉。城裏捉，鄉里鬥，好辦事。」85

什麼是「陽謀」？這就是。

注 釋

1 轉引自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華夏文摘》(www.cnd.org)。

2 同上，引言。

3 同上，第 134 頁。

4 《四十年的回顧與思考》(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 132 頁。

5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 23 頁。

6 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引言。

7 1956 年 4 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學習資料(1949～1956)》(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275 頁。

8 1957 年 6 月 13 日《人民日報》。

9 1956 年 5 月 2 日毛澤東在第七次最高國務會議的總結講話，《共和國走過的路》第 250 頁。

10 《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 148 頁。

11 鍾惦斐《電影的鑼鼓》(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第 53 至 57 頁。

12 1957 年 3 月 6 日毛澤東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自筆者保存的 1967 年 7 月某機關刊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23 頁。

13 1957 年 5 月 16 日上海《文匯報》。

14 1957 年 3 月 6 日毛澤東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自筆者保存的 1967 年 7 月某機關刊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23 頁。

15 1957 年 7 月 18 日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的插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9～1957.12)》(北京：編者不明，1967)第 194 頁。

16 1957 年 4 月毛澤東在杭州對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北京大學，1967)〖但未標明編印者〗第 126 頁。

17 1986 年 5 月 9 日《人民日報》。

18 1957 年 3 月，毛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的講話，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第 194 頁。

19 1957 年 3 月 17 日毛澤東在天津市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9～1957.12)》（北京：編者不明，1967）第 142 至 143 頁。

20 1957 年 3 月 19 日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二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同上，第 159 頁。

21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第 195 頁。

22 同上，第 197 頁。

23 1957 年 10 月 13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63 頁。

24 1958 年 1 月 28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93 頁。

25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第 485 頁。

26 1958 年 4 月 6 日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110 至 111 頁。

27 1957 年 1 月毛澤東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5 頁。

28 這段話收進《五卷》時改成了「我們把這個階級買過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37 頁。

29 1957 年 4 月毛澤東在杭州對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見《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北京大學，1967）〖但未標明編印者〗第 121 頁。

30 《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人物》編輯部）一九八七年第五期第 91 頁。

31 《炎黃春秋》（北京：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一九九六年第一期第 21 頁。

32 1957 年 12 月 25 日《北京大學學報》，轉引自《探索》一九九一年第一期陳一葦《馮友蘭的道路》。

33 《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勝利萬歲——黨內兩條路綫鬥爭大事記（1921～1967)》（北京：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1968）第 148、152 頁。

3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 283 頁。

35 1956 年 9 月，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的章程的報告》。

36 《中共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九九一年第六期，《八大黨

章未寫「毛澤東思想」的原委》。

37 1954 年 12 月 5 日中共央宣傳部《關于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中共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38 同上。

39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 834 頁。

40 《中共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 36 頁。

41 一九九三年九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報》，胡績偉《報紙生涯五十年》。

42 同上。

43 李莊《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第 199 頁。

44 1957 年 4 月毛澤東在杭州對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見 1967 年 9 月北京大學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114 頁。

45 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44 至 46 頁。

46 1957 年 4 月毛澤東在杭州對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北京大學，1967）〖但未標明編印者〗第 124 頁。

4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 403 頁。

48 1958 年 1 月 12 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84 頁。「鳴放」二字爲本文作者所加。

49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13 頁。

50 1958 年 4 月 6 日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111 頁。

51 1957 年 1 月毛澤東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彙集），《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7 頁。

52 同上，第 8 頁。

53 同上，第 9 頁。

54 1957 年 1 月毛澤東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3 頁。此文收進《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改成了「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現在情況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34 頁。

55　1957年1月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彙集)，《學習資料（1957-1961)》第13頁。

56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總結，《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22頁。這段話收進《五卷》時改成了「至于粱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見《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第355頁。

57 1957年1月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彙集)，《學習資料（1957-1961)》第9頁。

58 1957年4月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42至43頁。

59 1957年1月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彙集)，《學習資料（1957-1961)》第10頁。

60 1957.3.2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結束語，《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27、30頁。

61 《中國知識份子悲歡錄》(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225頁。

62 《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四期第12頁。

63 1957年7月18日毛澤東在青島會議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9～1957.12)》(北京︰編者不明，1967）第194頁。

64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第424至428頁。

6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第589頁。

66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第835頁。

6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478頁。

6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第610至614頁。

69 《風雨年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70 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197頁。

71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第 425 頁。

72 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 197 頁。

73 1997 年 6 月當時的清華大學團委書記阮銘與本文作者的談話。阮銘參加全國青年團代表大會後，5 月 25 日回校當天，在校黨委辦公室見到了放在辦公室的《事情正在起變化》。

7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614 至 615 頁。

75 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Thinkers Publishing Limited, 2006）第 149-150 页。

76 參加彭真召集的談話的阮銘與本文作者的談話。

77 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 202 頁。

78 同上。

79 1957.6.10「中央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 503 頁。

80 《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47 頁。

81 1958 年 1 月 28、30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同上，第 138 頁。

82 1957 年 4 月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47 頁。

83 1957 年 6 月 6 日《人民日報》。

84 冒舒諲《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見到了毛澤東》，1986 年香港《百姓》半月刊第 128 期第 42-44 頁。

85 1958 年 4 月 6 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漢口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續一)》（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115 頁。

駁「反右必要」說　　張成覺

1957年反右至今五十年了，仍未徹底平反。作為當年最年輕的右派之一，我今雖年近古稀卻仍是心潮難平。因為中共依然堅持「反右是必要的」，拒不認錯。國內外若干學者則有意無意為毛的罪行洗刷辯解，其中竟包括當年的受害者，其有關論著中甚至彌漫著一種「右派原罪感」。對此，不能不坦陳其非，以正視聽。

「猖狂進攻」純屬烏有

首先必須指出，「反右必要」說賴以建基的「右派猖狂進攻」，就是個天大的謊言，屬於賊喊捉賊的伎倆。

如所周知，反右的首個動員令是毛起草的「5.15」指示，即〈事情正在起變化〉，最初只發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等數人閱讀；公開的第一槍是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此前三個半月的2月21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號召鳴放。中共資深歷史學家黎澍多年後回顧稱：

「這個講話廣泛傳達以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幾個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學工作者中間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們被邀請在一些座談會上發言。可是，即使在這個時候，這種場合，發言者也還是心存顧慮。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人們怕『釣魚』。這篇文章是反擊右派進攻的信號。既然直到此時人們還說怕『釣魚』，可見直到反右派鬥爭開始時，也並沒有什麼資產階級進攻需要「打退」。」1

至於所謂三大右派言論，即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和儲安平的「黨天下」，分別發表于毛「5.15」指示之後的5.21，5.22和6.1。故朱正先生引述毛6月8日起草的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時，曾分析說：「這個文件實際上是兩項內容組成的，就邏輯的先後來說，第一是「組織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第二才是「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2毛使用「反擊」字樣，是為了掩蓋其「引蛇出洞」的卑鄙伎倆，好像是「右派猖狂進攻」在先，他完全處於不得已才被迫「後發制人」。他玩弄的這種花招必須揭穿。

所以，只能說是毛居心叵測地以「幫助黨整風」為名，誘使各界人士發洩不滿，然後羅織構陷，將大批敢言正直的愛國知識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如果按毛的說法右派進攻有罪，那麼毛引人犯罪在先，屬教唆犯；但實際上右派所言均無

違憲，並非犯法，毛則公然踐踏人權，侵犯公民言論、思想自由，扼殺人性，犯了滅絕人性的反人類罪。

其次談談著名学者朱正先生頗具代表性的一些論點。朱先生 1957 年被列另册而依然奮鬥不息，研究魯迅斐然有成，其散文隨筆更稱大家，爲筆者所敬重。于此提名論辯，實非得已。

《李慎之文集》中有一段說：「幾年前出版的、頗得好評的朱正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就認為毛本來是好心好意地號召鳴放，沒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猖狂，他才不得不反擊。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我所以在一九九七年寫〈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實際上是對朱正的反駁。」

對此，朱先生不僅在其上述著作的增訂本（香港版易名為《反右派鬥爭始末》）〈後記〉中作了答辯，其後在題為〈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的發言（以下簡稱〈發言〉）中，重申其論點並有所發展。3 他將 57 年反右歸結為：一「是中共和知識份子的矛盾積累到了極點時候的猛烈爆發」；二「是中共和一同致力於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其他政治勢力，即以中國民主同盟為主要代表的民主黨派的矛盾積累到了極點時候的猛烈爆發」。應當說，這兩點都是缺乏事實根據的。

與知識份子矛盾未到「極點」

我們不妨看看毛 57 年 1 月的兩次講話，是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期間講的。第一次是 1 月 18 日，結尾說：「總而言之，去年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國際上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一年，國內是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現在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4

且不論國際，就國內而言，他列舉的思想動向有這麼幾項，依次為：評級中黨內有些幹部「鬧級別」；有些幹部認為農業合作化沒有希望，連身為農業部長又是黨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廖魯言，也講「自己泄了氣」；「好些地方學生鬧事」；一些教授「也有各種怪議論」。

僅憑毛講話中所舉的論據，根本得不出「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結語。這大概因為他有意淡化了一些事例。據有關資料稱：

由於「三大改造」的超高速完成而造成的急劇社會大變動，以及在經濟建設上「大冒進」所造成的各方面的緊張，引發了一些城市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

上街遊行示威；各地農村則發生農民鬧退社、分社、哄搶集體物資、毆打幹部、進京上訪告狀等事件。

據不完全統計，從 1956 年下半年至 1957 年春，全國罷工請願事件達幾十起，參加者共萬餘人；幾十個城市的大`中學校學生罷課請願，遊行示威，參加人數有一萬多人；而各地農村的「退社」風潮，遍佈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僅廣東省退社的農民達十三萬戶，二百多個合作社垮臺。

……

廣東省某縣發生群眾示威時，縣公安局出動武裝員警鎮壓，當場開槍打死五人，打傷九人。5

其實，對於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上述事件所涉及的總人數極為有限，平均每起參加者也不過二三十人；而且就其性質而言，均屬中共「與無產階級大眾發生的矛盾衝突」，儘管個別相當激烈，但俱與知識份子無關。

回到毛的講話，他所談的四種動向中，與知識份子有關的只有一種。其所謂「怪議論」包括：「不要共產黨」，「共產黨領導不了他」，「社會主義不好」，如此等等。雖然這裏面已蘊含某些教授「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意味，但顯然不能據此而稱「中共和知識份子的矛盾積累到了極點」，更無法斷言不足四個月後，即 5 月 15 日他寫〈事情正在起變化〉初稿時，此一矛盾就「猛烈爆發」。

矛盾主因在於中共

誠然，中共和知識份子確有矛盾，根子在知識份子崇尚民主自由，中共則實行極權統治，彼此的價值觀迥異。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共。正如〈發言〉中所述，它得天下前制定的政策，即「爭取、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已將其視為異己。付諸實行的結果，不可避免地造成知識份子的不滿以至反感。邵燕祥先生為《反右派鬥爭始末》所寫的序言中概括稱：

「在五十年代初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在『忠誠老實學習』和肅反運動中，以及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對知識份子的政治觀點、學術觀點、階級出身、個人成分以至社會關係、經濟來源的審查，更早在解放區的整風、審幹，都已出現了簡單粗暴的做法。」

可見，兩者之間的關係早有問題。而中共坐天下之後，政治運動層出不窮，

更使雙方逐漸「形成某種緊張關係」。

作為反右的歷史淵源之一，〈發言〉中特別提到了因反胡風而起的肅反運動。儘管反胡風屬中共建政後「以言定罪」的首宗惡例，令知識份子不寒而慄，但畢竟該案涉及者不過千餘人，影響面遠小於肅反。後者殃及的無辜幾達一百四十萬！其中知識份子當不在少數。

其實，邵先生所講的「解放區的整風、審幹」裡，有個「搶救運動」專門「抓特務」，等於後來的肅反。其手段之恐怖可謂令人髮指，當年延安的知識份子鮮有倖免者，著名作家韋君宜直到晚年還對此耿耿於懷，其《思痛錄》可見一斑。那是遠非「簡單粗暴」四字所能形容的。連毛也不得不為此在延安的幹部大會上向廣大受害者鞠躬致歉。不料事隔十年餘，竟在六億神州（當年的「解放區」人口約九千萬）重現此種苛政，豈能使一眾知識份子悉數噤聲毫無怨言？

也正因此，毛 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即著名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所講 12 個問題中肅反問題居於第二。他提出要全面檢查一次，「有錯必糾」。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即源自此。而又由於羅成了大右派，上述檢查後來胎死腹中。不管怎樣，中共與知識份子的矛盾因肅反而有所加劇。含冤受屈的知識份子無非想討一個「說法」，需要訴苦，出一口氣，如此而已。毛卻視之為猖狂進攻，大逆不道。但並無跡象證明其間的對立「到了」「猛烈爆發」的程度。

事實上，反右之前知識份子早成驚弓之鳥，敢於在公開場合發表上述「怪議論」者，可謂少之又少。毛所列舉的應屬私下交談的閒話，被中共特務刺探得來或遭告密者洩露。因為盡人皆知，此類議論已超出「怪話」範圍，被當局視為「反動」，故必三緘其口。當然，腹誹肯定是有的，但決不輕率發言。一句話，如果沒有毛這樣仇視知識份子而又狡詐兇殘的暴君，就不會發生 57 年反右派鬥爭這場罪惡的政治運動。只說中共和知識份子的矛盾導致反右，不談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提毛所起的決定性的主導作用，那無異於雙方各打五十大板，這對於作為受害一方的幾十萬罹禍知識份子而言，是有失公允又極不公正的。

民主黨派規規矩矩

至於說到中共和民主黨派的矛盾，那也是早已有之。並不見得在反右前夕特

別激化「到了極點」從而導致「猛烈爆發」。說到底，無非是毛設下圈套「請君入甕」，使以民盟為代表的昔日反蔣盟友中計上當，然後提前「引爆」，令那批中南海新朝的「國士」大部份一下墜入無底深淵，從此不見天日，再也無法充當他認為「有可能向他的權力和地位挑戰」的對手。換句話說，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在中共，反右之發生同樣基於毛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這裏不妨回顧一下毛宣佈整風之前民主黨派的情況。可以用四個字概括：規規矩矩。排在首位的民革基本上是內戰中的敗軍之將，當然有自知之明，安於其「政治花瓶」的角色，不會亂說亂動。事實上，它的一名中央副主席王昆侖和一名中央常委兼組織部長朱蘊山，都是中共秘密黨員，它也亂動不起來。比較活躍的民盟雖有一定政治影響，兩位中央副主席章伯鈞羅隆基也較有政治經驗，並且有較強抱負，但兩人素有嫌隙，產生內耗。更何況其實權人物胡愈之（章怡和在所著《最後的貴族》中稱之為「民盟的主心骨」）是中共秘密黨員，其他如楊明軒、楚圖南等民盟首腦人物亦然，它實際上被牢牢地掌控於中共手中，焉能挑戰毛王朝的統治？

抛棄盟友早有圖謀

不過儘管如此，中共對這些民主黨派並不掉以輕心，而是從來就視之為反蔣的同路人，只可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掌權）。有關這點，〈發言〉中引述了 1947 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的一份指示，其中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6

這份文件是周恩來起草的，毛審閱時加寫了以下一段：

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抛棄他們。

一個月後的 11 月 30 日，在毛致斯大林的電報中更明白宣示，所謂「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就是指民主黨派。該電報稱：

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

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臺，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7

上述兩份文件都是在陝北的山溝中發出的。前此的10月10日公佈了毛起草的「雙十宣言」，即《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宣稱解放軍已大舉反攻，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宣佈中共的八項基本政策。其首項為：「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 各民主黨派……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當時預計，要到51年6月才能取勝。實際上三大戰役是一年後才打響，可見正當國共雙方內戰猶酣之際，毛即已蓄謀一俟奪得天下就過橋抽板，馬上拋棄民盟等共過患難的盟友，只是由於未獲斯大林首肯而將此計畫暫時擱置，過了將近十年才終於付諸實施。

發動整風針對劉周

〈發言〉中談到作為反右前奏曲的整風，據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宣稱，其目的是「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一些黨員的特權思想，從而改善執政黨的形象，改善黨與黨外群眾特別是知識界的關係」。其實還有一個沒有宣佈的目標，就是毛要跟黨內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算賬。

所謂「反冒進」，事緣不懂經濟的毛從1955年8月起，大講「反右傾」、「反保守」。在其鞭策下，1956年的工業經濟指標急升，全國出現一窩蜂的「大幹快上」，導致國民經濟嚴重失調，造成資金、物資、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緊張。5月11日周恩來挺身而出，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提出「反冒進」，此舉受到劉少奇、陳雲等中央集體支持。6月中旬，劉率中央政治局作出「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的決議，並授意中宣部起草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送毛審查時毛認為是針對自己的，寫了「不看了」三個字。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該文。毛更為惱火，但隱而未發。這是由於其時正值蘇共二十大之後不久，「反對個人迷信」，「尊重集體領導」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居於主流。加上國內外政局動盪對毛的壓力，他只好暫時按捺自己的「左傾冒險主義」思想。

其後的中共「八大」，也是在這種對毛不利的政治氣候下召開的。會議通過的決議中，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主要矛盾的提法，關於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

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關於加強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的方針，都是毛所不滿意的。只是因為形格勢禁，他一時間屈服於中央的集體意志，也舉手同意了。這是 1945 年「七大」以來，也可以說 1935 年 1 月遵義會議之後絕無僅有的一次。

當年 12 月，即「八大」閉幕後僅兩個月，他就在一次會議上向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常委說：

「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8

有論者指出：

毛澤東是個人意志十分倔強、固執的人，他從不認輸，也從不服輸。「反冒進」及中共「八大」對他的「左」傾思想的抵制，他是不滿意的，對「八大」在主要的內容上沒有體現他的「左」傾路線是耿耿於懷的。「八大」會議雖然吸收了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主要思想，但在經濟建設的路線上卻沒有採納毛澤東的超高速的「左」傾思想，而主張「穩步發展」。這不但意味著毛澤東的有關思想不正確，也使他的左傾冒險主義受到壓制，對此，毛澤東是不能容忍的，毛澤東必然要反擊。毛澤東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中國，改造世界。在這一點上，毛澤東不會有任何的讓步和妥協。毛澤東所要做的，僅是找尋適當的時機。9

顯然，此論甚是。可見，提出整風之際，毛的矛頭主要指向黨內最高層的劉、周等人。而這也說明，其時中共與民主黨派的矛盾並非「到了極點」，接踵而至的反右鬥爭更不能說是矛盾的「激烈爆發」。

違憲反右不可避免？

《反右派鬥爭始末》的〈結束語〉第四條歸結稱：

綜合當時國內外諸因素來考慮，反右派鬥爭的發生都是不可避免的。當時是不是存在另一種選擇的可能性，不搞反右派鬥爭行不行？抽象地來探討，也可以有另一種選擇。這就是說，共產黨的第一大黨的地位，執政黨的地位，雖然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動搖，但是卻不再享有不受制約的權力。在它還有力量維護自己這種不受制約的權力的時候，是決不會接受這種要求的。換句話說，社會還不要求解決這個問題。歷史僅僅提出能夠解決的任務。

這段話令人無法苟同。試問：一定要搞 57 年那樣的違憲的非法鬥爭嗎？「不

可避免的」要用對敵鬥爭的方式嗎？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不等於說反右有理，毛完全是對的？

反右之外豈無選擇

再者，除了發動反右之外，毛真的別無選擇嗎？以儲安平的建議而論，安排非党人士當國家副主席`政府副總理，又有何不可？這不過是恢復 1954 年以前的做法罷了，對中共何損之有？事實上，1959 年不是重新讓宋慶齡出任國家副主席了嗎？1949 年 10 月她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六名副主席之一，位列劉少奇、朱德之後，過了 10 年，排名還在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前。儘管如此，中共的權力不是依然不受制約嗎？

按照中國的國情，當然可以說 57 年「社會還不要求解決（一黨專政）這個問題」，或者說「歷史」還沒有「提出」這個尚未能解決的「任務」。但是豈能給人一種印象，即當年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提出」這個「任務」便是有罪？！便該戴上右派帽子受辱，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即使是進行冷靜的學術研究或深刻的歷史反思，也不應為毛的惡行洗刷，使之能夠假「歷史」之名逃脫其罪責！在這裏，「對事不對人」是不行的，「宜粗不宜細」也是不對的。倒不妨借用毛的話：「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我們理應講「認真」，把被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否則，不僅已故的反右鬥爭受害者死不瞑目，健在者亦意氣難平；而我們的國家民族也可能重蹈覆轍，再走彎路，用文革語言叫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即又一次經受「左」禍！這絕非危言聳聽，文革結束後三十多年來，極左路線的回潮不是屢見不鮮嗎？李慎之先生稱之為「皇權專制主義」的社會基礎，不仍然根深蒂固嗎？

「善良願望」何曾有過

〈結束語〉第五條，引述了赫魯曉夫的話：

「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是個激將法。毛假裝把民主和自由發表意見的閘門開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們把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者書面的形式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他認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

對此，作者認定：

這當然只是一種懷著敵意的情緒化的評論，把本來很複雜的事情看得過於簡單了。他抹殺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

我覺得儘管不能否認赫魯曉夫對毛「懷有敵意」，上述那段話卻不應視之為「情緒化」而全盤否定。因為一方面「國內一些研究者也有類似的說法」，這是下文緊接著承認的事實。可見未必是赫魯曉夫個人「把本來很複雜的事情看得過於簡單」，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某些中外論者，一針見血地點中了問題的要害！何況赫氏處於「旁觀者清」的客觀地位，所以理應對他的那段話實事求是地予以評價，而不宜大筆一揮輕易「抹殺」。

至於說到毛「消除弊端的願望」，似乎需要做認真具體的分析。正如〈結束語〉第一條中所談，毛要除的三害是有底線的。例如黨外人士有職無權，是毛實行「一黨專政」的「題中應有之義」，萬不可作為宗派主義整掉。「外行領導內行」也如此。打天下的老紅軍、土八路，縱使大字不識才幹全無，也必須佔據要職，尸位素餐亦在所不計。如此看來，毛之所謂善良願望，往往既未必「善」，也不一定「良」。

引蛇出洞早有預謀

然而作者對毛的善心確信不疑，就前述李慎之先生所提有關問題，他說：

我為河南本《結束語》增寫了第五條，就是回答這個意見的。李先生去世後，我發表了《君子和而不同》紀念李先生，其中說：

當然，我也能夠理解，李先生的這種看法，是基於他對毛的基本評價。就這一點來說，他當然是對的，我也完全贊同他的這個評價。一個講誠信的政治家，剛剛信誓旦旦地宣佈「言者無罪」，怎麼能夠一下子改口說「『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呢？根據他自己說過的「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人們豈不是有足夠的理由來懷疑他原先的動機究竟有多少善意嗎？不過我以為這同他有時也想作一點改善形象的努力並不是不相容的。

對於最後這句話，我是不以為然的。以毛的性格為人來說，他一貫充滿「虎氣」，極為固執，十分自信，自我感覺良好。他歷來自以為高大完美，根本不屑于理會別人的看法。他是絕不會想到如何「作一點改善形象的努力」的，從來不會，永遠不會。他對自己如此，對中共整體也如此。

毛不在乎「黨的形象」

如所周知，中共最為人詬病的是極權統治壓制民主，但毛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段著名的話說：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

在 1956 年 11 月 25 日的八屆二中全會上他又說：

我們共產黨是被人家罵了三十五年的，無非是罵共產黨「窮兇極惡」、「共產共妻」、「慘無人道」那一套。加一個達賴，再加一個什麼人，有什麼要緊。再罵三十五年，還只有七十年。一個人怕挨罵，我看不好。

他所列舉的對中共的那些惡評，除「共妻」這一條就當時而言或有誇大，但對毛及其曾經寵信的高崗，以及軍方一批高級將領如肖華、黃永勝等並無冤枉。而早期中共高層互換異性伴侶更不稀奇，現時大陸高幹婚外情尤已氾濫成風。至於其餘各項更係事實。但毛絕無悔意，甚至變本加厲。為了鞏固其權力與地位，他為所欲為，無法無天，兼且洋洋自得。

回到引蛇出洞這個話題。李慎之先生的觀點是，1957 年 1 月，毛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就表明他決心開展反右派鬥爭。〈結束語〉也認同稱：

（這個）講話中，就已經出現了後來反右派鬥爭一些辯論的題目`一些政策和策略。例如，他講了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的怪議論，涉及共產黨能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有沒有優越性，成績是不是基本的，對肅反運動的估計，對統購統銷的估計，對合作化的估計。毛還談到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唱對臺戲的問題，以為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裏的一些提法後來都出現在反右派鬥爭之中。

接著說，

更早像在幾個月之前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也就講過要足夠估計成績等等問題。但是這些都僅僅說明他的思想中有發動一場反右派鬥爭的因素，卻不能說這時他已經在計畫開展這場鬥爭了。

一心製造「小匈牙利」

這裏作者似乎忽略了一點：八屆二中全會是 56 年 11 月召開的，那時剛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毛在會上「沒有從積極的方面，如怎樣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改善

人民的生活，改進共產黨的領導來考慮避免類似事件在中國出現，而是從自己的政治需要出發，來『吸取教訓』。」強調「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其弦外之音是否定「八大」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的決議。有論者指出，「毛澤東的計畫是，製造一個中國的『匈牙利事件』，然後以此為口實，全面改變『八大』的政治路線。」10

對此，毛自己也供認不諱。他在 57 年 6 月 8 日的黨內指示，即《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文件中，明白宣示發動整風運動的目的，是「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

由此可見，把毛確定「引蛇出洞」策略的時間定在 57 年 1 月，即李慎之先生等研究者所說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期間，無疑是言之成理合乎邏輯的。

「剝的方法」早有三種

〈發言〉則仍然堅持原來的觀點，認為毛是 5 月間才下決心：先「引蛇出洞」然後開展反右派鬥爭。為此引述了毛親自撰寫的《人民日報》「七・一」社論，即〈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社論稱：

「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做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丑類。」

作者分析說：

5 月 8 日到 6 月 7 日是中央統戰部召集的座談會開始到工商界座談會結束的這兩個會議之間，正是在這期間，毛具體部署反右派鬥爭。引蛇出洞或者說誘敵深入就是戰役的第一階段。

作者以此否定李先生的結論。這層意思在〈結束語〉第五條中有如下表述：

就在這次省市委書記會議上，在談到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的時候，毛說，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沒有剝奪乾淨的還要剝。剝的方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可見這時他還沒有想到可以採用更加爽快的第

三個辦法，即給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可以說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在 1957 年初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都想到了反右派（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可是不能說，這時他已經具體想到了要開展一場如同後來實際進行的那樣的反右派鬥爭。所以，把他確定「引蛇出洞」策略的時間定在此時，似乎是稍早了一點。

《發言》將毛 1 月間只提了兩種「剝的方法」，當作「頗有說服力的證據」，以證明毛未決定「引蛇出洞」。其實大謬不然。因為毛在此之前採用的「剝的方法」，其實已有三種，另一種他沒有說，就是「批倒批臭」，例如 1953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對梁漱溟毫不留情的面對面的批判。這種方法豈只把對手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連其人格尊嚴也為之蕩然無存，掃地以盡！其實質是一個「壓」字。

「給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也屬於「批倒批臭」一類方法，不過壓得更厲害，更為嚴酷無情，被「剝」者入了另冊，成為賤民，屬專政對象之列。

這裏，「戴上帽子」是組織處理手段，「引蛇出洞」是鬥爭策略問題。兩者固有聯繫，更有區別。組織處理手段沒想好，不等於反右鬥爭策略沒確定。事實上，正如該書所指出的，連「右派分子」這名目也不是一開始就定下來的。可見，上面所引的毛的那段話不足為據。

動機多種有主有次

〈發言〉還對前引的李慎之先生的批評再次答辯（本書〈後記〉已作過回應），認為：

在他決定整風的多種動機之中，我提出毛一開始確實也包含想要消除那些太刺眼的弊端，改善一個執政黨的形象的願望。這裏可以舉一個有說服力的證據，是毛 5 月 16 日在一個批示中寫的一段話：

從揭露出來的事實看來，不正確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對黨外人士發號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黨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溝、高牆，不講真話，沒有友情，隔閡得很。黨員評級評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權，黨員高一等，黨外低一等。黨員盛氣淩人，非黨員做小媳婦。學校我黨幹部教員助教講師教授資歷低，學問少，不向資歷高學問多的教員教授誠懇學習，反而向他們擺架子。以上情況，雖非全部，但甚普遍。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扳過來，而且越快越好。

從這裏可以看出來，毛即使佈置反右的時候，仍然提出了消除一些弊端的要求，如果不看到這一方面，就未免把複雜的事情看得太簡單。

這個答辯不見得有多少說服力。因為毛決定開展整風的動機，僅在〈發言〉中就先後列舉了好幾個：

56 年 11 月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提出開展整風運動「就是為了避免在中國也出現匈牙利事件」；

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宣稱，整風目的是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特權思想，從而改善黨的形象，改善黨群關係。還有一個沒有宣佈的目標，就是毛要跟「反冒進」的劉周算賬。

同年 10 月 9 日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說資產階級進攻，我們就搞「防護林帶」。「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作者據此評論稱，「整風，反右其實是一回事。要說差別，不過是時間先後的兩個階段而已。」

顯然，這多種動機中，以「避免在中國也出現匈牙利事件」為主，跟劉周等算帳為輔，改善形象又在其次。實際上，〈發言〉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與反右派鬥爭之共同點亦含此意，即毛發動這兩場運動，「最根本的目的都是為了增強他本人的權力和地位，打擊有可能向他的權力和地位挑戰的對手」。57 年整風把社會上的資產階級（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都被毛納入其內）作為打擊對象。如此，66 年文革毛將靶子換成黨內走資派，即所謂「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便是順理成章的了。

求言背後實藏禍心

從毛所供認的「反右派就是整風」，作者進一步推論稱：

既然說反右是整風運動既定的最後階段，那麼開展這一場反右派鬥爭當然早就在毛的成算之中。這裏就有了一個問題：當初毛表示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多提些意見，究竟是真心誠意的求言呢？還是引蛇出洞或者說釣魚的一種手段，陰謀或陽謀？

人們知道毛對知識份子的輕視和敵視是一貫的。從延安整風，思想改造到肅反，開展一場打擊知識份子的運動並不是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當然可以認為在決定整風之時即有釣魚之意。就說這一回的整風運動，他已經明說就是思想改

造，這事實上是整風運動的第一階段或準備階段。是知識份子不知底蘊，以自己最好的願望去解釋整風指示的文字，誤入白虎節堂，自投羅網。

這兩段話真的有點撲簌迷離。毛的初衷到底是善是惡？若「當然可以認為在決定整風之時即有釣魚之意」，便是毛早有圖謀設下圈套。倘「是知識份子不知底蘊誤入白虎節堂」，那便屬於咎由自取，與人無尤，毛其實是真心求言，並無惡意。似乎是模棱兩可，語焉不詳。

不過，要是再看作者兩處自稱舉出「頗有說服力的證據」、「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毛並非早就蓄謀要反右派，甚至在 57 年 5 月 16 日「佈置反右派鬥爭的時候，仍然提出了消除一些弊端的要求」，可以明白作者還是傾向于肯定毛「原先的動機」確含「善意」。用李慎之先生轉述的話，便是「認為毛本來是好心好意地號召鳴放」。

對此，筆者想借用李先生的話：「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其實作者恐怕也未必完全說服了自己，其行文前後頗有矛盾，前已臚列，茲不重複。

如此矯枉焉能反正

但對於作者所舉毛 5 月 16 日批示，不能不再說幾句。因為其中所指的「錯誤方向」，正好是「黨天下」的真實寫照。黨員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盛氣淩人」，「有特權」，「擺架子」，「以致造成深溝、高牆，不講真話，沒有友情，隔閡得很」，「以上情況，雖非全部，但甚普遍。」這都是毛供認不諱的。執政黨的形象，黨員的形象如此醜惡，儘管他平素毫不在乎外人的評論，但轄下子民怨聲載道，他聽了總不能完全無動於衷，所以揮筆寫下批語，要求「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扳過來，而且越快越好。」他用了「方向」這個詞，可見事非尋常。在中共的詞典裏，「方向路線錯誤」屬於頂級，次為「方向路線性錯誤」，均遠超於一般錯誤。而且，「方向」置於「路線」之前，足見此類「甚普遍」的弊端在毛心目中的位置。

然而，能夠由此認定這個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是「列寧加秦始皇」）的暴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甚至「即使佈置反右派鬥爭的時候」，「也想作一點改善形象的努力」嗎？

否。

因為雖然中共執政只有七年，上述弊端已成「方向」，積重難返。但其根子正如儲安平所言在於「黨天下」這個思想。毛發動反右派鬥爭，將儲列為「位列三

甲」的首要標靶，等於給「有特權」「擺架子」的廣大黨員，首先是那些身居要職的黨內高幹打氣撐腰，試問他們看了毛的上述批示後，有誰會真正「緊跟照辦」，切實貫徹執行呢？光憑這官樣文章裏寥寥幾句話，就可以把那「錯誤方向」「完全扳過來」，豈非癡人說夢？相信連毛也知道他這些話只是說說罷了，並沒有「動真格」之意。

可以借用毛所言，「抓而不緊，等於不抓」。毛不過是裝腔作勢要消除弊端，改善形象，改善黨與非黨群眾的關係。他心裏很清楚，這些「弊端」啊，「形象」啊，「關係」啊，對他的最高權力和地位根本不構成任何威脅，無需認真對待。「如果不看到這一方面，就未免把複雜的事情看得過於簡單了」。尤其是像毛這麼複雜的首腦人物，用林彪的話叫做「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豈能「書生氣十足」地僅憑他短短數句批語，就作出善惡判斷？

毛劃右派何曾「克制」

〈結束語〉第七條說，「當年使用『右派分子』這頂帽子其實是頗為吝惜頗為克制的」，根據是「劃右派僅僅限於知識份子之內」，工農不劃。這裏面「吝惜」用詞不當，「克制」更說得顯然不對。

據《現代漢語詞典》，「吝惜」意為過分愛惜，捨不得拿出（自己的東西和力量）。用於給人戴帽子的毛，語法上搭配欠佳。至於說「克制」，就更非事實。據57年7月29日下發的中共文件，毛打算劃右派四千人。8月18日他估計全國右派約10萬人。最終結果是55萬多人。可見他簡直隨心所欲地把人打成右派，絕不手軟。試問何來「克制」之有？帽子一戴即成賤民，等於政治生命完結，淪入十八層地獄。從這個意義上，毛瘋狂抓右派，即是草菅人命。豈能以「克制」美化之？

強詞奪理乃毛慣伎

〈結束語〉第八條稱，「以言治罪」並非自反右始。但毛謂右派「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這是強詞奪理，典型的毛式霸王兼無賴作風。本條在引毛這段話後寫道：「當然，發言也是一種行為，這樣解釋起來，言與行之間相對的區別也不承認

了。右派分子也只能這樣想才能夠說服自己。」如此評論未免太「費厄潑賴」了。

毫無疑問，毛精通中國語言，正因此，其似是而非的詭辯不可勝數。諸如「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之類均是。出爾反爾也是他的慣技。有一個事例，反右之前的 4 月 10 日，毛曾召見鄧拓等《人民日報》負責人，痛斥鄧是「死人辦報」，沒有報導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此乃其「引蛇出洞」的重要舉措），並幾次批評該報不應出八版，浪費紙張。胡喬木回話說出八版是請示過他的。毛竟詭辯稱：如果是那樣，那是我說了昏話，我的很多話你們都聽不進去，這件事就聽進去了。[11] 窺斑可以見豹，毛之蠻不講理諉過於人凸顯無遺。

如果毛僅是諉過於下屬，則當事人最多丟掉烏紗帽。如鄧拓反右後調職，改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但右派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毛竟悍然加罪於幾十萬響應其號召的言者。為了自圓其說，他以不容反駁的九五之尊身份，振振有詞地恣意玩弄文字遊戲，混淆黑白，指鹿為馬，是可忍，孰不可忍？

總之，右派無罪，罪在毛澤東！（2007-6-4 改稿）

——為 2007 年 6 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

注 釋

1 黎澍《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 171 頁。

2 《反右派鬥爭始末》（上冊）（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第 189 頁。

3 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香港：田園書屋，2007 年 3 月）。

4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39 頁。

5 馮治軍《劉少奇與毛澤東》（香港：皇福圖書，1998）第 275-276 頁。

6 《中共中央文件選輯》第十六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第 573 頁。

7 《毛澤東 1947 年 11 月 30 日給斯大林的電報全文》，《中共黨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8 《劉少奇和他的事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第 436 頁。

9 馮治軍《劉少奇與毛澤東》（香港：皇福圖書，1998）第 294 頁。

10 同上。

11 王若水《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聯書店，1989）第 325 頁。

「反右派運動」的導火線　　葉永烈

《人民日報》質問：這是為什麼?

過去的 2006 年是中國「文革」四十周年祭，而 2007 年則是中國「反右派運動」五十周年祭。

提起 1957 年的「反右派運動」，馬上就會使人記起盧郁文這名字。對於如今的年輕人來說，已經不知道盧郁文為何許人，而在 1957 年卻是中國家喻戶曉的人物——因為那場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運動」，就是從「盧郁文事件」作為突破口開始的。

1957 年 6 月 8 日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反右派運動」就是從這一天開始的。在這一天，《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地位發表了石破天驚的重要社論，以質問的口氣作為題目：〈這是為什麼?〉！

社論一開頭，就提到了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作為「反右派運動」的突破口。社論寫道 1：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因為 5 月 25 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發表了一些與別人不同的意見，就有人寫了匿名信恐嚇他，這封信說:「在報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我們十分氣憤。我們反對你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譚惕吾先生的意見。我們覺得：你就是譚先生所指的那些無恥之徒的『典型』。你現在已經爬到國務院秘書長的寶座了。你在過去，在製造共產黨與黨外人士的牆和溝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還敢為虎作倀，真是無恥之尤。我們警告你，及早回頭吧!不然人民不會饒恕你的!」

在共產黨整風運動中，竟發生這樣的事件，它的意義十分嚴重。每個人都應

該想想：

這究竟是為什麼?

社論在提出「為什麼」之後，對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加以剖示。社論首先對所謂「無恥之尤」加以批駁 2：

盧郁文在 5 月 25 日的發言中講了些什麼呢？歸納起來，一是告訴人們不要混淆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二是說國務院開會時應該有事先準備好的文件，以便討論，免得像資產階級國家的議會一樣每天爭吵，議而不決，不能說就是形式主義，就是不讓大家討論；三是說他自己同共產黨員相處得很融洽，中間沒有牆和溝；如果有些人和黨員之間有了牆和溝，應該「從兩面拆、填」，雙方都要主動；四是說共產黨人對某些批評可以辯駁，這種辯駁不能認為是報復打擊；五是對黨外人士如何實現有職有權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具體意見。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樣不能不問：發表這樣實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見，為什麼就是「為虎作倀」、「無恥之尤」?為什麼要「及早回頭」，否則就「不會饒恕你」？

社論借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加以發揮，點出了主題，亦即開展一場「反右派運動」3：

我們所以認為這封恐嚇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這封信的確是對於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退到革命勝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可是他們忘記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在全國一切進行整風的地方，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風運動使共產黨孤立，想使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孤立，結果真正孤立的卻是他們自己。

在各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份子中，有少數右派分子像盧郁文所說，還想利用辱罵，威脅，「裝出『公正』的態度來箝制人們」的言論，甚至採取寫恐嚇信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 1957 年那場「陽謀」中，毛澤東運用「誘敵深入」的戰略，簡直是熟練極了。

毛澤東早已布好「口袋」，眼看著大批「右派」進入了「口袋」，他在思索著選擇什麼時機下令發起總攻擊。

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抓住了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作為突破口，一聲令下，發起總攻擊，一場急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運動」便席捲中國！

「右派」們罵盧郁文是「小丑」「小人」

「右派」們看了《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大罵盧郁文。

6 月 14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史良 12 日晚在民盟中央小組會議上的發言，揭露了章伯鈞在 6 月 8 日當天關於《人民日報》社論談話 4：

「記得上星期六晚間(6 月 8 日)，伯鈞來找我談話……伯鈞說：『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著寫社論的。而且一再掮出盧郁文來，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

章伯鈞的這一段話，鮮明地反映出他對於《人民日報》六月八日社論的態度。

反映最強烈的，莫過於譚惕吾。她在盧郁文宣佈收到匿名信之際，就當場與之爭論。她看了《人民日報》6 月 8 日的社論，當然非常反感。

據一位自稱「深受過譚惕吾的毒害」的青年、當時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學生劉則智，在題為〈揭露右派分子譚惕吾毒害青年的罪行〉的發言中揭發道 5：

「當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後，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到了譚家，一進門就看見譚惕吾怒氣滿面，手裏拿著《人民日報》罵著說『什麼《人民日報》呀，簡直是混帳，亂登消息，黨報真是豈有此理。』吃午飯時，她忽然把飯碗一摔，罵道：『盧郁文這個王八旦整到我頭上來了。』又說：『什麼匿名信，一定是盧郁文自己寫的。』飯後，她給黃紹竑打電話，也大罵盧郁文，她在電話裏說：『我百分之百保證匿名信是盧郁文自己寫的。』」

後來，譚惕吾在壓力之下不得不作了這樣的「交代」6：

「6 月 14 日我到劉斐家裏去，對劉斐說：『黨怎麼把我的名字和盧郁文的名字並列起來?顯出盧郁文是正確的，我是不正確的』，我批評了盧郁文很多不是，我說：『黨怎麼相信盧郁文而不相信我? 』我還說：『中國歷史上，只有朝代衰落

的時候，才相信小人，現在黨才執政八年，正是興盛時候，為什麼就相信小人?工廠裏的工人都表示擁護盧郁文,這給河南人民心裏產生什麼影響?什麼人不好做旗子，為什麼要用盧郁文做旗子? 』」

〈這是為什麼？〉的內幕

《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是怎樣寫出來的？毛澤東究竟是怎麼策劃的？這麼多年以來，一直是個謎。吳冷西的回憶錄《憶毛主席》終於解開了這個謎。

吳冷西是在關鍵時刻——〈這是為什麼？〉發表的前一天，即 1957 年 6 月 7 日，應毛澤東之約，在胡喬木的陪同下，一起來到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毛澤東的臥室。吳冷西說，那次談話，除了毛澤東、胡喬木和他之外，「沒有其他人參加這次談話。」

吳冷西回憶說 7：

1957 年 6 月 7 日，胡喬木同志通知我，說毛主席要找我談話，要我先到他的住處，然後一起去見毛主席。

這是一個初夏的下午，中南海顯得特別幽靜。我們從喬木同志住處出來，沿著小路走過居仁堂（這是中央書記處辦公的地方，後來拆除了），來到勤政殿（這是毛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的地方，後來也完全拆除了）後面的一個小旁門，進去便是毛主席的住所——菊香書屋。

這是一個不很大的四合院。毛主席通常習慣在北房工作和睡覺，雖然他的大書房在東廂房。這高大的北房是五開間，那裏簡直也是一個書房，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也常在這裏。

我們進去的時候，毛主席正在翻看當天的報紙。他似乎醒來不久，斜躺在兩張單人床合拼成的大床上，已看過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放在左手一邊木板床上，那裏堆滿近期看過或者要看的書，有古籍（大都夾著書簽），也有新書（有些翻開的）。他手裏正拿著文匯報，右邊的床頭桌上還放著好些其他報紙。

毛主席見我們進來就放下報紙，招呼我們在靠床前的椅子上坐下……

吳冷西回憶道，他剛坐下，毛澤東就跟他說起了「盧郁文事件」8：

我們剛坐下來，毛主席就興高采烈地說，今天報上登了盧郁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說他收到匿名信，對他攻擊、辱罵和恫嚇。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

接著，毛澤東向吳冷西說明了為什麼要抓住「盧郁文事件」做文章。毛澤東顯然極具戰略眼光，他是經過深思熟慮，才選擇了「盧郁文事件」作為突破點的。毛澤東以為抓住「盧郁文事件」有兩大好處：第一，盧郁文是非中共人士；第二，那信是匿名的。

吳冷西這樣回憶 9：

毛主席說，這封恫嚇信好就好在他攻擊的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當然署名也可以作為一股勢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們廣泛地聯想到一種傾向，一股勢力。本來，這樣的恫嚇信在舊社會也為人所不齒，現在我們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這樣的恫嚇信就顯得很不尋常。

毛澤東在跟吳冷西談話時，《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其實已經寫好。毛澤東手裏拿著《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向吳冷西解釋了社論的題目〈這是為什麼？〉的含義 10：

過去幾天我就一直考慮什麼時候抓住什麼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

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什麼？〉，在讀者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來思考。雖然社論已經把我們的觀點擺明瞭，但還是讓讀者有個思想轉彎的餘地。魯迅寫文章常常就是這樣，總是給讀者留有餘地。

毛主席說，寫文章尤其是社論，一定要從政治上總攬全局，緊密結合政治形勢，這叫做政治家辦報。

吳冷西還記得，臨走時，毛澤東又在社論上改了幾個字，囑咐胡喬木在翌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並囑咐吳冷西，在當晚就由新華社發出電訊，並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

這清楚表明，《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是由毛澤東親自改定，發表的時間也是由毛澤東決定的。

在一年多之後，毛澤東在另一次講話的時候，又談到了「盧郁文事件」，足見

毛澤東對於他選擇「盧郁文事件」作為「反右派鬥爭」的突破口，以為是他在政治鬥爭中的「得意之筆」。

那是 1958 年 8 月 25 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海灘游泳場休息室，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那時，毛澤東剛下海游泳回來，穿著睡衣就主持開會。出席會議的除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之外，還有彭德懷、王尚榮(總參作戰部部長)、葉飛(福州軍區政委)，胡喬木和吳冷西也參加了。

那天，毛澤東興致很高，高談闊論。吳冷西回憶說 11：

毛主席說，凡事要抓住時機。去年開始反擊右派是抓住了盧郁文事件，批判《文匯報》是抓住了《新民報》作了自我批評。這次炮打金門，就是抓住美軍登陸黎巴嫩。

九年之後，歷史重演，驚人的相似：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從此歷史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公開發動的一天。發動「反右派鬥爭」，毛澤東抓住了「盧郁文事件」，大做文章；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則抓住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大做文章，稱之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對於〈這是為什麼？〉起草者的考證

如今，很多文章斷定〈這是為什麼？〉是毛澤東起草的。其中有尚定著〈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二十年〉12：

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

又如，章立凡在〈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 1957〉中也寫道 13：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發表了毛澤東為該報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

筆者以為,〈這是為什麼？〉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起草並由毛澤東親筆改定，這是無疑的。但是，吳冷西的回憶文章中，並沒有確認〈這是為什麼〉是毛澤東起草的。筆者曾經致電吳冷西秘書，希望他能夠代向吳冷西詢問，吳冷西未予明確答復。

筆者查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以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卷，都未

見收入〈這是為什麼〉。另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也只這麼一句 14：

6 月 8 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

這就是說，中共當局關於毛澤東的三部權威性的書——《毛澤東選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毛澤東傳（1949-1976)》，均未提及〈這是為什麼？〉是毛澤東起草的。

倘若〈這是為什麼？〉不是毛澤東起草，最有可能的起草者當然是胡喬木。筆者是《中共中央一支筆——胡喬木》15 的作者，曾經查閱過《胡喬木文集》等諸多胡喬木著作，也未見收入此文。

由胡喬木起草的 1957 年《人民日報》「反右派運動」的社論共七篇，即：〈為什麼要整風〉（5 月 2 日)、〈是不是立場問題？〉（6 月 14 日)、〈不平常的春天〉（6 月 22 日)、〈鬥爭正在開始深入〉（7 月 8 日)、〈黨不能發號施令嗎？〉（7 月 10 日)、〈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7 月 18 日)、〈人可以不問政治嗎？〉（7 月 23 日)。

會不會是陳伯達起草呢？筆者也是《陳伯達傳》16 的作者，曾經多次採訪陳伯達本人。陳伯達當時忙於為毛澤東整理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沒有可能為《人民日報》起草社論。

1957 年 6 月 8 日當天，毛澤東給陳伯達寫了一封信 17：

陳伯達同志：

此件請參酌。如果文件今晚搞不完，明日下午二時交我也可以。

毛澤東

六月八日

毛澤東在信中提到的「此件」，是指當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陳正人對〈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三稿寫給毛澤東的意見信。毛澤東所提到的「文件」，則是陳伯達正在為毛澤東作修改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四稿。陳伯達當時在開夜車修改〈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當然也就無暇起草《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的作者究竟是誰？尚待查證。

當然，筆者並不排斥〈這是為什麼? 〉是毛澤東起草的這樣的推測，但是必

須言之有據——依照原始文件案進行證實。

盧郁文其人

在《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之前，盧郁文此人雖說並不廣為人知，卻也頗有來歷。

1949年，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不得不派出「和平商談代表團」和中共談判。

這年3月24日，南京政府公佈了代表團名單，內中便有盧郁文其人：

首席代表：張治中

代表：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28日又補劉斐)

秘書長：盧郁文

顧問：屈武、李俊龍、金山、劉仲容

除此之外，盧郁文的身世鮮為人知。由於盧郁文先生已經故世，我在1989年曾通過民革中央希望採訪盧郁文親屬。民革中央告知了盧郁文之子盧存學先生在廣西桂林的通訊處。這樣，我多次與盧存學先生通信，詢問有關盧郁文的生平。後來，盧存學先生又從桂林遷往廣西北海。2005年9月，我前往北海採訪，得以與盧存學先生暢談。

盧存學先生向我詳細地講述了父親盧郁文的一生，大致上可以歸納如下18：

盧郁文，原名盧光潤，字玉溫，後來據「玉溫」諧音改名郁文。1900年12月10日，出生於直隸（今河北）昌黎（原盧龍縣木井鎮盧柏各莊）的大戶人家。1922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堂英語系。1925年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國國民黨。1929年自費前往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回國後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講師，民國大學教授，河北法商學院經濟系主任、教授，國民黨政府經濟部、糧食部參事。抗戰勝利後，任新疆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1949年任南京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秘書長到北平參加和談。後留居北平。同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此後，任政務院參事，國務院秘書長助理。在「反右派運動」之後，任國務院副秘書長。他還擔任民革第三屆中央委員、第四屆中央常委，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兼副秘書長。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968年10月6日因突發性心肌梗塞病逝於北京。

在盧存學先生所講述的父親盧郁文漫長一生之中，在我看來，有幾個人生關鍵點值得細敘。從這幾個關鍵點可以看出，盧郁文的「左派人士」的面目是如何形成的，這也正是盧郁文在 1957 年 5 月 25 日說出那番「左派」言論的原因。

我沿著盧郁文的人生軌跡尋找他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時，注意到他與楊秀峰的親密友誼。

楊秀峰原名楊秀林，年長盧郁文三歲，河北遷安縣人，1929 年赴法留學，1930 年在法國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後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高等教育部部長。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盧郁文便結識楊秀峰——當時叫楊秀林，成為摯友。楊秀峰與盧郁文先後赴法國、英國留學。楊秀峰是公費生，盧郁文是自費生（他當時向朋友借了一筆錢前往英國）。盧郁文在倫敦陷入經濟困境時，楊秀峰省下錢匯往英國，接濟盧郁文，由此可見他們之間非同尋常的友誼。解放後，盧郁文在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時，曾把自傳寄給楊秀峰，楊秀峰給予熱情的鼓勵。

我又沿著盧郁文的人生軌跡，尋找他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找到了關鍵人物張治中。

盧郁文在 1944 年奉派前往新疆，擔任新疆財政廳廳長兼田賦糧食管理處處長、新疆銀行董事長。當時新疆的省主席為吳忠信。不久，吳忠信卸任，由張治中繼任。盧郁文與張治中在新疆共事一年多，結下深厚友情。抗日戰爭結束之後，盧郁文要求返回南京工作。臨行，張治中修書一封，讓盧郁文帶到南京面呈蔣介石。張治中在致蔣介石的親筆信中，稱讚盧郁文「此人品學兼優，堪以重任」。就這樣，盧郁文在南京拜謁蔣介石之後，得到蔣介石的信任。正因為這樣，1949 年南京政府組成和平談判代表團的時候，張治中被蔣介石任命為團長，而張治中則推薦了盧郁文為代表團秘書長。在盧存學家中，我見到許多張治中致盧郁文的親筆信，在盧郁文的日記中也不斷寫及張治中，他與張治中的密切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共產黨的和平談判代表團團長是周恩來。在談判過程中，盧郁文與周恩來有了許多接觸。

值得提到的是，在和平談判期間，毛澤東約見了盧郁文和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團員李蒸。

那是 1949 年 4 月 11 日清早，應毛澤東之約，盧郁文和李蒸乘轎車從北平市

內前往郊外香山的雙清別墅。當時，毛澤東住在那裏。一見面，毛澤東就說：「二位都是大學教授，我才是中學教員。」盧郁文跟毛澤東一見面，就領教了毛澤東的風趣。盧郁文說：「毛先生起床這麼早哇！」毛澤東的回答出乎盧郁文的意外：「我還沒有睡覺呢！」盧郁文這才知道，毛澤東通宵工作，尚未休息。那天上午，毛澤東就和平談判問題，與盧郁文談了三小時。毛澤東還請盧郁文和李蒸吃中飯，毛澤東夫人江青作陪。有了這次長時間的直接交談，盧郁文給毛澤東留下了印象，這也是導致在 1957 年毛澤東選擇盧郁文作為「反右派運動」的突破口的原因之一。

南京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和談破裂之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談判代表團在周恩來的力勸之下，留在了北平。作為代表團的秘書長的盧郁文，也就從國民黨官員變成了共產黨的統戰對象。以周恩來為總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成立之後，盧郁文出任政務院秘書長助理。這時，盧郁文兩度寫入黨申請書，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勸他暫時不要入黨。周恩來對盧郁文說，你在黨外比入黨起的作用更大。

據盧郁文之子盧存學在 2007 年 2 月 27 日告訴筆者，當局要給盧郁文安排秘書和司機的時候，盧郁文強調說，我的秘書、司機必須是中共黨員！最使盧存學感到不可理解的是，每當他給父親盧郁文寫信，盧郁文總是把信給秘書過目。在盧存學得知此事之後，對父親說：「我給你的信是家信，為什麼要給你的秘書看？」這時，盧郁文說了一句「名言」：「我是『無話不可對黨言』！」

正因為這樣，在 1957 年，盧郁文會以「左派分子」的面目出現，發表了那麼一番談話。盧郁文駁斥「右派分子」說，他自己同共產黨員相處得很融洽，中間沒有牆和溝。從盧郁文的角度看來，確實如此，因為他已經是在組織上沒有入黨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當然會「同共產黨員相處得很融洽」。

「左派」父親與「右派」兒子

在與盧郁文之子盧存學長談中，我注意到一個強烈的反差：盧郁文在 1957 年成為「反右英雄」，而他的兒子盧存學卻成了「右派分子」！

這一強烈反差，在 1949 年正好相反：那時候，盧郁文是國民黨高官，他的兒子盧存學卻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員。

盧存學原本在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上學。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後，盧存學與在南京的父親盧郁文失去了聯繫。當時，盧存學受共產黨的影響，在 1949 年 3 月 10 日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一分團一大隊一中隊的成員，住在北平東四。

1949 年 3 月 31 日，盧郁文作為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的秘書長，飛往北平，下榻于六國飯店。坐落在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是由英國人在 1900 年建造的，在當年是北平屈指可數的高級賓館。4 月 1 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抵達北平的新聞，盧存學欣喜地得知久別的父親盧郁文是代表團成員，也來到北平。不過，父子分屬於對立的政治營壘，不能隨便來往。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駐地，戒備森嚴。

盧郁文也掛念兒子。他通過中共代表團秘書長齊燕銘，找到了盧存學。4 月 3 日，中共代表團通知盧存學，可以前往六國飯店探望父親盧郁文。

從東四到東交民巷沒多遠。盧存學一身戎裝，步行來到六國飯店，正值吃中飯的時候。盧郁文帶著盧存學來到餐廳，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差不多都在那裏。盧郁文向代表團成員們介紹了自己的兒子。當代表團成員們見到穿著軍裝的盧存學別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胸卡，都非常驚訝。團長張治中笑道：「來呀，進步的兒子跟反動的老子打一架！」

在 1949 年，兒子代表「進步」，老子代表「反動」，而到了 1957 年則顛倒過來，老子代表「左派」，兒子成了「右派」。

那時候，盧郁文在國務院任職，住在北京手帕胡同，而盧存學則在桂林的《桂林日報》擔任副刊編輯。

當盧存學從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報》讀到社論〈這是為什麼？〉的時候，驚訝地發現這篇重要社論是以他的父親盧郁文收到匿名信為由頭寫的。在那些日子裏，父親盧郁文成為中國的新聞人物，爭議人物：「工農兵」以及「左派」們表示支持盧郁文，譴責那封匿名信，而「右派分子」們則稱盧郁文為「小丑」。

盧存學擔心父親的安全，就向報社領導請了假，前往北京探望父親盧郁文。到了北京，父親盧郁文告訴他，家中都平安，而且家附近似乎有便衣警衛在巡邏，以防不測。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裏，盧郁文問起兒子對於「反右派運動」的看法。盧存學

說，那只是上層的事，反的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跟他這樣當年參加南下工作團的熱心青年無關。盧郁文聽罷，批評兒子的「覺悟太低」！

盧郁文問起兒子在報社裏的情況，盧存學說起自己跟報社領導關係不好。總編輯年紀跟他相仿，常常盛氣淩人，他受不了。副總編輯待人還不錯，但是水平太低。盧郁文一聽，非常焦急。盧郁文特地抽出時間，把兒子拉到北京中山公園，在一個僻靜的小山坡上跟盧存學長談。盧郁文尖銳地批評兒子有驕傲自大的情緒，發展下去非常危險。盧郁文告誡兒子：「領導不管水平高低，他代表党。你對他不滿，就是反黨！因為你不可能直接反對黨中央。在中央的反右派鬥爭中，凡是對黨員提意見的，甚至對擁護党的積極分子提意見，都被視為反黨。你回去要趕快認錯檢討。」

盧郁文深為兒子的命運擔憂。1957 年 8 月 6 日，當盧存學要回桂林的時候，盧郁文寫了這樣一首詩送他，表達了對兒子的一片深情：

念兒將去苦日短，

盼兒來時何日長。

千里迢迢思送別，

一心伴兒到灕江。

盧存學從北京回到桂林，這才明白父親對於「反右派運動」形勢的估計是何等的準確。盧存學說，一進報社，「編輯部的同事們見到我時面部肌肉一概繃緊，特別是兩位領導，決不在我面前露一絲笑容」。儘管報社裏人人都知道盧存學的父親盧郁文是「反右英雄」，可是仍無法挽救盧存學覆滅的命運。1958 年 4 月 16 日，「右派分子」的帽子，果然戴到了盧存學的頭上。

盧存學說，父親盧郁文得知他成為「右派分子」，馬上向組織上彙報：「我的兒子墮落為可恥的右派！」

盧存學說，那時候父親盧郁文不斷給他寫信，進行教育，其中有不少「警句」：

「你說你從心裏沒有反黨，我相信，但誰能證明？左派的心和右派的心挖出來都是血淋淋的一塊肉。」

「要知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欲減之罪也是何患無辭的。」

「你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了嗎？主觀主義自以為是還不當右派嗎？」

盧郁文最令人難忘的對兒子所說的「名言」是：

「要像追女朋友那樣接近黨員、進步分子；要用實際行動的大筆把過去的污點一揮抹掉！」

盧存學成為「右派分子」之後，降級降薪，每月工資只有三十五元。省下兩個月的工資，還不夠去北京的往返車費。好不容易回趟家，在家中處於低人一等的地位，他連家中的水果都不敢吃！

直到 1960 年國慶日，盧存學終於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即便如此，他仍是「摘帽右派」。他仍不斷受到折磨。1961 年在「向党交心」中再度中了「陽謀」的圈套，甚至被關進看守所……

從 1964 年起，盧郁文擔任全國政協常委兼副秘書長、民革中央常委兼副秘書長。當「文革」風暴席捲中國的時候，盧存學又挨批鬥。不過，盧郁文由於被列為「保護對象」，所以未受紅衛兵的衝擊，只是在「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中被取消公家配備的轎車、電話。

1968 年 10 月 6 日，六十八歲的盧郁文剛剛吃過晚飯，突發心肌梗塞，當即去世。經全國政協請示周恩來，周恩來又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批准為盧郁文舉行追悼會，《人民日報》也為盧郁文的去世發了消息。在「文革」歲月，盧郁文病逝能夠受到這樣的禮遇，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經歷了「反右派運動」和「文革」的劫難，盧存學先生頗為感歎。他說：

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怎麼會有這樣適合迷信、野蠻、瘋狂、殘酷、排外、非古的毒菌生長的土壤，不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傳統意識根源的嗎？

盧存學先生還指出：

中國人因可憐而醜陋，因醜陋而更加可憐，應該到頭了！我們應該學會思考和辨別。

追蹤匿名信的來龍去脈

「反右派運動」的導火線是盧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

關於盧郁文收到的匿名信，當時很多人猜測純系子虛烏有，是盧郁文「製造」出來的。誠如譚惕吾所言：「我百分之百保證匿名信是盧郁文自己寫的。」

三十年後，戴晴在《儲安平與黨天下》一書中也寫道：「盧郁文，民主人士，

在鳴放階段幾次提醒，向黨提意見要實事求是，不應只講缺點不講成績。後來據稱為此接到謾罵威脅的匿名信，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筆者至今傾向于這是一場類似國會縱火案式的小把戲。」

盧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是否真有其事？筆者曾致函詢問盧郁文之子盧存學先生，承他於 1996 年 3 月 5 日復函：

關於匿名信的真偽問題：

1957 年夏，我由於擔心父親的安全，特地從桂林回京探親，曾詢及匿名信之事，父親說，那信是從北京以外的河北省某地發來的(我已不記得是保定還是石家莊)。

我還看了一批父親沒有來得及上送的信，其中大多數是表示同情和安慰的，也有個別持不同意見的。

無論如何不至於如譚惕吾、章伯鈞說的是自己寫的。況且，父親說匿名信上繳之後，有關方面已在我家(西單手帕胡同)附近採取了保護措施。

從盧郁文之子盧存學先生的復函中可以看出，盧郁文當時確實收到了匿名信，而這匿名信並不是他「自己寫的」。

不過，我經過採訪表明，盧存學先生所回憶的「那信是從北京以外的河北省某地發來的(我已不記得是保定還是石家莊)」是不確切的。

那封匿名信的信封上所蓋的郵戳，清楚地印著「北京海淀」。

海淀，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因為北京大學就在海淀，我在北京大學讀了六年書。海淀還是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的所在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科學院構成了海淀的「知識份子三角地」，數以萬計的知識份子集中在那裏。寫匿名信的人，理所當然是非常關心政治的知識份子。正因為這樣，那封匿名信從北京海淀這個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寄出，是完全符合邏輯的。

這封匿名信既然成了「反右派運動」的導火線，上了《人民日報》社論，公安部列為頭等要案查辦。公安人員判定，寫匿名信的人，就在海淀。雖說也有可能是寫信者住在北京別的地方甚至其他城市，為了迷惑破案者，特地跑到北京海淀寄信。不過，公安人員以為，這種可能性不大。他們把偵查的重點，放在了北京海淀。

對於破案有利的一面是那封匿名信用的是真實的筆跡。通常，很多匿名信是

以左手書寫，或者用印刷體書寫，以求隱蔽作案者真實的筆跡。那封匿名信既然用的是真實的筆跡，那麼通過核對筆跡，就可以破案。

然而，對於破案也有著極其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北京海淀有那麼多知識份子，浩如煙海。公安人員首先從這一地區的「右派分子」著手，核對筆跡。在他們看來，匿名信的作者極有可能是「右派分子」，只有「右派分子」才會那樣痛恨「左派分子」盧郁文。

不過，在海淀，即便是「右派分子」，也數量眾多。光是北京大學，就有五百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除了「右派分子」之外，那些歷史上有過問題或者表露出對共產黨不滿情緒的人，也在公安人員的懷疑名單之中。

公安人員暗中調閱文件案，核對筆跡。

然而，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一直未能破案，這使人們更加相信譚惕吾所作的判斷：「我百分之百保證匿名信是盧郁文自己寫的。」

就在將近三年之際——1960 年 3 月，我正在北京上大學。一天，學校裏忽然傳達緊急案情：有人竟敢冒充周恩來總理筆跡，以國務院名義，從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騙走二十萬人民幣!公安部門印發了那偽造筆跡的影印件，發動群眾辨認。

那是 1960 年 3 月 18 日下午 5 時 40 分，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西交民巷的中國人民銀行傳達室進來一個自稱是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工作人員的人，遞上一個淺棕色牛皮紙信封。信封上用毛筆書寫：「速送（限下午五點四十分前送到）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親啟」。信封是國務院用封，信封內是一份批件，內容是：「總理：主席辦公室來電話告稱，今晚九時西藏活佛舉行講經會，並有中外記者參加，拍紀錄影片。主席囑撥一些款子做修繕寺廟用，這樣可以表明我們對少數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據以上情況，擬撥給人民幣十五萬至二十萬元，可否請批示。」周總理的批示為：「請人民銀行立即撥給現款二十萬元。」旁注有：「為了避免資本主義國家記者造謠：①要市場流通舊票。②拾元票每捆要包裝好一些。七時以前務必送到民族飯店趙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務部）」。當晚七時，銀行發行局的三名幹部把裝有二十萬元現款的兩個麻袋送到民族飯店，交給了等候的「趙全一」。

為了迅速偵破此案，公安部門大量印發了那封信影印件，發動北京各單位辨認筆跡。

只花了半個月——4 月 3 日，作案者外貿部出口局計畫處科員王倬被捕。

就在破獲王倬案件之後不久，那個三年未破的匿名信案件也被公安部門偵破了。

2006 年 12 月 8 日，我採訪了匿名信案件的見證人之一宋兆麟先生。他當年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九五五級的團支部書記。

據宋兆麟先生回憶，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是五年制，在 1960 年 7 月末，他們已經畢業，正處於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的時候。突然，年級的黨支部書記穆舜英找到他，要他執行一項緊急任務：趕緊到「校衛隊」（注：「校衛隊」是當時北京大學的保衛部門）去，公安人員在那裏等他。公安部門要逮捕他的同班又同宿舍的同學楊秉功。由於公安人員不認識楊秉功，黨支部書記穆舜英要他為公安人員指認楊秉功。

當時，宋兆麟非常震驚，因為他跟楊秉功同窗五年，從未覺得楊秉功有什麼出格的行為。不過，黨支部書記這麼指示，作為團支部書記的他只得服從、照辦。

宋兆麟來到了北京大學「校衛隊」，公安人員向他出示了逮捕楊秉功的逮捕證。於是，宋兆麟帶領公安人員來到文史樓附近的一座平房，他知道楊秉功常在那裏看書。

當公安人員突然出現在楊秉功面前，並出示了逮捕證，楊秉功起初楞了一下，但是很快就鎮定下來。他沒有問為什麼要逮捕他，這表明他明白逮捕他的原因。他只是默默地聽從公安人員的吩咐，從平房前往宿舍，收拾好行李，跟隨公安人員走了……

據楊秉功的同學馬文寬告訴筆者，楊秉功被捕之後，歷史系 1955 級全體同學緊急集合，校方負責人向同學們宣佈了楊秉功因在 1957 年寫匿名信攻擊盧郁文而被捕。當時，同學們非常震驚，誰都沒想到那封轟動全國的匿名信，會出自同學楊秉功之手。

不久，北京大學校長陸平在全校大會上宣佈，本校歷史系學生楊秉功在 1957 年寫匿名信攻擊盧郁文而被捕。當時，北京大學出現「反標」（即「反革命標語」）事件，陸平以楊秉功為例，說「楊秉功雖然隱藏了三年，最終還是被偵破」，陸平借此警告「反標」的作案者，儘早向組織坦白。

楊秉功被捕的消息，當時沒有見諸於媒體。正因為這樣，直到 1997 年，戴晴

在《儲安平與黨天下》一書中才會對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作那樣的推測：「筆者至今傾向于這是一場類似國會縱火案式的小把戲。」

據北京大學歷史系 1957 級的王曾瑜回憶，1960 年夏，五五級一位楊秉功師兄，在未名湖貼出一張匿名小字報，說是廣西餓死人，於是在分配前夕被捕。當傳達時，消息閉塞的我根本不相信會有餓死人的事，還真以為這個反革命分子造謠惑眾呢。

楊秉功是在調查少數民族歷史時去了廣西，得知廣西餓死人的情況。那張「匿名小字報」引起了公安部門的注意，發現筆跡與 1957 年寫給盧郁文的匿名信相同。

據宋兆麟告訴筆者，楊秉功並不是「右派分子」。在 1957 年的大鳴大放中，儘管他們班級中出了三個「右派分子」，但是楊秉功沒有什麼「右派」言論。在「反右派運動」中，楊秉功也跟同學們一樣參加了對班級裏的「右派分子」的鬥爭。正因為這樣，楊秉功居然是那封匿名信的作者，這完全出乎同學們的意料。

宋兆麟記得，楊秉功是河南人，家庭困難，當時申請了助學金。

楊秉功的另一位同學告訴筆者，楊秉功富有正義感。楊秉功是歷史系學生，知道當年盧郁文是國民黨政府的「紅人」，投誠共產黨之後，又成為民主人士中的「紅人」。楊秉功看不慣盧郁文的為人，所以才會以匿名信的方式表達自己對於盧郁文的不滿。至於楊秉功的匿名信居然會上了《人民日報》社論，居然會被毛澤東看中作為「反右派運動」的突破口，這是年輕的楊秉功始料不及的。

楊秉功的這位同學對筆者說，楊秉功給盧郁文寫了匿名信，表達自己的不滿，這是完全可以的。楊秉功沒有在信中署名，是由於當時中國社會的不民主所造成的，「高壓政策」迫使楊秉功只能以匿名信表達自己的意見。楊秉功寫給盧郁文的信，即便個別詞句有點情緒化，那也不能作為「反革命罪證」來逮捕他。楊秉功因此入獄多年，是「以言定罪」、「高壓政治」的體現。

楊秉功的這位同學回憶，1998 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時候，滿頭白髮的楊秉功出現在同學會上。楊秉功經歷了種種苦難，在出獄之後，終於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他也當上了縣政協委員。

筆者經過多方打聽，終於撥通了楊秉功的電話。他一聽我的名字，就稱我為「老校友」。他的語氣是那麼的平靜、平淡 19：「1957 年，我只二十五歲，年輕人一個，血氣方剛。如今半個世紀過去，老校友，不必舊事重提了吧。我沒有什麼

可以說的。現在，我算是有碗飯吃，生活還算過得去。」(2007 年 4 月 15 日改定於上海「沉思齋」)

——2007 年 6 月 30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注 釋

1 1957 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

2 1957 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

3 1957 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

4 1957 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報》。

5 《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譚惕吾反動言行大會發言彙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整風辦公室 1957 年編印。

6 《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譚惕吾反動言行大會發言彙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整風辦公室 1957 年編印。

7 吳冷西，《憶毛主席》，一五五至一五六頁，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8 吳冷西，《憶毛主席》，三九頁，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9 吳冷西，《憶毛主席》，四〇頁，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10 吳冷西，《憶毛主席》，四〇頁，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11 吳冷西，《憶毛主席》，七六頁，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12 尚定，《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 20 年》，一九九頁，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

13 章立凡，《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 1957》，《黃河》，一九九七年第六期。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七〇五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

15 葉永烈，《中共中央一支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初版，廣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二月增補再版。

16 葉永烈，《陳伯達傳》（上、下卷），人民日報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1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1956.1-1957.12），四九九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18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日，採訪盧存學于廣西北海。

19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九日，電話採訪楊秉功。

評析右派三大理論　　葉永烈

毛澤東曾這樣說:「帝國主義、蔣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氣的。比如臺灣、香港的反動派，對儲安平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是很擁護的。」1

毛澤東所提到的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被稱為右派的「三大理論」，即「右三論」，受到最猛烈的批判。

其實，這右派的「三大理論」，是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再三「動員」，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才終於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發言。在他們發言之後，這才發覺，進入了毛澤東的「伏擊圈」。

也正因為「右三論」被毛澤東指為「右派分子向党進攻」的最具代表性言論，所以即便在後來給「右派分子」們平反的時候，「右三論」的提出者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未予「改正」。也就是說，直至今日，在中共眼中，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依然是「右派分子」，原因是他們在 1957 年提出了「右三論」。

這「右三論」究竟是怎樣提出的呢？

章伯鈞提出「政治設計院」

1957 年 5 月 21 日下午，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進入了第八次會議。

章伯鈞發話了。由於章伯鈞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兼《光明日報》社社長，在民主人士中，舉足輕重，所以他的發言很引人注目。

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第一次座談會上，章伯鈞講過幾句

無關痛癢的話。直至到了第八次座談會，他這才說了一些有分量的話。

章伯鈞這一回的發言，提出了關於「政治設計院」的設想。

章伯鈞先是說：「今天，我談個人的意見。近二十天來，全國各地都在談論人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正常的。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民主精神，已經取得了極大的效果。……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接著，章伯鈞談及了「政治設計院」。

以下是《人民日報》所載章伯鈞發言的原文，標題是《現在工業上有設計院，可是政治上沒有設計院》。章伯鈞說：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2

這就是著名的「政治設計院」的來歷。

這段話，不論是從頭至尾，或者是從尾至頭，反反復複地捉摸，也看不出有什麼「出格」的地方。

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是指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而不是別的什麼。他的「政治設計」的含義，無非是指「政治上的基本建設」，先交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這四個「政治設計院」討論，因為「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章伯鈞在發言中，批評了國務院。他說：

「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

章伯鈞的這段話，是希望把國務院也作為「政治設計院」。他作為交通部長，常常出席國務院會議。在他看來，國務院開會，應是「政治設計」會議，即讓部長們都參予設計，而不是「拿出成品」。

章伯鈞這一段話，後來被列為「著名右派觀點」。

羅隆基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

就在章伯鈞提出「政治設計院」的翌日，5 月 22 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第九次座談會上，中國民主同盟的另一位副主席羅隆基發言了。

羅隆基提出應該成立「平反委員會」，後來又成了「著名右派觀點」。

羅隆基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

1955 年 5 月，胡風在北京家中被捕，罪名是「反革命」。緊接著，一場聲勢浩大的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席捲中國大陸。羅隆基對此搖頭，他曾對朋友說：「胡風會是反革命？我不相信！」

羅隆基對於「肅反」、「三反」、「五反」中的過左行為，也頗有微詞。

既然中共開展整風運動，中共中央統戰部一次又一次召開座談會，竭誠地歡迎民主人士提意見。羅隆基有話在肚子裏，擱不住，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即成立一個「平反委員會」，以糾正以往運動中的冤案。

以下是 1957 年 5 月 23 日《人民日報》關於羅隆基發言的報導：

「他談到顧慮與保證問題，他說：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並保證『鳴』『放』得好，我覺得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成員和其他方面人士參加的委員會，以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屈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示過，由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成立一個機構來檢查肅反偏差。他擁護這主張。他說，成立這麼一個委員會有三大好處：

一、可以鼓勵有意見的人向委員會申訴。地方上的一些知識份子都希望有說話的地方，並且希望『條條道路通北京』，認為有意見傳到北京，就是『上情下達』。因此，有了這個委員會，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於沒地方申訴。

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昆侖先生說，現在有人以為今天的『鳴』『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實這不外是經驗主義者錯誤的主觀主義設想出來的公式。過去許多大運動造成一些隔閡。過去的運動都有平反工作。不過，過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會把意見轉給地方，地方又將意見轉給有關單位領導的組織去處理。這樣就很難做到『有錯必糾』了。如果成立了這麼一個委員會，那就可以將平反的機構和『三反』、『五反』、『肅反』的機構分開來。過去的運動是共產黨領導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黨派人士參加，那就更有利於做平反

工作。

三、在『鳴』『放』中，就有人有顧慮。誰也不敢保證，對『放』與『鳴』絕對不會有人打擊報復。有了這個委員會，受到打擊報復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員會控訴。這樣，有報復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報復的人也有路可走。

這樣的委員會，中央有，地方也應該有，而且中央可以領導地方的這樣的委員會；

全國有這麼樣的有系統的機構，一定能夠保證『鳴』『放』得好。我這個僅是建議，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當。」3

儲安平向「老和尚」提意見

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總共開了十三次。

已近尾聲，中共中央統戰部查對了重要民主人士名單，發覺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尚未發言。於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打電話給儲安平，請他務必在六月一日所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一次發言。

儲安平從命，在 6 月 1 日的座談會上，作了頗為直率的發言。他是事先寫好發言稿，照著稿子念的。那發言的題目就夠驚人的：《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光明日報》那時是「中國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報」，社長為章伯鈞，總編輯便是儲安平。

儲安平其實是在 1957 年 4 月 1 日才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在他作那番發言時，他上任不過整整兩個月。

儲安平作為民主人士，怎麼會忽然在 1957 年的大鳴大放中，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呢?

《光明日報》在當時雖說是一張中國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報，但是歷任總編輯都是中共黨員：第一任胡愈之，第二任邵宗漢，都是中共黨員。

內中胡愈之，向來有「黨外布爾什維克」之稱。他的公開身份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胡愈之在 1986 年去世之後，這才公開了他的身份：「中國共產黨的

優秀黨員」。不過，胡愈之是中共特別黨員，對外不公開身份，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從事社會活動。也正因為這樣，最初由胡愈之負責創辦《光明日報》，可以說是最佳人選。

胡愈之在擔任《光明日報》總編後，由於他又擔任了出版總署署長，工作太忙，所以一年後由邵宗漢繼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光明日報》第三任總編輯，亦即儲安平的前任常芝青，也是中共黨員。不過，他的中共黨員身份是公開的。1957 年 3 月 10 日，毛澤東在接見新聞出版界人士時，忽然問起《光明日報》總編常芝青:「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常芝青當即據實回答:「是。」 緊接著，毛澤東說道:「共產黨替民主黨派辦報，這不好吧！」

毛澤東一言定音。於是,《光明日報》社趕緊物色民主人士擔任總編輯。儲安平成了最佳人選。儲安平有著辦《觀察》週刊的豐富經驗，又是身兼兩個民主黨派的成員。就在毛澤東說了那句之後的第二十天，儲安平走馬上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儲安平後來在交代中, 曾這麼說及自己為什麼會在 6 月 1 日的座談會上發言:

「解放以後，一般說來，我很少在外面說話。鳴放開展以後，也很少講話。九三、作家協會來邀，都未發言，多少採取逃避的態度。一則我對發言的積極性不高，二則我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問題要談。所以統戰部座談會開得很久，我一直沒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統戰部來電話要我去。我答應去，但說明不發言。下午聽說六月一日還要開會，統戰部彭處長希望我六月一日發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還在報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寫發言稿，那天上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沒有外出。伯鈞同志說我的發言稿羅隆基看過，並無此事。」

應當說, 儲安平的發言，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以來,言辭最為尖銳的一個。

儲安平說:「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

他的這句話，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稱為「老和尚」，把一般的中共幹部稱為「小和尚」，夠「驚人」的。

儲安平正兒八經地「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了：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 年開國以

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党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4

儲安平在發言中，批評了「黨天下」：

「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党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亟需調整的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党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党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5

儲安平的發言，把大鳴大放推上了最高潮。

他剛講畢，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便連連用英語稱讚說：「Very good！Very good！」(很好！很好！)

第二天，《光明日報》全文刊登了儲安平的《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人民日報》也詳細加以報導。那時的中國還沒有電視，重要新聞由電臺廣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新聞節目中播出了儲安平的發言。

這樣，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座談會上，經過一次次鼓勵，終於頗有「收穫」，即「湧現」了右派的「三大理論」：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

吳晗首先批判「右三論」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欽定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從此「反右派運動」正式開始。社論發表之後，儘管毛澤東接連以中共中央名義對黨內發佈「反右派」指示，但是他自己絕不公開出面批判「右派」，連中共中央負責人也很少出面講話。

毛澤東深謀遠慮。

他採取的「反右派」策略，第一步棋先是以「工人說話了」打頭陣，造成一種熱烈的群眾運動的氣氛。

第二步棋是發動各民主黨派中的左派人士對「右派分子」發起猛攻。

這樣，「反右派運動」最初是在民主人士中展開：左派民主人士批判「右派」民主人士。

翻開 1957 年 6 月 8 日之後的《人民日報》，滿版滿版的是左派民主人士頭面人物對於「反右派運動」的擁護發言，以及對於「右派」們的揭發和批判：

在「反右派」之初，並不知道誰是「右派」，也沒有劃分「右派」的明確的標準——雖說中共各級組織已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內部定下左中右名單，但那畢竟只是內部掌握，並不公佈於眾。

所以，最初的反擊火力，只是集中譴責「匿名信事件」和批判葛佩琦——因為葛佩琦的言論太明顯了，誰都以為葛佩琦必定是「右派」。

第一個把反擊的火力指向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這三大「右帥」的，第一個提出「右三論」概念的，是吳晗。

那時，吳晗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員。

吳晗似乎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他因寫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文革」中第一個遭到炮擊。姚文元抨擊他為「右傾機會主義翻案」。然而，他在 1957 年卻衝鋒在「反右派」的第一線。

其實，這並不矛盾：他在 1957 年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此後他寫《海瑞罷官》也是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辦，毛澤東看了《海瑞罷官》曾熱烈地鼓掌。只是風雲變幻，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選擇了他曾讚賞過的《海瑞罷官》開刀，稱此劇的「要害」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翻案」，吳晗也就在「文革」中含冤西去……

當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的翌日，吳晗就在中國民主同盟中國人民大學支部座談會上明確指出：

「我對於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意見，完全不同意。因為他們的意見是離開党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方向的。我們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對於不正確的意見，應該展開反批評。一切違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都是錯誤的。」6

6 月 10 日，《人民日報》對吳晗的以上談話，加了大字標題發表：吳晗表示應該批判章伯鈞等人的意見。

也就在這一天，吳晗接見《人民日報》記者，發表了長篇談話。

6 月 11 日，《人民日報》迅即發表吳晗的談話，題為：《吳晗談話批駁章伯鈞羅隆基》《人民日報》還為吳晗談話加了四行黑體副題：

「章伯鈞主張另搞一個政治設計院，是否不同意憲法?」

「羅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機構，就是不信任党的領導」

「儲安平『黨天下』的論調是惡毒的誣衊」

吳晗一下子就抓住了三大「右帥」的要害——三大「右派」理論。他分別「右三論」進行批判。

吳晗首先批駁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

「憲法序言中講到我國的統一戰線由共產黨領導。政協章程也說要進一步加強党的領導和核心作用。各民主黨派也都承認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作用。所謂領導，應該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問題的領導。如果離開這種領導，另搞一個政治設計院，這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憲法精神和政協章程，不滿意共產黨的領導呢?」

接著，吳晗批判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

「這個意見牽涉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他對党領導的『三反』、『五反』、『肅反』等機構是不信任的。一個是他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一個最高權力的立法機關，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這樣一個協商機關，下降或者改變為司法行政機關，這和這兩個機關的性質是不符合的。」

吳晗非常尖銳地批判了儲安平的「黨天下」：

「儲安平作了一個很引人注意的發言，這個發言的目的是離開党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方向。他提出了『黨天下』的名詞。在國民黨統治時代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那時候的『黨天下』就是『蔣家天下陳家黨』，這怎麼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語呢?這是一種惡毒的誣衊。」7

可以說，在最初的反擊中，吳晗的批判是最有「水平」的。

當然，吳晗的談話可能跟他寫《海端罷官》最初是胡喬木授意的一樣，極可能是中共方面授意的。只是吳晗從未談及這一幕後的情形，所以也就不得而知了。

由於吳晗指明了「反右派運動」的鬥爭方向和鬥爭目標，即批判「右三論」以及提出者「右三帥」，全國的「反右派運動」就集中批判「右三論」，批判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

重溫「右三論」，懷念「右三帥」

「右三論」的提出，其實各有各的背景。

「政治設計院」一詞，並非章伯鈞的發明，最初倒是毛澤東講的！章伯鈞只不過借用毛澤東的話，加以發揮罷了。

大約正因為這樣，後來毛澤東雖然曾多次批判了章伯鈞提出的「政治設計院」，但是他並沒有否定「政治設計院」本身。

1957 年 10 月 13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所作的題為《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講話中，這麼說及：

「這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是中共中央這個政治設計院設計出來的，不是章伯鈞的那個『政治設計院』設計出來的。」8

這段話清楚表明，毛澤東並不反對「政治設計院」本身，而是以為政治要由

「中共中央這個政治設計院設計出來」，絕不能由別的「政治設計院」來設計。

章伯鈞主張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也作為「政治設計院」，無非是向中共要求一點點政治民主而已。這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其實都是處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不過是「見面握握手、開會拍拍手、選舉舉舉手」的所在。即便是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也成為「政治設計院」，中共何憂之有？然而，毛澤東卻連這麼一點點的民主也不允許，給予痛斥。

羅隆基所建議的「平反委員會」，則是說出了真話，超越了歷史。

二十一年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有一段話專門論述平反問題：

「會議指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只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党和毛澤東同志的崇高威信。」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精神的指引下，當年作為「反革命集團」的胡風一案，得到了徹底平反。

歷史證明了羅隆基關於胡風問題的見解完全正確。

歷史證明了羅隆基關於「平反委員會」的建議完全正確。

可是，在當年，羅隆基善意的建議，卻遭到了惡意的批判。關於「平反委員會」本身，也成了一樁需要平反的歷史冤案！

看來，羅隆基的「錯誤」，只是超越了時代！

時至今日，仍需要一個「平反委員會」，為「平反委員會」的提出者羅隆基平反，為千千萬萬當年蒙冤的「右派分子」們徹底平反。

至於儲安平在發言中所說的「小和尚」、「老和尚」，這比喻並不的儲安平「發明」的。他只不過是套用毛澤東的話罷了。這誠如章伯鈞提出的「政治設計院」，也只是對毛澤東的話加以發揮而已。

1957 年 4 月 30 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面對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回顧前些日子的鳴放時，很風趣地說了這麼一句：

「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

毛澤東說罷，引起一番大笑聲。

儲安平正是順著毛澤東的這句話，找到了發言的話題——《向毛主席和周總

理提些意見》。因為毛澤東「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嘛！

儲安平並沒有想到，像「小和尚」、「老和尚」之類的「幽默語言」，只有毛澤東說得，別人卻是萬萬說不得的！

至於「黨天下」一詞，則是儲安平的老師——羅隆基首創。當年，羅隆基用「黨天下」來抨擊「一個主義，一個党，一個領袖」的蔣介石、國民黨。儲安平在 1957 年則用「黨天下」抨擊同樣是「一個主義，一個党，一個領袖」的毛澤東、共產黨。

在毛澤東看來，「右三論」之中，最尖銳、最根本、最核心的是儲安平的「黨天下」。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提到「右三論」時，把儲安平的「黨天下」放在首位。

透過「右三論」也可以看出三位「右帥」的不同性格和作風：

章伯鈞委婉而不露鋒芒，所以他的「政治設計院」巧妙地借毛澤東的話加以延伸而提出了政治民主的訴求；

羅隆基則直率而富有正義感，所以他的「平反委員會」不遮不掩講出了真話；

儲安平勇敢而鋒芒畢露，所以他的「黨天下」直刺毛澤東的心窩。

在「反右派運動」五十周年祭，重溫「右三論」，懷念「右三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2007 年 9 月 22 日於上海「沉思齋」

注 釋

1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92 頁。

2 1957 年 5 月 22 日《人民日報》。

3 1957 年 5 月 23 日《人民日報》。

4 1957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報》。

5 同上。

6 1957 年 6 月 10 日《人民日報》。

7 1957 年 6 月 11 日《人民日報》。

8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93 至 494 頁。

「反右派鬥爭」鎮壓和扼殺了「五七民主運動」　姚監復

1956-1957 年中國知識份子發動了一場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政治思想鬥爭，而 1957 年 5 月 15 日毛澤東開展了「反右派鬥爭」，殘酷地鎮壓和無情扼殺了這場轟轟烈烈的「五七民主運動」。這場「五七民主運動」繼承了「五・四運動」的民主傳統，具有正義性、科學性和歷史進步性，符合國情民意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毛澤東發動的「反右派鬥爭」具有非正義性、歷史反動性和破壞性。因此，「反右派鬥爭」只是在這場政治鬥爭的後期，統治者反擊和鎮壓知識份子的手段，不能代表和反映運動的本質和方向，建議用「五七民主運動」概括表述這場重要的歷史事件。

五十年前中國共產黨發起的「反右派鬥爭」，曾被西方人稱為「苦果－－1957 年中國知識份子的起義」，我建議這場政治鬥爭應正名為：「五七民主運動」。

1926 年毛澤東開始的「陽謀」－－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革命的死敵」

在 1926 年 2 月 1 日《中國農民》雜誌上，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認定「反動派知識階級」為「大資產階級的附屬物」，「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的教授和學生，乃極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運動之死敵。」中產階級右翼的許多高級知識份子，「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和學生，一定變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為我們的敵人。」因此，1957 年 5 月 15 日毛澤東開始反右派鬥爭又要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是陰謀，但也是陽謀。因為，1926 年就將知識份子定為「敵人」的文章公之於世。不過，這也有陰謀，因為，在 1949 年以後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悄悄地刪去了。

在 1953 年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後，認定中國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消滅資產階級。鄧小平 1957 年 9 月 23 日強調「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反動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多數的知識份子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資產階級式的。所以，為方便起見，同資產階級放在一起說。」1 這樣，為了方便起見，党的總書記、反右五人領導小組組長就把知識份子同資產階級放在一起說、一起批鬥，作為敵我矛盾。

從歷史上看，二十年代毛澤東認定高級知識份子是反革命，就必然要反右派。三十年代反 AB 團，反社會民主黨，小學畢業就是社民黨，也是反右派鬥爭。四十年代整風、搶救運動，殺王實味是反右派鬥爭。五十年代，思想改造，批《武訓傳》、《清宮秘史》，批俞平伯、胡適，從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到整風反右、反右傾，都是不斷的反右派鬥爭。六十年代「四清」、社教和文革初期劉鄧要在高校抓 1%的右派，仍然是反右派鬥爭。七十年代文革中的鬥批改、清隊、抓「516」仍然是反右派鬥爭，八十年代的「清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反右派鬥爭，從九十年代到今天仍在批「六・四」民運分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仍然是一場延續了六十年的、二十年代「知識份子是革命死敵」的毛澤東反右派鬥爭的思維模式。

更早一些 1922 年 12 月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拒絕同中國國內外的反革命力量結盟。應當利用中國知識份子的動盪情緒，以便從中找到一些最有價值的堅定的革命分子，來組織年輕的中國工人階級。」2 中國共產黨的二大宣言指出：「工農有出版、言論、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3 党的任務是「利用」知識份子，言論自由只給工農，這是 1922 年的方針，反右派源遠流長，1957 年的反右派鬥爭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段險灘惡流。知識份子的出路何在？知識份子工農化，即遊民化、流民化、流氓化。何方說：通過整風，知識份子工農化，我們也變成了流氓。因此，反右派鬥爭不僅傷害了上百萬右派分子，而且使全黨全社會在政治上、道德上墮落、沉淪了。

反右派鬥爭是一場偉大的愛國的「五七民主運動」

1957 年的政治鬥爭，從統治者看是反右派，從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被統治者看，是一場意義比「五・四」偉大的「五七民主運動」。當年歷史的先知提出的精闢見解，深度和廣度遠超過現在大陸政改的現實與方案。以當年《人民日報》等報刊公開發表的一部分右派言論為來源，可歸納為：

1.「政治設計院論」:「應該發揮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這些政治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學習美國兩黨制。」「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政府官吏。對共產黨之施政方針,保留隨時加以研究討論、並請求人民代表大會加以更改和否定之自由。」4

2.「平反委員會」論:「肅反運動是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肅反是集反憲法之大成。」「成立平反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的偏差,鼓勵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除共產黨外,也應該讓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5

3.「黨天下論」:「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共產黨就是黨天下,這是根本制度問題。不僅是以黨代政,而且是有黨無政。」「廢除共產黨一黨專政、一切特權,實行教授治校。」「法院和公安機關不能歸党領導。」「黨系統經費由黨費開支。」「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為什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共產黨和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6

4.「取消馬列主義論」: 「建議取消馬列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憲法和法律不能加入『主義』、『革命』、『反主義』、『反革命』等字眼。」「列寧那套否定民主、黨專獨裁、階級鬥爭的殘暴政策的蘇聯經驗,欠人性、無道德的非民主的主義政治不能用於二十世紀的現在與將來。」7

5.「黨是剝削集團論」:「共產黨的幹部利用特權剝削人民,是剝削集團。這種剝削很巧妙,不必佔用生產資料,直接利用特權而無償地佔用勞動人民的剩餘勞動。」「黨內高級幹部中,一個特權層已經形成。他們已完全脫離了黨組織與群眾的監督,成為新的貴族。」「共產黨在中國的實踐結果是觸目驚心的獨裁政府,集中地表現在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上。」8

6.「軍隊公有論」:「取消党衛軍和御林軍,軍隊歸各個黨派公有。裁減軍備。」「國家軍隊和員警屬於全體人民服從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指揮。軍隊員警成員在服役期間停止一切黨派關係或活動。」9

7.「毛澤東帝王思想論」: 「毛主席,不如華盛頓,與德國俾斯麥、日本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不寧,察而不周,喜功好大,難以制天。搞俄式清算鬥爭,天天忙於鎮壓肅反,已不成為國家政治。」「毛主席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是帝王思想的變相復活。」「斯大林已遭受後輩共產黨人的鞭屍,我相信中國鞭屍的歷史要重演。」「秦始皇

與你相比，只能是一個無名小卒了，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願神棄神權，重返人間，神棄神皮，重新作人。」10

8.「無產階級專政有問題論」：「斯大林錯誤、匈牙利事件證明無產階級這個政治制度有問題。一黨專政，民主黨派如何監督？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必將越反越多。」「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為的盜竊國家政權的一個新名詞。」「是奴隸社會和中世紀教會統治的復辟。」「歷史會使這種做法遺臭萬年的。「美國的民主制度要比無產階級專政來得好，因為專政就是獨裁，用強力的獨裁政治來治理國家，不是長久之計。」11

9.「不民主的社會主義論」：「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不民主的。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現在比歐洲中古時代還要黑暗。」12

10.「以『黨主』代『民主』論」：「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替。憲法規定人民有選舉權，人民代表已由党內定。人民不認識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憲法定有言論自由，然而報刊、廣播、電臺為黨所壟斷，凡發表與黨的調子不諧和的言論，概以反革命論罪。反對以『黨主』代『民主』，把民主權給予人民。」「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聖的。一手托著聖經，一手杖著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出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戴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銬。」13

11.「學術思想窒息論」：「學術界由於教條主義的統治，學術思想、自由的思想遭到窒息而死的命運。沒有生命，沒有生氣。 教師變成了留聲機，科研機構變成了衙門，學者變成了鸚鵡。」「國民黨統治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14

12.「党文化無效論」：「為党宣傳的文化，令人不看已討厭，有何收效？」「如果党一定要這樣領導古典戲曲，過去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的？又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莫里哀的？」「中國戲劇反映忠奸功罪，離不開帝王將相，也有呼帝王萬歲，表徵實情實事。要以為這是封建餘毒，那麼主席、總理、部長、總司令、元帥，以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皆是封建餘毒。党的領導幹部，根本不明藝術，一律以馬列教條、社會

主義的結合，嚇唬他人，似乎拉屎撒尿都要結合社會主義，才拉撒得正確。」15

13.「盲目學習蘇聯論」:「我們的財經政策，不少盲目搬用蘇聯成例，盲目行事，並未遵循什麼客觀經濟規律。」「教的不是我們從前的科學，只是斯大林的語錄，替大人物做注解說明，作為一門科學似乎不像。」「中國共產黨以蘇聯為領導，學習蘇聯經驗，弄到黨內外缺乏民主、自由，動輒鎮壓、肅反，實在太危險。」「共產黨昏迷沉醉，死投于蘇聯懷抱，必有亡國滅種之一日。」「蘇聯一定要變，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16

14.「新聞沒有自由論」:「新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報紙上全是枯燥和教條的東西。」「新聞自由被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剝奪了。中宣部應該開放綠燈。」「報紙成了佈告牌、留聲機和翻版書。」「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然而報刊、廣播、電臺均為黨所壟斷，凡發表與黨的調子不和諧的言論，概以反革命論罪。」17

15.「反對專制論」:「我們反對共產黨人專制集權，我們要求祖國文化獨立自主，反對他民族文化的奴役。我們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要有人身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憲法明文規定死了由某党領導，萬一將來這個黨蛻化變質怎麼辦？由誰領導應該由人民按選舉結果決定。」「從毛澤東反胡風，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偽馬克思主義者。黨中央、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嗎？這不是個人崇拜嗎？」「任何時代，權力高度集中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當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險。斯大林破壞法制，進行獨裁，瘋狂的屠殺，原因在於共產黨對國家極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才使斯大林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來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通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18

從 1957 年政治鬥爭中知識份子的一部分言論，摘出這些不完整的內容，站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反對民主和爭取民主的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

從統治者角度看，這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反斯大林主義、反毛澤東的右派反動言論，因此「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正確的。」五十年後，也只承認「擴大化」，大部分右派可摘帽、改正。

從被統治者角度看，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繼「五・四」、「一二・九」運動之後的深度、廣度、力度創歷史水平的、偉大的「五七愛國民主運動」，應當從性質上

為這場政治鬥爭平反。

從國外學者角度看，認為是：苦果－－鐵幕後知識份子的起義。

從 100 萬反右運動受害者看,1957 年內心裏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被定為敵我矛盾是冤案，應平反，賠償。有一些受害者經過五十年反思，自己認為現在才從思想上成為真正的右派分子，不需要共產黨平反。

推進中國民主運動的政治力、經濟力和社會力

中國政治在「國」與「家」之間缺少中間組織。在推進中國民主進程中，根據 1957 年和 1989 年兩場民主運動的教訓，建議在重視政治力、經濟力、文化力的同時，注重社會力的加強。臺灣蕭新煌教授在介紹臺灣民主化進程的新興社會運動作用時，強調了社會力，這個總結值得注意。他介紹的臺灣 17 種新興社會運動是：

1．消費者運動；2．反污染自力救濟者抗議運動；3．生態保育運動；4．婦女運動；5．原住民人權運動；6．學生運動；7．新的教會抗議運動；8．勞工運動；9. 農民運動；10. 教師人權運動；11. 殘障及福利弱勢團體的抗議運動；12. 老兵福利自救運動；13．政治受害者人權運動；14．外省人返鄉運動；15．臺灣人返鄉運動；16．反核運動；17．客家權益運動。19

這十七種社會運動的特點是：以國家（執政黨）為抗爭主要對象，改變民間社會在國家控制中的地位；有強烈的政治與經濟「受害意識」；多有組織化趨勢；八十年代後幾年很快進入集結階段。

中國的民主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作艱苦的努力，包括政治力、經濟力和社會力的加強，發揮民間社會在中國共產黨加強和諧社會建設中的合法政治環境開闢的新的政治空間的作用。

結束語

棗樹根系生出幼芽的生物力，可以衝破壓實的路面，沙漠中的胡楊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朽了，地下根系仍然維繫著沙堆，保護生態

環境。希望以棗樹、胡楊精神，繼承 1957 年的民主運動的精神，為中國的人權、民主、自由、法制而不懈鬥爭，為十分貧困、十分勇敢又十分善良；十分可愛又十分可憐的中國農民、公民多做實事好事！祝在座和不在座的朋友們健康、幸福、平安、事業成功！（2007 年 6 月 23 日）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注 釋

1 1957 年 10 月 19 日（人民日報）。

2 郭恒鈺、基科連科編《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一卷》（臺北東大公司，1997）第 91 頁。

3 同上，第 128 頁。

4 轉引自丁抒《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2006 年修訂本）》（香港，開放雜誌社，2007）第 171、249、186 頁；原載 1967 年 5 月 22 日、7 月 23 日《人民日報》、清華大學校刊《新清華》第 217 期。

5 同注 4，第 120、121 頁，原載《右派論點選輯》（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委員會編，1957 年第 97 頁）1957 年 5 月 23 日《人民日報》。

6 同注 4，第 171、173、185、179、184 頁，原載 1957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25 日《光明日報》；《中國往何處去》（香港，成文出版社，1979）第 32 頁，《原上草》（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第 294 頁，1957 年 6 月 12 日《人民日報》。

7 同注 4，第 186 頁，原載清華大學校刊《新清華》217 期，《鳴放革命實錄史》（香港當代出版社）第 68 頁。

8 同注 4，第 177、270、175 頁，原載 1957 年 8 月 2 日《人民日報》，《劉賓雁自傳》（臺北：時報公司，1989）第 99 頁，新華社《內部參考》1957 年 2267 期。

9 同注 4，第 185、186 頁，原載《中國往何處去》（香港：成文出版社，1979）第 32 頁，清華大學校刊《新清華》第 217 期。

10 同注 4，第 188、160、169、163、164 頁，原載 1957 年 7 月 25 日《人民日報》，清華大學校刊《新清華》217 期，《鳴放革命實錄史》（香港，當代出版社）10、

11、36、82 頁，《中國往何處去》（香港成文出版社，1979）28-30 頁，《首都高校反右派鬥爭的巨大勝利》（1957）第 298 頁，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90 年第 7 期。

11 同注 4，第 173、174、160、203 頁，原載 1957 年 6 月 8 日、7 月 3 日《人民日報》,《鳴放革命實錄史》（香港，當代出版社）303 頁,《中國往何處去》（香港：成文出版社 1979）第 33-35 頁。

12 同注 4，原載《中國往何處去》（香港：成文出版社，1979）第 12-14 頁。雲南大學段教授與丁抒談張若名遺言。

13 同注 4，第 160－161 頁 67，原載《中國往何處去》（香港：成文出版社，1979）第 37-38 頁，1957 年 6 月 10 日《瀋陽日報》。

14 同注 4，第 154 頁，204-205 頁，原載《批判右派分子沈志遠吳承禧在經濟科學方面的反動言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第 13 頁，《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北京：光明出版社，1957）第 58 頁。

15 同注 4，第 150、149、150 頁；原載《鳴放革命實錄史》（香港：當代出版社）第 46 頁；《戲劇報》（編劇：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 年第 11 期第 5-7 頁；《鳴放革命實錄史》（香港：當代出版社）第 47-48 頁。

16 同注 4，第 208、208、139、139、136 頁；原載：1957 年 8 月 29 日《人民日報》,《右派言論選輯》（北京大學，1957）第 139、140 頁;《鳴放革命實錄史》（香港：當代出版社第 11-12 頁第 104 頁，1957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報》

17 同注 4，第 146、146、147 頁 160 頁：原載：1957 年 8 月 25 日《人民日報》;《新聞界反右派鬥爭資料彙編》（中共中央宣傳部圖書資料室，1757）第 74 頁，124、93 頁;《中國往何處去》（香港：成文出版社，1979）第 37-38 頁。

18 同注 4，第 165、166、166、167、130、173 頁。原載《上海師範大學大事記（1951-1987)》第 90 頁；李梧齡《氣血年華》（香港：博思出版公司，2002）第 39 頁，《鳴放革命實錄史》（香港，當代出版社）第 107 頁，新華社《內部參考》第 2223 期第 10 頁，《右派言論選輯》（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委員會編，1957）第 22 頁，1957 年 7 月 3 日《人民日報》。

19 蕭新煌《臺灣新興社會運動與民間社會的興起》（臺北《中華民國，民主化》張京育主編，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社，1992 年，第 89-119 頁。

反右運動中派發了一百八十萬頂「帽子」　　丁抒

全國總共抓了多少右派，連當時的中共中央也不甚清楚。毛澤東直到 1959 年 8 月還認為是三十多萬。當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糾正他說「現有四十五萬」時，他似乎有些得意：

「好多？四十五萬？哈哈，隊伍不少。」[1]

從此以後，中共便採用「四十五萬」[2]這個數字，一直沒有費神去統計全國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

直到 1978 年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主持「右派改正」工作，才發現被改正的右派總數超過了五十萬。有人說：「這怎麼辦？太多了。」胡耀邦答道:「當年猛抓右派的時候怎麼不嫌多？」最後，被「改正」者共計「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3]

此後，官方出版物都將此數當成右派總數，似乎反右運動僅抓了「五十五萬多」右派。其實右派數比這要多。這裡有必要論証一下。

百分之五的指標是所謂「控制數」，實際上毛澤東根本沒打算用它框住自己。六月十日，毛澤東發出《中央關于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民盟右派和反動派的比例比較大，大約有百分之十以上。」[4]在七月青島會議上他甚至說：「民主黨派打它百分之二十（右派），也還有百分之八十（不是）。」[5]

於是「民主黨派」立即加緊清理自己的門戶。譬如天津市的民盟成員 15%是右派，計有 117 名。[6]陝西省民盟成員 10%被劃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或壞分子，計 223 位。其省委委員、候補委員 20%被扣上了帽子。[7]

指標既然可以放寬，各級黨組織紛紛超額完成任務。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江隆基將全校總人數的 6.5%打成了右派，北京市委還是認爲他右傾，「反右不力」，于九月間將他調走，派鐵道部副部長陸平去主事。陸平一去，就在學校大飯廳作報告，說他手頭有一張尚未劃右派的學生的名單，這些

人是否劃右派，要看他們自己的表現。可是才過了三天，學生們還沒來得及表現，近二百人左右的補充名單就公布了。最後確定右派約八百名，近全校人數的 10%，其中一百四十多名「極右派」被開除，送勞改農場「勞動教養」。

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蔣南翔後來說：「清華大學的教授、副教授中劃右派者約達 18%（可能記得不確切）。」[8]該校師生共有右派 571（教職員 222 人，學生 349 人），也超過了 5%。[9]

北京地質學院五千多學生 9%是右派；一千餘名教師，右派占了 12%。[10]中國人民大學六千多學生，僅第一批右派就有四百多名。全部右派也在 10%左右。

吉林省各高等院校，反右剛開始還不到一個月時，講師以上的教員就已有 7%至 15%被定為右派。[11]年底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作報告說：「復旦大學六百多個教師中……右派只占 8.5%。」[12]太少了，所以 1958 年又補充了一批。

各大學的右派人數均在數百名上下。

譬如武漢大學右派有 430 名。530 位教師，14%是右派；三千三百多學生，右派幾達 10%。中文系一共不到二百學生，右派有 56 名。其中四年級學生 37 人，35 個是「右派」或「中右」。[13]

上海交通大學三百多名，華東師範大學 285 五名。其中中文系一年級揪了二十餘人，超過百分之十。[14]福建師範大學共三千多師生，右派抓了四百多個。中文系四年級一班共 36 人，右派有 31 個。[15]

據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韋君宜回憶：

「（中國）作家協會（機關）總共不過二百人，右派劃了五十多個，『踩綫』的還不算。但是，這也不足為奇，當時全國哪個單位不是如此？」[16]

後人也許會奇怪，哪裏會有那麼多學生出來攻擊共産黨？果真有那麼多學生參加了「右派大合唱」？這裡有個例子：清華大學一個學生擁護黨，積極寫大字報批判右派學生。不幸他的大字報裏有「雖然在這個問題上你的看法是對的，但是……」這樣的話，足証他與被批判的右派學生觀點相同。結果他也成右派，與被他批判者殊途同歸。

清華學生張德寰曾接濟過幾位經濟困難的同學，給了幾件舊衣服及幾十斤糧票。那些同學成了右派，連帶著把他劃爲右派，判處三年徒刑。[17]

鳴放時，北大學生時榮章曾打電話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澤東匯報北大的運

動。獲準後，以他爲首的十個同學，外加班主任黃繼忠老師，于 5 月 27(或 28)日到中南海，對稱為毛主席「辦公室主任」的人鳴放了一通。十天後反右，這十一名榮幸到中南海去鳴放的小人物一個也沒逃脫。黃繼忠和時榮章一對師生成了河北清河勞改農場的難友。時榮章班上 24 名學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18]

5 月下旬，蘭州大學學生選出有十二名成員的赴京請願代表團，到北京去請願。火車到達西安被阻。在從北京趕去的高教部副部長劉皚風勸說下，全體返回蘭州。這十二名成員除了一名因「揭發」他人而「將功贖罪」未定爲右派外，全戴上了帽子。不僅學生代表入網，連受校黨委委托陪同代表團赴京的副校長陳時偉教授也被「揪出來」，被送到了酒泉夾邊溝勞教農場。[19]

所謂「工商界人士」即交出產業後成爲「公私合營」工廠或商店的「私方代表」的原資本家，被打成右派的很多。人民日報曾宣佈：「全國工商界反右派鬥爭聲勢浩大，大大小小的章乃器揪了出來。」[20]如廣州市工商界，1956 年時有一萬零四百多資本家，右派一千二百多名成爲右派，超過 5%。[21]

結果就全國而論，右派總數超過了 5%的指標。當時全國被稱作「國家幹部」的人數是 953 萬，「五十五萬多」占其 5.8%。

各地被打成右派的人數差異很大。上海郊區川沙縣，僅 26 萬人，右派有 439 名。同樣是 26 萬人的陝西西鄉縣，右派僅 58 名。又如同樣是 15 萬人口，上海郊區寶山縣右派為 236 人，貴州貴定縣僅 75 名。[22]川沙、寶山文化相對發達，文化人相對較多是原因之一。

湖南、河南、安徽、河北、湖北、四川、山東等省右派的比例較高，其中一些縣份右派比例特別高。這就不是由於文化人相對較多之故了。那些地方緊跟毛澤東，也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最積極，餓死人比例也最高的省份。

譬如湖南省，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周惠參加七月青島會議時，發覺毛澤東對湖南揪出的右派太少表示不滿，只好回湖南加緊抓右派。結果湖南省的右派按人口比例計算的話，在全國名列前茅。

胡耀邦老家瀏陽縣，561 個右派；毛澤東的老家湘潭縣，683 名。[23]毛澤東的外婆家湘鄉縣，673 名。中共副主席劉少奇的老家寧鄉縣，1,027 名右派。全省第一。[24]

河南省，23 萬人的延津縣，532 名右派，「占參加運動人數的 17.7%。」[25]27

萬人的西峽縣，645 名，占參加運動人數的 16%。[26]35 萬人的伊川縣，433 名。[27]49 萬人的息縣，533 名。[28]49 萬人的西平縣：517 名，占參加運動人數的 12%。[29]汝南縣有右派 544 名。[30]商城縣 464 名右派。[31]80 萬人口的南陽縣，右派數達 1,164 名。[32]在全國兩千多縣首屈一指。

按人口計算，安徽省右派的比例遠高於全國平均數。靈壁縣有 674 名右派。80 萬人的霍邱縣，737 名。[33]76 萬人的濉溪縣，903 名。[34]28 萬人的全椒縣，445 名；休寧縣 17 萬人，339 名。[35]祁門縣 10 萬人，241 名。[36]

河北武清縣，右派抓了 632 個。[37]

湖北，49 萬人的江陵縣，429 名右派。[38]70 萬人的襄陽縣 852 名；77 萬人的隨縣 741 名。[39]

四川省新津縣 131 人劃為右派，為參加運動的人數的 7%。仁壽縣，「錯劃右派分子 462 人，占參加運動人數的 7.3%。」[40]

山東慶雲縣 19 萬人，右派劃了 114 名。人口 52 萬的昌邑縣，右派有 389 名。[41]

在同一個省內，右派人數相差很大。如江蘇省東台縣，人口 78 萬，右派 100 人。而人口僅 45 萬的江寧縣，右派卻有 638 個。[42]

共產黨組織嚴密，無遠弗屆，不存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黑龍江省嘉蔭縣隔黑龍江與蘇聯相望，全縣僅六千餘人，沒有一輛汽車，知識份子屈指可數，右派却仍有 15 名。按人口比例計，比安徽還高。

官方各出版物都將「五十五萬多」當成右派的總數。其實這「五十五萬多」僅是右派中被「改正」了的人數。還有「不到一萬名」不予平反的右派[43]不在此列。而且那「五十五萬多」右派都是上了「國家幹部」花名册的人，「不包括尚未納入國家幹部行列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原屬民族資產階級工商界、民主黨派等不拿國家工資的右派。」[44]

當時大專院校近五百所，學生右派應在五萬甚至十萬以上。其中究竟有多少不在那「五十五萬」之內已難考證。但可以肯定「五十五萬」右派之說不確。

十幾萬落網的小學教師中一多半是鄉村教師。其中有些是所謂「民辦教師」，即從農村生產合作社領取工資、不屬「國家幹部」的教師。「五十五萬」裡沒有他們。

因種種原因不宜公開的「內控右派」也不在「五十五萬」的統計數內。除前述北京大學馬寅初、馮友蘭外，還有瀋陽金屬研究所研究員葛庭燧、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等。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董希文畫了大型油畫「開國大典」後，毛澤東曾把他請去中南海做客，不好將他定爲右派，所以也是「內控右派」。

大學生若是「內控右派」，還可分配工作。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班學生靳景儒到了太原重型機械廠。廠裡一看他檔案裡寫著「內控右派」，便叫他住工棚，後來又說他是「壞分子」。他跑回塘沽家中，從此無正經職業。他的同班學生楊白樺也是「內控右派」，分配到瀋陽拖拉機廠。他知道自己是另册中人，乾脆回廣西農村老家種田去了。

「五十五萬」也不包括當作右派處理，但未列入右派花名冊的人。

「新鳳霞是在 1957 年被劇院戴上右派帽子……到七十年代據查她的檔案裡根本沒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數幾個劇院領導的蓄意迫害……」[45]

由此可知，新鳳霞的名字並不在右派花名冊裡，「五十五萬」裡也就不包括她。

到處都有名字不在右派花名冊裡，卻按右派處置的人。

有一位年輕的工程師，曾受總工程師特別器重。總工程師成右派後，不僅拒絕揭發總工程師，反而給他通了信。這一來，他也成了右派。二十多年間，不能升級、漲工資，也不能結婚。到了五十歲出頭，當局才發現，他的檔案裏根本沒有他是右派的記錄。

安徽省蚌埠市的《蚌埠報》文藝組的編輯記者全成了右派，包括組長張鍥。但是，拉糞車、扛麻包，改造了十五年之後回到蚌埠，軍管會依例查看張鍥的檔案，却發現并無上級核準他爲右派的批件。因此張鍥不算右派，十五年右派是白白當了。[46]

有一位青年軍官，年方二十餘歲，從部隊轉業到一所小學擔任黨支部書記，適逢鳴放結束，反右開始。上級派下五個右派的「指標」。他只抓出四名，再也找不出第五個。爲了完成黨的任務，衹好把自己的名字添上。上級照例批準，于是他被開除黨籍、送勞改農場。妻子離婚，兒子亦隨之改姓。在農場改造了二十年之後，右派們均獲「改正」回了城，惟獨他無人過問。原來上級右派籍冊裡沒他的名字，「五十五萬」裡不包括他，故不在平反之列。[47]

1979 年，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右派都被平反，教師李樹槐卻無人過問。他申訴後被告知：當初上級並未批準定他為右派。「你不是右派，我怎麼給你改正？」他在二十年右派生涯中遭的罪，就此不了了之!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畢業班學生閻桂勛被定爲「反社會主義分子」，分配到黑龍江一所學校教書。不久北大來通知說閻是右派，于是改以打掃厕所、下礦山、到北大荒農場。直到 1999 年北京大學才承認，閻的右派案「沒有經過黨委審批」，無效……[48]

右派改正時，當年曾在北大荒農場 853 分場「右派隊」接受「勞動教養」的原《大眾電影》雜誌主編方詩見改正沒他的份，找領導問話。領導說:「沒有你的檔案，你不是右派。」

顯然，張鍥、李樹槐、閻桂勛、方詩都不在「五十五萬」裡。

不屬國家幹部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內控右派」，再加上「未經正式批准」的右派，全國至少有五萬。這樣，當初被按右派處理的總數就是六十萬而不是「五十五萬多」了。

不在「五十五萬多」之內的還有「中右分子」。

「中右」也是正式的右派帽子。自然，這也出自偉大領袖的指示。毛澤東說：

「右派是反對派，中右也反對我們。」[49]

于是在右派之外，又抓了幾十萬「中右分子」。

譬如 1958 年 4 月，城市的反右運動進入尾聲時，河北徐水縣二千餘名中小學教師被集中到孤莊營村鳴放、辯論。除 150 人定為右派外，還有 46 人定為「中右分子」。[50]

什麼人算「中右」？沒有標準。譬如四川西充縣規定，凡「有右派情緒的」就是「中右分子」。[51]

說起來「中右」不同於右派，但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實際上按敵我矛盾處理。」[52]如河北遂平縣，「劃右派分子 562 人……劃不上右派而定為『中右』的 501 人……凡是右派和中右者，大多被開除公職，遣送回家，由生產隊監督勞動改造。」[53]

被打成「中右分子」者，所受處置各不相同。除少數受的處分稍輕，如雲南女作家季康（趙繼康，《五朵金花》、《摩雅傣》等電影的劇作者）被寬大、僅下放

農村勞動外，大多數受到與右派一樣的處置。如中共浙江永嘉縣委書記李桂茂被撤銷職務，工資降三級。齊齊哈爾解放軍第十一軍醫學校一位教員的預備黨員資格被取消，轉業到邊遠的小縣城北安。1949 年渡江戰役時登上第一船，獲特等功勛章的新華社記者、軍隊作家寒風，留黨察看兩年，下放雲南。《文藝報》副主編陳企霞的妻子鄭重被中華全國合作總社「劃為中右，內控使用」，送福建古田縣的一個水電站工地。

河南信陽步兵學校把少尉助理員徐先國等「中右分子」送到北大荒農場。哈爾濱空軍第一航校的「中右」和右派一起，都送到北大荒去勞動改造，不加區別。

北京大學的「中右」和被定為「右傾」而處理的人數為八百左右。右派應屆畢業生不能畢業，「中右」們也領不到畢業証書，只能算是「肄業」。已經印製好的畢業証書捆成一堆，成了廢物。[54]

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創作室 32 人，9 個右派之外，又揪出 7 個人，分別定為「中右分子」和給予黨內處分。[55]加起來恰好是半數。

由於主持湖南反右運動的省委書記周惠說「新湖南報就是個『小匈牙利』，抓右派不受比例限制，有多少抓多少」，一百四十多人的報社，除 54 個右派外，還有二十多「中右分子」。合計超過半數。[56]

一般說來，「中右」比右派少。譬如河北唐縣，151 名右派，37 名「中右」[57]，江蘇溧陽縣 171 名右派，33 名「中右」；安徽廬江縣，515 名右派，98 名「中右」。[58]

不少地方的「中右」雖少於右派，絕對數目並不小。如甘肅武威縣二百多右派，157 名「中右」。[59]廣西大新縣，124 名右派，100 名「中右」；寧明縣右派 145 個，「中右」有 100 名。環江縣「中右」為右派數的三分之二。[60]安徽濉溪縣有「中右分子」419 名。江蘇省宜興縣，右派 208 名，「中右」169 名。[61]

有些地方，「中右」數與右派不相上下。如吉林省伊通縣，100 名右派，97 名「中右」。[62]黑龍江省拜泉縣，137 名右派，「中右」130 個。[63]

也有一些地方，特別在某些省，「中右」比右派多。如黑龍江省肇東縣「共劃右派 193 人，中右份子 336 人。」愛輝縣 20 名右派，73 名「中右」，為右派的三倍半。[64]

內蒙古巴林左旗，25 名右派，35 名「中右分子」。[65]

雲南省鎮雄縣，右派 52 名，「中右」140 人；騰沖縣，右派 101 人，「中右」156 人。[66]

中國第一大省四川，「中右分子」有六萬餘人，比右派還多。[67]

據本文作者抽樣統計，全國「中右」的總數大約為右派總數的三分之二，近四十萬人。

此外還有「右言分子」(「有右派言論者」之簡稱)，或乾脆就叫「右派言論」。如「廣西上林縣有 127 人被劃為「右言分子」。江西武寧縣，「右言分子」比右派還多 40%。[68]

還有「疑似右派」。中共中央《關于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中說：

「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間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確定爲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劃爲右派分子，并且不用鬥爭右派分子的方法對待他們。」[69]

中共中央下達文件的本意是說，對疑似者暫先不按右派處置，但結果適得其反。既有「疑似分子」一說，各地便索性將之另劃一類，叫「疑似右派」。如安徽泗縣將 117 人劃成了「疑似右派」。[70]既屬「分子」，又「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之間」，所受處分自然也應界乎二者之間。總之，也是賤民，與右派處境無異。

此外還有各地創造的「分子」。譬如四川郫縣唐昌鎮揪出了 31 個「爛言分子」。[71]黑龍江省拜泉縣，25 人被定為「黨的落後分子」。[72]這都是不包括在那「五十五萬多」之內的。

「右言分子」、「疑似右派」、「爛言分子」，全國的總數應在十萬以上。這些也都不在那「五十五萬多」之內。

所以，右派六十萬、中右分子四十萬、加上右言分子和「疑似右派」等，右派總數共約一百十萬。

實際總數還不止於此。當年還有成千上萬的「以所謂『右派言論』戴上其他帽子」的人！

譬如雲南省騰沖縣，「因右派問題劃為地富反壞分子 33 人。」陝西西鄉縣，3 人「因『右派言行』定為反革命、壞分子而被開除公職。」[73]

安徽和縣一千五百多中小學教師集中鳴放、反右，成果巨大。右派 338 名，已占教師的 20%，可是還有 481 個不能放過，又定為「反革命分子」。一場反右，

半數以上教師成了運動的祭品！[74]

廣西上林縣 1,070 名教師中，除右派外，還抓了 158 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雲南通海縣一千三百多教師集中鳴放、反右後，除了右派，還揪了 164 名「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和「壞分子」。[75]

浙江《東海》雜誌編輯部總共才 13 個人，除了 7 個右派和 1 名「中右」，還有一個「壞分子」。[76]

「壞分子」定義含糊，形形色色。有的大學生，有「右派言論」，剛好借圖書館的書丟失，逾期未還，當局便宣布他是偷書的「壞份子」，抓走了。上海同濟大學學生舒展（筆名）無論怎麼挨鬥，拒不承認自己是右派。最後學校將他以「壞分子」的名義送到勞改農場，從此再也沒人知道其下落。[77]

全國因「右派言論」而被扣上「反革命」、「壞份子」帽子者，應當不下數萬。

還有許多「未戴帽而受到各種處分」的人。既無帽子，也就不在當局統計數之內。譬如河南西平縣，355 人「因『右派言行』被錯劃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和未戴帽而受到各種處分。」[78]

《文藝報》專職評論員竹可羽，未定爲右派，但被流放到懷安縣農村改造，蟄居了三十多年。浙江嘉興縣的中學教師姚辛有右派言論，但念他是轉業軍人，不定右派，僅開除教職發送農村。安徽有一位鄉村小學教師，因「右派言論」被批鬥、開除後，送回原籍青陽縣農村「監督勞動」。[79]

當時北京郊區土城收容所是右派等候發配勞改農場時的集中地。清華大學一位學生，「因書寫了一張攻擊大躍進的大字報，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動分子的身份進了土城。」[80]

北京幼兒師範學校女學生胡慧芝的父親因「歷史反革命」罪入獄。她給父親寫的信和日記中同情父親的話被一位學生幹部偷看，報告上去，就够定爲右派了。但她才十七歲，不夠戴帽子的年齡，便給了她一個「反右期間有錯誤言論，不宜當教師」的結論，發配到北大荒興凱湖勞改農場，算是「支援邊疆」。二十年後，她父親平反回北京了，但她却回不了。她無反可平，因為她不是右派。她到《新觀察》編輯部去請求記者為她申訴時，痛苦地說：「我真希望自己是個右派！」[81]

江蘇省高淳縣，「因鳴放（言論）受到各種處理」的有 62 人。江寧縣有 244

人「以所謂『右派言論』戴上其他帽子」。[82]

廣西，上林縣有 57 人「因右派言論受到各種處分」。[83]

河南，商城縣有 406 人「因右問題受處理」。[84]

雲南省騰沖縣，「因右派問題劃為地富反壞分子 33 人。」[85]

安徽省除右派外，還劃定了「四種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中右分子」，「疑似右派分子」以及「因右派言論受處分」的分子。霍邱縣的「四種人」有 483 名。靈壁縣，「有 977 人被錯定為四種人。」[86]

安徽亳縣，一百多人「因『右派思想』及其問題而失去工作」，八人「因右派言論受到批判而失去工作」。[87]

全國因「右派言論」、「右派思想」、「右派問題」受到各種處置的人，總數至少十萬。

一百十萬各類右派，六十萬反社會主義分子，十萬「右派言論」引致的各色「分子」，1957 至 58 年間，一百八十萬人被派發了一頂帽子，「未戴帽而受處分」者還不在內。

不論帽子有無，個個都是賤民。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註 釋

1　1959.8.11 毛澤東的講話，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 296 頁。

2　1959.8.24 毛澤東給劉少奇的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 475 頁。

3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第 13、17 頁。

4　文聿《中國左禍》（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第 199 頁。

5　1957.7.17 下午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的插話。

6　《天津民盟四十年》（天津：民盟天津市委員會，1991）第 8 頁。

7　《民盟陝西省委員會歷史沿革（1942 年——2002 年）》。

8　一九六六年九月蔣南翔《檢查我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主要錯誤》。

9　《清華大學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第 723 頁。

10 該校右派學生吳弘達與本書作者在美國的談話。吳平反後訪問母校，得到此數字。

11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 60 頁。

12 1957.12.25 柯慶施在中共上海市委一大二次會議的報告。

13 吳貽谷主編《武漢大學校史（1893－1993)》（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第八章，《在曲折中前進(1957—1965)》。

14 1957.8.17 人民日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大事記（1951-1987)》第 101 頁；2000.7.29 世界日報（紐約），龔濟民《愧對同窗悔恨終生》。

15 福建師範大學物理系右派學生林學政《陽謀》，《從大陸看大陸》第 122 頁。

16 《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一九九八年第二期第 27 頁。

17 據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張僖說：「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５８年，由中國作協劃為右派分子的共有三十人。」《新觀察》一九八八年第十八期，郭本余《一位工程師的命運》。

18 一九九一年黃繼忠與本書作者在美國的談話。

19 一九九一年蘭州大學學生何之明與本書作者在美國的談話。

20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人民日報。

21 伊凡《廣州工商界萬人爭鳴記》，《鳴放回憶》（香港︰自聯出版社，1966）第 33、38 頁。

22 《寶山縣志》（1992 年版）第 38、135 頁；《貴定縣志》（1995 年版）第 36、959 頁。

23 《瀏陽縣志》（1994 年版）第 39、106 頁；《湘潭縣志》（1995 年版）第 136 頁。

24 《湘鄉縣志》（1993 年版）第 38、107 頁；《寧鄉縣志》（1995 年版）第 127 頁。

25 《延津縣志》（1991 年版）第 129 頁。

26 《西峽縣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 384、116 頁。

27 《伊川縣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 36 頁。

28 《息縣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 36、75 頁。

29 《西平縣志》（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第 305 頁。

30 《汝南縣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第 44 頁。

31 《商城縣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 35 頁。

32 《南陽縣志》（1990 年版）第 39 頁。

33 《靈壁縣志》（1991 年版）第 12 頁；《霍邱縣志》（一九九二年版）第 496 頁。

34 《濉溪縣志》（1989 年版）第 482 頁。

35 《全椒縣志》（一九八八年版）第 21 頁；《休寧縣志》（一九九〇年版）。

36 《祁門縣志》（一九九〇年版）第 33、86 頁。

37 《武清縣志》（1991 年版）第 727 頁。

38 《江陵縣志》（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 27、106 頁。

39 《襄陽縣志》（1989 年版）第 22 頁；《隨縣志》。

40 《新津縣志》（1989 年版）第 31 頁；《仁壽縣志》（1990 年版）第 366 頁。

41 《慶雲縣志》（1983 年版）第 408、434 頁；《昌邑縣志》（1987 年版）第 22、92 頁。

42 《東台市志》（1994 年版）第 36、149 頁；《江寧縣志》（1989 年版）第 33 頁。

43 金春明等《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講》第 27 頁。

44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第 17 頁。

45 吳祖光《「二流堂」奇冤大案》，1991 年 3 月 19 日，北京。

46 《新華文摘》一九八一年第八期第 134 頁。

47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團結報》。

48 《炎黃春秋》（北京）二〇〇〇年第九期第 48 頁。

49 1958.1.3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的第一次講話，《學習資料（1957～1961）》（清華大學，1967）第 121 頁。

50 《徐水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第 491 頁。

51 《西充縣志》（重慶出版社，1993）第 149 頁。

52 廖蓋隆《黨史探索》（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 238 頁。

53《遂平縣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第 136 頁。

54 高望之《北京大學與民主運動》，一九八八年五月哥倫比亞大學「二十世紀中國民主運動史」會議論文。

55 《炎黃春秋》（北京）一九九八年第五期第 16、20 頁。

56 劉皓宇《悼李長恭》、《惡夢》，劉皓宇、羅印文編《1957：新湖南報人》。

57 《唐縣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 32、348 頁。

58 《廬江縣志》（1993 年版）第 22、130 頁；《溧陽縣志》（1992 年版）第 34、159 頁。

59 《武威市志》（1998 年版）第 121 頁。

60 《寧明縣志》（1988 年版）第 129 頁；《炎黃春秋》一九九八年第四期第 26 頁。

61 《濉溪縣志》（1989 年版）第 482 頁；《宜興縣志》（1990 年版）。

62 《伊通縣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第 172、173 頁。

63 《拜泉縣志》（1988 年版）第 334，538 頁。

64 《肇東縣志》（1995 年版）第 23 頁；《愛輝縣志》（1989 年版）。

65 《巴林右旗志》（一九九〇年版）

66 《鎮雄縣志》（1987 年版）第 326 頁；《騰沖縣志》（1995 年版）第 36 頁。

67 《當代中國的四川（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 599 頁：「改正和安置錯劃右派五萬餘人，『中右分子』六萬餘人。」第 705 頁：劃右派 44,621 人。

68 《上林縣志》（1989 年版）第 384 頁；《武寧縣志》（1990 年版）。

69 《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八）》（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669 頁。

70 《泗縣志》（1990 年版）。

71 《唐昌鎮鎮志》（1983 年版）第 29、32 頁。

72 《拜泉縣志》（1988 年版）第 334，538 頁。

73 《騰沖縣志》（1995 年版）第 36 頁；《西鄉縣志》（1991 年版）第 221 頁。

74 《巢湖地區簡志》（1996 年版）第 13 頁。

75 《上林縣志》（1989 年版）第 383 頁；《通海縣志》（1992 年版）版第 19 頁。

76 1997 年 3 月，鄭秉謙《兩個平常的作家在一個不平常的時刻》。

77 《鳴放回憶》（香港：自聯出版社，1966）第 120 頁。

78 《西平縣志》（1990 年版）第 309 頁。

79 朱效池《法官軼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 148 頁。

80 從維熙《走向混沌︰反右回憶錄，勞改隊紀事》（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第 152 頁。

81 華培明《一樁二十六年沉冤提出的問題》，原載於《新觀察》。

82 《高淳縣志》（1988 年版）第 35 頁；《江寧縣志》（1989 年版）第 45 頁。

83 《上林縣志》（1989 年版）第 384 頁。

84 《商城縣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 35 頁。

85 《騰沖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 36 頁。

86 《霍邱縣志》（1992 年版）第 496 頁；《靈壁縣志》（1991 年版）第 12 頁。

87 《亳州市志》（合肥：黃山書社，1994）第 318 頁。

自由主義的終結和共產主義的退潮

——一九五七年和我　　　方勵之

北戴河的自由元素和權力之鞭

1956 年 8 月底，我從北大畢業，隨即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從事核反應堆理論研究，它屬於中國核武發展項目。

報到之前，有一個多星期的假期。一想到學生生活就此結束，這已是最後一個暑假，因此，決定去玩一番。於是，我和同學李清潤相約一起去山海關，秦皇島和北戴河。向虞富春教授借了 15 塊錢，就上路了。李淑嫻那時已開始工作，而且在我們之前她已去過北戴河，故未參加我們的旅遊。

15 塊錢的預算，不容我們有從容的吃、住、行。在四天的旅程中，一夜在秦皇島的一個小學教室裏借住，一夜在北戴河的海濱浴場的更衣室裏偷住，一夜在火車上。累極了，但興奮至極。因為，二十歲的我，還是第一次登上天下第一關，站在長城的起點。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秦皇島外，遠遠的漁帆點點，正在暗藍發紫的海的波濤上起伏前行。這時候，真想作詩，如果能夠比普希金的〈致

大海〉作得更好的話。

再見吧，自由的元素，

這是你最後一次在我的眼前

滾動著蔚藍色的波濤，

和閃耀著驕傲的美色。

普希金寫〈致大海〉時，也才二十五歲。為什麼就是「最後一次」？至少，不完全適合我當時的心境。不管它。

按歷史記載，差不多同時，毛澤東也來過北戴河。可能他也被大海感動了，也想作詩，結果他填了一闕詞。其中有一句「秦皇島外打漁船」，證明他也看到了漁船，說不定他同我們看到的是同一批船，因為，那時的漁船真的不多。不同於我們的是，漁船和大海沒有使他想到自由的元素。他想起的是因霸業成功而躊躇滿志的曹操。他的詞中有一句「魏武揮鞭」，可見，他得意的是有了一條曹操那樣的王權之鞭。

不到一年，權力之鞭果真抽向了自由的元素。這致命的一擊，使那一次面對大海真成了我的最後一次。直到 22 年之後，我才有機會再一次面對海洋。

像所有年輕人一樣，不少物理系的學生喜歡詩和音樂。普希金、席勒、海涅，裴多菲…像拉普拉斯、馬克士威、波爾茲曼…一樣被熟知。每天晚飯後，北大廣播台播放半小時的音樂，其曲目皆由物理系、數學系同學選擇和提供。當時，我們常常被告誡，海涅的「夜鶯」、聖桑的「天鵝之死」、貝多芬和席勒的「歡樂頌」等等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非共產主義的。不過，並不真懂，自由主義同共產主義到底有多少衝突？海涅不還是馬克思的朋友嗎？海涅的一些抒情詩，不還是由恩格斯譯成英文的嗎？

第一次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真正感到不適，來自列寧。

週末沙龍：量子力學---- 海森堡，列寧

1957 年春夏，我每星期六去北大。因為當時李淑嫻在物理系工作。她擔任蘇聯專家的翻譯。1956 年秋後，根據中蘇合作協定，蘇聯派了一批專家來北大，授課及研究。每個專家都配有一兩個翻譯協助工作，口譯和筆譯。這些專家的水平，

大約相當於北大的講師或副教授。但是他們的待遇則大大超過中國的正教授。僅就他們佔據的辦公室而言，也比中國教授的辦公室大為排場。

每星期六晚上，李淑嫻的專家的辦公室，就由我們佔據。那時候，我們似乎都有用不完的精力。雖然相愛至深，但不想結婚，我們的原則是立業之後才有權成家。甚至，星期六晚上的卿卿我我，也覺得是浪費光陰。於是，我們常約倪皖蓀（同班同學）或其他朋友一起活動。倪是另一個蘇聯專家的翻譯。因此，每星期六我來北大時，常是幾個人一起討論問題，談談一周以來的讀書或研究的心得。我們的一個的「雄心」是，以這個週末沙龍為凝結核，慢慢地吸收更多的人來參加，說不定會發展成一個學術集團。這樣，從 1957 年春天開始，幾乎每個週末，我們都要在北大放言高論一番。論題主要是物理的，哲學的，也有政治的。

大部分的議論早已淡忘了，但有一件事至今記憶猶新。那是有一次我們討論海森堡(W. Heisenberg)的一篇科學哲學文章，當他論及有關量子力學解釋的爭論時，曾說，「蘇聯布洛欣采夫(Bloshinzev)對量子力學的‘新’解釋只不過是為了適應列寧對馬赫的政治批判而已」(大意)。對列寧如此出言不遜，使我們為之一震！在當時的中國，列寧屬先知至聖，絕對找不到任何的中文出版物，會使用海森堡那樣的語言對列寧說三道四。

然而，物理學的論證又使我們不能不去認真思考海森堡的的論斷。我們在大學所用的一本教科書，正是布洛欣采夫寫的《量子力學教程》。布洛欣采夫一書的第一版是採用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解釋，即波爾和海森堡的解釋。四十年代末，蘇聯發動了對資產階級科學的批判。哥本哈根學派是批判對象之一。布洛欣采夫在第二版書中轉而批判哥本哈根解釋。他自己也聲稱，他提出「量子力學新解釋」就是要批判並取代那些「資產階級的量子力學學派」。雖然，布洛欣采夫的「新解釋」還不算李森科式的偽科學。但是，顯然地，「新解釋」是動機於政治而不是物理。儘管如此，布洛欣采夫並沒有用非物理的語言來討論物理。還是可以接受的。列寧的文字則不同了。請看：

既然……不是明確地承認時間和空間的客觀實在性……也就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一直滾到「終極原理」和「第一推動」中去，因爲，他們使自己失去了防止超出時間和空間界限的客觀標準。如果，時間和空間只是概念，那麼，創造它們的人類就有權利超出它們的界限。資產階級教授們就有權利由於保衛這種超

越的合法性，由於直接或間接地擁護中世紀的「荒誕事情」而從反動政府領取薪金了。(《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據說列寧是以「邏輯嚴密」著稱。但是，什麼邏輯能把「從反動政府領取薪金」作為否定「超出時空界限」的一個物理理由呢？顯然不符合物理學的常識。海森堡的評論並沒有完全動搖列寧在我信仰中的地位。但是，第一次迫使我看到，在科學與非科學二者之間，我無疑應當選擇前者，不論那些非邏輯的著作曾有過怎樣的神聖光環。

所以，即使沒有任何其他的影響，我們的週末沙龍的後果多半是使參加者從追隨科學開始，漸漸地偏離共產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有些史家認為，如果毛澤東在 1957 年不發動‘反右派鬥爭’，不大規模迫害知識份子，就不會造成後來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之間的衝突。這不完全正確。因為，知識份子，至少像我們讀書小組這類青年人，之所以偏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由於賽先生的引領。科學的實證精神和方法並非僅僅與一個「反右」政治運動相矛盾，而且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根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君臨一切之上，是難於相容的。所以，一批青年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之間的離異，或遲或早，是註定要發生的。

「反右運動」只是加快了離異的進程。

是「陽謀」嗎？

1957 年 3 月，科學院黨委向北京各研究所的黨員傳達了毛澤東的兩個新的講話。我也去聽了。在講話中，毛澤東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並懇請黨外人士批評共產黨的各種錯誤。特別是針對三害，即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敬請批評 。運動簡稱為「鳴放」。

據毛澤東自己後來的解釋，他號召「鳴放」是一個「陽謀」，即一個圈套，其目的是引誘對現實心懷不滿的人批評共產黨，然後聚而剪除之，從而鞏固共產黨天下。這種解釋似乎暗示毛澤東在事前一切都有神機妙算，似乎他早已料定，他準備加以剪除的那些人一定會及時地中計「鳴放」，然後他可以用「反右派」運動及時地整治這些社會主義的敵人。

在我看來，「陽謀」說只是部分正確。一個證據是，毛澤東早在 5 月 15 日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即已開始從「鳴放」轉入鎮壓。如果他是一切都

有預謀的，那麼，這意味著，在 5 月 15 日，他認為，那些該中計者大多數已中了計，是收網的時候了。可是，直到 5 月 15 日，大學裏還沒有一張大字報，學生的大鳴大放還沒有開始，「右派」的一個主力軍——大學生——還沒有出場呢！這至少證明，毛澤東沒有估計到，大量「思想好」的學生也會投入「鳴放」，參加批評共產黨的行列。按他的估計，在共產黨領導的大學裏培養的年輕知識份子，是他的政權的受益者，故而是支持者。

應當說，他的估計並不全錯。當時，我及我認識的同齡北大人，極少自覺地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持對立政治立場。不同的只是對當局的支持程度，有的狂熱，有的溫和。所謂「落後分子」，也多不是由於有政治異見。正因此，當大學之外的「鳴放」已令毛澤東感到「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時候，大學生卻尚無動靜。

至於我所在的核反應堆小組，因為數值計算正緊，更少介入「鳴放」。向科學進軍已經夠忙了，何談「鳴放」。而且，「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對自然科學來說，了無新意。自由爭辯對發展學術之必要，無需毛澤東用長達四個小時的報告向自然科學家去廢話，三百年前的伽利略時代的歷史，就有結論了。

我們仍日日浸沉在計算中，沒有「鳴放」，只有算盤聲。

三月，四月，五月上旬，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了。感不到陰謀，也感不到陽謀。

〈是時候了〉

5 月 18 日，星期六，我仍照例去北大。我們仍照例在李淑嫻的專家辦公室裏，照例的約會，照例的闊論高談。

校園裏，同平時的週末一樣，如鏡的未名湖、智慧的花神廟、沈默的鍾亭，淨潔而且寧靜。

5 月 19 日，潘朵拉盒子打開了。

歷史系的學生首先發難，用斗大字的大字報質問：「團代表是怎麼產生的？」（二十九年後， 1986 年，科大上街遊行學生的質問，如出一轍。）

接著，第二天，星期一，在北大學生往來最多的大飯廳東牆上，出現了一張醒目的大字報。是一首詩(又是從詩開始)。題目是〈是時候了〉

青年人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齊都寫在紙上，

不要背地裏不平、背地裏憤慨、背地裏憂傷，

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來見一見天光。

………

作者是兩個中文系三年級的學生，沈澤宜，張元勳。旋即，各色各樣的大字報從原本寧靜的各個角落潮水般地湧出。學生的鳴放真正開始了。

1989 年春天，沈澤宜到北京天文臺來找我。雖然他為這首詩付出了二十多年的歲月。曾被流放西北。頭髮業已斑白。但是，一當談起〈是時候了〉，他的眼神依舊放出炯炯的光彩。他在為我背誦這首詩時，似乎依然是 32 年前的那種激情。的確，它是一首值得驕傲的詩，它是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與共產黨大衝撞的第一響。

很清楚，〈是時候了〉所渴望的，不多也不少，就是自由主義。就是海涅式的自由，

「一棵樹長到了我的墳墓之上，

年輕的夜鶯在她枝頭歌唱；

它歌唱如此純潔的愛情（自由）啊，

就是在夢中，我也聽得如訴衷腸。」

北大學生最有名的右派雜誌——《廣場》，只出過一期，首篇即是《自由主義者宣言》。海涅雖是馬恩的好友，但他從不認同馬恩合寫的《共產黨宣言》。終於感到了，也看到了，在意識形態上，自由主義者宣言與共產主義者宣言是水火難容的。

死結——三害根源

北大大飯廳一帶的衝撞目標，一開始就不是指向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具體三害，而是指向了一個根本：三害的根源在那裏？三害的社會根源在那裏？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根源在那裏？

這可能是毛澤東和中共當局沒有料想到的，但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既然承

認有三害存在，那麼，就應有根源。這個問題是〈是時候了〉之後，學生大字報的一個主旋律。不幸，按照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這個問題是不准也不能討論的。因為，研究三害的根源，不可避免地要評定現行社會制度的優劣。然而，十月革命以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不容置疑的。至少，不論如何評定，結論都必須是：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不幸，教育使學生習慣于對任何事都要尋根求源。三害根源自不例外。沒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它被研究之前就規定它的答案，否則只是預設，不是論證。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擁護，也不能為預設所替代。所以，從學生一上場，他們與當局的衝突就是原則性的：是崇尚自由思考和科學的論證，還是對威權的迷信和崇拜？

顯然，這是一個無法調和的死結。

因此，在大學裏，三害根源一問，把「鳴放」的發動者逼到了料想不到的困境。雖然，青年知識份子當初的動機，絕非有意想給鳴放發動者製造困境，更不想爭奪領導權。相反，對民主黨派要求的「有職有權」等等，在學生中極少共鳴和呼應。學生呼喊的不是「權力」，而是天賦的自由「權利」。當時認同民主黨派的學生很少，可能比同情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托派）的學生還少。民主黨派，從來只是收容所式的政治花瓶。學生大字報中，對於共產黨的所作所為的意見，大多集中于肅反和胡風問題。這與 1956 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直接有關。

赫魯曉夫的報告在社會上是嚴禁流傳的。然而，在北大，蘇共《真理報》和西方報刊的報導都看得到，不同的中文翻譯版本在學生中間流傳，並用小字報貼了出來。許多人都不同程度地知道報告的內容。斯大林，也曾是這一代人心目中的偉人。1953 年，當他的死訊傳來時，不少同學落下了淚，是真的淚。難道他竟然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名濫殺無辜的暴君？事實俱在。使我們不能不重新思考肅反，思考胡風問題，重新思考自己信仰的事業。（李和我去過布達佩斯，幾位經歷過匈牙利事件的物理教授與我們同齡。他們指著 1956 年留在建築物上的彈痕，談到他們當年對斯大林，對蘇聯共產主義的幻滅，竟然同萬里之外的我們一樣。）

權力之鞭與自由元素之間的和平相處期，就此結束。一場衝突勢不可免了。

內疚與給黨中央的信

「北大出事了」的消息，第二天就傳到近代物理所。不過，我們的研究工作並未受到影響。隨後，每天都從北大傳來越來越令人坐不住的消息。但那一個星期裏，我還是照例堅持到週末，即 5 月 25 日星期六，才去北大。

那天，李淑嫻、倪皖蓀和我談論的主題，是大字報。我們三個都是共產黨員，在學生時代又都擔任過青年團的職務。所以，原則上說，我們屬於「鳴放」所批評的對象，即大字報批評的對象，而不是「鳴放」參與者。確實，我們沒有任何寫大字報的衝動。然而，大字報引起我們的深思。大字報中批評的問題，我們也有過，的確也在大學裏傷害過人，包括我們的同學。作為共產黨員的我們，是否也對三害負有責任？

答案是肯定的。儘管在我們在大學的那幾年，沒有大規模的階級鬥爭，但由於青年團工作的一個最高原則是「作黨的助手」，所以，我們回想起，我們同樣因此而傷害過一些同學。比如，1955 年初，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訪華，要北大的學生去飛機場歡迎，本來是件小事。但因毛澤東、周恩來等所有中共領導人也都在機場，一個簡單的歡迎式，就成了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要求我們在挑選歡迎者時，按階級鬥爭觀念處理。結果，一些「思想落後」的同學由於被認為「不可靠」而不准參加。這些同學受到嚴重的歧視和傷害。更嚴重的傷害發生在「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中。雖然學生裏並沒有反革命分子，但在為時一個月的運動中，一些「思想落後」的同學遭到猛烈的無道理的批判。這些批判會的組織和主持，我們都參與過。我們感到內疚。

因而，深感應當改進共產黨青年團的工作，以使那樣的傷害不再會發生。為此，倪皖蓀動議，我們聯名給黨中央寫一封信，提出我們自己對改進共產黨及青年團的工作的看法。李淑嫻和我，都同意了。

6 月 2 日，星期日，我再去北大時，倪皖蓀已擬好了信的大綱，很長，3 張 8 開紙。其中討論了共產黨的各種缺點和錯誤，包括理論上的教條主義、思想上的主觀主義、作風上的宗派主義等等。經過一下午的討論，大綱被改定。並分工由倪寫主要部分，李寫有關青年團部分。我本也很有興趣寫一部分，但核反應爐的工作太忙，不容抽身。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日子

時間又過了一個星期。6 月 8 日，又是週末，我又去北大。

天已變了。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毛澤東起草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一份黨內文件。一場「反擊右派分子」的階級鬥爭，正式開場。

幾十年間，中國共產黨發動過的階級鬥爭，雖然名目極為繁多，但其鬥爭的基本過程和方式卻大同小異，可以用一個通用的程式來操作。這個程式中有以下幾個關鍵的副程式。

1， 確定鬥爭對象。按規定，階級敵人的數目一定是「一小撮」，即不超過百分之五。因此，運動領導者的一個任務就是保證達到這個數字，誤差越小越好。李淑嫻後來被定為右派，而我得以倖免，全賴於誤差範圍太小，兩個人不能同時擠進。

2， 構造罪名。按規定，凡右派分子(××運動時，則用××分子)的罪名，都應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因此，運動領導者的任務是構造罪名，使之達到反黨反社會主義。北大曾有一張大字報，內容是批評北大理髮店不講究質量，學生的髮式都被理成了「狗啃式」。後來，這張大字報的作者也被劃為右派。因為，大字報暗示，社會主義是用「狗啃」學生的頭，反動至極。

3， 揪出暗藏的集團。按規定，××分子必定是組成各種反黨小集團，有綱領、有計劃地向社會主義進攻。因此，運動領導者的任務是把右派分子(或××分子)組建成一個個的反黨小集團，再加以批判。雖然，有些被組織在一個反黨小集團中的人，甚至原來根本沒有見過面。

跟著，就是大小的批判鬥爭會。那也有標準的程式。無論被鬥爭的人多麼虔誠地認罪，與會的人也一定要高喊「不老實！快交待！」同時也要一致地舉起手，就如，在電視裏看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們在表決時一致舉起手一樣。

成千上萬的天真無邪的學生和青年知識份子，就這樣被捲入階級鬥爭的壓榨機，成了「右派分子」。許多人，經受不住這種對靈魂的淩辱，自殺。

直到 1957 年 8 月，倪皖蓀，李淑嫻和我，還平安無事，雖然我們要給黨中央

寫信的事，當局是知道的。然而，到 6 月 8 日，我們的信還沒有寫完，也就沒有寄出。黨員向黨中央寫信，是不違背黨章的。我們的信的內容也從未用大字報公開過。因此，我們的行為似無一絲越軌。所以，從不認為有錯。

9 月，北大的反右已近尾聲，「不老實！」 的口號聲漸漸稀少了。一場運動看來已快過去。

然而，人生就是不能完全避免偶然。

也在 9 月，當時作為中共中央「反右運動」辦公室主任的鄧小平和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陪蘇共中央訪問者來北大。鄧彭二人「偶然」順便看了北大的大字報，出乎他們的意料，驚歎：「北大右派的質量很高」。於是，他們立即破格優惠北大，必須再追加右派分子，數目可以不受百分之五的限制。

這樣，北大的運動進入第二次高潮，再次搜尋適合充當右派者，右派分子數目增加到了百分之七。我們準備寫信的事，就在這場新搜索中落網。這封信，很容易在階級鬥爭的程式上通過。我們的信是寫給黨中央的，所以是反黨；我們的信有大綱，所以是有綱領的；我們 5 月以來每週討論一次，所以是有計劃的；我們是三個人，三人為眾，所以是有組織的。這一案例，很快成為北大的一個新典型。在北大，印發了我們的信的提綱，嚴加批判。倪皖蓀，李淑嫻均被定為右派分子，一個二類，一個六類。王竹溪先生在物理系討論李淑嫻問題時說：李不夠右派，還差一個 delta（數學上的小量，但不為零）。但是，馬克思的《數學筆記》中沒有 delta，只有零除零。

我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也遭批判。對著我喊的「不老實！」，也聽過幾次，但終歸沒有正式被定為右派。得以倖免的原因之一是，當時我不屬北大管轄，而屬於中國科學院。鄧小平沒有來科學院，也就沒有優惠給科學院額外的百分點。原定的百分之五的定額，業已滿員。「右派分子」的帽子全已分發完畢，已經沒有給我準備的名額和帽子了。另一說是，當時的科學院副秘書長杜潤生，把我從右派分子的名單中劃掉。果如此，當在此謝之。

全員覆沒之後

一封並未寄出的信的所有參與者，就此全員覆沒。倪皖蓀後來被開除出北大，

送去勞動教養，二十二年後，才再回到大學執教。

李淑嫻則留在北大作為反面教員——賤民的‘優雅’稱號。

我則於 1957 年 12 月被逐出核反應堆研究組，下放河北省贊皇縣，勞動改造。

覆沒的消息一個接著一個地傳來。

楊德勳，我中學好友，也是北大同屆，從中文系畢業後到中央戲曲研究院工作。致力於戲曲理論。不時地給我送來一些戲票。從洋歌劇「茶花女」到川劇「打面缸」，都有。後來，不來送了。右派。

施於力，北大同屆，中文系，以朗誦《致大海》對抗我們物理系的詩歌朗誦隊。大勝。獲北大首屆朗誦賽冠軍。其父為托派。1957 後，沒有聲音了。右派。1966 年自殺。

朱津棟，物理系朗誦隊的指揮。畢業後到大連醫學院任教，並研究物理醫學。不幸，因酷愛藝術，認識一位原胡風分子。右派。

侯德彭，我大學做物理實驗的搭檔，畢業後，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任職。他們似也有一個沙龍，也都是年輕人。我也去過兩次，聽到其中有人公開聲稱，不信馬克思，而信康德，云云。後來，沙龍不能去了。《人民日報》上登了侯的名子，中宣部的首批右派。1967 的武鬥年代，侯被派到廣西邕江撈屍。

……

不能盡數。

有的人，從此音信杳然。

不完全統計，1956 年從北大物理系畢業的一百人中，至少二十人是正式的右派分子（即類別小于、等于 6 的右派）。中文系也類似。「類外而內控」如我者，就算是很「幸運」的了。

終結

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潮流，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插曲。我們也被捲進這個潮流裏來了。共產主義夾雜在十九世紀西歐的自由主義思潮中興起。到俄國的革命，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它被很多知識份子接受，可以說是一個主流。從西學東漸到西潮東漸，我們這一代人東方的青年趕上了這個東漸潮流的尾端。

從此—1957，共產主義思潮，在中國，和在全世界一樣，走過了它的歷史峰值。

再見吧，自由的元素。

我將長久地、長久地傾聽

你黃昏時分的轟響，

你悲哀的喧響……

1990 年 2 月，北京

附記：

1986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剛從意大利回到北京，並準備於當天下午離京去上海、寧波，再回合肥上課。在北京暫短逗留的半天裏，我和李淑嫻去許良英家。開會。只有四個人，許良英、劉賓雁、李淑嫻和我。論題是：反右運動快三十年了，我們能做些什麼？一致的意見是，在 1987 年春舉辦一次「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大家討論了會議的議題以及有關組織的方法。最後，要我根據這些意見起草一份會議通知。在南行的旅途上，我寫了初稿。到合肥後，迅即寄給了許。他們修改後，就散發給了可能的參加者。這就是後來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中央收集在批判劉賓雁材料中的黑「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

______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即將滿三十周年了。反右運動是值得研究的，因為，不瞭解反右運動，就不能全面地瞭解三十年來的歷史，也就難以認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撥亂反正和推行改革的歷史性意義，也就很難深刻認識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我們社會中蘊藏的蓬勃生機。

反右運動的許多當事人，已年過花甲，應該及時把有關史料收集和保存下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使這一段歷史變成留給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識。為此，我們發起舉行學術討論會，開始這一歷史研究，其主題應包括：

1. 史料的收集，當事者的經歷或見聞，統計資料；
2. 反右運動的國內和國際背景；
3. 反右與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運動的關係；
4. 反右對政治道德的影響；
5. 反右運動的歷史、社會根源；
6. 反右之後「左」 派及右派的運動軌跡；
7. 反右與今天的開放、改革、現代化。

我們邀請您參加討論會，歡迎提出自己的報告，請告知您的報告題目，每個報告限在一小時左右，會後將根據報告，選編成文集出版。

會議時間：1987 年 2 月 3-5 日

會議地點：北京（具體地點待定）

費用：全部自理，確有困難者請來信告知，以便為您籌措。收到通知後，請您於 198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否能參加，以及您參加會議的報告題目。

聯繫地址：北京中關村 812 樓 704 許良英。

發起人

許良英 劉賓雁 方勵之　 1986 年 11 月

在許良英家的籌備會上，沒有討論我們幾個發起人應當講什麼。許、劉兩位都是出了名的右派，做為當事人，或做為見證人，他們都不乏講題。按當局的規定的級別，右派分子（非學生）共分六類，一類最大，六類最小。學生右派分子分四類。許和劉都是第二類右派。李淑嫻是第六類。我則是類外，沒有右派的正式名銜，而是「內控」，不及他們三個。所以，我當時並沒有想好講題。反正還有兩個月時間可以慢慢去想呢！

事情發展就是快。「通知」發出不到一個星期，1986 年 11 月 30 日，科技大學學生貼出第一張小字報，質問人民代表候選人是由誰定的。12 月 5 日，學生上街遊行。隨後觸發了全國 29 個城市中的 156 所大學學生上街遊行。不過，科大的局勢很快穩住了，三天之後，學生上課，教師授課，逐漸回歸正常。12 月 9 日，管惟炎校長要我就科大局勢的穩定與胡啟立（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通

過一次電話，向他澄清一些有關科大的不實報導。胡沒有說什麼話，至少沒有我記得住的重要「指示」。 大概是風暴之前的無言和沈默。根據經驗可以預感，運—動—要—來—了…。

果然，兩天後，李淑嫻從北京打電話來，許良英告訴她，《人民日報》社領導要求劉賓雁退出「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隨後，李淑嫻不斷打電話來，催我趕快回京。我的課程——近代物理——於 12 月 31 日上午結束。趕到北京，正好是 1987 年元旦。第二天，1 月 2 日，中共中央下達 1987 年第一號文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正式啟幕。隨後兩個星期，報紙上的頭版新聞是：1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長職務，撤銷方勵之科大副校長職務；1 月 14 日，中共上海市委決定，開除王若望黨籍；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報，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1 月 19 日，中共安徽省紀委決定，開除方勵之黨籍；1 月 25 日，中共《人民日報》機關紀委決定，開除劉賓雁黨籍。許良英漏網，據說是鄧小平一時說不出許良英的名字。就此，「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也成為標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事件之一被記入中共的文件。

雖然「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夭折了。我還是記下了我在 1957 的片斷經歷，以備不時之需。這就是正文的來源。所以，上述的「通知」（1986 年）應是正文（1990 年）的一個前言。 2004 年 9 月，Tucson

方注：前文分別寫於 1990 年和 2004 年，未發表。現只作了少許技術性改動。供《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會議參考。 2007 年 2 月 12 日

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在東歐和北越的影響
——對「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的再考察 程映虹

五十年前，1956 和 1957 年的「非斯大林化」標誌著冷戰時期全球共產主義陣營的第一次嚴重危機，期間發生了很多重要事件。赫魯曉夫在 1956 年 2 月蘇共「二十大」上關於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震動了整個共產主義世界，並引發了一

場政治地震，在很多國家最終導致對共產黨體制的挑戰，特別表現在 1956 年底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他東歐國家雖然基本上未發生由政治抗議引發的大規模暴力事件，但黨內辯論和異議知識份子的聲音還是非常普遍，同時也發生了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在亞洲，中國知識份子對共產黨體制的批判是眾所周知的，尤其是在 1957 年春天的「整風運動」中，此外也發生了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在北越，知識份子直接向党國體制挑戰，在 1956 年秋發起了「《人文》、《佳品》」(這是兩份當時有影響的異議刊物的名稱)運動，同時北越義安省農民發動了反抗越共「土改」和整個農村政策的武裝暴動，在城市也有工人和學生的騷亂。

值得注意的是，1956 年 11 月，當蘇聯坦克開進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鎮壓了匈牙利革命之後，整個蘇聯東歐的政治氣氛發生了根本變化。但在中國，中共繼續允許知識份子批評政府，這不但給蘇聯造成了壓力，而且在一定意義上鼓勵了東歐黨內改革派發出自己的聲音。「匈牙利事件」發生後不久，北越政府鎮壓了義安省的農民暴動，用取締報刊和發起批判壓制了知識份子的異議；但到了 1957 年春，隨著中共對知識份子批評的寬容和鼓勵，越共的「反自由化」運動失去了勢頭，越南知識份子也恢復了對黨的批評；直到 1957 年初秋，越共尾隨中共發起了大規模「反右鬥爭」，結束了所謂的「自由化」。在東歐，中共的「反右」給了東歐一些黨內改革派勢力最後一擊，「匈牙利事件」後殘存的改革派人士最終在 1958 年初被清除，世界共產主義陣營的第一次大規模政治危機至此告終。

迄今為止有關「反右」的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國國內政治為主要背景，對蘇聯的「非斯大林化」只稍有涉及。筆者在本文中選擇了一個不同的角度，把中共的「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放到國際共運的大環境中觀察，著重分析 1956 年至 1957 年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在東歐和北越的影響。由此可以發現，中共的「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之決策，不僅服務於國內政治目的，而且與中共的國際目標有重大關係；「雙百方針」的提出，不單純是為了「引蛇出洞」，也是中共在國際共運陣營裏嶄露頭角、爭奪領導地位的舉措。如此看來，對「反右」運動之前的風風雨雨，應當有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認識「反右」運動的由來和毛主義的實質。

一、「莫斯科中心論」和「中國聯繫」

在敍述和分析這場「非斯大林化」或自由化運動時，人們常常遵循一個以莫斯科為中心的模式（筆者稱之為「莫斯科中心論」)。這個模式置蘇共——尤其是蘇共「二十大」——為中心，把其他國家放在邊緣。在這個模式的敍述中，這些邊緣國家最初對蘇共批判斯大林的反應是震驚和困惑，但很快一些國家的黨內外人士就利用這個機會發出那些通常不被允許的改革之聲，由此出現了一場自由化運動。

考慮到蘇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以及一些最重要事件的先後順序，「莫斯科中心論」基本上是符合歷史真實的，但有必要注意這個模式的一些盲點。「莫斯科中心論」的主要缺陷是，忽視和低估了那些並非起源於莫斯科的政治變化，這常常導致對一些複雜歷史事件和對各國共產黨之間相互關係理解的簡單化。

「莫斯科中心論」還有一個重大缺陷，它強調在這場自由化運動中國際範圍內受到挑戰的主要是「斯大林模式」，卻忽視了「毛澤東模式」實際上同樣受到了挑戰。在中國和北越，「土改」、「鎮反」、「整風」、党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和對文學藝術創作的嚴酷控制，這些相似的政策與其說是「斯大林模式」的產物，還不如說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發明創造。這些做法通過思想、組織和人事方面的渠道至少對北越的共產黨革命產生了重大影響。1956 年到 1957 年期間，這些毛主義的產物不但在中國「右派」的言論中，而且也在北越知識份子中受到了挑戰。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問題。今天回顧 20 世紀的國際共運史時很多人以為：「斯大林模式」(以農業集體化、工業化和黨內清洗等為代表的建立極權主義體制的道路)在 50 年代中期受到了清算；而毛主義(以「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用「不斷革命」來鞏固和發展極權體制)的被批判始於七十年代末，是「文革」的災難性後果引導著人們開始否定毛主義，但毛主義關於「民主革命」和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很多政策還是「符合實際」的。這也就是所謂毛澤東的「早年」和「晚年」之區別，也是其個人功過「三七開」的主要根據。然而，回顧 1956 年到 1957 年的歷史，在國際共運陣營清算「斯大林模式」的同時，這個被「七分肯定」的毛主義實際上也受到了批判和挑戰，儘管在程度和影響上與蘇聯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還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我們至少有理由對

國際共運史上對毛主義的批判究竟始於何時這個問題重新考慮。

在這個意義上，本文從中共與一些東歐黨和北越黨的關係——或者簡單地說是「中國聯繫」——出發，考察共產黨國家在 50 年代中期由「非斯大林化」引發的自由化，並強調「中國模式」或毛主義在這場政治巨變中的作用。這是一個至今被「莫斯科中心論」所忽視或低估的問題，即使是在資訊自由的西方學術界也是如此。1

「中國聯繫」的內容非常複雜，它可以包含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共的「土改」、「鎮反」、「整風」，以及經過「延安整風」形成的知識份子政策和文藝政策，這些對北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結果是北越在 1956 年到 1957 年間的「自由化」實際上不是反斯大林主義，而是針對這些毛主義的產物。但毛主義的這個側面在東歐國家基本上未產生重要影響。第二方面是中共當時的「雙百方針」、從 1956 年初到「反右」前寬鬆的知識份子政策以及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人民內部矛盾等。這些政策也是毛主義或「中國模式」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組成部分，客觀上是對此前的很多政策的修正，具有明顯的解凍或自由化傾向，在實踐中不但鼓勵了中國知識份子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啟發、鼓勵了東歐和北越黨內的改革派和異議知識份子的活動。東歐把毛主義和「中共模式」的這個方面借用來作為對抗斯大林主義和蘇共強權的意識形態武器；而在北越，異議知識份子則用毛主義和「中共模式」的這後一方面來對抗其前一方面。從這個意義上看，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在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後繼續發揮著影響，直到中共發動「反右」運動為止。「中國聯繫」的第三個方面是毛主義和「中共模式」對其他國家共產黨處理危機的方式之影響，包括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策略的國外應用以及對自由化運動最終的鎮壓。中共的「反右」給了東歐和北越自由派知識份子和黨內改革派以最後和最致命的一擊，從而宣告了斯大林死後共產黨陣營內自由化運動的終結。

應該指出，毛主義或「中國模式」的這三個方面在具體政策傾向上雖然有重大甚至原則性差別，但在兩個根本點上是相互聯繫且完全一致的。其一，在國內它們都是為了維護一黨專政這個目標，不同的僅僅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段和途徑。中共建政之初，還處於體制上的摸索階段，尤其是在處理和知識份子的關係問題上更是如此，因此在一定階段內表現出了靈活性。那也是毛澤東掌權的 26 年中唯一的一次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控制上表現出靈活性的時期。其二，在國際上，

它們都服務於在國際共運中推廣「中國模式」和樹立毛主義的地位這個總方針。在斯大林去世並受到批判、蘇共領導地位受到「二十大」正反面影響的衝擊的形勢下，中共企圖提出對其他共產黨國家有吸引力的政策，通過推廣自己的模式來擴大它在國際共運中的影響、甚至和蘇共平起平坐，這一意圖是非常明顯的。

本文討論的「中國聯繫」主要涉及兩個方面。其一是中共和東歐(一定程度上蘇聯也包括在內)從 1955 年到 1958 年初的關係; 其二是中共和越共在相同歷史時段內的關係。從這兩個方面分析了「中國聯繫」之後，不但可以看到一個「莫斯科中心論」無法解釋的共產黨國家政治變化的源頭，而且有助於加深認識那個階段的歷史演變，甚至引導我們把分析的時間範圍進一步擴展，比如，有必要將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報告之前和匈牙利革命被鎮壓之後的諸多事件也納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和越南知識份子的抗爭實際上是一種不同于波蘭－匈牙利事件的政治抗議模式：波匈是有工人和市民大規模參與的政治暴力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政權更替成為公開訴求，知識份子最終被邊緣化；而中越始終以知識份子的抗爭為主，爭取言論自由始終是主要訴求。

二、中共「雙百」方針對東歐國家的影響及中共對「匈牙利事件」的態度

很多歷史學家認為，中國在東歐事務中產生重大影響始於它在解決 1956 年 10 月和 11 月的東歐政治危機中。2 當時，莫斯科決定動用武力鎮壓波蘭工人運動，中共反對這個決定，認為波蘭問題主要是由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引起的，抵制了蘇聯所說的「西方陰謀論」；然而，在匈牙利問題上，當蘇聯徘徊於鎮壓和放手之間時，中共先是持相似于對波蘭問題的立場，但不久又變為催促蘇聯出兵鎮壓。近些年披露的中方材料證明，從 1956 年 10 月下旬到 11 月初，中共和蘇共之間的聯繫極為密切，中共積極參與了東歐問題的處理。

1. 中共在波蘭和匈牙利危機中的立場和參與過程

1956 年 10 月，當瓦迪斯拉夫・哥莫爾卡在國內嚴重的政治危機中當選為波蘭党的領導人之後，莫斯科認為他對蘇聯的態度曖昧，波蘭局勢可能失控，於是決定鎮壓。蘇聯駐華大使尤金于 10 月 19 日會見毛澤東，通報了蘇聯的立場。毛立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反對蘇聯干預波蘭。毛於 20 日和 21 日兩次召見

尤金，通報了中方立場，凸顯出北京的強硬。蘇聯方面於是邀請中共派高級代表團前往莫斯科，當面協商解決東歐危機的方案，中共立即派劉少奇和鄧小平於 23 日赴蘇。中共領導人到達蘇聯後，一直與蘇共領導人保持密切聯繫，甚至列席了 24 日和 26 日蘇共主席團會議。10 月 29 日和 30 日是波匈事件的關鍵時刻。29 日晚蘇共領導人會見劉鄧，說明波、匈局勢大變，兩國政府已要求蘇聯駐紮在這兩國的軍隊立即撤出。劉鄧說，波、匈問題雖然是由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引起的，但目前局面下蘇軍不宜立即撤回。這時中共代表團接到了毛澤東電話，毛主張蘇聯立即撤軍，劉少奇馬上改變主張，向蘇方轉達了毛的意見。次日，中共代表團接到了蘇聯派往匈牙利的副總理米高揚從現場發回的報告。報告稱，隨著蘇軍撤出，匈牙利已發生反革命殺人事件，匈政府和保安部隊已瓦解。與此同時，中共也接到了駐匈牙利使館和其他派出機構的相似報告。經過一天的討論後，劉電告毛，認為匈牙利事件的「性質」已變，力主蘇軍鎮壓，得到毛的同意。不過毛說，最好再給反革命幾天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這是典型的毛方式。得到毛的同意後，中共代表團緊急約見蘇共領導人，劉要蘇聯不要「放棄」匈牙利，鄧小平則直截了當地要蘇聯軍隊返回布達佩斯，鎮壓「反革命」，奪回政權。但赫魯曉夫說，蘇聯已錯過了干預匈牙利的時機，現在蘇軍再返回布達佩斯，會被國際上看作是對外國的軍事佔領，所以蘇聯領導人決定不加干預。聽到蘇聯領導人的這一決定，中方沒有堅持。但 11 月 1 日早晨，赫魯曉夫前往飛機場，與即將啟程返回北京的中共代表團舉行緊急會談，告知他們蘇聯又改變了方針，命令蘇軍開回布達佩斯(實際上在和中共代表團會面時，蘇軍坦克前晚已經開進了匈牙利首都)。3

中共方面的材料披露了蘇共領導層在匈牙利危機中的動搖和猶豫，這可以在赫魯曉夫自己的回憶中找到佐證。他說:「我不記得究竟有多少次我們在匈牙利問題上是『一舉粉碎叛亂』還是抽身離開之間舉棋不定。」4 究竟中共在促使蘇聯下決心鎮壓上起了多大的作用，這是個很難判斷的問題。但根據上面所引的中方材料，至少蘇共領導人做決定時對中共的態度是非常重視的。至少可以說，中共對匈牙利事件在最後關頭的強硬態度促成了蘇聯領導人下決心。11 月 3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支持蘇聯鎮壓，這是共產黨陣營中最早對鎮壓表態的黨報之一。1957 年 1 月中旬，當匈牙利局勢還很不穩定、面臨巨大國際壓力時，周恩來訪問了布達佩斯，給了依靠蘇聯坦克建立的新政權極大的支持。

以上情況可以在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很多出版物中看到，海外研究者對此也不陌生。然而，中共在匈牙利問題上最後關頭的強硬立場和後來對鎮壓的全力支持，其實只是中共當時對「非斯大林化」問題的立場的一個側面。中共對「大國沙文主義」的批判，反對蘇聯企圖出兵波蘭，以及毛澤東在匈牙利事件的「性質」轉變之前要求蘇聯撤兵，這些都說明中共在波匈問題或者更廣泛的蘇聯東歐關係上有更複雜的立場。

2.「非斯大林化」給中共帶來了在國際共運陣營中嶄露頭角的機會

如果擴展視野，把「非斯大林化」的整個過程都包括進來，特別是考察一些不太被重視的歷史材料，那就會發現中共立場和影響的另一面。如果用正統斯大林主義的標準來衡量，並把動機擱置一邊，那麼中共的一些政策無疑具有自由化傾向，在東歐國家的改革派領導人和知識份子中從 1955 年起就引起了共鳴，其影響早于蘇共「二十大」。在匈牙利革命被鎮壓後的半年多時間裏，中共繼續允許知識份子批評党和政府的政策，也仍然影響著東歐國家，直到「反右」運動開始。

有證據表明，中共對東歐國家的影響在斯大林死後不久就開始了。斯大林死後，蘇聯領導人由馬林科夫為首發起了自稱為「新路程」(New Course)的改革。在國內政策上，「新路程」主張適度減少對重工業的投資，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放鬆對主要日用消費品的價格控制，在政治生活上緩和政治鎮壓和恐怖，在對外政策上修正斯大林時期受到損害的與東歐各國共產黨的關係，為斯大林時期各國黨內一些受迫害和排斥的領導人恢復名譽和地位，尤其是恢復鐵托的名譽(鐵托於 1948 年被蘇聯操縱的「共產黨情報局」開除，鐵托被宣佈為叛徒)，赫魯曉夫並於 1955 年 5 月訪問了南斯拉夫。與後來蘇共「二十大」造成的政治風暴相比，蘇共的這些政策不過是和煦的微風，但它們確實起到了「解凍」被斯大林主義僵硬了的政治土壤的作用。

東歐黨內的改革派也開始把這些政策引入本國的經濟政策和黨內生活中。為了從莫斯科的控制下得到更多的自治，一些東歐國家領導人轉向北京尋求意識形態支援。它們的理由是，中國正處於同它們類似的發展階段(從「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而蘇聯早已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

例如，東德是較早受蘇聯「新路程」政策影響的國家，東德黨在 1955 年 11 月的全會上通過了按照「中國模式」對剩餘的大型私人企業國有化的方案，對原

業主提供相當於其資產 50％的贖買金，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贖買而非全盤沒收，允許原業主參與國有化後的管理(至少在原則上如此)，這些都是中共革命有別於俄國模式之處。5 東德黨對中共比較溫和的國有化模式的興趣還表現在對中共模式的介紹上。1956 年 6 月 13 日，東德黨報 Neu Zeit（《新時代報》）翻譯並發表了中華全國工商聯主席發表于《人民中國》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為什麼我們資本家歡迎社會主義」，作為對東德私營企業主讀者對「中國模式」的問題之回應。該年 9 月，東德黨刊 Einheit（《團結》）翻譯並發表了一篇中文文章，題目是「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新階段」。同月，東德党總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應邀列席了中共「八大」，他回國後介紹中國情況時強調了中共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6

波蘭和匈牙利的共產黨改革派領導人對中共的一些政策提法表現出更大的興趣。例如，匈牙利原總理伊姆雷·納吉對中共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7 十分推崇。納吉原來在斯大林時期受打擊被下獄，「新路程」時期被平反和起用，1953 年底擔任總理，但不久又被黨內以拉科西為首的斯大林主義者構陷，於 1955 年 3 月下臺。下臺後，納吉感覺到政治氣候會發生變化，於 1955 年底 1956 年初撰寫了「為新路程辯護」的長篇文章，向黨上書 8。在這份匈牙利改革派共產黨人的政治宣言中，對外政策這一章的標題是「國際關係的五項基本原則和我國外交政策的問題」，其主旨就是用中共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匈牙利的民族主權和從莫斯科的統治下獨立的要求辯護，納吉特別指出，它們的應用「必須被擴展到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之間。」9

蘇共二十大後，隨著斯大林主義受到公開批判，中共對東歐國家的吸引力不斷增強，中共也積極地在東歐擴展影響。中共對自己的一些政策在東歐的反響以及蘇聯和東歐盟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心中有數的，對東歐國家斯大林主義領導人在「解凍」和蘇共「二十大」後的困境也非常注意。為了擴大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影響，中共十分注意發展與東歐那些改革派人物的關係。

當時匈牙利外交部負責亞洲事務的雅諾什·拉凡伊(Janos Radvanyi)與中共駐匈牙利大使館和大使郝德清的關係非常密切。據拉凡伊回憶，中共大使館在匈牙利的黨和政府機構內建立了非常有效的情報網，通過這個情報網，郝德清不但得知納吉的上書，而且通過在匈牙利黨中央秘書處的關係得到了一份複製件。當

蘇聯大使館還在遵循過去的模式邀請「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斯大林體制下的勞動模範)作客時，中共大使館卻對作家、藝術家、經濟學家和記者的興趣更大，常常在大使館用中國菜招待這些知識份子，他們當中有些人是匈牙利政府不信任的。郝本人和大使館的其他高級人員以及新華社駐匈記者，常常外出考察匈牙利社會。當「裴多菲俱樂部」開始活動時，中共大使館就通過自己的交換學生掌握其活動。可以說，中共對匈牙利政治局勢演變的瞭解是很細緻的，這在初期為中共瞭解匈牙利「非斯大林化」的進展提供了途徑，在後期則為其判斷匈牙利事件「性質」的轉變提供了材料。10 匈牙利事件之後，當匈領導人再次訪問中國時，毛澤東曾告訴他們，他當時每天都聽取從中國大使館和新華社發來的詳細報告，這些報告幫助了中國領導人對匈牙利局勢的轉變作了正確而及時的判斷。新華社駐布達佩斯記者為此獲得嘉獎，大使郝德清後來也官運亨通。

1956 年 10 月 30 日，蘇聯發表了「蘇聯政府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承認蘇聯在處理與「兄弟黨」的關係中有過錯誤。這是蘇聯公開表示軟弱和退讓，其內部已決定不干預匈牙利危機。當時，毛澤東也主張蘇聯撤兵。11 月 1 日中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響應蘇共聲明的文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蘇聯政府 1956 年 10 月 30 日宣言的聲明」。該聲明提到：「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同時又是以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團結在一起的。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就更應該建立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這種口吻表明，中共意識到這是歷史給予它的向蘇共領導權挑戰的良機，所以它抓住機會在這一時刻明確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適用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匈牙利知識份子正是從《人民日報》的這種表態中，判斷中共站在他們一邊。

然而，形勢瞬息萬變，幾乎就在中共發表 11 月 1 日的這項聲明的同時或稍早，中共對匈牙利局勢的判斷已經改變(其間只差一到兩天)，蘇共也決定出兵鎮壓。因此，《人民日報》剛唱玩「和平共處」、「不干涉內政」的高調，兩天後就發表社論，堅決支持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顯然，對視一黨專政為生命線的中共而言，崇高的「五項原則」其實不過是個美麗的肥皂泡而已。

3.「雙百」方針如何在國際共運中為中共贏得聲望

1956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

「雙百方針」的文章，引起了東歐國家知識份子的強烈興趣，促進了這些國家思想文化領域裏的自由化。該年 9 月，中共召開「八大」，所有東歐國家共產黨都派出代表團列席，中共利用這個機會和各國共產黨領導人密切接觸，發展關係，介紹「中國模式」。匈牙利代表團團長是改革派領導人雅諾什・卡達爾。他和納吉一樣，在斯大林時期被迫害，1954 年恢復名譽並進入黨的領導層，是蘇共「二十大」後匈牙利乃至整個東歐陣營的政治明星。中共領導人對卡達爾非常感興趣，毛、劉、周、鄧等都會見了他並長時間談話。10 月 1 日，卡達爾再次帶領匈牙利黨政代表團參加北京的中共建政十周年慶祝活動。中共駐匈牙利大使郝德清抓住這個機會擴展中共在匈牙利的影響，他向匈牙利各界人士廣泛散發了中共「八大」的材料，在匈牙利電臺和報刊上介紹中共的方針，使得許多匈牙利知識份子認為，「雙百方針」是中共誠心誠意實行的不同於斯大林主義的路線。

11 月初，當蘇聯軍隊開進布達佩斯時，很多匈牙利知識份子還誤認為中共仍然站在他們一邊。11 月 2 日匈牙利知識份子的刊物 Irodalmi Ujsag(《文學報》)還寫道：「西方和東方都站在我們一邊。美國已經清楚地表達了對我們事業的信念，其他一些大國如中國和印度也是這樣。」11 當蘇軍進入布達佩斯後，很多匈牙利知識份子根據他們過去對中共的印象，紛紛前往中共大使館尋求庇護，但被中共大使館拒絕。

雖然中共在最後關頭全力支持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但在國內政策上，「匈牙利事件」後中共不但未收回「雙百」方針，而且毛澤東還在 1957 年 2 月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承認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人民和政府之間有可能產生一定的非對抗性矛盾，表示出對民眾當中的異議的某種容忍。1957 年 4 月，中共甚至大力號召知識份子幫助党「整風」。中共在國內的這種放鬆控制和容忍自由化的政策，當時在一些東歐國家有相當的影響。

今天中國的不少研究者認為，1957 年初春毛已決定「引蛇出洞」了。但那時東歐的知識份子和黨內改革派對此毫無所知，對他們來說，中共在「匈牙利事件」後堅持「雙百」方針、承認人民內部矛盾、鼓勵知識份子批評党和政府，無疑是保護了「非斯大林化」的成果。所以，波匈事件後，一些東歐國家的改革派把中共看成是「非斯大林化」的「聖地麥加」12，中國成了暗夜中一座令他們嚮往的燈塔。

在東德，改革派領導人卡爾・施德萬(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保羅・萬德爾(書記處主管教育的書記)和容格・庫辛斯基(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等人，紛紛稱讚中共通過區分「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矛盾，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尋求和諧並鼓勵對政府的批評。施德萬說，中共真正懂得如何「創造性」地利用蘇共「二十大」的方針。萬德爾認為，中國是唯一的「把黨和群眾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當作頭等大事的社會主義國家。庫辛斯基公開號召在東德實行「雙百方針」，說「讓百花齊放，讓它們表現出自己的色彩，因為每一朵花都用它們無數不同的色、香、形裝點這個世界。這是對待科學家、作家和藝術家的真正進步的態度。」13 這些人的言行給東德黨內保守派和斯大林主義分子造成了很大壓力。總書記烏布利希原來對「中國模式」很推崇，「匈牙利事件」後他轉向保守。1957 年 2 月，針對黨內要求實行「雙百方針」的呼聲，烏布利希回應說：」我們的主要問題不是讓百花都放，而是有選擇地允許那些正確的去放，栽培真正新的、有益的花，而對那些在鮮花的外表掩藏下的毒草絕不姑息。」14

在「波蘭事件」中，蘇聯沒有出兵，而是與改革派領導人達成妥協。改革派領導人哥莫爾卡在匈牙利事件後擔任總書記，他企圖在斯大林主義和改革之間保持一定的中間立場。1957 年 5 月他在党的全會上說，波蘭黨懷著「深刻的同情」注視著中國的政策。他稱讚中共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應用新的方法解決非對抗性矛盾」和「讓百花齊放」，這些是「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中至今為止沒有嘗試過的」，因而是對「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15 一個星期後，波蘭黨的一份刊物發表的一篇呼籲移植「中國的百花」的文章表示：「人民內部矛盾－－儘管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形式－－在我國也存在。如果我們要通過說服和討論的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就必須同官僚機構作堅決鬥爭，改善國家機器，對政治和階級盟友採用更靈活的政策。」16

4．蘇聯及東歐共產黨保守勢力對中共「雙百」方針和「反右」的態度

自從中國提出「雙百」方針後，莫斯科就抱有懷疑、批評甚至焦慮，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後。當中共決定公佈「雙百方針」時，陸定一受派遣前往蘇聯大使館向蘇方通報。這是根據中蘇兩黨的約定，彼此有重要決定時儘量事先通知對方（儘管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時並未事先向中方通報）。據隨行的陸定一秘書于光遠回憶，蘇聯大使尤金聽了陸定一的介紹後，找出列寧的一篇文章，意在用

列寧當年對言論自由的禁止反對中共對公開批評的容忍。離開蘇聯使館後，陸定一對于光遠歎息道：「他們的教條主義真是根深蒂固！」17

波匈事件後，中共對自由化政策的堅持更加深了莫斯科的不安。1957 年 4 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據參與會談和接待的俄文翻譯李越然回憶，伏羅希洛夫至少兩次對毛澤東提出了對「雙百」方針的不滿，說他無法理解為什麼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竟然被允許登載報紙上。他引了「匈牙利事件」作為自由化氾濫的後果來警告毛。毛的回答是：請放心，中國不是匈牙利，中共不想做「溫室裏的花朵」；如果反黨分子想借機推翻共產黨，他們只會落到暴露自己的下場。18

赫魯曉夫下臺後所寫的回憶錄裏提到了蘇聯領導人對中共自由化政策和報刊上大張旗鼓地宣傳「雙百方針」的反感。他說，中國人「很會提出一些動聽的說法」，他們「很會掌握提出正確口號的時機」。回憶中共的方針在蘇聯所造成的影響時，他寫道：「我們自己的宣傳幹部問我應該怎樣對中共的方針作出回應。『我們的讀者正在報紙上看到中國正在進行的新運動』，他們說，『這個百花運動已經潛入到蘇聯社會中了。』我們於是指示自己的報刊編輯和宣傳幹部不再報導這方面的內容，也不加評論。我們的立場是，中國的百花運動是中國為自己的內部需要而提出的口號，不適用於蘇聯社會。我們避免對這個方針作直接的批評，但我們也不表示支持……任何農民都知道什麼樣的花應該栽培，什麼樣的東西必須剷除。一些作物能結果，但味道苦澀，對健康有害無益，而另外一些則會瘋長以至於窒息那些鄰近作物的根莖。」19

赫魯曉夫當時已經由於「非斯大林化」而陷入了麻煩，他當然不想為任何進一步的自由化政策付出更大的政治代價，雖然他理解，毛不過是為了讓那些壞分子暴露自己而「引誘人們說出他們真實的想法」而已。赫魯曉夫也拒絕了毛關於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著人民內部矛盾的觀點，儘管這個觀點已在東歐國家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1957 年 6 月 2 日，當中國正處於「反右」前夜時，赫魯曉夫接受了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採訪。當問到他對北京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在人民和領袖之間存在矛盾」的看法時，赫魯曉夫斬釘截鐵地回答說：「我們相信我們沒有任何這一類的矛盾」。20

1956 年匈牙利曾受到中共很大的影響，匈牙利事件後上臺的党的新領導層對

中共「反右「前的路線和口號仍然心有餘悸。1957 年 5 月，就在中共極力鼓動知識份子向党提意見的時候，匈牙利黨的刊物發表文章，總結歷史教訓，警告那些眼睛看著中國、心裏想著在匈牙利實行「雙百方針」的人。文章說：「近幾個月中國——尤其是在文學、科學和藝術界——廣泛開展的『讓每朵花都開放』運動正在匈牙利引起越來越大的興趣……當這個運動剛剛開始時，曾經受到它導致思想自由化和壓制馬克思主義的指責……毛澤東同志對中國知識份子非常瞭解，他知道他們的大多數是忠於社會主義的，所以他為‘百花’的口號辯護……在經歷了過去的那場悲劇之後（指半年前的匈牙利革命——本文作者注），我們現在也許最好是對在匈牙利實行中國的方法保持警惕」。21

莫斯科對中國政策的警告、反對和禁止傳播的背後有兩個擔心。其一是本國和東歐的政治穩定；其二是中共借機在國際共運中向蘇聯的領導地位提出挑戰，尤其是在莫斯科的政治威信受到「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損害的時候。周恩來在 1957 年初訪問莫斯科時，在「雙百方針」問題上受到很大壓力，他利用在莫斯科大學接受名譽學位的機會公開表明了中共的態度。他說：「為了推動文學和藝術的發展，我們中國提出了『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方針。當然，我們這樣做是為了發展和豐富社會主義文化，而決不是為了取消或者削弱社會主義文化，列寧從來也沒有放鬆過對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化的尖銳批判。」22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蘇聯及東歐共產黨保守勢力的這種憂慮很快就釋然了。1957 年 6 月初，毛終於發起了「反右」運動，蘇聯及東歐國家的保守派松了一口氣。東德黨刊 Neues Deutschland(《新德意志報》)的記者于 7 月 12 日從北京發回報道說：「這次運動的主要對象是『右派』……現在那些過去站在『右派』立場上的人都暴露無遺了」。半年後，烏布利希在東德黨內發起了「反對修正主義分子」運動，清除了支持自由化的領導人施德萬、萬德爾、佛雷德・奧森納(政治局成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人)和其他一些同情者，很多鼓吹在東德實行「百花」方針的知識份子也遭到清算。

三、「中國影響」在北越

與對東歐的影響相比，中共對越南的影響發生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

裏，能看到的材料也豐富得多。如果說中共對東歐國家的影響始於斯大林死後，而且受到蘇聯影響的限制，那麼中共和越共之間歷史上的關係要密切得多，甚至可以追述到 20 年代。

1．中共和北越共產黨的緊密關係

胡志明和其他越南共產主義者曾經在「第三國際」指導下加入過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以中國為掩護。在抗日戰爭時期，胡志明留在中國廣西。抗戰結束後，很多加入中共的越南共產黨人和軍人回到越南北部，開展了抗法鬥爭。1949 年中共革命的勝利為越南革命提供了直接支援，中共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顧問和物資，中共革命的模式對越共也有深刻影響。1951 年 3 月的越共第二次代表大會把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列作為黨的指導方針，毛的像片也與馬恩列斯並列；「中國模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民主專政」被確定為越南當時和未來的革命目標，「民族統一戰線」也被稱為動員各種力量——尤其是民族主義知識份子——實現革命目標的主要手段。此外，歷史上越南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儒家思想和中國文化典籍一直是越南知識份子學習的對象，使用中文的能力(後來和使用法文的能力並立)是衡量一個知識份子文化教養的標誌。因此，很多越南知識份子可以從中文材料中瞭解外部尤其是北方鄰國的情況。

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北越的「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與中共的關聯遠比與蘇共的關聯密切。東歐國家當時的主要問題是照搬「斯大林模式」造成的，例如過度強調重工業，缺乏日用品和農產品，斯大林時期黨內清洗留下的案件和積怨，秘密員警的恐怖統治，最重要的是莫斯科的太上皇地位。這些問題在中國大陸的國際共運史研究中都是人盡皆知的。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批判「斯大林模式」給東歐國家帶來種種嚴重問題的同時，對自己的模式在北越所造成的問題從來諱莫如深。在中共正式公佈或間接透露的有關中越關係的文件資料中，充斥著中共如何在軍事、經濟、外交和人員上對北越的援助，但閉口不談北越在 50 年代上半期如何照搬中共的「土改」、「思想改造」(「延安整風」)以及知識份子和文藝工作這三大政策，給北越社會帶來嚴重破壞的情況。

2．中共農村政策在北越的影響

北越在 1946 年到 1953 年的抗法戰爭期間，對其控制區的地主富農基本上是實行「減租減息」，同時沒收法國地主和依附法國殖民當局的越南地主的土地，這

是中共抗日時期土地政策的翻版。早在 1949 年，中共就開始催促越共按照中共模式實行「土改」，但胡志明和其他一些越共領導人以越南情況和中國不一樣為由拖延抵制。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因此認為胡志明態度消極，不願意按照中共模式實行徹底的「土改」，在農村的階級鬥爭問題上表現曖昧。劉少奇在 1963 年一次反修正主義的內部報告中，以「老子党」自居，指名道姓地說，胡志明「這位同志歷來右傾。我們建議搞土改，他不搞……後來把他搞到莫斯科去，我跟斯大林一說，斯大林把他臭罵一頓。他才下決心搞土改」。劉少奇提到的胡志明的那次莫斯科之行發生在 1949 年 7 月。

從 1953 年開始，隨著對法戰爭的節節勝利，北越党認為全面勝利在望，於是加快了社會改造的步伐，開展了「土地改革」。當時北越黨關於「土改」的宣傳提綱中特別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革命在抗戰時期(即民族革命)一直堅持了「減租減息」，而現在北越也還處於相同的歷史階段(仍在和法國殖民軍作戰)，為什麼卻要實行中國在下一個階段才實行的「土改呢」？越共中央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中國當時由延安和重慶兩個政權組成民族統一戰線，後者代表地主利益；而北越的情況不是這樣，除了法國殖民者就是在西貢的保大傀儡政權，所以實行「土改」是有條件的。換言之，在北越，無人保護地主的利益，所以即使在「民族革命」時期也可以將他們打倒。

中共的顧問參加和指導了北越很多地方的「土改」，介紹了中共「土改」中「鬥地主」的經驗，比如在農村裏劃分階級路線、用各種手段煽動對「地富」的仇恨、甚至用地痞和流氓充當打手等。越共幹部在參加「土改」前都必須專門學習中共的「土改」政策和經驗。直接領導這次「土改」的長征從 1941 年起就擔任總書記，在越共領導人中地位僅次於胡志明。他受中共影響很深，不但把「土改」看成是在越南照搬「中國模式」的最重要部分，而且看成是他個人對北越革命最大的貢獻，甚至有時把派往地方的「土改」工作隊稱為「我的」幹部。

在全面「土改」之前，北越勞動党於 1953 年春節先在農村發動了一場恐怖運動，為即將到來的「土改」鋪平道路。這場運動以北越黨中央的一道命令開始，名義上是打擊那些沒有按照規定交納農業和商業稅的富戶，但實際上幾乎波及全體農民。運動開始後，幹部組成工作組，帶著棍棒、繩索和武器下鄉，對那些沒有完成上交稅收的農民嚴刑逼問，強迫他們交代逃稅的後臺和同夥，以及逃稅的

政治目的。使用的刑法包括在頭頸上吊石塊，用繩索拴住手或腳吊起來等等。這場運動很快就產生了滾雪球效應，把越來越多的農民捲進去成為受害者。後來運動失控了，逃稅與否已不再受到關注，揪出反革命和鎮壓反革命成了主要口號。在很多地方，工作組和党的幹部都只在幕後操縱，甚至原先被依靠的「貧苦農民」也遭到排斥，前臺則由鄉村的破落戶和痞子主導。恐怖籠罩了越北農村，很多黨員幹部由於其家庭背景和對運動的抵制也成為犧牲品，甚至一個回鄉探親的北越政府部長也被當作逃稅戶而關押，結果夫婦雙雙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殺。當時有數萬人被關押，直到 1956 年北越黨被迫「糾錯」時才被釋放。

越北農村的這場恐怖延續了兩個星期，有研究者認為，平均每個村有 4 到 5 人死亡。1953 年 2 月底胡志明發表了講話，對兩個星期來農村運動的失控表示遺憾，向農民道歉，但並未否定整個運動。「群眾的義憤」和「群眾自發的行動」被黨用來為恐怖和暴力辯護，「群眾永遠是正確的」、「群眾可以自己領導自己」等口號也被用來在原則上肯定這場運動。這些實際上都是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觀點。黨取得對農村基層的控制權後，收集了那些抵制運動、參加運動不力或企圖保護自己在農村的親戚的黨員幹部名單，然後把他們全部送進「再教育營」，直到 1956 年夏天才在「糾錯」運動中和那些被捕者一起釋放。這場「反逃稅」運動所造成的後果是，在北越農村造成了恐怖氣氛和對黨的絕對服從，為幾個月後「土改」的全面展開鋪平了道路。

北越的「土改」從 1953 年底國會通過「土地改革法」開始，到 1956 年底結束。在這場「土改」中，大量中農和富農被劃為「地主」而受到打擊，甚至被送上「人民法庭」乃至槍決。同時，越共還對「土改」對象的家屬實行「社會隔離」政策，不允許這些家屬與外界有任何聯繫，導致大批婦女兒童在家中餓死。這實際上是黨的「消滅地富」政策的組成部分。在黨內，很多反對這種「土改」政策的原「老區」的黨員幹部受到積極貫徹新政策的外來幹部的打擊、懲處甚至殺害。

3．北越的「整風」和「思想改造運動」

「整風」的越南文發音為 Chinh Huan。北越「整風」的歷史背景和中共的「延安整風」類似，都是對參加民族民主革命的幹部和知識份子不信任，要從改造人性入手建立高度統一的極權政黨。很多參加過「延安整風」的北越共產黨人回國後，把他們在中共那裏學到的經驗介紹過去。這場針對黨內外知識份子和幹部的

「整風」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是毛澤東「延安整風」的翻版。按照臺灣學者陳永發對 50 年代早期中共思想改造政策的簡明概括，「中共的思想改造主要籍由兩個方式：一是邀請知識份子參加土地革命，一是成立各種學習班或辦理各種政治學習」。這兩個方式在北越的「思想改造」運動中都被採用。

從 1946 年到 1950 年代初，越共普遍採用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思想改造」的主要方式。從 1951 年開始，「整風」運動在越北地區大規模展開，延續了幾年。這兩場運動波及北越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甚至那些在武裝和地下鬥爭中證明了自己對党的政治忠誠的知識份子，也被強迫送進與外界隔離的學習班和特殊學校，經受系統的強化的思想改造，被迫向黨坦白一切。很多人不堪忍受壓力和折磨而自殺，所以後來連剃鬚刀都被沒收，在電力緊張的情況下，「思想改造學習班」的燈火晝夜通明，對被改造者嚴加監視。從 1953 年到 1956 年，大批北越知識份子被安排參加「土改」工作隊，參加了農村人口「成分」調查、政策宣傳和撰寫通訊報導等工作，要求他們在此過程中既改造農村，也改造自己。

很多中國讀者都知道，有一個叫洪水(原名是阮山)的北越共產黨人，參加過中共的長征和「延安整風」，曾任八路軍的高級將領。他 1948 年回到北越，以少將軍銜擔任第四軍區司令。他根據參加「延安整風」和解放戰爭期間「整軍」的經驗寫了小冊子，建議越共實行「三整」(整黨、整幹、整軍)。由於洪水主張毛式「自力更生」，在軍事方針和爭取中共援助上與胡志明、武元甲等北越党、軍領導人有矛盾，洪水後來回到了中國，他的「整風」建議沒有馬上在北越實行。但 1951 年以後，越共在中共顧問的參與下還是發起了「整風」運動。洪水的建議說明，中共的「延安整風」模式在北越黨政幹部中早就產生了影響並形成了接受這種模式的土壤。

中共對越共的影響不僅表現為北越的「整風」中大量使用了中共的「整風」文獻，而且「延安整風」(以及後來歷次政治運動)中採用的很多具體做法也有其越南版本。例如「硬戴帽子」，即不管受審查者如何否認，他必須承認他從未犯過的罪行，絲毫沒有自我辯護的機會；還有「車輪戰」，即連續多個晝夜對受審查者進行盤根究底的逼問，涉及到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受審者心理崩潰。北越「整風」中的另一個常用手段是「連環套」式的追究「反革命」動機。有這樣一個案例，一位教師被懷疑為「反革命」，於是他的學生對他使用了這種方法，將他

定為「反革命」。其過程是：你給了某學生一個他不應得的高分，我們就此認為：一，你以此在我們之間製造矛盾；二，有了這種矛盾學生就相互爭吵；三，他們從此就不再進步；四，他們甚至會認為現在的教育制度不如法國殖民統治下的學校；五，他們會進而認為今不如昔，現在的整個制度不如法國殖民時期；六，所以用一個不符合實際的成績，你就達到了為殖民統治者服務的目的；七，可以得出結論，你就是法國殖民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的走狗。23

在中共的「思想改造」中，認「罪」者常常在公開場合痛哭流涕表示自己的悔「罪」；在北越，這種方式演變為一種集體性的悔罪和施加壓力的手段。在「思想改造」會議上，聽取「悔罪」者認罪的人常常集體痛哭流涕，表示他們沒有聽從「胡伯伯」和「毛伯伯」的教導，讓這個人犯了罪；或者是集體到一個還拒絕認「罪」的人那裏，在他的門口大聲哭泣，用這種方法逼他就範。這種方法在很多地方，尤其是集中了未成年「思想改造」對象的學校裏，造成精神失常。

需要說明的是，在國際共運中，北越只不過是受中共「延安整風」模式影響的一個事例。馬來亞共產黨在 60 年代也曾多次發動「整風」，讓黨員輪流去「學習班」，由一些從中國回來的幹部介紹「整風」經驗。毛澤東的「整頓黨的作風」、「反對自由主義」等被作為馬共的「整風」文獻，每個人都要「活學活用，敢於在自己靈魂深處鬧革命，把自己的骯髒卑鄙思想挖出來消毒，讓自己放下包袱，輕裝前進」。24 馬共內部在 60 年代末還發生了「肅反擴大化」的情形，因此大批參加革命的知識份子和青年被殺害。25 馬共 1989 年放棄武裝鬥爭重返社會時，大量受害者的家屬前往馬共營區追尋親人下落，馬共不得不專門發出文件，為這些受害者「平反」，追認其為「烈士」，並給每個受害者家屬 800 美元的賠償。

4．北越對知識份子的管理控制

和中國一樣，北越共產黨的革命吸引了大量懷抱民族主義理想的知識份子，尤其是文學藝術家，他們在民族主義革命中非常活躍。如果說中國知識份子很難找到第三條道路的話，越南知識份子更是如此，因為越南除了法國殖民當局就是保大傀儡政權，而中國畢竟還有一個獨立的國民黨民族主義政權在與共產黨爭奪知識份子，還有大量的城市供獨立知識份子活動。因此，民族主義意識強烈的越南知識份子在政治上除了北越共產黨以外沒有別的政治勢力可以選擇，在活動範圍上除了前往北越根據地以外也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讓他們作為民族主義知識份子

而生存。這些參加抵抗法國殖民主義的知識份子被稱為「抵抗知識份子」，很多人長期在森林中生活，與「越盟」（越共在抗法時期的名稱）的幹部戰士一樣落下了一身疾病。

如果說中共在革命中曾面臨如何改造大量知識份子這個問題的話，那麼在北越這個問題就更加尖銳。很多越南知識份子其實對以毛主義為模式建立的北越政權有反感，甚至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但在民族主義的兩難處境中他們往往選擇了前往北方、加入革命。北越 50 年代中期「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潘魁 26 曾對這種兩難處境和無可奈何的選擇有過一個比喻。他招待客人喝咖啡時，由於「越盟」控制的越南北部地方沒有可以直接融於咖啡的白糖，潘魁就讓客人嚼一些土產粗糖。他說：「這些土產粗糖代表愛國主義，它可以沖淡咖啡的苦味，而這種苦味就象党的領導。有了這種土產粗糖，我們就可以在忍受咖啡苦味的同時欣賞它的芬芳，因為這種芬芳就是我們知識份子的尊嚴。」還有一些知識份子把自己比作越共的「小老婆」，其含意是，不論你如何忠心耿耿，越共也永遠不會「明媒正娶」，改變你的「身份」。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知識份子人由於忍受不了「越盟」的控制和改造，於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離開越南北方的「越盟」控制區，回到了越南南方。

為了控制和改造參加革命的知識份子，北越實行了軍事化管理，所有參加反法民族主義鬥爭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家都歸北越軍隊的總政治部管轄(北越政府一直到 1955 年二月才建立起文化部)，接受軍事紀律的制裁。北越軍隊總政治部完全是仿照中共軍隊的模式建立的，很多越共軍隊政治幹部在中共軍隊中受過訓練，受黨的委派監督知識份子和藝術家的工作。在總政治部下有一個軍隊文藝工作處負責具體事務。北越也有模仿中共的文化藝術工作者聯盟(文聯)，但其權威無法和軍隊總政治部對文藝的控制相比。當時知識份子和藝術家甚至就住在軍營裏，受軍事紀律的約束，外出要象士兵一樣向上級申請離營證，社交對象也要由軍隊黨組織批准。

在文藝思想上，與毛澤東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統一黨的文藝方針，明確知識份子必須遵循党的路線、為黨的政策服務一樣，北越也把知識份子和文化藝術創作嚴格限制在為黨的政治目的服務的範圍。北越党的主席胡志明提出了「文化抗戰化、抗戰文化化」的口號，把文化完全看作是抗戰的一條戰線。

北越党的總書記長征在 1948 年 7 月的第二屆文化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作了「馬克思主義和越南文化」的報告。他明確指出，西方文化中為藝術而藝術的腐朽傾向在北越革命中是不允許的，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這個報告後來成為北越文化工作的指南。北越黨也有一個類似于中共文藝領導人周揚的角色，即中央委員、詩人素友(To Huu)，他在 1949 年就提出，必須從文化領域中徹底清除舊社會的全部遺跡，要讓藝術與政治結合，讓作品的政治內容決定藝術形式，文藝工作者必須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指導創作。在越共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文藝家都首當其衝。

5．北越知識份子的異議思潮

和中國一樣，正是在這些參加革命的知識份子中，產生了共產黨體制下最初的異議思潮。法國長期的殖民統治使越南知識份子能夠接觸到在西方形成的現代自由主義和民主人權的觀念，就像世界近代史上很多非西方民族從殖民統治下瞭解並接受這些思想一樣。而中國文化的長期影響，尤其是儒家人文主義和精英文化的薰陶，使他們難以接受共產黨革命中的暴力和粗俗。越南知識份子對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歷史非常熟悉。越共也利用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比中共在抗戰結束前後對美國制度的讚美有過之無不及。抗日戰爭結束前，胡志明和武元甲等人不但熱情接待空降到越北遊擊區的美國戰略情報局人員，表示未來的越南要和美國建立親密關係，而且多次向美國國務院發電報，表示越共的運動完全是民族民主性質的。1945 年 9 月 2 日，胡志明在河內巴亭廣場宣讀的「越南獨立宣言」中，第一段就完全引用了「美國獨立宣言」的第二段，即那些「不言而喻」的基本人權(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以及人民主權)，並稱這些是「不朽的原則」。胡志明還引用了「法國人權宣言」中的一段。《越南獨立宣言》的主要部分列舉了法國在越南的殖民統治如何公然無視這些普世性原則，踐踏越南的人權和民族權利。如果把這些段落與「美國獨立宣言」相對照，可以發現它們在結構上幾乎是對稱的，語言上也十分相近。不但如此，「越南獨立宣言」的結尾和「美國獨立宣言」也幾乎完全相同。胡志明和「越盟」如此做的政治目的是向美國表示，越共的革命是受自由、民主、人權的意識形態的鼓舞，並非共產黨革命，從而希望美國能支持他們在日本戰敗後防止法國殖民統治捲土重來。

據 Kim N. B. Ninh 的研究，北越党和知識份子之間的分歧早在 40 年代末就

開始了，但一直沒有合適的機會凸顯出來。27 北越共產黨 1954 年從法國殖民統治下獨立，結束了武裝鬥爭，進入城市，並建立了國家政權。城市生活助長了知識份子的獨立情緒。28 恰逢「非斯大林化」浪潮在各共產黨國家蔓延，北越知識份子從 1955 年 2 月開始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當時，軍隊中大約 30 名作家和藝術家聯名向中央委員會上書，要求廢除軍隊總政治部對文化藝術工作的領導。這份上書的內容包括：「一，把對藝術和文學的領導權還給藝術家和文學家；二，在軍隊組織範圍內建立作家和藝術家協會；三，廢除現存的對文藝工作的軍事化管理。」29 領導這場上書運動的是年輕詩人和小說家陳寅。參加上書的有詩人黄琴(當時是越軍總政治部文藝部的營級幹部)、音樂家子朴等。在上書的同時，陳寅帶領大約 20 名文藝家面見軍隊總政治部主任阮志清，提出 3 項保障藝術創作自由的要求。阮志清拒絕了這次請願，當面斥責這些人受到「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侵襲。這些知識份子本來以為他們參加革命的經歷已經使黨相信自己的忠誠，這次請願的失敗使他們大受挫折，為以後向黨發出更激烈的挑戰埋下了伏筆。

陳寅所領導的上書和請願是共產黨國家中斯大林死後文藝領域「解凍」呼聲的一部分。這種呼聲政治上要求放鬆對文學藝術家的控制，藝術上要求解除「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即只准從正面表現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統治)的束縛，是知識界自由化運動的先聲。一些北越文化界和知識份子的研究者認為：陳寅的活動與中國的「胡風事件」30 有關；當胡風對中共文藝界領導人提出挑戰時，陳寅正由越軍總政治部派往中國，撰寫反映「奠邊府大捷」31 的劇本，他在中國期間無疑對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文藝界人士中議論紛紛的胡風觀點有相當瞭解。和大多數參加革命的越南年輕知識份子一樣，陳寅是在對日抗戰結束時參加革命並開始創作活動的，1948 年入黨。在 40 年代下半期，他就表現出反對官方文藝政策——即胡風所反對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塑造模式化英雄人物的傾向。陳寅 1951 年參加過「整風」，是北越文化界中最早的一批接受中共「整風」方法的人，他對毛主義的一套和中共文化藝術界的情況非常熟悉，在北越文藝界同儕中有「中國大師」之稱。陳寅和胡風在文藝思想和對官方文藝權威的態度方面非常相似，可以說是在相同的政治控制和文藝政策下一對孿生的異議分子。在他 1954 年前往中國時，越共按慣例由總政治部派一位政工幹部伴隨陳寅，對他的創作活動橫加干預，陳寅不久就與這位幹部發生了衝突。回國後在發起向阮志清請

願的同時，他發表了長篇小說「前仆後繼」，表現奠邊府戰役中普通戰士的形像。他沒有按照官方教條把戰士的形像拔高，而是儘量使用現實主義的手法。與此同時他還發表了一篇文章，嚴厲批評和諷刺了越共文藝界權威人物、越共中央委員素友新出版的一本詩集。官方認為素友的這本書貫徹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文藝創作的樣板。而陳寅在他的文章中不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直接提出質疑，而且提出了「百家」的概念。他批判黨的文藝機構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教條下規定寫什麼和怎麼寫：「為什麼沒有人去寫政府機構？為什麼沒有人去表現愛情？為什麼只准寫工人農民出身的人物？現實主義應該鼓勵形式和內容上的百家爭鳴。」32

「百家爭鳴」作為學術研究上的指導方針，是毛澤東 1953 年應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歷史研究委員會主任陳伯達的要求，就郭沫若和范文瀾之間在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上的爭論所寫的題詞。這個說法不久就在中國知識份子中傳播開來，後來又成了「雙百」政策的一部分。陳寅關於「百家爭鳴」的提法是否與他在中國的經歷有關？作為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越南知識份子，他有可能知道「百家爭鳴」的典故。但更可能的是，他不久前在中國時對這個原則留下了深刻印象並受到鼓舞。

陳寅的上述言行可以看成是在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下越南知識份子的大膽發洩。研究越南 1950 到 1960 年代党與知識份子關係的 Ninh 指出：「很明顯，中國進行的對胡風集團的猛烈批判提高了越南黨的警覺。」33 隨著中共開展反胡風運動，1955 年 5 月，陳寅被北越共產黨「勸告」退黨。1956 年初，他又被送進「土改」工作隊強化「思想改造」。不久，胡風被中共逮捕，1956 年 2 月越共也逮捕了陳寅。一個參與決定逮捕陳寅的越共高級幹部認為：「中國有一個胡風，我們很可能也有一個」。34 在北越 1956 年 9 月 30 日出版的《人文》雜誌上，刊登了一幅諷刺党的文藝界領導在越南抓「胡風」的政治漫畫。這幅漫畫的畫面上，越共管理文藝工作的領導人之一懷青左手拿著胡風的書，右手把拿著反映「奠邊府大捷」作品的陳寅當胸抓住。漫畫裏有這樣的文字說明：懷青說，「同志們，這就是胡風本人！」陳寅說，「親愛的同志和領導，我發誓我的名字叫陳寅。如果你們不信，可以去查我的出生證明。」35

6.「非斯大林化」和「雙百」方針在北越引起的反響

陳寅被捕後不久，蘇共在 1956 年 2 月舉行了「二十大」，4 月派遣米高揚去北京和河內通報「非斯大林化」的新政策。蘇共的變化給越共帶來了震動，它不得不重新考慮與知識份子的關係。米高揚訪問河內後，越共以逮捕陳寅的決定未經高層批准為由將他釋放(陳寅曾經在獄中自殺未遂)。5 月，中共宣佈實行「雙百方針」，這立即激起了北越知識份子的共鳴。著名哲學家、新建的越南國立大學歷史系主任陳德草立即安排人翻譯了陸定一的講話，準備在北越發表。陳德草在法國獲得學位，用法文出版過研究現象學的著作，在西方哲學界很有影響。他于 50 年代初放棄在西方學術界的發展回到越南，參加了越共領導的反法鬥爭。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為了表示和自己的過去一刀兩斷，縮短與參加過武裝鬥爭的越共成員的距離，陳德草曾故意不用蚊帳睡在森林裏，讓蚊蟲叮咬，患上了瘧疾，這是很多遊擊隊員的常見病，幾乎成了參加革命的標誌。36

據 Bernard B. Fall 的研究，北越黨最初力圖限制蘇共「二十大」和中共「雙百方針」造成的影響，但北越知識份子對「非斯大林化」和「雙百方針」的熱烈響應不久就衝破了上層的限制，引發了 1956 年夏秋的異議浪潮。37 在自由化運動的初期，北越知識份子主要是討論創作自由以及黨對文藝的領導，但也涉及其他問題。8 月 1 日到 18 日，越共被迫讓文藝工作者舉行了「第一屆越南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北越原有中國模式的「文聯」，但從未開過代表大會)，議題是學習蘇共「二十大」文件和中共的新文化政策，結果會議通過了要求黨中央修改文藝政策的五項要求，包括立即翻譯中共有關「百花齊放」政策的文件。38 1956 年 7 月底 8 月初，河內市議會舉行會議時，與會代表也對越共各方面的政策（從食品短缺到稅收）提出了嚴厲批評。

在國際國內形勢下，越共被迫就 40 年代末以來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作總結和反省，於 1956 年 8 月底宣佈採用新知識份子政策。這些新政策是：「一，最廣泛地團結和動員知識份子的力量，完成新時期的革命任務；二，根據知識份子的能力使用他們並信任他們；三，在國家能夠承擔的基礎上，保證知識份子的工作條件，給予他們應得的報酬；四，繼續幫助舊知識份子瞭解革命思想，訓練新知識份子，不斷地擴展他們的知識，擴充他們的隊伍。39 在主要內容甚至措辭上，越共的這些政策與同期中共的政策驚人地相似。周恩來在 1956 年 1 月所作的有關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中，曾宣佈知識份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當前的問題不

是知識份子是否應該信任，而是如何合理地充分地讓他們發揮自己的專長，如何向他們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如何在國家經濟條件許可的範圍內保障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周恩來的報告在北越知識份子和黨政幹部中有相當影響。越共中央黨校的編譯機構 1956 年 11 月翻譯了周恩來報告以及稍後陸定一關於「雙百方針」報告，供內部傳閱。由於很多越南知識份子都能直接閱讀中文，所以中共文獻在北越知識份子中的實際流傳要早于越南文本的出版。40

在調整知識份子政策的同時，越共派人前往中國考察「百花齊放」問題。到了 1956 年秋天，隨著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激化，共產黨國家的異議浪潮不斷高漲，越共中央開始全面修正政治經濟政策。越共中央於 9 月初召開了「十中全會」，由於爭論激烈，會議一直開到 10 月底。黨中央於 10 月 29 日發表全會公報，承認在「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犯了嚴重錯誤，絕大多數在「鎮壓逃稅」運動和「土改」中被捕的幹部、知識份子和農民被平反和釋放。越共總書記長征成為替罪羊，引咎辭職，由主席胡志明代理總書記。直接主持「土改」的政治局委員黎范龍被貶為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胡越杭則被貶為普通黨員。越南通訊社 1959 年 10 月 29 日的報導披露了越共在「土改」中的一些「嚴重的錯誤」，包括依靠壞分子不分青紅皂白地選擇鬥爭對象，「大量貧農和雇農受到打擊，許多中農受損害，富農幾乎全被劃為地主」。越南黨報《人民報》1956 年 11 月 1 日的報導中也提到，「土改」中「很多地區用刑訊逼供，用偽造的文件將無辜黨員幹部和群眾送進監獄」。不久黎筍從越南南方的黨組織調到北方擔任党的總書記。這一調動表明，北越黨組織的錯誤已嚴重到要由向來處於被領導地位的南方黨組織來幫助糾正的地步。此後，在黎筍的領導下，越共開始逐步擺脫中共的影響。41

「十中全會」之後，越共隨即開展了針對「土改」和知識份子問題上所犯錯誤的「糾錯」運動。河內電臺 10 月 30 日廣播說，「十中全會」後，黨的首要任務是民主化和改善人民生活，而過去一直列於首位的民族統一此時移到了第三位。42 越共還召開了幹部會議(又稱「七百人大會」)，傳達中央全會精神。會上由軍事領導人武元甲作報告，解釋中央的新政策。武元甲被認為和中共關係不深，與從中國回來的洪水在學習中國經驗上有矛盾，在領導「奠邊府戰役」中曾經不理會中共的軍事顧問，對知識份子的態度則比較開明溫和。北越黨選擇他在這個時刻作報告顯然是一種姿態。此外，越共主管文藝的素友和阮庭氏公開承認，犯了

壓制知識份子自由創作的錯誤，主持審查和逮捕陳寅的懷青發表文章說，他把陳寅定為「反革命」是毫無根據和完全錯誤的。

當時的北越駐華大使黃文歡曾回國參加 1956 年 9 月到 10 月的全會，並在會上被提拔進政治局。當他回到北京後，周恩來非常關心越共黨的「糾錯」和「整風」，專門召見他詢問北越「土改」中的錯誤是否與中共顧問團有關。黃文歡回答說，中國經驗都是好的，錯誤是越南人自己犯的。這很明顯是政治套話。43 周恩來如此關心越共的「糾錯」，顯然是因為中共對北越黨揭露出來的問題深感震動。

近年來中國學者開始對北越 1957 年的「糾錯」運動作極其有限的介紹。例如，周新城主編的《越南、古巴社會主義現狀與前景》一書中有關「土改」的一段，在肯定了「土改」中「貧困農民通過向地主階級展開暴風驟雨般的鬥爭」分到土地的成就時也說：「到 1956 年夏季，越共發現土改中在鎮壓敵人、整頓組織、劃階級成分方面犯有嚴重錯誤，即擴大了打擊面，錯劃了一些人為地主、富農，把在革命戰爭時期以‘白皮紅心’面目參加革命的人，錯打成階級異己分子、鑽進革命隊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於是開始糾偏，到 1957 年底結束。負責土改工作的越共中央總書記長征引咎辭職。」44 這段文字對越共搬用「中國模式」造成的「錯誤」之程度和後果介紹得極其有限，不但回避了中共對越南「土改」中「錯誤」的責任問題，而且對當時共產黨國家中自由化運動和反斯大林主義的大背景促使越共「糾偏」這一點隻字不提。

7.北越知識份子自由化的高潮：「《人文》、《佳品》」運動

在這樣的形勢下，北越知識份子從 1956 年 8 月到 11 月發起了「《人文》、《佳品》」運動。這個自由化運動主要是由一批突然湧現出來的出版物組成的，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人文》和《佳品》。《人文》是一份公開的政治性週刊，其刊名意指「人文主義」，但也包含中國儒家在文學和哲學的陶冶中修養人性的意思(法國對北越知識份子深有研究的 Boudarel 認為，這個刊名顯示了胡風的影響)。從 1956 年 9 月到 11 月，這份雜誌一共只出版了 5 期，但刊登了大量尖銳的文章。《佳品》45 則是具政治傾向的文學刊物。除了這兩份最重要的刊物外，還有《百花》、《新地》46、《說真話》、《創造》、《新河內》、《新時代》、《祖國》等。這些刊物都是民辦的，在報刊亭裏出售，對官方報刊的銷路造成強烈衝擊。民辦的明德出版社因出版《人文》和《新地》等刊物而令人矚目。當政府機關通過壓縮紙張的分配來

限制其銷路時，編輯部門號召讀者捐款來解決問題。這些刊物或者直接發起政治討論，或者用文藝作品的形式發表政見，其內容從黨對文藝和知識份子的政策到官僚體制，政府的腐敗無能，有的甚至指出了「党國體制」的合法性。

這些刊物發起的討論引起了廣泛反響，甚至擴展到了河內人民代表大會和越南「祖國陣線」(越共的統一戰線組織)的會議上。據 Boudarel 的研究，北越知識份子對共產黨體制的尖銳批判超過了當時的中國，更超過了蘇聯的知識份子。北越知識份子的目標集中在三個問題上：自由與民主，法制和人權，以及在思想和研究的所有領域開放言論自由。47 他們還借蘇共「二十大」反個人崇拜的機會，對北越黨在人民中灌輸的對「胡伯伯」（胡志明）的帶有家族長老溫情色彩的個人崇拜提出挑戰。

例如，《人文》主編潘魁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用伊索寓言的筆調影射胡志明是越南農家放置檳榔的石灰罐，這種石灰罐時間一長內部的石灰就越積越多，容積變得越來越狹長，直到無法使用，但卻因使用年久而常被農家供奉起來。胡志明體型瘦長、年高，而且被崇拜，就像是這樣一個老而無用的石灰罐。潘魁還說，不久前對陳寅的批判中，陳寅的一個罪名是在其作品中用了大寫的「他」，這個用法長期在北越只可以用來稱呼「胡主席」。潘魁寫道：「當我聽到這個指控時，我覺得仿佛是在皇家宮廷裏」。1956 年 10 月，當北越自由化運動達到高潮時，潘魁正率領越南文化代表團在中國參加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紀念活動。由於中共對魯迅的推崇，魯迅在北越也享有很高聲譽。在北越自由化運動中，「魯迅精神」成為異議知識份子向專制文化政策挑戰的工具。在「《人文》、《佳品》」運動的高潮，選擇這個運動的領袖人物前往中國去紀念追求知識份子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的魯迅，這很難說是一個巧合，而有可能是越共向知識份子作出的妥協。潘魁在《人文》上發表文章談創作自由，舉了一系列事例，包括一年前寫紀念魯迅文章時受到過來自權力機構的對文學藝術活動的蠻橫干預。潘魁在文章中質問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怎麼創作？我怎麼可能保持我的個性？」48 很明顯，當時在北越，紀念魯迅並不是一件應景的事，而是有實際政治內容的，與當時知識份子與党的矛盾有關係，並和知識份子中最具有挑戰性的人物有關聯。

在「《人文》、《佳品》」運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來自中國的影響。中共的「雙百」方針和 1956 年對知識份子的新政策鼓勵了北越知識份子，幫助他們突破了北

越黨的控制。越共理論家和領導人搬用馬克思、列寧的語錄來論證越南歷史也有那麼幾個「社會發展階段」，很多越南歷史學家對此感到十分厭煩，毛的「百家爭鳴」說法正好給他們提供了理論武器。越南著名的歷史和人類學者陶維英說：「在有關越南歷史和國家形成的辯論中，很多研究者不敢提出那些不符合經典馬克思主義以及党的領導人的意見的新觀點。誰敢越雷池一步就會遭到離經叛道的指控，就只能閉嘴。在很多研究和討論領域，很多人只有一個恐懼，那就是在無意中偏離了正統教條和官方思想規定的現成的路徑。對於他們來說研究工作成了馬戲團裏需要高度技巧的走鋼絲。」他大聲疾呼：「我們必須採用中國共產黨在這個領域的政策：『百家爭鳴』！」49 這些刊物和參與討論的知識份子意識到，在他們背後有中國的自由化在撐腰。Ninh 指出：「事實上，《人文》對中國和東歐的發展亦步亦趨，在越南回應中國的百花運動和波匈的自由化……《人文》的作者們意識到他們是一個更廣泛的國際性運動的一部分。」50 此外，僅僅從一些刊物的名稱(如《百花》、《新地》等)上也能看出中國的影子。

其實，在「《人文》、《佳品》運動中，受到最嚴厲批判的恰恰是越共從中共那裏移植或借鑒來的東西，而不是離越南實際較遠的斯大林主義。這與赫魯曉夫推動下出現的自由化導致東歐國家批判蘇聯模式如出一轍。從上面的敍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通過「延安整風」建立起來的、由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的、經周揚等人貫徹推行的中共文藝路線，其北越的翻版在 1955 年到 1956 年受到了挑戰。北越知識份子提出，文藝要擺脫黨的控制而獨立，文藝家要有創作自由，他們和黨之間應該是平等的。陳寅在 1955 年 2 月向党請願時便提出：「一個作家責任感的最高表現」是對真實的尊重和信念，它「超越一切指示和理論」；作家必須服從真實，而不能「為了政治需要而扭曲它」。51 潘魁則用直白的語言說：「文學為政治服務，政治領導文學和藝術，這已經變得天經地義了。但我們必須要問：如果政治要達到自己的目的，能僅僅依靠口號、旗幟、傳單和命令而沒有文學和藝術嗎？要誠實地回答這個問題，（我想）政治必須拍拍文藝的肩膀，說『我和你聯繫是需要你，需要你的藝術』。只要政治這麼說了，文藝就會同意。但被政治所需要的文藝的功能只是文藝的一個部分。政治（連這一部分也）不能領導，文學和藝術必須要求自己的自由。因此，我想政治沒有理由不接受一個（政治和文藝）『雙贏』的結果」。52

越共從中國照搬的以「思想改造」為主的知識份子政策，是另一個在「《人文》、《佳品》」運動中被批判的重點。很多越南知識份子對「思想改造」深惡痛絕，他們敏感地認識到，在這種「改造」的背後其實就是反智主義和民粹主義，目的是把知識份子「搞臭」，這是毛主義的核心內容之一，與「土改」中對「群眾」的「自發革命行動」的縱容出於同一根源。越南歷史學家陶維安強調說，這種「改造」的實際結果是摧毀知識份子的自尊，甚至使他們恥於承認自己是知識份子。著名律師阮孟牆說：「當發現党對他們完全不信任時，參加抵抗鬥爭的知識份子……感到痛苦和失望，儘管他們為黨作出了無數犧牲。是他們索取過多嗎？他們提出要當部長或者大使嗎？沒有。完全沒有……他們的大多數只不過要求根據他們的才能服務於人民，捍衛他們的榮譽和思想自由，他們相信這是他們作為知識份子的尊嚴最本質的東西。」很多自由化的參加者還對蔑視知識份子專業知識和才能的「外行領導內行」(這實際上是極權主義統治的表現，對它的批判也是中國「右派」言論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的做法大張韃伐。有一首詩這樣說：「喜歡說大話的領導人，雖然對文藝一竅不通，他卻一直在說教和批評。鸚鵡學舍地背誦從書本上看到的他自己還沒有弄懂的字句，他的心就像乾木頭，他的說教聞上去就像燒焦的米飯。當被問倒時，他拍著胸脯，揮舞著黨的文件，一心只想把人嚇倒」。

在「《人文》、《佳品》」運動中，異議刊物還大量揭露從 1953 年春到 1956 年的「土改」中對所謂「階級敵人」濫施暴力、折磨和殺戮的情形。北越的知識份子指出，甚至在 1956 年 9 月越共已被迫承認「土改」中的錯誤、發起了「糾錯」運動並大量「平反」和釋放被捕者時，各地「土改」中的既得利益者和有血債者仍然利用他們在「土改」中獲得的權力，以暴力來維護自己的地位，對被「平反」和返鄉者施加報復。例如，1957 年 3 月 14 日出版的那期《新地》雜誌詳細報導了一個案例：一個村莊的前村長在「土改」中被劃為惡霸地主而遭逮捕，但在「糾錯」運動中被重新劃分成分，改定為中農並被釋放；就在他返鄉途中，曾把他定為「地主」的新村長卻糾結手下人將他處死。

1956 年 11 月 5 日的《人文》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土改中，非法逮捕和關押、剝奪財產，對地主(以及被錯劃為地主的普通農民)住宅的隔離(這造成了很多無辜兒童被活活餓死)，所有這些都不是党的領導有失誤所能解釋的，而是因為完全沒有法制。」53 造成這種無法無天的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黨的專制和暴

力摧毀了農村的秩序，建立了以「土改」工作隊為代表的絕對權力。一個參加過「土改」的知識份子發表文章說，他當時被派下去報導農民的苦難和地主的殘忍，但他看到的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他回憶道：自己所屬的「土改工作隊」隊長進入一個村莊後沒幾天，就組織大會用槍斃一個「地主」來提高農民的「革命精神」，還要求工作隊員通過與農民結婚來「提高思想覺悟」。這位知識份子表示：「我對這種行為表示懷疑，但我一聲都不敢哼。他（隊長）動一動指頭就可以把我送進監獄！」54

越南哲學家陳德草尖銳地指出，在「土改」中，整個省和區一級的政權結構都被重新改造了，其目的是把「整個農民階級痞子化」。55 根據「土改」的教訓，陳德草強調，「自由的本質是個人自由」以及「自由的內容」必須由「自由的形式」來保障這個自由主義的原則。他的觀點對共產黨所主張的自由首先是集體的和社會的自由、以及實質的自由重于形式的自由構成了直接的挑戰」 。他說：「自由的形式是個人自由（'個人自由'在原文中用的是斜體，以示強調）……個人為共同體服務，但共同體必須建立在個人之上，在人民的法律範圍記憶體在的個人自由的形式使得個人能夠為建設共同體作出貢獻。」56

在有關「土改」問題的討論中，產生了對個人自由(權利)和法制的呼聲，而實現它們的首要條件則是確保言論自由。《人文》雜誌的最後兩期曾為言論、集社和遷徙自由大聲疾呼。當時河內還有很多殖民地時期或在法國受過專業訓練的律師，他們從法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的角度，總結了「土改」的教訓，甚至追究政府的責任。阮孟牆是當時的一位著名律師，他在 1956 年 10 月對越南國民大會提出了一系列建議：設立一個獨立委員會調查「土改」中的「過火」行為；對幹部的工作建立制度性的監察；把非官方的群眾組織真正建成表達人民意見的渠道；實現建立在出版和新聞自由之上的言論自由。他強調說，在越南，政治權威至高無上，淩駕于經濟和文化生活之上，這是導致「土改」中災難性錯誤的主要原因。時任党的總書記的長征和農業部長等党的領導人雖然承認了錯誤，但沒有觸及制度性的根源。他說，作為律師，在這樣一個黨政結構中，他無法判斷什麼樣的個人能夠為這樣大的錯誤承擔「責任」。

參加自由化運動的知識份子的代表性非常廣泛，但可以劃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法國殖民統治時期就長期堅持民族獨立立場的老知識份子。第二類是比較年

輕的的一代，他們的主要政治經歷是參加「越盟」或越共領導的抗法鬥爭，包括黨內的一些高級幹部。上文提到的陳德草、阮孟牆、陶維安和陳寅等人，就是這兩類人的代表。此外，還有很多知識份子站了出來。鄧範努是著名生物學家，他曾經在戰爭年代幫助越共就地取材製造抗生素，以克服森林生活中的種種傳染病。女詩人劉氏燕(筆名翠安)是越南著名作家，女性主義文學的代表者，她在 30 年代編輯了兩份很有影響的婦女雜誌，出版過愛情小說《魂》。長友則是 40 年代初把心理分析學引進越南的學者，他一直支持「越盟」的抗法鬥爭，儘管他反對它的很多具體政策。在年輕人中，文高是青年作曲家，北越國歌的詞作者和譜曲者。在黨內高級幹部中，值得一提的是阮友燈。他是越共政府青年部副部長，在越共政治活動中非常活躍。當胡志明 1945 年在河內巴亭廣場宣讀著名的「越南獨立宣言」時，他是廣場上群眾集會的發動和組織者，並以此成名。他也是陳寅 1955 年 2 月請願的參加者和關鍵人物，後來一直利用自己的地位、影響和關係，推動著自由化，保護知識份子，與素友、懷青等文藝界的黨棍發生過尖銳的衝突。在一些被越共按照中共模式封為「民主人士」的知識份子和社會活動家中，出版家陳少寶具有代表性。他主持的明德出版社出版了《人道》、《佳品》和《新地》等刊物，為異議分子提供了陣地。

四、中越兩國當局知識份子政策的馬鞍型同步演變

當「斯大林模式」在東歐受到公開批判時，以「土改」、「鎮反」、「思想改造」(「整風」)和「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毛主義模式，也在中國和北越受到挑戰。當然，在嚴格意義上，毛主義的這些政策都可以在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中找到對應的內容，並非毛主義的獨創。例如，列寧早就主張，文藝是黨的一條戰線；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政策也把大量農民劃為富農並消滅。儘管如此，這一整套政策畢竟是毛主義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前的主要特色，而且系統地構成了毛主義的精華。在中共能夠有效施加影響的北越，毛主義就是越共的精神武器。正因為如此，當蘇聯東歐的知識份子向斯大林主義發起全面挑戰時，北越知識份子所推動的自由化浪潮直接指向毛主義，而非斯大林主義。對國際共運的這段歷史需要重新評價，它不但涉及到對北越 1955 年到 1957 年「自由化」運動的認識，也

涉及到對毛主義的歷史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越南知識份子爭取政治自由的努力與其中國同行的命運息息相關，而越、中兩國當局應對這一挑戰的舉措也基本上同步同調，因此，1956 年到 1957 年間中、越兩國當局的知識份子政策呈現出有趣的馬鞍型同步演變。

1．1956 年北越鎮壓義安省的農民暴動卻允許知識份子繼續「鳴放」

就在北越知識份子向党挑戰的同時，1956 年 11 月，北越農民向「土改」和黨在農村的組織發起了暴力反抗。這次農民暴動發生在義安省，那裏是胡志明的老家，1930 年到 1931 年在這個地區發生的「義安－河靜」暴動造就了越南的「蘇維埃」運動。在這個越共的老區，「群眾基礎」似乎應該比較好。然而，恰恰就在這個地區，越共推行的「土改」政策極大地傷害了自己在農村的權力基礎，令農民積怨甚深。1956 年 10 月底，越共中央全會承認，在「土改」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這個消息傳到農村後，農民並未因為黨認錯了而感恩戴德；相反，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在 11 月 5 日發起了武裝暴動，大約有兩萬多農民參加。越共被迫調動其軍隊中的精銳第 325 師，一個星期後才將農民暴動鎮壓下去，大約有 6 千農民被殺或被強迫遷移。當時，北越義安省農民對政府的反抗，在規模上或許僅次於「匈牙利事件」，但今天很多研究者對此知之甚少。

毫無疑問，這次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威脅到了北越政權的基礎，本來應該增加越共的恐懼，使它對任何異議更加敏感和不寬容，何況這次農民武裝暴動正好與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同時發生。但在匈牙利革命和北越本國農民的暴動被鎮壓之後，北越黨不但放鬆了對知識份子的壓制，而且還允許他們繼續「鳴放」。當時正是中共置蘇聯和東歐對「百花齊放」政策的批評和抵制於不顧，號召知識份子在單位裏和報刊上廣泛向黨提意見的時候。考慮到中共和越共之間聯繫的緊密，北越對知識份子的這種寬鬆政策或許很難說是偶然的。

2．當時越共對中共的政治依從

當時越共在國內政策上對中共意見的重視，可以從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中找到充分證據。至今中國當局對歷史上中共和越共之間的政治關係(此處指中共如何影響北越的內政，而不是指軍事、經濟和南北統一問題)透露甚少，但還有線索可循。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說：「日內瓦會議閉幕前夕，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勞動黨中央要求中國對越南鞏固和平、擴大土改、接管城市、恢復和發展經濟等

工作進一步提出意見，並派人協助。」57 顯然，中共自己也承認，它參與了北越「土改」的決策和實行，所以北越「土改」中的「擴大化」無疑與照搬中共模式有關。

北越鎮壓農民暴動的槍聲未息，越共中央致電中共中央，請中共就下列問題提供意見：「一，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和意見；二，為實現日內瓦協議而鬥爭的工作任務；三，越南目前的財政經濟狀況與今後經濟工作的任務。」58 其中的第一項「目前局勢」的含義非常廣泛，當時共產黨國家面臨的「局勢」中最重要的是「非斯大林化」和鎮壓匈牙利革命所產生的影響，而越南國內最重要的「局勢」當然就是農民暴動和知識份子的抗議。

1956 年 11 月 18 日到 21 日，周恩來訪問了河內。在與越共政治局會談關於越南國內的情況時，周恩來說：「土地改革的成績要肯定，有錯誤是難免的，糾偏不能拋棄正確的東西，這樣才不會使自己處於被動，使群眾失去信心。」59

1957 年 4 月，中共突然號召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幫助党整風」。與此同步，北越當局也放鬆了控制，允許異議運動再次活躍起來。

3．北越當局 1956 年到 1957 年對自由化運動之對策的起起落落

北越的自由化經歷了兩個時期，或者說是一個馬鞍形的過程：第一個時期從 1956 年 8 月到 11 月，隨著匈牙利革命被鎮壓而中斷；隨後出現了一段短暫的打壓時期；自由化的第二個時期是從 1957 年春到夏秋之交，在北京維持「雙百」方針和寬鬆的政治氣氛的背景下，北越知識份子又被允許重新「鳴放」；最後，隨著中共發動「反右」運動，北越共產黨也徹底剿滅了自由化運動。

從 1956 年 8 月到 11 月，北越的自由化運動經歷了所謂的「《人文》、《佳品》」時期。從 11 月初開始，緊接著蘇聯對匈牙利革命的鎮壓，越共開始在報刊上發表反擊知識份子的文章，特別是一些催促政府採取行動的所謂「群眾來信」。越共《人民報》在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後第五天發表社論說：「我們不應允許任何人利用民主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離間黨和人民，誹謗我們的制度，在人民之間製造混亂，或者散佈有害的、反動的思想。」經過約一個月的宣傳，12 月 18 日，根據北越政府主席令，河內市政府停止了《人文》和《佳品》的出版，關閉了這兩份雜誌的出版單位明德出版社，沒收了市面上的這些雜誌，還要求過去購買這些雜誌的人將它們交出。當時國際上很多人都認為，就像在東歐一樣，北越的自由化就此

告終。例如，英國的《經濟學家》特約記者在 1957 年 1 月 5 日發表了一篇題為「在中國的陰影下：胡志明的方式」的文章。該作者認為，《人文》、《佳品》是在「非斯大林化」的氣氛中和在中共的鼓勵下越共放出的試探性氣球，看看知識份子想走多遠，黨能容忍多久。「現在看來，無論如何這個實驗是結束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1956 年 11 月到 12 月河內的政治風暴並未持續多久。兩個月後的 1957 年初，《人民報》的反自由化運動就失去了勢頭。所有在前兩個月中受批判或牽連的知識份子都安然過關，除了個別人調動工作外，沒有一個人被逮捕或開除公職，很多人只是作了自我批評。Ninh 指出：這些知識份子「繼續保留黨和政府內的職位，在某些人那裏甚至是領導職位，例如在出版社和文聯執行委員會中」。例如，陳寅和黃琴仍然在文聯下屬的出版社工作。1957 年 2 月，北越全國文聯舉行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的決議中竟然出乎意料地沒有提到「《人文》、《佳品》」事件，只是說要和「錯誤傾向作鬥爭」。就連被認為是党在文藝界代言人的詩人素友(時任文化部副部長)也在大會的報告中說「在文化和藝術活動中，我們可以也應該有在共同基礎上的不同的傾向，因為這是符合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所有觀點和藝術傾向都可以而且應該從討論中表現出來」。60

1957 年 5 月，北越文聯出版了一份新的週刊《文學》(Van)，作為新成立的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在這份刊物的旗幟下，那些《人文》和《佳品》的作者很快就聚集起來，重新發表對文聯領導機構甚至党和政府挑戰的文章，「那些在前一階段對他們的批判看來絲毫沒有起作用」。因此，1957 年上半年北越的文化氣氛和 1956 年底明顯不同，越共不但沒有強化批判運動，懲罰那些在 1956 年夏秋向党挑戰的知識份子，反而允許自由化的傾向恢復和發展。《文學》雖然時不時地受到《人民報》上的文章的質疑和批判，但沒有形成一個有聲有勢的運動或迫使異議作者沈默。Hirohide Kurohara 在他關於北越 1957 年文化政策的研究中認為，當時北越黨有兩條「靈活」的路線：「一條是尊重作家和其他知識份子……不強迫他們從事政治學習或體力勞動」，而在 50 年代上半期則是必須人人過關的；另一條是「在貫徹党的政策時採用溫和的方法，力圖通過說服和耐心討論和知識份子達成共識」，在貫徹這一路線時，「那些執行政策的党的幹部受到警告，要他們不得粗暴行事。」61 這個被恢復的自由化運動持續了大半年。

1957 年 7 月 8 日，越共領袖胡志明途經北京前往北朝鮮、蘇聯和東歐，此刻

正是中共全面展開「反擊右派進攻」的時候。8 月底，胡途經北京回國。兩次路經北京時，胡都與中共領導人舉行了會談。在胡志明公開的政治日程表上，他與中共領導人談的只是越南南、北方為和平統一舉行自由普選的問題，但人們很難想像，中國如火如荼的「反右派」鬥爭和北越知識份子的第二波自由化運動會被排除在會談話題之外，也很難想像，中共領導人會對從「雙百方針」到「反擊右派」的轉變及其中之謀略不作任何說明。胡志明的中文程度非常好 62，他在中國期間，只要翻開中共的報紙，「反右」運動就會有聲有色地在他面前展開，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策略很可能會讓他心有所悟。

中共剛發動「反右」，1957 年 7 月和 8 月，越共理論刊物《學習》便開始發表文章，發動對《文學》的批判，聲稱它的內容「極大地偏離了現實，偏離了生活、偏離了革命的責任」，為「資本主義文學的觀點」提供了講臺。待胡志明回到河內，北越的政治氣氛立刻為之大變，北越黨開始部署全面反撲，完成在 1957 年初沒有充分展開的政治運動。9 月 16 日，胡志明回國兩周後，他在北越《人民報》上用化名「陳力」發表文章(毛澤東也曾用《人民日報》評論員的名義在「反右」運動開始時發表過「這是為什麼？」)，標題是「粉碎右派」。胡志明用典型的毛式語言說:「右派是毒草。讓我們把他們連根拔除，化作肥料，改善我們稻田的土質。」63

國際學術界一些研究 50 年代北越文化政策的學者，也從共產黨國家政治形勢的整體演變角度，指出中共對北越轉向「反右」的影響。比如 Kurihara 認為:「蘇共的二十大和反斯大林曾經促成了《人文》和《佳品》，中國的百花齊放也起了相同的作用」；但到了 1957 年夏，他們都改變了政策，特別是「中國的『百花』運動已經變成了反右運動」。64

經過幾個月的宣傳和批判，1958 年 1 月 6 日，越南勞動黨中央通過了「政治局關於文學問題的決定」，要求把那些「顛覆分子」從文學組織中清除出去，對知識份子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再教育」。於是，《文學》週刊被取消。接踵而至的是一場大規模而持久的政治運動，當局企圖一勞永逸地清除北越知識份子中的異議人士和異議思想。越共沒有正式使用「右派」之類的政治整肅範疇，而是用「反革命」、「反黨」、「右傾錯誤」等罪名整人。1958 年 2 月，首批 172 名參加了「《人文》、《佳品》」運動的知識份子被送進「再教育班」；3 月又有第二批 304 名

知識份子被送去。這些人中大約 300 人是作家和藝術家，其他人則是教育、文化和出版機構的人士或幹部。與中共一樣，越共讓那些最有影響的知識份子(如陳德草 65、阮孟牆、陶維安、陳寅、黃琴等)在報紙上發表自我批判的文章，名義上是清除散佈的「毒素」，實際是對那些「小」右派們起到震懾作用，顯示黨的威力。《文學》被停刊後，新出版了《文學研究》，由黨的文藝「理論家」阮廷氏主編，1958 年 5 月出版的第 1 期就刊登了大量「自由化」分子的自我批判。

越共對這些「自由派」分子的處理，也仿照中共根據「右」的程度不同而「區別對待」的做法。例如，上文提到的阮友燈、劉氏燕和陳少寶這三位被正式逮捕；其他人有的被開除出文聯(如潘魁)，有的人其文聯會員資格被停止三年(如陳寅)，有的被撤銷行政職務(如詩人黃琴的文聯執行委員會委員被撤銷)。1960 年越共當局對安排了所謂阮友燈、劉氏燕和陳少寶等人「特務案」的審判，在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的情況下，指控他們是「法國間諜」，分別判處五年到十五年的徒刑。北越最有影響的知識份子潘魁被下放勞動，就在當局準備給他安一個罪名加以審判時去世，他在「祖國陣線」機關報擔任編輯的兒子不久也去世，死因不明。一個為越南的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奮鬥了三代人的家庭就此悲劇性地告終。

除了集中打擊「自由化」的帶頭人物，越共也全面整肅絕大多數知識份子。1958 年夏，越共發動了大規模的「下鄉進廠」運動，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無論在「《人文》、《佳品》」時期的「政治表現」如何，都必須去農村和工廠，在從事體力勞動的同時接受「思想改造」。近年在中國大陸對北越的「反右」運動也有一些有限的介紹。例如，有一本書提到：「1957 年，在文化思想戰線上開展反修正主義的鬥爭，對在《人文報》和《佳品》雜誌上發表『毒草』作品的人展開批判，把這批人定為『人文佳品』集團分子，是黨員的開除黨籍，有的被開除公職、軟禁，有的被勞動改造，有的被投入監獄，境況都很悲慘。越南實行革新（即改革開放，本文作者注）之後，打成『人文佳品』集團分子中的某些人的作品又重新發表，但和中共承認反右擴大化和為多數右派平反不同，無論對他們本人還是對整個運動，越共都一直維持當初的結論，沒有任何平反決定。」66

結 論

共產黨陣營從 1956 年到 1957 年的「非斯大林化」運動和自由化運動，應該從一個更廣泛的角度來考察，包括那些在蘇共「二十大」和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以外的導致政治變化的因素。共產黨陣營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相互作用的世界，而不是一個簡單的「中心－－邊緣」的政治結構。作為共產黨體制的主要模式，斯大林主義當時固然是最有影響的，但這並不排除毛主義作為另一個模式的存在和影響。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在 50 年代中期的那場自由化運動中都受到了衝擊，在這個意義上講，用「非斯大林化」來概括那場自由化運動，是有很大局限的。對於研究毛澤東和中共革命的人來說，有必要認識到，毛主義早在「文化大革命」結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破產前二十年，就在中國和越南受到很多知識份子的否定。換言之，共產黨統治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或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對毛主義的批判，自 1950 年代中期就開始了。不過，由於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是那場自由化運動的主流，也由於中國官方對歷史記憶的壓制、抹殺和對歷史真相有選擇的披露，加上中國知識份子對毛主義在其他國家的影響瞭解不夠，才使得那段歷史的這個側面在中國大陸很少有人瞭解。

毛主義和「中國模式」當時的內容，既包括「土改」、「鎮反」、「思想改造」和對知識份子以及文藝的控制這些在歷史上形成的和在自由化中受到批判的部分，也包括在新形勢下應運而生的一些新政策，如「雙百」方針、知識份子政策的暫時調整和承認「人民內部矛盾」等。這兩方面的政策彼此是密切關聯的。它們代表了 50 年代中期國際共運發生巨大變化、蘇共的老大党地位動搖時，毛澤東和中共在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內尋求一種不同於僵硬嚴酷的斯大林主義模式的嘗試，當然在這種嘗試的背後也有毛澤東企圖充當共產黨陣營「龍頭老大」地位的雄心。這些政策在東歐和北越的知識份子中得到強烈共鳴，促進了自由化的發展。「匈牙利事件」後，中共不顧蘇聯和東歐國家共產黨當局的反對，不但堅持「雙百」方針，提出「在人民內部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還繼續鼓勵知識份子「向党提意見」。無論毛當時是否決定「引蛇出洞」，這些政策在客觀上延續了「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這在北越的案例中尤其明顯。但最終這種對「自由化」的有意操控導致的是更悲劇化的結果：毛澤東對政治異議運動採取的「引蛇出洞」策略和一旦政策轉變後對知識份子的整治手段是極其陰險和徹底的。如果說在東歐國家，異議運動在匈牙利革命後遭到了壓制，那麼，在中國「反右」運動是力圖把

中國知識份子的異議運動在社會各階層中連根拔除。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陣營的第一次國際性危機並非結束於匈牙利革命的被鎮壓，而是中共的「反右」以及它在東歐和北越的影響。

從研究中共黨史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在「反右」前採取的寬鬆的國內政策，不單純是為了「引蛇出洞」，還有在國際共運舞臺上沽名釣譽的策略性目的。中共運用國內政策為提升和鞏固其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服務，始於波匈事件，終於「文革」。可以說，國內政策大幅度變動與在國際舞臺上的表演相互配合，這既是毛澤東生前最後二十年執政史的一個基本特徵，也是解讀這段歷史的一個重要線索。

——為 2007 年 6 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發表於《當代中國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注 釋

1　例如，Richard Hudelson 的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Willie Thompson 的 The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1945 (Blackwell, 1998), Geoffery Swain 和 Nigek Swain 的 Eastern 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Palgrave, 2003)，Ben Fowkes 的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Astern Europe (St. Martin's, 1993)，都沒有提到中共在「非斯大林化」運動中對東歐國家的影響。越南在 1956 到 1957 年的「自由化」和中共對越南的影響，更是在「莫斯科中心論」的視野之外(除了少數專門研究北越 1950 年代的歷史學家注意到這點)。一位研究者甚至說：「可以肯定沒有哪個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受到它（非斯大林化）的衝擊，可能是因為它們都是建立在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和共產國際的關係不深，它們的發展和東歐國家不同，較少受蘇聯的影響，對斯大林主義的記憶不那麼深刻。」很明顯，他把北越排除在「非斯大林化」運動之外，更不用說中共的影響了。見 Willie Thompson 的 The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1945，77 頁。

2　對這個問題的早期研究見 G. F. Hudson 的「China and the Communist 'Thaw'」，Epilogue for Roderick MacFarquhar's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Praeger, 1960)。最近的有關研究見陳兼的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3　以上敍述綜合了中國近年出版的回憶錄和官方文件，其中比較重要的是時任中共中央俄文翻譯的師哲的回憶文章，載《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11至17頁。陳兼的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第6章也有描繪。

4　《赫魯曉夫回憶錄》（The Thomas J. Watson J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2006），第418頁。

5　見William Griffith ed.,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Continuity,Change,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MIT Press, 1964), Vol.2，p.101。

6　出處同上。

7　這「五項原則」是中共在1954年與印度的一份聯合公報中首次提出的，在1955年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國家會議上，周恩來又再次正式提出這些原則，作為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準則。它包括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在中共的官方表達中，這五項原則常常伴隨著一個定語「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這個定語嚴格說來是多餘的，但是中共常常要強調，為的是打消亞非國家對中國輸出革命的擔心。至於這些原則是否適用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似乎並不是中共當初提出它們的主要目的。

8　他在1956年春上書匈牙利黨中央，同時送給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一份。

9　Imre Nagy，On Communism，(Praeger, 1958) p.23.

10 Janos Radvanyi,「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China Quarterly 43 (1970)，p.23.

11 出處同注5，第242頁。

12 出處同注5，第103頁。

13 出處同上。

14 出處同注5，第104頁。

15 S. Shneiderman, The Warsaw Heresy，(Horizon Press, 1959) p.56.

16 出處同注2，第304頁。

17 陳清泉，「陸定一推行雙百方針始末」，《炎黃春秋》，2000年9月，第6頁。

18 李越然，《國際舞臺上的新中國領導人》(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94)，第127至128頁。

19 出處同注 4，第 271 頁。

20 出處同注 2，第 307 頁。

21 出處同上，第 304 頁。

22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5) 第四部，第 108 頁。

23 Hoang Van Chi，From Colonialism to Communism：A History of North Vietnam，p.119.

24 方山編著的《馬泰邊區風雲錄》(21 世紀出版社 2005)有一章的標題為「學習與黨校」，專門介紹了有關情況。

25 見馬共總書記陳平 2004 年出版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Media Masters 2005) 第 28 和 30 章。

26 潘魁是越南德高望重的民族主義知識份子，他的父親在 1883 年是河內總督，在法國佔領河內前自殺，成為越南民族主義的象徵性人物之一。潘魁本人早在 1907 年就是越南知識份子反法運動的領袖，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他支持越共領導的反法民族主義革命，成了越共重要的統戰對象，他的兒子也被任命為越共統一戰線組織「祖國陣線」機關報的編輯。

27 Kim N. B. Ninh，A World Transformed：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Vietnam 1945-1956，(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pp.121-161.

28 河內這個城市曾被認為是西方和殖民主義在北越的象徵。陳寅進駐河內後，與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擁有房產的女士產生了愛情，黨和軍隊不允許這種關係的存在，而陳寅卻不願為了黨籍和軍籍犧牲愛情。陳寅的作家好友、國家戲劇小組組長黃坎(他也參加了陳寅發起的上書和請願活動)也由於和一個類似身份的河內女子產生了感情而自發要求解除軍籍。

29 Nhu Phong，「Intellectuals, Writers and Artists」， in P. J. Honey ed.，North Vietnam Today，p.81.有關中共革命模式對北越的影響，可參看 William J. Duiker，「Seeds of the Dragon：The Influence of the Maoist Model in Vietnam」，in Arif Dirlik，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Humanity Books, 1997) pp.313-341.

30 胡風是中共在文藝界的老戰士和理論家，他代表原來在國統區的共產黨文藝工

作者，從40年代下半期以來與周揚等代表的延安來的文藝界領導就有矛盾，中共建政後這種矛盾發展成為文藝界的正統和異端之間的衝突。胡風於1954年7月上書中共中央，批評當時的文藝政策和文藝界的領導人，尤其是批判他們堅持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希望能為文學藝術的創作爭取自由。除了創作原則上的分歧，胡風對中共文藝界領導人的專橫和官僚作風也深感不滿。雖然胡風根本無意挑戰党的領導地位，但他的行動確實表現了一部分知識份子和文藝家長期以來在創作自由問題上的積怨，是中共和曾經追隨它的革命知識份子之間在建國後發生的第一次分歧。中共文藝界領導人不久就發動了反擊，毛澤東本人將胡風及其追隨者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於1955年5月發起了「反胡風」運動。胡風於6月被捕，直到「文革」結束才被釋放。

31 指1954年越共在中共支持下打敗法國殖民軍的關鍵戰役。

32 George Boudarel，「Intellectual Dissidence in the 1950S：The Nhan-Van Giai-Pham Affair」，in The Vietnam Forum，Vol.13，p.158.

33 出處同注27，也見於George Boudarel的文章，見注26。

34 出處同注27，第140頁。

35 雖然絕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中國的胡風對北越的陳寅有相當的影響，但陳寅之子陳崇武(出生於1963年，越南改革開放後赴美留學，現居法國，是美術家)告訴筆者，認為他父親在1955至1957年間的思想和言論主要是他自己思考的結果，和胡風沒有很大關係，研究者們只是根據胡風與他父親的活動在時間上的先後和觀點上的類似而想當然地認為他父親受到胡風的影響。陳崇武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沒有任何研究者能提出確鑿的證據證明，陳寅十分引用過胡風的觀點。如果陳崇武的說法成立，筆者認為，既然陳寅和胡風在重大問題上不謀而合，恰恰說明毛主義的文藝路線在中國和北越同時受到了自發的挑戰。文中提到的那幅漫畫見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jwh/15.4/cheng.html。

36 有關陳德草參加越共領導的革命以及後來的遭遇，見Shawn Michele，「Vietnamese Marxism，Dissent，and the Politics of Postcolonial Memory：Tran Duc Thao，1946-199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1(2002).

37 Bernard B. Fall，The Two Vietnams--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alysis (Westview Press, 1986) p.188.

38 P. J. Honey，「Ho Chi Minh and the Intellectuals」，in R. F. Wesley ed., Vietnam：Anatomy of a Conflict (Peacock Publishers, 1968)，p.160.

39 Robert F. Turner,Vietnamese Communism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p.152.

40 周恩來報告的越南文譯稿到 1957 年 3 月才出版。

41 70 年代後期，正是在黎筍擔任領導期間，中越兩黨正式分裂，以致於爆發中越戰爭。1985 年底，黎筍去世，曾按中共模式主持「土改」的長征擔任了越共總書記。長征在越南政治經濟面臨全面危機的情況下，主張模仿中共的改革開放，主持了越共「六大」，廢棄了原來由時任政治局委員的老左派素友起草的政治報告。越共從此走上了「革新」道路。

42 Ang Cheng Guan，Vietnamese Communis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econd Indo-Chinese Conflict，(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1997) p.36.

43 黃文歡，《我的回憶》，(解放軍出版社， 1987) 第 277 頁。

44 周新城主編，《越南、古巴社會主義現狀與前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 頁。

45 這個刊物又分為《春天的佳品》和《秋天的佳品》兩份(即 Giai Pham Mua Xuam 和 Giai Pham Mua Thu。這兩個刊名也可譯為「春華秋實」。「佳品」還可譯為「佳作」，但「佳品」已成習慣譯名。

46 這是一份大學生刊物，意為為百花所準備的新鮮土壤。在這份刊物上首次出現了「党國體制」的概念。

47 出處同注 32，第 165 頁。

48 出處同注 39，第 153 頁。

49 出處同注 32，第 167 頁。

50 出處同注 27，第 146 頁。

51 出處同注 32，第 158 頁。

52 出處同注 27，第 150 頁。

53 Turner，The Vietnam Workers' Party：Liberalization and Peasant Revolt，(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 p.155.

54 出處同注 27，第 125－126 頁。

55 出處同注 23，第 111 頁。

56 出處同注 27，第 152 頁。

57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第一卷第 94 頁。

58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四卷，第 138-139 頁。

59 出處同上。

60 Nhu Phong，「Intellectuals，Writers and Artists」，The China Quarterly, No. 9 (Jan. - Mar., 1962), p68.

61 Hirohide Kurihara，「Changes in the Literarily Policy of the Vietnamese Workers' Party，1956-1958」，in Takashi Shiraishi and Motoo Furata ed., Indochina in the 1940s and 1950s，(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Translation Series Vol 2, 1992) p.180.

62 1966 年 5 月他在杭州休養，正是「文革」初起之時，他曾聽取毛澤東的建議，前往浙江大學看大字報。

63 出處同注 32，第 170 至 171 頁。

64 出處同注 61，第 189 頁。

65 陳德草發表這樣的聲明後得以保全生命，他於 1990 年代去世。

66 出處同注 44，第 11 至 12 頁。

試探 1957 年 4 到 6 月間中國國際關係與整風轉向之間的關聯

張軼東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我感到有幸參加這次「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歷程」國際研討會。我也是一個飽經滄桑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而且是一個中共曾經大力培養，而後又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留蘇學生。我在《從列寧格勒大學到新肇監獄》一書已詳述了自己

的經歷，在會上就無需重述了。在這次會議上我想著重探討一下整風前後，即 1957 年 4 到 6 月間，中國國際關係中發生的一些突變事件，對於整風突然轉向的影響。

我將分三點來提出我的一些疑點：

第一，1957 年 4 到 6 月間的中美關係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1957 年四月，臺灣蔣介石先生曾派代表宋宜山來北京與周恩來秘密談判。宋宜山在北京當然也看見了「大鳴大放」的景象並報告蔣介石的。當存在著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性時，毛澤東需要製造一種「開明」景象，是不可能發動反右派鬥爭的。但是即使在五月中旬，在臺灣發生美軍軍官槍殺翻譯劉自然事件引起臺灣一度的反美浪潮後，蔣介石也宣稱他堅持站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一面。臺灣代表宋宜山也離開了中國大陸。毛澤東製造 「開明」氣氛的必要也大大減少了。這當然是使整風轉入反右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即使是臺灣問題沒有解決，毛澤東和周恩來也是一直想和美國拉上關係的，這也導致他們需要在國內保持一定的「開明」氣氛。其實早在 1956 年中共八大開幕以前，中國就曾派一個藝術團去拉美國家訪問，其真實目的是看是否會被美國邀請。但美方未予理睬。1957 年在莫斯科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期間，我是中國青年代表團西歐北美組的組員之一。上級傳達命令說，這次聯歡節後將要邀請數十名美國青年訪問中國。在與美國青年代表團聯歡的前一天，中方參與人員開了一整天的「預備會議」，交代了「注意事項」（我因不知有這麼一個「預備會議」而和一個蘇聯姑娘逛公園去了，因此未能成為「參與人員」）。聯歡後的確有數十名美國青年應邀隨同回國的中國青年代表團來中國訪問，並受到了周恩來的接見。但是這次訪問並沒有導致中美兩國政府之間的正式接觸。中共的宣傳機器總是吹噓 1971 年的「乒乓外交」是毛澤東的一步高棋。其實「乒乓外交」並不是誕生於 1971 年的新發明。早在 1957 年，毛澤東和周恩來就作過這一類的嘗試。可以設想：如果 1957 年的數十名美國青年訪華會導致中美兩國政府之間的直接接觸，即使反右鬥爭已經開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也可能令其剎車，或至少限制其規模，不使其擴大化吧？

第二，1957 年 4 到 6 月間蘇聯發生的一件大事

1957年4到6月間蘇聯發生的一件大事，對中國的整風反右有無影響？

1957年6月底，即在中國整風轉為反右之後不久，在前蘇聯發生了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企圖搞宮廷政變推翻赫魯曉夫未遂的事件。這件事是驚天動地的。因為在這事件中，在蘇共中央主席團（這是政治局在那時的稱謂）十二名委員中，有八名站在莫洛托夫一方：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謝彼洛夫、伏羅希洛夫、別爾烏辛、薩布洛夫和布爾加寧。在赫魯曉夫一方的只有四人：赫魯曉夫、米高揚，另二人可能是蘇斯洛夫和庫西寧。當時赫魯曉夫的情況岌岌可危。幸虧國防部長朱可夫（但後來也因功高震主而被赫魯曉夫排斥了）支持中央委員們湧進克里姆林宮要求召開中央全會。中央全會一開，形勢大變，通過了關於馬林科夫，卡岡洛維奇和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改組後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把那八個人都換下來了。要知道：即使是在建國後的中共歷史上，也沒有在同一屆中央委員會的任期內改組政治局並換掉其三分之二成員的事件呀？

在1956年底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曾提出在中共高級幹部內有人「裡通外國」，實際上是「裡通蘇共」。這個人或這些人到底是誰，至今沒有點名。反正已不是高崗，因為這是好幾年以前的事了。也可能是彭德懷吧？但是至今還沒有證據說是他。

問題在於：既然在中共中央內部有人「裡通蘇共」，那麼在蘇共中央內部是否有人「裡通中共」呢？國與國，黨與黨（尤其是共產黨）之間的「裡通」本來就是常事。那末如果蘇共中央有人「裡通中共」，這個人可能是誰呢？我以為，這個人可能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克里門特·葉福列莫維奇·伏羅希洛夫。

我手上當然沒有證據，但是我有兩個最大的疑點：

第一個疑點是：四月份伏羅希洛夫作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訪華，兼有國家元首和議會主席的身份，毛澤東作為國家主席接待他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從職務上更對口的應當是當時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劉少奇。然而毛澤東卻「獨攬」了對於伏羅希洛夫的接待，劉少奇幾乎沒有露面。人人都知道，毛澤東是不喜歡搞繁文縟節的禮儀的，但這次接待伏羅希洛夫卻熱情得反常，在機場又是擁抱又是吻臉龐的，還陪他遊山玩水。更鮮明的對比是：1956年米高揚三次來華，毛澤東對他都很冷淡，並且一再批評蘇共對斯大林的作法。在米高

揚代表蘇共中央向中共八大致賀詞時毛澤東故意不出席，氣得米高揚當天便登上飛機回莫斯科了。

毛澤東和伏羅希洛夫相處了幾乎二十天，難道兩人之間只談了什麼抽煙對健康是否有益的話題，而沒有談論前蘇共二十大和斯大林問題。越是沒有他們之間關於這方面談話的報導，越是有可能懷疑他們之間不僅談了這個問題，而且談得很深，觀點一致。但是諱莫如深，決不能失秘。

關於伏羅希洛夫在前蘇共中央 1957 年 6 月全會上站在莫洛托夫一方的問題當時全會決議沒有點他的名，這是 「照顧」他剛從中國回來的原故。但是不久他就被迫從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位子上「退休」，由米高揚取而代之。點伏羅希洛夫的名和披露蘇共中央 1957 年 6 月全會的驚險過程，是在 1961 年 10 至 11 月的蘇共 22 大上作出的，那時中蘇兩黨的分歧實際上已經公開，尚未開始公開論戰而已。

蘇共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及其主席團（即政治局）當然是在 1956 年的二十大上產生的。但隨著當時國際形勢的波濤洶湧，在其內部的鬥爭始終是很激烈的。中共中央可能不經常注意著蘇共中央的內部鬥爭，甚至物色「裡通中共」的人嗎？1956 年蘇聯和南斯拉夫關係一度好轉。6 月份在鐵托訪蘇前夕，蘇聯政府突然解除莫洛托夫的外長職務，改由謝彼洛夫擔任（但後來證實謝彼洛夫也是莫洛托夫一方的）。當時我正在從蘇聯回國度假的路上，以為這不過是蘇聯政府調整外交政策的一項措施而已。不想我回到北京以後，在教育部召開的回國留學生座談會上，留學生管理司長（前我國駐蘇使館留學生管理處處長）許鐵民對我們說：「莫洛托夫受處分了。」這是蘇聯沒有對外發表的消息，我國一名司局級幹部就知道了。這難道不說明中共中央始終注意著蘇共中央的內部鬥爭嗎？

其實這是可以理解的。有人懷疑過中國政府曾經試圖影響美國的總統大選。對於 1989 年的前蘇聯八·一九政變，也有人懷疑中共有牽連（在政變發生後幾小時中國的電視就轉播了）。至於毛澤東支援波爾布特在柬埔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第三次大恐怖和大屠殺，則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那麼，中共中央曾試圖影響蘇共在二十大以後的走向，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我的第二個疑點是：中共的整風運動原定是在 1958 年進行。為什麼伏羅希洛夫回國後，毛澤東立即提議，要求立即進行整風呢？這裡面毛澤東似乎有一個大

的「算盤」。他這個「算盤」的內容不得而知，但這個「算盤」是必然存在的。

這麼說吧：假如在 1957 年蘇共中央 6 月全會上，莫洛托夫一方獲勝了，那就是斯大林主義在蘇聯死灰復燃了。中蘇兩黨一致了，毛澤東的壓力不大了。那時即使反右派鬥爭已經開始，他是否也會限制這個鬥爭的規模，而不使其擴大化呢？

第三，不能把整風前後的中共中央看成鐵板一塊

不把整風前後的中共中央看成是鐵板一塊，可能成為探索整風轉為反右的關鍵障礙。

1956 年的蘇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以後，中共中央內部已經形勢大變了。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下，毛澤東已經從至高無上的專制領袖下降為中共中央領導集團中的一員。有一次周恩來在看戲時甚至告誡觀眾在毛澤東來時不可鼓掌，鼓掌者下次看戲時不發給戲票。

從 1935 年的遵義會議到 1943 年延安整風結束，中共高層經過多次權力的再分配。毛澤東是通過這些權力的重新分配而取得最高權力的。但是那幾次權力的重新分配，都沒有立刻通過黨的中央全會或代表大會固定下來。然而 1956 年中共八大後的權力重新分配則是另一回事了。我們都知道，八大以後，中共中央分成了兩線。毛澤東退居二線，對黨國大事保持最終發言權。而劉少奇等政治局常委則仍處於一線，處理日常事務，手中握有八大黨章，包括第 37 條必要時可設中共中央名譽主席一人。這可是懸在毛澤東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劍呀！

因此我始終懷疑毛澤東在整風開始時有必要費很大的心機去對付那些並不是他的主要敵人，並且端著共產黨的飯碗的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而把他的主要敵人—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線放在一邊。但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毛澤東還不可能搞九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以一舉摧毀「劉少奇司令部」。他得一方面為自己的「二線中央」網羅人才（林彪、康生、柯慶施和江青等），這需要時日。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整風削弱以劉少奇為首的一線中央，再度突出他最高領袖的地位。

在這方面我有三點旁證。第一就是前述的為什麼本來定於 1958 年才進行的整風運動，在五月間伏羅希洛夫訪華回去後，毛澤東就要求立刻開始整風呢？

第二個旁證是整風的方式。劉少奇要求的整風方法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毛澤東則要求「大鳴大放」。這顯然是因為這兩種方式對於兩線中央帶來的壓力

是不一樣的。

第三個更使我感到關係重大的旁證是：如果全面觀察一下整風期間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分子們提出的意見，直接不利於毛澤東的部分（如個人崇拜問題）所占比例不大，而有利於毛澤東，批評共產黨的意見則更多。在這些意見中，反對向蘇聯「一邊倒」的意見明顯是對毛澤東有利的。即使是「各民主黨派輪流坐莊」的那種意見，也只能動搖中共的執政地位而動搖不了毛澤東中國精神領袖和最高領袖的地位，即利大於弊。

記得 1957 年 8 月間周恩來接見美國青年代表時，有一個美國青年向周恩來提到他聽說在中共領導人之間有意見不一致的問題。周恩來故作驚訝地說：「哎呀？我都不知道的事，你也知道？」那個美國青年打圓場說：「我對你的回答感到很快活！」這其實是欲蓋彌彰。政治家之間從來都是貌合神離的。不要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菊香書屋開會時，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對毛澤東說的都點頭。他們不過是早已知道了毛澤東的為人和性格，不敢唱反調而已。

總之，我的思路是：在 1957 年 4 到 6 月間，中國的國際國內黨內形勢撲朔迷離，瞬息萬變。整風開始後的走向變數很大。前途存在著多種可能性。毛澤東不可能在那時預定什麼「陽謀」或「引蛇出洞」。直到 6 月末，塵埃落定，才確定了整風轉向反右。

關於反右擴大化我還想補充一點，即擴大化不完全是毛澤東的個人意願，而是當時中國社會生存鬥爭的反映：從建國以來，運動不斷，產生了不少吃運動飯的人（我在自己的書中稱這種人為「運動派」）。「運動派」們是靠被鬥爭者們而過活的。任何單位，揪出的「右派分子」越多，就騰出越多的好位置給「運動派」們。反右鬥爭怎能不擴大化呢？這是共產黨的鬥爭理論和實踐決定的。其實從 1930 年的富田事變起到 1967 年的清查「五・一六分子」，哪一個運動沒有擴大化呢？

請原諒我的思路可能不夠清晰，也缺乏原始證據。謹願與到會諸位共同磋商。謝謝！

——2007 年 6 月 30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意識形態的興衰與知識份子的起落　　　　　　陳彥

極權主義概念將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與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其他各種專制制度區分開來，指出這兩種極權制度的四大基本特徵，即一黨專政（黨即國家，國家即社會），國家壟斷經濟及一切資源，意識形態專政，員警恐怖。而從意識形態的內容、號召力的強度、大眾認同的持久性及其普適性等方面看，相對於納粹主義，意識形態專政是共產主義制度更為本質的特徵。1 本文嘗試從意識形態專政概念入手，從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意識形態專政演變的軌跡出發，比較發生於 1957 年的反右運動與 1980 年代爆發的「新啟蒙」運動的歷史定位並進而探討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命運。

一、意識形態認同與意識形態恐怖的內在緊張

利用國家機器將一種意識形態強加於社會，以一種意識形態體系統攝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個人生活是共產主義制度的一大發明。從蘇東共產主義與中國共產主義的制度實踐來看，可以將意識形態專政分為意識形態認同和意識形態恐怖兩個方面。所謂意識形態認同乃是通過各種教育、宣傳手段灌輸意識形態教條，要求人們無條件地認同，將教條當作真理來信仰。共產主義不同於宗教，宗教訴諸於人們的非理性的心靈需求，共產主義則宣稱自己是科學，要求人們通過「理性」思考來達到認同的目的。換句話說，意識形態認同不僅要求人們信從，還企圖同時壟斷理性思辨的通道。意識形態認同也同時具有一神教宗教的特徵，最為突出者即無處不見的排他性。為了達到意識形態認同的目的，共產主義不僅壟斷一切思想、文化資源，也動員專政力量割斷民眾同外界和傳統的聯繫，封閉社會的橫向與縱向的通道。

意識形態恐怖是意識形態專政的另一面向。無論共產主義的宣傳教育機器如何強大、其各種控制手段如何無孔不入，要將千千萬萬個獨立的個體思維和形形色色的社會管道全部納入同一思想體系和同一運行軌道，卻不是單靠思想教育和認同動員就可以實現的。對那些頑固不化者、不堪教育者、信仰不堅者，必須動

用專政的手段，一方面強迫他們接受正統的意識形態，一方面懲戒其他可能的動搖者。事實上，極權主義的特徵之一就是壟斷一切專政手段以鎮壓一切可能的和潛在的敵人。階級鬥爭的理論及建立其上的制度手段正是這種鎮壓的預設。這種制度不僅需要鎮壓敵人以維護其極權的一統天下，而且還需要製造敵人以便維持鎮壓機器並進而證明極權制度的必要和合法。利用人們對烏托邦的嚮往，通過對教育、傳播手段的壟斷來灌輸教條、馴化異端，改造洗腦，達到意識形態認同；又以意識形態認同之名，鎮壓反叛，消滅異己，威懾大眾，達成意識形態恐怖。意識形態認同與意識形態恐怖交叉並用，互為目的與手段，這即是意識形態專政。

在意識形態專政內部，認同與恐怖雖然互為補充，但二者也存在著內在的緊張。意識形態專政的演變一方面決定於極權主義統治下的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同意識形態專政的這種內在緊張密不可分。意識形態認同的內在前提是意識形態應為顛撲不破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意識形態恐怖則實際上表明意識形態並非無堅不摧的思想利器，意識形態認同僅僅靠灌輸教條是無法達到的。意識形態專政必須借助思想教化以外的暴力手段才能確立。整體上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的制度實踐表明中國的意識形態專政一直是認同與恐怖兩手並用，二者互為表裏，難以分割。但細觀從 1949 年到改革開放的歷史，也存在著一條由認同動員與恐怖專政並重而逐漸走向強化恐怖的極權主義演進的線索。

二、意識形態專政史上的 1957

從這條線索著眼，可以將 1949 年至今的中國歷史分成四個階段。

一、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到 1957 年反右，是意識形態專政的確立階段。

二、1957 年到 1976 年文革結束為意識形態專政的巔峰階段。

三、1978 年至 1989 年六四屠殺為意識形態專政的衰變階段。

四、1989 年之後中國則進入後意識形態階段。

從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初開始，為了建立意識形態專政，中共即採取灌輸與恐怖兩手政策。1951 年 5 月開始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1951 年秋開展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1952 年的批判唯心主義思想運動，1955 年的批判胡風

反革命集團運動等屬於前者。建國伊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 年底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1951 到 52 年的三反、五反運動，1955 年肅反運動等則屬於後者。1957 年以前，儘管中共鎮壓運動不斷，但對知識份子而言，主要趨勢仍然是以灌輸意識形態教條為目的。對知識份子的大規模鎮壓是從五七年反右開始的。反右表明中共意識形態專政的正式確立，是共產主義這一套思想政治符號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全面落實並取得統治地位的標誌性歷史事件。不少研究者看到，反右運動是中國現代政治史上的一大轉折，是中共從經濟建設轉向階級鬥爭，最後走向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開端。從意識形態專政的角度看，反右運動正是從意識形態認同向意識形態恐怖的轉折。

反右中的「右派」，以解放前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份子為旗幟。這一代知識份子，有曾經與共產黨同為多元社會中的政治盟友，如章伯鈞、羅隆基；有在建國前已對中共有著清醒認識的自由知識人，如儲安平。對於建國之初的中共來說，保留並任用四九年以前的少數上層精英，有利於傳達開明盛世的資訊，有利於增強共產主義政權的道德感召力。從整個知識群體來看，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並不認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本身，但同情或認同共產黨宣揚的平等、均富等左翼價值及獨立、圖強等民族主義理念，對共產黨心存幻想；一種是對共產主義理想懷有真實信念，並企圖以理想檢驗現實，進而希望按照共產主義烏托邦情懷改造一黨專政下的社會現實。

三、反右再解讀

在 1957 年作為反右鬥爭前奏的「鳴放運動」中，在共產黨、毛澤東的鼓勵與推動下，這些知識人敞開心扉，從各個方面分析中共建國之後的局勢，針砭時政，指出了當時政治走向獨裁，社會漸被窒息的危險轉向。從目前對反右運動的評價來看，尤其是從共產黨先有整風鳴放在前，批判鎮壓右派在後的這一時間順序出發，存在兩種看法：一種是著名的「陽謀論」。即毛澤東此前提出的雙百方針，鳴放整風是反右鬥爭正式啟動前的「陽謀」階段。陽謀階段也就是所謂「釣魚」或「引蛇出洞」階段，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反右鬥爭戰略部署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對於這一分析的最好論據是毛澤東自己的話：「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

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2 從這一立論出發，當時的知識人之所以敢於對共產黨提出批評建議，乃是因為未能抵抗住毛澤東「陽謀」的誘惑，上了共產黨出爾反爾的當的原因。

第二種說法正好相反，即反右運動根本不是預先策劃的具有戰略先見的所謂「陽謀」或「引蛇出洞」。反右運動從鳴放開始到鎮壓結局，恰恰由於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對於當時形勢的錯判。鳴放一旦啟動，批評言論滾滾而來，毛澤東感到處於被動地位，迫於形勢不得不採取應變措施而實施的緊急鎮壓。這就是毛澤東本人於 1957 年 5 月 15 日所說的「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種論點可以歸納為「鎮壓論」。這兩種說法看上去似乎針鋒相對，但實際均是從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的動機出發分析反右運動。

將反右運動帶入意識形態專政的分析框架，我們看到，無論是事先設置圈套的「陽謀」，還是事後調兵反擊的「鎮壓」，均是意識形態專政的兩個層面的一體兩面。「陽謀論」的預設是毛澤東一開始就認為無論是在教育界，文學藝術界，新聞界，科技界，工商界還是民主黨派內，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不可能認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而意識形態恐怖是唯一的手段。而「鎮壓論」的預設則是毛澤東在當時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認同充滿信心，發動鳴放之後才發現共產主義並非如此得人心，建國之後強大的意識形態灌輸和宣傳也並非如此有效，共產主義政權因而也並非如此鞏固。於是，鎮壓成為必須。

從這一視角切入，問題的關鍵點不是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的動機，而是反右運動的對象－－知識份子這一階層如何面對意識形態專政這一史無前例的極權主義國家形態。在目前各種反思反右運動的著述中，不乏對於共產黨、毛澤東翻雲覆雨、失信於民的控訴。對反右運動中普遍存在的以「誣陷」、「栽贓」為手段而羅織罪名的批判也屢見不鮮。最近郭羅基先生在《歷史的旋渦》一書中總結「反右運動」整人術有「捕風捉影、強加於人、去頭掐尾、本末倒置、穿鑿附會、混淆黑白、偷樑換柱、向壁虛構、無限誇大、含血噴人、一棍打死等」各種手法，一應俱全。3

對於共產黨在反右運動及其他類似運動中所使用的卑劣手段當然需要清理和反思，不過這類清理卻不應該自我局限于受害者的視域。僅僅從共產黨與知識人的關係上講，從擁護還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的角度來講，將眾多的理念上認同共

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知識人打成右派也許是一場「誤會」，主觀上講他們也的確是「無辜」的。然而，從意識形態專政的角度講，如果意識形態專政的目的是為了閹割獨立精神，造就不能思考的思想奴隸的話，那麼，他們對共產黨的批評、建議，無論多麼善意，多麼中肯，只要他們還可以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就只能表明他們仍然保持著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建國後鋪天蓋地的共產主義教育並沒有使他們喪失思想與判斷的能力。從極權主義邏輯看來，知識人保持著思想能力與獨立精神這一事實本身就是極權機器的失敗，就是知識人的罪孽。換句話說，反右運動的本質不能被簡單地解讀為一場知識份子與民主黨派人士上當受騙，共產黨翻臉不認人的卑鄙與冤枉互植的歷史「悲劇」。反右運動的本質一方面是共產極權主義自我擴張並進而全面控制社會，禁錮思想的全能邏輯的必然歸宿；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建國後中國知識份子對意識形態馴化的偉大抗爭。

從當時的右派言論來看，不少批評諫言是直指共產黨的合法性的。如儲安平指責「黨天下」，章乃器批評共產黨「以黨代政」，張百生、黃振旅甚至說共產黨「以黨代憲法，以黨代人大」，章伯鈞建議將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改成四個政治設計院，黃心平更是直言共產黨應與民主黨派輪流執政。4

如果說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這些建國前的政治精英的民主言論乃是「舊」社會、「舊」教育的殘餘的話，反右運動所體現出的共產黨意識形態灌輸的失敗也體現于共產黨建國後培養出來的一代新人如林昭、林希翎這一代大學生身上。著名右派人大學生林希翎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林希翎面對專案組的教誨與訓斥，始終沒有「悔過」，終於被送上勞改之路。從思想交鋒的角度，林希翎被送入監獄的那一刻，則意味著極權思想自甘失敗。她的生命的閃光是由於她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確立時期站出來捍衛了理想的純正。她的不可馴服的事實，直抵中共意識形態教化的底線。5

從反思中共極權主義總體演變出發，縱觀反右期間的右派言論，反右運動的啟示是多方面的。首先，大量的鳴放言論顯示，1949 年以前，自由民主已經深入人心，以知識份子為主的國人精英對民主建國、多黨制度、言論自由已有共識。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由西方強行闖入中國而開啟的中西彙通的近代歷史已經走過了一個世紀之久。經過幾代中國知識精英的不懈努力，源于西方的現代價值實際上已經全面植根于中國文化。

第二，1949 年到 1957 年，中國言論、思想環境相對寬鬆。新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一方面還沒有完全暴露出其極權面目，另一方面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徹底取消舊有社會管道。原有的在多元環境下接受教育的老一代知識份子（所謂舊知識份子）仍然能夠通過現存渠道將民主、自由理念傳輸給青年一代。這是北大、清華、人大等校園內大學生能夠保持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參加「鳴放」，對當時體制提出質疑的知識社會學背景。

第三，反右前的「鳴放」雖是共產黨發起，但知識人抓住時機，為自由、民主、多元進行了有力的辯護和不屈的抗爭。從總體上檢示右派言論，受到共產主義烏托邦所誘惑的這一代知識份子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仍然保有敏銳的觀察和深刻的洞見。不到十年的共產主義實踐，應該說知識份子的整體已經感受到極權主義的真實。即使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公共空間窒息而無法交流與辯論的一黨專政的背景下，知識人的判斷力並沒有因此而萎縮，獨立精神仍然不滅。這一精神既與中國古典文化中士人精神一脈相承，也是經現代西方思想洗禮所結出的果實。49 年之後的中國雖然是共產主義依靠國家機器力量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統治的一統天下，但知識人的批判能力並沒有因意識形態強制灌輸系統的確立而喪失，也沒有因為肅反以來的較大規模的意識形態恐怖而受到根本傷害。這一代知識人並沒有如專制者所預期的那樣臣服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於新建立的極權主義制度來說，對這些無法被意識形態俘獲的具有獨立思想能力的知識份子，從肉體上給予鎮壓於是成為必須。從這個意義上講，反右運動昭示了中國一代知識人對極權主義國家機器的全面抵制，宣判了以思想改造為主要手段的意識形態認同的失敗，迫使毛澤東、共產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不得不從意識形態認同與意識形態恐怖兩手並用轉向以意識形態恐怖為主要手段。

四、1980 年代到上世紀末知識份子的啟蒙

作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反右運動隱藏著共產極權主義運行的雙重軌跡。第一是所謂全控型國家邏輯，即國家政權將控制社會生活的全部作為自己存在的主旨。也就是說，一旦共產主義作為制度登上了某一個國家的歷史舞臺，它的全部目的就是將社會與人生的一切統統納入自己的運行軌道。中共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每次運動既是全能國家對仍然存在的社會的野蠻吞噬，又一

步一步將全控型國家推向頂峰。最近鮑彤先生就反右運動撰文指出:「反右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轉折點。它為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以後繼續無法無天探明了道路。反右的受難者主要是知識份子，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受難者就以農民和工人為主了。反右派鬥爭封了黨外人士的嘴，到了反右傾鬥爭，就來封黨內幹部的嘴了。反右派以文字獄為主，文革公然提倡文攻武衛，到了天安門鎮壓，就是血淋淋的坦克加衝鋒槍了。」6 這段文字無疑是對這一極權邏輯的極好闡釋。

第二便是意識形態專政的軌跡。在中共建國之初，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仍然發散出烏托邦的理想光芒。對知識份子的大規模鎮壓強化了新興意識形態專政制度的恐怖向度，暴露了這一政權在思想領域施行專政的真實面目，因而開啟了共產主義烏托邦幻滅的過程。對於中國當代知識份子來說，反右鎮壓使得作為社會階層的中國知識份子集體殞落。反右之後，無論是大躍進還是文革，知識份子不僅作為群體已不復存在，作為具有獨立立場、批判意識的個體知識份子也幾近絕跡。面對恐怖與認同的雙重夾擊，知識份子幾乎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臣服，要麼滅亡!

在論述列寧主義的思想來源時，法國蘇聯問題專家阿蘭・貝桑松教授注意到一個知識階層的悖論：意識形態的在場是知識階層得以降生的決定性條件之一，而意識形態一旦獲得統治地位，也就意味著知識階層的瓦解 7。飛鳥盡而良弓藏。按照這一分析，反右之後，中共意識形態專政正式確立，知識份子的歷史使命於是結束。然而，到了上世紀的八十年代，中國極權主義演變的現實卻奇跡般地給知識份子提供了又一次重生的機遇。

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共產主義走向晚期，我們目睹的卻是一個正好同知識份子隨意識形態確立而瓦解的現象相反的歷程：知識份子通過與意識形態決裂而鳳凰涅槃烈火重生。八十年代是新一屆領導人發起改革的年代，也是中國在意識形態和思想領域啟動一個重要的歷史進程的時期。這一進程即是我所稱之為的「意識形態解構」。8 這一進程由兩大相互聯繫但又有質的區別的運動組成。首先是「思想解放」運動。這一運動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發起，旨在為文革後的改革提供一個較少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但是，思想解放一旦啟動，便迅速地超出了鄧小平預設的界限，突破政治實用主義的羈絆。隨著知識份子的全身心投入，在思想解放的名義下，誕生了稍晚被稱為「新啟蒙」的「民間」思想運動。新啟蒙運動同官方推動的思想解放有著同源的動力基礎：官方的思想解放需要突破僵化的意

識形態教條以恢復黨的合法性，知識份子因此獲得了解構意識形態的歷史契機。但是隨著啟蒙的推進，知識人很快超越了工具性的範疇。知識界作為思想、理論更新的主體，經歷了從改革派的同路人、同盟軍到獨立思想者的演化過程。突破意識形態的話語系統，打破思想禁錮的枷鎖，探求真理，擁抱自由是知識人最後走出極權主義政治邏輯的內因。

1978 年檢驗真理的標準是知識份子重生的一個象徵性歷史事件。從毛主義回到元典馬克思主義，中經人道主義與人的異化的辯論再到規模空前的「文化熱」，中國知識份子與黨內改革派以回到五十年代社會主義正統之名，一磚一瓦地拆除中共自建黨之初開始建構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大廈。他們試圖從毛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虛幻中走出來，重返中國真實的歷史情境。

新啟蒙運動的形成和推進標誌著中國知識群體在中共極權主義走向沒落時代的新生。利用極權主義政權政策調整而生發出的討論空間，知識份子獲得了重生的條件；解構意識形態的共同目的使得知識份子群體重新聚集成為可能。可以毫不誇張地斷言，肇始於 70 年代末的這場思想運動，是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最為壯觀的知識革命。不僅在推動中國人走出愚昧主義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也為影響深遠的中國改革提供了方向指引。

隨著知識份子回歸社會中心和走向思想獨立，知識份子前行的路上無疑再次遇到了政權的力量。前者繼續探索真理之路，而後者則回歸到維護獨佔權力的極權統治邏輯。中國知識群體在二十世紀末年與中共政權的最後一次結盟最終以統治者的六四屠城而戛然而止，中國的知識階層再一次被血腥剿滅。

五、1957 與 1980 兩次抗爭的歷史定位的異同

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來看，1957 年的反右運動與 1989 年的學生民主運動兩件歷史事件標誌著當代中國意識形態之鏈上的兩個歷史轉折點。1949 年中共在全中國範圍內的勝利，既是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勝利，也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成功。包括章伯鈞、羅隆基在內的當時主張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與知識精英對共產黨抱有期待。建國後大批海外華人精英歸國也顯現出當時的中共及其意識形態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從某種意義上講，即使僅僅從意識形態層面講，中共 49 年的勝利也不能單純理解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對於中國的知識人及眾多

的海外華僑，共產黨在中國建立政權是民族主義加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混合體的勝利。然而，此時的共產主義所傳達出的烏托邦幻象的向心力依然不可忽視。

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對這一幻象的最初衝擊。按照中共官方的數字，全中國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共有55萬人之眾，丁抒先生認為全國共劃右派總數為一百二十萬 9。當時的中國社會仍處於極權化的過程中，一旦被劃為右派，輕則撤職降級，重則流放他鄉、勞動教養。當年的右派，為人歧視，受盡屈辱，一人落難，全家株連。苟且偷生者眾，僥倖逃脫劫難者寡。中華民族的幾代知識精英，即使沒有被一網打盡，經此一役，業已潰不成軍。反右由誘導向共產黨提意見，到圍剿推動共產主義改良的知識份子，意圖從精神與行政兩方面強化無產階級專政。反右運動是中共從經濟建設轉向階級鬥爭，最後走向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開端。反右的結果，毫無疑問加強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

同反右加強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專政相反，六四慘案對八九學運的鎮壓意味著意識形態統治的崩潰。八九學運發生於中共意識形態衰變的八十年代末期。在這一時期，由於中共歷次運動尤其是文革的意識形態暴力洗劫，共產主義理想光芒已經黯然失色。經過官方發動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民間新啟蒙潮流的衝擊，殘存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大廈已經搖搖欲墜。正是由於自由、民主、人權等新思想、新觀念的湧入，才使得青年學生走上街頭，發起了呼喚民主、推動政改的八九民主壯舉。反右由共產黨全盤操控，八九則意味著共產黨已經失去了主導能力。八九學運雖不是共產黨所發起，但學生的出發點仍然是推動共產黨的政治改革。這一運動以六•四悲劇結束，結果不僅不是加強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統治，而恰恰是給予了意識形態大廈最後的一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固然沒有因為六•四而同柏林牆一起倒場，但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幻象則從此壽終正寢。中國於是走上了一党專政加自由經濟的壟斷資本主義之路。

六、如何面對後意識形態的極權社會

縱觀整個意識形態專政的歷史，知識份子群體實際處於整個中華民族現代悲劇的中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知識份子可以是特定意識形態的創制者、傳播者，也可能是意識形態的奴隸和祭品。共產主義將意識形態統治推至極端，既強化了知識份子在意識形態專政之中的特殊地位，又將對知識人的奴役作為向全社會強

加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首選和象徵。在意識形態專政的每一個轉折點上，知識份子都起到了關鍵作用。1957 年反右時期悲壯的抗爭，凸顯了知識份子不甘屈服、追求自由的獨立精神。此後，中國社會步入意識形態專政的巔峰時期，馴服乃至成為政權的幫兇一度曾是知識人維繫生存的唯一可能。然而，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知識份子借助極權主義萎縮的歷史契機，重振雄風，為最後徹底推倒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統治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如果將 1957 年反右運動中知識份子對「党天下」的批判和 1980 年代以解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主旨的「新啟蒙」運動看作是中國現代史上知識份子奮起抗爭、呼喚自由的兩大高潮的話，兩次高潮的不同結局卻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課題。反右之後，以獨立於國家政權並具有批判意識的社會良心作為定義的知識份子群體在中國社會已不復存在。1989 年以後，意識形態信仰系統解體，極權社會進入後意識形態時代。當今的中國，無孔不入的極權制度雖已失去了烏托邦的光環，但知識份子卻又必須面對政治高壓與物質誘惑的雙重困境。如果說八十年代意識形態解構的偉大歷史運動中，知識份子曾經展現了勇氣、智慧和力量的話，意識形態解體之後，知識份子群體是否仍然存在呢？八十年代之後，新啟蒙思潮在中國仍然生機勃勃。民族主義、新保守主義、新儒家、新左派、自由主義等討論此起彼伏。然而，既使是在九十年代，由西學向「國學」與「實學」的轉軌，由激進向保守，由浪漫向現實的轉向也已體現出中國知識界淡出公共領域的前兆。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類似八十年代的文化討論和九十年代的思潮辨析似已成為時代的絕響。

從世界範圍來看，東西冷戰結束，意識形態消退之後，知識份子已無用武之地。歐美多數輿論雖然不認為歷史從此終結，但知識份子退出時代的前臺似乎已經成為當今學界的共識。有人總結，當代知識群體的隱退除了意識形態退潮這一大的歷史背景及知識分工的日益細密所導致的知識人的專業化因素之外，決定性的原因是公民社會的壯大在很大意義上已經取代了當年知識份子的社會功能。10 反觀中國，公民社會的經濟與社會基礎業已形成，但獨立于國家政權意義上的公民社會仍處於繈褓之中。知識份子還沒有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難道就已消失於中國社會舞臺？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發表於《當代中國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注 釋

1 關於中共極權主義的批判，參見拙文「試析中共極權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雙重邏輯」當代中國研究 2001 年 第 1 期。

2 1957 年 6 月 14 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所寫社論：《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

3 郭羅基，「歷史的旋渦——一九五七」明報出版社，2007 年 4 月

4 華民，「中國大逆轉 ——反右運動史」，明鏡出版社，1996 年 12 月，第四章。

5 参见 99 年 3 月号「北京之春「拙文「从意识形态认同到意识形态恐怖——释读《不可驯服的林希翎》」。

6 見「新世紀」網站 http://www.ncn.org

7 Alain Besancon，法國科學院院士，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u léninisme，（列寧主義的思想起源）巴黎 Gallimard 出版社，117-119 頁

8 有關意識形態解構問題請參見拙著「中國之覺醒——文革後中國思想演變歷程 1976－2002」田園書屋出版，2006 年 8 月

9 丁抒《陽謀》，香港開放雜誌社 2006 年 5 月第 310 頁。

10 參見 Didier Eribon,《D'une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 : Et de ses effets sur la gauche francaise》 Editions Léo Scheer 2007 年 3 月

1957：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消失　　朱正

一　「消失」的主體：中國現代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這個概念，是近現代才傳入中國的西方符號。在中國承載這個符號的群體，在社會結構和社會功能上異于西方知識份子，在個體的養成和群體的結構上也異于西方知識份子。

在近現代，隨著西方文化的衝擊，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逐漸普及，識文斷字的讀書人，成了擁有各種學歷的文化人，成了術業有專攻、承擔傳播社會良知

的知識份子。

「現代知識份子」這個概念，可以有兩種理解。這個概念可能基於時間的界限，把古往今來的知識份子區分為古代的、近代的、現代的，從群體功能延續的時間邏輯上講，由古代而近代而現代，不會斷續消失，除非出現了斷裂。「現代知識份子」這個概念，也可以理解為類型的分別，有傳統知識份子，也有現代知識份子。當然也有的個體，既現代又傳統，比如魯迅、胡適；也有的個體，既非現代也非傳統，兩個方向的異化交織，使之成為知識、知識份子乃至中華民族的異數，比如毛澤東。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之後，這片大地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知識份子」嗎？

如果沒有，本書的主題就失去了主體，那麼，這種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有，有多少？他們都在哪里？

如果知識份子就是社會的良知，那沒有了良知，就都不應該算作知識份子了。這樣看來，從失去良知起，這個知識份子的個體就已經「消失」了。

如果整個知識份子的群體、或者其中的某些類型，雖然把社會良知藏在心底，但是他們或者喪失了維護社會良知的勇氣，或者失去了維護社會良知的機會和力量，那他們該不該被算作「消失」了呢？

二　「消失」的時間點：1957 年

把「1957」作為本文標題的一部分，只是為了指稱的簡潔，而不是強調「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就「消失」在 1957 年，這一年既不是「消失」的起點，也不是「消失」的終點。「消失」的程式在 1957 之前三十年就已經啟動。「消失」的高潮在 1957 之後十年更加慘烈，「消失」的餘緒三四十年後還在波動。

強調「1957」，是因為在這一年裏，發生了影響深遠的反右派鬥爭。

1956 年 2 月蘇共「二十大」用「反對個人崇拜」批評斯大林；1956 年 4 月毛澤東提出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召開，對於這些，知識份子都是歡迎的。以為這些預示了政治格局將有所變化，自己可以有一番作為了。民主同盟的領袖章伯鈞對羅隆基說：「現在我們民主黨派大有可為，可以大做特做。」1 他情緒高昂，就來考慮民主同盟和

他的農工民主黨(由第三黨衍變而來)的發展組織、開展工作這些事情了。

這幾個月裏，在遙遠的東歐發生的一些事情影響了中國的政治氣候。

蘇共「二十大」，批評斯大林，中國一些知識份子對此感到興奮，反應卻還是頗為平靜的。在受到蘇聯影響更大、更直接的東歐，反應要強烈得多。1956 年 6 月，波蘭發生波茲南事件，軍隊鎮壓示威群眾，死七十四人，傷九百多人。10 月，由曾經被整肅的哥莫爾卡取代奧哈布為黨中央第一書記。匈牙利的亂子鬧得更大，黨中央第一書記拉科西被迫下臺，最後是蘇軍出動了坦克車才把遍及全國的騷亂鎮壓下去。

中國知識份子對波匈事件的熱烈反應，使毛澤東十分反感。1957 年 1 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莫爾卡的棍子轉，哥莫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

從這個時候開始，在毛澤東的思慮中，可以說是有了一個「匈牙利情結」。他在考慮中國也出一場「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他認為，資產階級和地主這些敵對階級，「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他甚至作了這樣極端的估計：「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佔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

話雖是這樣說，但他心中想的，當然是力求避免出現「匈牙利事件」。採取什麼對策來避免呢?他想到的一項對策，就是開展整風運動。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就是在蘇軍坦克開進匈牙利之後幾天召開的，波匈事件是會上的熱門話題。就在這次全會上，毛澤東提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這時，他所設想的整風運動是什麼意思呢?在這篇講話中，他說：「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

事情過去幾十年之後，回頭來看這一段話，就好懂了。有兩種「大民主」：匈牙利事件那樣的群眾上街，以及不久之後右派分子的大鳴大放亂鳴亂放，是資產階級的大民主；而整風運動，人人過關，發動學生來鬥爭教授，如同前幾年行之

有效的思想改造運動，或者幾個月之後的反右派鬥爭，就是無產階級的大民主。想一想他說的「整風就是思想改造」這話，就不致對他發動整風運動的初衷有什麼誤解了。由此也就可以知道：通常說的「由整風運動轉變為反右派鬥爭」這話，未免有點隔膜。在毛的思慮之中，反右派鬥爭是整風運動的實質，或者說是整風運動既定的最後階段。這裏面說不上有什麼轉變，尤其不能說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有些人之所以會認為是由整風運動轉變為反右派鬥爭，只是因為他們所說的整風運動並不是毛心中所想的、並且明確說了「就是思想改造」的整風運動，而是他自己所希望出現的整風運動，那是以最大的好意去解釋〈整風指示〉字面的含義。看到實際出現的情況同他所希望的並不相符，於是就以為是轉變了。

發動整風就是為了避免「匈牙利事件」這意思，在毛澤東寫的一份黨內指示中說得更加明白：

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還好，擠出膿包)，利益極大。

這一段話見於 1957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2。這正是反右派鬥爭公開發動的日子。這個指示是被看作宣告反右派鬥爭開始的發令槍聲的。它表明整風即反右，目標就是防止「匈牙利事件」。

毛澤東是帶著他的「匈牙利情結」進入 1957 年的。在 1 月舉行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他講了他的一些具體的思考。

一年以前，周恩來在《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中談到對知識份子的安排和改造兩個方面，而側重點在改善安排。這時毛澤東的說法卻不同了，他說：「在知識份子問題上，現在有一種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不敢去改造知識份子了。我們敢於改造資本家，為什麼對知識份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談到民主黨派，毛澤東注意到了，「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不過，他又說，「對於他們的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因為他們沒有本錢了，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不聽他們的，他們腳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變，一個原子彈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爛，這些人不起變化呀?那就難說了。」基於這樣一種估計，重要的是，決不可以讓他們變得「有本錢」。於是，他提出了一個對待

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的辦法：

……我們把資本家包了下來，還給他們七年的定息。……出這麼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繫的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文化技術知識一般比較高。我們把這個階級買過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這樣，政治資本就不在他們手裏，而在我們手裏。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沒有剝奪乾淨的還要剝。

所謂出錢買，是對資本家說的，就是給定息的意思。所謂安排點事做，是對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說的，給安排點政府機關的職務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之類的頭銜，目的也是在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這時毛澤東還在想用捧的辦法而不是壓的辦法。並不是壓不下，半年之後的反右派鬥爭，就是改用壓的辦法來徹底剝奪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的政治資本，在他，似乎更加得心應手。不過，至少在 1957 年 1 月這個時候，他還沒有說要用壓的辦法。由此看來，似乎不能認為這時他已經在準備一場後來那種具體形式的反右派鬥爭。

1957 年 3 月，毛澤東召開了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他分別邀了到會的教育界幹部、文藝界和新聞出版界人士座談。在同文藝界代表談話的時候，周揚提出：秦兆陽用何直的名字寫了一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有人批評他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他很緊張。毛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問題，這次會議一時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結論，也用不著緊張，可以研究討論。」3 在談話中，毛還說到了假如魯迅還在世會怎樣的問題。他說：「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 4，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5

3 月 12 日，毛在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主題講話。在講話中，他分析了我國知識份子的情況。他說：「對於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份子，是極少數。……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這種人在五百萬左右的人數中間，大約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絕大部分的知識份子，占五百萬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6

在這篇講話中，毛提出了一個百家爭鳴實質上即兩家爭鳴的論點。他說：「我

們提倡百家爭鳴，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或者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或者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7

原來，他所提倡的百家爭鳴，並不是知識份子所理解和希冀的那種不同學派的自由爭論，而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通過這種「爭鳴」來克服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最終達到一家獨鳴的結果。

使毛澤東震怒的，是民主黨派活躍起來了。1957 年 3 月，民盟開了全國工作會議，章伯鈞在會上提出：要重新估價民主黨派的性質與任務，要大大發展組織，每個民主黨派可以發展幾十萬人，幾個民主黨派合起來可以發展一二百萬人，組織發展到縣一級。不久，民盟中央又成立四個臨時研究組，分別研究高等學校黨委制、科學體制、有職有權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四個問題。他們這樣做，表明他們希望民盟在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特別是在文教、科學這些主要是知識份子活動的領域中，有較多的發言權，起較大的作用。這些，就是毛澤東無法容忍的「黨要擴大，政要平權」。那樣的一場反右派鬥爭就是無可避免的了。

胡喬木為《人民日報》（1957 年 7 月 23 日）撰寫的社論《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中，從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引來了一大段話，其中宣稱：「無產階級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憑藉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胡喬木對列寧這話作了這樣的解釋：這意思「是說不與任何人分掌政權的領導」8。讀了這篇社論，那些已經被安排了各級領導職位的民主人士該不會再抱怨有職無權了吧。

其實，當年毛對民盟的積極性別有警覺。羅隆基在作檢討的時候說，他的這些活動，目的只在於「擴大民盟的影響，擴大民盟的組織，提高民盟的地位，能夠在國事的決策上取得較多較大的權力來解決這些問題。我的妄想亦只此而已，絕對沒有推翻黨、推翻社會主義、恢復資本主義的陰謀。」9 這並不是為了乞求寬恕而作出的一種姿態。他真是這樣想的。就大的傾向來說，幾年以來，他久已習慣於這樣的角色了，總是持一種十分合作的態度。這裏可以舉一個例。1956 年 6 月，就在陸定一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講話之後一個月，羅隆基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的發言中，這樣談到他對百家爭鳴方針的理解，他說：

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時代的「百家爭鳴」，如同一個偉大的管弦樂隊。樂隊中彈琴的，吹笛的，敲鑼的，打鼓的，在樂器上各有專長，在技術上各顯神通，而

這些音樂家的技術專長是相輔而行，相得益彰的。……但樂隊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的，樂隊隊員每個人的目的亦必須是為人民服務的。這樣，樂隊在為聽眾演奏的時候就必須有組織、有領導、有指揮，而後演奏出來才有和聲，有節奏。這是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時代「百家爭鳴」同動亂時期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不同的地方。10

羅隆基苦心孤詣分辨兩個不同時代的「百家爭鳴」，可以理解為一種政治上的表態，他在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中就好比在一個管弦樂隊中，他願意在這個有組織、有領導、有指揮的樂隊裏參加「爭鳴」。

當年民盟做的許多事情，本意是想來幫點忙的，結果卻被認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就說 6 月 6 日民盟六教授的集會，這是直接引爆反右派鬥爭的雷管，事情究竟是怎樣的呢?當時在場的葉篤義回憶說：

6 月初，局勢繼續發展，北京一些大學有學生鬧事的跡象，聲稱要「驅逐校黨委」，而校黨委按照黨內指示聽之任之，不做一聲，一些學校秩序大亂。出於對各大學的憂慮，6 月 6 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樂部邀集曾昭掄、吳景超、黃藥眠、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等六教授，當時參加者還有胡愈之和我，瞭解各校情況，分析形勢。由於我們當時不知道黨內「引蛇出洞」的策略，誤以為一些大學的黨委已經癱瘓，失去控制局勢的能力。因此，擬提議由民盟出面做學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勢穩定下來，並決定次日就去北大。當晚史良因參加國務院會議，有機會見周總理。因此叫她就便與總理商定時間，通知六教授一同去見，當面請示機宜。規定史良在取得總理的同意後，立刻用電話通知我，再由我用電話通知他們六位。我一直守在電話機旁，等到半夜，最後知道這個建議遭到總理拒絕了。這就是當時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事件的全部經過。11

民盟這樣活躍，毛澤東看在眼裏，怒在心裏。1957 年 6 月 8 日，毛寫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秘密指示，其中提出了他預防發生「匈牙利事件」的辦法：

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126 月 10 日，毛又寫了題為《中共中央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的秘密文件，毛估計：

各黨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進等頗好，民盟、農工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拼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積極奪取教育權，說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將大亂。

《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秘密指示下達才幾天，湖北省就製造了一個馬哲民（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員）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6 月 12 日，漢陽縣第一中學有幾百學生因升學率問題罷課，上街遊行。8 月 8 日《人民日報》發表以《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為題的長篇通訊，將此事大加渲染。馬哲民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員。說這次學生鬧事是馬哲民策動的，也就是民主同盟或曰章羅同盟策動的了。要把這件事情掛在民盟的賬上，有一個困難，就是漢陽縣一中並無一個民盟的人，民盟還沒有來得及去發展組織。後來找到了這樣一個線索：縣文化館的圖書管理員楊煥堯是民盟盟員，又是漢陽縣民主黨派聯合小組長，此人曾經按照中共漢陽縣委統戰部的意見，找過漢陽一中中共支部洽商發展盟員的事，談到過發展該校副校長王建國的意向。好了，這就夠了。就憑這一點，《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就能夠把這一次純粹自發的學生鬧事同民盟掛起鉤來了。文章說這次學生鬧事是：

在章羅聯盟駐武漢的大員馬哲民的策動下，以漢陽縣民主黨派聯合小組長、民盟盟員楊煥堯和民盟發展對象、漢陽縣一中副校長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在漢陽縣機關所在地蔡甸鎮製造的一次他們自稱的「小匈牙利事件」。13

楊、王二人，再加上一個被認為是王在校內的親信鍾毓文，三人不久即以反革命暴亂罪槍斃了。同案判徒刑的十人，送勞動教養的三人，還有幾十人受了其他處罰。直到 1985 年，經過中共湖北省委複查，並報經中共中央批准，才為此案徹底平反。14 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當年為了打擊民主同盟，什麼傷天害理的手段都使出來了。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社論聲色俱厲地質問：

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臺」。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這一切豈不是做得太過分了嗎？物極必反，他們難道不懂得這個真理嗎？

這篇社論宣告了反右派鬥爭的開始。

三　「消失」之前的聲音

薄一波回顧整風反右，有一句話：「我們對右派的情況，並沒有一個確實可靠的估計，而基本上是跟著群眾運動走，整出多少算多少。」15 據官方公佈的數字，當年劃出的右派分子是五十五萬多人。他們每一個人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具體原因，可說是千差萬別。並不一定真要本人有什麼過失，有的僅僅是因為民盟盟員的身份，有的是因為私怨，有的甚至只是因為要湊足數目，等等等等。因為這些就可以把一個人「打成」階級敵人，也就足以表明這種政治體制可怕到什麼程度了。不過也有一些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並沒有這樣大的冤枉，他們或者在整風鳴放的座談會上，或者在大報小報乃至壁報黑板報上發表了觸犯六條政治標準的言論。

這裏，我們就來看看當年右派分子提出了些怎樣的主張，這些主張又受到怎樣的批判。

黃紹竑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說，我們的立法是落後於客觀形勢的需要的，刑法，民法，違警法，公務員懲戒法都尚未制定公佈，經濟方面的法規更不完備，五年計劃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條例還沒有制定。他說，公務員懲戒法和各機關的組織條例辦事規則是與整風最有密切關係的法規，必須早日制定。16

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在《我國重要法典何以遲遲還不頒佈?》一文中說：我們過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實在跟不上實際的要求。例如，平常與人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及一般社會關係的調整最有密切關係的刑法典、刑事訴訟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等至今還沒有頒佈。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違法的，什麼不是犯罪，什麼是犯罪，以及應如何處罰等等，以致偵查、檢察、審判人員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足資遵循，因此就發生一些無根據的控告和不應有的錯捕、錯押、錯判的情況。這篇文章指出：這種情況很可能成為製造矛盾與不安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於那種以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難免限制政府機關的應付事情的靈活性」的意見，這篇文章反駁說：政府機關那種無明確的法律限制的辦事的「靈活性」有時頗足以破壞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仰。17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說：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對法院工作的領導是通過制定法律來實現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黨的意志，審判員服從了法律，就等於服從了党的領導。因此，審判員只需服從法律，再不必有什麼党的領導了。黨具體過問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就是違法。18

這些意見，只不過是希望中國成為一個法治國家。在當年卻被認為是嚴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在頒佈憲法前後，已經制定了許多重要的法律，並不像有些人所說「完全無法可循」。19二十多年之後，才有了不同的說法。1979 年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的時候說：「我們好多年實際上沒有法，沒有可遵循的東西。……我們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個法律總要有的，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現在只是開端。」20

在剛才摘引過的黃紹竑的那次發言中，在表示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權的同時，提出了一個領導方法的問題，他認為，由党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會造成很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章乃器在《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一文中也提到了這個「以黨代政」的問題。以為不少黨員對國家機構的作用還沒有足夠的認識，以為有些事情如果先讓行政負責處理，黨組織加以指導和支援，情況就會更好一些。21 譚惕吾在民革中央小組會議上的發言中，也談到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方式問題，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的問題。她認為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指示，是由於國務院單獨發指示不起作用。她問：既然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為什麼自己專政的機構不用，而要削弱其職權，另在政權之外來搞一套黨的系統呢?她提出：共產黨必須遵守憲法。她把這以法治國的問題提得很高，尖銳地反問道：共產黨今天是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呢?還是自己搗自己的亂?22

為了批判這些意見，《人民日報》專門發了一篇社論《黨不能發號施令嗎?》(1957 年 7 月 10 日)，說這些意見的實質「就是要取消黨對於政府工作的領導，削弱党對於人民群眾的聯繫，就是要使得我們的政府變為真正的官僚機關，使得黨變為政府機關的可有可無的附屬品」。這篇社論還發誓要把這種發號施令的做法堅持下去：「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在黨還存在的時候)還是這樣。」

這問題後來也有了不同的講法。1980 年鄧小平在《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這篇重要講話中，批評了過去那種「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的做法，談到他正在考慮逐步進行的重大改革，有一項是：

真正建立從國務院到地方各級政府從上到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今後凡屬政府職權範圍內的工作，都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討論、決定和發佈文件，不再由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發指示，作決定。23

涉及党對國家的領導，說得最刺激的是儲安平的「黨天下」。他說，我認為党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而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呢?他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24

瀋陽師範學院張百生、黃振旅合寫的文章也談到了黨把自己擺在國家之上、人民之上的問題，說中國不只是一千二百萬共產黨員的中國，而是六萬萬人的中國，難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党同志都無德無才，應當絕對服從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張，當這百分之二人的「順民」麼。文章還主張把黨從「人大」與政府之上拿下來，使「人大」成為真正的權力機關，「人大」代表必須經普遍的競選產生。25

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劉地生的文章認為，決不能說一千二百萬黨員的利益就是六億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說一千二百萬黨員的利益應該超過六億人民的利益。應該改變以往把黨放在國家之上，以黨的利益代替甚至超過國家利益的做法。這篇文章還主張，在學校裏的黨派，可以在教員當中活動，不需要在學生中活動，特別在中小學，應取消少先隊和青年團的組織。大學裏的政治課自由選讀，以免阻礙培養青年獨立思考的能力。26

這些，在當年，是最犯忌諱的言論。周恩來在一屆四次全國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大段對此進行了批判，說「有些右派分子把共產黨對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說成是什麼『黨天下』，這完全是惡意的誹謗。」這篇報告所批判的種種右派謬論中，還有一條「各黨派輪流執政」。似乎不見有哪個右派頭面人物發表過這樣的意見，在我接觸到的材料中，只見天津一個中學教師黃心平在座談

會上說了:「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來輪流執政，由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就好得多。因為這樣做，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27

一些人還提到共產黨員的特權問題。張雲川說，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資上，都表現了共產黨員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後，而是相反，形成特權。28 當時毛澤東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也認為確實存在這種情況，他說:「黨員評級、評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權，黨員高一等，黨外低一等。」29 整風鳴放中，不少人都提到了這個問題。前面引過的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把反對特權和純潔党的組織加強党的領導聯繫了起來。文章說:「取消了黨員的特權之後，只有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才要求入黨了，為了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個人主義者用八抬大轎請他他也不希望入黨了，因為入黨以後無利可圖，反而處處需要帶頭，起模範作用。這樣一來，黨的組織才能純潔，党才能通過黨員的模範作用去影響人民，才能通過他的正確的主張去領導國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牆』平『溝』，才能團結全國人民，才能推動歷史的前進。」

前面所引，如黃紹竑、譚惕吾、儲安平這幾位，都屬於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他們的這些主張，不免是聯繫政治權利的分配來考慮的。像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那次發言中就直接提出了為什麼國務院副總理中沒有一個黨外人士。當然，他們的這種考慮，也不能認為單是為了個人利祿，像章伯鈞就說過，他想「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為作官，是為了實現我的政治主張」30。而當年在校大學生中劃出的右派分子，正如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指出的，「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們的探索的熱情，並非源自利益的驅動，而純是(或基本上是)出於對『真理』的追求。」31 這裏我們來看看這些年輕人發表了一些怎樣的主張吧。

「在中國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蘭式的變革，我覺得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譚天榮)32

「前幾年的錯誤絕不是個別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線的錯誤……用紙包火總是十分危險的，斯大林的錯誤總有一天會被揭發出來的，黨中央也該整風，難道掩飾錯誤、喜歡斯大林的威信對革命有好處嗎？」(嚴仲強)33

「我們目前的任務是：爭取憲法的徹底實現，切實保障民主自由人權，使社

會主義制度臻至完善。」(陳愛文)

「肅反運動……在錯誤的理論指導之下，在錯誤的領導思想和敵情的估計之下，絕大多數的鬥爭是錯了，……肅反運動錯誤的根源，不在工作方式，而在於脫離群眾、以憲法人權為兒戲的官僚主義；以搬運公式為滿足的教條主義；以及不准阿Q革命的宗派主義。」(江文)34

「我們有了一個社會主義工業化，還應有個社會主義民主化。」(龍英華)35

「法制不健全不嚴肅，民主權利沒有嚴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溫床。」(葉于泩)36

「如果缺點只是個別人造成的，為什麼全國普遍各地都如此。關鍵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缺陷的問題。……我們當前的任務正是要為改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而鬥爭。首先就是爭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王國鄉)37

「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林希翎)38

「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斯大林的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險!」(王書瑤)39

「斯大林錯誤，波匈事件，我國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嗎?不，都是一個根源：不民主。……三害的根源是缺乏人民的民主和監督。」(岑超南)40

可引的還多，意思相近的就不引了。這些，就是當年遭到猛烈批判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說了或者寫了這些的，就成了右派分子。幾十年之後來看，其中的一些已經變成了人們的共識，例如法學界的一些右派論點，已經被寫入了法律條文之中。其他方面一些右派分子的主張，也在實際上被採納了。這裏可以再舉一個例。在批判經濟學家陳振漢的會上，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嚴中平說，陳振漢在十多年前就主張：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和外國工廠，增加的結果，並不阻礙而是幫助民族資本的積累，說是因為外國資本輸入或外國人在中國辦工廠的結果，與民族資本一樣，是增加本國人民的生產能力，也就是增加他們的所得。嚴中平

認為，這是陳振漢由來已久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41 今天已經沒有必要來說這種批判究竟對不對了。1980 年鄧小平在同外國記者談話中說：「吸收外國資金、外國技術，甚至包括外國在中國建廠，可以作為我們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補充。」42 改革開放的二十年以來，引進外資，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所起的有目共睹的作用，已經代陳振漢作了答辯。

當年右派分子發表的主張，就其主流來說，都是為了中國成為一個法治的、民主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這些主張，如果不是橫加批判，而是認真聽取，採納其中應該採納的部分，那麼，我們國家的政治形勢、經濟形勢、社會道德面貌都會有很大的不同，接踵而來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會發生，總之，這幾十年的歷史就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寫法了。

一場反右派鬥爭，就主要方向來說，反的就是這些東西。這也就不難判斷這一場鬥爭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是必要的還是沒有更好些了。在總結這一歷史事件的時候，可是就有人不願意看這事情的主要方面，卻去死死抓住當年個別人說的情緒化的、過頭的話不放，來證明鬥爭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就好像他正在同右派分子辯論大是大非的當年的會場上一樣。就情緒或者感情來說，可以說他是把反右派鬥爭持續到了他說這話的當時了。其實，他所引以為據的那些過於激動的情緒化的話語，例如葛佩琦的「殺共產黨人」，就完全出自歪曲的、不實的新聞報導，當年葛佩琦本人就不承認，要求更正的。當葛佩琦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蓋棺論定之後，當年栽誣他的殺氣騰騰的話是不好再說了，是不是要從當年的反右報導中尋找出另外的右派言論來坐實這個論斷呢?

四　右派鬥爭的總結

當猶太人被貼上黃色六角星，大滅絕就離他們不遠了！

當一部分中國知識份子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消失」的加速度就更快了！

1957 年的夏季，發生了一件當時沒有幾個人知道的小事，卻很能反映知識份子在反右派鬥爭中的命運。7 月 7 日晚，毛澤東在上海同三十六位知識界人士圍桌閒話，羅稷南問毛：「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這時正是反右派鬥

爭白熱化的高潮之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意思顯然是問：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你會不會把他打成右派分子？毛澤東回答說：「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是作家魯迅，那就會不斷地寫作；如果不再寫了，他也就不再是作家魯迅，而只是自然人周樹人了。羅稷南問的，顯然是那個像活著的時候那樣，拿著一枝筆不斷向黑暗勢力挑戰的魯迅。毛澤東的回答也是明確的：如果是這樣一個魯迅，我得把他關在牢裏。這將比右派分子受到的最嚴重的處分還要嚴重；如果他不再寫文章了，也就是說魯迅不再是魯迅，而只是自然人周樹人，當然不必關起來，按照毛在 3 月 3 日說的，甚至還可以安排他當文聯主席哩（這時的文聯主席是郭沫若）。在現代知識份子中，魯迅是最受民眾尊崇、最受共產黨尊崇的一人，假如他活著，也難逃此厄，別的知識份子就不用說了。

有一種說法，這反右派鬥爭雖說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不過也有缺點，缺點就是被嚴重的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使這些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多年受了委屈，不能為人民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但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國家的損失。我們來思考一下這個意見吧。說反右派鬥爭打擊了一大批無辜者，這當然是事實。據薄一波提供的數位，「反右派鬥爭中所劃的 55 萬人中，除極少數是真右派外，絕大多數或者說 99%都是錯劃的。」43 這就給了人們一個印象，所謂擴大化，是將 1 擴大為 100，即擴大了一百倍。擴到這麼大，傷害了這麼多人，當然不是好事情，也可以說是錯誤或者缺點吧。

如果僅僅著眼於誤傷了多少人，那麼，在反右派鬥爭之前，1951 年的「三反」運動，1955 年的肅反運動，豈不同樣有嚴重的擴大化嗎?「三反」運動中，把被打為貪污犯的人稱為「老虎」，各個機關團體企業學校，在沒有任何調查線索的情況下，都被要求編制「打虎預算」，「三反」運動即據這種毫無根據的「預算」，把一大批無辜者打成貪污犯(即老虎)，當年究竟打出了多少老虎，其中又打錯了多少，我沒有掌握具體數字，在印象中，錯案率很高，這是可以斷言的。肅反運動的情況是有數位的，前面已經說過，立案列入肅反對象的有一百四十余萬人，肅錯的一百三十余萬人，錯案率百分之九十四強。因此，可以說，三反也好，肅反也好，也無一不同反右派鬥爭一樣，是嚴重的擴大化了。所以，擴大化並不是反右派鬥爭獨有的缺點或者錯誤。那麼，反右派鬥爭有什麼不同於三反肅反這些運

動的特點呢?顯而易見的一點是，三反肅反在運動行將結束之際都有一個複查程式，一隻老虎當他經過內查外調批鬥逼供之後，仍然無法證實他有貪污行為或政治歷史問題，他經過幾個月到一年左右的折騰之後，也就解脫了。而反右派鬥爭的這個復查程式，直到 22 年之後的 1979 年才姍姍來遲，這樣才有「多年受了委屈」一說。這還不是反右派鬥爭最重要的特色。更加重要的分別是：三反也好，肅反也好，不過是打擊人而已，並沒有同時進行大規模的思想批判，更談不上理論和路線的批判。而反右派鬥爭則不同，把一個人劃為右派分子加以打擊，通常是同批判他的思想、見解聯繫起來進行的。批判了些什麼呢?反了些什麼呢?前面已經舉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意見。當把這些有助於促進國家法治和民主建設的意見當作反動言論加以批判之後，事實上就只能從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後退了一大步。要總結歷史經驗，就要從這個角度來總結，而不要只著眼於打擊了多少人。

1951 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3 年批判梁漱溟，1954 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由此轉為批判胡適，批判《文匯報》，由此又轉為批判胡風，1955 年批判胡風文藝思想升級為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這就揭開了「肅反運動」的序幕。思想批判無休無止，批判的對象，由個人到幾個人，再到小團體，株連開去，總有一天會要整到數以萬計、數以十萬計的知識份子的頭上，實質上，就是整到知識的頭上，最終整到中華民族自己的頭上。

還不能不指出的一點是，反右派鬥爭中斷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說：「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是，由於當時党對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線和許多正確意見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去。」44 這沒有堅持下去的原因就是因為發生了這一場反右派鬥爭。在另一篇講話裏，他實際上說出了這個意思：「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45 對此，薄一波說得更加具體，他說：「八屆三中全會修改黨的八大關於我國主要矛盾的論斷，動搖了八大路線的根基，從此開始了對八大路線的偏離，助長了『左』的指導思想的發展。」46 大家都知道，八屆三中全會正是總結反右派鬥爭的會議。

反右派鬥爭改變了中共八大的路線，進一步破壞了民主和法治，敗壞了社會道德，從而為文化大革命準備好了舞臺；還為它準備好了姚文元、關鋒等等幾個主要角色。而這一場文化大革命，可說是一場大大擴大了的反右派鬥爭。反右當

中的「群眾創造」：大字報、大辯論，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氾濫全國。當年右派分子攻擊的集權、特權等等這些東西更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宣佈要堅持、要保衛的那些論點，也正是反右派鬥爭宣佈要堅持要保衛的論點。大體上說，反右派鬥爭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要總結反右派鬥爭就要這樣來總結。

在對 1957 年發生的這一事件作總結的時候，人們不應該只看上面說的這些令人心情無比沉重的事情。還應該看看當年右派分子說了些什麼，寫了些什麼。這些被錢理群稱做「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的，這些以它的作者二十二年的受難為代價，有的甚至是以生命為代價而留下的遺產，經過時間之流的淘洗，是更加光彩奪目了。他們當年的願望和要求，有一些已經實現，有一些將要實現。有一部分，此刻還不具備實現的條件，我相信日後遲早會要實現的，我有這個信心。

1957 年的反右派鬥爭，既是此前三十年共產黨革命的果，又是此後五十年中國的狀況、中國人的狀況、中國知識份子的狀況的因。

反右派鬥爭過去之後，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大躍進開始了。1958 年 9 月 5 日，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他說：「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裏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知識份子在反右派鬥爭中得到了教訓，這時已經噤若寒蟬，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大躍進當中的那些「新生事物」，像全民煉鋼、全民打麻雀、高產衛星田、吃飯不要錢，等等等等，都沒有遇到任何非議地搬演了出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有人會問，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知識份子群體，那些史無前例、也但願史無後例的社會不正常事件，就不會發生嗎？這些事件令人痛心地發生了，就證明中國沒有了現代知識份子嗎？

人們也許對中國的知識份子寄予了太重大的期望。寄厚望予某個群體、寄厚望予某個個人，正如同厚責某個群體、厚責某個個人一樣，並不能真切地總結歷史，也不能合理地展望未來。

「總結歷史」也好，「展望未來」也罷，再算上「收拾而今現在眼目下」，說來說去，就兩個字：制度，真正的人的制度。這制度，不僅僅是落實到文字的法律，也不僅是前赴後繼的知識份子們針針見血的言論，而是時刻貫穿在每個群體每個個人的行為中的規則。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責任應該是，學習真正的制度、向

群眾普及真正的制度、做踐行這個真制度的表率。

五　「消失」多年以後

1978 年 4 月 5 日，中共中央發出第 11 號文件，批准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

同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發出第 55 號文件，提出受理要求改正的申請，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同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更推動了歷史上遺留的冤假錯案的解決。在 1979 年裏，這被錯劃的右派分子，據薄一波提供的數字，占原劃右派分子百分之九十九，都得到了改正，被開除公職的恢復了公職，被開除黨籍的恢復了黨籍，大都回到原來的專業上工作了。有些人甚至擔任了比反右以前更高的職務。像朱鎔基，做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王蒙做到了中共中央委員、文化部部長，費孝通和錢偉長都做到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86 年 11 月，三個當年的右派分子許良英、劉賓雁和方勵之，聯名發起開一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向一些人發出了邀請信。邀請信說：「1957 年的反右運動，即將滿三十周年了。反右運動是值得研究的，因為，不瞭解反右運動，就不能全面地瞭解三十年來的歷史，也就很難認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撥亂反正和推行改革的歷史性意義，也就很難深刻認識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我國社會中蘊藏的蓬勃生意。」　費孝通收到邀請信之後，在 1987 年 1 月初舉行的一次民盟的會議上要求民盟全體成員不要參與劉賓雁等發起的反右三十周年紀念活動，要大家「汲取 1957 年的教訓」，並把他收到的這封邀請信交給中共中央。

確實也有一些當年的右派分子「汲取」了「1957 年的教訓」。1997 年鄧小平逝世後，王蒙發表了一篇悼文。這篇題為《小平同志改變了我們的命運》的文章中說：

在 1988 年秋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上。在會議即將結束、通過會議文件時，有一位老中顧委委員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措辭提出了一些意見。小平同志即席講話，他講得特別明確，一再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我提出來的，而且我最堅持」，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他毫不含糊，寸步不讓，他的政治敏感，政

治判斷力與政治上的堅持性頑強性，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應該說是凜然肅然的印象。47

王蒙這篇文章也會給他的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的。

1957年開始的反右派鬥爭結束以後，中國知識份子失去了批評的話語權，知識份子的「消失」從局部潰瘍到全國，這，成了中華文化的解構和重組的一個階段。

希望總大於沮喪。只要中國還有鮮活的人群在，只要這人群都希望過真正的人的生活，制度和規矩都會產生出來的。在這百年大計之中，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僅僅要通過他們的言論，也要通過他們的行動，發揮出他們巨大的潛力。

——為2007年6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發表於《當代中國研究》2007年第3期。

注 釋

1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十五號，第168頁。

2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第285-286頁。

3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57頁。

4 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室1957年3月6日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彙集》，共彙集了33個問題。

5 同上書，第253-254頁。

6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68-269頁。

7 同上書，第273頁。

8 《胡喬木文集》第一卷，第572頁。

9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十八號，第99頁。

10 《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13號。

11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第100-101頁。

12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32-433頁。

13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十七號，第156頁。

14 蔡公《「小匈牙利事件」真相》，載1999年1月15日《南方週末》第10版。

1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人民出版社，下卷，第642

頁。

16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十一號，第31頁。

17 1957年5月9日上海《新聞日報》。

18 1957年12月12日、24日《人民日報》。

19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十四號。

20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89頁。

21 《章乃器文集》下卷，第566-567頁。

22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3號，第85頁。

23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9、339頁。

24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十二號，第23-24頁。

25 1957年6月10日《瀋陽日報》。

26 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報》。

27 1957年5月27日《天津日報》。

28 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報》。

29 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2頁。

30 1957年7月4日《人民日報》。

31 錢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見《原上草》，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9頁。

32 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第46頁。

33 《原上草》第76-81頁。

34 《原上草》第104頁。

35 《原上草》第131-132頁。

36 《原上草》第141-142頁。

37 《原上草》第149-150頁。

38 《原上草》第153頁。

39 《原上草》204-207頁。

40 《原上草》第209-211頁。

41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二十號，第82頁。

42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351 頁。

4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641 頁。

44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253-254 頁。

45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253-254 頁。

4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654 頁。

47 《王蒙文存》第 15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年 9 月版，第 163 頁。

中共反右運動「消滅」了中國的知識份子　　高瑜

五十年前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是一場反對人類文明的運動，那場運動的對象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他們是知識、思想和科學的載體，這場運動的結果，是「消滅」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孕育出來的中國幾代最優秀的知識份子。這場運動製造的嚴重後果有三個明顯的特徵，一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方位性；二是曠日持久性；三是可傳承的災難性（廬山會議和反右傾、文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都是反右的傳承）。我僅就毛澤東用這場運動消滅知識份子這個結果談談我的見解。

毛澤東要消滅的是知識份子的理性思想和批判社會的力量

我先引用畫家陳丹青一段演講：

「五・四」那一兩代人，單是模樣擺在那裏，就使今天中國的文藝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聯買到的兩冊抗戰照片集，發佈了陳公博、林柏生、丁默村、諸民誼押赴公堂，負罪臨刑的照片。即便在喪盡顏面的時刻，他們一個個都還是書生文人的本色。他們丟了民族的臉，卻是照片上沒有丟書生相貌的臉。我斗膽以畫家的立場對自己說：不論有罪無罪，一個人的相貌是無辜的。我們可能有資格看不起漢奸，卻不見得有資格看不起他們的樣子。其中還有一幅珍貴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乾淨的長衫，瘦得一點點小，可是那樣的置之度

外、斯文通脫。你會說那種神色態度是強作鎮定，裝出來的，好的，咱們請今天哪位被雙規被審判的大人物鏡頭前面裝裝看，看能裝得出那樣的斯文從容麼？

我這是第一次看見周作人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歎他們周家人氣質非凡。

到了 1979 年，文革後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報紙上許多久違的老臉出現了：胡風、聶紺弩、丁玲、蕭軍……一個個都是劫後餘生。我看見什麼呢？看見他們的模樣無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說句不敬的話，一個人模樣給弄成那樣子，還不如長得醜陋，猶不如法庭刑場上的漢奸們，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點最後的尊嚴。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藝家，倒也罷了，現在你看看，長期的侮辱已經和他們的模樣長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說句不敬的話：他們帶著自己受盡侮辱的面相，還居然去參加文代會，本身就是再次確認侮辱。那樣的會議，魯迅會去嗎？1

用今天的話評論陳丹青先生，應該稱他是魯迅先生最狂熱的粉絲，他獨獨尊稱魯迅為「大先生」，他認為魯迅若活著，是不會去參加 1979 年中共的文代會的。陳先生依據的是從來沒有接受過共產黨改造的魯迅的品德和風骨。直到 2001 年因周海嬰公之於眾，我們才知道，1957 年 7 月 7 日毛澤東在上海與 38 名文化界人士座談，翻譯家羅稷南向毛提問：「如果魯迅在世，他今天會怎麼樣？」毛回答：「要麼在監獄裏繼續說，要麼識大體，不作聲。」1957 年的毛澤東對魯迅都要封口，何況對其他人呢？魯迅果能被封住口，那脊樑骨也就被打斷了。

陳丹青用畫家目光審視的不僅是毛政權之下坍塌了、扭曲了的中國知識份子的相貌，也是他們坍塌了、扭曲了的靈魂。毛澤東 1942 年在延安搞「搶救運動」、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一次對知識份子殘酷的迫害和改造，是 1942 年整風的直接結果，是他建立毛氏王朝，搞獨裁專制的開始。而 1957 年的反右，規模和手段都是 1942 年不能比的，這場運動從社會屬性上講就是要打垮和消滅中國的知識份子，消滅他們獨立的思想，自主的人格和批判社會的力量，社會屬性不再有了，知識份子也就不存在了。毛因此才能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作為右派的主體，是這樣幾部分人：

一、以「章羅聯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的頭面人物，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份子，是中國具有現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理念的大知識份子，他們針對毛澤東建立的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提出批評，並提出多黨制架構的設計。

二、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一大批全國各地新聞出版界的黨內知識份子。他們最瞭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積累的大量的嚴峻問題，他們直接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信，喊出人民的疾苦，批評党的幹部的特權。

三、以林希翎和北大「五・一九」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他們接受蘇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影響，激烈地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

四、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鍾惦棐、蕭軍為代表的文藝界領導和著名文藝家，他們的知名度高，就黨對文藝的領導，對文藝作品的封殺和黨內宗派主義提出批評。

五、教育界、科技界著名教授、科學家，他們學貫中西，就教育、科學和經濟建設違反常識、違反規律提出意見。最經典的是黃萬里反對三門峽工程。

以上五部分人都是當時和未來中國的精英人物，摧毀他們，就是摧毀中國。從此中國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黨派，中共內部和各行各業開始逆向選擇，正所謂「表揚了指鹿為馬的，提拔了溜鬚拍馬的」。知識份子的群體徒具有學歷的標籤，而喪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會的功能。

毛澤東摧毀知識份子的四種方法

「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與普世價值的尊嚴、理性、自主有一致性，毛澤東反右就是從摧毀中國這一文化傳統入手，從而摧毀了全社會知識份子的靈魂。毛把整風中敢於或者被迫講了真話的知識份子，統統加了「右派」這頂政治帽子，是文革搞階級鬥爭為綱的預演。我就從「右派」這頂帽子談起。

一，「右派」帽子，相當猶太人身上的黃星。

毛澤東為了建立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黨專制，建國之後，在連續的政治運動中，已經人為製造出「地、富、反、壞」階級和階層，另外還有「胡風分子」、「高饒分子」。上文歸納的右派主體的五類人，按照思想的光譜，基本與右不沾邊，有的甚至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但是毛澤東統統給他們加了一頂「右派」帽子，在當時因東歐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左的思潮正在世界範圍湧動，中國更是高唱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進行曲》「向左！向左！向左！」在這樣的政治氛圍內，無疑是置「右派」於死地。毛澤東在中國處於一言九鼎的地位，他拋出的帽子，相當法律裁決，輕而易舉就把一、二百萬人和家屬，一個大到上千萬

人的群體續在「地、富、反、壞」的後邊，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被剝奪公民權。

二，所有右派必須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公開檢查，也就是公開認罪。同時要表態「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這是向毛澤東具結畫押。這是毛澤東剝奪知識份子尊嚴最厲害的一手，尊嚴沒有了，靈魂也就破碎了。

毛澤東根據右派的職務高低，給右派也定了六個級別，一類最大，六類最小。1980 年我曾經採訪冰心的丈夫社會學家吳文藻先生。這次採訪成為我終生難忘的一次採訪，就因為吳先生講的一句話：「我是第五類右派，是性質最輕的。」按照吳先生的級別至少是二類，定為五類明顯是優待。講到右派經歷，吳先生忍不住流下淚水，但是他對被劃為五類，是心存感激的。每當我想到毛氏運動對人性、對人的尊嚴的剝奪，我總會想起吳先生的這句話。

毛澤東正是根據每個人認罪的態度，又給右派定了五種處理方法。把最嚴重的送監獄，甚至被判死刑。次之送北大荒、夾邊溝全國幾十個右派改造基地，無異於肉體消滅的集中營。右派在改造基地承擔了毛澤東搞大躍進的嚴重後果，成千成千被活活餓死，已經越來越多見於史書，這是作為右派的知識份子以他們九死一生的經歷成為史家，對中國歷史的一個貢獻。還有的被開除公職，下放工廠、農村接受改造。最輕的在原單位降職、降薪，拿二十幾元的生活費接受改造。

拒不檢查的右派是極少數，其中一個是鄧小平拒不改正的中央統戰部管理的五個大右派之一彭文應，這是今天我們應該永遠記住的名字。彭文應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碩士，是共產黨真誠的朋友，資助過周恩來和多名共產黨人，因為參加共產黨的活動，1949 年 5 月初陳毅率人民解放軍進逼上海時，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曾下達密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1957 年，身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的彭文應，他在受到批判時，不僅就每一件具體事情與成百上千的圍攻者據理爭辯，固持事實和己見，而且在上海市二屆二次人代會上公佈了一篇發言稿，對自己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所追求與堅持的社會責任作了總結和闡述，拒寫檢查。彭文應為他的「態度惡劣」付出了沉重代價。他的職務被撤銷，沒有了工資，六個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頓失生計。妻子急得舊病復發死去，次子自殺身亡。組織上來人告訴他，「只要寫個檢討認錯，甚麼問題都可以解

決。」可是他堅決不寫。他說：「想用不給吃飯來逼我承認，是絕對辦不到的！」子女們跪著哭求他：「家裏沒有飯吃了，你就承認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寫。他對一同落難，奉命說服他認罪的王造時解釋說，他的經濟和家庭的確越來越困難，但是不應該從個人利害得失來對待政治上的是非問題，這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生命最後一年，還給中央上「萬言書」，呼籲「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2

1978 年，全國的「右派」幾乎全都被宣佈為「錯劃」而獲得改正，而彭文應卻被「升級」，與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並列，成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當年的「反右前臺指揮」鄧小平，報復的就是彭文應不認罪的態度。

王怡先生最近為我們提供了一名被稱為中國的巴弗（聖經中的一個聖徒）的基督徒右派吳維尊。1987 年 5 月 28 日，吳維尊被監獄哄騙出獄，寫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監日呈文》，聲稱 1981 年的減刑裁定是謊言，將他的「毫不悔改」說成「確已悔改」。文中說：「從今天出到監獄牆外之日起，進一步採取下列兩個方面的行動：一個方面，不使用釋放證去辦理釋放後的任何手續，不回天津或進而回南方與親友團聚，不享受從這張錯誤裁定書得來的自由和權利，不離開監獄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單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為一個留廠職工的工作）。」從此吳維尊在監獄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個監獄外的服刑人員。直到死。他以如此決絕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屈服。3

右派分子最後的尊嚴，隨著這些人生命的結束而消失。更多的人隨著被摘帽，1978 年被改正，向黨表示感恩戴德。

三，對右派實行「全民共討之，全國共伐之」。反右是毛澤東實行大民主的試驗，是文革的先聲，是讓中國人集體喪失人性的大動亂。

全國的人，包括右派家屬子女，親朋好友對待右派，沒有權利保持沉默，沒有權利不對右派下手，人人要口誅筆伐，揭發檢舉，人人必須學會撒謊，製造謠言，必須學會大義滅親、上綱上線。使得右派處於眾叛親離，人人喊打，無地自容的境地。很多右派不甘受辱，或畏懼受辱而自殺身亡。很多人只因同情右派，為右派講話，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光明日報一位老記者，是我的大學長，他當年被定為「中右」，他說，當時一聽到班上一個左派的聲音，心裏就不停地哆嗦。

被稱為「中國知識份子惟一」的顧准的家庭變故，是頗具典型性的實例。讀

了朱學勤先生對顧准六弟陳敏之的採訪《遲到的理解》，我流下了辛酸的淚水。顧准是 1957、1965 年兩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他的境遇更悲慘。我摘一些內容給大家：「1966 年，顧准被迫與妻子離婚，搬離家庭。次年回去取書籍衣物，久喚門不開，後來還是鄰居幫助他把東西搬下了樓。不久，又被迫簽具了斷絕父子、父女關係的聲明。從此，顧准蟄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饅頭度日，再也沒有邁進過家門。」

「顧准又是個孝子。從幾個弟妹的童年時代起，顧准即肩負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擔，幾十年來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可以說相依為命。1965 年，顧准處境惡化，不得不將母親遷至太原三妹處。1966 年，母親隨三妹一家遷來北京，住處與顧准相去不遠。終因形勢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終未能見面。不能見面的原因並不複雜。顧准妹夫當時正任部級官員，為避免對他有所影響，顧准和母親只能回避。1972 年前後，母親曾提出想見見顧准，年底，陳敏之赴京，也曾設想安排母子見面，亦未如願。離京前，陳敏之與其妹只能達成這樣的協定：將來母親病危進醫院，立即通知顧准，讓母子在醫院見面。1974 年 11 月初，顧准咯血不止，先于母親住進了醫院。11 月 16 日，經濟所黨內外群眾經過討論，一致同意給顧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達病床，顧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了。」顧准走在了母親前面，母子相見，終成泡影。

「1982 年前後，顧准子女獲悉六叔陳敏之處保存有一份父親的通信筆記，向他索要去傳閱。這份筆記就是後來陳敏之整理出版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1984 年 2 月，大女兒寄來了一份「讀者附記」。「附記」說：「我逐年追蹤著父親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後，他是一步一步從地獄中趟過來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數不完的批鬥、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著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個父親，對於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他的女兒還說：「真正嚴峻地擺在面前的，是需要解決這樣的一個悖論——為什麼我們和父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途？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麼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4

今天強迫中國人和知識份子接受和奉行的準則仍舊距離科學還遠，這就是1957 年毛澤東為中國留下的遺產。

四，右派在改造中仍要比認罪、比檢查、比揭發、比檢舉。這是毛澤東分化瓦解、個個擊破慣用的手段，也是將知識份子改造成馴服工具的手段。

毛澤東善用人海戰術，搞過「百萬雄師過大江」，百萬，幾百萬這是讓毛澤東十分在意的數字，毛決不會掉以輕心。右派在改造中，無論在監獄，還是在勞改營，哪怕是在原單位接受監督改造，在右派群體內，仍要比認罪、比檢查、比揭發、比檢舉，讓右派和右派廝殺，讓右派改造右派。毛澤東用這種方法，打散，進而消滅這支幾百萬人的龐大隊伍，讓你不能抱團，讓你七零八落，讓你餓人搶食。「食」是毛澤東誘惑靈魂的高招，那就是「摘帽」、「返城」「安排工作」、「提高待遇」。為右派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美其名曰：「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給出路。」毛講的都是謊言，但是迷惑了右派中的絕大多數。這也是毛澤東搞歷屆整人運動慣用的方法。

李銳女兒李南央的書《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寫了她的母親范元甄的一生，范的一生是蹉跎的一生，也是揭發別人的一生。她在所有政治運動中揭發自己的兄弟姐妹，好朋友，熟人。李銳致命的「攻擊」毛主席的話，都是她揭發的。1962 年七千人大會之後，李銳離婚，本來是要恢復黨籍，降為局級使用的，就因范元甄的一封長篇檢舉信，將李銳置於死地。信最後傳到鄧小平那兒，鄧說：「太惡劣，燒掉！」范元甄自己都認為鄧是因她揭發的內容，而不是她的揭發行為，說「太惡劣了。」文革之後，因范揭發人太多，沒有單位接受，拿著副部級工資，仍然在仇恨和咒罵中度日。令女兒南央吃驚的是，母親揭發父親，「根本不是因為他們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膽小，為保自己出賣了丈夫。」對李南央的書，有一個評論：「范元甄是被黨改造好了的知識份子，而李銳是沒有被改造好的知識份子。」李銳自己有這樣一個總結：「知識份子夫婦，去延安的，大多離了婚。而沒有去延安的，大多白頭偕老。」反右運動中，造成的離婚案到底有多少？數目會大得驚人。這就是毛澤東改造知識份子力量的體現。5

反右運動對知識份子改造的威力在中共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這體現在一些屬於右派中的頭面人物的身上。1986 年 11 月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共同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是已經是鐫刻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事件。許

良英先生紀念反右四十周年寫的〈關於反右運動的片斷回憶和思考〉，詳細記述了這個事件，值得我們很好的回味。許先生寫道：

「我們發出大約四十封信，除費孝通、錢偉長外，都立即回復，而且都充滿熱情。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回信者有：化學家袁翰青，水利學家黄萬里，電影評論家鍾惦棐，雜文家曾彥修，翻譯家劉尊棋，老報人徐鑄成，文學家白樺、陳學昭、邵燕祥，數學家曾肯成，浙江所謂『沙楊反黨集團』骨幹孫章錄和沙文漢夫人陳修良。有不少我們並沒有邀請的右派，也主動來信要求參加會議。有一個原來不知其名的浙江右派，來信教訓我，說反右問題中央已有結論，我們只能在此框框內討論。這種由右派轉變的左派，我已見識不少，如丁玲、陳沂、陳涌等，想不到在浙江也冒出了一個。」

「12 月 20 日，劉賓雁通知我，說《人民日報》社領導要他不要參與這個會的活動，他只好照辦，望我們諒解。12 月上旬開始，合肥、武漢、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繼出現學生上街要求民主的遊行，當局歸咎于方勵之。聽說就在這個時候，錢偉長通過民盟中央把我們寄給他的反右運動歷史討論會邀請信送交當局，並附了這樣的意見：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但與他們是不同的。12 月 30 日上午，鄧小平召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等人講話，批評胡耀邦制止學潮不力。當他批評方勵之的「自由化」言論時，趙紫陽插話，說方勵之和劉賓雁、王若望要開紀念反右三十周年大會（把我誤為王若望，把歷史學術討論會誤為紀念大會），於是鄧說，要把這三人立即開除出黨，並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不久錢偉長果然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6

二十年前紀念反右的這段公案，也是「六・四」學潮的一個誘因，血上加血的歷史記錄，無論怎樣的強權也難以抹去。

五十年前的反右運動和今天中國的國家安全

中國軍方的《解放軍報》四月刊登採訪報導，通過一位原軍事科學院教官和一位武警部隊政委的談話，提出國家安全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安全的新安全觀。他們強調，西方敵對勢力通過文化傳播兜售的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等反動思想，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中國軍隊要維護國家文化

安全，捍衛國家文化主權。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會長，上將熊光楷五月在《學習時報》發表〈資訊時代的國家安全〉，文中把「尋求非法擴散政治影響的組織或個人」列為對資訊時代國家安全的威脅，並稱「資訊網路的濫用將可能影響到國家的政治穩定」。

我認為中共當今奉行的仍然是背離世界主流文明的國家安全觀。到底今天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因素是什麼？早在七十年代，毛政權請來的一位左翼作家韓素音，已經為中國指出了。她說，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是環境和教育。三十幾年之後，韓女士的預言成真。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幾代知識份子本來是中國現代化的中堅力量，他們被反右摧毀，使得二十世紀下半葉出生的人在文化斷裂中成長。文革已經無法重新再揪出更多的右派了，但是對老右派卻是致命的摧殘，很多人死於這個時期，包括槍斃了林昭。文革只能產生幾百萬紅衛兵，紅衛兵只能充當批判一切文明的打手。今天聊度餘生的右派，都垂垂老矣，現在是紅衛兵正在領導我們的國家。林昭的母校，我們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理科系，四年下來還要讓學生必修五門政治課「思修」——思想品德修養，「毛概」——毛澤東思想概論，「馬哲」——馬克思主義哲學概論，「鄧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馬政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文科系還要再加一門「時政」。中共 17 大之後會不會再增加一門「科諧」——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呢？背著這樣的枷鎖，我們怎麼能優化我們的知識結構？

中國的高樓以世界不及的速度在拔地而起，中國模仿的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出口到全世界，中國已經到世界各地開採、收購石油。世界在驚呼：「中國突然無處不在！」中國的軍事裝備已經向世界顯示導彈摧毀衛星的能力。而我們付出的代價是 70％的江湖遭到四－－五類的中度和重度污染，魚蝦死絕，沿岸到處是癌症村，二分之一以上的城市地下水污染嚴重；十五個海洋生態監控區中只有兩、三個處於健康運行狀態；生態系統退化加劇，土壤侵蝕 2004 年就達到了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早就世界第一，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了。中國國民一半以上看不起病，政府九年義務教育不能完成。到底哪個是對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我們有世界人數最多的政黨和軍隊，但是我們沒有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經濟學家、文學家和科學家，因為培養世界一流的老師都被

反右扼殺了，現在能夠恢復和提高中國人辨別善惡是非能力的社會力量還是太弱了。

物極必反。文革末期中國知識份子的光譜上成長出「四・五」一代，「六・四」出現了「八・九」一代，一二・九的垂垂老者仍然是呼籲中國民主的領袖。九十年代四十歲的王小波提出反對愚蠢和無趣。今天更年輕的劉軍寧提出「中國需要一場文藝復興」，他呼籲「一切回到人的立場」。被反右運動摧毀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理性、自由和人性正在成長。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注 釋

1　節選自百度陳丹青《2005 年 6 月 5 日在北京魯迅紀念館講演》。

2　有關內容取自百度《大右派之一彭文應的坎坷一生》一文。

3　有關內容取自民主中國網王怡《1957 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一）》。

4　朱學勤《遲到的理解》見百度《二閑堂文庫》。

5　李南央《有這樣一個母親》（香港：開放出版社）。

6　節選于許良英《關于反右運動的片斷回憶和思考——紀念反右 40 周年 》一文。

從羅隆基看中國自由派在 1957 年的命運　　陳奎德

一、羅隆基其人：他的典型象徵意義

羅隆基是 1957 年反右運動毛澤東欽定的大右派，同時也是二十多年後，中共為 55 萬右派中絕大多數「改正」後，「碩果僅存」不予改正的六名右派之首（六人為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林希翎）。無論就政治理論 ，還是政治活動而言，羅隆基都是中國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作為人權理論家，政治活動家，民盟創始人之一，作為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和行動的中堅，羅隆基在 1957 年的命運，在相當程度上象徵了中國自由主義在反右運動中

的命運。作為欽定右派，羅隆基的悲劇，就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悲劇。

羅隆基（1898—1965）字努生，人權理論家，政治活動家，民盟創始人之一。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中，一身而兼有學者和政治活動家雙重身份的人很少，羅隆基是其中突出者。他才華外露，個性鮮明，敢恨敢愛，不拘小節，是一位有棱有角、毀譽交加的人物。

早在五四時期，羅隆基就是走在遊行前列的一名學生領袖。他的清華校友潘大逵這樣介紹羅隆基:「他是清華的一個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為擅長，能寫作，善辯論，得過清華國語演說比賽第一名。他頗有領導才能，是個才華橫溢的政治家。」

1922 年 7 月，羅隆基與同班同學錢宗堡、聞一多、何浩若等人相伴赴美，在英美留學期間，他與聞一多等人發起組織過國家主義團體大江社。後來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從師於拉斯基（Harold J. Laski）教授。1928 年秋天，羅隆基從英國歸來任上海光華大學政治學教授，同時兼任由胡適擔任校長的吳淞中國公學政治經濟系主任及教授。

當年，作為「新月」派的重要人物、胡適自由主義大旗下的火槍手之一，他一度從胡適手中接編過《新月》雜誌，縱橫筆墨，書生言政。在民盟創立和發展的歷史中，羅隆基起草了民盟一大綱領，並積極投入民盟反國民黨的政治活動。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政壇上，羅隆基是被國共兩黨竭力拉攏爭取的人物。1949 年之後，毛澤東也給了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全國政協常委諸種頭銜。

1930 年 11 月 4 日，羅隆基在光華大學任教期間，被國民黨當局以「言論反動，侮辱總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後，胡適等人動用自己的社會關係，八方營救，使羅當日即獲得釋放。後來在 1931 年「九一八」事變期間，羅隆基在《瀋陽事變》等一系列《益世報》社評中，對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進行了猛烈抨擊，《益世報》因此曾受到停止發行的處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羅隆基的這兩次經歷，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跡。從此，他對國民政府沒有絲毫好感，喪失了信心，並不遺餘力批評國民黨侵犯人權的行徑。與此相對照，他對一切反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和團體，譬如共產黨，就滋生了一種身處同一條戰線的同情，從而有時就喪失了理性的批判能力。當然，由於那時國民黨是當下的、即在的、現實的壓迫，

自由派知識份子日日感同身受；而共產黨在野，並未掌權，其統治的嚴酷尚未呈現，同時中共當時又高調讚美民主自由，自然就俘獲了自由派知識界的主流情緒。

從思想理念方面的追溯，羅隆基他們這一代自由主義者（包括儲安平、費孝通、潘光旦等），受到當時英國的費邊社，特別是其政治學者拉斯基（Harold J. Laski）以及弗布（即 Webb）夫婦等的思想影響，屬於自由主義左翼，染有社會民主主義甚至部分社會主義的色彩。

有鑒於上述兩方面的因素，自由派營壘不少人其政治同情轉向共產黨，是有其歷史和思想淵源的。

四十年代抗戰結束後，羅隆基異常活躍，參與創建民盟，出任民盟宣傳部長，已成一位專職政治活動家了。從 1943 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出現了一股聲勢頗大的自由主義運動，圍繞著國民黨的「還政於民」、戰後中國政治秩序的安排等熱點問題，轟轟烈烈，不僅在公共傳媒上佔據了輿論的制高點，而且進入了實際的政治過程。前者自然是「觀念人物」的汗馬功勞，而後者則要歸功於以民盟為首的「行動人物」的不懈努力。

從成立之初到抗戰勝利的短短四年期間，民盟已經成長為遍佈全國主要城市、擁有三千盟員，在知識界具有首位影響、實力僅次於國共的「第三大黨」。鑒於當時暫時出現的和平氣氛與力量均勢，民盟成為各方爭取的對象，變成舉足輕重的砝碼。1945 年秋天召開的民盟一大，宣佈民盟是「一個具有獨立性與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團」，其神聖使命是「把握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1 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及其綱領，可視作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大憲章。

這一載入史冊的自由主義大憲章，就是由羅隆基起草的。

在這部由羅隆基起草的綱領中，中心的理念和架構實際上是左翼自由主義，甚至是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發展到 40 年代，在國際上愈加洶湧。尤其是戰後英國工黨的執政，給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以巨大的精神鼓舞。知識份子普遍認為戰後的中國民主模式，應該也可以仿效英國工党所施行的「中間道路」；在政治上實行英美式的議會民主政治，在經濟上參照蘇聯的社會主義平等原則，也就是所謂的「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

儘管民盟的這一中間道路在學理上的依據並不充分，但它緊緊地抓住了中國

當時兩大主要社會問題：國家政治體制的不民主與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正，並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施政改革方案。這一方案能夠在 1946 年初被國共兩方所接受，成為政協五項決議的藍本，證明它滿足了當時中國人的基本精神需求和想像，的確是一個出色的改革綱領。在這以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如以胡適為代表的《努力》和《獨立評論》派）所關心的往往是都市知識份子感受最深刻的政治不自由，而對社會底層（尤其是農村）更關切的社會公正和經濟平等問題漠然無視。這樣，他們既不能回應民粹主義的政治挑戰，即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社會公正問題；也遠遠遊離中國社會底層的最基本需求，也就是羅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中所稱的「免於匱乏的自由」。民盟的社會民主主義中間道路，則成功地將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原則相結合，從而有效地回應了民粹主義提出的挑戰，滿足了社會底層的經濟平等要求。

可惜的是，國共之間的分裂與內戰，使得這一在中國知識界有相當共鳴的社會民主主義綱領，無法獲得其實踐的機會，中國也就從此與左翼自由主義的中間道路失之交臂。一旦戰爭的暴力替代了理性的對話，自由主義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最基本空間。1947 年民盟被迫解散，象徵著自由主義運動在中國的毀滅性挫折。

梁實秋評價羅隆基是「固定偏左的自由主義者」，即，比較傾向中共。在其早年友人中，羅隆基已經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作為他的朋友，梁實秋對他的變化也很不以為然。他曾直率地說：「我曾和羅隆基開玩笑，我說他是才高於學，學高於品。這話雖是有意挖苦他，其實也正是我的意見。」2

作為一位自由主義者，羅隆基不是看不到共產主義的基本問題。其實，在撰寫人權理論文章時，他就早已指出國民黨的「黨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權，並有專門論文論及馬克思主義的諸多錯誤。但是，政治情感常常比理論更能左右一個人的政治實踐。羅隆基就是最好的注腳。

二、羅隆基論人權

我們知道，胡適在二十世紀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的中國發起過一場「人權運動」，而羅隆基，正是那場「人權論戰」的主將。在中國自由主義者中，羅隆基作為政治活動 家是引人注目的，但人們卻因此而常常忽略了他對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建樹。實際上，他的理論貢獻在其一生事業中，佔有相當的地位，這就是他

建構的人權理論體系。在這方面，在他之前和同時的中國自由派中，無人能出其右。

羅隆基在 1929 年 7 月 10 日出版的《新月》上發表〈論人權〉一文，充滿自信的說:「我們目前要的人權是些什麼？已到了我們回答這問題的時候了。」由此，他開列了三十五條他認為最重要的權利，全面闡明瞭他的人權主張。僅僅舉其犖犖大者，就有：

國家的功用，是保障全體國民的人權。

國家的主權在全體國民。任何個人或團體未經國民直接或間接的許可，不得行使國家的威權。

法律是根據人權產生的。

未經全民直接或間接承認的法律不應有統治全民的威權，同時全民沒有服從的義務。

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因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對國家政治上一切權利，應有平等享受的機會。

不得有教條及政治信仰的限制。不得有社會階級及男女的限制。

國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員，他們應向全國，不應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團體負責。國家官吏的雇用應采國民、直接或間接的選舉法及采公開的競爭的考試方法。凡向全民負責的國家官吏，不經法定手續，任何個人及任何團體不得任意將其免職，更換，或懲罰。

（一）沒有代議權，即沒有擔任賦稅的義務;（二）議決預算決算。凡一切未經人民直接或間接通過或承認的一切經濟上的負擔--賦稅，公債，捐輸，饋贈--均為違法，均為侵犯人權的舉動。

國家財政應絕對公開。

凡國家對任何國民一切無相當酬報的強迫勞動，均為侵犯人權。

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所以全民應受同樣法律的統治。同時，法治的根本原則是一國之內，任何人或任何團體不得處超越法律的地位。凡有任何人或任何團體處超越法律的地位，即為侵犯人權。

法治的根本原則是司法獨立。司法獨立的條件比較重要者有三:（一）行政長官絕對無解釋法律及執行司法的職權;（二）司法官非有失職的證據，不得隨意撤

換或受懲罰。（三）司法官不得兼任他項官吏。違此三者，即侵犯司法獨立，即侵犯人權的保障。

無論何人，不經司法上的法定手續，不受逮捕、檢查、收押。不經國家正當法庭的判決，不受任何懲罰。

國家的海陸空軍是全民所供養的，他們的責任在保護全民的權利，不在保護任何私人或任何團體的特別權利。

國家軍隊應對全民負責。非經人民直接或間接通過，無論任何文武官吏，對內對外，不得有動員及宣戰的行動。

國家對國民有供給教育機會的責任。為達到發展個性，培養人格的目的，一切教育機關不應供任何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的宣傳機關。

國民應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3

如此等等。

羅隆基的人權觀念及其明確申張的這些權利，大體上與國際公認的人權精神是協調統一的，雖然其中關於人權（human rights）與公民權（civil rights，如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等）還需要作一些更細緻的區分，但最基本的內容已經呈現出來了。重要的是，羅隆基的論文中已經蘊含了人權高於主權的思想。在今天看來，這或許是卑之無甚高論，並非石破天驚的主張。但是如果放在中國 20 世紀 20 年代末的時空背景下，確實是難能可貴的，應當說，它是中國人權觀念的時代先聲。

羅隆基人權理論，除了上述正面的闡述外，還從反面作了重要界定。他左右開弓，右反國民黨一黨專制侵犯人權，左攻馬克思主義中共革命扼殺人權。他指出，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和中共以馬克思主義為信條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權，因此，他除了在言論和行動上抗議國民黨的人權侵犯外，還在 1930 年 3 月《新月》上撰寫了〈論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上的批評〉和在 1931 年 7 月《新月》上發表了〈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兩篇長文，較為全面的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謬誤，分析了中共領導的暴力革命對人權的危害。所有這一切，呈現了他作為自由主義者的眼光和見識，是對中國自由知識界的理論貢獻。

三、反右實質：剿滅自由主義

在政治上剷除自由主義者及其組織，消滅潛在的政治對手，是毛的政治直覺。而羅隆基，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政治實踐上，正是毛澤東的最典型的箭靶。因此，他早就在毛策劃打擊的名單中了。

根據蘇聯解體後的秘密檔案，可以發現：實際上，差不多在反右十年之前，在中國取得政權之前的 1947 年，毛澤東就已暗露殺機，想要拋棄盟友，獨霸山頭了。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致電斯大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了，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斯大林不贊成毛的這個意見，他在 1948 年 4 月 20 日的複電中說：“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同它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權，即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佈為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孤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代理人。應當考慮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後建立的中國政府，就其政策而言，還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目前還難以預料這將持續多長時間，至少在勝利後會是這樣。這也就是說，暫時還不能實現土地國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沒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財產，也不能沒收大土地佔有者以及依靠雇傭勞動的中、小土地佔有者的財產。要等到一定時候才能進行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產黨以外，也還有其他政黨參加人民陣線。」4

從這裏可以知道，早在 1947 年的 11 月，那時國民黨還有強大兵力，戰爭勝負未分的時候，中共還在向民盟等民主黨派大灌蜜湯的時候，毛澤東就已經在籌畫拋棄民主黨派了。只是因為斯大林的電報，才把這事推遲。

雖然推遲了，但是毛仍頑固堅持其反自由主義的主張，其基本目標始終未變。不久之後，在 1949 年毛寫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他就已經敏感地把他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劃為美國人「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人，從而已經把他們打入懷疑和整肅的範疇中。在毛的詞典中，「民主個人主義者」就是通常所說的「自由主義者」（至於毛在延安發表的文章「反對自由主義」中的所謂「自由主義」，則與自由主義是完全無關的）。毛的這一戰略，一方面出於他的意識形態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出於毛本人反

智主義的內在本性。

因此，順理成章，毛在進城後，很快就把自由派看作自己最主要的敵手。

與此相對照，如前所述，羅隆基所屬的自由主義左翼（以民盟為代表），當年基於其反蔣的歷史情結和費邊主義的思想淵源，他們把政治同情轉向共產黨，在國共之爭中是為中共出了力的。然而，1949 年之後，中共奪得天下，地位發生了變化。「人一闊，臉就變」，昔日的盟友，就像「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最後的致命一擊發生在 1957 年。

四、一九五七：思想國有化與羅隆基命運

反右的發生，從共產黨國家的脈絡來看，自有其貫通性的極權統治的邏輯，那就是：由經濟而政治，由物質而思想。

1956 年，合作化運動和工商業改造，完成了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在共產黨統治的脈絡裏，順理成章，接下來就是思想的國有化。 在中國，1957 年的反右運動，作為一個歷史性標記，是思想國有化的完成禮。

於是，黑雲壓城。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場以言治罪的文字獄——反右運動，在中國大陸降臨。

我們來看看羅隆基在那一場劫難中的個人命運曲線。

1957 年 4 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並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參加運動，幫助中共整風。在毛澤東言辭懇切聽來推心置腹的反復邀請下，昔日的自由主義者們終於吐出了已經憋了幾年的苦水。

5 月 22 日，中共統戰部舉行座談會，國家森林工業部部長羅隆基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讓大家申冤訴苦。而該委員會須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組成。

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員會」的主張，它與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一起被稱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論。

當時，6 月 8 日之前，人們看到的，是一片生氣勃勃，議論叢生，同時也是風和日麗，歌舞昇平的「政通人和」氣象。執政當局虛懷納諫，謙恭之態可掬……。

然而，頃刻之間，風雲驟變，霹靂擊地。1957 年 6 月 8 日，一場以國家暴力

為後盾的反智狂濤，自北京興起，掃蕩全國。當局遽然變臉，以言治罪，以文下獄。整個中國變成一個精神裁判所，党、行政、立法各部頭目統統成為司法官，裁決言論，裁決文字，裁決思想。事實上，其時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座囚錮靈魂的大監獄。

六月二十一日，羅隆基從錫蘭公差歸國，他沒能料到，等候他的，竟是這樣一場最後置他於死地的暴風驟雨。

七月一日，中共的《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批判該報為資產階級右派充當「喉舌」，指控民盟和農工民主黨「反共反社會主義」。而右派的進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後被稱章羅聯盟）」。

這是一紙混雜著謊言和怨毒的最高當局的終審宣判，沒有律師，不容分辯。其中最荒誕的公開的指鹿為馬，就是所謂「章羅聯盟」。章羅關係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謂無人不知。但毛澤東發揮詩人想像力在聖旨中把它生育出來後，它就居然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活蹦亂跳了幾十年。國是至此，已慘不忍睹。

羅隆基對此的反應，是咆哮章門，並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這是最後展示羅氏個人性格的戲劇性鏡頭。

反右，其所以稱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字獄」，其原因在於，那是一場極其典型的以言論文字入罪的迫害，同時，它涉及人數竟達一百萬之眾！每人皆僅僅因幾句話，幾行字，就墮入地獄，毀滅一生，萬劫不復。

中國歷史上何曾有過如此巨大規模的文字獄？世界各國上何曾有過如此巨大規模的言論罪？

人們曾見識過秦始皇悍然實施的焚書坑儒，人們曾見識過明代朱氏王朝以文字入罪，戕害士人，人們曾見識過有清一代的 160 多起文字獄，誅人計達千餘人之眾。人們也曾見識過西元四世紀羅馬皇帝一紙聖諭，焚燒了基督教《聖經》，人們還曾見識過希特勒德國的「焚書坑猶」——1933 年德國衝鋒隊員焚燒「非德意志精神」書籍的沖天烈焰，以及此後滅絕 600 萬猶太人的焚屍爐火…..。古今中外，形形色色，反智主義暴政如過江之鯽，罄竹難書。

然而，所有這一切，比起毛氏王朝來，小巫而已。

反右，作為共產中國「一言堂」的奠基禮，它使中國只剩了一支筆：「毛」筆；

只剩了一種文體：毛文體；只剩了一種聲音：中共中央電臺那高亢單調的「毛式社論」。

五七年，國人智力萎縮，文明退化，使中國人在心智上蛻變成了嬰兒

五七年，國人廉恥不張，倫理退化，使中國人在道德上蛻變成了痞子

其時，歷來以傲氣逼人我行我素著稱的羅隆基，轉眼之間，就墜入了十八層地獄，備極羞辱，受盡煎熬。然而，一系列對羅隆基的批鬥會，卻也顯示出羅的獨特的政治原色，顯示出在上層「右派」中，恐怕只有他與儲安平才確實是帶有比較清晰的自由主義理念的政治人物。翻閱那些揭發材料，抖掉其歷史的塵埃，現在看來，不僅非罪，反而為功，為羅隆基毀譽交加的一生增添了奪目的正面色彩。

無疑，羅隆基關於平反委員會的主張，反對政治迫害，強力伸張人權，凸現了他一生堅守的政治理念。更重要的是，考諸他 1949 年的政治軌跡，不難發現，他還是在中國試圖催生真正政黨政治的先驅。遠在中共建政前夜，羅隆基帶信給沈鈞儒，要求沈「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幾個條件：（一）不要向蘇聯一邊倒，實行協和外交；（二）民盟成員與中共黨員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綱領，據此與中共訂立協議，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聯合政府，成為在野黨。」5

此外，當時公佈的對羅的揭發材料還表明，儲安平的「黨天下」論，其實是沿用了當年羅隆基批評國民黨的說詞。羅直指國民黨「『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繼續不斷地『黨天下』」了。

更為原則性的一點，是在中共掌權後，對民盟盟章總綱裏是否寫入「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一語。羅隆基據理力爭，堅持不寫。依政治常識，世界上沒有一個政黨的黨綱注明接受另一個政黨的領導。抗爭未果後，他說：

「盟章有了這樣一條，民盟的生命就結束了。」6

這是羅隆基強力聲明、最富遠見力的抗爭之一。它攸關政黨政治在中國存廢的關鍵。這不是一個政黨黨綱裏的某句宣言的可有可無的問題，而是關乎該黨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寫進了這一句，則「黨將不黨」，猶如接受了「死亡之吻」，其命運就註定了：跨進墳墓，別無選擇。

五十年了，在其根本的體制精神上，1957 年的陰雲仍然籠罩著中國。

這就是反右二十多年後，當局為右派「改正」，但惟有以羅隆基為首的六位被拒絕改正的根本原因。 因為從其統治合法性而言，中共仍然需要抗拒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傳統。

然而，歷史之神畢竟不是盲目的。就在當年反右之後的黯黯長夜的 1962 年，大英百科全書刊載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指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

雖然羅隆基晚年淒苦孤寂，鬱鬱而終。但是，一條永遠的「未改正右派」的殊榮，一條大英百科全書簡潔公正的歷史結論，只此兩條，自詡為自由主義左翼的羅隆基當可以死而瞑目了。而反右運動，則因羅隆基等上百萬人的殉難，而被歷史釘到了反智主義以及文字獄的巨大恥辱柱上。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注 釋

1　白壽彝總編《中國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後編（1919-1949）（上冊）第十六章，2006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梁實秋〈羅隆基論〉，載《世紀評論》2 卷 15 期。

3　羅隆基〈論人權〉，載《新月》，1929 年 7 月 10 日出版。

4　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訪西柏坡——來自俄國檔案的秘密》，見《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

5　章詒和〈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 載《往事並不如煙》時報出版社 2004 年。

6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牛津大學出版社。

從「一邊倒」看毛與民主個人主義者　　戴晴

表面上看，1949 年 8 月，以〈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發表為標誌，而向世界公

開的這一「完全倒向蘇聯，與以美帝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全面決裂」的外交政策，似乎緣于美蘇冷戰。而中國為求得老大哥的好感，不得已而為之的策略。

我們今天已經知道，這一悲劇性地令世界對中國關閉了二十多年的國策，是在幾乎全部外部因素，包括蘇共斯大林，美國國務院，司徒大使本人，毛的幕僚如周恩來，以及當時他還客氣地被稱作「先生們」的國民政府反對派和民主黨派人士，都切望新成立的人民中國應與美國及世界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情況下，「深明大義」與「高瞻遠矚」的毛澤東，以別人身上極為少見的執拗、偏狹，極力抗拒、「等待時機」、「引蛇出洞」而終於完成的。用他的話說，是「打掃乾淨屋子再迎接客人」；是「防止孫行者鑽入牛魔王的肚子搗亂」。這裏的屋子，我們今天已經知道，是他的無人再敢多嘴的一統天下（文革後迎接尼克森時候的茫茫大地）；牛魔王，可以說是即將成立的中央政府。而孫悟空，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美帝國主義是也」。

美帝如何鑽得進來呢？須靠他的代理人：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這就是在今天，在我們回顧反「右」鬥爭五十年的時候，我要講的題目：

從「一邊倒」看毛與民主個人主義者

「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 何許人也？我們今天讀史已經知道，其實就是二十世紀以來，整整一批極為可貴地在艱難的戰爭環境成長起來、具有現代眼光與專業訓練、從學理（而非僅僅實際利害）抵制專權並且一心報國的知識型人才。他們本以為，國家者，公器也。沒想到外交政策是否「一邊倒」，在毛心中，竟成了在將來共產黨的一統天下，他們究竟處於什麼地位、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

我們先談「一邊倒」。

當時，有可能左右中國未來格局的政治勢力，大致有四個方面：蘇聯、美國、即將以武力拿下全部國土的中共、第三勢力（不是鄧演達的第三黨，也不是國共開戰前的第三方面，而是當時國民政府中的反蔣勢力如李宗仁、國民黨裏邊的反蔣勢力如李濟深，還有民盟及其他民主黨派、知名人士等）。

當時的這四大勢力的態度是怎麼樣的呢？

1949 年 1 月 18 日，斯大林特使米高揚，在毛澤東多次懇求訪蘇不准之後，來到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肯定了蘇聯對中國和毛的全面支援。

2 月初，美國國務院〈重審並制定美國對華政策〉獲得總統批准。檔著重分析國民黨失敗和共產黨成功的原因，明言美國必擺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並和中共打交道——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立即執行。

3 月上旬，在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已經制定了的自衛的底線：儘管美國人想承認我們，我們卻不忙與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建立關係。要特別警惕帝國主義「內部破壞」的陰謀。

3 月底，為與中共高層搭上線，司徒大使開始出面聯絡「第三勢力」。如今已有史料證實的，有民革陳銘樞（許以美金二十億）；民盟羅隆基（許以美金四十億）；還有張東蓀等既有見識、又具有斡旋資格的老朋友。事實上，從這時候直到四月中，「燕京舊人」包括校長、總務長、教授們都在努力，期望正常的外交關係得以達成。

四月底，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南京。美國以大使不去廣州表明對新政權的態度，並造成除蘇聯外所有國家都沒有去的局面。雖然蘇聯大使如此行事，毛澤東那時其實收到了斯大林發來的電報：

只要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在內，能夠正式放棄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支持，那麼，中國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絕同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和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因為這樣做將有助於使美國放棄其分裂中國的計畫。

共產黨內部，也並不是人人都對與美國建交懷著如毛澤東那樣超乎尋常的警惕。南京剛拿下，燕京大學肄業生（後來的共和國外長和副總理）黃華，即奉周恩來之命，頂著專門為他而設的頭銜「軍管會外僑事務處處長」，開始與「老校長」作非正式接觸。對此，毛沒有反對。作為謀略家，他也需要有人到第一線作試探。

當時，黃華的同班同學（同時也是司徒雷登校長事無巨細的助手和秘書）傅涇波正在大使身邊。通過極為謹慎的接觸，黃華終於與司徒見面，並於 5 月 10 日發回彙報。毛澤東親自批閱回復，並對「黃華報告」的第三條（「敦促美國拿出實際行動來」）作了重點批示，強調：「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

5 月 13 日，帶著毛主席的切告，黃華正式前往大使官邸（第一次是學生探訪老校長）。會面時傅涇波在座。楊奎松在他的分析裹說，「人們事實上可以把這次談話看成是新中國成立前夕中美雙方的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接觸」。但如果考慮到外交其實是內政的外延，著者傾向認為，它對後來毛的絕對不許外人干涉的「內政」

的影響，怎麼估計都不會過高——當然這裏所說的外人，已不僅僅指外國人。比如文化人梁漱溟就是國家農業政策制定的外人；經濟工作也不是彭德懷份內的事。至於這「內」與「外」會在什麼時候以及如何劃定，只能聽憑偉大領袖自己的直覺了。

會面中，黃忠實轉達毛「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反動殘餘力量的聯繫」意向。對此，司徒書生氣十足地解釋，「只要國民黨政府仍然存在並得到美國承認，美國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多半不會因為中共的軍事勝利而迅速改變。」接著，雙方談到至關重要的 「干涉中國內政」問題。作為崇尚自由主義的司徒雷登，以大使身份表達的——我們後世讀史現在已經清楚看出——是一句多麼要命的話：美國的承認，要視新中國政府是否能夠廣泛吸收「民主分子」參加。（！！）

從五月中旬到五月底，對如何處置中美未來的關係，似乎有兩根線在同時運作。溫和的一根：傅涇波再見黃華，明確告訴他，美國國務院與國會，在對中共的政策問題上，是存在著極大分歧的。形勢緊迫，對於司徒雷登力主與新中國建立友好關係，望得到中共方面的信任和諒解。黃華也在得到批准後，主動約司徒（還有傅涇波）在外事處再度面談（6 月 6 日），雖然對原先談過的（也就是毛規定的）三原則，不敢有一絲鬆口。

司徒除了就國際法向他的學生解釋，在「中國沒有一個新政府」的局面下，無所謂承認，也不能與尚有存在條件的舊政權斷絕外交關係。「美國準則」 和「人類普世價值」在這次關鍵性的會見中再次被強調。第一次當大使的傳教士兼教育家司徒雷登，一點不具外交官常持的「與人方便 自己方便」（Practical Convenience），再次溫和卻十分明確地告訴黃華，承認與否，將視未來中國的政府裏是否能夠儘量吸收一些民主開明的人士參加而轉移（！！！）。

另一根強硬的線，基於毛澤東那一刻也沒有放鬆的警惕。對美國人最關切的「中國會不會成為鐵托或者半個鐵托」，他沒有興趣——那是 20 多年以後「整蘇修那個王八蛋」的時候才提上日程的。他此時正「耐下性子」，一邊「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一邊等待轉機。」

六月上旬和中旬，似乎是，溫和派占了上風。司徒在上海的學生都已經知道，老校長已經得到去北平的邀請（意味著與周甚至毛的會見）。軍管當局甚至同意他

乘坐他自己的那架飛機。這時候出現的一個相對「負面」的消息，在我們後世讀史人看來，也是這一大趨勢的鋪墊：6 月 19 日，中共突然採取了自春天以來第一個針對美國政府的強硬行動，公佈美國駐瀋陽領事館人員從事間諜活動。五天後(6 月 24 日)，毛澤東決定將此事件再度升級，親自批示公開廣播〈英美外交　特務外交〉——這些，都可以看做是為即將到來無可避免的建交打擊對方、拔高自己。他似乎決定暫時「悠住」。因為，就在那天下午 6 時，毛澤東照例給胡喬木寫信，請他寫一篇紀念「七一」的社論。胡的那篇，並不是我們後來看到的那篇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毛在那時候，還沒有覺得自己必須全部重寫。

到了 6 月 30 日，毛正式批准「禁止美國新聞處在中國的活動」，並決定對美國駐瀋陽總領事華德等一干人進行公開審判——這已經不僅動嘴，而是動手了：為「黨的生日」造勢。

但他還沒有得到最後「撕破臉」的機會。

6 月 30 日，應該動身北上的司徒，沒有聽從傅涇波的力促，先行動後請示，而是依例向國務院報告自己受到的邀請，請示能否成行。沒有等到否定指示到達，毛在得知這「請示」之後即明白表示：「從即日起，對於司徒雷登來北平問題，不再有任何興趣」——毛澤東等到了他掐斷溫和路線的機會：難道是我們在主動邀請你麼？這是絕對不能原諒的。

毛澤東以自己的面貌出場，「奪回對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論人民民主專政〉當日發表，「一邊倒」正式出臺。

別再夢想什麼鐵托的第三條道路！新中國將義無反顧地倒向蘇聯！至於什麼「真正容納民主人士參加的聯合政府」，對不起了，用不著你們多嘴。我們要的是「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　：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

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

8月2日，司徒雷登「夾起皮包走路」了。5日，就在他抵達珍珠港的當天，《美中關係白皮書》發表。一周後，8月12日，新華社（我們已經知道，其實就是毛澤東）在接下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連撰五篇評論，「對白皮書進行透徹的分析與批判」。其態度之峻刻、用語之刻薄、行文之一瀉千里，以及為受盡了委屈與蔑視的中國共產黨人吐氣伸冤之酣暢淋漓，不僅在政治，甚至從文化與文學層面，奠定了幾代中國人對現代文明的仇視、疏離與無知。

縱觀中國外交史，似乎未見有人撰文論述，一個成熟的主權大國，應否由筆力雄健的元首，如此恣意地抒發鬱悶於胸中怨與恨——完全不顧如此激揚文字，是否會給他國政府造成「蓄意激怒」的印象，而為以後的外交操作造成障礙，乃至悲劇性地改變歷史走向。不錯，一個巴掌拍不響——你美國是怎麼對待我們中國人民的？但綜觀《美中關係白皮書》，其中雖然有對中共的不恭之處，但主要內容還是檢討他們自己錯誤的對華政策，並拿蔣介石問罪。作為主要靶的，老蔣反應相當平靜，只例行公事地發表了一個語氣平和的抗議聲明；而本應對這樣的檢討表示歡迎的共方，卻是出人意料地激烈——太反常了。

我們知道，從1941到1949，美國政府支持的，一直是毛最主要的敵人蔣介石（日本侵略者還在其次）。「迪克西使團」到延安的時候，對美國，他曾經抱有那麼大的期望：主義可以放在一邊；「共產黨」三個字也可以不要——體現善意的援助依舊未到，希望再次落空。到了1947年，帝國主義兇相畢露，軍事上前所未有地大力援蔣。結果如何？如今我自己搶回了江山！坐在金鑾殿上的，已是我共產黨政府！這回，想要用我對付蘇聯了，是麼？

這累積了八年，累積於兩場大戰中的氣，自不待言。但毛什麼人？記在肚子裏幾十年的仇，爆發前一分鐘你都察覺不出來。

有這樣的想法墊底，他同意黃華前往接觸，「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從黃華發回的報告裏，他知道自己的戒心不是無的放矢：美國的承認要視新中國政府是否能夠廣泛吸收「開明的民主分子」參加——這難道不是要干涉中國的內

政？南京市委當時就對司徒雷登這段話做了生動解說:「聯合政府內應吸收美帝走狗」。

但「廣泛吸收開明的民主分子參加政府」，本是 1946 年馬歇爾特別使華，希望迫使蔣介石政府接受的條件。所針對的，是中國這個大國裏邊的專制獨裁，無所謂國民黨或者共產黨。中共當時對此不但竭誠擁護，還作出若干相當大度舉措，很有在野大黨的氣概，比如為青年黨參會而讓出自己名額。而臺上的蔣介石，則以絕對的不合作，迫使美國政府換馬。

應該說，毛澤東對美帝的警惕、對知識人堅持獨立思考，從而對獨裁者可能有構成制約與挑戰的厭憎，並非始自黃華報告。有據可查的是，1947 年 10 月 27 日，在國民黨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時，毛澤東在周恩來起草的一份〈論及統戰策略〉的中央文件就曾加寫：

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在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

1947 年 11 月 6 日，民盟在國民黨的壓迫下正式宣告解散。就在周恩來、潘漢年竭盡全力，將重要的「盟友」救到香港的當口，毛澤東則確定「讓所有的政黨都離開政治舞臺，決心搞一黨制」。他在這年 11 月 30 日給斯大林發去的一封電報，是對「建國」後體制的通盤考慮。在彙報了戰事進展後，毛這樣提到如何對待抗戰勝利後曾一同爭民主、爭自由的盟友：

隨著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國中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方向不再存在。民盟成員中有同情我黨的人士，然而他們的領導者大多數是動搖分子。正是他們在國民黨的壓力下解散了民主同盟，從而表明了中等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在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取勝時，根據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榜樣，除中國共產黨以外，全部政黨都應退出政治舞臺，這樣能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這年 12 月中央開會。毛澤東說：

中間派沒有了，民盟解散了，至於解放區，素無中間黨派。以為民族統一戰線一定要有許多黨派並存，是不對的。

雖然未來的政府中實際只有共產黨一家，但還可以叫做聯合政府，故聯合政府的提法並不取消。

到了 1948 年底（12 月 4 日），就在三大戰役血肉橫飛之際，一則不知從哪個渠道發回來的「談話材料」（說是從一個美國記者那裏獲悉），引起他嚴重注意：

美國國務院現政策之中心，在於如何在新的聯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國則在某種方式下承認新的聯合政府，恢復與中國貿易，對新中國投資，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統一戰線，竭力支持聯合政府中之非共產份子。

毛將談話材料批送全體中共要員（劉、朱、周、任、彭真、胡喬木）：

此種陰謀必須立即開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陰謀在新政協及聯合政府中得逞。

在被周派到南京「偵察對方意向」的黃華報告發回，美帝「赤裸裸地打算在新中國政府裏支持民主人士，以抵抗共產黨之政治攻勢」這樣一個陰謀坐實之後，毛澤東的基本國策一錘定音：對外，「把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當成自己頭號敵人，時刻保持高度警惕，並且針鋒相對地進行鬥爭」；對內，則把試圖鑽進牛魔王肚皮的美帝代表（「民主個人主義者」），一個個收拾掉。

作為一個大國至高無上的統帥，他正面臨一場新的戰爭。在這場如何「造福」他的子民的戰爭裏，他的敵人——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新的、駕淩一切之上霸主地位的主要威脅，已經不再是王明、不再是張國燾、不再是蔣介石和他美式裝備的百萬大軍，而是有帝國主義在後邊撐腰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艾奇遜在《白皮書》中已經明白招認「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成為改造社會的有效力量」；「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

對這些大小毛猴，偉大領袖自有他的一套。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麼？管你西裝革履；管你長袍馬褂——他的戰場，不見硝煙、不見升旗降旗、不見合同條款。他將直戳心靈。好名的，好利的，好面子的，好風雅的……你總有一好吧？我就鬥你那一閃念，讓你從此規規矩矩——什麼自由、平等、人權、民主，「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清除乾淨，從此絕了你美帝的望！

「一邊倒」（即與美帝絕決）後，中共一手包辦了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數量可觀的開明的民主人士給安放到直令革命老軍頭跳腳怒罵的高位。1949 年 10 月 1 日，新政權決定向世界公佈剛剛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單。感到由

衷高興的張瀾，建議同時公佈 56 名委員——「讓全世界看看我們的陣容」！當時沒有人想到，或者想到了也沒有膽子指出，這陣容會持續多久。

「一邊倒」在紅旗與熱淚中收場。開國大典只有四名外國記者到會：蘇聯一位，義大利一位，朝鮮兩位。在緊閉的大門裏，毛澤東完成了他的鎮反、肅反、合作化、工商「改造」、反「右」、大躍進和文革。沒有任何外國政府就此干涉，也沒有任何一個國際組織就「反文明」或「反人類」罪對他予以正告。

大門裏邊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呢？

此時距離將章伯鈞拉到鬥爭臺上、距離把你們諸位真誠、熱烈、勇敢、誠實，並且一心為民族、為國家的發言者，誘進絞肉機，殘忍地碾碎、榨乾，還有七年。

早在以「民主個人主義者」為敵的外事決策戰場，毛澤東已經牛刀初試，以力排眾議的「一邊倒」，「扭轉了歷史發展的趨向」（朱正對反「右」之結語）。

——2007 年 6 月 30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中國民主黨派的歷史變遷　　　章立凡

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中國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是基於對民主憲政的訴求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共識。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民主黨派成為聯合政府的成員。隨著中共權力的穩固，民主黨派的地位開始發生變化。以 1957 年「反右派鬥爭」為分水嶺，中共實現了一黨專政的政治目標，民主黨派從盟友淪為改造對象，並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完全停止了活動。1980 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改造後的民主黨派仍作為政權的一部分而繼續存在，但被定位於「參政黨」。本文即以「反右」前後的歷史為背景，分析中國民主黨派被改造的歷史。

一　民主黨派與中共的結盟

1.　中國知識份子的結社傳統與近代中國政黨的會黨特徵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結社可分為知識份子結社和民間結社兩種。明末清初，這

兩種結社開始相互融合，形成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會黨——洪門。

中國近世政黨往往帶有會黨色彩，不是政治學意義上的現代政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如此。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部分帶有民粹派傾向的知識份子精英，主張直接與社會下層群眾結合發動暴力革命，因此也有部分會黨人物加入了革命隊伍。中共是一個農民成分占 90%以上的政黨，其中有一部分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遊民無產者，這種人最易成為會黨政治的擁護者。精英政治本身具有的排他性，會助長決策的不透明和家長作風；而在白色恐怖下險惡的生存環境，亦需要經常以嚴酷的紀律來控制內部。中共黨史上一些 「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事件，皆與會黨政治的傳統有關。會黨政治加上烏托邦主義，使中共難於進入現代政黨的行列。

2. 「第三方面」及其與中共的「聯合政府」共識

1949 年以前，除國共兩黨之外，還存在一些小黨派，如民主社會黨、致公黨、青年党、第三黨、救國會派、鄉建派、職教派等。除致公黨有較多的會黨特徵外，這些黨派的共同特點，是以知識份子為主體，主張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憲政，但不具備軍事實力。

抗日戰爭時期，這些黨派在大後方發起憲政運動，要求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開始形成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方面」，不斷提出實施憲政的政見，批評蔣介石的獨裁政治，呼籲實現西方式民主。1939 年，由民社黨、第三党、青年、鄉建派、職教派、救國會派的國民參政員及其他第三方面人士，組成了統一建國同志會。提出了實施憲政、黨派平等、學術思想自由、計畫建設、軍隊屬於國家、反對內戰等十二條主張。該會於 1942 年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 年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

1944 年 9 月，中國共產黨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改組國民黨的一党政府、建立一個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受到第三方面的歡迎。中共在陝甘寧邊區推行的「三三制」政治樣板和毛澤東的聯合政府主張，也吸引了「第三方面」黨派。

抗戰勝利後的組黨熱潮中，又出現了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等。在這些中間勢力黨派中，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分別代表自由知識份子和民族資產階級，

其政治綱領和政治主張也是最系統和明確的，建設現代民主國家的憲政、人權、經濟民主、軍隊國家化等理念，都有完備的體現。

1946 年國共兩黨內戰的爆發，導致了第三方面的重新組合，青年党、民社黨及一部分社會賢達，參加了國民黨政權召開的國民大會；另一部分黨派則採取了抵制的態度，並進一步受到國民黨的壓迫；而國民黨中的反蔣人士，組成了以李濟深為首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了，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斯大林不贊成毛的意見，他在 1948 年 4 月 20 日的復電中說， 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同它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權，即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佈為聯合政府……1

斯大林一錘定音，決定了 1949 年後中國大陸的政治格局；而此時毛澤東對民主黨派的心態，則成為十年後發動「反右」的一個注腳。有研究者質疑這兩封電報的真實性，但從此後的歷史進程來看，筆者認為存在可信度。

1948 年，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軍事失利，中國的政治格局開始重新洗牌。中共中央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了國內各中間黨派的回應。這些與中共合作的黨派，後來被稱為民主黨派。中共的軍事勝利比預計提前了兩年，但其作為一個以農民為群眾基礎的政黨，文化教育的平均水準低於國民黨，缺乏接管一個大國的人才儲備，因此，與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民主黨派合作，也是時勢使然。

3. 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底牌

將人群貼上「左」、「中」、「右」標籤加以劃分，是中共的一種習慣性思維模式，在各革命階段的中共文件及毛澤東著作中屢見不鮮。1949 年籌備新政協時，中共中央統戰部在一份綜合報告中，對參加新政協的各黨派單位的「左、中、右」有詳盡的分析。

在總體表述上，報告透露的長期目標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取代右派。至

此，中共對政治盟友的親疏好惡及政治盤算已經一覽無餘，而八年後「反右」的一些主要目標人物，皆已列位彀中。

此外，劉少奇在 1949 年 7 月訪問蘇聯時，給蘇共中央斯大林報告中也談到：「現在政協籌備會已組成，共有籌備委員 134 人，其中黨員 43 人，肯定跟我們前進的進步人士 48 人，中間人士 43 人，其中中間偏右的只有 12 人，在進步人士中有 15 個秘密黨員，共產黨可以保證對政協籌備委員會的絕對領導。在籌委會中另外還設立了常務委員會，有委員 21 人，同樣可以保證我黨的領導。」2

4. 《共同綱領》與聯合政府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政協）在北京召開，在出席新政協的 662 位代表中，共產黨員約占 44%，黨外人士占 56%.其中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占 26%，各民主黨派的成員約占 30%，基本上實現了中共的「三三制」原則。中共以及「老大哥」蘇共都承認新政權是一個聯合政府。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新政协及其制订的大宪章式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文件带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保留了聯合政府的理念框架，並未從字面上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軍隊的掌控。

《共同纲领》頒佈后，各民主党派随即宣布以《共同纲领》替代本党的政治纲領，但中共仍保留了自己党章中的總綱。

新政治協商會議被認為是中共統一戰線策略的成功範例，它顯示出新政權的精英政治色彩及共產黨對其他民主黨派及社會賢達的尊重。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中有張瀾、李濟深、宋慶齡三位非中共人士；沈鈞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非中共人士約占半數；政務院名單中，非中共人士黃炎培、郭沫若出任副總理，章伯鈞等二十人擔任了政務委員和部長職務，聯合政府的色彩濃厚。

聯合政府的人事安排在中共黨內也引起了不滿，對此，毛澤東回答說：安排民主人士「好處很多」，「第一，可以『賺』人，各方面的非黨人物都有當副主席、部長、司令員的，『朝裏有人』，國民黨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賺』來四萬萬人民，賺來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賺』一個社會主義。這叫做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3

5. 民主黨派改造的開端

中共在新政權的領導作用，首先體現在人事安排上。各民主黨派在新政協的代表名額分配與新政權的職務安排，起決定作用的是中共。

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在新政協閉會後，立即併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救國會也在新政協閉會後宣佈解散，其成員多數溶入民盟並掌握了領導權。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救國會與中共關係密切，這兩個偏左黨派單位的「摻入」，事實上改變了民革、民盟中的內部成分，顯然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最終形成了延續至今的八個民主黨派格局。

新政權成立後，民主黨派「軍隊國家化」夢想首先被打破。中共的成功經驗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毛澤東語），1950 年 3 月 21 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宣佈：「各民主黨派已決定不在工人、農民和人民武裝部隊（包括軍事學校和機關）中進行黨派活動。」4 1950 年 6 月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于同年 7 月 19 日正式作出《有關各民主黨派組織活動的決議》進一步明確，各民主黨派在下列機關學校亦不進行組織的活動：（1）情報機關。（2）革命大學。（3）舊人員訓練班。（4）使、領館。5 根據政協全國委員會的指示，活動禁區還包括少數民族地區。6

對民主黨派的人事改造，也在新政權成立後不久開始。歷史上各民主黨派內都有中共秘密黨員，如胡愈之、趙朴初、沙千里、孫起孟、嚴希純等。新政權成立以後，一些共產黨人如南漢辰等曾被公開安插進民主黨派。中共將「以進步為骨幹」內定為對民主黨派改造方針。

中共中央統戰部還提出「應當按照中央規定吸收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中合乎我黨黨員條件的入黨，以便從民主黨派內部密切黨與非黨的關係。」7 例如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吳晗在 1957 年 3 月加入了中共，而無黨派人士郭沫若的中共黨員身份早就存在，1958 年又以重新入黨的方式予以公開。

中共中央統戰部給各民主黨派劃定了發展成員的分工領域。民革：原國民黨軍政人員；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識份子；民建：民族工商企業家和與他們有聯繫的知識份子；民進：教育、文化、出版、科學界知識份子；農工民主黨：醫藥衛生、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界知識份子；致公黨：歸僑、僑眷；九三學社：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和醫藥衛生界知識份子；臺盟：臺灣省籍人士。

根據統戰部 1953 年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民主黨派在國內的黨員總數為三萬二千多人（加上民盟、民革和致公黨在國外的黨員約一萬人，總計四萬多人。較之一九五零年國內一萬一千餘人，發展了兩倍。

雖然人數有所增長，但比起中共發展黨員的速度和規模，民主黨派難於望其項背。章乃器曾堅持主張民建應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而中共的因應之道，是成立全國工商聯，分散了民建的實力。工商聯因此成為與八個民主黨派並列的人民團體。

各黨派的經費，以往都是通過捐助等方式自籌。自從成為新政權的成員之後，民主黨派的經費及人員工薪變成由國庫支出。

中共宣佈在外交上實行親蘇的「一邊倒」政策，遭到民主黨派中崇尚西方民主理念的自由知識份子的強烈質疑，毛澤東為此曾在 1949 年發表《別了，司徒雷登》等雄文予以駁斥。民盟中主張與美國保持關係的重要人物張東蓀遭到整肅，被扣上「出賣情報」的罪名而失去自由。

中共在 1950 年代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也對民主黨派造成相當的衝擊。例如民革主要是國民黨內分化出來的政治勢力，但與舊軍政及地方勢力淵源較深，在土改、鎮反、肅反等運動中受到的觸動較大。軍警曾包圍民革主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濟深的住宅，從他家中抓走訪客。又如民建是以民族工商業家為主體的政黨，「五反」運動中，中共統戰部一度提出「火燒工商界，打劫民建會」的口號，很多會員遭到鬥爭甚至自殺。思想改造運動和對胡適、梁漱溟的批判等，也觸及了很多民主黨派內的高級知識份子。

但民主黨派對於中共出臺的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評權。對於出兵朝鮮、糧食統購統銷等重大決策，民主黨派中有相當多的反對意見。黄炎培曾主張「江南無封建」，對土改政策提出質疑，並批評國家在重要物資上的壟斷是「與民爭利」；梁漱溟因反映農民生活太苦而遭到毛澤東的責罵時，陳銘樞當場要求毛為梁的觀點定性；統戰部提出民建發展組織應以「中小（資本家）為基礎」，章乃器一再表示反對。

6. 過渡時期總路線與政治一體化

1953 年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把原來設想中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間表大大提前了。1954 年起，以國家資本主義取代私人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

改造（公私合營）進程就開始了。

1954 年 9 月 15 日，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原先的《共同綱領》相比，「五四憲法」首次明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大前提，並增加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政務院副總理的黨外人士，皆轉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至此，國家最高層職務完全由中共領導擔任，實現了「黨政合一」，聯合政府的色彩漸趨淡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日形突出。而在 1949 年曾起過重要作用的政治協商會議，變成了一個諮詢機構。

1956 年毛澤東對民主黨派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定了這一方針。但有不少民主黨派成員私下表示「監督不了」、「監督不敢」。

1956 年年底，「對資改造」基本完成，毛澤東在黨內會議上亮出底牌說：對於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繫的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需要「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方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給安排，給他們事做。這樣，政治資本就不在他們手裏，而在我們手裏。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沒有剝奪乾淨的還要剝。」8

二　在「陽謀」中陷落

1.　「整風」之前民主黨派的批評

1956 年是個多事之秋，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共產主義世界引發了地震，不久發生的波蘭、匈牙利事件，更引起毛澤東的警惕。這警惕也分為兩種：一是對黨內接班人否定前任功績的警惕，二是對黨外政治力量問鼎權力的警惕。

自 1956 年 9 月以後的近半年中，全國各地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民主黨派的政治批評也在一些內部會議上出臺。在 1956 年 7 月和 10 月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以章乃器、章伯鈞為代表向中共「提出了尖銳、嚴厲的批評，廣泛涉及党的領導、國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問題。」對於中共提出的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章伯鈞等提出：一、監督應有法律保障，民主黨派向相當政府部門應有質詢權；二、民主黨派可在人大設「議會黨團」，有權

單獨向中外記者發表主張；三、政府部門和政協對民主黨派所提批評建議，應認真處理，不得敷衍。

關於民主黨派的發展方針問題。章乃器批評中央統戰部一九五二年提出「中小為基礎」的建議，是團結中小、排斥打擊大資本家，是製造階級鬥爭。對於過去協議的各民主黨派重點分工範圍，章伯鈞一再表示不滿，主張要打破「防區制」「包乾制」。有些人對中共在高級知識份子中發展黨員，認為是「對九三學社的威脅」。有些人從增強民主黨派的實力出發，主張取消民盟、民進、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四個黨派，另組一個知識份子的大党。

章乃器批評中央統戰部有階級鬥爭簡單化、統戰工作庸俗化的傾向，指責部分黨員、進步分子懷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針，執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業者受到無情打擊，主張重新審理「三反」、「五反」案件，處分過重的予以平反。羅隆基、章乃器等提出，共產黨員和非黨員不平等，黨外人士怕黨員，見到黨員唯唯諾諾，覺得自己比黨員低一等。座談中普遍反映黨外人士有職無權，對黨員幹部的官僚主義十分不滿，有人指出：「現在官氣之重，比國民黨還甚」。許多人對中共劃定的民主黨派發展方針表示不滿，對政協的工作感到有名無實，章伯鈞主張實行「兩院制」，將政協變為上議院。9

對於黨外人士的批評，中共中央統戰部確實認真加以研究，並提出了具體改進意見。據說中共領導人劉少奇亦有實行「兩院制」的想法 10，中共中央于同年 12 月批准統戰部《關於加強政協地方委員會工作的意見》的指示中，認為「政協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不僅具有統一戰線組織的作用，而且在實際上起著類似「上議院」的作用。」

至此，1957 年「反右」的三個主要目標人物，已全部進入毛澤東的視野。毛的視角與劉少奇及做具體工作的中央統戰部顯然不同，他認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對派」。11 毛未嘗沒有「引蛇出洞」的意圖，不過對黨外講得隱晦，在黨內就比較放得開。1957 年 1 月，他在黨內會議上談到「對臺戲」時說：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12

2．　毛澤東提出「整風」和民主黨派人士的批評

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的第十一次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對與會的黨

內外人士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講話。講話的內容被迅速傳達到全國，掀起了一股清議之風。

在 3 月間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再次重申「不能收，只能放」，鼓勵批評，並宣佈年內開展整風，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再度發出指示，組織黨外人士對党和政府展開批評。民主黨派的批評，多集中在中共與非党人士的關係上，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批評了「以黨代政」造成黨外人士「有職無權」。這些發言都涉及中共的領導角色及黨派關係，章乃器認為自己在糧食部「有職有權」，「是鬥爭得來的」；章伯鈞還提出了具體的改進方案——「政治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

《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在 6 月 1 日關於的「黨天下」言論，提出「党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並直接向毛澤東、周恩來喊話：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 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党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

中共一直將民主黨派定位於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毛歷來關注的黨外動態重點，一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動向，二是民主黨派的動向，此時這兩個方面代表人物的言論，被認為是在向中共爭取更多的權力。

儲安平的發言，是在向毛澤東重申 1949 年建國時的聯合政府共識，觸及了中共與民主黨派關係的底線。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領袖，都習慣於將國家名器視為戰利品，儲安平「党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的言論，直接涉及到現政權格局的合法性問題，是中共絕對不能容忍的。

3. 形勢失控與中共轉舵

民主黨派代表人物的言論，影響迅速波及全國。廣大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們

的批評，更廣泛地涉及政治、外交、經濟、司法、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毛澤東本想利用「大民主」手段來衝擊官僚體制，卻產生新的兩難境地：「大民主」危及到党的一元化領導，或許是他始料所未及。青年學生與民主黨派人士合流的跡象，也是靠群眾運動起家的中共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

毛澤東慣用的權術，是利用中央號令地方，利用地方挾制中央；利用黨外制衡黨內，利用黨內壓制黨外。當他的黨內權力受到威脅時，會偏右一點，以借助黨外力量壓制黨內；當黨外力量上升時，會偏左一點，贏得黨內支持一致對外。

在黨內權力制衡關係中，毛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各中央局和省級幹部，這些人憂心如焚，呼籲他將自己放出的「魔鬼」收回瓶中。在中央高層中，對「整風」的看法雖未盡一致，但對於「反右」的看法卻空前一致，因為這關係到政權。5 月 14 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作出了「反右」決定。毛澤東的決策，得到從中央到基層的一致支援。他的個人權威也開始重新樹立。

對毛澤東而言，「大民主」是一把兩刃劍，既可用於黨內，又可用於黨外，劍柄則操之於己。「蛇」被引出「洞」後，是「放蛇咬人」還是「斬蛇七寸」，完全根據形勢需要而定。重樹黨內個人權威和整肅民主黨派，都是其戰略目標。這兩個目標後來都實現了。

4. 「反右」的策略

作為群眾運動大師，毛澤東善於利用形勢實現自己的目標。他利用民主黨派內部矛盾，分化瓦解、各個擊破。據黃炎培 1957 年 6 月 5 日的日記記載，毛澤東向他們透風說：「章乃器是和我們走兩條路的」，「章伯鈞反動語」，「他和羅隆基勾結了」。

毛的旨意在民主人士的小圈子內迅速傳播並得到呼應。次日，在民盟的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安排下，章伯鈞與六位教授座談，史良、閔剛侯在座。與會的教授大多認為形勢嚴重，章伯鈞提出：現在我們民盟有責任要幫助黨。13 當晚史良即向周恩來作了彙報，並被毛澤東作為民主黨派插手學潮、向中共奪權的證據。

毛澤東將打擊重點放在成員以高級知識份子為主的民主同盟，並在題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 7 月 1 日《人民日報》社論中，羅織出「章羅同盟」這個名詞，以影射民主同盟。

被毛澤東稱為「右派的老祖宗」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情況有所不同

而又有所相同：章伯鈞注重黨派工作，大部分時間在民盟、農工主事，很少到交通部上班。羅隆基對政治興趣濃厚，但在民盟內是非主流派，盟務插不上手，對在森林工業部部長的工作一直很消極。章乃器屬於專業人士，與章伯鈞、羅隆基工作旨趣不同，嫌民建內部是非太多，多次表示要退出，幾乎每天都在糧食部上班。

這三位「大右派」的共同特點，是年富力強有主見。章伯鈞、羅隆基在民盟分屬左、右兩翼，關係緊張，但都屬於少壯派，平時好發表政見，毛澤東便製造出 「章羅同盟」，一釜烹之。章乃器在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上，經常與中共「唱對臺戲」，在民建、工商聯內則與黃炎培、陳叔通長期不和。毛澤東便親自深夜召見兩老面授機宜，利用矛盾將章乃器扳倒，並給所謂的「章羅同盟」定下了調子。

一些拒不認罪的「右派」，在運動後期被定為「極右分子」加重處理，如民建的章乃器和民盟的彭文應等。

5. 民主黨派淪為改造對象

「反右」過後對民主黨派的評價，與此前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根據中共中央統戰部 1956 年 3 月起草的第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決議，「各民主黨派已經基本上成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團體」14，但在 1958 年 7 月 18 日該部提出的《改造民主黨派五年工作綱要》（修正稿）中，卻將民主黨派定位于「半反對派」，並認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也是階級鬥爭，「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這場階級鬥爭中同我們較量的主要對手」。

這個文件認為：「民主黨派作為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地位和作用已經日漸削弱」，「作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具，它們在這一方面對我黨的輔助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日益加強了」。文件制定了具體的「組織整頓」步驟，以實現「壯大左派、團結中間，孤立右派」的目標。

民主黨派的政治地位在「反右」後迅速跌落，只是作為「政治花瓶」繼續存在，留任和新任的民主黨派領導人表現得十分馴服。1959 年二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部長名單中，黨外人士比例由上屆的 37%降至 22.8%。《光明日報》、《文匯報》等民主黨派報紙在「反右」以後相繼被收編，某些專題新聞的審批權由黨中央專門機構行使。

6. 走向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

以 1957「反右」為分水嶺，共和國的民主建國理想和聯合政府共識被摒棄，走向一黨專政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

「反右」整肅了民主黨派，不僅令「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徒托空言，也使社會矛盾集中到中共自身，政治鬥爭的重點逐漸轉移到了黨內，資產階級已成為改造、專政的對象，僅存政治宣傳上的假想敵價值。1959 年的「廬山會議」重創黨內民主後，歷經「七千人大會」到「四清」，權力鬥爭愈演愈烈。以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名義進行的「階級鬥爭」，毫無例外地以揪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為目標。自相殘殺的黨禍，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國性內亂。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8 月 23、24 日，一些北京紅衛兵發出致各民主黨派的《最後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 72 小時之內自行解散並登報聲明。自 25 日起，北京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陸續貼出「通告」，表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自即日起停止辦公。隨著紅衛兵運動的狂潮從北京向全國各地席捲，民主黨派人士橫遭抄家、批鬥、毆打、侮辱，民主黨派瀕臨滅頂之災。

三　民主黨派的現狀

1. 「右派」的「改正」

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反右」後嚴重下降，成為「政治花瓶」。「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動長達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得以恢復活動。中共出於緩和國內矛盾的需要，在胡耀邦的主持下，開始對「文革」、「反右」和歷次政治運動中造成大量的冤、假、錯案加以清理。

1978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門《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決定>的實施方案》（中發［1978］55 號），提出：「對於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這是我黨的一貫方針。已經發現劃錯了的，儘管事隔多年，也應予以改正。」 15

经过反覆斟酌，198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又下发〈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複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发［1980］60 号）。在複查的二十七人中，确定二十二人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

根據「文化大革命」後官方公佈的數字，「右派分子」總數為 55 萬多人，約占當時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總數（500 萬人）的 11%。但這個資料一直受到質疑，如

將內定劃為「中右」及補劃的「右派」等計算在內，受到迫害的人數遠遠大於此數，而且還不包括他們的親屬。

鄧小平是「反右運動」的主要執行者，他堅稱當時「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16

根據這個定調，60 號文件在承認「反右派鬥爭確實擴大化了」的同時，堅持認定「反右」是完全必要的。報告推翻了毛澤東在 1957 年羅織的「章羅同盟」，但出於政治需要，對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五人，仍維持「右派」原案（其中前四人已逝世）。

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上，對錯劃的「右派」都只講「改正」，以區別於對其他冤假、錯、案的「平反」，這不是文字遊戲，而是堅持「反右」的正確性和必要性。「文革」中被扣發工資的幹部，工資都是全額補發的，而根據 55 號文件的規定：「經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的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但不補發工資。」這也是對「右派」實行區別對待的一種體現。

2. 重燃的政治熱情與「六四」事件後的轉向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些重要關節點上，諸如 1945-1946 年的國共和談、1957 年的中共整風、1989 年「六・四事件」中，民主黨派曾試圖扮演調停緩衝的角色，但並不成功，甚至不受歡迎。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的治國方略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工作為中心」。1980 年代初，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民主黨派的政治熱情重新煥發。一些資深的民主黨派人士在某些重大政治、經濟問題上，例如在三峽大壩上馬的問題和 1989 年「六・四」事件上，不僅提出過獨立見解，甚至能夠堅持己見。

在內部人事上，也出現了對中共干預的抵制。民主黨派內部曾有動議，要求具有中共身份的「交叉黨員」退出，或不得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民盟的一批中委，曾試圖在換屆時通過選舉由千家駒取代費孝通出任民盟中央主席，經中共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出面彈壓，費孝通才保住了主席職位。

「六・四」槍聲響起之後，民主黨派隨之失聲。不久迅速轉向，紛紛發表聲

明支持「平暴」，並慰問戒嚴部隊。個別持反對意見的人士（如千家駒）則遠走海外，民主黨派一度高漲的問政熱情歸於沉寂。

3.　由聯合政府成員變為「參政黨」

1989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將中國的政黨制度定位在「多黨合作」。從此以後，民主黨派與中共的關係，徹底告別了「聯合政府」這個早已不存在的歷史概念，進入了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時代。

定位於「參政黨」的民主黨派，除了基本的組織活動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舉辦各種調研，在此基礎上形成提案、議案，體現「參政議政」的存在。雖然民主黨派的工作沿襲了 1950 年代劃定的「重點分工」範圍，而各黨派的調研、參政及提案內容，卻未因這種劃分而顯示出明顯差別，顯得籠統而雜亂。由於資訊不公開，民主黨派的調研資訊明顯不足，提交的議案也不專業，不易引起政府決策機構的重視，最終流於形式。

4.　民主黨派的邊緣化

進入 21 世紀以後，隨著經濟增長引發的政權腐敗，民主黨派創建時的民主憲政理想已被淡忘，功利化、機關化、邊緣化的現象十分突出，政黨特徵模糊不清。民主黨派在監督方面無所作為，甚至其自身也難以抵禦腐敗。民主黨派的邊緣化現狀，主要體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一、無獨立政治主張：按照國際流行的政黨概念，政黨應有獨立的政治綱領、組織體系、經費來源、群眾基礎等，這些都不適用於「中國特色」政黨制度下的民主黨派。除了參政水平低下以外，民主黨派的政黨特徵也逐漸消失，成為政權的一部分。目前的民主黨派有的仍以《共同綱領》為政綱，有的雖有政綱卻與《共同綱領》大同小異。在執政黨宣佈自己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時，民主黨派習慣於宣稱自己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二、入黨動機功利化：隨著老一代的領導人逐漸辭世，民主黨派開始換代並迅速完成領導層的更替。新發展的黨員對本党的歷史傳統和理念十分隔膜，更多的是功利上的企望與訴求。

三、組織發展受限：目前各民主黨派總共僅有 65 萬黨員，相比與中共 7000 萬黨員的規模，顯然少得可憐。民主黨派發展黨員，仍受 1950 年代中共劃定的重

點分工規範，一些重要的部門和領域，至今仍是民主黨派的發展禁區。

四、副職晉升律：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被安排到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的職位上，與 1954 年以來的狀況並無區別，其他人物只能安排副省部級以下的實職，與建國時的陣營不可同日而語，甚至遠不及「文革」以前的境況。民主黨派人士的從政軌跡，會遵循「副職晉升」的規律，即從下一級副職晉升任上一級副職。

五、幹部培訓制：民主黨派幹部的提拔，需要通過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培訓。該校被稱為民主黨派的「中央黨校」，仿照中共中央黨校的模式培訓黨外幹部。目前中共中央黨校兼具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庫的職能，而社會主義學院只是一個幹部晉升的臺階。

六、「交叉黨員」掌權：雖然中共宣稱其黨員不加入民主黨派，但各民主黨派內部，仍存在一定數量不公開或半公開的中共黨員（習慣上被稱為「交叉黨員」）。但目前掌握實權的領導人，基本上是這類人物。「交叉黨員」的存在及其實權地位，從組織上確保了民主黨派與中共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七、人事、經濟機關化：如前所述，自 1950 年代起，民主黨派機構從人事、經費上開始機關化。各民主黨派的辦公場地和日常辦公經費，全部由國庫支出而無需自籌。2005 年頒佈的新《公務員法》將民主黨派機關工作人員正式納入公務員隊伍。經濟上的依賴性，決定了「參政黨」與「執政黨」利益上的一致性。

八、監督無力：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 1980 年代提倡：民主黨派與中共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而現狀則是：因為利害一致，民主黨派與中共在做到了「長期共存」和「榮辱與共」；因為地位不同，在「互相監督」和「肝膽相照」上難以到位。由於上述各種原因，決定了民主黨派在政治生活中無力對執政黨實行有效的監督。

5. 民主黨派有沒有未來？

自「反右」歷經「文革」迄今的五十年間，公權力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監督。鄧小平的 「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起飛，也造成中國大陸的貪腐橫行，這正是消滅了民主監督的惡果。由於毛澤東的偶像地位仍被愚蠢地維持，「反右」這一摧毀民族精神、斫喪民族元氣的歷史罪案，至今未得到應有的清算。

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和分化，使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面對民間日益高漲的民

主憲政訴求，中共在堅持一黨執政的同時，不得不繼續獨自承擔改革的全部壓力。新任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在接任之初，對民主黨派元老的優禮有加，不斷釋放出提高民主黨派統戰價值的信號，試圖重新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

2005年和2006年，中共中央先後出臺三個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和《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文件提出民主黨派人士「符合條件的可以擔任正職」，明確了把黨派專項經費列入同級財政預算，研究解決黨派機關人員編制等。

2006年11月出臺的《關於鞏固和擴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還提出「要照顧同盟者利益」。2007年4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表決，任命原同濟大學校長、致公黨副主席萬鋼為科技部部長，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首位來自民主黨派的部長。這一任命確實具有詮釋「照顧同盟者利益」的象徵意義，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參政黨」與「執政黨」之間的「利益共同體」關係，但在原有體制不變的前提下，起決定作用者仍是中共中央派駐的部黨組。

中共高層在堅持「一黨執政」的大前提下，試圖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所謂「民主社會主義」能否使國家走上憲政之路，歷經長期改造的民主黨派前途如何，至今仍屬未定之數。

結　語

以1957年「反右運動」為分水岭，毛澤東重新樹立了個人權威，走向個人獨裁；中共推倒了聯合政府共識，走向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則从聯合政府的盟友，沦为被改造的对象。就中共而言，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成功的，同时也是失败的。同盟者在被成功地驯化為仆从之后，当主人出现决策错误时，僕從是无力履行监督功能的。

民主黨派創立時的理想是反對一黨專政，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今日中國之民主黨派，距離這個理想已十分遙遠。當商品經濟的復興喚醒了國人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多的公共知識份子參與到公民維權行動中時，其中並無民主黨派的身影。當社會熱烈探討政治體制改革、民主和民主社會主義時，人們幾乎聽不到民主黨派的聲音。這無疑是一種歷史的諷刺。

知識份子黨派與農民會黨的結盟，其結果是前者被後者改造。到目前為止，

中國大陸有「党文化」而無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政黨」實際上趨同於「政權」。如果民主黨派應反省自身的退化，更須反省自身執政歷史的是中共。

西方民主理念和馬克思主義都是外來政治文化，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卻毫無例外地被同化為「中國特色」的「會黨文化」（或曰「党文化」）。「黨同伐異」、「結黨營私」的積弊，連海峽對岸的臺灣都無從倖免。對中國知識份子而言，不僅需要反省百年來的政治文化，更須反省中國人的「國民性」。（ 2007 年 6 月 26 日完稿）

——2007 年 6 月 30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注 釋

1 [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揚的赴華秘密使命(1949 年 1—2 月)》，《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5 年第 5 期。

2 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 頁。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 页。

4 李维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的形势与任务》（李维汉同志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0 年 3 月 21 日。

5 中共中央《有關各民主黨派組織活動的決議》，《中國民主建國會歷史文獻選編》（2），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4、65 頁。

6 《民主建國會關於不在軍隊等系統發展組織的通函》，《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2），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4 頁。

7 《1956 年到 1962 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1956 年 3 月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决议）。

8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37 页。

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20、821 页。

10 阎秉华：《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炎黄春秋》2006 年第 11 期。

1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79 页。

12 毛泽东：《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55 页。

13 閔剛侯：《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人民日報》1957 年 7 月 4 日。

14 《1956 年到 1962 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1956 年 3 月 3 日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决议）。

15 《中共中央<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78 年 4 月 5 日。

16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97 页。

從北大一角看「反右」

陳斯駿

我所在的北大歷史系五四級一班有成員三十餘人，其中三分之二為調幹生，三分之一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反右，派了四頂帽子，其中一人後來升級為「托派反革命」。此外尚有一名內部控制的中右份子。時至八十年代初，已知四右中兩人死亡，一人癡呆，倖存者僅我一人。數十年來，苦熬之餘，每多思索，果能尋得苦難症結，不枉我當年投太史公門下之初衷也。

一 、序戰

1950 年 6 月，著名哲學家艾思奇在北大紅樓對首都高校教師和高年級學生做了歷時五個多小時的演講，主題是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講話中，他提出了「磚與牆」的比方，喻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他說，一塊磚砌到牆裏去，那就推不動了，落到牆腳，不砌進去的話，那就被一腳踢開了）艾思奇形象地解釋了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基本態度和政策。換言之，消滅知識份子的獨立精神 和自由思考，正是

宗旨所在。艾思奇的講話牽動了一個時代，牽動了一場歷時數十年的知識份子浩劫。

1952 年高等院校調整，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贊由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調長北大歷史系。原北大秘書長兼歷史系系主任鄭天挺教授另調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論及鄭天挺，他在北大的淵源、資歷以及在史學界的學識、威望，本無人可以企及。但中共視北大歷史系為意識形態的一個方面軍，改造合併後的北大歷史系教師隊伍實為當務之急。鄭天挺之調南開，據他自述：「在思想頗有波動。多年從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學，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單位的清史資料浩如煙海，絕非其他地方可及……」。鄭師縱然悲歎，但也無可如何。翦伯贊當年在中國史學界資歷不算深，他之取代鄭天挺是形勢的需要，也是他夲人與中共多年密切關係之所以然。當時，北京史學界尚有一位領軍人物即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也被調南開大學歷史系。如今看來，調鄭，遣雷，無非是為翦伯贊主政北大歷史系騰出道來。風雨欲來！當時已有些敏感的教授聯繫到思想改造運動，知道歷史系從此多事矣！

合併後的北大歷史系教師隊伍頗為紛雜：既有北大胡適多年培植的師資，又有蔣廷黻的清華歷史系班底和燕京歷史系洪業的舊部等。總算好，幾年過去，翦伯贊以其相對寬容和平實的作風取信於方方面面，北大歷史系確已穩坐國內史學的領先地位。

如今，經歷了幾十年風雨，我們看出一條規律：毛澤東的國家是經不起穩定的，有幾天好日子，接著必然是撲撲騰騰，風吹雨打。1955 年反胡風告一段落，肅反接踵而至。北大和北大歷史系的沉重災難始於是時。

五五年胡風運動在北大見有大動作，只是在大飯堂一次集會上公開宣佈逮捕東語系一名講師而已。順便一提， 這位講師與胡風僅一信之緣， 不久被釋， 但又難逃反右一劫。

肅反初期，我班曾有個別同學派出外調工作，此外也僅有幾次小組討論。其中一次是批判「胡風份子」路翎的小說〈窪地上的戰鬥〉。

五五年夏，晴天霹靂，深受同學愛戴的青年教師王承炤自盡身亡。王承炤是張政烺教授的助教。張先生是知名的古史家，但為人木訥，不善言辭。王承炤則擅表達。張的智慧深邃和王的能言善辯可謂珠聯璧合。肅反開始不久，有材料說，

王承炤在解放前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分隊長， 而他自己交待是普通團員。按規定的政策界線，三青團分隊長以上是「反動黨團骨幹」。據說學校有關幹部和王談話後， 當天，他就自我了結。

王之死，在歷史系引起陣陣不安的迴響。老教授們在惋惜、悲痛之餘，不免為政治運動之險惡而震慄。解放至今，歷史系因政治運動而奪去人命的畢竟是第一遭。一位教授說，王承炤「罪」不至死，奪去他生命的是不珍惜人命的官僚主義。學生中，悲憤之情難免演化為激憤的抗議。有人在黨總支辦公室門口貼上四個大字: 「草菅人命！」總支夏自強書記為此寢食不安，有人說他這幾天常唉聲歎氣，人明顯地瘦了下來。夏自強出身燕大歷史系，解放前是地下黨員，有人說他是個書生型人物。也有人說，翦伯贊主任在得知此事後，潸然淚下， 說他身為系領導人責任重大。

學校黨委畢竟不同凡響。他們認為，王承炤之事也許是操之過急，今後工作宜細不宜粗。但目前暴露的右傾情緒十分嚴重，歷史系總支書記在鬥爭中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堅定性。就這樣，肅反結束後不久，換了一位新的總支書記。沒有這個人，北大歷史系就沒有「波瀾壯闊」的十年歷史了。

二、「小陽春」

反胡風和肅反甫停，1956 年出現了毛澤東統治期間難得一見的「小陽春」，在北大也有了幾陣和風。歷史系主辦的學術講座曾一時轟動。當時請來了哲學研究所的鄭昕、賀麟和金岳霖等教授，講了康德、黑格爾學說和邏輯學。在校內沉寂多時的西語系名教授朱光潛講了西方美學史幾個問題。外校有人來旁聽，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也來了記者。講座結束後，同學們大受啟發，我級許多同學選修了外系課程，我就選了西方哲學史和西方文學史。青年團號召團員准備考副博士……。學子們精神亢奮，人人立下宏願，老教授們也個個春風滿面。五六年春，馬寅初校長開始舉辦全校性的不定期講座，邀清中央首長和名人來校演講。喬冠華（外交部部長助理）、李富春（副總理）、胡耀邦（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陳毅（外交部長）、廖魯言（農業部長）和丁玲（名作家）、范長江（名記者）等人光臨北大大飯堂講臺，很受同學歡迎。馬老及時利用了當年寬松的政治氣氛，打算為北大營造一個活潑、多元的良好學風。與此同時，校內出現了不少新的學生團

體：國際時事學習社、音樂欣賞社和樂隊等相繼成立。

這一年的 5 月 13 日，我級同學到明十三陵遊覽，意外地在長陵遇到了劉少奇委員長。在半個小時的席地談以後，劉少奇向我們透露了黨中央即將執行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方針。劉少奇談話內容在北大校刊刊登後，同學們對黨中央提出的「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更是信心百倍。

如今六十歲以上的知識份子在回首這段歷史時，大多為 1956 年那個被稱為「興旺的年代」的驟然中斷而惋惜不已。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善良的，他們寄望於中共，但是換來的是毛澤東的出爾反爾和越來越收緊的桎梏。

三、「五・一九運動」

北大整風鳴放始自 1957 年 5 月 19 日。這一天大飯堂外墻出現了歷史系五五級幾位學生署名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就其內容而言，並無驚人之處。只是質問校團委:「出席全國團代會的北大代表是誰？誰選的？」如此而已！大字報署名者四五人皆團員，事後，其中一人雖劃了右，但其罪名與該大字報無關。看來，當局並無追究這個大字報的意思。但應指出，沒有這下子「春雷」，也就沒有以後的鳴放大潮。傳聞該大字報是歷史系五四級許南亭所撰，有誤。隨後，校園內出現越來越多的大小字報，5 月 23 日，人大女生林希翎在校園內發表了演說，引起了較強烈反響。這期間，校黨委副書記崔雄崑曾在一次大會上婉轉表示不同意校內舖天蓋地的大字報，但一兩天後又聽說黨委書記、副校長江隆基說不該壓制學生鳴放。如今看來，學校領導人已陷於無所適從，放也不是，禁也不是。此時，全黨只有毛澤東一人是「清醒」的。崔雄崑之輩怎能理解領袖的「陽謀」大略呢？而江隆基此時的「似是」卻在若干天以後轉化為「而非」，成了無可原諒的右傾和做了右派的尾巴！

如今，許多人都說當年的右派言論是驚天動地的啟蒙運動，對此，我不盡苟同，這個評價太高了，不切當時實際。須知，毛澤東在運動過程中，一直掌握主動。他誘使毫無政治經驗的知識份子和學生跳下他布下的陷阱，大多數受難者渾然不覚。可以肯定，運動中沒有出現可稱之為先知型或領袖型的人物，一些難友是在多年後才意識到自已的歷史責任，而更多的人在殘酷折磨後已喪失了鬥志。中國的青年運動在 1957 年遭受了重大打擊，十年後，惡果畢現。毛澤東在文革中

輕撥彈指，又讓千百萬青少年捲入毀滅性的紅衛兵運動，造成華夏空前浩劫。當前，中國青年茫然失去方向，晃晃悠悠中，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尋得了什麼？值得我們深思，再思。

四 、析案例若干

北大的鳴放材料犖犖大者，已廣為人知，這裏不提也罷。有幾個小案例值得說說。

例一：校內有一個學生組成的百花社，筆者曾參加了他們一次小型座談會。會上，歷史系五四級一班的黨員黃良元以新聞自由為題，做了一個簡短發言，他說:「共產黨人為什麼要把自由民主大旗送給資產階級呢？難道共產黨人不主張新聞自由嗎？請同學們聽聽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是怎麼說的。他在〈第六屆萊因省議會的辯論〉一文中指出：『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馬克思的意思當然也包括新聞自由。很遺憾，我們沒有人引過這句話。新聞和出版不應成為誰的工具和喉舌，我們的先進制度應該體現在新聞和出版的民主化和多元化上。」

在座有一位同學插話說:「據我所知，馬克思這話是針對普魯士反動當局說的，拿到今天，合適嗎？」黃良元胸有成竹，他說:「有一句恩格斯的現成話，可以用來回答這位同學的疑問。他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以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的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

座中不少人鼓了掌。

為了這次發言（當然有別的罪名），黃良元派為極右 ，遣往京郊齋堂勞改。八十年代初，我與黃曾一晤。黃說:「我一個共產黨人，引用了馬恩的話，因此成了右派，我至死不解。」我說:「中共本質是專制主義，如果說有人不喜歡馬克思的某些言論，那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黃良元，一位勇敢、明智的馬克思信仰者。五十年前，他和我談到，他理解的馬克思思想是批判與寬容並重的，對專制、獨裁的批判和政治文化的多元論是馬克思思想的核心。黃說，他反對武斷解釋馬克思，更難以容忍官方的任意曲解。為堅持馬克思思想，黃良元付出了生命！

例二：哲學樓樓下走廊有一張題為「請用法制代替運動」的小字報，內容如下:「……共產黨發起了整風運動，要求人民對黨和政府提出監督意見，這樣做，

當然是好的。當今世界文明國家都建立了人民對政府的監督機制，使民意能上達執政者，形成一種對權力的制約。我想，文明國家之所以能長治久安，這是一個根本原因。共產黨喜歡搞運動。這是在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傳統，無可厚非。但時至如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應將法制建設置於工農業建設同等重要地位……我們批判官僚主義，不僅要揭其現象，更應究其本質。官僚主義產生的根源，正是無視法制的人治陋規。許多領導幹部喜歡一句口頭禪:「這事是我說了算」。這不對！我們應該有一個不是由誰說了算，而是法律說了算的制度……。」

小字報的作者已不可查，也不知他有沒有因此成了右派。時至如今，中國的小百姓仍為人治所苦，這個小字報的作者如健在，他應為自己數十年未竟之志而痛哭。此類針砭政治現實的言論，在北大校園言論中不在少數，說大字報閃光點就在這裏，我是贊成的。有人說當年北大大字報具有啟蒙性，就有點誇大了。北大人都知道，五·四運動的科學與民主原則，在北大是早已有之的。

例三 ：文史樓樓下走廊出了一張大字報，標題是:「解放者，還是鎮壓者」:「十八世紀最後幾年，拿破崙統率的法國軍隊接連打敗了地中海沿岸撒丁島、馬耳他島和愛奧尼亞群島等地的封建統治者。這些地區人民簞食壺漿，迎接給他們帶來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軍隊。不久，俄國沙皇的黑海艦隊在海軍上將烏沙科夫率領下，把法國占領的地區奪了回來，恢復了封建統治。在蘇聯的歷史教科書和電影作品中，烏沙科夫和沙皇軍隊成了「解放者」！……該怎樣評價拿破崙和烏沙科夫在這場鬥爭中的是非曲直呢？」

這張大字報的作者是我。

沒有想到，在這張大字報周圍出現了五六張「露骨反蘇」的大小字報。

有的直指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上百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失土，批評蘇聯繼承沙俄的侵華政策，質問蘇共為何不執行列寧的平等對華政策。

有的質問中共為何承認外蒙的獨立。

有的指摘 1945 年蘇聯紅軍進軍東北後的胡作非為。

有的批評蘇聯專家的霸道作風。

……

一位校內蘇聯專家在翻譯陪同下，看了這些大字報。他到學校質問，這是露骨反蘇，你們管不管？

當然要管！連不同意考試五分制，主張多學英文少學俄文的人也扣上反蘇右派帽子！當年我小心翼翼不去碰蘇聯，但沒有想到沙俄也是碰不得的。

五、 災難的持續

此時，1957，十年後，文革，一脈相承。

學生中的右派，渾然不覺大難已至。我級大部右派都被遣至京郊齋堂公社勞動改造，少數幾人留校監督改造。右派大多思想不通，但都願意服從改造，望有出頭之日。五十年過去了，難友們經歷了苦厄的大半生，不少人甚至付出了生命！這就是當局對我們的要求：「徹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實質。

歷史系教師也劃了一批右派，為首是向達教授和王鉄崖教授，青年教師中，有張廣達和夏應元等先生。楊人楩、商鴻逵等教授雖未公開劃右，但仍受到批判警告。

說起向先生，歷史系的學子都會有一肚悲憤要傾訴。北大一級教授、北大圖書館館長、全國政協委員、科學院學部委員、知名的中西交通史專家和歷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長，這些都是向達反右前的頭銜。一夜之間都沒了，成了一個在歷史系厠所低頭掃地的佝僂身影。

五七年整風前，向達曾以蘇聯極左派史學家波克羅夫斯基的言論為戒，說明割斷歷史文化傳統之為害。向先生擔心的是中國史學也會走上蘇聯的錯轍。向先生為人鯁直，言談不慎間難免得罪某些權貴。然而，這一切都無從得出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結論，但是災難畢竟來了，而且在十年後文革中演成沒頂之災，向達教授逝於文革之始六六年，表面原因是死於尿毒症，實際上是死於殘酷批鬥。

楊人楩教授是國內知名的法國史專家，專長法國革命史。解放前夕，他曾在儲安平的〈观察〉雜志撰文〈自由主義往何處去？〉。楊認為，自由主義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到任何國家，當然可以深入到中國。楊指出，自由主義之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格格不入」的。共產主義根本反對自由主義。楊還強調自由主義者是不主張內戰的。……有如楊人楩之類的教授是「應該清算」的，但他在整風期間，沒有公開反黨言論，似無從劃右。當時歷史系有傳聞謂，楊受批判後，內部劃為中右，這大概不是空穴來風。文革期間，楊人楩受到衝擊，過早地逝世。

商鴻逵教授是原中法大學歷史系教授，是知名的明清史專家。院系調整後調

入北大歷史系，降職副教授。自此，不允他講授明清史，只安排他講次要的歷史文選。在北大，他被蔑為「反動文人」（他曾加入國民黨）和「黃色文人」（曾撰名妓〈賽金花本事〉）。他雖未劃右，但難逃批判。商先生性格豁達，在多次運動中，能做到坦然對之。這是他能活到八十年代的原因。

談及史學界的反右，雷海宗教授的遭遇當然不可忽略。雷先生 1927 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後，隨即返國擔任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和系主任並兼任金陵女子大學教授和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教學之余，從事開拓性的研究。所著〈殷周年代考〉一文確定了典籍〈竹書紀年〉中所述殷周年代細節。三十年代以至抗戰，他在清華和西南聯大任教授和系主任、院長等職。此期間，他學著成就斐然，所撰論文曾成集：〈中國文化和中國的兵〉。繼後，雷先生又熱衷於社會文化研究。他在「戰國策」半月刊以及大公報撰文多篇，批判中國柔性主義文化傳統和國民劣根性，大力倡導英雄崇拜。他的學派當時被稱「戰國策派」。1949 年，國民黨當局曾動員他前往臺灣，他不為所動 。

解放後不久，如前所述，他從清華去了南開。這一時期，他參加了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運動，學習了馬列主義。雷先生前後思路、遭際和上述向達和楊人楩、商鴻逵先生相似，可以做為「原罪」派的榜例,他們即使不鳴不放,也難逃反右清算。雷先生在整風前後的確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其中有的可謂「反動透頂 」（比如他說，到 1895 年恩格斯逝世後，馬克思主義已停止發展）。即使他言論「反動」程度稍遜，也難逃反右大棒。毛澤東和康生甚至直接過問對他的批判。雷先生逝於反右後四年，即 1962 年，可見大棒打擊之直接，威力之可怖。

六、所知北大反右血與淚

王承炤事件以後，來了個新任系黨總支書記，此人是出身西南聯大歷史系的許壽諤（此時已改名許師謙）。前任書記夏自強顯然已不適應新的政治形勢的需要，調到教育部了。許師謙上任之始即以改造北大歷史系為已任。「風生水湧」，反右給他帶來了機會，自此十年，直至文革，在他調任校黨委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之前，歷史系的大小災難都留下了此人的罪印。直至文革結束，他還公然阻撓翦伯贊夫婦冤案的的平反。

應一提，許師謙麾下有一些邪惡的左棍子。沒有他們，歷史系的反右是搞不

起來的。試舉二例：一是五四級的李原，此人反右期間「火綫入黨」，被許師謙贊為「階級鬥爭英雄」。他學識極差，畢業後居然留系內當助教。但因不勝任教學，只好在系內專職整人，當政治輔導員。（順便一提，文革告終，鄧廣銘教授主政歷史系，撥亂反正，把反右留系的左棍子，一一撥走）文革期間北大武鬥，李原充當校內一派頭目，被對立一派俘獲，活活打死。另一個孫伯驎，也是五四級，此人被稱「理論權威」，為人陰陽怪氣，以整人為業。反右之初被許師謙提拔為党支書，畢業後在哲學系任教。後調南京大學，數十年一帆風順。一些同學說，想起他，就不免想到康生。此人已病逝。

反右期間，在學學生五三級至五五級中共有八個班，每班三十餘人，按指標各攤三至四名右派。粗略統計，派入右冊者至少有二十五六人。另有入冊而不公開的中右份子若干。有文章說北大歷史系所劃右派要比中文系少得多，原因是系主任翦伯贊寬洪大量，網開一面云云。此言不實。翦伯贊並不掌反右實權，況且他一向待人較寬厚。劃右多或少，一決定於上面給的指標，二決定于總支掌握分寸的的鬆或緊。

北大全校劃了多少右派?官方說是八百多人。當時全校師生員工萬餘人，這個比例當然不算低，但肯定不是實數。公佈數字乘上一點五，我想，這才是切合實際的最低估計。

我手頭材料並不全面，但下面所舉事例已足令人震慄。

右派傷亡名單，（五三級缺）。

五四級：

許南亭：派右後升級為「托派反革命」，判長期徒刑，身陷癡呆後，出獄。 現存北京。

熊光祖 ：派右後，與許南亭同案，判長期徒刑。北大荒勞改，釋放後在家鄉勞改多年 ，現倖存香港。

黃良元：派右後，在京郊齋堂勞改 ，後遣放黑龍江，八十年代逝。

趙明海：情況不明，但知八十年代前已逝。

陳德鈞：遣回原籍四川後，早逝。

張磊 ：遣河南原籍後，不知下落。

五五級：

沈元 ：遣至齋堂勞改，仍埋頭學術，撰歷史著作若干，為劉導生（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領導人）和黎澍（近代史所所長）等人所賞識。破格調至近代史所從事研究，所撰文曾在人民日報刊出。文革遭殘酷批鬥，逃至馬里大使館請求庇護，被捕。七零年以「叛國罪」處決。

雷光漢：遣至新疆，六十年代險遭鎮壓，被迫逃亡蘇聯。現居哈薩克斯坦。

陳鴻生：出身下中農，沒有鳴放，但發現其日記中有農村飢饉記述。劃極右，遣清河農場勞改，餓死。

孫敦新：死於徐州。

黃友釗：已早逝，情況不明。

楊秉功：整風期間，寫匿名信「攻擊」盧郁文，判反革命罪，刑期七年。現存活。楊並非入冊右派，而是反右後數年落網。

北大全校反右過程中傷亡事件，不盡我所知，但在我耳目所及有數起十分驚心動魄。我住在三十七齋四樓，樓上是經濟系和法律系學舍。這裏發生了兩起悲劇。其中一起帶有「喜劇」淡彩：一位右派難友從窗口一躍而下。地面是鍋爐房的厚厚煤灰層。人們把他抬到校醫室。值班醫生檢查了四肢，摸了鼻孔，聽聽心臟，說，沒事。躺十幾分鈡，他自己可以走回去！這位難友是誰？忘了。他從死神門口回來後，免不了挨批鬥。他寫了檢討書，貼在大飯堂旁的佈告牌上。檢討書上有句話：「死，是逃避罪孽，生，是接受改造，我選擇後者。」

第二起是北大草菅人命之最。也是在五樓的一間宿舍裏，右派難友黃宗羲正在挨鬥。他受盡折磨，精神崩潰，爬上窗臺，打算跳樓，一死了之。兩三位同學把他抱住。黃喪失理智，拔出身上的削鉛筆刀，刺傷了身旁一同學。結局是法院判他反革命殺人罪，處決。

校內風光綺秀的未名湖成了右派難友的生死抉擇地。吉林大學歷史系教授丁則良從國外訪問歸來路經北大，突聞吉大劃他右派，他一頭躍入清泉，以明心志 。

反右是政治運動，怎麼會造成駭人聽聞的傷亡事件呢？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這又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一位著名的學者說，沈元之死，是專制下的「集體共謀」。這是一個無奈的答案，也可說是終極的答案。「書呆子」們想要一個透明答案，只能是水中撈月！答案只能是一篇沉痛的史詩，它的時代上限是1957 年，下限但願永遠止於一九七六年。

北大歷史系怎麼會出了一個以許南亭為首的「托派反革命」案件？1952 年 12 月，國內「托派反革命」已徹底被消滅，五七年怎麼又冒了出來？北京市公安局的知情諸公，你們可以出來說說嗎？

北大和歷史系學生中劃了多少不公開的中右份子？不得而知，但從我班李銘清同學的遭遇可見中右份子的日後災難。。五五年，他為王承炤老師冤死一事，在總支門口貼了「草菅人命」四個大字。反右時，已是「秋後」，該給他「算賬」了，但我班劃右已超標，沒有公開扣他帽子。畢業前一次會上，許師謙說李在肅反的表現本可劃「反革命」，「姑念他年紀尚輕」網開一面，以示寬大。畢業後，李的數十年遭遇：農村勞改、苦役、文革以漏網右派身份挨鬥和長期監管，與右派並無二致。

反右期間，在北大這樣高層次的學校，也發生了一些難以想像和荒謬的低層次事例。西語系某女同學的遭遇真令人哭笑不得。她沒鳴沒放。整風期間，一位同學叫她去清華聽一個報告，她去了，到了會場，發現內容是控訴肅反，味道不對，於是馬上退場。遲了！參加這個會的同學都派了右，她也未能倖免。

七、翦伯贊和吳晗

很多人看過一張五十年代初周恩來與翦吳的三人合影，由此可見，兩位史學大師與中共領導人的關係十分密切。眾所周知，翦吳在文革中死於非命，然兩人命運皆由險惡的政治鬥爭所決定。

翦伯贊是留學美國的經濟學者。1937 年加入中共，但為統戰需要，其身份長期未公開。抗日期間，翦伯贊撰有《中國史綱》等著作，他的學術活動密切為政治鬥爭服務。此期間他曾奉周恩來之命，擔任馮玉祥的歷史和哲學教師。解放戰爭期間，他曾在香港達德學院 （由民主人士創辦的中共幹部學校）任教。解放初期，翦伯贊任教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如前述院系調整後調任北大歷史系系主任。調任前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翦伯贊陪同郭沫若、杜國庠、侯外廬到北大歷史系參加全系教師的一個座談會，主持人是向達教授。不料在座中竟有一名青年教師對來客大發厥詞達一小時之久。翦伯贊為此遷怒于向達。有人說反右期間翦對向達的批判源於此事。向達反右蒙難以至文革身死的過程，翦先生是知道的，我無從瞭解他當時的心態和反應，但寧願從好處著想：不火上加油，不落井下石，

就是好的。

身為大學教授和系主任，翦卻享有周恩來特批的一座小樓和專車，另為他派來秘書和炊事員、保姆等服務人員，這顯然是高級政治官員的待遇。

在歷次運動中，翦伯贊的學者良心和他的政治身份（五十年代中期，他的黨員身份公開並兼任副校長）顯然是很難協調的。章詒和女士在所撰「心坎裏別是一般疼痛—憶父親與翦伯贊的交往」一文中，有刻劃入微的第一手見析，令人信服，值得再讀。我在北大五年，對翦為人處事略有所知。他寬於待人、從不厲言惡色。在一次全系反右大會上，我眼見他在發言中為五三級同學張伯倫、戴靜華受批判而流下傷感的眼淚。

文革期間對翦的多次批鬥污辱、收回專用轎車和兩層住宅以及沒收大批珍貴藏書等，雖令他身心大損，但未致信心徹底瓦解。即使專案組巫中之流的殘酷迫害，也未足使他走上絕路。毛澤東針對他的兩次發言才是毀滅性的打擊。六六年三月，毛就學術批判說了一些話，其中有一句是:「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是國民黨。」六八年十月，毛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有個翦伯贊，北大教授、歷史學家、資產階級歷史權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將相也難。……這些人用處不多了。還有個吳晗，可能還有些用處。要問唯心主義，要問帝王將相，還得問問他們。」和翦、吳一樣，北大大哲學家馮友蘭教授也被毛多次指名痛斥。馮老不會把領袖的話太當回事。他已視批鬥污辱為等閒，他並不以為中共會把他當自家人，因而不會有翦伯贊那樣的委屈感。人們視翦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創始人，他自己也以馬列為生命真諦。他的生死悲劇的關鍵也許就在這裏。吳晗的悲劇與翦老異曲同工。他同樣是被中共扶上他並不情願相就的學界首座，而且最終又被毫不吝惜地推下火坑！

吳晗是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早年即以其左傾而著稱。他在抗日和內戰時期的高風亮節是應該肯定的，他的學者良心使他義無反顧走上民主和反獨裁大道。解放後走上政界高層，他個人對領袖的膜拜和在歷次運動中的「緊跟」，終於使他走入迷途，以至被導入絕境。反右期間，學界知情人皆不屑於吳晗在多次批判大會上的「張牙舞爪」和「落井下石」（楊人楩語）。楊人楩教授就曾為此丟下一句話:「吳先生怎麼不想想為自己留下後路？」。北大西語系美籍教授羅伯特·溫特（Robert Winter）曾對在西語系就讀的陳學弟說:「吳晗是個小人（snob）！」

溫特是吳晗數十年好友且在吳晗受國民黨追緝時曾給予援救。

如今，學界人士在談及吳晗時，不免懷有一種既憐且厭的心情。人們不能不想起解放前夕他在西柏坡晤見毛澤東，且在毛「啟發」下「低頭四改〈（朱）元璋傳〉」（廖沫沙詩〈哭吳晗〉中一句）的過程。學者可以沒有財富和權勢，但斷不可沒有脊樑骨。陳寅恪先生的一句樸素名言：「讀書不肯為人忙」，吳晗一字也沒有讀通乎？吳晗因「海瑞罷官」案陷入絕境，是毛一手泡制的，也是吳自願選擇的，這是他一生政治道路的必然結局。有人以文人受「誘姦」不為恥反為榮解釋之。此說雖刻薄，但不無道理。

八、也算題內話

民主黨派中有一個農工民主黨，它的黨主席是著名的章伯鈞，副主席是下面要提到的黃琪翔。這個黨和民盟在歷史上和中共曾同舟共濟，取得革命的勝利。中共說過要和民主黨派「……肝膽相照，長期共存」這樣的昭彰名言。至於在另一個場合，毛澤東對斯大林說過勝利以後再來「收拾」這些黨派，此語當時不可能為人所知。

筆者的父親陳卓凡是這個党最早成員之一，數十來年一直與章伯鈞共事。1956年，父親到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他帶我拜見了幾位長輩，其中有黃琪翔先生。黃是著名的北伐將領，曾任第四軍團長以至軍長，抗日時期曾任集團軍總司令。見面時，我帶去了自撰的〈葉挺傳〉初稿，請他指正。此稿是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所約。黃琪翔與葉挺私交甚篤，北伐時曾共同作戰。我想，找他審閱，再好沒有了。不料他才翻了五六頁，面有慍色，把稿子丟在沙發上，說：「你們就這樣寫歷史！北伐是葉挺一個人打的嗎？」事後，父親說：「他沒說錯！如今的歷史也太不像話了，把北伐、抗日都說成是中共領導！這是歪曲歷史！」

反右，是毛澤東「收拾」民主黨派的大好時機。民盟和農工党成了勢在必克的重點。農工黨的大多數中央委員悉數派右，連一些一向靠攏中共的左派也未能倖免。黃琪翔被迫在全國政協做了檢討，他想不出怎樣認罪，只好說說1927年鎮壓廣州公社起義的陳年舊帳。我父親並未鳴放，只因是「章伯鈞在廣東的代理人」也派了右。人們數落他的「罪行」，只不過是參加抗日統一戰線，在國民黨軍政界服務的往事。

本來，毛澤東對農工党創始人鄧演達有好感。鄧在 1931 年被蔣所殺。毛在讀〈新唐書〉中的「徐有功傳」時，在眉批上寫了「歷史上『以身殉志，不亦偉乎』的古今志士數人中，就有鄧演達的名字。中共建政後，鄧演達的遺骨被安葬在中山陵左側，與另一側的廖仲愷墓相對。顯然，中共視鄧廖二人為孫中山的左臂右膀和國民黨左派的兩名主要代表人物。1951 年，周恩來曾接見先父，談及他與鄧在黃埔軍校的親密交往。當時鄧是黃埔教育長，周是政治部主任。周透露了二人在 1930 年（應是八月上旬）的一段無人知曉的往事：鄧和周在大連駛往上海的輪船上偶遇。其時，鄧剛結束歐洲之行，而周則秘密訪蘇歸來，他化裝為商人。鄧為邂逅而歡欣鼓舞，他向周伸出了手，但對方反應冷淡，說，先生，你認錯了人。周礙於黨的紀律，他不能與鄧接觸。鄧又請人遞兩次條子，要求與周晤談，但終為所拒。當時中共把斯大林的指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奉為圭臬。周恩來對先父說，他對不起鄧演達，也為當年兩黨未能合作而深感遺憾。

毛澤東奉魯迅為民族偉人，但對魯迅繼承者胡風和馮雪峰毫不容情。異曲同工，毛對鄧演達的後繼者也絕無憐憫之心。章伯鈞、黃琪翔和農工民主黨人無須有反毛之意 ，他們的命運在毛的戰略中早已註定。

毛澤東和周恩來是政治權術的行家裏手，豈能有婦人之仁。既已打倒國民黨蔣介石，民主黨派的歷史任務已告結束，章伯鈞、羅隆基能不收斂心性，安心高位厚爵乎？整風反右為的是「引蛇出洞」，政治上老練如章羅者，豈可浮躁如大學一年級學生乎？「肝膽相照……」一說乃文學語言，全無法律約束含意，豈可貿然信服乎？武漢有一位民主人士曾說：「肝膽相照，豈敢，豈敢！你的肝大我的膽小。」一針見血！

如今已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了，民主黨派做為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是革命對象了，毛澤東在私下和公開都說了這樣的話，能不在意嗎？建政初期，劉少奇渾渾噩噩大談什麼「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 」，觸了大忌了。順便一提，我和弟弟陳斯驄（出身清華，時在東北設計院）以及先父陳卓凡「一門三右」實在難脫農工民主黨這個瓜葛。

下面說說一個普通民主人士命運的故事：農工黨廣東省委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幹部名叫鍾順源。此人面容黝黑，左眼角有一個深深的傷疤。他參加過抗日戰爭，在高炮部隊服役時受過重傷。勝利後他參加反蔣民主活動。某次，為逃避軍警追

捕，他從二樓跳下，左腳受重傷，從此不良於行。鍾順源性格鯁直，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在領導人面前，從不低三下四。反右開始，在揪出陳卓凡等「大右派」的同時，也把他揪了出來。

1958 年，鍾順源等廣州市「極右份子」二百餘人被遣至青海省勞動教養。多年後，鍾順源和「表現好」的難友若干人被釋返廣州。（順便一提，到七十年代，這批遣青海難友，倖存者僅十人）。此時已是文革中期，民主黨派已被「砸爛」，鍾要找一個收容他吃飯的地方已不可得。自此，他淪為貨真價實的乞丐。他住處是一間報廢了的倉庫，吃飯的地方是兩三家允許他幹些粗髒活換取一點剩飯的食店。鍾自信他會求得公道，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他堅持鍛煉身體，時而到珠江游泳。他寫了十數封信給「敬愛的毛主席」訴說冤情。回報是有的：一個早上，來了一批紅衛兵拉他去批鬥，要他跪在碎玻璃上，向主席請罪！

筆者和鍾順源有不淺的交情，曾責他「想當奴隸而不可得！」事後，他有所悟！大哭了一場。七十年代末，鍾的右派問題改正了，身體也垮了，癌細胞侵入了骨髓，確診後，活了兩個月。臨終，他給我一紙袋文件，說:「你看看這些東西吧，我太相信別人了！我沒有機會改正自己的執誤了。」紙袋裏大多是他寫給毛主席信件的底稿和一些思想檢查。

結語

從毛澤東的反右實踐中，可見他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或曰「整人術」）的諳熟。毛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什麼本錢，也知道他的子民的弱點何在。 反右是一場刻意策劃的政治謀殺，受害者不是個別人，也不只是一個群體。在毛的政治哲學裏，始終存在兩個敵人：實體的敵人和想像（或潛在）的敵人。1957 年，他要消滅的正是可能在十年八年後威脅他的獨裁政權的「幽靈」。與其說，毛的死敵是現實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如「章羅聯盟」），還不如說，毛已經看到了集合在大學校園裏的學生才是他的掘墓人。當年波蘭和捷克共產黨領導人看不到工會領袖瓦文薩和劇作家哈維爾的危險，毛澤東倒是知道到哪裏去發掘潛在的敵人。

中國能走上民主自由坦途嗎？果真如此，1957 年的大學校園本應是一片似錦繁花的萌芽幼苗，我的悲慘難友們本應有一個光明的前途！（二零零七年四月，舊金山）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78 年 4 月 5 日。
16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97 页。

抵抗極權的民間雜誌——《廣場》　　邵江

1. 雜誌和民刊簡述

雖然中國有悠久印刷文明，但是在 19 世紀以前，沒有民間雜誌存在的紀錄。唐朝時，邸報開始印刷，便於皇帝和官員之間傳送公文和新聞。宋朝時，一些被選擇的學者能夠有機會閱讀一種特殊類型的邸報，這種邸報禁止刊登敏感新聞譬如災害、軍事資訊、和政府秘密。

英文和法文雜誌一詞來源於阿拉伯語，是「儲存貨物的倉庫」。雜誌更進一步被引申作為思想倉庫。在歐洲，雜誌誕生於 17 世紀下半葉。他們通常彙集了各種文體，內容包含藝術、文學、哲學、科學等。

雜誌形成比「雜誌」這一名稱出現更早。「雜誌」的同義詞有「刊物」、「學報」、「日刊」、「週刊」、「月報」、「季刊」、「年鑒」等。雜誌的共同的特徵如下:

1. 文體混雜，文本開放。
2. 影響公眾輿論。
3. 固定出版。
4. 雜誌側重評論而不是單純的新聞報導。
5. 一本雜誌複製多份。

在中國大陸最早的雜誌是一份中英文雜誌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20 年創刊於澳門，內容涉及基督教、新聞和科學。據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記載，1862 年 John Macgowan 出版了 Shanghai Miscellany(1862-68).1，中文翻譯第一

次在近代報刊中使用「雜誌」。雜誌有兩個字構成。根據說文解字：「雜」，五彩相會；「誌」，紀錄。

1896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有三份中國人辦的雜誌出現，其中《強國報》和《時務報》主張君主立憲制，要求政府改革，同年《蘇報》創立，雖然這些刊物以報命名，但是從內容和形式而言，它們更接近現代雜誌。1896以後到辛亥革命期間，中國非官方雜誌呈現快速增長，許多雜誌提供辯論平臺（改革或革命）以及介紹新思想，同時雜誌兼具倡導推動政治和社會變化，組織聯絡等功能。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加強審查報刊，一度限制了報刊的發展。新文化運動期間，報刊發展迅速，期間《新青年》和《新潮》是兩本最有影響的雜誌：傳播科學、民主、人權，自由主義，和普世主義，這兩本刊物同時為為「五・四」運動和隨後運動提供了思想平臺，並創造了聯繫網路。

因為雜誌和報紙常常一起發行，簡稱報刊。許多非官方報刊批評掌權者，執政者常使用各種手段壓制，賄賂、監禁、甚至刺殺作家編輯或關閉報館。其後果往往是增加了這些報刊的影響，社會公開支援，抗議和壓力常常迫使統治者妥協。特別在「五・四」運動以後，總體上政府控制社會能力下降，非官方的報刊成為影響大眾最重要的媒體形式。1911年到1949年，非官方的雜誌不僅廣泛影響政治和社會，而且它們在許多方面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如藝術、文學、娛樂、時尚。特別是雜誌寫作和發行促進了新文化深入傳播和新文體形成。

中共執政的1949年到80年代，民間雜誌（民刊）成為民間的主要傳播媒體。民刊不接受中共黨團組織的指導，是自發形成的，不需要依賴中共及週邊組織承認和支援。民刊也是在沒有結社自由的情況下的一種結社方式，有時形成跨區域網路公民抵抗。研究民刊意義在於：挖掘和部分恢復被極權摧毀的歷史，重現歷史和社會的多樣和複雜，尋找結束歷史的暴政和暴政的歷史為一體的各種專制和極權可能性，探索建立公民社會的可行性。

中共在1949年奪取政權以後，全面建立了極權制度。汲取清朝覆滅和國民黨失敗的經驗，中共嚴密地控制敏感新聞和思想傳播，獨佔媒體。中共對涉入民刊的人經常以反黨或反革命集團罪論處，民刊的許多編輯、參加者和支持者常常被監禁、勞改、勞教或處決，民刊被視為非法刊物予以取締。在許多情況下民間雜誌不能公開存在，不能像普通刊物一樣定期出版，它也被稱為地下雜誌。

2. 中共獨佔媒體和消滅民刊

我將探討中共四個鞏固政權的方法。這四個方法是軍事統治、政治運動，獨佔媒體和報刊控制。軍事統治通過軍事管制委員會（軍管會）血腥立威，迫使社會恐懼和臣服新的統治者。政治運動規範人們的思想，強迫人們遵守中共的統治規則，其主要方法是改造、利用、分化、遮罩和消滅等。

1921 年中共誕生以後，中共視雜誌和所有其他媒體為革命思想武器，傳播它的意識形態以影響公眾。毛澤東視媒體為筆桿子，與槍桿子一起作為最有效奪取政權的工具。中共將雜誌塑造成為反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力爭在宣傳和傳播上擊潰國民黨。雜誌對中共而言是倡導暴力革命，協助武裝奪取政權的工具。在中共奪取政權後，雜誌是建立極權鞏固極權和洗腦的工具。

(1) 軍事統治

在內戰期間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共消滅了或關押了大量被它視為危險份子的人，同時嚴格執行社會管制和媒體控制。1947 年以後，中共在新佔領的區域設立軍管會，中共中央軍委和地方黨委直接控制軍管會。在 1947 年和 1953 年之間，軍管會作為這些地區的最高行政管理機構。雖然軍管會有時包括少量中共承認的民主黨派成員，這些人嚴格處於中共控制之下，或是中共的秘密黨員，他們一般擔任一些不重要的職務。在涉及軍事安全財政通信媒體和外事等領域，全部由中共直接控制。中共執行下述步驟鞏固政權，獨佔媒體。首先，接管國民黨政府辦公地、警察局、軍事基地、財政部門包括銀行和工廠和文化機構包括學校和出版社。其次，幾乎所有非中共報刊被沒收，軍管會同時指示或嚴密監控所有報刊的編輯和發行，僅存的非中共報刊被改組。如果他們希望重新出版，必須重新得到軍管會的執照。第三，禁止絕大多數外國媒體出版社和新聞記者活動。中共允許的個別外國通訊社報導，為中共政權在國際上進行公共宣傳服務。同時這些外界報導根據中共對內宣傳需要，選擇進口，加強國內宣傳。例如，有四位外國新聞工作者允許報導關於首次政協開幕的新聞。這四名記者，一位來自蘇聯塔斯社，一位來自義大利共產黨團結日報，二名來自北朝鮮朝通社。在韓戰期間，中共組織新聞代表團訪問了北朝鮮，英國工人日報的 A lan Winnington 和蘇聯新聞工作者被允許跟隨團報導。

中共將媒體傳播作為國際關係的一部分，同時作為塑造意識形態和統治基礎的一部分。中共加入蘇聯陣營，進口蘇聯極權意識形態並模仿其統治手法。同時中共也尋求與西方一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試圖保留在西方的影響，但阻止這些國家的民主思想和實踐進入中國，在中國建立集古今中外獨裁政權為一體的極權制度。

在 40 年代，雖然由於投資和技術的限制，設立非官方電臺比較困難，在國民黨控制區域仍然存在一些非官方電臺。而 1949 年以後，中共沒收了所有非官方的電臺。中共控制的媒體不僅接管了國民黨黨報刊同時佔領了所有非屬國共兩黨或中共承認的民主黨派的報刊。比如中共上海機關報《解放日報》接管和佔領了中國近現代歷史最長的報紙《申報》。在解放軍佔領一個地區之前，中共的地下組織已記錄這個地區所有媒體的政治傾向。在軍管會達到這一區域後，對這些媒體採用不同的措施。2

1949 年 11 月，中共設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總署和新聞總署，監控不同的媒體，協助軍管會控制媒體。1950 到 1952 年，中央政府頒佈了至少四個有關管理書報刊的章程。1)《全國報紙雜誌登記辦法(草案)》，2)《管理書刊出版印刷業發行暫行條例》，3)《期刊登記暫行辦法》，4)《關於查禁書刊問題的指示》。3 第 1 個規定取消了民間報刊的合法存在。第 2 個和第 3 個章程要求現存雜誌（不包括中共機關刊物）得到地方當局的執照，接受中共宣傳部和安全部門的直接監測。第 4 個章程是關於禁止和銷毀「反動」書籍和雜誌。另外，中共更有超出這些規定的人事監控和潛規則。在 1952 年以後，出版總署撤銷，監督控制和銷毀報刊書籍等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控制和負責。

（2） 政治運動

中共執政初即開始了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如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主要針對中共外部敵人，土地改革先收買人心，然後迫使農民為奴。「抗美援朝」對外形成和鞏固它的國際聯盟，對內強化中共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和向心力。這一系列運動後果是人們被洗腦，增加人們的恐懼和絕對服從的意識。中共開始建立單位制度，監控個人思想和控制個人的經濟來源。在出版、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領域強迫業者加入新組成的單位，剝奪其獨立於政府控制的生存狀態。單位變成控制個人的極權制度的基本單位。

中共對知識份子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目的是強化它的意識形態。中共的思想改造運動(1951-2)是強迫出版、教育、文化和健康等領域的知識份子跟隨黨的基本路線的一部分。使他們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必須參照中共的樣本4自我改造。個人是否在改造中過關，必須經過中共單位黨組織的首肯。

思想改造完成不意味中共信任了知識階層，中共繼續以批《武訓傳》，批胡適和俞平伯，清除非中共思想的影響，迫使知識界臣服，接受中共意識形態的準則和教條。知識界人士人人自危，憂慮被清除或「趕不上時代」，被當成追求資產階級思想的典型。與此同時，中共向新培訓的學生學者灌輸他們將作為社會主義知識份子，以取代資產階級學者。這樣取而代之的宣傳和操作模式成為中共控制社會的一種長久戰略：在不同時期標識不同的人群，對特定的人群許諾和標識他們為優等階層或「統一戰線」，動員他們圍攻、監視和鎮壓中共標識的主要敵人。

1955、1956年的肅反運動是消滅敵人長期戰略的一部分。但是，這次尋找的敵人主要集中在中共內部和它的盟友之中。5「胡風反革命集團」是這次運動的主要成果之一。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胡風和這次運動的主要受害者的基本政治傾向是反對國民黨獨裁，他們曾經被中共標識為文化盟友。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始，胡風寫過《時間開始了》等讚頌毛澤東和中共的詩篇。1954年胡風三十萬言上書中共，批判中共的文藝政策。中共在這次運動中將許多支持或同情胡風的人投入監獄或送到勞改營。

（3） 極權媒體

像蘇聯布爾什維克一樣，中共將媒體徹底改造為極權媒體，充當宣傳機器和灌輸其意識形態的工具。對中共而言，雜誌與其他媒體譬如電臺、書或報紙一樣，是執行它的統治意志的工具。在1949年和1957之間，中共軍事化管理媒體，同時控制流通領域，贖買或沒收民間出版社，直接控制媒體，從而形成維護政權控制社會的一體兩面：宣傳和審查。

1911年到1949年之間，民間出版尚有公開存在和與權力博弈的可能。在1949年以後，民間出版和發行的外在條件最大限度被毀壞了，新的民間出版幾乎完全不可能。在極權制度下，宣傳和審查的結合，使人們難以形成獨立意識，更困難的是形成集體抗爭，保護公民權利。不間斷媒體洗腦和中共運動強迫人調整他們的忘卻和記憶。忘，是忘掉發生過的反抗，忘掉被抹煞的聲音；記，是記憶被灌

輸的謊言，記憶不斷被篡改的歷史。忘和記的相輔相成，早已是中國歷史敘述的一大特色，中共把這一特色發揮到淋漓盡致。

最具諷刺意義的是中共批判國民黨出版不自由，利用媒體的有限自由和空間，輔助武裝奪取政權；1949 年攀登上權力高峰後，便開始系統地消滅所有非官方的媒體。幾家民主黨派的雜誌陸續被改造成黨的宣傳工具。同時中共使用了邸報模型，對不同級別的中共官員提供等級不同的消息。

中共控制了書籍和報刊的發行、郵政、鉛印設備、紙張供應。圖書和雜誌的發行由中共組建的新華書店負責。少量私有出版者通過中共審核後，發行由中共改造後的三聯書店控制。不久三聯的這部分業務就劃歸給了新華書店。

中共奪取政權初期，個別中共信任的人申請辦雜誌尚被允許註冊，但他們的發行依靠官方控制的渠道。而官方部門拒絕發行這些非官方的雜誌，這些雜誌均無疾而終。胡風主編的《起點》曾被允許登記，但三個月後即停刊，因為所有的流通領域部門都拒絕發行。許多出版業者曾反對國民黨的新聞和出版控制，但他們在中共執政後不僅自己服從了中共，而且要求他們的同業自我審查。6

在 1949 年和 1951 之間中共完成了對所有民間出版的控制，所有 1949 年以前建立的非中共出版和印刷機構都被接管、沒收或整頓。1948 年 11 月，中共中央頒佈〈關於新解放城市中中外報刊通訊社處理辦法的決定〉，宣佈「對於私營報刊與通訊社，一般地不能採用對私營工商業同樣的政策。」7 對私營工商業，若中共認為與國民黨無關，可以允許其存在。但所有的民間出版和印刷機構全部由軍管會接收，不管與國民黨有無關係。在這些行業的私人投資即使沒被沒收，也必須退出。

(4) 報刊控制

中共在 1949 年到 1951 之間完成了對所有民間雜誌的接管或關閉，同時，控制所有的印刷工廠和流通領域。大量民間雜誌記者編輯和發行人員被解僱，有的被捕或被殺害。1945 年，中國大陸有 1848 本雜誌(146 國有)。在 1949 年和 1950 年之間，只剩下 295 本雜誌。8「據新聞總署 1950 年在萬名記者中的統計，新聞記者中共幹部所占比例是 99.3%. 在 6708 名採編中，1949 年前在非中共新聞機構工作的比例只占 12%。」9

《廣場》是 1949 年後非官方雜誌再次誕生的標誌。

3. 《廣場》 無權者的力量

赫魯曉夫在蘇共 20 大發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以後，中共高層傳達這份秘密報告，但是嚴格限制在社會上流傳。不過這份報告仍然通過不同渠道在一些大學師生中流傳。北大數學系助教任大熊翻譯了這份報告的一部分，分期刊登在北大圖書館佈告欄。1956 年 10 月，匈牙利公民抗暴運動開始，引起整個極權制度潛在的多米諾骨牌效應。10 在抗暴運動初始階段，中共封鎖消息，否認這一事件。在敦促和支持蘇聯血腥鎮壓後，中共將這次事件定性為反共反革命。11 但是一些大學生同情和支持匈牙利公民運動，更進一步思考蘇聯陣營和中國大陸的制度問題。

1956 年，1957 年，社會不滿和抗議增加 12，對中共執政壓力加大。1954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從屬條款有公民言論結社自由，蘇聯陣營也有類似的〈憲法〉。〈憲法〉中的公民權利是 1956 年匈牙利和波蘭初期合法抗爭的目標之一。蘇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曾搞過與中共五十年代初、中期的鎮壓和政治運動類似的運動，仍然沒能阻止五十年代的非斯大林化，於是毛澤東採取百花齊放和引蛇出洞互為表裏的鞏固極權的戰略：目的是消滅隱藏的敵人和取消任何合法抗爭的可能。

1957 年，許多人對中共的整人政策記憶猶新，並不相信中共的鳴放和整風運動，於是中共基層組織積極執行引蛇出洞的鳴放政策，說服和鼓勵人們在會上向中共提意見。然後選擇一些，刊登在官方媒體上。在北京大學，一些學生不滿意官方控制的鳴放，一些人希望幫助中共改善統治或對其共具體制度不滿，有一些更經歷了殘酷的肅反運動，也有的質疑政權的合法性，許多學生討論時政，開始表達他們自己的想法。從 1957 年 5 月 19 日起，大字報成為辯論論壇，同時成為不同於官方意識形態的思想流傳的媒介，脫離中共媒體控制的民間傳播形式。

5 月 19 日以後，北大黨委開始組織力量分割圍攻有異端思想的大字報的作者和支持者，組織官方學生會的刊物如《浪淘沙》、《紅樓》、《啄木鳥》、《六六六》13 等圍剿學生的異端活動。同時，中共封鎖北大民主運動的消息，調動宣傳機構宣佈「北大處於『無政府狀態』、『被反革命分子所控制』。」14

由於大字報傳播範圍有限，容易被覆蓋，這些大字報的作者和支持者希望聯

合起來，共同面對官方的圍剿和壓制，以及中共動員的大眾的圍攻，衝破其資訊封鎖。於是他們建立了社團《百花學社》，創立了雜誌《廣場》。這份雜誌將油印大字報（也稱油印小報）的分散個人和小團體聯合起來，形成了超越中共控制的公共表達和傳播方式。

「五・四」遺產

1919 年的「五・四」運動在北大留下兩個具有歷史象徵意義的建築，一個是紅樓，中共第一個馬列主義小組誕生於此；另一個就是民主廣場，當時五・四遊行集合和組織的地方。《廣場》名稱來源於北大民主廣場。在 5 月 30 日成立會議上，張元勳被選為雜誌編輯，他建議為這份雜誌命名為《廣場》。「現在北大團委和學生會辦了一個刊物叫《紅樓》，我們就辦一個刊物叫《廣場》，對著幹。」15 與會者都同意。北大大字報出現的最初幾天內，沈澤宜和張元勳在大字報民主牆中也曾經開闢一個區域，也稱為廣場。

《廣場》的封面「主要是火，只露出一點火炬的把。象徵傳遞五四的火種。」16《廣場》封面題字，複印魯迅手寫體 17。

《廣場》繼續大量油印有異端思想的大字報，《廣場》第 1 期也是惟一的一期油印了 500 本，也稱〈北大民主牆選輯〉，這期文章包括政論文，詩歌和散文，政論文至少包括下面 7 篇 18：

發刊詞

「五・一九」紀事

「是時候了」　沈澤宜	張元勳
論無階級社會中人之等級	談談
肅反論綱	江文
（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	王國鄉
怎麼辦？	燕遯符
我的控訴	顧文選

《廣場》準備以增刊的方式，向社會上散發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任大熊從圖書館借了英文版的英國《工人日報》，那上面刊有這份報告，因為文章比較長，由任大熊、陶懋頎和陳奉孝三人各取一部分翻譯了出來。」19 陳奉孝將他們

三人翻譯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與林希翎和她同學手抄的中文《秘密報告》對照 20，準備印刷，因官方鎮壓，未出。

《廣場》宣佈，「絕不受官僚主義者的左右。」21 但它始終面臨中共和它動員的大眾的壓力。另外，《廣場》必須協調內部以保持力量反擊官方和它動員大眾的壓制打擊。這批年輕人對中共的統治手法缺乏經驗：「我們都是窮光蛋，文藝修養也不夠。」22 但是，這是第一批在中共奪取政權以來，以自主生命踐行自己的思考，勇敢探索的年輕人。他們集體和公開地抗爭，警示大眾不要變成「抬轎手」，吹鼓手，或無頭腦的人。23

《廣場》稱「我們的〈廣場〉是真正『廣』的『場』，是一切不脫離社會主義的言論的講壇。只要為了『真善美』，不論什麼基調的歌都可以到廣場上來對年青人放開嗓子唱！」把「促進法制的建設與改造，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化」作為總目標。具體的步驟是「充分揭發三害（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事實」，「逐步把中心轉移到探討三害的根源，使大家明確認識問題不單是作風，而是牽涉到國家制度」。同時提出「輿論自由」、「取消出版的檢查制度」、「確保言者無罪」等要求，使「自己的社團成為當前群眾運動的核心」和「成為長久性的組織」，並「通過各種形式擴大影響」，直到「校外去的設想，（以致）面向全國。」24

中共執政以來，將廣場作為顯示極權力量和動員人們表達忠誠的場所。《廣場》雜誌從名稱、標誌、目標而言，顛覆了這個場所：「《廣場》為爭鳴而開，我們的《廣場》是百花齊放的地方！我們的《廣場》矛頭指向陽光下的黑暗！我們的《廣場》又是火葬場！……來吧！朋友們！到《廣場》上來！這裏有自由而新鮮的空氣，它可以震動你的聲帶，唱出你願意唱的個性的歌！」《廣場》對其成員而言，不僅是地理空間，更是個性自由的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間。

抵抗語言暴力

中共控制所有媒介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向社會灌輸它的意識形態和極權話語，以此使社會和個人徹底的臣服于極權的語言暴力，鑄造人們的思維和語言習慣。5 月 19 日運動以來，挑戰官方意識形態和話語的大字報和《廣場》經歷了使用官方語言解釋成不同的意思，轉換官方語言，顛覆官方意識形態和創造話語的過程。《廣場》和它的支持者稱他們張貼大字報、組織辯論和社團、創辦《廣場》

的事件為「北大民主運動」或「五·一九民主運動」25，取代官方定義的整風鳴放運動。許多《廣場》和它的大字報同道「開始並沒想幫助黨的整風，只覺目前壓制得厲害，要民主、自由這是正義的。」26《廣場》定位自己作為獨立的民間社會力量，而不是統治者操控和動員服務于統治者的群眾團體。27

中共聲稱民主是有階級屬性的。其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廣場》和它的同道們對民主闡述截然不同。首先，他們認為民主必須來自奮鬥，而不是權力者的贈予。「以為如今的民主是給你的恩賜，不！不是的，這民主是我們自己爭來的——裏面，還攪和著匈牙利人流的血液。」28另外，《廣場》同仁指出權力的合法來源，「強調公選領袖就是民主生活的表現」。29民主有超越階級的屬性。30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既是民主的一部分，又是公民權利。實踐這一權利是實現民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廣場》認同「五·四」運動的宗旨，它對「五·四」運動的解釋與官方不同。在我的採訪中，張元勳說「五·四是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的五·四。我們的五·四是叛逆，不是馴服。」31譚天榮說「五·四」是「當發展受到阻礙時必然的革命」陳奉孝說，「五·四運動的精神是民主和科學，今天的問題就是缺乏民主（精神），北大的精神是相容並包，主張各種思想和學術自由爭論……（應該）恢復北大的這一精神。」32

在我採訪的《廣場》成員中，沒有人提及傅斯年，羅家倫，胡適和《新潮》。我不能判斷是否官方批胡適對《廣場》成員有影響。或許他們是選擇暫時不觸及官方最敏感的禁忌？據當時編審《廣場》第一期的沈澤宜說，編委會收到稿件中有嚴仲強的《自由主義者宣言》，但沒有收入。33「其原因不是我們反對這篇文章，而是以大局為重，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壓力。」34

在中共統治初期，社會主義是不容辯駁的。大部分《廣場》成員對這一辭彙沒有疑問。張元勳說，「我沒有懷疑過這些名詞，因為當時沒有被鎮壓，對於這些口號、名詞沒有懷疑過。當時不認為這些口號有本質上的問題，只是在執行得時候出了偏差。偏離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後來的生活教育了我們。使我們認清了他們的本質。」《廣場》文章和許多油印小報中強調社會主義應該包含了人道和平等，他們相信社會主義是保障公民權利，開放，民主的社會主義。

張錫坤明確提出三害根源是國家制度問題。35他進一步質疑「在資本主義與

社會主義宣傳上的片面性」和「社會主義是天堂，資產階級的東西一切無可取之處」。他在文章中說，（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了）「嚴重程度不同的官僚制度」，這種制度的形成和鞏固依賴「思想懶漢，滿足于作應聲蟲……人民盲目」。在這種體制中，壓制人們的各種執行者從「白骨搭成的梯子往上爬。」他進一步質疑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體現在制度上。制度並非神聖不可侵犯。」36

由於中共控制了所有媒介，許多異端在官方語言中生成，借用、轉換、抵抗官方語言，擴展異端。《廣場》和它的許多油印文章成功地突破思想封鎖，轉換和創造話語，復活被遮罩的部分「五・四」傳統，重新界定社會主義。

雜誌潛力

《廣場》試圖恢復雜誌的最初特點，並為雜誌創造新的特點。在極權嚴酷環境下，雜誌大量複製較容易，是傳播多元（最重要是與官方不同）的一種媒體形式。《廣場》成立後油印了許多異端的大字報，大字報中包括分析官僚制度，批評殘酷鎮壓的文章。這些內容不可能或絕少出現在官方媒體中。一些學生幫助通過自己的交往渠道和通信傳播《廣場》油印的小報。《廣場》成員為支付設備和紙張大量變賣他們自己的財物，同時請求北大校長馬寅初個人捐助五百元。馬寅初開始同意捐贈，後來在壓力下食言。6 月 6 日《廣場》成員在大飯廳開始一小時的預訂，並講述《廣場》籌備的艱難和馬寅初毀約的經過。同情者和支持者捐助了兩千元 37。當官方組織圍攻時，募捐人群散去。《廣場》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民間募捐。

6 月 5 日《廣場》成員購買白紙三十令，直接送往北京印刷一廠，並將《廣場》第一期稿件留下，印刷一廠承諾鉛印《廣場》第一期。6 月 10 日，《廣場》成員去北京印刷一廠看樣和取貨，北京印刷一廠沒收了《廣場》稿件和紙張，並圍攻批鬥《廣場》編委會成員。38

創刊號鉛印被阻礙之後，在反右運動的高壓下，從 6 月 11 日到 21 日，《廣場》部分成員和支持者在 28 齋 426，以《廣場》編輯部的名義油印《北大民主牆選輯》500 本。房間外，許多不明身份的人在監視他們。用《北大民主牆選輯》名義代替《廣場》是為了保存力量，避免損失。39 同時《廣場》編輯部討論減少損失的其他方法，比如保持《廣場》成員的秘密聯繫和更名《廣場》，繼續出版。40

6 月 21 日中午，《廣場》成員和支持者在大餐廳空地，分發和售賣《廣場》。五百本少量為《廣場》成員和支持者保留，其餘分發和售賣完畢，「同時宣佈《廣場》暫時停刊」。41

已經出售的許多本《廣場》被黨委組織的人買走。下午，校園有線廣播號召燒毀《廣場》，多本《廣場》被燒毀。42 隨後北大黨委部署清查，多本《廣場》被查抄，一些人被迫將他們的《廣場》交出。43

反右結束不久，當局開始加強控制油印設備和紙張供應。

1957 年的大字報是公民抵抗的新媒體形式，又是中共動員大眾大批判的工具。大字報只有張貼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才容易有影響。它的缺陷是容易被新大字報覆蓋，同時不容易複製和保存。「5 月 19 日到 20 日在北大校園裏，張貼 162 份大字報，在隨後的幾天中大字報的數量增加迅速。」44 油印小報和雜誌克服了大字報閱讀區域固定的缺陷，更容易形成超出大字報的閱讀網絡。另外，雜誌無須在大庭廣眾之下閱讀。它的體積小，便於攜帶，保存和傳送。《廣場》從大量的大字報選稿和組稿，同時《廣場》編輯部油印了大量重要的單篇大字報，從這個意義而言，《廣場》變成了流動小字報。

北大民主運動中公開辯論、大字報、油印小報和《廣場》交互影響，促成《廣場》恢復雜誌原有之意和豐富的內涵，建立交叉索引，相互爭鳴和開放多元的平臺。在同一個平臺，廣泛的題材，風格和多元觀點反映在它的內容上：詩，短篇小說，評論，爭鳴和調查報告。

雜誌——底層公民抵抗行動

在五十年代，許多人熟悉中共對歷史進程的論斷，也熟悉列寧，普列漢諾夫和中共對雜誌的敘述：雜誌是組織武裝暴力集團、推動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思想和宣傳武器。45《廣場》與此不同，它從做具體的小事開始，「敢於行動，敢於創造」46，實現無權者的力量。

湯瑪斯·加里格·馬薩里克（Tomas Garrigue Masaryk）提出了二十世紀早期反抗極權主義的哲學。中共早期領導人李大釗曾引述他的平民主義，說「除在革命時期內，有用他（強力，或暴力）以壓服反對革命派的必要外，平時施用強力，適足為政治頹廢的標識。」實際上，馬薩里克思想並沒有強力壓服反對革命派（反革命）的思想，相反他始終強調人道精神 47 和公民責任，即從微不足道的

小行動開始，從權力的邊緣，自主地從底層抵抗權力的肆虐和暴政，維護人道和人的尊嚴。一個小的行動，比如辦一本民間雜誌，從權力的底層，不需要權力者認可，自主實現公民的權利和儲備民間無權者之力，最終可能改變力量對比。這不是一種革命思想。馬薩里克強調，挑戰穩定的暴虐制度，應該立足民間，開始自下自主的公民行動，一系列公民行動可能產生巨大的變化。在極權制度下，超越官方媒體的限制，書寫張貼大字報，創建民間社團和雜誌正是實現無權者公民力量的一部分。

與駕馭和控制社會的經驗日臻完善，防微杜漸地控制媒體，動員和威懾大眾無所不用其極的中共政權相比，雖然勢單力孤、缺乏資金和抗爭經驗，《廣場》成員書寫張貼大字報創立民主牆，辦社團，串聯，公共辯論，最終油印出版《廣場》，向大眾傳播，其影響滲入了中共媒體控制的薄弱環節。5 月 27 日《文匯報》報導了北大民主牆，形容北大公共辯論「就像海德公園」。「這篇報導在許多學校引起強烈反響。」48

中共逐漸發現大字報和民間雜誌挑戰它的體制集腋成裘的力量，借助基層黨組織不能有效控制運動和民間大字報和雜誌，於是動用鎮壓機器全方位剿滅公民抵抗和民間大字報油印小報和雜誌，強化宣傳部門作為監控和鎮壓一體的「閻王店」，從引蛇出洞的鎮壓轉化成防微杜漸的鎮壓，消滅民間大字報和刊物。但是，暴政很難消滅所有自主個體。一個個自主個體小的聯合行動可能導致未來巨大的變化。雖然民間自主抵抗在龐大的權力面前弱小和卑微，但它們聯合起來有潛力扭轉力量對比。

4　反抗極權和新極權

面對殘酷的鎮壓，參加「五・一九」民主運動和《廣場》的勇敢和追求獨立思考的人們，抵抗暴政維護人的尊嚴、自由和自主地存在和創造，實踐公民權利。參與《廣場》的顧文選、賀永增、劉奇弟、任大熊和張錫坤等在勞改中被殺或折磨致死，其他人勞改或勞教 22 年左右，許多人歷經磨難，九死一生。49 他們的努力將永久地被記住。

極權主義極權制度的組織原則和宣傳方法毀壞人之人之間所有獨立交往的空間 50，導致人們無法形成公民意識和公民聯合抗爭，保護公民權利。在 1957 年

的極權中國,《廣場》作為重要和主要紐帶，連接大字報和學生運動。反右開始後，他們面對外部的高壓和內部可能的分裂，在幾乎沒有得到社會和制度內部異議力量的支持的情況下作了一個月的抵抗。這是民間抵抗和組織網路抵抗的雛形。

《廣場》和許多抵抗極權的民刊雖然在高壓下沒能在社會上廣泛傳播，但是他們維護思想言論出版自由，抵抗權力的蠶食，維護公共話題，堅守公民集體抵抗的實踐，為後代的公民抵抗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廣場》為隨後的民刊提供了網路思想交流和組織模式。隨後的一些民刊成為在嚴禁結社自由的極權制度中一種潛在的跨區域社會聯絡網路，甚至進一步發展成有意識聯合抵抗極權制度的社會力。正如林昭所言:「集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強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

《廣場》意義在於民間自主反極權主義，這是對極權主義的真正威脅，它同時反對當今大陸許多雜誌的玩世不恭。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數十年的宣傳口號，真實的意思是以人民的名義為權力服務。在當代中國，當權者的意識形態興趣在於服務於權力和黨。對這個制度而言，從未有真正「為人民服務」，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這樣《廣場》有兩方面的遺產：它提出公民自主獨立思考非暴力抵抗，而不是中共的暴力、意識形態宣傳和利益結盟；從長遠看,《廣場》提出公民自主獨立思考非暴力聯合抵抗極權主義，也將對新極權主義的「和諧社會」和它的專制變種提出挑戰。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
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注 釋

1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 1927 年， 27 頁

2 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 第 2， 3 卷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1992 至 1999 年

3 〈出版 5 0 年大事記〉:
http://www.bigc.edu.cn/jigoushezhi/depts/pub/chubanweb/crs/hdjsh/50/main.htm;

http://209.85.165.104/search?q=cache:bmGfKpN_p_sJ:www.bigc.edu.cn/jigoushezhi/depts/pub/chubanweb/crs/hdjsh/50/49-58.htm；任不寐〈「新中國」出版管制五十年〉http://www.boxun.com/hero/renbm/13_1.shtml

4 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

5 丁抒:《陽謀》（香港：開放雜誌社，2006）第67－82頁。

6 陳偉軍:〈被放逐的邊緣話語——解讀建國初期文壇有關同人刊物的言說〉。

7 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2卷1197頁。

8 China Handbook， 1937-45，1954-55，Macmillan, 中國報刊投稿指南, 1954

9 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3卷53頁

10 王康：〈他們的悲劇，我們的宿命〉

http://chinesepen.org/tjwz/ShowArticle.asp?ArticleID=8173

11 同上

12 錢理群：〈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中國的農村、工廠與學校〉

13 張元勳談話

14 〈北大民主運動紀事〉，《思忆文丛》，

http://www.oklink.net/99/1208/sywc/index.html

15 張元勳：《北京大學１９５７》，１００頁，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

16 張元勳電話談話

17 張元勳：《北京大學１９５７》

18 張元勳：《北京大學１９５７》，１０３ 頁 ，參看沈澤宜談話

19 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

20 採訪林希翎，也參見王友琴：〈三名相關聯的文革受難者——任大熊、莫興齡、章漢夫〉，‘林希翎的男朋友曹夢飛是胡耀邦的秘書，有這份報告的中文譯本。胡耀邦當時是共青團中央書記，中共中央委員。陳奉孝請林希翎借來這份檔，和他們從英譯本作的中文翻譯進行核對。……林希翎，被判處十五年徒刑。曹夢飛秘書被判了七年徒刑，罪名是「洩露機密」。’

21 陳奉孝：〈聲明〉，《 思憶文叢 》

22 同上

23 參見張錫坤，王國鄉的大字報，《 思憶文叢 》

24 錢理群:〈發生在未名湖畔不應忘記的往事——記 1957 年的三個學生刊物〉

25 〈北大民主運動紀事〉,《思憶文叢》

26 楊路:〈我的發言〉,《思憶文叢》，參看採訪沈澤宜

27 參看思憶文叢中張錫錕、葉于勝、王書瑤、沈迪克（談談）、嚴仲強、趙清，楊路，陳奉孝，譚天榮的大字報，趙清言論見張元勳:《北京大學１９５７》和陳奉孝談話

28 王國鄉：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

29 葉於泩:〈我看民主〉,《思憶文叢》

30 楊路:〈我的發言〉,《思憶文叢》

31 張元勳談話

32 陳奉孝談話

33 張元勳:《北大１９５７》，１０３頁

34 沈澤宜談話

35 張錫坤:〈三害根源〉,《 思憶文叢 》

36 同上

37 陳奉孝談話，沈澤宜談話，參張元勳:《北京大學１９５７》，１１４頁

38 同上

39 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參張元勳:《北京大學１９５７》

40 同上

41 錢理群:〈發生在未名湖畔不應忘記的往事——記 1957 年的三個學生刊物〉

42 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參張元勳:《北京大學１９５７》

43 徐雲龍採訪

44 張元勳:《北京大學１９５７》，５９頁

45 錢理群:〈發生在未名湖畔不應忘記的往事——記 1957 年的三個學生刊物〉

46 〈北大民主運動紀事〉,《思憶文叢》

47 參看Ｊohn, Keane, Vaclav Havel: A Political Tragedy in Six Acts, Bloomsbury, 1999, p276, 參崔衛平譯:「說出真實總是有意義」《哈威爾文集》

48 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３卷，２０３

49 錢理群:〈發生在未名湖畔不應忘記的往事〉，參張元勳《北京大學１９５７》，陳奉孝《夢斷未名湖》(勞改基金會， 2005)， 五柳村等。

50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rvest Books; New edition, pp378-555, 1973

1956—1966 中國大陸民間思潮個案研究　　錢理群

（一）民間思潮的特點與研究意義

首先要作一點題解：我所說的「民間思潮」的含義，特點和研究民間思潮的意義。在我看來，「民間思潮」大概有四個特點：一是思想的非主流性或異端性；二是其傳播方式是民間的：或以大字報形式公開張貼，或以手抄稿秘密傳遞，或僅存於私人日記和文稿中，經後人整理才得以問世；三是其作者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更有為其獻出生命者；四是其思想成果被強迫遺忘，以至我們今天的研究首先遇到的就是資料的匱缺，只能作個案討論。

問題的嚴重性當然不只是造成了學術研究上的困難。應該看到，「強迫遺忘」是中共當局的一個基本的，影響深遠的文化國策。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對歷史記載的「重修」。魯迅揭露說，這其實就是對古書大肆刪改，或毀或抽，目的是將歷史的血腥全部抹掉 1。而現在的做法就更乾脆，也更徹底：不讓當事人回憶，不讓後人討論，不許學術界研究，從一開頭就不予記載，不准進入歷史的敍述，進而從根本上消滅歷史的記憶。

這樣就造成了對歷史的兩大遮蔽：一是如反右、文革這樣的歷史的錯誤與罪惡，歷史的血腥氣被遮蔽了，真的成了「一片光明」；一是歷史上的血性人物（反右、文革都不缺少這樣的硬漢子）被遮蔽了，只剩下「良民」和「順民」。 這樣的兩個遮蔽就必然產生兩個嚴重後果。

一方面，歷史血污的被遮蔽，就意味著造成反右和文革這樣的歷史錯誤與罪惡的觀念，體制，以至思維方式、言說方式，都沒有得到認真的反省和清理，沒有產生實質的變化，這樣，反右、文革不僅有重演的可能，而且是一種現實性，

對當今的中國，反右、文革，不僅是歷史，更是現實：事實上，反右、文革正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規模，不同的範圍不斷地上演。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嚴峻的現實：我們並未從實質上走出反右、文革時代。

另一方面，思想先驅者被人為的遮蔽與抹殺，他們的思想成果不能為後人所知，這就導致了思想的不斷中斷，每一代人不能在前人的思考已經達到的高度上繼續推進，而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從頭開始：這應該是中國現當代思想始終在一個低水平上重複的重要原因。而這種精神傳統的硬性切斷，如魯迅所說，對整個民族精神的損傷也許是更大的：「堅卓者」的「滅亡」，必然導致妥協、鄉願之風盛行，活命哲學猖獗，「遊移者愈益墮落」，實際是民族精神的墮落：「倘中國而亡，操此策者為之也」。2

因此，我們今天強調「民間思潮的研究」，就是要向「操此策者」表明我們「拒絕遺忘」的意志和決心：這是關乎中國的歷史——現實——未來發展的思想、文化全局的大事。

民間思潮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意義，還關係著如何觀察和看待當代中國這樣一個大問題。這裏，我要向諸位推薦魯迅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魯迅提醒我們：「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上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要看他的筋骨和脊樑」；「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只不過他們「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而這樣的「筋骨與脊樑」也同樣存在於當今中國社會，他們也同樣「被摧殘，被抹殺」，而且似乎還沒有進入我們的許多中國觀察者的視野之中。因此，魯迅的另一個提醒就非常重要：觀察中國社會，不能只看「那些狀元宰相的文章」，而要「自己去看地底下」，3 看底層、民間社會裏的那些默默奮鬥者，犧牲者。

這背後是有一個歷史觀的問題的：不能眼睛只盯著占主流、正統位置的「正史」，而忽略了非主流、非正統的民間「野史」。當代中國，不僅是一個極權統治的中國，而且還存在著一個反抗極權統治的民間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思想、文化史，不僅是一個極權意識形態的建構的歷史，還是一個不斷反抗、解構極權意識形態的歷史：正是這兩個中國，兩個歷史，它們之間的矛盾、衝突、互動，才構成了真實的當代中國史。長期以來，對民間史的忽略和漠視，使得我們對中

國當代史的研究，實際上是「跛腳」的，現在提出「民間思潮研究」的課題，正是為了建立一個更為健全，也更符合歷史事實的當代中國史，特別是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結構。

這就說到了我們今天會議的主題：1957 年的反右運動。我們考察 1957 年中國發生的事情，就不能只看上層鬥爭——其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但卻不能因此而忽略底層社會所發生的事情：這就是我所要著重報告的——

（二）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 1957 年中國校園民主運動

1957 年所發生的，實際有兩個運動，一個是毛澤東所領導發動的自上而下的整風運動，與此同時，在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中國大學校園裏，還掀起了一個自下而上的民間思想、政治運動。正是這兩個運動引發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黨內各種力量的巨大震盪，各種矛盾的交織，導致了最後的反右運動。

對於前一運動，我們已經有了許多研究，而對校園民主運動卻多有忽略，這當然也有它的道理：因為這樣一個民間思想、政治運動是在響應毛澤東的整風運動的號召的旗幟下進行的，而且許多學生是被捲入的，未必有那麼大的自覺性；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運動的發動者和主要骨幹，卻是有相當的自覺性的，而且在發展的過程中越來越明確了自己的目標與要求，在後來成為北大右派大本營的《廣場》發刊詞上就旗幟鮮明地指出：「這個運動已遠遠超過了黨內整風運動的範圍，而且有了偉大的社會思想意識大變革的巨大意義」，「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價和探索」，這將是一場「社會主義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4 在另一篇編輯部寫的文章裏，則明確地自我命名為「北大民主運動」，並指明這是一次「爭取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自下而上地爭取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運動」。5——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五・一九民主運動」的發動者對同樣發源於北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傳統的自覺繼承；我因此曾經提出了北大歷史上的三次輝煌，即 1919 年的「五・四」，1957 年的「五・一九」，和 1989 年的「六・四」，都是影響全國的政治、思想、文化運動，其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根據我的初步研究，以北大為中心的 1957 年中國校園民主運動，它既是中國五四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又是由蘇共二十大引發的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民主改革運

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主要訴求有四。

首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其代表人物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林希翎，北京大學的龍英華，錢如平，沈迪克，北京航空學院的周大覺等。這是這一代中國大學生的特點，由於所受到的教育，他們大都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當林希翎在著名的北大演講中提出要反對「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6 時，得到了廣泛的回應，不是偶然的。在這一代人的理解中，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包含兩個主要內涵。一是「社會主義民主」。龍英華因此提出：「我們有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還應有個社會主義民主化」，7 並且有這樣的強調：「要形成和發展這樣一種民主，不是硬搬蘇聯的形式，更不是販賣西歐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土壤中生長的民主制度」。8 在 1957 年的大學生看來，當時的中國破壞社會主義民主的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制不健全，民主權利沒有嚴格的可靠的保證」，二是「權力的高度集中」。這一代人理解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另一個內涵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因此，1957 年中國校園爭論最為熱烈的話題是：「特權階級」是否已經或有可能從社會主義體制內產生，以及如何防止特權階級的產生和發展？周大覺、沈迪克、錢如平等人都指出：「隨著舊的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生產資料佔有，主要掌握在軍政要人手中」，「分配不合理」，社會地位「不平等」，「日常生活中各種待遇均論等級」，「已開始自覺地形成一個社會集團，他們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9 在他們看來，這正是構成了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根本威脅。

大學生們在強調社會主義民主時，特別突出了「維護憲法的尊嚴，人權的尊嚴」的訴求，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學的劉奇弟，清華大學的羅蘭，南京大學劉地生等。他們強烈要求「真正把憲法規定的人權還給人民，使六億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利」，並且從理論上說明黨與國家的關係：「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党，但這不等於說共產黨就是國家」，提出「應該改變以往把黨放在國家之上，以黨的利益代替甚至超過國家利益的做法」，10 要求確認國家憲法的至高地位，走「依憲治國」的道路。

大學生們的第三個訴求，是要求「重新估定價值」的思想啟蒙，精神的獨立、自由與解放。北京大學的譚天榮、張元勳、沈澤宜等人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

們因此而質疑「黨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黨神話」；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絕對化，終極化與宗教化，要求恢復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本質，以發揚其本來具有的批判性；同時呼喚「救救心靈」，要求從党文化的精神禁錮和所造成的精神病害（如思想的僵化，對一切不懂的東西的無條件的仇恨的愚昧，表演人格，人與人關係的猜疑、冷酷和相互殘害等）中解放出來，爭取獨立思考、言說的權利。11 因此，1957 年的校園裏的思考，包含了一些更為廣泛、更深層次的思想、文化問題，還出現了《自由主義者宣言》、《利己主義者宣言》，這都是很值得注意的。

1957 年的大學生在政治上的主要訴求，集中體現在北大第一批大字報中陳奉孝、楊路、張景中等提出的五大主張：「取消黨委負責制，取消政治必修課，取消秘密檔案制度，取消留學生內部選派制度，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12

從 1957 年 5 月 19 日開闢北大「民主牆」，到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發出反右運動的動員令，不到二十天的時間，中國的大學生卻提出了如此廣泛、重要而深刻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真正體現 1957 年中國政治思想、文化上的深度與意義的，應該是這些校園裏的民間思考和吶喊。但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都被扼殺了，所有的言者都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但反右運動又同時培育了自己的審判者和掘墓人：這大概是運動的發動者所未曾料及的。

於是，在反右運動以後，又有了——

（三）林昭、顧准、張中曉對極權體制的三大批判

首先要提到的是林昭。我曾這樣談到林昭的意義：「當大多數人屈服於反右運動的淫威時，林昭反抗了！當我們低頭接受改造的時候，林昭昂首拒絕了！當我們沈默時，林昭發出了生命的絕唱！當我們放棄了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追求時，林昭在中國更高地舉起了自由、民主、人權的旗幟！當我們屈辱為奴時，林昭成了頂天立地的大寫的人！」

更彌足珍貴的，是林昭的理性思考。13 她根據自己對反右運動，以及反右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的獨特觀察與思考，獨立提出了「極權社會」的概念，從而實現了思想上的一個重大突破。她並且對中國式的極權社會的特點，作出了六個方

面的概括：即「極權統治的警察國家」;「以血和仇恨來維持統治」;「極權寡頭」;「唯我主義的世界觀」;「愚民政策」;「對青年的欺騙和利用」。應該注意的是，林昭對極權體制的政治批判，同時引發了刻骨銘心的自我反省：自己的青春激情為什麼會被利用？如林昭所說「在嚴肅而沉重的自我審判中林昭對於自己的責備那是比別人之別有用心的提問更要尖銳而嚴厲得不知幾多」。於是，作為一個清醒的覺悟了的自由戰士，林昭在反右以後的「萬馬齊暗」中，發出了「還我自由與人權」的呼喚，這是足以驚天動地的。

而且林昭還付之行動，她和一批右派一起組織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提出了八項政治主張：「一，國家應實行地方自治聯邦制；二，國家應實行總統負責制；三，國家應實現軍隊國家化；四，國家政治生活實行民主化；五，國家實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六，國家允許私人開業，個體經營工商業；七，國家應對負有民憤者實行懲治；八，應當爭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國家援助。」14——林昭和她的戰友是在 1962 年提出這樣的未來中國的藍圖的。這是和同時期毛澤東所提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針鋒相對的另一條治國理念與路線，儘管隨後的中國歷史走的是毛澤東的路線，但其超前意義卻是不可否認和低估的。

而林昭對自由的理解更是超前的，她提出了「完整而不可分隔的整體自由觀」:「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被奴役者不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不能「把自己的鬥爭目的貶低到只是企望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並以自己的柔弱的身軀進行拼死反抗的情況下，提出要走出「以暴易暴」的歷史怪圈，要根本改變「以一種奴役形式代替另一種奴役」的歷史的思想與信念，這實在令人嘆服和敬佩。

林昭的政治批判之外，還有顧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早在 1956 年，顧准就在蘇共二十大的啟示下，提出「一切問題都要重新估價」15，並對「如何看待當代資本主義」16，「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17，「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黨的評價」18 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思考，並提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概念 19。1959 年他又以戴罪之身繼續思考「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立與相互吸取」20，「馬克思主義中的黑格爾式的絕對主義的印記」21 等尖端的思想、理論問題，並宣稱「我接受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自然主義」22。

最值得注意的是，1959年、1960年間，顧准在河南農村勞動改造期間，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及其所造成的「大饑荒」的理論思考和分析。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實質是「國家和農民的衝突」23。他認為這是一種「社會主義史前期」的「羊吃人」現象：所實行的是「離開經濟手段而用政治手段實現經濟目的」，「城市中心主義」的「拼命刮削農民」的「建設」路線，是「以馬列主義的人口論，恐怖主義的反右鬥爭，驅饑餓的億萬農民從事過度的勞動，以同時達到高產、高商品率的農業與消滅過剩人口」的目的24。

因此，顧准始終關注並努力揭示的，是「大饑荒」背後的體制問題：1，以「人民公社」為主體的組織形式，將農村勞動力從生產到流通、分配、消費、生活全面控制起來，以形成人身的依附；2，用「戶籍制度」將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禁止城鄉交流，形成城鄉二元對立結構；3，割斷有可能成為「農民代言人」的知識份子與農民的聯繫，並吸納農村有文化而又忠實的人才，以形成自我控制機制，同時不斷發動以遏制所謂「農民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為中心的階級鬥爭，以消弭任何不穩定因素，達到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和農村社會的全面而穩定的控制，將農民大批死亡的後果嚴密控制在農村範圍，不使其擴散為全民大恐慌25。——這些分析，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理論的鋒芒與力量。

而另一位因胡風案件而被投入監獄的青年理論家張中曉，在因病保釋就醫期間所寫的《無夢樓文史雜抄》、《拾荒集》、《狹路集》裏，所關注與思考的，是極權體制下的精神問題。

他揭示了中國式的極權精神統治的幾個重要特點。首先是「絕對的光圈」的籠罩。所謂「絕對真理」、「歷史必然性」、「國家至上」、「公共意志至上」等等，最後都落實到「假先知」頭上，製造党神話和領袖神話：他們是絕對真理的化身，共性和歷史必然性的體現，國家至上利益的代表，公共意志的執行者；服膺於絕對光圈，就是服膺于党和領袖，落實為「行動獨斷主義」26。

張中曉指出，極權精神統治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不斷突破道德底線的「流氓政治」，和不斷製造假像和幻覺的「道德者政治」的結合27。——這大概就是「流氓帝王」和「道德宰相」的結合，其實就是中國傳統的「霸道」與「王道」的交替使用。

其三，極權精神統治一方面「以堅強有力的（國家，黨）意志，去奴役無數

軟弱的意志和無意志」，另一面，又在「無知」的愚民和年輕一代中煽動非理性的「激情」，這樣的「無知和激情的交織」，就造成了中國特色的「群眾專政」，將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年輕一代培育成非理性的狂熱的暴虐的野獸與魔鬼 28。這後果是十分嚴重的。

張中曉還討論了極權精神統治「對待異端的辦法」，這大概是最能顯示中國特色的：基本上不採取肉體消滅的辦法，而著重於精神迫害和控制，實行所謂「思想改造」，張中曉將其稱之為「世俗權力在精神王國揮舞屠刀」29。

在張中曉看來，這樣的中國式的極權精神統治極其嚴密，無所不在，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病害：他將其概括為「僵化與仇恨」30、「恐懼」31、「怯懦」32 和「虛無」33，其結果就是培育了「廉價信徒與廉價叛徒」34。——這樣的病害大概是延續至今的。

張中曉還提出了一個獨特而深刻的命題：在極權精神統治下，不僅會產生「權力的腐蝕」，還有「壓迫的腐蝕」35。當人處在被壓迫的地位時，同時就處在走向「神」和「獸」的十字路口，「天國」和「地獄」的分界線。專制主義的壓迫，由此造成的人的孤獨感，受壓抑感，屈辱感，不僅會激發人的正當的憤怒和反抗，也會造成精神傷害，突出地表現為心靈的「陰毒」：對人和人性的絕望，不信任，對他人和社會的敵意，對愛和溫暖的排除，造成人性的硬化，粗暴，乖戾，不近人情，形成受迫害者自身的精神黑暗 36。而另一方面，精神統治者、壓迫者的思維，邏輯，以至語言也會滲透到被迫害者的心靈深處，甚至支配其行動，只要有條件，自身也會成為新的精神壓迫者：這才是其真正令人恐怖並不可饒恕之處。

因此，張中曉指出，受迫害者，甚至反抗者，都不會自然成為「人」，而必要自覺地高揚自我人性中的神性，內心的光明，壓抑獸性，鬼氣，這才能達到精神的超越和昇華。我們不難從前述林昭走出「以暴易暴」怪圈的自覺，張中曉對「壓迫的腐蝕」的警覺，看出他們都已經達到了這樣的超越，既「信深守固」37，又具有「理性光明」38：這本身都是能給後來者以啟示的。

（四）六十年代初校園裏的地下新思潮

最後，我們還是回到校園裏來。根據初步的研究，可以斷定，大概在 1963 年到 1966 年間，中國校園裏，繼 1957 年的反右運動之後，又湧動著一個「懷疑

主義」的地下新思潮。但基本上沒有留下具體的文本，僅能從有關當事人的回憶中，略知其概貌。

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最初的反叛，是一群藝術家的子女所組織的「太陽縱隊」，這是一群藝術上的反叛者，自稱「詩人是天生的革命者，天生的叛徒」，他們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現代藝術，因此，希望「給文壇注入新的生氣」39。

而具有更大的思想自覺性的是這些年頗引人注目的 X 詩社。他們中有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和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因而天然地和五·四傳統存在著血肉的的聯繫：郭世英的問題就是：「(父親年輕時代）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為什麼我不行？」40 而據張鶴慈的回憶，他是在中學期間看到北大學生 1957 年的大字報，而對既成觀念產生了最初的懷疑的 41：這都顯示了一種歷史的承接。

而擺在反右運動以後的這些中國大學生面前的問題卻是：如何從反右以後極大地強化了的極權精神統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X 詩社的意義也就在這裏：據張鶴慈解釋，「X」就包含了「懷疑」、「否定」與「探索」之意 42。而據當時公安部門宣佈的他們的罪名，也是「要求精神開放」，「要求自由」與「追求絕對真理」43。郭世英也明確地宣佈，要通過獨立思考「自己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44。他們不但對現行體制、政策（如所謂「三面紅旗」，反對「修正主義」等）提出質疑，而且也要求探索 「人性問題」(「如果沒有共同屬性，人類怎麼還成為一個類？」)，「個性自由」(「應該傾聽自己的內在聲音，讓個性得到自由的表達」) 45 等問題：這都是 1957 年校園裏的思考的延續。

X 詩社之所以引起高層的震動，是因為他的成員都是所謂「高幹子弟」(有條件接觸西方現代思潮，這是他們能夠首先突破反右後的思想禁錮的原因)。毛澤東因此而作出批示：「幹部子弟也鬧得太不像話了，要整頓」。46X 詩社正是一個「幹部子弟蛻化變質」的典型。據說後來所謂「革命接班人 」問題的提出，也與此有關。

於是，又有了 1963－1966 年對「反動學生」的批判和處理。著名學者王學泰，在 1964 年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時被打成「反動學生」而送去勞改，他在《鮮為人知的「反動學生」案》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追憶——

「清理和處理大專院校的反動學生是從 1963 年開始的。1963 年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的分歧和衝突已經十分尖銳，面臨著攤牌的邊緣，這年 6 月鄧小平

率領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做最後一次說服對方的努力，並同時發表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共 25 條，當時也簡稱『25 條』。此文在中央人民電臺廣播以後，地質學院有位應屆畢業生馬上給電臺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不同意見。（也有人說，他的信中對『25 條』逐條地進行了『駁斥』）於是此事驚動了中央。那時每屆大專畢業生在畢業前夕都要由中央首長接見一次。1963 年 7 月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本屆畢業生時就提到這個問題，並說，有的大學生反對我們党的『反修』政策，你有什麼道理可以站起來講嗎？這個魯莽的山東學生突然就要從座位上站起來『辯論』，旁邊早有四條彪形大漢站了起來把他摁了下去。這件事影響很大，高教部和北京市委聯合上報中央，毛主席對這個檔做了批示。因為這個事件與他在 1962 年底提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相符合，他認為這類學生是大學生中的極右分子，是階級鬥爭在學生中的表現，而且『所在多有』，應該清理」。47

根據毛澤東批示的精神，形成了一個《處理大專院校應屆畢業生中反動學生的決定》，由中共中央批轉執行。據說劃分「反動學生」的主要標準有三：攻擊「三面紅旗」，反對「反修鬥爭」，同情「右派分子」、「右傾分子」。王學泰介紹，全國波及「反動學生案」的大約在一千人左右。當時本文的作者正在貴州的一個小城安順任教，當地安順二中就有一批學生也被打成反動學生，因此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所謂「反動學生案」已經波及到邊遠地區的中學，可見影響之深。和所有的「運動」一樣，所謂「反動學生」，大多數不過是有些牢騷和不滿，但也確有敢於向當時的主流政治挑戰，表達自己的觀點的，他們出現在反右以後建立的極其嚴密的「輿論一律」的思想控制，以及校園裏「爭當革命接班人」的「革命氛圍」之中，其大膽懷疑，獨立思考，衝破精神控制，要求自由言說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正是 1963－1966 年間的這些「反動學生」，構成了 1957 年的「右派學生」和 1966 年以後文革期間的「異端學生」之間的一個中間環節，形成了中國校園裏源源不斷的爭取民主、自由的反抗運動的潮流。而這樣的民間思潮、運動一直延續到文革以後：從七十年代末的西單民主牆，1980 年的校園民主選舉運動，到 1989 年的「六四」運動，以及九十年代至今的爭取民主與人權的思潮與運動，其自身是形成了一個傳統的。

在作了以上簡要的勾勒，結束我的發言的時候，我想作出兩點總結——

在觀察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時，要「眼睛向著地底下」：民間的中國，底層的中國，那裏發生著的緩慢的，卻是深刻的真實變化，將決定未來中國的命運。

面對歷史與現實，我們不能只停留在痛苦的回憶，義憤的控訴，情感的發洩上，而應該進入科學的理性的思考與批判，中國特色的極權統治、後極權統治，必須有中國特色的批判理論。從歷史經驗的總結和現實社會的調查、研究中構建具有解釋力的新的批判武器，這是中國知識份子、學者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我特別希望有更多的年輕朋友來參與「民間思潮」的研究，「1957 年學」的研究，參與批判理論的構建。在這方面，身居海外的學者可以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做很多工作，其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2007 年 6 月 30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2007 年 7 月 16－19 日整理，補充。

注 釋

1 參看魯迅：《買〈小學大全〉記》，《病後雜談之餘》，均收《魯迅全集》6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出版。

2 魯迅：《書信。330618　致曹聚仁》，《魯迅全集》12 卷，405——406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出版。

3 魯迅：《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嗎？》，《魯迅全集》6　卷，122 頁。

4 《〈廣場〉發刊詞》，《原上草》，19 頁，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 年出版。

5 《北大民主運動紀事》，《原上草》，27 頁。

6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原上草》，153 頁。

7 龍英華：《「世界向何處去，北大向何處去」》，《原上草》，132 頁。

8 陳愛文：《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原上草》，101 頁。

9 參看周大覺：《論「階級」的發展》、《再論「階級」的發展》，沈迪克：《談談無階級社會中人的等級》，錢如平：《論階級的發展》，均收《原上草》。

10 劉地生：《讓青年學生純潔的頭腦自由成長》，《原上草》〉，284 頁。

11 參看譚天榮：《第一株毒草》、《第二株毒草》，《救救心靈》，均收〈原上草〉。

12 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沒有情節的故事》，496 頁，北京

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

13 以下引述林昭的觀點，均引自《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手抄稿）。

14 黃政：《林昭被捕前後的一段往事》，《走近林昭》，122頁，明報出版社，2006年出版。

15 《顧准日記》，51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

16 《顧准日記》，61頁，62頁，64——65頁，73頁，75頁。

17 《顧准日記》，50頁，73頁，71——72頁，28頁。

18 《顧准日記》，62頁，51——52頁，61頁，75頁。

19 《顧准自述》，231頁，330頁，327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

20 《顧准日記》，101頁，122頁。

21 《顧准日記》，100——101頁，102頁，118頁，119頁，120頁，103頁。

22 《顧准日記》，119頁，120頁。

23 《顧准日記》，227頁。

24 《顧准日記》，164頁，251頁，232頁。

25 《顧准日記》，184頁，149頁，196頁，187頁，216頁。

26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143頁，103頁，128頁，135頁，134頁185頁，117——118頁，195頁。

27 《無夢樓全集》，106頁，118——119頁，133頁，107頁，178頁，124頁。

28 《無夢樓全集》，113頁，224頁，216頁，194頁，132——133頁，225頁。

29 《無夢樓全集》，121頁，127——128頁，227頁。

30 《無夢樓全集》，196頁，118頁。

31 《無夢樓全集》，115頁。

32 《無夢樓全集》，132頁。

33 《無夢樓全集》，126頁。

34 《無夢樓全集》，131頁。

35 《無夢樓全集》，202頁。

36 《無夢樓全集》，188——189頁，155頁，176頁。

37 《無夢樓全集》，155頁。

38 《無夢樓全集》，218頁。

39 參看張郎郎:《「太陽縱隊「傳說及其他》,收《沉淪的聖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年出版。

40 牟敦白:《X 社與郭世英之死》,《沉淪的聖殿》,28 頁。

41 參看宋永毅:《訪 X 詩社張鶴慈》(網上下載文件)。

42 宋永毅:《訪 X 詩社張鶴慈》,

43 《幹部子弟蛻化變質九例》(1963 年 9 月公安部文件)(網上下載)

44 周國平:《歲月與性情》,69 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 年出版。

45 周國平:《歲月與性情》,78 頁,84 頁。

46 宋永毅:《訪 X 詩社張鶴慈》,

47 王學泰:《鮮為人知的「反動學生「案》,《多夢樓隨筆》,386——389 頁,學苑出版社,1999 年出版。

五十年後的「反右」創傷記憶　　徐賁

在 1949 年以後發生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和事件中,反右和文革可以說是留下最深、最持久社會創傷的兩次災難。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在《文化創傷和集體身份認同》一書中,把「創傷」定義為人們所經歷的「可怕事件」,在「群體意識上留下的難以磨滅的痕跡。」 對於那些受害者和同情受害者的人們來說,「可怕的事件」就是災難。可怕事件的歷史痕跡構成了對人有持續傷害作用和後果的記憶。1

對歷史災難存在著兩種認知模式,一種是「客觀發生」,另一種是「文化構建」。2 「客觀發生」模式認為,災難對個人所造成的傷害是一種客觀發生的事情,它本身具有清晰可辨的反道德性質,這個本質的意義不允許作任何的道德粉飾。「構建模式」認為,歷史事件是一種本身沒有本質意義的過去發生,災難的「邪惡」是一種由闡釋者共同體所構建的意義。不同的闡釋者群體出於不同的動機和需要可能對同一歷史事件作出不同的闡釋,構建出不同的事件意義。

本文將從社會、文化構建的角度,參照現有的文革記憶,討論反右發生五十

年後對這一事件的創傷記憶特徵。這一討論將涉及創傷記憶構建的三個主要方面：創傷記憶的敍述者和受眾關係，主導創傷記憶敍述的因素，以及創傷敍述的多種話語。反右的「災難」和「創傷」意識是一種社會性的文化構建的結果。在這一構建的過程中，社會可以通過反思政治災難得到自我教育。籍由構建歷史創傷，社會不僅會在認知上辨認出人間苦難的存在和根源，還會為此擔起應負的道德責任。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因此可能更多地分擔他人的苦難，更積極地參與重新界定群體的團結關係，使社會變得更加正義，也更加正派。

一.　「客觀發生」和「文化構建」:歷史事件的兩種認知模式

在中國，對反右和文革持批判和譴責態度的認知中，「客觀發生」觀一直保持著相當大的影響力。以這一認知方式來看，反右客觀上是一場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殘害運動，徹底摧殘了中國社會中的獨立思想和言論元氣，這種殘害和摧殘具有客觀的、不容粉飾的反道德意義。這種看法還可以更進一步，把反右這個客觀發生的「惡事」認知為性質獨一無二的「特殊」惡事。反右不是中國歷史上屢有發生的殘害讀書人事件(「焚書坑儒」或「文字獄」)的再演，而是自成一類的「思想整肅」。反右之所以特別邪惡，乃是因為它結合了現代專制國家的政治欺騙(「陰謀」) 和制度暴力(流放、勞改、戴帽等等的懲罰)，以恐怖和殘害的手段公然剝奪本國人民的憲法權利（自由言論)。

無論我們多麼同情那些在 1957 年被誘騙進「鳴放」圈套乃至蒙受災難，甚至家破人亡的人們，我們必須看到，反右並不具有一種所有的「好人」都能一眼看明白的「邪惡」本質。無論「邪惡」還是「災難」都是一種經過價值和道德構建所產生的「意義」，一種被社會中廣大公眾所接受或拒絕的「共識」。

僅就對「右派分子」的一般社會看法而言，從 1957 年的「壞人」到今天的「受冤者」，這裏面已經包含了公眾對反右共識的改變。1957 年以後，右派分子被戴上帽子，許多被送去流放式的勞改，社會上大部分人認為他們「罪有應得」，對他們的遭遇並不予以同情。文革中，　「右派分子」在社會的冷漠旁觀下，再一次遭受迫害。直到文革後，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社會上對右派才有了更多的同情。反右從「偉大勝利」變成了幾百萬件「冤假錯案」，這種轉變本身就是對反右運動對錯、正邪判斷的重新構建。尋找歷史事件的真相，建立有關共識，　是一個意義

構建和再構建的過程，也是一個社會自我認識，自我教育的過程。

「客觀發生」和「社會文化構建」雖然是對歷史災難的不同認知模式，但並不相互排斥，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構建」需要以實際發生過的「事實」為基本材料。在歷史事件當事人和旁觀者都還活著的時候，脫離普通人經驗事實的構建無法令人信服。如果沒有人因為反右而被迫害，一生坎坷，乃至家破人亡，那麼誰也無法令人信服地把反右構建為一場「災難」。

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的動機和利益，可以選擇不同的事實來構建符合他們需要的歷史事件意義。即使是歷史事件中的受害者，他們也可能把客觀發生的傷害構建成完全不同的意義。例如，反右或文革中發生在個人身上的災難(死亡、牢獄之災、勞改之苦)可以被當事人構建為「迫害」、「摧殘」和「冤屈」(林昭之所以抗拒「改造」的原因)。但也可能當事人構建為「罪有應得」或者「改造新生」。就象二戰中猶太人有的精心製作和銷售標誌猶太人屈辱身份的「黃星」臂章一樣，右派受害者接受加害者加給他們的罪名，平反時感激涕零，這本身就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受害形式。

構建正面的反右回憶，最具公眾影響力的當然不是那些擁抱汙名的右派可憐蟲，而是享有公共權威的人物，如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他們的言論有明確的公共目的和公共作用。與五十年前相比，今天專家學者的影響已經大大上升，因為他們常被視為擁有中立客觀的立場。然而，即便如此，他們對於群體回憶的形成，所起的仍然是構建而非客觀揭示的作用。當然，他們自己並不總是願意放棄「客觀發生」的神話，著名政治學學者王紹光最近在《南風窗》上為反右所作的辯護式回顧就是一個例子。

王紹光提出，譴責反右起於「陰謀」或預先有計劃的「引蛇出洞」，都只是以毛澤東自己說的「陽謀」為根據，不足采信。反右的「客觀真實」起因是，「毛澤東跟別的領導人不一樣，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創立的制度，1949 年之後他有三次大的社會實踐，第一次是『百花齊放』，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齊放』是他的一個試驗，他已經意識到中國新建立的，儘管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裹面還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雖然幹部大量是工農苦出身的，以前跟民眾結合得也比較密切，但是這時候有脫離群眾的危險性，還存在一系列的問題，所以他要大鳴大放，要百花齊放。」王紹光認為，反右確有必

要，因為右派確實乘「鳴放」之機向黨發起了進攻，「百花齊放的時候，說讓工農幹部去休息、去學習、開除黨籍，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是一堆人這麼說。我二十年前曾花了很長時間查看 1949-1966 年的各類報刊，看到 57 年『百花齊放』時出現的言論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我也會有強烈的反應，我想會的。」3

王紹光為自己的看法提出的客觀證據是，若不是右派真的威脅到了新政權的存在，「打擊知識份子（其實）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它建立現代國家要用這些人啊。中國當時沒有多少知識份子。在 1956 年，整個中國只有 42000 位大學教師、31000 位工程師以及 63600 位技術員。在六億五千萬的總人口裏，按照中國標準只有三百八十四萬人可以被定義為知識份子。」4 按照王紹光的這個邏輯，莫非我們應該從屠殺猶太人不符合納粹的「人力經濟」利益而推導出它的不可能發生？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中就有這樣一個場景，猶太女工們在工棚裏議論納粹用毒氣屠殺猶太人的傳聞，她們以為猶太人是「對他們有用的人」，不相信納粹會無端浪費能幹活的人力。然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證明，它所針對的是全體猶太人，並不是沒有勞動力價值的老弱病殘。

為了證明反右的「不得已反擊」確實是歷史客觀事實，王紹光不僅強調自己「很長時間」的資料研究(閱讀「1949-1966 年的各類報刊」)， 而且還強調普通勞動人民 1957 年對右派「憤怒」的客觀證據，「當這些知識份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黨的人並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党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份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資。」 王紹光例舉了李敦白的岳母，「(這個普通勞動婦女）乾脆把知識份子的言論稱之為『都是放屁』」。5

王紹光在提供「真實發生」證據時，所不幸忽略的是，「真實」報刊材料和市民反應後面其實已經有統治意識形態的構建在起作用。當時中國報刊的任務不就是把右派言論報導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嗎？這樣的材料不證明右派反黨，還能證明什麼呢？能用納粹時代的報刊和「人民義憤」來證明猶太人就是該消滅的劣

等民族嗎？1957 年群眾憎恨右派，這只能證明，構建歷史事件意義不一定只是在事後才發生。就在反右事件正在發生時，它的意義已經在被構建，並因此對它的後續構建產生影響。但是，原先的意義構建也完全可能在許多年以後被改變，被其他的意義構建所質疑甚至取代。否則也就不會有右派的平反。1957 年右派分子對「官僚主義」和專權腐敗的批評，在今天的意義構建環境中還有多少人會說是「放屁」呢？

在王紹光對反右的「事實發生」論中，我們恰恰可以觸摸到歷史事件構建的一些基本問題，例如，什麼是構建可以運用的事實資源？是那些本來就已經受到權力嚴格控制的「各類報刊」嗎？是那些本來就經過持續而系統意識形態教育的「勞動人民」嗎？在意義構建中誰有發言權？受什麼樣的社會、政治制度條件影響？等等。

在對待右派的問題上，譴責和辯護的區別其實就是「災難」和「非災難」記憶的區別。這兩種記憶都是構建而成的。在對歷史經驗事實的運用上，構建反右的「災難」記憶，一般著眼於具體個人所受到的肉體或精神傷害和折磨，「死亡」是這種傷害和折磨的極限標誌。以任何政治理由，僅僅由於一個人的言論就剝奪他的生命，這樣做是「邪惡」的。即使沒有達到這一極限的其他形式折磨和殘害也具有同樣的邪惡意義。這是一種以人道價值為基本尺度的意義構建，並可以進一步政治化為公民對民主、權利、法制的要求。

與「災難」說的人道意義構建不同的是，對反右「非災難」記憶的構建往往走的是一條「去人化」的路子。它總是從「大局」或「總體」方向著眼。這種大方向可能是「歷史」，也可能是「階級利益衝突」。在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作用下，個人的遭遇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也是沒有意義的。這種從大處著眼的去人化構建即使不直言反右的「積極」意義，也會有意無意地取消它的「災難」意義。「右派向黨進攻，後果咎由自取」，這樣的說法是一種權力理性的意義構建。在這個構建中完全看不到苦難個人的面孔，只有「國家」、「階級」、「集團」和勇於制度創新的最高領袖。

把反右和文革這樣的歷史事件或發生看成是「災難」或「創傷」，乃是基於它們對具體個人和人群造成的傷害，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可以如何去理解這種創傷記憶的構建特徵和因素呢？亞歷山大對「文化創傷的社會化過程」的分析有

助於我們回答這個問題，我把他的分析模式簡化為這樣三個方面:一，災難訴說的敍述和接受關係，二，對創傷性災難的認知因素，三，敍述災難的話語樣式。在分別討論這三個方面的時候，我會把反右記憶和文革記憶作一些比較，目的不在於面面俱到，而在於揭示災難記憶構建的複雜因素，並期待有更深入系統的討論。

二. 創傷記憶的敍述者和受眾關係

對人造成具體傷害的事件，並不必然對受影響的集體成員是創傷性的，更不要說是對整個社會是如此了，「事件是一回事，對事件的再現又是另一回事。」只有當事件被「再現」或「敍述」為一種創傷時，只有當它被構建為一種「災難」時，它才會獲得這樣的意義。在構建歷史災難時，要有人不僅說出那個事情，而且說出那是「壞事」，是「災難」，「集體不會做(這樣)的決定，能動者(agents)才會這麼做。」這些把事情說出來的人們就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承載群體」，他們往往是直接受害者，受害後的倖存者和同情並認同他們災難的人們。6

在災難的敍述中，承載群體起著能動的作用，他們不只是講述事情的經過，陳述事情的成因，而且還對事情做出對錯判斷。這種對錯判斷中必然包含基本的道德原則和不容違背的道德戒律。這和單純理解式的「成因分析」是不同的。由於缺乏起碼的對錯判斷，後一種分析很難避免從「解釋」自動轉變為「辯護」。

在反右災難敍述中，起能動作用的「承載者」，即直接受害者和同情者，並不是超然的道德主義者，「承載群體兼有理想和物質利益;他們位居於社會結構裏的特殊地點：而且他們擁有在公共領域裏訴說其宣稱（或許可以稱為『製造意義』）的特殊論述天賦。承載群體可能是精英，但是他們也可能是遭貶抑和邊緣化的階級。」7

語言(論說、陳述和說故事)和公共言說是災難敍述的關鍵。因此，具有這種能力者自然就發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相對自由的公共言論環境也特別重要。儘管反右運動的對象主要是知識份子，但並不是所有這些知識份子都自然成為反右災難敍述的公共承載者。公共承載者不僅要有語言能力，而且還要有運用這種能力，辯明是非公道的強烈衝動，那就是「義憤」。苦難可以激起受害者的義憤，也可以將它侵蝕殆盡。

在構建反右災難回憶的過程中，起作用的承載者可以是直接受害者，但也可

以並不是直接受害者。在災難記憶構建中，能動者不需要一定有直接經驗。隨著直接當事人和受害者的年老逝去，能動者必然會越來越多倚重後代的關心者。在今天的反右災難記憶構建中，已經有了後代記憶者的加入。一些極為感人的反右災難敍述都是產生在他們的筆下，如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告知夾邊溝》，邢同義的《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趙旭的《風雪夾邊溝》，劉海軍的《東星北檔案》，尤鳳偉的《中國一九五七》，等等。

具有公共性質的創傷訴說是一種言說行為(speech act)，它包含三個因素:言說者、接受者(受眾)和言說情境，「言說者的目標是以有說服力的方式，將創傷宣稱投射到受眾，也就是公眾。這麼做的時候，承載群體利用了歷史情境的特殊性、手邊能用的象徵資源，以及制度性結構提供的限制和機會。」8 與文革災難記憶構建相比，反右災難記憶的構建有明顯可見的局限。首先是言說者，也就是承載群體比較小，背景和經歷也比較特殊。由於反右的言說者絕大部分是知識份子，這也就增加了他們爭取廣大公眾同情和移情認同的困難。反右災難構建的另一個困難就是言說情境，即「言說行為發生的歷史、文化和制度環境。」 9 文革在結束以後曾有過一段否定文革的政治寬鬆時期，為文革災難記憶構建提供了很有幫助的情境條件。但從反右到文革結束的 20 年間，反右記憶卻沒有及時得到過寬鬆的構建情境。反右創傷記憶的構建不是「後反右」現象，而是「後文革」現象。一直到今天，許多「右派分子」對徹底否定反右仍心有餘悸。雖然 55 萬的右派除了 98 個全部平反，但反右仍被官方定調為正確和有必要的運動。

三. 主導創傷記憶敍述的因素

有四種關鍵因素主導著創傷性災難的能動者敍述，它們分別是苦難的性質、誰是受害者、直接受害者和一般公眾的關係，以及傷害的責任歸屬。第一，苦難的性質。「苦難」和「創傷」一樣，它的意義總是處在正反構建的爭奪之中，正反構建會對是否存在創傷形成截然不同的論斷。例如，奴隸制對非裔美國人而言是個創傷嗎？或者是像某些修正派史家所宣稱的，奴隸制只是一種強制性且具有高額利潤的經濟生產方式？如果是後者，那麼奴隸制不會造成創傷痛苦。如果是前者，它就牽涉了殘暴且創傷性的身體支配。又例如，1938 年的中國南京，死於日本軍人手上的人數不足一百，還是有超過三十萬的受害者呢？這些死難是日軍單

方面的「屠殺」，還是中日兩軍交戰的「猛烈對抗」呢？10 對於反右記憶來說，「苦難的性質」也具有類似的曖昧性。反右對知識份子而言是個創傷嗎？或者象王紹光所說的是一種老的和新的「精英集團」的奪權鬥爭？如果是後者，那麼反右就與對冤屈者造成的傷害無關。如果是前者，那麼它就涉及了政治迫害和身心摧殘的暴力傷害。

第二，誰是受害者？反右和文革記憶對這個問題有不同性質的回答。文革災難記憶一般把整個中國社會都看成是受害程度不等的受害集體，官方和民間至少在「一場浩劫」的表述上還能保持一致。但是反右的情況就不同了。對反右受害者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說法。一般的看法是，反右的受害者基本上都是知識份子，與廣大「勞動人民」無甚關聯(除了有家屬遭牽連的)。而且，平反冤假錯案以後，55 萬右派平了反，只剩下幾十個「真右派」。被平反者是平反以前的受害者呢(以前錯受懲罰，現已平反)，抑或平反後仍然還是受害者呢(吃過的苦頭再也無法改變)？那麼，剩下的幾十個「真右派」呢？他們是不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因此不能算是受害者呢？還有的看法是，間接受害者包括了整個中國社會，正是由於反右對不同意見、對公民言論權利的殘酷壓制，掃除了黨內、外民主派，整個社會噤若寒蟬。隨即而至的大躍進中只聽到一片叫好之聲，無可避免地引致為「三年自然災害」的災難。反右消滅了 1949 年前與共產黨合作和加入共產黨的「民主力量」，從此為毛澤東的個人專制鋪平了道路，反右實際上就是文革的序曲。

第三，受害者與一般公眾的關係。苦難的性質需要有公眾的認可。例如，林昭從一打成右派，就確認了自己的苦難性質，但她周遭的人群卻認定她是「反黨分子」。過了將近半個世紀，林昭和其他右派分子的遭遇才引起人們的公開同情。從來沒有經歷過反右的青年人中，許多對林昭充滿了真摯的欽佩。受難者與一般公眾之間也因此形成了一種認同關係。正如亞歷山大所說，「典型的情況是，在創傷過程的開端，大部分受眾不太能夠察覺自己和受害群體之間的關係。唯有受害者的再現角度是從廣大集體認同的價值出發，受眾才能夠在象徵上加入原初創傷的經驗。」11 反右災難和文革災難的一個更重要的區別在於，一直到今天，廣大公眾還是對反右受害者比對文革受害者容易採取「與我無關」的旁觀者態度。這種差別其實就是一般公眾與受害者認同的差別。

第四，責任歸屬。要構建能夠為一般公眾接受並認同的災難創傷記憶，必須

確認誰是「加害人」。正如亞歷山大所說,「誰實際上傷害了受害者?誰導致創傷?這個議題總是涉及了象徵和社會的構建。」12 確認加害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一直到今天，納粹災難的歸屬仍然是一個思想界和道德輿論爭議的問題。是「德國人」還是納粹政權造成了大屠殺?罪行要局限于特殊的蓋世太保武力，或是整個納粹軍隊也深涉其中?罪行要擴及一般軍人、一般平民，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德國人?只有老一輩的德國人要負責，或者後來的世代也要負責?反右災難記憶和文革災難記憶也都面臨著類似性質的問題。現有的回答(當然還遠遠不是深入、充分的回答)已經顯示這兩場災難記憶方式的差異。官方對文革的罪魁禍首畢竟還有一個說法(「四人幫」及其爪牙)，但對反右則完全沒有。是誰造成了反右運動中幾十萬的「冤假錯」案?誰該為此負責任?是各個單位的「領導」，是「運動積極分子」，還是另有其人?是「失誤」，還是侵犯公民權和人權?是辦事人的「個人水平不夠,」還是整個統治制度本身就被設計成為一部暴力和恐怖的機器?對反右起因現在有兩種不同解釋，一是毛澤東早就計畫的「陽謀」;二是「先無此意，後不得不為之」。13 這兩種說法一個包含著對最高層加害人的確認(準確不準確是另一回事)，而另一個則是完全否定這種確認的必要。後一種說法是官方對反右的說法，它與現有的文革記憶畢竟還有某種最高層加害人確認形成了特別明顯的差別。

四. 災難敍述的不同話語

災難記憶是用語言來構建的，它的根本形式就是敍述，在不同的社會知識和交際領域中，敍述有不同的話語形式特徵，形成了不同的敍述樣式。它們相互聯繫，有時甚至相互交叉重迭。重要的敍述話語種類包括歷史、文學和藝術、大眾文化和傳媒、政治和法律，甚至與人文話語甚為遙遠的科學。現有的關於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災難記憶構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多元敍述話語共存和互動的實例。從二戰剛結束到今天，大屠殺災難記憶的構建，從一件只與「他們」猶太人命運有關的事情，變成了一件與公眾大家(「我們」)的道德生存都有關的事情。大屠殺的構建提升了公眾社會的普遍道德共識，對譴責類似的邪惡起到重要的象徵作用。它的災難性已經被普遍確認。無論是左、中、右的政治人物、公共人物或學界人物，都再不能公開否認這是一場災難，而不受到公眾的側目或譴責。在

中國，公眾在反右和文革歷史記憶上還沒有形成象大屠殺記憶這樣的共識，而在程度上，反右則又更比文革次之。因此才會出現公然為反右辯護這樣的事情。

不承認反右為一場災難，或者甚至為之辯護，這種敘述經常出現在國家官僚話語領域中，也會時不時出現在主流媒體和各種國家官僚化了的「學術專業」的領域(如「政治學」、「歷史學」、「公共行政學」等等)。這些領域話語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不在乎活生生的個人。這原本就是專制型國家政治的特點，只要「路線正確」，「符合歷史規律」，一切活人付出的代價都算不了什麼。當然，這種話語的使用者自己不能是受害人。許多國家官僚話語的推行者，甚至連反右運動的推動者和幹將，都因為後來在文革中的個人遭遇和苦難，改變了原先的想法，向受害人表示道歉和懺悔，如周揚。

在國家官僚話語的「正史」之外，有一種另類的歷史話語領域，可以稱作為「真實內情」的歷史。另類反右史有的是由 57 年曾被打成右派的人士所撰寫，如朱正的《反右派鬥爭始末》，有的則是出自非直接經歷者之手，如丁抒的《陽謀:反右運動始末》。他們都是反右災難的承載人。他們的歷史言說有一個重要動機，那就是還歷史真實和完整的原來面目。在儘量揭示歷史原始材料這一點上，另類歷史對正統歷史在重要歷史細節上的語焉不詳和閃爍其辭形成了挑戰，因此給讀者一種真實和值得信任的感覺。例如，對朱正的《反右派鬥爭始末》有這樣的回應，「1957 年的「反右」運動，我是親歷者。對於那場運動的專橫無理，對於運動中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對於運動擠壓下人性的扭曲，我是領教頗深的。不過，也有些情況我一直不甚瞭解。比如最高當局如何從誠意可掬地懇請各界「幫助整風」、「消除顧慮大膽鳴放」，驟然變臉，轉為聲色俱厲地「反擊右派」，把上百萬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自然生命置於死地，其中的過程一直不甚了了。又比如，當時各界頭面人物究竟說了些什麼，也只從報上看到顯然經過加工處理的片言隻語，從未看到完整的發言稿。對於北京高校學生們的言論，尤其是北大學生熱烈討論國家時政（他們自稱為「五・一九」運動）的種種見解，也未聞其詳，因為當時的報刊對此全無報導。這幾年看了一些材料，特別是讀了朱正先生所著《反右派鬥爭始末》，才有了較多的瞭解。不過，只要歷史檔案沒有解密，人們對於許多內情總還是難以真正清楚的。」14 真實內情歷史的受眾比較有限，他們是對反右運動和官方反右史實本身有疑惑的思考者。

還有另外一種與「真實內情」歷史不盡相同的另類歷史，包括各種各樣「回憶錄」、「回憶紀念」和「口述史」。這是一種「個人敍述」的邊緣話語領域。這種個人敍述的形式是由特定社會文化中的偶然因素形成的。例如在美國的猶太人大屠殺災難記憶中，就有象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的《女孩日記》(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1952）和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的《夜》(Night， 1958)這樣的「倖存者敍述」(儘管弗蘭克小姐最後並沒有逃過納粹的魔掌，不能算是倖存者)。和「倖存者文學」一樣，中國文革以後的「個人回憶敍述」是一種雜合性的話語形式，它既有一些歷史的真實記載，又不必受制於正規歷史學的嚴謹方法要求。它的許多細節之所以被視為「真實可信」，全在於它是一種個人的寫作，不象國家官僚話語的「正史」那樣被嚴格定調。它不需要為政治正確而犧牲真實回憶。這種回憶的真實可信幾乎完全出於「無須說謊」的推導。

個人回憶的不少作品可以歸入災難「見證敍述」的類別，文革記憶中也有很多這樣的見證敍述(如巫寧坤的《一滴淚》和鄭念的《上海的生與死》)。個人見證敍述中有歷史，有故事，能取信于讀者，又能打動他們的感情，是最能幫助構建反右和文革災難的敍述形式之一。15 儘管不同的回憶中，「歷史」和「故事」的成分搭配不同。許多這樣的回憶錄涉及的是高層民主黨派人士或高層知識份子，如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和韋君宜的《思痛錄--露沙的路》(其中有專門回憶反右的一章，題目是《從反丁、陳運動到反右風濤》)。有的則是反右時並不出名者的自述，如高爾泰的《尋找家園》。這些作品往往以文字優美、思想真誠打動讀者，比單純的真實內情歷史更能打動人心、引發創傷記憶。

最能引發普通受眾反右創傷記憶並幫助構建這種記憶的也許是文學和大眾傳媒(電視、電影)，可惜有影響的作品不多。當然，一有影響，就又會遭禁。它的特點是寫普通的右派或他們的家屬，而不是民主派或知識份子頭面人物。文學和大眾文化傳媒雖然有所區別，但就災難記憶構建而言，它們所起的共同作用都是「講故事」。不同的講故事形式會有受眾人群大小的區別，受眾越大的說故事形式對於公眾性的災難記憶構建作用越大。大眾傳媒的作用因此特別重要。小說、電影、電視，無論什麼形式的故事，都必然展現具體的人物，日常活動和心理感受，故事把「災難」在活生生的個人身上體現為人的災難。故事的情感和審美感染力幫助受眾認同受害者並思考他們的受害原因。受眾在故事中看到的不只是「右派

分子」，而且是普通中國人。

在文學和電影中，這樣講述的故事，它的災難性是普通受眾都能認同的，因此有可能引起的政治聯想，觸犯現有的意識形態禁忌。田壯壯的電影《藍風箏》就是一個例子。故事的主角並不是右派分子林少龍，也不是走資派老吳，而是陳樹娟這個普通婦女。故事講述的是樹娟的三次婚事。樹娟初嫁林少龍，57 年林少龍因為在開會時上廁所，人不在時被落實在了單位的右派指標之內，後來被送去勞改，幹活時被倒下的大樹壓著，「死了」。樹娟二嫁的是李國棟。李國棟是林少龍生前的好友，無意中出賣了林少龍。李國棟在「大躍進」後的「自然災害」年月中營養不良，得了肝病，「也死了」。樹娟三嫁的是出入有專車的大幹部老吳。好景不長，老吳在文革時成了走資派，被鬥了又鬥，「又死了」。影片中表現反右創傷的手法是象徵的，林少龍在他工作的圖書館裏，在一條寫著「大鳴大放幫黨整風」的紅色條幅下走過，這時候紅色橫幅落下來，蒙住了他的頭。故事敍述的感染力不在於它追究了反右運動究竟是源自「陽謀」還是「不得已反擊」，而在於它展示了，一旦反右運動來了，它給許多無辜者的生活帶來的是怎樣的災難後果。這就象卡夫卡小說《變形記》中的主角一覺醒來，變成了甲蟲，故事並不探究他為什麼變成了甲蟲，而在於敍述變成了甲蟲的人會有一種怎樣的非人遭遇。

受眾對苦難故事的認同往往是一種藝術感染和人性感染的結合。人在感動和情感投入中會作出樸素的對錯、正邪判斷。這種價值判斷的共識是社會自我道德教育的根本條件之一，也是創傷記憶的社會意義所在。儘管目前的公眾語言仍在使用「反右」和「文革」這些沿用官方語言的辭彙，但它們已經不再是中立的或褒義的辭彙，而是不能不載負沉重的道德包袱。由於反右和文革的道德缺失，企圖洗清「反右」和「文革」的災難惡名，便成為一種類似於 1970 年代德國「希特勒熱」那樣的歷史翻案行為。

「說故事」是人性化的領域，越是人性化，就越少有反右不是災難的說法。反右災難的故事敍述常常會和文革災難故事聯為一體 象文革結束初期的電影《牧馬人》、《芙容鎮》和九十年代的《藍風箏》都是這樣的講述方式。這樣的故事講述往往把反右敍述為文革的前史和預演，讓高潮落在文革災難上，在兩個分別事件之間延續成一個漫長的制度性人性災難。關於反右災難本身的故事出現得較遲，最有特色的就是從本世紀初到目前已經自成一類的「夾邊溝故事」。

五. 夾邊溝：反右創傷記憶的「極端處境」

反右創傷記憶形成了一種與納粹「猶太人大屠殺」和前蘇聯「古拉格」創傷敍述相類似的中國式「極端處境」敍述，那就是「夾邊溝」故事。這是反右創傷回憶獨立于文革回憶的部分。迄今為止，在文革創傷回憶中還找不到在震撼力和密集敍述上可以與「夾邊溝」故事相比的「極端處境」敍述。文革敍述中最常見，最有象徵意義的「極端處境」是文革初期的紅衛兵暴行，「夾邊溝」故事再現的是一種與紅衛兵暴行不同的極端處境。紅衛兵暴行是自發、陣發和非理性的，但「夾邊溝」再現的是一種由國家權力直接組織和執行的，有制度理性的，漫長而有序的折磨：饑餓、勞累、寒冷、絕望，直至死亡。

前蘇聯「古拉格」創傷敍述者基本上都是古拉格集中營的倖存者，如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金斯伯格(Evgenia Ginzburg)，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和馬青柯(Anatoly Marchenko)。他們的文學再現使得蘇聯的集中營成為共產極權的公認象徵。有了古拉格，蘇聯的斯大林主義統治便有了可以辨認的特徵。 同樣，有了夾邊溝，中國的毛澤東式統治便有了可以辨認的特徵。和「古拉格」創傷敍述者不同的是，「夾邊溝」創傷敍述者中有的並不是夾邊溝的倖存者，而是同情者。「夾邊溝」創傷敍述因此也成為一種「後記憶」敍述。16

夾邊溝農場成立於 1954 年 3 月，它的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原本就是一個關押犯人的勞改農場。這個位於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沿的昔日勞改農場，1957 年 10 月至 1960 年底，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除了風大沙多，夾邊溝有限的農田多為鹽鹼荒灘，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只能養活這麼多人。甘肅省將近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夾邊溝農場貧瘠而嚴重鹽鹼化的土地的收穫物，根本無法使這麼多的右派勞教分子果腹。夾邊溝成為右派分子在改造和懲罰中掙扎求生的煉獄。

「夾邊溝」創傷敍述者有的是夾邊溝的倖存者。和鳳鳴在《經歷——我的 1957 年》敍述了她和丈夫王景超的勞改遭遇，他們夫婦倆反右前同為《甘肅日報》編輯，王景超被打成極右分子，和鳳鳴則是一般右派。1957 年 4 月，夫婦倆同一輛火車被押送勞改，和鳳鳴去的是十工農場。王景超則到了夾邊溝。三年後，王景超在夾邊溝餓死，和鳳鳴僥倖躲過一劫。「夾邊溝」創傷敍述者有的並不是夾邊溝

的倖存者，其中的代表性作家有楊顯惠、邢同義和趙旭。

饑餓和人命不如螻蟻，這是夾邊溝故事最震撼讀者心靈的主題。饑餓同樣也是不少大屠殺文學和古拉格文學的一個共同主題，如威塞爾的《夜》和索爾仁尼琴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饑餓還是一個連接 1960 年全國大饑荒的主題。在夾邊溝農場，1960 年春天，有一半人已經虛弱得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從衛生所的病房裏被抬出去。在死神面前，人們開始了求生本能的掙扎。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裏，盡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下一頓糊糊湯。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蜥蜴，抓來燒了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他們只能煮幹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1960 年 4 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裝完貨的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 個人一口氣將 160 斤洋芋統通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裏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裏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嚥。」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瀉，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顧著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夾邊溝故事外的故事同樣感人肺腑。大眾傳媒的報導也幫助擴大了夾邊溝故事的影響。羅四鴒在《文學報》上對夾邊溝和夾邊溝文學的長篇綜述報導，就是一個例子。17 報導讓人們更體會到，在閱讀夾邊溝故事時，無動於衷和麻木不仁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反右」及其造成的人間苦難，文學描寫的真摯同情與政治學分析的冷漠隔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公眾影響極大。2000 年 7 月，楊顯惠的小說《上海女人》

在《上海文學》雜誌發表，此後，每月 1 篇，連續 12 篇「夾邊溝紀事」系列小說，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震動。一位死難者的兒子，偶然讀到了以自己的父親為原型的小說，他哭倒在地，把報刊供在桌上，長跪著，一頁一頁地讀，一次一次地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只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父親死得這樣慘。

在甘肅的臨洮縣，從夾邊溝死裏逃生的 82 歲高齡的裴天宇老人說，他用了半個月的時間才讀完四篇小說。他說：每一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鐘，就淚流滿面……讀不下去！許多當年的倖存下來的右派主動打電話找楊顯惠，講述自己的真實經歷。夾邊溝倖存者高吉義在看到當地報社轉載的「夾邊溝紀事」系列小說後，通過報社聯繫上楊顯惠，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儘管楊顯惠已經非常熟悉了夾邊溝的故事，但高吉義的講述讓他感動落淚。半個月後，《飽食一頓》和《逃亡》問世，這兩篇小說的主人公原型就是高吉義。

2004 年 1 月，《當代》刊登了楊顯惠的《告別夾邊溝》，「編後」中寫道：每個編輯閱讀之後，不是叫好，而是沈默。那種震撼已經難以用言語表達。……無論怎麼稱讚，不管多高的評價，都不會過分，都難以表達我們對作者的敬意，因為作者之痛，不是個人之痛，不是家族之痛，不是人群之痛，而是整個中華民族之痛。不僅切膚，而且徹骨，而且剜心。邢同義的《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選擇了完全紀實的手法。為了保證材料的真實可信，書中記述的每個人物和每件事，他都盡可能地找到當事人或其親朋好友，詳細詢問，反復核實。2002 年 8 月，在甘肅安西縣，邢同義見到了馬述麒的遺孀李春蘭，這或許是目前唯一能找到的右派分子的親屬。他向這位飽經滄桑的老人講述了馬述麒在夾邊溝所經歷的一切，老人一邊擦眼淚，一邊表示感謝，因為她終於知道了自己丈夫的經歷。邢同義在天水舉行的《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的簽名售書會上，有三個人一直默默站在一邊，直到快結束的時候，他們才找到邢同義，原來他們是夾邊溝的一位死難者的親屬，他們掏出一張 50 年代的工作證和一些舊照片，讓他辨認，是否認識當年死在夾邊溝的親人。

2006 年 5 月，由中國小說學會主辦的中國小說學會第二屆學會把短篇小說獎頒發給了楊顯惠的《上海女人》。小說故事講的是一個善良柔弱的普通女性，除了對丈夫的一腔忠貞，完全不明白反右這場橫禍是怎麼來的。她千里迢迢來到夾邊

溝，想不到丈夫早已餓死，死後拋屍荒野。她把帶來的食物分給其他難友，爭搶場面令人震悚。女人默默地到墳地撿起丈夫的遺骨，用一條難友給的毯子包起來，背著白骨，離開了夾邊溝。小說獎的評語是這樣說的，「在包括《上海女人》的《夾邊溝紀事》系列小說中，楊顯惠以含蓄節制的風格，通過一些倖存者對三四十年前歷史事件的重述，表現了人在面對饑餓與死亡時的慘烈、堅韌乃至從容，使作品獲得了巨大的歷史穿透力和精神衝擊力。」18 小說獎本身就是一種對反右的無聲的道德評判。

「夾邊溝故事」講述的是一種人生災難的極端處境。政治權力以把罪人改造成新人的名義，把人變成只受動物本能驅使的非人。極端處境展現的是每一個普通人都能懂得和設身處地體會的生存絕境和求生欲望。當死亡慢慢地逼近這些政治犯的時候，政治已經失去了任何意義，剩下的只是生命的極度脆弱和輕賤。懲罰和死亡已經不需要理由，只是偶然的，荒謬的事實，但卻仍然一刻也不放鬆地奴役著這些賤如螻蟻的中國人。與這些令人刻骨銘心的身心折磨聯繫在一起的就是「災難」最根本的含義， 災難的邪惡和災難的非正義。以人的生命為反右災難付出的苦難代價是不允許用空洞政治概念來漂白和淡化的。

六. 全球化時代的災難和創傷記憶: 反右為什麼錯了？

災難敍述是在具體而特定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環境中發生的。統治權力的利益和結構會對創傷構建過程維持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其中的因素包括，誰控制了政府？誰控制了社會秩序？公眾是否可能發揮獨立的影響？誰擁有報紙？媒體在多大程度上獨立於政治權力？法院是獨立的嗎？獨立的律師行動範圍有多大？教育政策的獨立性如何？是否必須服從統治官僚的意志？由於災難敍述必然引起人們對共產黨長期統治的人權紀錄和道德合法性的質疑，因此不得不受到延續這一統治的政府嚴格限制。這是不奇怪的。但是，在國家之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全球環境。

在全球化的今天，對反右災難和創傷記憶的構建有了遠比先前寬廣的歷史比照和世界聯想空間。歷史比照和世界聯想使我們對災難和創傷構建的基本方面看得更加清楚，也使我們可以用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尺度去衡量象反右這樣的災難事件。在災難記憶構建中，對災難的公共敍述起著關鍵的作用。對整體社會

有道德教育作用的災難記憶，不可能，也不應當在重要的公共領域中，尤其是法律領域中被消除和缺席。厘清災難責任必須從法律責任開始。二戰後對納粹首惡判罪的紐倫堡審判就是一個先例。

歷史比照讓我們看到了法律在反右創傷記憶構建中完全缺席了。文革之後，至少還有一場對「四人幫」的審判來確定這場災難的刑責罪行。法律不只是給具體的個人定刑責罪行，而是代表整個社會對事件本身作出有權威的總體對錯判決。只要審判「四人幫」的結論還得到維持，就很少有人會公開挑戰公眾輿論，明目張膽地為文革辯護。但是反右的情況卻不同，雖然官方承認了反右的「擴大化」，造成了幾十萬右派的冤假錯案，雖然有成千上萬人遭受折磨、摧殘甚至死亡，但卻沒有任何人必須為此承擔任何法律責任。作為社會最重要的制度性道德權威的法律在反右事件上至今沒有做出對錯裁決，使得有些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稱，反右「沒錯」。

歷史比照還提醒我們，人們對災難邪惡的認識是一步步加深，一步步獲得普遍道德意義的。國際道德普遍化的過程是從 1945 年紐倫堡審判開始的。對納粹首惡的審判擴展成為這樣一種普遍的道德準則，那就是，某些十分罪惡的行為是，也必須被確定為「對人類犯罪。」19 公開審判本身就應該以公眾的正邪共識為基礎，「(紐倫堡)法庭懲罰罪犯的權威直接來自戰爭的勝利，間接來自一個雖無形但真實的理由，那就是世界良心的覺醒。」20 紐倫堡審判在世界各國廣泛報導，「對人類犯罪」、「世界良心」和「人類良知」這類說法也因此成為具有普遍人類意義的道德概念。紐倫堡審判後的第二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95 號決議，強調聯合國將遵循由紐倫堡審判所確立的國際法原則。兩年以後，聯合國發佈了「人權普遍宣言」，宣言在前言中提到了對納粹暴行的記憶，稱這一暴行為「人類良知所不能容忍。」1950 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在解釋「宣言」的原則時明確指出，提倡和堅持人權，為的是要防範國家對公民的侵害。21

現有的國際道德共識讓我們可以把「災難」和「創傷」從道義意義的「邪惡」轉化為法律和政治的「違反人權。」 造成「迫害」和「苦難」的原因，是因為公民的人權被政府剝奪了，並完全沒有反抗的條件。對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的意義就是經歷了這樣一種轉化。「大屠殺」這個辭彙現在已經特指一種新的國際行為的標準。就在它的道德和人權標準國際普遍化的同時，它的「教訓」也變得

更清晰，更有束縛力了。由於「大屠殺」的教訓，人們對哪些是政府不應當做的事情，知道得更具體了，也更堅持了。違反人權不是普通的人侵害他人，而是由政府組織和策劃的人侵害他人。人權不只是保護個人不受侵害，而是保護個人不受國家政府的侵害。

今天的全球人權共識使我們能夠重新提出反右為什麼錯了的問題。反右是「錯了」，還是「沒錯」直接關係到反右災難記憶的合理性。但是，即使那些認為反右錯了的人們，他們對「反右為什麼是錯的」，仍然存在著實際的分歧。一般的說法是，那些所謂的右派，其實是對黨和政府提出善意的批評(當然，有許多右派連這樣的批評也根本沒有提過)，他們本沒有反黨言論，所以不該把他們打成右派。右派被「錯劃」和「冤枉」，是因為他們原本很「忠順」。這種說法其實把受害者看成是理應效忠於權力統治的臣民。它的邏輯是，如果臣民不忠順(「不懷好意地批評」)，那麼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嚴厲懲罰他們。

但是如果比照由紐倫堡審判發展而成的普遍人權和公民權觀念，那麼上面這種說法則並不符合當今世界的普遍道德共識。一國的人民，他們對政府和執政黨提出批評，只要是在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範圍之內，就不應該因言獲罪。批評是他們的公民權利，與出於什麼動機沒有關係。一個政府動用國家機器對行使正當權利的公民進行迫害，無論被迫害者是否忠順於這個政府，錯都在這個政府。

全球化時代的人類普遍價值觀能幫助反右創傷記憶把反右受害的性質從「好人受冤枉」轉變為「公民權利受到國家政府侵犯」。從違反人權和公民權來看，反右就不再是一個平反的問題。歷史比照和同類聯想至少可以讓我們提出這樣兩個問題:第一，如果「反右」錯了，那麼犯錯政權的繼承者應該怎樣對公眾有一個交待？第二，在這種罪行發生時，其他公民做了些什麼或者沒有做什麼，負有怎樣的集體責任？

從國際人權共識來看，反右是一次制度性的作惡。這種制度之惡是國家在歷史中的非正義行為，巴坎(E. Barkan)稱之為「國家之罪」。不同的「國家之罪」受害範圍和傷害方式有不同，但都是「蓄謀的、系統的、有組織的暴力，這種暴力針對某個打上汙名的集體的成員，而汙名集體則是用原初特徵的方式或意識形態的方式來劃定的。」22「右派」這個「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中的一類，就是這樣一種打上了汙名的集體。國家曾經對「右派」這個汙名集體施加了蓄謀的、

系統的、有組織的暴力，進行了迫害和摧殘。汙名曾經有效地把右派同中國社會的其他部分分割開來，使他們在受迫害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社會的其他部分對他們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

既然反右是非正義的行為，那就必須有人應該承擔罪責。不承認有罪責行為者，也就是不承認傷害行為的非正義性質。承擔歷史中國家罪責的方式不一定是追溯非正義行為組織發動者的法律罪責，但必須承認這是非正義的行為。它的目的不一定是要懲罰非正義的行為者，而是要通過認識罪責，達到和解，並在此基礎上幫助建立一種正義的新社會關係。在當今世界的不少國家中，承擔歷史中國家罪責是用「道歉」的方式來表現的。

不少國家領袖都曾代表他們的國家道歉過。道歉必須是公開而鄭重的。道歉是一種「儀式化的清洗--洗滌」。公開的道歉是表明「人必須做正義之事，當正直之人。這種演示性的洗滌只能經由回到過去才能實現。」這就是反思歷史，「反思是通往洗滌的有效之途，那是因為反思可能使人淨化，當然並非一定使人淨化。有沒有得到淨化的標誌就在於是否承認錯誤。如果既不認錯，又不道歉，那麼法律意義上的懲罰雖然避免了，但象徵和道德意義上的污垢就會永遠存在下去。」23

道歉不僅對罪責承擔者，而且對整個社會都有洗滌作用，因為被國家之罪玷污的不僅是那些幹髒活的行為者，而且還有那些在國家之罪發生時，袖手旁觀的無行為者。道德的公共生活要求我們在非正義行為發生時，即使看上去與我無關，也要有所行動。吉森(Bernhard Giesen)說，「儘管沒有積極參與罪行，卻並沒有防止那些以群體的名義犯下的罪行，」24 指的就是這樣一種集體政治罪過。集體政治罪過的關鍵不在於「定罪」，而在於「懺悔」。承認集體政治罪過的懺悔，需要借助某種公開承擔的儀式，成為一種公開宣誓，而不只是一種私人性質的良心負擔。

構建反右創傷的意義在於，它可以讓中國社會在回顧歷史的時候，有一個自我洗滌的機會。它也可以幫助更多的公眾建立道德責任感。構建文化創傷，對於社會來說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它教育公眾如何辨認出人類苦難的存在和根源，如何擔負起一些重責大任，如何重新界定他們正義公正的群體關係。回顧過去是為了重新開始，正如大屠殺倖存者，1986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威塞爾所說，

「上帝創造人類的時候，告訴人類一個秘密，這個秘密不是如何開始，而是如何重新開始。」25 反右的災難發生在 50 年前，今天構建反右創傷記憶，不是為了沉溺在往日的痛苦回憶中，而是為了重新開始。回顧反右和文革，都是要借由讓廣泛的公眾得以參與他人的痛苦，擴大社會認同和同情的範圍，開創一個能實現新的社會團結的未來。

——為 2007 年 6 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發表於《當代中國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注 釋

1 Jeffery C. Alexander，「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In Jeffer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1. 在引用亞歷山大時，我援引的基本是王志弘的譯文。見王志弘譯：《邁向文化創傷理論》www.cc.shu.edu.tw/~gioc/download/jeffrey_Chinese.doc

2 對歷史災難的兩種認知模式，其他論者有相似的表述，例如，敏茲(Alan Mintz)在對美國社會如何記憶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研究中，歸結出兩種不同認知大屠殺的模式，一種是「特殊模式」，另一種是「構建模式」。特殊模式所認知的大屠殺是「獨一無二的」，「納粹要殺害所有的猶太人，將這些受害者投入屈辱的深淵，造成的大屠殺悲劇與其他災難既不可比，也不類似。」大屠殺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的」「黑暗真實性」，對這種真實的傷害可以有不同的表現，但決不能不承認。構建模式所認知的大屠殺則是一種本身沒有本質意義的歷史發生，大屠殺的「邪惡」是一種有「闡釋(者)共同體所構建的意義。不同的闡釋(者)群體出於不同的動機和需要可能作出不同的闡釋。」敏茲所說的「特殊模式」其實也是一種對災難的「客觀發生」認知。Alan Mintz，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Holocaust Memory in Americ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 pp. 36-42.

又例如，J. C. 亞歷山大把兩種認知模式的區別稱作為「常民創傷理論」和「文化建構理論的」區別。根據常民理論，「創傷是自然發生的事件，損害了個人或集體行動者的幸福感受。換句話說，損害的力量 —‘創傷’— 被認定來自事

件本身。對於這種損害事件的反應—‘蒙受創傷’— 在感覺和想法上，被認為是立即而不假思索的回應。根據常民觀點，創傷經驗發生於造成創傷的事件與人性互動之際。人類需要安全、秩序、愛和連結。如果有事情劇烈破壞了這些需求，那麼根據常民理論，人們無疑就會因此蒙受創傷.」 亞歷山大本人持「文化建構理論」的立場，他主張，「事件本身不會創造集體創傷。事件並非本然具有創傷性質。創傷是社會仲介的屬性。這種屬性可能會隨著事件展開，而同步造成；它也可能在事件發生之前造成，成為一種預示，或是在事件完結之後，成為事後的重構。」 Jeffery C. Alexander，「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pp. 2-3，8.

3 王紹光：《歷史的邏輯與知識份子命運的變遷 — 王紹光博士專訪》(http://www.tecn.cn) 2007-01-24.

4 同上。

5 同上。王紹光引述的是李敦白的回憶錄:《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丁薇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 139-141 頁。

6 Jeffery C. Alexander，「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p. 11.

7 Ibid.

8 Ibid.， p. 12.

9 Ibid.

10 這兩個例子都是 Jeffery C. Alexander 在他討論「痛苦的性質」時所舉的。Ibid.，p. 13.

11 Ibid.， p. 14.

12 Ibid.， p. 15.

13 對反右起因的兩種不同解釋可以用李慎之和朱正的分歧為例子。朱正在他的《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對此有所論述。
http://details.blogbus.com/logs/2006/07/29

14 張允若: 《讀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說詞》 傳播學論壇，
http://www.chuanboxue.net/list.asp? unid=1869 2007-2-26

15 關於反右的個人回憶敍述，例見，杜高的《我不再是我—一個右派分子的精神死亡檔案》、張元勳的《北大一九五七》，都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韋君宜的

《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雖九死其猶未悔》：葉篤義著，同上。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記憶：往事未付紅塵》：章立凡主編，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反右派始末》：葉永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枝蔓叢叢的回憶》：季羨林主編，牛漢、鄧九平執行主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沒有情節的故事》，同上。《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同上。《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牛漢、鄧九平主編，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同上。《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同上。《親歷一九五七》：徐鑄成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戴煌著，學林出版社，2000， 等等。

16 「後記憶」是 Karein Goertz 提出的一個概念，它指的是一種「間接見證者」(secondhand witnesses)的敘述方式。間接見證者以後記憶來表達與特定歷史過去的關係。後記憶是一種繼承而來的，並非親身經歷的過去。但這個過去卻成為間接見證者是誰的一個有機部分。「後記憶」與「記憶」的不同在於它沒有直接見證者那種親身的經歷。「後記憶」與客觀「歷史」的不同在於它具有極深沉的個人感情投入。後記憶揉合了記憶和歷史。法國小說家 Henry Raczymov 和德國女小說家 Esther Dischereit 的大屠殺題材小說《無聲的叫喚》(Un cri sans vois, 1985)和《裘米的桌子》(Joemi’s Tisch, 1988)都是大屠殺後記憶的代表作。Karein Goertz, 「Transgenerat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Holocaust: from the memory to ‘post-memor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72：1（Winter 1998)：33-39, p. 33.

17 我在本節中對夾邊溝和夾邊溝文學的介紹，主要就是轉引這篇報導。 羅四鴒:《翻開一頁塵封四十年的歷史》(《文學報》專稿)，wenxue.news365.com.cn/tgzg/200504/t20050428_486143.htm, 2005-04-28.

18 《走近中國小說學會》半島網-半島都市報，http://www.bandao.cn/news_html, 2006-05-26.

19 R. F. Drinan,」Review of Ann Tusa and John Tusa, The Nuremberg Trial.」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 : 2 (1987): 333-334, p. 334.

20 Quoted by Jeffrey C. Alexander,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ral Universals: The Holocaust from War Crime to Trauma Drama.」 In Jeffer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p. 250.
21 R. F. Drinan,」Review of Ann Tusa and John Tusa， The Nuremberg Trial,」p. 334.
22 Elazar Barkan， Guilt of Nation : Restitution and Negotiating Historical Injustic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3.
23 Jeffrey C. Alexander，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ral Universals,」 p. 244.
24 Bernhard Giesen， 「The Trauma Perpetrators: The `Holocaust’ as the Traumatic Reference of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In Jeffer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p. 130.
25 Elie Wiesel，「Why I Write？」In E. Wiesel，From the Kingdom of Memory.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90， p. 21.

為什麼很多右派會低頭認罪？ 胡平

當年的右派份子、作家舒蕪寫道:「二十一年後重新審查當時各單位的『反右』運動，幾乎都是百分之百地『擴大化』了。我被『擴大』，開始是想不通的，但經過大會壓、小會追，終於想通了我為什麼是『資產階級右派』的道理；我們那裏別的『右派』中，完全自覺冤枉的不知有沒有，至於清醒堅定地始終相信真理在手的，我看不出有誰。國外有人說這是一種’政治催眠術’，倒是一個很有趣的比喻。」

舒蕪這段話告訴我們：在反右鬥爭的初期，大部分右派對被強加的罪名都是不承認的，而後在持續的壓力下才終於「低頭認罪」；然而這種認罪又並不僅僅是迫於外部壓力的違心之論，而是程度不等的真心悔過。這就和古今中外屢見不鮮的苦打成招有所不同，因為在苦打成招的事例中，當事人內心是自覺冤枉的；而反右鬥爭以及毛時代的其他許多政治運動的結果卻是，它最終使得受害者自己也

認為自己果真犯下了他實際上不曾犯下的罪過。

那麼，這種奇特的思想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不錯，「政治催眠術」是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但它也祇是一個比喻而不是解釋。以下，我將試圖對此一現象給出我的解釋。

1、政治判斷的特殊性質

劉賓雁講過，他自己後來之所以低頭認罪，「全國工農憤怒聲討右派震耳欲聾的吼聲就起了不小的作用」。這種情況大概是很普遍的。可以說，大多數右派後來低頭認罪，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們遭受到廣大群眾一致的強烈批判，因此對自己原先的觀點或主張產生了動搖、懷疑，直至最後的自我否定。因為一般來說，政治觀點的是非對錯是根據它是否能夠贏得別人的贊同為標準的，當你發現你的觀點遭到眾人的一致反對，你就很容易陷入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

這裏不妨再談談實踐標準的問題。我們知道，在 1978 年，中國展開過一場有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在政治上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在理論上卻是站不住腳的。把實踐標準應用於政治觀點或政治主張實在是大錯特錯。譬如說，你如何去反駁「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這句話呢？如果這個殺人的政權果然又坐穩了二十年江山，難道就證明了殺人的主張是正確的，反對殺人的主張倒是錯誤的嗎？深入思考便可發現，當我們反對「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這句話時，其實我們並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基於價值。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殺二十萬人不可能換二十年穩定。我們的意思是說用殺人的辦法換取穩定以及刺刀下的穩定嚴重地違反我們的道德信念。我們不是說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不可能，我們是說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不應該。在這裏，我們爭論的不是「是不是」的事實問題，而是「該不該」的價值問題。

所謂價值，主要是涉及人們對善惡美醜的感覺，通常我們稱之為道德感和美感。不過這裏的「感」是心靈之感而非感官之感。我們覺得殺人是惡的，花是美的，那和我們覺得糖是甜的，冰是冷的顯然不是一回事。後者衹涉及我們動物性的生理結構，前者還涉及我們人性的心理結構。在《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二書中，康得分別對道德判斷與審美判斷進行了研究。他提出了一條道德的絕對命令:「我一定要這樣行為，使得我能夠立定意志去要我行為的標準成為普

遍規律。」這條絕對命令的意思和古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十分相似。它對政治思想的意義無疑是非常重大的。但是，按照漢娜。阿倫特的分析，康得對審美判斷的見解更有啟發性。和一般人把審美判斷僅僅視為趣味問題，僅僅視為純個人性的問題這一觀點不同，康得認為審美判斷在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的功能。首先，凡是你認為是美的，你一定也相信別人同樣會認為是美的。其次，祇有在和他人交流溝通的情況下，你才能確有把握地獲得關於某物是美的這一判斷；換言之，你不可能在完全孤立的狀態下獲得明確的審美判斷。美感是主觀的，但不是任意的；它不是純個人的，而是與他人共有的。正是在這一點上，審美中的價值判斷和政治思想中的價值判斷極為相似。

對政治問題的認識會使我們心中產生一種特殊的感覺，覺得這件事是好還是壞，是善還是惡，我們認為別人也應該和我們具有同樣的感覺。這種感覺即使可以獨立地發生，但倘若不和他人交流而獲得他人的共鳴，它就祇能是模糊的、朦朧的，如果我發現我和別人的感覺不一致，我不可能像對待純口味問題那樣，對這種不一致置之不理，我必然會尋求一致，但是我又不能像確定自由落體定律那樣找到一種客觀的測度驗證手段，我祇有訴諸交流和辯論。這種交流和辯論可能包含著大量的邏輯問題和事實問題，但是並不能完全歸結為邏輯問題和事實問題。我不可能找出一種邏輯或一件事實迫使認錯；我祇能通過一系列分析說明，最後訴諸于對方的內心，期待對方心中也產生和我一樣的感受。除非得到別人的認可，否則我很難對自己的判斷產生信心。當伽裏略迫於教會壓力而放棄日心說時，他還講了一句話：「可是，它（地球）畢竟是在轉動的啊！」這就是說，在舉世皆表反對的情況下，一個人仍可以對自己所持的某一知識判斷深懷信心。在價值判斷上就不同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反對你的觀點，你就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起碼是自我懷疑。

2、四面楚歌導致自我懷疑

我們知道，反右鬥爭的第一步就是點名批判。它把被批評者從人群之中劃分出來，並且動員其他人共同參與批判，形成所謂群眾運動，造成鋪天蓋地的聲勢，從而使得被批判者感到極大的壓力。面對著黨和群眾的批判，被批判者處境之尷尬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党是「偉大、光榮、正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因此，

你若是反駁黨和群眾的批評，豈不是大有和黨對抗，和群眾對抗的可怕嫌疑？我們知道，在每一次批判運動中，都少不了會有一番「幫助」被批判者「端正態度」的插曲。所謂「端正態度」，就是要求被批判者從一開始就承認對方的善意，對方的正確，也就是從一開始就放棄任何可以抵制批判的理由或立場，否則便被視為「對抗運動」——那本身就是一個可怕的罪名。在批判者方面，不少人既然認為自己正處於受命批判他人的高人一等的地位，因此他們總希望看到被批判者低首下心，作恭敬狀，因為那便表明他們的優越得到了承認。如果被批判者竟然爭辯反駁起來，他們就感到自己受到冒犯。如果你說你是對的，那豈不是等於說黨錯了，群眾錯了嗎？那豈不是等於說你比黨，比群眾還高明嗎？於是，這些人果真會對你產生憤慨。這樣一來，你的處境也就更危險了。你不得不發現還是放棄爭辯為好。

在共產黨那裏，批判是階級鬥爭，它從來不是平等的辯論，而是單向的口誅筆伐。其特點是：粗暴，武斷，強詞奪理，斷章取義，無限上綱；更要命的是，這種批判是不由分說不容爭辯的。你本來或許還胸有成竹，以為你可以舌戰群儒，澄清問題，說服對方，但事到臨頭你卻發現滿不是那麼一回事，你不但不能還手，甚至不准招架。不消說，這種大批判很難讓你心服口服，但是它足以使你強烈地感到別人都是反對你的，你的觀點是被眾人唾棄的。你也許感到很冤枉，但同時也就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危機，開始產生了自我懷疑。

3、孤立於集體之中

在進行了群眾性的大批判之後，共產黨的下一步手段是將被批判者儘量地孤立起來。孤立對人心造成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人天生是群居動物、社會動物。即使對於少數秉性孤獨者，被孤立也是一種難熬的刑罰。孤獨和孤立都是指離群索居的狀態，但一為主動，一為被動。孤獨是主動的孤立，孤立是被動的孤獨。孤立本身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將你和眾人互相隔離，一種是讓你繼續生活在人群之中，但別人都不理你。後者我稱之為「孤立於集體之中」。

試比較兩種孤立產生的不同效果。假如當局僅僅用強力將你與眾人隔離分開，從外表上看，你的孤立是徹底的，但在內心裏，你反而可能會覺得自己並不那麼孤立，你依然可以在想像中繼續與他人保持交往。你可以認為別人不來接近

你僅僅是由於不能或不敢而非不屑不願，你可以認為自己仍然受到眾人的支持或同情。你甚至還可以認為自己深得人心，廣受擁戴。在這種孤立狀態中，你比較容易把自己的境遇更多地歸咎於少數掌權者的錯誤，你還可以相信群眾，相信你的親人和友人，因此你就會認為自己其實並不孤立。畢竟，強制隔離狀態是非正常狀態，因此你總是可以懷抱一種一旦回歸正常狀態事情就會改觀的或真實或虛假的幻想。這種狀態誠然令人痛苦，但卻未必能輕易地摧毀你的希望。「孤立於集體之中」的滋味就大不一樣了。正因為這種狀態在表面上看是正常的，所以它能更無情地剝奪掉你的一切幻想。你仍然像過去一樣成天和原來熟悉的人們共同生活，但你處處感受到別人的異樣目光。眾人都對你視而不見，或者是向你表示輕蔑。連舊日的友人也待你像麻瘋病人一樣地避之唯恐不遠。有的人回到家裡都見不到好臉色，妻子兒女也要和你劃清界限。你可以勸慰自己說那祇是出於恐懼，可是你對這一點卻不能有多少把握，因為別人的表現看起來好像不是出於不敢而是出於不願。你可以認為這中間發生了不幸的誤解，但是既然沒有幾個人願意傾聽你的訴說，那又不能不給你一種印象，似乎在眾人心目中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並沒有甚麼誤會和冤枉。在這時，你不大容易明確地意識到掌權者的暴力，你更強烈體會到的祇是群眾對你的排斥，拒絕和嫌棄。於是，你從內心深處感到徹底的孤立。

孤立狀態會深刻地影響到一個人的理智和認知。首先，正如我先前講過的那樣，人對政治問題的是非善惡的價值判斷祇有在與他人交流而獲得共鳴的情況下才可能清晰，才可能確認。與眾隔離的孤立使你失去參照系而陷於自我懷疑；孤立於集體之中則使你面對顛倒的參照系而陷入自我否定。兩者都會使你對價值的感覺變得模糊、暖昧，從而更容易屈從于別人強加於你的那套觀點。共產黨常常要人「隔離反省」，其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它的觀點的影響力。也許有人會提醒道，平時我們不也認為一個人在離群獨處，靜坐沉思時最能獲得清明無蔽的認識嗎？古人說「閉門思過」，那不是和「隔離反省」的意思差不多嗎？不然。因為獨處靜思是一種主動狀態。在獨處靜思中，一個人排除了別人的直接影響，但同時卻沒有排除掉他和別人自由交往的經驗。他無非是獨自地把先前與別人自由交流的經驗細心地安排整理而已。所謂隔離反省，是指你在周圍輿論的一片否定聲中被迫進入孤獨的思考。你好比帶了一本號稱權威但實則謬誤的字典去獨自閱讀你內心

的那本書，結果衹會越讀越糊塗。

據說在當年納粹集中營中，大部份人都陷入精神崩潰狀態，能夠較好地抵制壓迫和堅持原有信念者，就群體而言是兩種人：一種是共產黨人，一種是宗教信徒。這是因為這兩種人都屬於那種堅強緊密的團體，在精神上他們不是孤立無依的。他們有著自己的另外一套精神資源或曰參照系，他們可以由此而保持自信。霍弗爾（Eric Hoffer）指出，當個人面對著巨大的壓力時，如果他衹是孤零零的個人，那是不能抵抗的。「他力量的唯一源泉在於，他不衹是他自己，他乃是某種強大的、光榮的、不可戰勝的東西的一部份。」霍弗爾講得對：「在這裏，信念問題首先是個認同（identification）的問題。」我們知道，不少黨員右派份子，也包括不少共產黨老幹部，在昔日遭受國民黨的壓制時尚能表現得相當頑強，但一輪到在共產黨自己的政治運動中挨批鬥就完全變成了另一副模樣。有人解釋說那是因為共產黨整起人來更兇狠，這話不全對。不管怎麼說，一個人僅僅是挨幾場批判（如果不伴以肉體折磨的話）總要比坐監獄好受些。關鍵是在前後兩種不同的情況下，當事者的認同變得很不一樣。過去，國民黨指責你是共產黨而打擊你，你正以身為共產黨員而無比驕傲，你的精神當然不會垮。如今，偏偏是共產黨自己反過來指責你不是共產黨，指責你是反黨份子，試問你如何去抵禦？你自命為愛國主義者，可是你卻遭到來自「國家」的嚴厲批判。你相信自己在為民請命，可是卻遭到「人民」的無情唾棄。如果你在打擊面前深信自己與主同在，與黨同在，與人民同在，與歷史同在，你感到自己有巨大的靠山，你就會有力量感。反過來要是你無法相信這種種「同在」，你就會發現自己極其軟弱無力。因為在這時，你感到你已經「從那構成生命本質的每一樣事物中孤立了出來」（布哈林語）。

4、缺少單獨的精神支柱

索爾仁尼琴指出，共產黨的政治迫害之所以對大多數人威力無敵，原因之一是大多數人「沒有單獨的立場而缺乏進行鬥爭的精神支柱。」這無疑也是廣大右派低頭認罪的一個重要原因。自 1949 年以來，中國大陸便不存在任何真正獨立於共產黨的團體。我們每個人都屬於那個獨一無二的黨和國家（state）。一旦我們被黨和國家拋棄，我們就會變得徹底的無依無靠。在精神上，我們從來就缺少外在超越的宗教。我們追求的各種價值，歸結起來大致總脫不開為國為民這些世俗

的目標（至少是不能反對這些目標）。因此，當共產黨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以國家的名義和人民的名義，指責右派份子犯了「不愛國」和「反人民」的錯誤時，我們祇有拚命地辯白，卻沒有另外的一種立場可以據之從事理直氣壯的反對。從傳統中汲取力量嗎？很不幸，傳統早就受到衝擊而失去了它的權威，歷史已被割斷。譬如說，我們很難再以屈原、海瑞自命。再說我們的傳統本身也往往是立足於種種世俗的價值之上。海瑞敢於罵皇帝，是因為他知道他的行為被清議所認可並為百姓所稱頌。共產黨為甚麼要不遺餘力地製造「輿論一律」並一再動員群眾參加批判，目的就在於剝奪掉海瑞式人物的精神後盾，剝奪掉他們藉以傲對權勢的那種道義資本。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無法依靠內在的良知。因為所謂良知，無非是指人心固有的對善惡是非價值的感覺，它是內在的，卻必須通過與他人的交往才能確立。當周圍的人們都發出相反的聲音時，良知也會沈默，因為它自己就陷入困惑。

索爾仁尼琴講得不錯：斯大林在布哈林們成為反對派之前就宣佈他們是反對派，這就使他們失去了威力。那反過來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先就打定了主意「反黨」，黨再來指控我們「反黨」，我們就不大在乎了。怪不得那些真正的反對共產黨的右派份子，在反右鬥爭的風暴面前反倒比較鎮定。不過細想下去這中間仍有破綻。因為「反對」本身不是一種獨立的立場，「反對」祇是基於一種立場對某一特定事物的態度。換言之，我們總還需要有另一種東西為憑藉才能理直氣壯地去反對，我們總是因為贊成什麼東西所以才反對另外的什麼東西。通常，這就又回到「為國為民」一類目標上去了。我們是為了人民而反黨，所以我們不害怕黨指責我們「反黨」，但是黨卻堅稱反黨就是反人民。如果「人民」都表示和黨一條心，「人民」咬定反黨就是反人民，我們就又沒有立足之地了。除非我們假定人民正在受欺騙，人民終有一天會恍然大悟。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假定歷史會在我們一邊。可是我們又如何確信歷史會在我們一邊呢？須知那時候共產主義革命看上去來勢洶洶，方興未艾。除非我們相信天國，相信末日審判，從而也就是相信現實世界中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足以動搖我們的信仰，我們和上帝直接相通。有些天主教徒後來告訴我，在過去那段時期，許多天主教徒都表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這倒很可能是真的。祇是話說回來，像這樣堅定的教徒（不論是甚麼教的教徒）終究少而又少。這就是為甚麼在反右運動中，大多數右派都無法抵禦那種精神壓

力，因為我們是如此普遍地不具有另外的精神資源。我們是真正的無家可歸。

5、從迷亂到順從

在壓力下，被壓迫者一般都會產生向壓迫者認同的願望。對於反右運動中的大多數人而言，問題還要更簡單一些，因為在這裏，大多數人本來就是認同共產黨的，起碼是不曾明確地自覺地反對共產黨，所以他們在壓力下常常會進一步地順從共產黨。普通人總以為壓迫會導致反叛，他們不知道壓迫也會強化忠誠。共產黨發動政治運動就是運用壓力去強化人民的忠誠。這種忠誠可以被強化到如此的地步，以至於一個人可以極為痛苦而又相當真誠地承認自己犯下了自己實際上從未犯過的「反黨」罪行。

這一奇特的過程的確是相當複雜的。首先常常是動機與效果統一論發揮作用。你本來不反黨，不反人民，黨卻咬定你反了，「人民」也異口同聲地說你反了。你百般申辯而對方卻不為所動。於是你不得不意識到，你雖然沒有反黨反人民的主觀動機，但不幸卻造成了反黨反人民的客觀效果。畢竟，客觀效果這個東西，顧名思義，那就不是依你的感覺為准，而是依對方的感覺為准。毛澤東打比方道：一個醫生祇顧開藥方，治死了多少病人他是不管的，行嗎？當然不行。其實，毛澤東這個治死病人的比喻並不恰當。因為治療效果的好壞是客觀的。所謂客觀，不但是說它必須以病人的狀態為標準而不能以醫生的狀態為標準，它還是說這裡所指的病人的狀態也是客觀的，即可以進行客觀量度的。一種病到底是治好了還是治壞了，單靠醫生說固然不算數，單靠病人說也同樣不算數。在這裏存在著一種中性的，為大家公認的物理和化學的檢測手段。它看來像是一個價值問題，其實是一個事實問題，起碼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為事實問題。純粹的思想意識的是非對錯則與此不同，因為其間往往並不存在甚麼客觀的物理和化學的檢測手段，它往往祇能是主觀的心理的感覺。我出於愛護你的動機講出一句話，你卻以為這句話傷害了你。這就不是一般而言的客觀效果的問題了。你的感覺固然於我是客觀的，但本身仍然是主觀的。你可以說你覺得那句話傷害了你，但你不能據此斷定那句話客觀上就造成了傷害的效果，否則天下就沒有誤解這回事了。假如對方聽不進你的解釋澄清，而你又不願意對方有被傷害的感覺，你可能會同意收回那句話，但這不意味著你已經承認那句話本身就產生了壞的客觀效果。

以上這番道理，共產黨不明白，也不想明白，甚至於故意裝作不明白。說話者自己恐怕未必都十分清楚。因此，當共產黨一口咬定你的某種思想觀點意生了惡劣的客觀效果時，你自己也可能以為確是如此。於是，你衹好承認你的觀點錯了，雖然你並不知道它究竟有甚麼錯，但你還是決定去改正它。面對這個明顯的矛盾，〞立場〞概念便顯得頗有說服力。你納悶：為甚麼你自己認為正確的觀點，黨和人民卻認為是錯的呢？那大約是你沒有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想問題的緣故吧。可是你分明又意識到你本來是一心一意替黨和人民去著想的。那是不是因為你主觀上想站在正確的立場上，但客觀上還是站到錯誤的立場上去了呢？這是否證明你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立場、資產階級世界觀，在你不自覺的情況下頑強地表現自己呢？可惜的是，立場並非一個地理位置，它好像在和你搞惡作劇，永遠處於你的對立面。列寧講過，歷史喜歡跟人開玩笑。你本來想進這個房間，結果卻進了另一個房間。你百思不得其解。在這時，從眾性便發揮作用了。不論是出於「黨和人民總不會錯，千萬不要站在黨和人民的對立面」的角度，還是出於「隨大流更安全」的角度抑或是出於二者的混合，最後你決定要「承認錯誤」。

有時候，事情就到此為止。你認錯了，黨也就原諒你了。但更多的時候則不然。在很多時候，黨還要進一步追問你：既然你承認自己的思想是錯誤的，可見你本來就懷有惡劣的動機。這就更讓你百口難辯了。你好像落進了「既說了一就要說二」的境地，不承認自己曾懷有惡劣的動機似乎倒不合情理了——別人顯然是這麼看你的。於是，你努力挖掘內心深處，看是不是有甚麼不可告人的惡劣念頭。通常你總會成功的。且不說以人心的複雜微妙，誰不曾產生過各種稀奇古怪的念頭？有些念頭根本是隨機的，並不受意志的支配。也不必說反省的暖昧，這點休謨早就講過了。單單是外界輿論的不斷指控，正好起到了心理學上的暗示作用，你越是害怕找到甚麼。你倒越有可能情急意亂地自以為果然找到了甚麼。好的動機可以解釋為壞的動機。譬如說，為國為民的願望可以解釋為出風頭、個人主義。原先沒有過的動機也可以被認為曾經有過。你會變得糊塗起來，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你可以相信現在的你是好人——這點是當下自明的，但你對過去的你就沒有多大把握了。你可以相信自己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但你可能弄不清楚你過去是不是一向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是否有過不擁護或者反對的時候。你也許還不至於自我否定，但你很可能已經陷入自我懷疑難

以自拔。而對於黨要你認罪即否定過去的自我這一點而言，那差不多就夠了。

劉賓雁這樣寫道:「是被迫認罪嗎？不全是，是心甘情願嗎？也不是。我在那一式六份右派結論上簽上自己的姓名時，心情是淡然的，近於麻木。我似乎真正認為自己確是那幾條罪狀的罪犯, 但在內心深處, 又沒有一條我不是半信半疑的。」事實上，到了這一步，簽字不簽字已經無所謂了。大多數人是會簽字的。人在自信心倍受摧殘的時候總是比較容易受人擺佈的。

6、與壓迫者認同的情感需要

大概在所有低頭認罪的右派當中，上述這種「從迷亂到順從」的類型最為普遍。許多人都是經由類似的心理活動。最終承認自己有錯或有罪。完成這樣一種複雜曲折的心理活動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開始，幾乎人人都想不通，不服氣，到後來才漸漸地表示通了服了。在這裡, 共產黨的另一手策略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那就是所謂「給出路」。黨宣稱犯了錯誤的人衹要認了錯，黨和人民就會歡迎你，讓你重新回到人民隊伍中來，否則就是自絕於党，自絕於人民，死路一條。

我們知道，被孤立、被排斥和被拋棄的滋味是十分難受的——這裏還且不說被處分被下放被勞改。它不但會造成理智上的混亂，更會導致情感上的焦慮。為了免除這種可怕的焦慮，許多人寧願不惜一切代價。因此事情往往是這樣的，許多人還在想通服氣之前，就已經急不可待地決定放棄自己原有的觀點，以便早日「回到人民的懷抱」了。有這種強烈的情感需要為前提，還有甚麼認識上的彎子轉不過來的呢？在這時，你的認罪很可能是誠心誠意的，但是嚴格說來，那與其說是你誠心誠意地想認罪, 不如更準確地說是你誠心誠意地想「回到人民的懷抱」。

綜上所述，大多數右派之所以低頭認罪，首先是由于巨大的外界壓力而導致巨大的恐懼，其次是極度的孤立與四面楚歌的困境，由于大多數右派缺少獨立的精神資源 無力從事單槍匹馬的抵抗，故而很容易陷入迷亂、惶惑幷失去自信，以爲自己真的錯了，再加上急于「回到人民懷抱″的焦慮，所以紛紛表示悔過。這一過程兼有自 覺與不自覺、被動與主動的二重性。這就是中共宣揚的「思想改造」。在不同的程度上，生活在共産黨統治下（尤其是毛時代）的絕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都經歷過類似的「思想改造」，右派分子不過更典型而已。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

討會》上的發言。

我所知道的「反右鬥爭」和「右派份子」 朱學淵

一、「反右」是毛澤東的流氓術

1957 年我才十五歲，但已經蒙朧地感到自己不適應那個社會，開始想知道陰暗面和外國的事情，誘因是厭倦學校的集體活動。前一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報告」後，社會主義陣營的陣腳大亂。那時《文匯報》連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回憶錄《斯大林時代》，我每天放學走到兩里路外的閱報欄去讀它，雖然一知半解，但也知道了一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恩怨。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覆滅的啟端，也可以認識毛澤東陰謀一生的一個側面。

1949 年，毛澤東發誓「一邊倒」的時候，他對斯大林和蘇共就早已懷恨在心了。赫魯曉夫在二十大的秘密報告流傳到西方後，1956 年 4 月 15 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此文儘管說了一些溢美死人的好話，但表白了毛澤東與追隨斯大林的教條主義者的長期鬥爭，它的基調是贊同批判「個人迷信」的，毛澤東是準備要在這場風波中撈點油水的，他以為接替斯大林的地位時機已經到來。

1956 年，事態一直朝著不利蘇共的方向發展。六、七月間，波蘭發生波茲南鐵路工人鬧事 1，毛澤東則幸災樂禍。當時的新華社駐華沙記者謝文清 2，在幾十年後告訴我，他曾經寫了一份「內參」，報告波共執政錯誤和工人鬧事有理的根據。毛澤東看了這份內參後，如獲至寶，親自批示，並在黨內通報表揚謝文清。毛澤東借波茲南事件打壓蘇共，造成赫魯曉夫在波蘭問題上手軟，最後接受哥穆爾卡的復出。

然而，事態繼續發展。十月間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迅速地把毛澤東的「幸災樂禍」轉化為「憂心忡忡」。他一反當初認為波蘭工人「造反有理」，翻轉臉來逼赫魯曉夫鎮壓布達佩斯的「反革命暴亂」。1956 年 12 月 29 日發表的《人民日

報》社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說：「在過去時期的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打擊，以致反革命分子在 1956 年十月間能夠很容易地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組織武裝叛亂。」

1956 年，赫魯曉夫的處境很困難，只能由得毛澤東任意指鹿為馬。而毛澤東就開始發明什麼「兩類矛盾」及其「轉化」的「理論」，即：「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於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這不僅圓了他對波、匈事件截然相反的荒唐立場，同時也為 1957 年的「幫助黨整風」轉化為「引蛇出洞」，預設了陷阱。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花言巧語號召「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幫助黨整風」，中國的民主主義政治家們未能認識這個專制主義陷阱，還以為是「政治的春天」的到來。5 月 15 日他就向黨內發佈〈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密示，要「誘敵深入，聚而殲之」。6 月 8 日他在《人民日報》發出「反右」信號彈〈這是為什麼〉，6 月 19 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說是毛澤東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其實內容卻全部篡改，春天已經轉化成為寒冬。

毛澤東與生俱有惡劣的天性，後天又耳濡目染湖南農村的流氓習氣。1957 年「反右」只是他的系列陰謀中的一次，「文革」則又是「反右」的後續，其間他年年都有花樣，而且所向披靡。既然「陰謀」可以無往不利地實施，當然他也可以無恥地聲稱它是「陽謀」了，這與「我是流氓，我怕誰？」沒有任何區別。

眾所周知，1957 年夏天，毛澤東的湖南同鄉羅稷南問他，要是魯迅活著會怎樣？毛澤東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其實，毛澤東造就一個「無言論環境」的企圖在三十年代就發作了，江西蘇區的「富田事件」殺人如麻，殺的都是不擁護他的紅軍官兵。「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後，他則是逐次、按比例地將一部分人民、一部黨內同志「轉化」為「敵人」，使整個民族分批發生恐懼，其中又以「文革」最殘酷，「反右」最卑鄙。

1965 年，毛澤東與劉少奇為「四清」問題發生爭論，他當著一群「党和國家領導人」惡狠狠地對「少奇同志」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今天中共統治集團成員的父輩，大多見識過毛澤東流氓術，但他們

的特權又是基於毛澤東流氓術造就的中華民族的恐懼，去年我們紀念「文革四十周年」，今年紀念「反右五十周年」，都旨在消除這種恐懼；而中共統治集團反對我們舊事重提，則是因為毛澤東的流氓小指頭，還有為後人牟利的價值。

二、什麼人會是「右派分子」？

「反右」剿滅了中國民主主義者，使他們的「多黨制」訴求成為「罪惡」，膽小的中國人至今聽了「多黨」還害怕。然而，「反右」又大大超越了鎮壓制度訴求的政治層面，大批科學、文化、藝術工作者，數以十萬計的中小學教師，因為對黨委、對黨支部、乃至對個別共產黨員提意見，或者對中蘇關係、民族政策等提出見解，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整個中國知識階層受到了無端的清洗，和史無前例的恫嚇，甚至一些黨內、軍內的幹部，也沒有逃脫當「右派分子」的厄運。

毛澤東和共產黨以為階級鬥爭和計劃經濟可以解決世間一切問題，一進城就打擊「反動的資產階級社會學」。1952 年「院系調整」，各高校社會學系全部被肢解，大批接受西方訓練的經濟學者被降級改行，人類學者潘光旦、吳文藻、費孝通被編入民族學院，人口學者吳景超被編入財經學院，「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學科被根除。「整風」初期，有人呼籲恢復社會學系，共產黨出重拳予以打擊，「反右」期間全國的社會學學者被一網打盡。今天中國人口、民族問題之積重難返，是與 1957 年共產黨著重摧殘人口學、民族學等社會學學科是有密切的關係。

以民族學為例。民族學家吳文藻（冰心的丈夫）在關於土家族的問題上與汪鋒（當時的「中央民族委員會」主任）的意見相左；妻子是藏族的藏學家任乃強，對西藏問題有太多的見解（如川甘邊境「白馬人」不應劃入藏族，白馬人的祖先是「白馬氐」、「白馬羌」；又如昌都、丁青「三十九族」親漢、親中央政府，清代受駐藏大臣直接管轄等）。真知灼見與政令不一致，共產黨就把這些真知者打成「右派」。

危害民族團結、祖國統一的罪人究竟又是誰呢？五十年代，共產黨左傾盲動，在康區魯莽推行「民主改革」，遠在 1959 年 3 月「西藏叛亂」前，康區就發生大規模的暴亂，今天海外藏獨骨幹中竟有許多是原本是親漢、親中央政府的康巴藏族。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西藏政教合一統治，長期局限在衛藏地區，今天達賴集團提出的「大西藏」的版圖，很多是共產黨「廢西康省」的慷慨贈與。

1957 年，我由初中進入高中，我就讀的上海鐵路中學的老師中打了三個「右派分子」（汪潔、顧能超、李家婉）。容貌美麗的李家婉老師出身富商家庭，解放初還只是一個大學生，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她迷上了一位口若懸河的工農幹部。結婚以後，這位老幹部屢教不改地沾花拈草，她在「鳴放」中發了「工農幹部道德敗壞」的牢騷，於是美女就「化成毒蛇」了。

1965 年，我被分配到四川榮昌縣教書，次年文革開始，我結識了一批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瞭解了他們「向黨進攻的罪行」。其中，以張建平的「罪行」最荒誕離奇。張建平是安徽六安人，父兄曾參加紅軍。他於 1950 年隨西南服務團入川，其人雖僅有初中程度，但精明能幹，能言善文，被劃定為「右派分子」前，任榮昌縣人民法院副院長。

五十年代前期，榮昌縣峰高鋪發生一起強姦幼女案，經某女性辦案人偵定，系當地一已婚育的農民所為。嫌犯被判長刑後，送某農場勞改。服刑期間，該犯從不洗澡潔身，便溺必無旁人。經農場當局查驗，該犯竟無男器，於是宣佈無罪釋放。原來嫌犯是獨子，年幼蹲便時，被餓犬咬去陰莖。家人長期隱瞞此事，乃至成年成婚，其妻與他人育子，亦未為人知。嫌犯為「無後為大」和「名正言順」，寧受冤屈，甘願勞改，亦不露身。而共產黨辦「強姦犯」，竟也不驗身。此事遂成一大笑話。張建平於「鳴放」期間，以此例批評法院的工作，引起縣「公檢法」負責人陶家賓（老幹部，江蘇東海人）不快，而將他定為「右派」。

另一名「軍內右派」孟慶臣，山東金鄉人，出身貧農，1944 年就隨父兄參加了八路軍，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出生入死，身經百戰。孟慶臣所在冀魯豫部隊就是後來進軍西藏的十八軍。1950 年昌都戰役俘虜阿沛·阿旺晉美，孟慶臣還參與了處置工作。五十年代初，他去張家口高級通訊學校受訓，結業後回西藏軍區，任昌都警備區通訊兵主任，兼地區郵電局局長和黨組書記。1955 年授大尉軍銜時，年僅二十五歲。

昌都地區軍政總負責人是中共幹員，西藏軍區副政委王其梅（王在「文革」中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成員，被摧殘致死）。1957 年，王其梅去北京經年未歸，西藏軍區傳言他有歷史問題。1958 年西藏軍區開展「整風反右」，昌都警備區找不出「右派」。於是就無中生有，將與王其梅工作關係密切的孟慶臣隔離，組織群眾揭發他的「反黨罪行」；在王其梅返回西藏工作之前，又將孟慶臣送交軍事

法庭審判，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開除軍籍，送交地方處理。於是孟慶臣以「軍內右派」的罪身，輾轉來到棨昌。孟慶臣一生悲苦，在「文革」中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他的五個子女無一人受過良好教育。

三、「反右」的報應和後果

中華民族從「反右」得到的教訓是：「禍從口出」，從此「黨天下」就更加發揚光大，不僅「黨委即黨」、「支部即黨」，乃至「黨員即党」，群眾見到黨員就噤若寒蟬，看到黨支部點燈，就以為共產黨要整人，而「政治審查」愈見嚴格，「階級路線」愈見張揚，「出身不好」的人晉升進學，就愈見困難了。

有了鴉雀無聲的恐怖局面，毛澤東行事就更方便了，1958 年的「人民公社」、「大躍進」就是他的為所欲為。1959 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則繼續所向披靡；後續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四千萬人，1962 年的「七千人會議」，劉少奇主會，毛澤東暫時吃癟；1966 年他反攻倒算，這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57 年，吳晗可算得上是中國「第一號左派」，《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第二天，即 6 月 9 日，吳晗就奉命點了三個「大右派」的名，把火燒到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身上。而翦伯贊是北京大學左派，老舍是文學藝術界的左派。這些左派幫助共產黨強化了「黨天下」，也就為自己挖好了陷阱和墳墓。九年以後，上述三人統統自殺身亡。

我 1960 年入華東師範大學，這也是一所以「出右派」著名的大學，除了出了許傑、施蟄存、徐中玉等「大右派」外，還打了無數的學生「小右派」，那時有一部電影《大風浪裏的小故事》就是以華東師大「反右」為背景拍成的。不少「右派」在「文革」中尚能死裏逃生；而主持華東師大「反右」的黨委書記常溪萍，卻撞在「文革左派」聶元梓的槍口上，非死不可。

常溪萍，山東平度縣人，地主家庭出身，中等師範程度，抗日時期以小學教員的身份，參加共產黨，曾任中共膠東局秘書長，青島市軍管會主任，後調上海擔任「全國重點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其人「黨性」堅定，視「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若寇仇。1963 年，低我一屆的李維路等被揭發「聚眾聽裴多芬交響樂」，常溪萍親自組織批判，一口一個「裴多菲俱樂部」，簡直嚇死人。好在後

來發現「裴多芬」不是「裴多菲」，才銷了這個案。

1965 年，與學術無緣的農村小知識份子常溪萍，已榮任「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的大部長，據說還將高升中央工作，有些人開始用「馬克思主義者」的頭銜來恭維他。原因是他在擔任北大「四清工作團副團長」時，袒護北大黨委書記陸平，1964 年底受到「馬克思主義者」、「反修戰士」彭真的接見。然而，陸平和北大黨委辦公室主任彭珮雲，中年氣盛，見好不收，在北大實行反攻倒算，與聶元梓結下了冤仇。

1966 年彭真的「性質」發生轉化，他先于劉、鄧入了毛澤東的「彭羅陸楊」陷阱。聶元梓貼出「第一張馬克思主義的大字報」後不久，就急下上海專揪「北大四清運動的叛徒常溪萍」。常溪萍得了飛來的「大叛徒」帽子，「馬克思主義者」的「捨得一身剮」精神，竟徹底崩潰，隔離期間跳樓身亡。

1976 年，毛澤東的陰謀陷阱挖得已經太多，而且太大了，竟至連共產黨也被他坑了。毛澤東一死，他的「神」的面具就脫掉了，共產黨的神話也破滅了，「反右」製造的所謂「黨委即黨」、「支部即黨」、「黨員即党」等「次級神話」，更是人間不齒的笑話了。由於它們太神乎、太荒唐，乃至後人幾乎要把歷史上這兇惡而愚昧的一頁遺忘了。

四、結論：流氓畏懼歷史

在五十年前的「黨天下」，大部分中國人是把毛澤東當做「神」的。今天「黨天下」似乎未變，但「道」已變，因為人們不僅知道毛澤東不是「神」，而且還知道他是一個「流氓」。如果中華民族還有什麼畏懼的話，也不過是畏懼流氓，或者畏懼「帶槍的流氓」罷了，因此「畏懼」的性質已經轉化。

1957 年，流氓毛澤東說的「陰謀陽謀」、「美女毒蛇」、「香花毒草」、「引蛇出洞」、「聚而殲之」，都是世世代代難以忘懷的恐怖，「反右」是永遠抹不去的歷史。死了的流氓畏懼歷史，活者的流氓更畏懼歷史。雖然，我們手中沒有槍桿子，但我們有追求真實和推崇理性的筆桿子，把流氓的惡行紀錄下來，就是使中華民族免受流氓侵害的功德。 （2007 年 5 月 17 日）

——2007 年 6 月 30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注 釋

1 波茲南事件：一九五六年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傳出後，六月上旬波茲南機車車輛製造廠工人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並派出三十名代表赴華沙與政府談判。二十八日一萬六千名工人舉著「要麵包和自由」的標語，來到市中心廣場請願，呼喊「打倒秘密員警」、「釋放政治犯」、「俄國佬滾回去」等口號，大量市民沿途加入。市政當局拒見群眾代表，其間又有赴華沙請願代表遭逮捕的傳言，於是群眾衝擊政府，打開監獄，奪取民兵武器，並與警察和保安部隊交火。衝突中至少有五十多人死亡，二百多人受傷。當晚波蘭政府指稱「流氓分子「和「挑釁分子「製造流血事件，次日波共機關報稱帝國主義間諜和暗藏的反革命挑動群眾反對人民政權。七月初政府改口，強調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七月十八至二十八日召開的波黨二屆七中全會承認黨和政府要對事件負大部分責任。同年十月召開的二屆八中全會則完全肯定，事件是人民對歪曲社會主義的抗議，其原因應該到党的領導和政府中去找。

2 謝文清：河南省武陟人，出身貧苦而敏學，幼年參加八路軍，在延安接受新聞工作訓練後，長期擔任軍事記者，五十年代初任新華社駐外記者，文革後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改革開放高潮中出任廣播電視部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主持該部的業務和黨務。因報導波茲南事件，謝文清受到毛澤東的特別表揚，成為新華社的重要幹部，但謝文清不忘公義，晚年與李銳等結為「言必誅毛」的摯友。一九八二年夏天，美國國務院邀請在香港任上的謝文清訪美，他在去黃石公園遊覽途中與我等結識，暢談通宵，針砭黨弊，結下友誼。一九八九年五月，謝文清率廣播電視部部員上街遊行，轟動京城。「六四」後被開除出黨，後來中共收回成命。一九九三年，廣播電視部假西京賓館慶祝中央電視臺成立三十五周年，謝文清與吳冷西、艾知生等老舊官僚入座主席臺，主會人唱名與會的「老部長」、「老首長」，會場靜如死灰；惟宣佈「還有我們的老部長——謝文清同志」時，突然全場起立，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

沙文漢的政治民主訴求及對中國社會特點之探討　　沙尚之

沙文漢的一生，反映了二十世紀初一代青年知識份子，在中國社會從封閉到開放的轉型初期，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解放和建設人民民主的社會，走上革命道路所遇到的挫折與遭遇。他們曾以天下為己任，歷盡無數劫難，在沉積了幾千年的皇權的泥潭和暴政的漩渦中艱難地掙扎、呼喊、苦苦地探索真理。以自己的人生為代價，為後人鋪墊了前進的道路。他們的探索、反思、乃至失敗都是我們民族最寶貴的財富。百年來先人們的許多理想至今還沒有完全能夠實現，回頭看歷史仿佛是走了一個大圈子，表面繁榮的經濟增長並沒能自發換來社會制度與國家的現代化。當今社會對民生，民主，公平，正義的呼喚正在日益高漲中。今天讓我們理性地重新審視歷史，靜心地傾聽一下在繁華的喧囂聲中早被淹沒與遺忘了的先人們微弱而堅定的聲音，對於真正關心著中國人民命運的人也許不是無益的。

一　　從理想主義的青年知識份子成長為堅定的民主主義革命家

沙文漢（1908-1964）浙江寧波鄞縣塘溪人氏，出身于農村一個儒醫之家，父親早亡，留下五個年幼的兒子，沙文漢排行第三。五個兄弟由一位吃苦耐勞、深明大義的母親在家鄉沙村艱難地養大。她變賣家產，支持兒子們去求學，期盼他們走出貧鄉求得出路。

兄弟們從小受到父兄的影響，熟讀古文歷史與詩詞，尚勇好義。通過自身和家庭受到的壓迫與痛苦經歷，沙文漢從小痛恨農村中欺侮窮人的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他對於歷代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和古典文學中為民除害的俠義人物非常崇敬，立志長大做一個保護貧窮百姓的英雄漢。1

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烈火在中國大地燃起後，極大地激發了這些在社會邊緣掙扎著，努力尋求人生真理的知識青年的熱情。沙文漢在寧波甲等商業學校求學期間，立即成為《中國青年》、《嚮導》等革命刊物的忠實熱情讀者，他感到剷除社會不平的出路在於為了民族而奉獻自己，他決心向舊世界宣戰。1925 年 4 月他在學校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正處國共合作的時期，他也因此參加了國民

黨。 1926 年從商校畢業後，他放棄了長兄沙孟海為他找到的一份銀行工作的美差，毅然回到家鄉，接過二兄文求在沙村建立的農會領導工作，組織起農民運動，抗拒苛捐雜稅反對橫徵暴斂。1927 年「四·一二」事變發生，他震驚地看到本來合作的友党竟背信棄義在一夜間無情屠殺、追捕大批革命青年。但這一切並沒有嚇倒他，只能激起他極大的憤怒。於是,他跟著黨組織，投入更大的暴動來反抗，這也是當時他能想到的唯一選擇。這年底，他參與組織的鄞、奉暴動遭失敗，有更多人被殺害，沙文漢也遭到通緝，老家被抄。以後當他回憶起這段歷史時,他深感自己的莽撞與不成熟，他說自己「當時根本就不怕死，甚至從未想到過失敗。」

1928 年 1 月沙文漢逃到上海。同年，年僅二十四歲的二哥文求，卻因為參加廣州起義被國民黨政府殺害,犧牲於黃花崗。二哥是他投入革命的引路人，是他的崇敬的人。文求的勇氣和思想對沙文漢有很大影響，這一聯串的痛苦與打擊對他是刻骨銘心的。

但是，如果說這段經歷並沒有嚇倒他，反而激勵了他更加堅定地去投入革命的話，那麼，以後幾年的黨內鬥爭卻使這個年青人感到迷茫。

到上海以後的沙文漢在大哥幫助下進了日本人辦的東亞同文書院就讀。同時還擔任了法南區共青團書記，一邊做黨的工作。當年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的中共，完全以史達林的馬首是瞻，無不以蘇共的意見來決定黨的方針。盲動主義路線就是在所謂「革命高潮到來」的判斷下出現的。黨要求每逢革命節日組織「飛行集會」，搞罷工，罷課，上街遊行，企圖通過武裝暴動，像蘇聯那樣舉行城市起義奪取政權。沙文漢經過鄞奉暴動的失敗與思索以後，已開始意識到這種「左」傾路線不對頭。作為青工部長的他，曾幾次婉轉提出不要先沖工廠搞罷工，應深入下層組織做好群眾工作，但都被領導人所否定。

1931 年 1 月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在蘇共支持下上臺，沙文漢被懷疑為「右傾」、「右派」不給工作。由於當時的職業革命家是沒有其他社會職業的，所有的生活來源均由黨的上級根據工作分配發給，沙文漢因此也就沒有了生活來源，常因一個星期只能吃上幾頓飯，在外出時因饑饉和疾病昏倒在馬路上。這對他的健康有很大的摧殘。但是沙文漢並沒有因此被擊倒。1932 年在一首自勉詩中他寫道：

「吾道無人識，頻年獨苦行。貧遭街犬吠，病妒塞雞鳴。

楚國雖三戶，秦皇徒萬兵。勿云時不至，有志事竟成！」2

這年秋沙文漢因遭到黨內叛徒的告密和政府的追捕，失去了黨的組織關係。在親友幫助下，1933 年 2 月他與妻子陳修良一同流亡到日本。通過他在同文書院的好友汪孝達關係，由陸久之介紹進了東京鐵道學院就學，又與東京的中共支部重新接上黨的關係，並被安排在紅軍遠東情報局工作。這一時期他如饑似渴地學習了日文版「資本論」和其他馬克思經典著作，寫了許多筆記和文章，這些學習為他打下系統的馬克思理論知識基礎。

1935 年 10 月，沙文漢夫婦從日本回到上海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當時，上海的黨組織已經全部破壞。沙文漢根據他在日本的理論學習和對日本經濟，政治，社會和軍事的研究，用不同筆名以文化人姿態，寫下大量針砭時弊、有客觀資料，具體分析和很有說服力的論文，表現出這一個時期他的政治視野與思想已經走向理性與成熟。3

1937 年秋，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正式恢復。建立了以劉曉為書記的江蘇省委。沙文漢擔任宣傳部長，主管學生和文化工作，領導學委和文委，在上海培養了大批學生幹部，開展「孤島文化」。在文委領導下，組織出版了《西行漫記》、《魯迅全集》，開展一系列的話劇、電影、音樂、曲藝等創作活動擴大抗日文化統一戰線。這一時期，他還同時兼管過武裝鬥爭，接替江蘇省軍委書記張愛萍的工作，領導抗戰初期上海週邊地區抗日武裝活動。1940 年以前，沙文漢擔任過江蘇省委外縣工作委員會的書記，開闢與建立蘇（州）常（熟）太（倉）遊擊區、澄（江陰）錫虞（常熟）遊擊區、「江北特委」、「青浦工委」等地區的武裝遊擊活動。太平洋戰爭（珍珠港事件）爆發以後，1942 年江蘇省委奉命撤退到淮南新四軍根據地，他擔任過淮南和華中分局城市工作部長，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重新回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宣傳部長，兼任統戰和策反工作委員會的領導工作。在 1946 至 49 年的國內戰爭期間，沙文漢領導下的宣傳文化工作，在上海創辦和組織了大量報刊的發表，如《時代日報》、《聯合日報》、《文匯報》、《聯合晚報》、《文萃》、《經濟週報》、《民主週刊》、《消息》、《新文化半月刊》等 4；他在領導統戰工作中與各界工商人士，知識份子，民主人士建立起密切的聯繫。

1947 年配合抗戰後全國高漲的民主運動，中共上海局發動過影響全國城市的「五．二〇」學生運動，1948 年沙文漢與張執一領導了上海局的策反工作。主要針對國民黨高層軍政人員的策反：發生了上海劉農峻傘兵部隊和林遵第二艦隊的

起義、國民黨預備幹部局少將局長賈亦斌嘉興起義，軍長劉昌義在上海起義、有「御林軍」之稱的國民黨 97 師王晏清師長在南京起義，他還直接聯繫了上海愛國將領張權將軍的起義、指導南京地下党策動「重慶號」巡洋艦、空軍、江陰要塞起義等等。1949 年 5 月 25 日，在沙文漢領導下上海局地下警委接管了上海警察局。

建國後，沙文漢認為自己多年來的理想：國家繁榮富強，消滅剝削和壓迫民族自強的民主社會最終能夠實現。他擁護共同綱領，因為這個綱領在建國之初是經過社會各界大量精英的醞釀與討論，獲得各派力量的擁護與公認，它是中共党與其他民主力量共同推翻蔣家王朝的政治基礎。共同綱領開宗明義提出：我國是「新民主主義國家」，「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

沙文漢從自己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深深體會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符合中國的國情，作為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華東代表團副團長（陳毅為團長），他參加了對這個相當於憲法的綱領之批准，在建國初期歷次政治運動中，沙文漢身體力行，從自己主管過的工作出發，以不同角度多次宣傳共同綱領的精神，以此精神指導統戰，經濟，文化，教育與知識份子工作，沙文漢在有關協商建國和共同綱領的傳達報告中提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嚴格遵守共同綱領，党的幹部要端正對待民主人士，知識份子，工商業資本家的態度。」5 他沒有想到，正是因為他堅持信守共同綱領的政治承諾，決定了他日後政治生涯的悲劇性命運，更何況隨著「革命的深入」，依然堅持新民主主義革命原則的他，還將遇到更多、更致命性的打擊。

二　沙文漢的政治民主思想

1957 年 12 月，沙文漢在浙江省省長，省委常委的任上被打成右派。他的夫人陳修良是浙江省委宣傳部代理部長，被打成「極右派」，夫妻雙雙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工資級別連降六級。沙文漢是全國黨內地位最高的右派，浙江省省委同時打出一個 「沙、楊、彭、孫」反黨集團，有九名省委委員被清除出党，成為全國轟動一時的新聞。

今天，當剝去一切誇大其詞的批判，撇開所有造謠誣衊之詞，重新分析認識

沙文漢的「罪狀」時，我們發現對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民主主義思想上。這就是他的：政權觀念、主張黨政分工、實行黨內外民主、團結依靠知識份子，信任民主人士、反對以思想意識問題作為是非和敵我界線的劃分依據、貫徹雙百方針、擁護「八大」發展經濟和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的政治路線。

2.1 關於政權的實現形式、內容及黨政分工

1954 年 9 月頒佈了建國後第一部由毛澤東為首起草的憲法。6 根據憲法，浙江省第一屆一次人代會選舉沙文漢為省長，1954 年 12 月沙文漢正式從上海華東局宣傳部調至杭州到任。從共同綱領到 1954 年憲法的公佈，一般的理解此舉應當是為了加強政府的作用和實行國家法治，但`以後的事實說明這兩者似乎都不是這個憲法發佈的動因。

首先，浙江省在 1954 年下半年宣佈成立省人委和各廳局的政府行政機構時，曾一度準備在政府機關建立獨立領導的總黨組。幾個月後的 1955 年春，浙江省委很快便取消了政府系統設立總黨組的決定，另行籌建省委書記處。它按照與政府同樣的條塊分口，但要求政府各部門必須服從于相應的主管書記，那怕後者行政上地位更低，能力更差。1955 年 8 月中央批復浙江省委的書記處正式成立，一律為外來的幹部組成，但沙文漢不能參加書記處（理由是莫須有的：他有地下黨歷史，因此與潘漢年有關，需要審查）。中央對書記處的部署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賦予其高於政府的地位：「什麼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們（書記處）做，發文用中央名義」，書記處「要管黨政軍各方面的工作，面很寬」，代表政府的國務院周恩來就不能主持中央書記處的會議。7 這足以說明這個憲法的出臺決非為了加強政府的作用。其次，新憲法公佈後除出了一部婚姻法以外，直到八十年代，全國也沒有其他法律再出臺，長期以政策代替法律。據此，很難以加強政府的作用與實行法治來理解它的出臺目的。

據現已瞭解的材料證明，1954 年憲法推出是受到蘇共史達林本人的直接催促與指導的。此後，建國之初根據共同綱領精神，政府從副總理開始各部有大量民主人士與社會賢達直接參與執政的形勢不復存在。共同綱領中規定的多黨執政原則實際上被否定，政協作為客體而不再是執政的主體存在。此舉從根本上加強了

共產黨的全面統一領導地位，使一切權力（包括政府所有的職能）集中於黨。

但是，沙文漢對此中的意圖顯然並沒有理解，因為 1954 年底他在全省一次行政會議中依然提出 「四個階級聯合專政」，主張多党聯合民主執政。（1957 年反右批判揭發材料）他認為：政權就其對社會的作用與影響而言，是一種極其強大的 「駕乎社會之上」的權力。政權屬於公眾，應當超越黨派。他說「政權不是屬於一部分集團的, 政權機構應體現出它是屬於公眾的（社會的）公共權力機關。」為此,「政權機構應當具有完整的形式與內容，政府機關要有憲法所規定的獨立的形式和自已平衡的統一組織。」他以為憲法既然規定人民委員會是政府的組織形式，就應當有法律所賦予的行政執政的權力，而不是「空架子」。1956 年，他在浙江省二屆一次黨代表大會發言中說：新建立的「各級人民委員會多數都很不健康，很形式的，甚至怎樣在黨委領導下工作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就省人民委員會情形來說：差不多每次開會都只勉強湊足半數的法定人數，討論問題幾乎完全是做做樣子, …. 既沒有像樣的討論，也無不是機械地通過。」8 沙文漢還提出：無產階級政權若是要比資產階級政權更強大有力，只能是「因為真正能夠代表人民利益，能給廣大人民以真實的政治權利，即要實行最廣大的民主，發揮他們的政治積極性」。這些就是他所認定的我國人民政權的民主性基礎。9

沙文漢的民主執政主張與毛澤東 1945 年 4 月 19 日發表於《新華日報》的對外講話公開宣稱的「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政治」是不矛盾的。劉少奇也講過類似的話：「（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10 這與沙文漢關於民主執政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只是在政權建立以後，以上這些正確的、符合國情的民主政治目標被拋棄，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政權」觀念了。

沙文漢一貫反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在他看來政府不可以依附在黨的下面，必須是獨立運行的， 有關黨政關係問題，沙文漢在 1954 年擔任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兼高等學校黨委書記時, 在「關於華東高等學校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寫道:「學校黨委的性質和任務，按黨章的規定，學校中黨的組織應該是黨的基礎組織，應保證學校行政任務的完成（沒有如在工廠黨基礎組織那樣的監督權)。現在華東高等學校中黨組織性質與任務有二重性，一方面既是基礎黨的組織，而另一方面又

是學校的領導機關，這樣不但使學校中黨組織的權力與其所擔負的責任過大，並且很容易黨政混淆」。他批評目前「學校重要問題，縱令是上級政府的指示也非經黨組織決議，校長就無權處理，今天我們黨委一般說沒有這麼高的水準。」

1956 年沙文漢在浙江省二屆一次黨代會上針對普遍存在的黨政不分現象時說：「人民委員會所屬的各廳、局，工作是不少的，但幾乎所有的事情都非請示黨委有關部門不行，稍大一些的事情還得由常委或書記來決定，工作中很少有獨立思考的餘地。政府機關應辦的工作，多半都是黨委的部門與分工的常委辦的。」「黨委該做什麼，政府該做什麼的責任界線分不清楚，更加嚴重的是，黨委行政事務過多，在日常行政事務的壓迫下，不能不放鬆政治思想領導；使行政機關對黨委不能不存在等待、依賴心理，而人民委員會也只能成了空架子。」11 他說；「党既領導著政權這個階級鬥爭的工具，那麼政權機構作用發揮越大，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與領導力量越強，有些事情由黨來做和由政府來做有什麼原則區別？」他提出「黨的活動不應束縛政權機關的活動，而使自己陷於日常事務，削弱了對大政方針和重要工作的領導，這是得不償失的」。他認為出現黨政不分，「二位一體」的狀況，是根源于執政者在國家政權機關的根本觀念上有問題。党的元老董必武也曾說過：「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12 這其實是建立現代國家制度的基本常識，在當時卻成為異端邪說，是「反動的資產階級政權觀點」並成為他的右派主要罪狀。

2.2 依靠知識份子，真誠地團結、信任社會民主人士

當沙文漢在華東工作時，多次對知識份子問題和政治與業務關係問題提出自己的思想。1954 年 11 月，他在上海大專院校貫徹四中全會決議與知識份子政策的發言中，關於「依靠誰來辦好學校」的問題，他提出：要「團結全體教師辦好學校」。特別指出「對老教師有歧視、懷疑、利用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說不應「把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或者與資產階級有社會關係的，與資產階級混為一談；對他們政治上進步看的少，而對歷史複雜看的多」，特別嚴厲批評有些南下幹部認為：「老子打下來的天下叫他們享福」的錯誤思想，他要求「對教師要尊重與信任，要發揚民主作風，建立同志感情；照顧知識份子自尊心，關心生活」，特別提出學

校中「黨政要具體明確分工，不要使黨外人士有職無權，黨的工作不能脫離教學中心。」13

1957 年 5 月 24 日沙文漢曾給浙江昆蟲學家蔡邦華，傳染病學家王季午親筆寫信，對自己在 1952 年「三反運動」中的錯誤作了誠懇道歉。沙文漢的原信為：「邦華先生，來信收到。一九五二年三反運動時曾誤信片面材料懷疑你是貪污分子並行隔離審查，事後雖未認為貪污分子，但既未當即做出結論予以公佈，更未向你道歉，使你精神上，名譽上受到了重大損失，這是很對不起的。這個處理失當的責任完全應該由我負責。記得前年在浙江省人民委員會和省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的一次聯合會議上，我曾說明了你和王季午先生等在三反運動時受了冤屈，這是我們的過錯，然而這是遠不足補償你和季午先生等在三反運動時所受的損失的。這裏特向你作書面道歉，如你認為必要，此信可向你的朋友和同事們傳閱。」

最近出版的《束星北檔案》記載了沙文漢保護知識份子的一件事情：浙江大學的物理學家束星北教授（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吳健雄的老師)，在解放初「鎮反」運動中，因從前的學生徐名冠被浙大錯打成反革命而逮捕，全家遭殃。束教授不顧自己會被牽連，到處請命救助，最後找到了浙江省教育廳時任廳長的沙文漢，才使徐名冠無罪獲釋。14

沙文漢推薦過不少浙江的老學者到文物管理委員會，圖書館，博物館或文史館工作，使大量歷史文物和圖書得以整理和保存，他指令保護過普陀山一千羅漢和天臺國清寺佛經等文物。他的長兄沙孟海，解放前曾在陳布雷手下任國民黨的國府秘書時為蔣氏編纂家譜。1949 年，他不願隨蔣介石到臺灣去，沙文漢就推薦安排他在杭州從事文物工作，成為我國著名書法大師和金石考古專家。

沙文漢有長期統一戰線工作的經歷，他與黨外民主人士之間真誠的關係建立在幾十年來共同奮鬥的民主革命目標上。建國後共同綱領明確提出聯合四大階級的統一戰線線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忠實執行這一方針的沙文漢非常反對有些黨員幹部掌權後排斥、打擊黨外民主人士的行為。1956 年 1 月 8 日在浙江省的廳，局黨組委員以上党的幹部會議上，沙文漢明確規定了三條要求：

1，要相信民主人士的能力和政治上可靠；

2，要使他們有職有權，如果黨外人士是正職，就是領導，我們硬是要服從他；

3，要幫助他們做好工作，他還要求黨員幹部將此三條作黨性保證。

沙文漢尊敬民主人士的小事，在四十多年後依然被一位當時的記者記得很清楚 15：一次在省人民大會堂開會，到開會時間後沙文漢問：民革主任委員何燮侯 16 老人為什麼沒到？當瞭解到原來機關事務管理局沒有派車去接他，原因是侯老家巷子小進不去車，沙省長責問：「你自己家巷子也小，為什麼可以坐公車（小汽車）來呢？」開會了，沙先宣佈：「何老這麼大年紀走路來開會，我們都坐車來，想想也臉紅。今後凡邀請（民主）黨派負責同志來開會，都要派車接送，車不夠先保證他們，黨員同志可以騎自行車或步行。」沙省長語畢，在座各黨派負責人莫不動容。浙江民盟著名的民主人士宋雲彬說：「沙文漢的文化和理論水平都是相當高的，自己對他有一種知己之感，容易接近，談起話來總是很融洽的。」17

1957 年反右運動開始後，許多黨外人士被點名批鬥，但沙文漢仍堅持認為「中國的知識份子最多是中間階層而不是敵對的資產階級」，「他們歷史上是進步的，跟黨走的。」他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盡力地保護他們。

1957 年 6 月第一屆四次全國人大在京召開，這次會議成為浙江省全面開展反右運動的起點。以沙文漢省長和楊思一副省長為正副團長的浙江省代表團剛到北京，在事先沙文漢並不知情的情況下，杭州一下子發起對浙江省民盟宋雲彬，農工民主黨李士豪的公開登報批判。此時浙江省委書記處來電話要求浙江全國人大代表團立即在北京就地批鬥宋，李。沙文漢覺得手頭沒有材料，不好這樣做。浙江日報公佈對宋的批判材料是 23 日寄到北京的，沙文漢和楊思一兩位團長看後都認為材料散亂，沒有說服力，宋雲彬只能作為思想問題幫助而不能定右派。李士豪在杭州的見報材料是 6 月 26 日才寄到北京的。當省委書記處來電話催促要代表團在北京開展批鬥時，沙文漢也對李士豪的材料不充分提出了疑問。

宋雲彬的情緒很激動，他表示要求在會上講清自己的問題，並說有些揭發的事情與實際有出入。26 日晚上，浙江代表團針對宋雲彬開了首次小型座談會，沙文漢安慰宋說：「你的歷史我們是清楚的， 大家對你提了一點意見，可能有的意見不一定完全得當，有的帽子大了一點，也不要太緊張，不是右派.也不能硬要成右派，是右派也辯不掉。」宋雲彬在後來的檢查中談到：「在北京，沙文漢不止一次對我說：『你的歷史我是知道的，你在民主革命時期追求民主和自由是進步的，沒有人會否認你。』『你的問題要回浙江去才得解決，你要撐得住』。」18 雖然浙

江省委多次來電話催促在京批鬥宋、李並要求快見報。但浙江代表團在沙文漢的主持下一再推遲批鬥，火力又弱，這令浙江小組中的一些積極分子們大為不滿。更使他們不滿的是：沙文漢在整個會議期間對待宋、李的態度竟然始終與往常一樣保持友好。因為沙文漢後來在檢討中說，在他看來「他們只是犯了錯誤的朋友」，「是人民代表，省人委委員，在沒有撤銷資格以前，我仍應一樣地對待他們。」

回到杭州後，宋雲彬在 7 月兩次發現家中來了陌生人，要見他提意見，感到奇怪，拒絕接見。8 月 6 日又接到一封從香港的來信自稱王天池，說過去給他寫過信，表示對當前國內問題的關心云云。宋雲彬看出這封信是用報紙作信封，似是國內出品，香港是不會用這樣信封的。信封上把宋雲彬寫成宋雪彬，而且有用另外顏色墨水塗改過。宋立即寫信給沙文漢，呼籲：「您幾次對我說，叫我要撐得住，我總算撐住了。在民盟六天大會中，大家已經不把宋雲彬當作一個『人』了……今天接到那奇怪的信，不能不害怕，我覺得的確有人在用種種方法來陷害我，把我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翻身……沙省長，我再次請您救救我，把那信交給有關部門，加以調查和研究……」19 沙文漢立即將信轉省委書記處備案並要求統戰部出面處理。但是省公安廳一個副廳長認定，這是「香港美蔣特務機關向宋雲彬表示支援拉攏的一種試探」，為打倒宋雲彬，這位副廳長甚至在報上公開稱：「有反革命分子洪國正給宋雲彬寫信聯絡。」可是宋此前從未收到過洪的信，妙在公安局長的文章發表後不久，宋真的收到一封自稱為洪國正的人來信！沙文漢對黨外右派的這種態度立即轉變為黨內反右的目標。

1957 年 7 月毛澤東主席在青島召開省委書記會議，浙江省委書記江華于 8 月 2 日向省委幹部傳達會議精神時說：「所有人員都要過社會主義關，尤其是某些老幹部特別重要，其中有些是過不去的。實際這次整風在黨內就是清黨，但對下不說」，「在反右問題中，尤其對宋雲彬問題上，有些人是溫情主義，實際是右傾」，特別提醒：「整風中要有什麼就揭什麼，不管他頭髮有多白，資格怎樣老。」20 就這樣實際上點出了沙文漢與宋雲彬的聯繫，宣告浙江省的反右運動將從黨外轉向黨內。沙文漢的前述種種事實，構成了他「和黨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親如兄弟.支持宋雲彬,李士豪,陳修良向黨猖狂進攻」的主要右派罪證。

2.3 發揚黨內民主與貫徹文藝雙百方針

1955年中國農業合作化的政策發生過反復性的變化。浙江從高速的合作化到1955年春的「堅決收縮」，解散了一萬五千多個合作社。但到夏季以後 「堅決收縮」方針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重新走回超快速的合作化之路。過快的合作化與反復，引起幹部與農民關係的緊張，1956年下半年農村山區出現過上千次事件。土改後剛得到土地的農民，在合作化中重新再次以集體化形式失去了土地。

沙文漢雖不主管農村合作化問題，但他看到了各地幹部對省委在這些問題上大起大落的反復與粗暴的工作作風不滿，在全省黨代會的工作報告中主要領導卻又沒有認真檢查這些問題。1956年7月在浙江省黨代表大會上，沙文漢針對以上情況又提出加強黨內民主問題。他說：「我們黨內的民主太少了，由於缺乏這個寶貴的要素，就使黨內上下存在隔閡，壓抑黨員的積極性，嚴重損害群眾路線原則，使集體智慧不能很好發揮……」「我們過去犯錯誤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健全黨的生活」，代表們的「各種批評和對省委的要求都歸結到要加強黨內民主生活（包括集體領導在內），反對驕傲自滿，主觀主義，脫離群眾。」他批評省委「存在嚴重的驕傲自滿和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脫離群眾」的問題，主張要「加強黨內民主生活，包括集體領導在內」來避免錯誤，提高領導水平。21 而這些意見後來都成為沙文漢「攻擊省委領導」，與黨「離心離德」的右派罪名。

沙文漢曾長期從事文化方面領導工作，擔任省長以後文化仍是他分管的工作。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文化局長黃源在回憶錄中稱：「浙江解放以後，文教系統基本上都是在林乎加的領導下。從地位上說沙文漢當過部長，林是副部長，但是林乎加是省委管意識形態的副書記。林的妻子又是省文化局副局長，黨組書記」。這種地位決定了對五十年代浙江的文藝路線實施有重大的影響。林乎加副書記一貫要求文藝作品必須密切配合當前政治任務，必須多登工農作品。22

黃源首先遇到的問題是發揚民間藝術與政治性的關係。1955年春他提出建立省歌舞團，在舞蹈隊搞起群眾喜聞樂見的「獅子龍燈舞」後，立即遭到林氏夫婦的反對，認為是脫離春耕生產，要批判。林乎加「一看民間歌舞團和春耕生產沒有關係，認為是脫離春耕。這個東西要批判」必須演他們提出的配合農業發展四十條綱要宣傳的節目，1956年歌舞團差點被解散。23 另一件事是昆曲「十五貫」的改編和演出，黃源積極幫助了這個瀕臨滅亡的小劇團和劇種，但主管書記認為

這個劇的創作在思想上與政治上都脫離當今實際，不予支持，因而在浙江不能推出，省委主要領導人也決定不去觀看此戲。後來此劇輾轉到上海和北京演出後大獲成功，又到全國巡迴演出，人民日報稱是「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雖然沙文漢從開始就一直十分支援黃源對昆曲「十五貫」的發掘工作，但他在杭州看演出後，竟不能上臺與演員握手慶祝，因為他顧忌省委領導對此舉不快。這件事以後又成為沙文漢支持黃源的修正主義文藝路線主要問題，在 1957 年反右中重新算帳。

類似的事還有：為進行著名藝術家蓋叫天的紀念活動，浙江省長也不能出面，因為沙文漢知道省委是不去人的。他「只好要我（黃源）以文化局出面，在蓋叫天家裏擺酒設宴，省長自己前來祝賀，也不見報。」「省長到昆劇團去也是秘密活動。」因為省委認為這都是屬於「非政治性的活動」。24 當時文匯報記者採訪浙江省文聯後，報導浙江省對作家的待遇時稱：「在杭州民主婦聯可以有極好的一所大房子，但作為浙江全省的文藝領導機構之一的文聯房子到現在沒有完全解決。」沙文漢曾在自己有限的權力中為浙江文聯撥了房子，卻被一些處長占去做了宿舍。25

沙文漢在努力貫徹執行「雙百方針」中所遇到的許多尷尬處境的原因，在黃源回憶錄中有一定反映，可以看到，他們兩人當時的境遇是共同的。黃源說：「雙百方針在黨內傳達了，省委沒有表態，也不要求我們出具體執行的方案。」「我沒有主動向省委請示彙報，而只是在實際工作中執行中央的方針了，這樣，就同省委的思想對立了。」26 但這一點卻證實了毛澤東主席的估計：「許多幹部實際上不贊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高級幹部十個有九個不贊成 ，或者半數不贊成。」27 不久後，像黃源，沙文漢一樣認真在貫徹執行這個方針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這是因為他們不懂得：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其實只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家，非此即彼，並沒有中間道路的，又何來百家？

2.4 貫徹「八大」發展經濟文化，不執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矛盾的路線

1956 年 9 月「八大」在京召開，「八大」通過的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提出：「國

內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要求與落後的農業國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在經濟建設指導方針上是反對冒進，提出「綜合平衡，穩步均衡，按比例」的發展；在汲取蘇共教訓中，「八大」報告提出要「擴大國家民主生活」，「貫徹雙百方針」；在党的建設上更是提出：「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偏向」，要借鑒蘇共問題「反對個人崇拜，避免專斷」等等正確的意見。

沙文漢擁護「八大「的方針和路線，他認為當時最重要的任務在於建設國家，廣泛團結社會各種積極因素發展經濟和科學文化，以迅速轉變中國落後的社會經濟面貌。

從浙江的情況看：到了 1957 年浙江全省糧食產量為 158 億斤，全省人民收入人均 88 元，農村生活貧困；工業極不發達，工業總產值（還包括手工業在內）為 22.7 億，只占工農業總產值三分之一左右；社會文化教育水平低：幹部隊伍已經替換為以南下幹部為主體，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以較發達的嘉興，海寧為例，縣以下幹部初中以下文化的達到 80%，包括一部分半文盲。全省文盲有 800-900 萬之多相當於一個歐洲國家人口。社會文化教育水平低：主要是初中，小學生，1957 年全省的高中生只有 3.7 萬人。由此可知，建國七年來，浙江省的社會經濟基本仍處在相當落後的農業社會階段，「八大」關於以綜合平衡發展工農業，建設經濟文化，擴大民主等基本方針是正確的。

但在實踐中完全不能按照沙文漢所理解的那樣去執行。「八大」前一年，在 1955 年秋的浙江省城市工作會議中，省工業部嚴厲批判省統戰部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執行方針是「嚴重右傾」。沙文漢是分工主管統戰部的，但他事先不知道開會的事，省委也不讓他參加這個會議。他在聽說後，不同意這種批判。在沙文漢看來，工商業資本家經過多次運動改造，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這與以後八大政治報告提出的「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結束」的基本估計相符）。他向省委書記江華提議：常委可否對此不同看法先討論一次統一認識，卻被書記所拒絕，10 月 28 日在總結會上，省委書記在做結論時指出：「城工會議一個多月的爭論中心是對過渡時期階級鬥爭如何認識的問題，誰戰勝誰沒有看清」，他還說：「民主革命時代聯合資產階級是為著反對三大敵人；在社會主義時代聯合資產階級是為著消滅資產階級自己」。沙文漢的觀點在他們看來當然是「右傾」的，因此也不需要他參加

這個會議。

沙文漢不同意把思想意識問題混同於政治問題，他反對用整人辦法進行階級鬥爭。1954 年他在華東宣傳部有關高等學校思想改造報告中談到：「鬥爭批評解決不了思想問題，而且脫離中間群眾。」他常對在肅反與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中過火的鬥爭深感不安。1955 年，在全黨宣傳批判唯心主義思想時，沙文漢根據過去政治運動的教訓提出：「應該說理，講事實，切避空洞、扣帽子與謾罵」、「要注意有不正派的或懷有不正當目的的人，藉學術討論為名挑撥離間，進行宗派鬥爭，陷害他人和騙取別人信任等行為。」沙文漢認為 「中國的知識份子最多是中間階層而不是敵對的資產階級」，「目前意識形態思想戰線上不會變成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要解決也主要依靠正面引導、和風細雨的說理討論與懷柔的方式逐步解決。」他認為資產階級連生產資料都收歸國有了，怎可能階級鬥爭形勢反而越來越尖銳呢？但這恰好與毛澤東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它的知識份子，是現在可以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論斷是對立的，據此，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知識份子就是資產階級，是革命對象。

儘管「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分析和經濟建設的方針被提出來後墨跡未乾，還正在逐級學習貫徹，受到廣大幹部與群眾的歡迎，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黨內和社會民主氣氛的提升和思想的活躍。但是，「八大」剛結束就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國內也出現罷工，學生鬧事，農村鬧退社。毛澤東對此十分警惕，他開始反復強調肅反與階級鬥爭的必要。最高領導「高瞻遠矚」下決心否定「八大」方針，代之以兩條道路和兩個階級的鬥爭作為國內主要矛盾；經濟建設上則是要反「反冒進」，反對「平衡發展」，為下一步的大躍進做好準備。

最高領導的這一動向，起先只有極少數人得風並緊跟。五十年代中期毛澤東主席頻繁到南方，尤其是到上海，杭州。在 1957 年青島會議和八屆三中全會上毛主席明確加快了修改對國內主要矛盾提法的意圖。但是他發現許多中央和地方幹部還深深沉浸於「八大」的政治與經濟方針中，不能很快響應他的號召。甚至在 9 月的三中全會上還發生過很多爭議，許多幹部對毛澤東提出的：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矛盾是整個過渡時期主要矛盾，「感到不理解」，在全國諸多省市黨委書記中，「好學生」柯慶施與江華也許是最早、最能善解其意並立即行動的。毛澤東主席感到在北京空氣不好，自己的一套想法得不到支持，但他從「諸侯」中找到了

「知音」。他說「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28

柯慶施親臨浙江，力圖解釋毛澤東對當前矛盾的提法與「八大」不「矛盾」。他特別闡述了毛的關於「思想意識」領域的階級鬥爭問題，把「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矛盾」提高到作為目前階級鬥爭的重大特點。這樣就為下一步在「思想和政治戰線」上發動對右派的階級鬥爭建立了理論依據。29 從 1957 年秋起，浙江省連續召開各級會議，以開展黨內整風為由，相繼打出以黃源為首的「反革命文藝」集團，揪出以陳修良為代表的省委宣傳系統一大批部，廳級黨員幹部為右派分子。這一系列會議的最高峰是在 12 月 9 日浙江省第二屆二次黨代會上，省委書記江華做工作報告，並宣佈浙江省委對以沙文漢為首的「沙、楊、彭、孫」反黨右派集團的決議。30 江華的長篇工作報告重申：「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

同日，毛澤東主席從北京到杭州，準備召開有各地區省市書記參加的「杭州會議」。看了這個報告後十分高興。12 月 17 日淩晨，毛主席給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秘書葉子龍通知其他華東省市的書記推遲其他工作，要求緊急看完江華的報告，並連續兩天召集他們討論此報告。23 日毛還要江華、胡喬木、田家英討論對報告關於國內主要矛盾部分進行修訂。3128 日在人民日報向全國公佈此文時，編者按稱：報告「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國性的」。就這樣，最高領導從浙江的大案得到了他早就反復告誡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鬥爭，仍然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只是這種矛盾主要地不表現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而表現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最有力的證明。

為了將浙江案例在全國推廣，毛澤東主席多次舉一反三，遂使此案成為黨內大規模反右、清黨運動的起點和在全國樹立的典型樣板。1958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的南寧會議上，毛主席對柯慶施大加讚賞要「大家學習柯老」。在 15 日的會議上，他對於兩條道路，兩個階級是主要矛盾問題的講法肯定了：「上海有發展，浙江有創造。」32 在 1958 年 3 月 9 日至 26 日的成都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又提出我們應該採取列寧的辦法 ：「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特別舉出浙江為例，向到會的書記提出問題：「是江華獨裁，還是沙文漢獨裁？」33 在 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會議上，當談到所謂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時，毛主席再次點出浙江

沙文漢，安徽李世農和廣東，廣西等省負責人的名字，他們剛被打成右派，或認為犯了極其嚴重的右傾錯誤。毛澤東要求各省都要「獻寶」。稱沙文漢等人：「有的是十個黑指頭，有的是九個黑指頭，只有一個指頭乾淨」。1958 年在成都會議上毛主席提出反右是一次「新式肅反」，「這實際是一次清黨，一千二百萬黨員中，清除二十萬，百把萬，不算多。」34

三　沙文漢對中國社會發展特點的思考

反右以後，沙文漢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職務，工資級別從原來六級降為十二級，經省公安局的抄家後，被趕出北山路葛嶺的原住所。他的夫人陳修良被送往嘉興農村勞動，全家離散。沙文漢的身體很壞，只得由他的二嫂（沙文求的遺孀）照顧。他被罷官後謫居杭州保俶路寶石新村四幢，在對面樓下，當局另安排住了一戶人家，全天侯監視沙家出入人員。他雖然掛了一個省政協委員名稱，但被長期擱置起來，終日在家不分配任何工作。

沙文漢發現自己能夠做的只有兩件事：一是，需要不斷反復寫檢討。他趁機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希望能從中找到對一些問題的解釋；同時也可以整理與思考自己對政權的建設，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等問題上的觀點；第二，他最想研究的是中國的政治和黨史，他要搞清許多為什麼。但又因自己的身份，已不可能被允許做黨史或政治問題的研究，因而沙文漢決定從被他稱為「死人的政治」——古代歷史的研究著手。

理論學習中他並沒有找到可對他的「右派言論」批判的更多依據。相反，通過檢討，他委婉地以解釋或甚至以批判「錯誤」的形式來表達、解釋與證明自己的觀點。今天，重讀他的大量檢討原稿，可以發現許多這種痕跡和意圖。他要把自己對這些有重大爭議問題的認識通過檢討書寫下來，留給後人做評判，可謂用心良苦。

另一方面，在研究與探討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特點過程中，他卻有了深刻的認識與獨到的見解。沙文漢從小在中國農村成長，熟讀古代文學與歷史，非常熟悉我國的社會經濟特點和朝代的歷史變革。早年除了學習過商業經濟，日文以外，1929 年 6 月至 1930 年 5 月他還被派往蘇聯少共國際學習馬列理論，1933 年至 35

年在日本自學「資本論」和在東京鐵道學院時接受了更多的西方經濟與文化知識，他又有長期參加革命鬥爭的親身社會實踐經驗，這一切使他能以更寬的視野，從與其他社會比較的角度來認識中國的社會特點。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愛思考和養成了理性分析習慣的人，雖然身處斗室，失去了活動和與人交流的一切自由，但是他的思想並沒有一刻停止過思索，反而思潮洶湧，更加不知疲倦地為追求真理而自由地馳騁。

沙文漢早年養成的毅力，幫助了他在反右後克服被冤案折磨的巨大痛苦、堅強地經受著氣喘、心臟病、困難時期極度的營養不良、缺少必須常吸的氧氣和醫療條件等種種考驗。1958 年 3 月，他鼓勵即要下鄉勞動改造的陳修良說：「在任何情況下，我們一定要堅強地活下去，決不自殺」。他對自己的要求是：「春蠶到死絲方盡」。1962 年，在生平的最後一首詩中，他寫道：「孤燈夜永油將盡，老馬途遙力不支」、「人生得失毋須計，畢竟事成總可期」！

沙文漢研究中國的奴隸制度目的是為了搞清中國社會發展的特點，以及研究為什麼會這樣發展的原因。早在 1935 年的一篇論文中他就提出：「經濟是社會問題的根源，明白了中國經濟構造，就能明白中國的社會，也就能明白中國社會的變革，應採取的方針和策略。」這正是他用來觀察研究歷史和社會發展的一條基本準則。例如，他用大量的資料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狀況，指出：「研究中國必須把研究土地關係作為中心；中國農業封建性高度優勢，完全不具備資本主義條件；中國革命主要內容是反封建而不是所謂「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35

在其他論文中也顯著地表現了他的這一分析思路，如在以叔溫為筆名的「中國財政的根本問題」36 一文中，他將江浙一帶農民的稅負占農民總收入的比例與國外情況相比較，指出我國農民「比諸 1866 年普魯士農民要多 60 倍，1923 年的美國農民多 18 倍，1931 年的日本農民 8 倍。如果說中國農村比任何一國都來得窮，那末他的稅賦擔負則是比任何一國要高好幾倍！」由此指出這種稅賦制度正是破壞國家生產力的根源，中國的財政問題不可能通過「開源節流」等膚淺的措施來解決的。

〈中國景氣論〉是沙文漢（叔溫）1937 年另一篇重要論文，他搜集大量資料證明中國現階段半殖民地國家經濟特質：資本主義發展薄弱，同時，中國的經濟地位又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的支配，失去了獨立性。37 正是出於對中國社會經濟有

相當深刻的瞭解，決定了沙文漢在政治觀點上一貫堅定追求實現民主革命的目標，反對消滅民族資產階級，強行向共產主義各階段過渡的烏托邦主張。

1963 年 6 月末，沙文漢懷著熱情、帶著病痛完成八萬多字的論文〈中國奴隸制度的探討〉。38 通過對大量古代文物考古發掘資料（如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左傳，詩經，尚書，漢書，論語，孟子、墨子，國語，公羊傳等）的研究，同時又仔細閱讀了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社會各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通訊集》等經典著作，重點研究與探討了當時社會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和社會政治制度之間的聯繫。

他的研究證明：人類原始社會在生產力發展以後會分化為階級社會，這一點是共同的。中國在商代與西周存在過奴隸社會，但是我們不能用西方的奴隸制度標準硬套用到中國來衡量，以為所有的奴隸社會形式也全是一樣的：有一個個奴隸主，管著一批做工的奴隸，並進行著奴隸的交易買賣。他認為在不同生產方式與文化歷史條件下社會發展可以出現不同的實現形式，中國的奴隸社會與西方的實現形式就很不相同。他發現由於中國的初民早已是農業民族，生產方式強烈依賴土地。由農耕生產方式發展出來以血緣，氏族為紐帶形成的穩定耕作群體，奴隸的形式上似乎與西方完全不同，但從考古的大量證據來看，這些人的生存方式就是奴隸無疑。他把這種奴隸制度稱之為「氏族」或「國族」奴隸制度，以區別於西方的奴隸制度。

通過史料考證，沙文漢提出中國的奴隸制最大特點竟然是;「土地和奴隸都是屬於國家所有的」。人們從商周起就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道理。這個情況也是西方社會所沒有的。他論證：土地私有制在中國古代就不存在，沒有（人民的）私有制，連人也是世代屬於國王或諸侯的（實際上，人都是奴隸）。

他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由於長期缺乏私有制的發展，使得中國社會只形成為兩個階級：「一頭是人數極少的主子，一頭是人數極多的奴隸，中間缺乏第三種階級自由民」，這種社會結構反映到國家形態上，就是實行「政治經濟完全合一，權力極端集中的君主獨裁」。反觀西方從奴隸社會起就產生了私有制，並且能夠培育出人數眾多、有勢力的中間階層集團（如希臘和羅馬的平民階層），這對於日後民主制度的建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中國奴隸制的探討〉從歷史角度揭示了國有化和集權制並不是社會進步與文明的必要前提。他看到古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濟，一向是由極少數統治者以國家名義，對絕大多數人實施壓迫與掠奪形成兩極結構。統治者為了剝奪更多，就一定要杜絕大多數人發展私有財富，結果是造成私有制度的缺乏和民眾普遍的赤貧化。極少數統治者需要維持這種經濟結構，又必須在政治上保持權力高度的集中。因此，經濟的兩極分化與政治上高度集權兩者是孿生兄弟，相互依賴、互為前提。其結果是形成了幾千年來中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民，對皇權制度的崇拜與恐懼，許多人深信權力只能集中，黨政軍合一，党國合一是唯一的統治方式，而世代的民眾只能生活在既無財產、又無權力的可憐的奴才狀態。

對奴隸制度的探討使沙文漢從深層次上認識與理解了：為什麼在中國傳統上一直實行專制與皇權統治？為什麼中國的民族偏向保守，表現出對上的盲目服從的奴性,非常缺乏獨立與自治的精神？為什麼歷史上統治者總可以用「集中」「統一 」為理由壓制民主，排斥異見？為什麼中國社會中的等級差別制度如此森嚴，難於破除？為什麼在歷史和現實中常見由同鄉，同宗結成幫派的爭鬥與黨同伐異的現象?。產生這一切特點不是偶然的，也包括他自己為什麼僅因為追求實現民主革命目標而被深深陷入這場運動的社會歷史根源。

四　　結語

沙文漢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探索者，他與成千上萬的那一代追求真理的知識份子一起，在國家動亂、民族存亡之際，無怨無悔地以天下為已任，無私奉獻自己。他們期望中國能夠擺脫千年的貧困與落後，建設起一個繁榮富強，公平、自由與民主的現代國家。他的一生是這一代知識份子和民主革命家命運的縮影。沙文漢的遭遇又說明在一個有著深厚皇權傳統的封閉性的小農國家中，實現民主革命目標絕非易事，五十年代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還遠未具備接受國家現代化的條件。

1949 年建國後經過長期武裝鬥爭，中國的政權的主體和名稱發生了極大改變，但沒有改變的是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氏族性地方宗派的生活方式，落後的小農意識形態與行為模式。

毛澤東建國前夕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指出:「我們必須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地轉化為工作隊」.他強調「軍隊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就是「全國勝利以後,只要有階級鬥爭存在」就「還是一個戰鬥隊」。事實上,龐大的戰爭機器在突然停止下來後,需要有巨大能量的釋放。這些基本面決定了:以農民為主體的軍人執政的政權,是我國在該階段中的歷史無奈的選擇。在這個階段不可能實施現代國家意義上的文官政治制度。很快,共同綱領被實際被廢止,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被宣告終結,匆匆開始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目標不但要消滅私有經濟,還要消滅各種思想意識,這恐怕是馬克思生前也沒有想到的吧。

建國後沙文漢依然表現出對民主政治的強烈訴求,這是因為他從國情與對馬克思理論的理解出發,他從根本上感到當時的社會生產力與文化如此落後,沒有進行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他所主張的政權觀念、黨政分工、黨內民主、團結依靠知識份子、信任民主人士、反對把思想意識問題作為階級鬥爭、擁護雙百方針、貫徹「八大」路線,發展經濟文化等等都說明了這點。儘管他所主張的這些問題,也是中央以前一再聲明過的、有過正式文件的、甚至是經過莊嚴的程式一致通過的。而這種重大政治綱領,路線與方針政策的變幻無常,對沙文漢是致命的。作為一個有理性思維的誠實的知識份子,他既不理解,更不會輕易跟風轉向,這就註定了他悲劇性的政治命運。

所幸歷史並不顧及什麼人的意志,它將頑強地按照自己的規律前進。過早終止民主革命任務的後果現在是眾所周知的。大躍進、文化革命宣告失敗,二十年多以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重新提出以經濟工作為中心與改革開放。1981 年 6 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次宣佈:「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而這卻正是二十五年前「八大」路線的未竟之業。

當時我國民主革命的重大任務本應是發展生產力和建立有社會公平與民主的政治制度。必須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對此我們已無法回避,今天無論是用發展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者其他什麼名稱去稱呼它,都是一個含義。社會發展階段不可能超越生產力和經濟文化水平的制約與局限。從落後的小農經濟生產力水平出發,拼命反對發展相對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力,本身就是社會的大倒退,更何況要想跳躍過去,用階級鬥爭,人為地改變上層建

築來實現共產主義呢。烏托邦是「極左」思想的溫床，在社會付出了巨大代價後，今天我們終於承認要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任務。這個漫長的過程只證明了一個道理：歷史的根本規律是任何人無法改變的。堅持永遠向「左」轉彎的結果，是在付出沉重代價，走了一個圈子之後再回到原點。

我們不應該忘記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原理，任何一種社會革命的任務都有經濟與政治兩個基本面組成，其背後則是深刻的社會文化因素。因此，決不可能依靠單一經濟的發展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經濟、政治、文化必須同步適應，協同發展。如果強行違背這些基本規律，社會還將再次受到歷史的懲罰。要消滅兩極分化的經濟結構、消除城鄉和各種社會不公正，必須通過建設民主，公平的社會政治制度來實現，而不能單純用經濟方法去解決。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就像社會生產力的現代化一樣，也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它需要通過中國人民以更高的智慧來解決。

沙文漢的民主政治思想、出自於他對中國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關係的研究結果，以及他堅持從經濟，文化角度來認識政治制度的分析思路。今天這些思想與方法，對我們依然有很大啟發和借鑒意義。後人應當吸取歷史的經驗，不能因為社會中任何一部分人眼前的需要，不惜讓全社會再付出巨大的代價，僅僅換來一個前人早已得出的常識性結果。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農民運動可以反對皇帝，但決不會反對皇權制度本身。現代化和民主完全不是農民革命的訴求，相反，現代化在某種意義上正是要終結農業社會。百年痛苦的歷程告訴了我們太多的經驗與教訓，因此中國社會向現代化轉型的這部歷史需要認真總結與研究，而不是去掩飾與篡改。這樣做是徒勞的，因為「你可能在一些時候能騙過所有的人，也可能在所有的時候騙過一些人，但決不可能在所有時候欺騙所有的人。」

恩格斯說:「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那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經過百年的苦難和歷史變遷的風雨，今天的情況與五十多年前相比已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不再天真，也不再激進，我們認識到任何社會的變革都不能一蹴而就，更何況對一個有幾千年封閉文化的古老國家！而只有改朝換代，不改變社會制度已被證明也是徒勞的。

中國邁向現代化社會的變革非常需要理性的智慧與實踐的勇氣、非常需要虔

誠的態度與寬容開放的胸襟、非常需要幾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任重而道遠。因而，靜心地聽一聽前人真誠的聲音、反思我們民族的歷史是很有必要的。前人已用極其沉重的代價，為我們總結出中國社會停滯落後的根源，為什麼後人不能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做出更大、更有效的努力呢！　(2007 年 3 月)
——為 2007 年 6 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

注 釋

1　沙文漢的長兄沙孟海（文若），擅長古文書法,教書為生,二十年代後期起在國民黨政府長期任文職官員，是朱家驊、陳布雷等人的秘書，沙文漢的其餘兄弟都參加了共產黨。二兄沙文求是烈士，1928 年犧牲于廣州，小弟沙文度（季同）是畫家，參加抗日到延安，1943 年死於整風運動。四弟沙文威（史永）從事地下黨情報工作，建國後從事統戰部和政協工作。黃仁柯《沙孟海兄弟風雨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

2　姜沛南、沙尚之編《沙文漢詩文選集》（上海社會科學院，1999）第 4 頁。

3　沙文漢抗戰時期發表在《東方雜誌》,《世界知識》,《中國農村》,《中山教育會館季刊》等進步刊物上的有「日本戰鬥力的估計」、「外蒙問題的告急」「阿（比西尼亞）軍失敗的原因及其教訓」、「日蘇問題的總檢討」、「中國財政的根本問題」、「中國景氣論」、「日本在對外侵略中所加深的內部矛盾」、「怎樣組織抗日遊擊運動」、「蘇聯在遠東的國防」等，大部分收於《沙文漢詩文選集》。

4　姜沛南《沙文漢對上海革命文化的貢獻》,原載《新文化史料》1992 年 6 期。

5　沙文漢傳達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報告（未刊）。

6　1953 年底毛澤東帶一個班子到杭州，1954 年 1 月 9 日開始起草，主要起草人是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1 月 31 日完成了初稿。3-6 月分級討論，9 月 15 日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通過此憲法。此後，政協被降級為諮議性質機構。民主人士占多數的政務院改為國務院，副總理不再有民主人士，原有許多社會賢達參加的中央政府委員會也改為最高國務會議,完成了將多党聯合的執政體制轉變為一黨專政體制的轉換。

7　李雪峰《關於黨的八大召開前後的歷史片斷回憶》，　「 中共黨史研究」1996

年 4 期。

8　1956 年 7 月 23 日沙文漢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屆黨代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

9　沙文漢：檢討材料,1958 年（未刊）。

10 《劉少奇選集》 第 172-177 頁。

11 同注 8。

12 《董必武選集》54-55 頁。

13 1956 年 7 月沙文漢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屆黨代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

14 劉海軍《東星北檔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15 曹連生《浙江省新四軍歷史人物傳(上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445 頁。

16 何燮候（1878-1961）浙江諸暨人，愛國學者。早年曾任北京大學校長，支持抗日同情革命，是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省民革主任委員，性格剛強，心口如一。反右後對沙文漢，楊思一的錯誤處理表示不贊成。

17 烏鵬延《原浙江省省長沙文漢同志關心民主人士的一件小事》，浙江省委統戰部網站，2005 年

18 宋雲彬：（1898-1979）浙江海寧人，著名文史學家，作家，教授，進步出版界人士，全國政協委員，民主同盟中央委員等職。在他逝世後發表的《宋雲彬日記：冷眼紅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中沒有找到 1957 年的有關問題。此處所引為當年批判大會材料。

19 1957 年 8 月 12 日沙文漢關於宋雲彬來信給中共浙江省委書記處的信（未刊）。

20 中共浙江省委會議筆記記錄(未刊)。

21 同注 8。

22 《黃源回憶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 266 頁。

23 同上，第 247 頁；及文匯報 1957 年 5 月 25 日《獅子龍燈舞在浙江的苦難歷程》

24 同注 22，第 262 頁。

25 〈房子的糾紛〉，文藝報（上海）， 1957 年 11 期。

26 同注 22，第 268-269 頁。

27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

（錄音記錄文件）。

28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第 56 頁。

29 同上，第 48-50 頁。

30 〈浙江省第二屆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文件，1957 年 12 月 13 日。與沙文漢同時被劃為右派開除出黨的還有副省長省委常委楊思一，省委常委檢察長彭瑞林，省委委員財貿部長孫章錄。當時被稱為「沙，楊，彭，孫」反黨集團。沙文漢 1964 年 1 月 2 日逝世。在陳修良、史永和許多人的努力下，經過極其困難的平反歷程，直至 1983 年 11 月 25 日，在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浙江省委正式撤銷了 1957 年省二屆二次黨代會開除沙，楊，彭，孫黨籍的決議和同日開除黃源黨籍的決定。

31 薄一波《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第 629-631 頁。

32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第 73 頁。

33 同上，第 174 頁。

34 同上，第 182 頁。

35 沙文漢〈駁任曙關於中國經濟結構的論點〉，1935 年寫於日本，同注 2，第 29 頁。

36 陳叔溫（沙文漢）〈中國財政的根本問題〉，1936 年 8 月東方雜誌，同注 2，第 85 頁。

37 陳叔溫（沙文漢）〈中國景氣論〉，1937 年中山教育會館季刊 4 卷第二期 ，同注 2，第 106 頁。

38 沙文漢〈中國奴隸制度的探討〉，同注 2，第 215 頁。

一部個人檔案和一個歷史時代　　　　杜高

各位朋友：

走進這個會場，和朋友們在這裏相聚，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靜的。

儘管有些人強制我們忘卻，甚至禁止我們回憶，我們還是在這裏相聚了，這表現出了一種歷史精神和一種歷史態度。我是懷著一顆真誠的心，懷著一種對後代的責任感，來出席這個研討會的，雖然回憶五十年前的那場災難，對我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我來到這裏，不是為了悲悼我那被毀滅了的青春年華，而是為了我們的後代人的青春年華不再被毀滅。

我想起了悲慘死去的難友們，想起他們，我會止不住流淚。不僅為不幸的死者，也為我們不幸的民族。

就我個人的政治遭遇來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反胡風運動、肅反運動、反右運動、以及長達十二個年頭的勞動教養，直到 1979 年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我經歷了整整二十四年的坎坷歲月，經歷了整整一個時代的磨難。而在上世紀末，奇跡般出現的一部《杜高檔案》，也就成為我在那個特殊年代的一份特殊的歷史遺產了。

在中國，一部這樣完整的個人政治檔案流落到了民間，在文物市場上出賣，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因為中國的檔案制度是極其嚴密的，「文革」結束後，右派改正，所有運動中的材料都已全部銷毀。沒有想到獨獨留下了我的這部檔案，不但沒有燒掉，十八年後，居然出現在北京的一個著名的文物市場當作商品出賣。它被年輕學者李輝發現並購得了。這當然是令人震驚的奇跡。這部檔案跟隨了我二十四年，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漫長歲月。它對於我，既是神秘的，也是可怕的。當我第一次面對這部帶著厚厚的歷史塵埃的檔案時，我的靈魂的確顫抖了。

它使我看到了政治運動後面的「機密」。專案組向上級的秘密報告，領導人的批示，反右運動中專案組預先設定的批判發言的提示等等，我這才真正懂得了這些運動是怎樣有預謀地、殘酷地毀滅著一個人，一個無辜的青年人，怎樣地製造著冤案。

2004 年，李輝先生把檔案的原始文本以《一紙蒼涼》為書名，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我又寫了《又見昨天》一書，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編入《百年人生》叢書出版。這兩本書引起了海內外知識界的關注。

我要坦誠地說，為了這部個人檔案的公之於眾，我盡了最大的意志力，重又承受了一次精神的煎熬。我不想遮掩自己，我願意坦露我所有的難堪，連同我有過的屈辱、過錯和醜惡，把五十年前那個歷史環境中的真實的自我，赤裸裸地展

露在世人面前，還原歷史的真相。

感謝人們，並沒有因這兩本不堪一讀的書嘲笑我和蔑視我，人們理解了我，甚至憐憫我，因為他們從我而認識了一個歷史時代。當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感動著我。

但我沒有想到，已經出版的檔案文本還不是我的檔案的全部，還遺落了一冊，這一冊被另一位定居澳洲的語言學者麗江先生在上世紀末也是在北京潘家園文物市場發現並收藏，帶到澳洲去了。他是在看到國內出版的那兩本書以後，在 2007 年春節回國時找到我，給我看了那冊檔案的目錄和部份複印件的。

這冊檔案裏收有九十七份勞教時期的各種材料，二百五十多頁，十餘萬字。內容包括 1958 年 4 月 18 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從文聯機關帶走後，在一張囚犯登記表上印下的手掌紋和手指紋，以及公安局當時拍下的標號「0115」的我的一個頭像。還收存了檢舉揭發我的材料 21 份，批判會和改造評比會的記錄 18 份，其他材料 10 多份。最後一份材料是 1969 年 11 月 4 日我被勞改農場遣送回原籍後，寫給當地派出所請求勞動的報告。

這冊檔案記錄了我的整個勞教過程，是已出版的《杜高檔案》遺落下來的重要一冊，其中有幾份告密材料對我的打擊是致命的，我沒有想到五十年後還能看到它們的原件。

比如 1961 年 4 月，我已滿勞動教養三年，公安局又宣佈給我繼續勞教三年的懲罰，管教幹部聲色俱厲地呵斥我，說有人揭發我罵他們是「沙皇時代的獄卒」。我無權申辯，只得低頭認罪，接受懲罰。現在我看到了這份可怕的檢舉材料的原件。

又比如 1966 年 8 月，「文革」爆發後，右派勞教隊檢查物品，這次檢查的重點是有人檢舉右派隊裏正在傳閱著一本手抄的小說，作者張志華是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學生，勞教後從農場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學林昭（林昭後來在「文革」中被秘密處決）。那時林昭正患重病，從監獄保外就醫。張志華和她有過最後的一次長談。不久張志華被公安局抓回農場。他關在禁閉室裏，在一個筆記本上寫下了他的這一段驚心動魄的逃亡經歷。張志華是一個很有文學才能的青年，他的這篇作品在秘密地傳閱著。管教人員搜查物品的這天，全隊人員已出工勞動，只剩下幾個病號留在隊裏。我那時正在生病，沒有出工，

隊部便交給我任務，要我寫一個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劇本。我趴在炕頭寫著，稿紙散亂地攤在炕上，稿紙下面就藏著張志華的那個筆記本。檢查躲過去了。我把筆記本悄悄還給了張志華。但沒有想到這天病號組裏還有一個病號，這件事沒有躲過他的眼睛，於是他寫了一個秘密報告交到隊部揭發我。這個報告我在這冊檔案裏看見了。看到這個報告，我的內心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深深的傷感，在那個殘酷的環境裏，改造者利用人性的弱點，發動右派囚徒們互相揭發和互相廝咬，今天回想起來，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管制方法。

現在可以說，一部約有五十萬字的完整的《杜高檔案》留存了下來。它是迄今為止被發現的惟一的一部未經任何改動的右派分子的原始個人檔案。歷史是具體的，歷史的本質只能從人的命運中去認識。正因此，這部個人檔案也就成了人們認識一個歷史時代的最為可靠的文本根據。

《一紙蒼涼》和《又見昨天》出版後，我讀到了許多篇談論它們的文章。人們認為這部檔案為研究和瞭解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社會的政治管治機制和方式，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歷史證詞」。比如人事檔案制度，一本檔案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政治命運，而他本人卻毫無知情的權利，只能隨「組織」評說裁決。又比如勞動教養制度，實質上與對罪犯實施勞動改造並無區別，但非國家司法機關的任何一個單位，大至黨政機關，小至所謂群眾團體、學校、商店——都可以任意施行專政的權力，可以不經任何司法手續，就把一個無辜的人送進監獄。

人們從檔案中看到，1955 年胡風事件爆發，凡是讀過胡風的書的讀者，無不被迫交代和檢查思想，有的就要受審查。僅僅因為我和胡風集團的作家路翎是同事，關係友好，就要把我關起來「隔離審查」，失去自由一年零七個月。搜查審看我所有的私人書信和日記，白天黑夜連番「追查批鬥」，專案組圍攻審訊，以「逼、供、信」強迫坦白認罪。任意把暴力專政手段引入個人的日常生活，用對付敵人的方式打擊普通人民。

人們看到「肅反」運動中厚厚的一堆機密材料，都是追查我和幾個年輕朋友的友誼和交往。目的是要挖出一個小集團，揪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今天看來是青年人特別是從事藝術工作的年輕人最平常不過的生活內容，在那個極權時代恰恰是不被允許的。除了黨團組織，特別忌諱人們相聚一起。肅反中全國追查各種小集團，我和幾個朋友被指控為「小家族」集團，從追查我們的一言一行，追查

我們寫作的作品，再擴大到追查我們的歷史，然後把它們都附會成反革命性質。檔案裏收存的那一冊反右運動中專案組編寫的在內部傳閱的《有關「小家族」的材料彙編》和《「小家族」辯論會發言提示》，就是強迫人們按照預定的意圖，把小集團歸入吳祖光的「二流堂」，而進行大批判的一個最典型的例證。

人們因此清楚地看到了一個事實：在那個專制時代，一個人不僅可能因思想言論獲罪，連青年人最起碼最基本的生活權利都受到干涉和侵害。人的個性遭到壓抑，友誼、親情、愛情、聚會－－都被禁忌排斥，都被指控為資產階級的腐朽行為。人們只能生活在一個模子裏，彙聚到一個組織中，只允許愛領袖一個人，只允許把思想統一到一個頭腦裏。這就是檔案活生生地展示的那個時代政治管制的一大特點。

最為人們悲歎的，是檔案中輯錄的大量所謂「坦白材料」、「檢舉材料」、「交代材料」、「揭發材料」、「彙報材料」－－有的是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和我的朋友們在壓力下無奈地寫的揭發和交代材料，有的是我所在單位的一些同事為表現政治積極，對我的攻擊和陷害；有的是在勞教隊裏，囚徒們之間的互相攻擊和廝咬。看起來這都是一些個人的舉動，實質上都是在組織的驅使脅迫下進行的，普遍地運用在政治生活中。今天你整了我，到了明天，你也一樣淪為被整者。在我的檔案中留下了名字的那些曾經是運動的領導人和積極分子們，到後來的「文革」中，幾乎無一倖免地遭受了更為悲慘的結局。人們會問：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之間搞得這樣四分五裂、互相仇恨、人人自危，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檔案中記錄的 1959 年「大躍進」以後的三年大饑饉歲月，勞教右派所經受的苦難、折磨和死亡的悲劇，使人們驚駭和心靈震顫。一些文章引用我經歷的那個「兩個窩窩頭事件」，來論述在那個殘酷的生存環境中對一個知識份子的精神人格尊嚴的踐踏和摧殘。那是在 1960 年冬天饑餓的日子裏，一次由我為大家打飯。恰好有一人沒來，多餘了兩個窩窩頭。我沒有把它及時送回伙房，我確實有過吃掉它們的念頭。但我又不敢吃。正在這時，管教幹部發現了這兩個沒有退回的窩窩頭，對我進行追問。我立即作了口頭檢查，他不罷手，又召開小組會，發動勞教犯對我揭發批判，再責令我寫出書面檢查。在那個大饑餓的 1960 年的除夕之夜，監舍鐵門外站著荷槍的警衛，我便在昏暗的燈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

撻自己的靈魂，坦白交代自己內心深處的犯罪苗頭，批判自己的「可恥」、「惡劣」、「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階級本性，再從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批判到剝削階級的剝削意識－－－小組會的批判記錄和我的這篇檢查，都作為罪證裝在我的檔案裏，我的這篇檢查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寫了四頁，前三页收在《一纸蒼凉》裏，最後一頁現在也在遺落的這冊檔案裏發現了。

一位評論家看了這些材料後寫道：「讀到這裏，人們怎能不為之悚然？從這個小小的荒誕劇，大致可以想像到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對於不曾在那個環境裏生活過的人，當然是不能真切體驗和想像得到的。所以當你們研究或評論這段歷史時，請對這些受盡苦難的人給予更多的理解，不要譏笑他們的軟弱和屈從，責難他們的無所作為。」1

這就是我在前面說過的使我深受感動的當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

經過了長期的囚禁、摧殘和折磨，一個活生生的生命，一個有尊嚴的人，終於被扭曲、虐殺，被可怕的政治車輪碾成碎片。在我的檔案中，人們讀到最多的文字，是長篇累牘地「向毛主席請罪」、「求毛主席寬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這一類的自我批判，也就是人們說的「匍匐在改造者的腳下，辱罵自己，表示悔改，頌諛天王聖明，感激領袖隆恩」的奴隸式的表白。這些文字是個人迷信時代的產物，只有當我發誓做一個奴隸，才賜給了我那張解除勞教的批示表。

我說過，經過了十二年高牆電網下的強制改造，我已經不再是「我」。我從一個生氣蓬勃的青年變成了「一個世故的人，一個學會了應付周圍環境的人，一個沒有表情的人，一個被貧窮折磨得衰老的人，一個外表顯得老實可憐而內心一直在用力壓抑著情感的人，一個虛假的人。」2

在當權者看來，這也許就是思想改造的「勝利」；而對於一個人，則是自我的徹底毀滅。

一個歷史時代的本質就是這樣決定著一個知識份子的人生命運。我不是五十五萬個右派中遭遇最慘的人，比我悲慘的人何止千萬？他們的檔案都被燒光了嗎？我們應該尋找更多的「歷史的證詞」，把它們留給後代。

五十年後的今天，歷史的天空仍在迴響著五十年前有識之士呼喊民主、自由和法治的聲音，只是今天的民主理念和訴求更具有現代形態。中國的政治家和知識份子們，理應站在新世紀的高度深刻反思歷史，推動中國向民主化的方向更快

地進步。

但是由於中國文化傳統缺乏懺悔理性，中國的政治家們向來把懺悔看成恥辱，缺乏承認自己的歷史錯誤的勇氣，他們決不肯向受害者道歉。由此更顯示出今天這個研討會的意義，我希望它對中國的歷史反思和政治文明的進步產生積極影響。

《又見昨天》出版後，一位很有見地的女作家張抗抗寫了一篇文章，她在文末寫了這樣一段話:「這本書尤其讓我們警覺：一個不善於在『今天』拷問『昨天』的民族，是沒有『明天』的。」

她說得多麼好啊，請允許我借用她的這段話結束我的發言。

謝謝各位。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注 釋

1 丹晨:《為了明天－－關於杜高的〈又見昨天〉》。

2 杜高《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第 193 页。

一個歸國華僑的右派經歷　　葉國榮

一，我出生在越南小鎮

我出生在一個越南小鎮裏一個華僑的家庭，那裏離越南首都河內三十公里。父親去國離鄉數十年，當他還沒有在海外安家的時候，每年年底他都回鄉過年和陸續置產，在海外省吃儉用的積蓄他都換成了關金、國幣以便有朝一日回鄉養老。他為在海外生的五個男孩所起的名字叫：國光、國榮、國瑞、國安和國新，從此都可看出他熱戀祖國的心情。作為兒子的我們怎能不繼承他的願望並為自己的祖國去努力呢！

我從小受到中文教育。小學畢業後父親帶我和哥哥到河內的中華中學去考入

學試。兩個人都被錄取了，但因家境貧窮，家裏負擔不起，只好失學呆在家裏。1946 年我得知在廣西的龍州有一所國立華僑學校，有公費可以免費讀書，就到那裏考試並考上了，在那裏開始上中學。讀了一年半初中，我就跳上高中。再讀一年半，到 1949 年底，國民黨潰退，共產黨要來了，學校解散，我也就回到越南家裏。總之，在三年的時間裏，我已讀了中學裏五年的課程，無論如何，我都得想辦法再讀一年高三，以便告一段落。

我插班進入在河內的中華中學讀高三，結束時居然考得第一名。學校通知我去參加畢業典禮，我本來想去，但參加典禮要求穿白長褲，我沒有白長褲，也買不起，就沒有去。但後來同班同學轉給我一本精美的英法-法英字典，那是河內市市長送給第一名畢業生的禮物。

二，越過中越邊界封鎖線回國

高中畢業以後到那裏去呢？到外國留學當然是最理想。同班的曾廣敏要去英國，彭立生準備去法國，李德光準備去美國，這些對我都不現實。後來得知回到了大陸的同班同學梁堯勳考上了北大生物系，這明確給我指出了一個努力的方向。由於我出生於貧困的家庭，使我對「等貴賤、均貧富」的共產主義理論有天然接受的傾向，但要我離開家裏遠走，我捨不得丟下已經年過七十的老父親，我下面還有幾個年幼嗷嗷待哺的弟妹，我有幫助他們的責任。但是我又想，我這樣留下，又能幫得了他們什麼？能幫得多少呢？與其共同沉淪，不如拼命殺出一條出路，改變了整個社會後所有的家庭都可能獲救。不過從法國殖民軍統治下的越南到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那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會有許多風險，不冒險是不行的。

最初我找到了一個跑車的工作，這輛汽車每天早上從河內出發，送貨到法軍統治邊境。我希望接近邊境後能認識一些人，可以帶領我穿過封鎖線。花了半年時間，我只結識幾個偷運茶葉的女販子。那時只有人從共產黨統治區跑出來，沒聽說有人跑進去。只得另想辦法。我請我的未來妹夫鄭國強幫我辦一張船員證，憑這張船員證可以合法到達中越邊境的硭街，它與廣西省的東興只隔一條不很寬的北侖河。

船到了硭街，我上了岸，正漫無目的又無可奈何地在街上閒逛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跟我打招呼。一個熟人，經他牽線，知道公路局正在找汽車司機，待遇也不錯，就介紹我去，幫我找到了工作。載重卡車司機是一份收入不錯的職業，但我的目標不是發財致富，重要的是要在邊境找個立足點，等我把路線和方向看清楚，就可以過河，遊到另一個新世界去了。

南方中午很熱，街上行人很少，我拿著一個很小的手提包，朝北方漫步走去。只要方向不錯，我一定會走到河邊的。那是硭街市的郊外，來到河邊，四顧無人，我急急忙忙脫掉外衣褲，托著手提袋，裏面有我的身份證、駕照、金戒指、瑞士手錶，連同身穿的那套衣服，慌慌張張地向對岸游去。百多米寬的小河，沒幾分鐘，就靠近了。當我還沒有到岸的時候，正在河邊玩水的小孩，看到有人從對岸過來，馬上跑去向駐紮在附近的解放軍報告。轉眼間，提著槍的解放軍就趕來了，我心裏有數，並不害怕。他們瞭解情況後，就把我送到華僑招待所。

東興市這時幾乎是一座空城。它原來是靠邊界貿易維持的，斷絕了四年，商店都關了門，居民都搬到別處去了。街上一兩個行人聽到的只是自己腳步聲的迴響。

華僑招待所安排我到南寧參加統一的高考，我順利的以第一志願考上了武漢大學的政游治經濟學系。

三，武漢大學的學生生活

為什麼我選了這個專業？我高中畢業後從海防華僑中學圖書館裏借來了一些論著，如政治經濟學大綱和政治經濟學概論之類，加以鑽研；但它們對我都沒有吸引力。倒是蘇聯的列昂捷夫寫的那本「政治經濟學」，能自成體系並可以自圓其說。其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並不排斥西方的學說，相反，他的剩餘價值理論是建立在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的。

我到了武漢大學美麗的珞珈山，學習和追求我相信的真理，實現了我的夢想，天從人願，我萬分高興，分秒必爭。我的衣食住行和跟學習有關的一切費用，都由政府負責，我一點不必操心。

高考後在等待放榜這段期間，我常到新華書店站在那裏看書。我很喜歡方志

敏寫的「可愛的中國」，也很敬佩他的為人。他那篇「清貧」對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響。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我國自古以來知識份子的優良傳統。何況共產黨不是一直宣揚「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嗎？我一直鼓勵自己能獻身於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事業。方志敏和許多仁人志士不正是為了這一偉大的目標而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嗎？我在學校裏能夠安心學習，不正因為有廣大的勞苦人民在供養著我嗎？我為他們獻身不正是天公地道的嗎？

我滿懷信心地努力學習，從一個閉塞落後的地方進入崇高的學術殿堂，使我大開眼界。圖書館裏不但有看不完的書報，每個週末的舞會上高年級同學教我們初出茅廬的新生跳交誼舞。1-234，1-234，或者 1-2-3，1-2-3，摟著女同學的腰板，像推板車那樣從舞場的這一端堆到另一端，也是挺有趣的。遇上有什麼文藝演出，作為華僑學生會受到優待，能拿到票。我第一次看到京劇，看不懂。有票就給了別人。後來接觸多了，像對「蘇三起解」有點熟識，就覺得很有趣，也喜歡。知名人物也常到武大做報告，包括胡耀邦在內。

1954 年長江發大水，全市都捲入了增高堤壩的防汛鬥爭。每天清早喇叭響起動員的歌曲。學校分配我們到附近的山坡上挖土，烈日底下我們雖然揮汗如雨，無意中也挖出了不少古墓，但感覺很有意義，一點都不覺苦。武漢市終於保住了，但市外卻一片汪洋。

四，運動一個接一個

1955 年的運動是肅反，我對胡風反革命集團一無所知，除了在報紙上登載的材料外，我還到圖書館找他們的著作看，可惜一無所得。我覺得只讓起訴的一方發言，不許被告辯護是不公平的，所以對胡風反革命集團也就恨不起來，反而同情他們。校內的鬥爭仍然是很激烈，在我對面房間住的一個生物系四年級同學蔣春軒，就跳樓自殺，當場身亡。另一個物理系學生也跳了樓，因落在斜坡上，還是救活了。

1956 年的運動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向科學大進軍的活動。我太高興了，參加了到農村去調查的科研小組，研究農業合作化問題。回來還寫了一篇兩萬多字的論文，寄到出版社去。我被評選為「三好學生」 。

除了讀書以外，其他方面的活動我也很出色。在全校的乒乓球比賽中，我擊敗了教工冠軍的任映國而奪得全校冠軍，所以常常代表校隊外出比賽。毛澤東這一年橫渡了長江，接著武漢市也組織了橫渡長江的活動。當我從長江的南岸游到北岸登陸時，副市長在我胸前掛了個獎章，粉紅色的絲帶遇水把胸前都染上紅色。

入黨入團對我是無所謂的，但在團員同學們一再動員下，我還是參加了共青團。

我的論文以專題研究的形式發表在《新建設》1957 年的第一期上。拿到 370 多元的稿費（當時每月的伙食費只要 10 元），鼓舞我向更大的領域進軍：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熱潮的鼓舞下，我要以批判斯大林錯誤的經濟理論作為我的畢業論文的內容，真是雁初學飛嫌天低。

當時大學生每學年的課程裏都得上一門政治課，一年級是中國革命史，第二年是聯共黨史，第三年是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生，系裏還派我，也是培養我，讓我給哲學系三年級同學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章節，大學生給大學生講課。我不是通過念講義而是通過我的理解來講述，結果還是令人滿意的。

大鳴大放開始了，我被選為學生代表參加了湖北書記王任重來校組織的座談會。會上我聽到同學們向當局提了不少意見。我沒有說什麼，不是我不敢說，不是我有什麼顧慮，而是我不懂。我的生活面很狹窄，我的知識很膚淺，實在提不出什麼意見。但對校內外對一黨專政和個人崇拜的批評我都贊成和有同感。記得上課時每節課之間有十分鐘休息，我們都搶著到資料室去看參考消息，看上面登載的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文章，主要內容是揭發斯大林的暴政等等。

校園內召開了幾次大的辯論會，武漢大學在華中地區是首屈一指的學校，名聲遠播。除了本校成千上萬的師生員工外，許多校外人都來旁聽，真是摩肩擦背，人山人海。中文系的吳開斌和莫紹裘是主講人。他們對胡風問題和共運等許多問題進行闡述和爭辯；真是高論滔滔不絕，風度翩翩。我以班長的身份，帶領全班同學參與了中文系同學到人事處進行的「質詢」。他們在人事處的門欄上貼上「黑暗小王國」的橫幅，我們只起了推波助瀾、吼叫助威的作用，無論如何，我是算不上什麼人物的。

反右開始了，我在全校範圍內是排不上號的，但在經濟系的學生裏卻首當其衝。並非我有什麼了不起，無非是「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貼在宿舍門口

對面牆壁上有關我的反動言行的大字報，在我看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斤兩。在我的畢業論文的草稿裏確實罵了斯大林，罵他「惡人先告狀」。他在學術爭論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壓人。事實上同學們並不知道我在論文的草稿上寫了些什麼，這是指導我寫畢業論文的老師揭發的。當他和我一起討論我的論文的內容時，他很同意我的觀點，毫無非議。後來他卻作為反動言行來揭發我，但我並不恨他。他不揭發，別人知道，他就無以自保。

五，我成了「極右分子」

我們班裏共有二十一個學生，劃了五個右派。我算情節最嚴重，是個極右分子，處理是不予分配工作，留校監督勞動。沒有工資，只發生活費。最初在圖書館勞動，後來跟下放幹部到蘄春縣農場勞動。十五個留校監督勞動的應屆畢業生裏，中文系的莫紹裘和曾君儒是在這時升級被判刑的。他倆被從縣監獄押回農場開宣判大會時，除了手上戴銬，還被帶槍的民兵用繩子牽著，像人們牽狗一樣。圖書館學系的學生何文白也曾在鬥爭大會上被圍著拳打腳踢。

大躍進不但沒有豐碩的成果，相反，物資供應越來越緊張，學校本身也要自辦農場來解決自己的匱乏問題。我們這批在外地農場勞動的下放幹部和右派分子，就調回自己的農場，於是我就回到珞珈山武大的農場來勞動。1959 年國慶十周年宣佈摘掉第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沒有我的份。1961 年算是摘掉我的帽子，並從農場調回本系資料室搞世界經濟的資料工作。

表面上我是被孤立了，沒有人跟我講話和打交道。但當廁所和洗澡房裏沒有旁人的時候，就有人願意跟我談話和問候我。系裏有些領導也表示過，把我劃成右派分子是一種損失。我知道，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也力不從心，甚至自身難保。1961 年把我安排在資料室裏搞資料，實在也是給我一個學習的機會。

但是，當我稍微熟悉這方面的資料的時候，學校卻把我冒充應屆畢業生分配到雲南，趕出了武漢大學。

以我一個摘帽右派的身份，沒有和武大人事處商討的餘地。而雲南人事廳不賣武大的賬，以我不是應屆畢業生為理由，拒不給我安排工作。

我記得有這麼一首三句半：「充軍到雲南，見舅如見娘；兩人齊下淚，三行！」

雲南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邊遠的專門作為發放賊配軍的荒蠻之地。當然，現在交通方便了，就天然環境看應該說雲南還是個好地方。我被發配到雲南也可以說因禍得福。有一位同校一起分到雲南的生物系姓林的同學，和我過去並不熟悉，當知道我的右派背景後不但沒有歧視，相反，他還邀我到他工作的林科所作客，還送一幅他父親手書的墨寶給我，上有兩句唐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四十多年了，至今我仍掛在臥室的牆上。

有一位同系的一起分配去雲南的畢業生，可能對我有監督之責，逢人就介紹我的右派背景。有些人從此就不敢接近我，但想不到卻有一位也是從外地分配到雲南的姑娘，竟因此而主動找過我。我們在等候分配的空閒時間裏，一起遊山玩水，交談學習心得和對時局的看法。五百里滇池，陳圓圓的金殿，都曾留下我們共同的足跡。我們越談越親切，幾乎難捨難分，不過最後還是分手了。即使她願以身相許，但我覺得不能不為對方考慮。以我戴罪之身，誰靠近我誰都會受到連累和倒楣。我祝福她有美滿的生活，並一輩子對她都心懷感激，難得她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對我的鍾情。

我終於被雲南人事局退回湖北省。回到湖北，武大仍不要我，我又等了幾個月。我催得多了，人事局的幹部煩不過，向我訴苦，她說：「我求爹爹，告奶奶，沒有人肯要你。」可想而知，在我的檔案裏，武大人事處把我寫得多麼壞，是個多麼可怕的妖魔鬼怪！誰願意接納收容一個有特務嫌疑的反革命呢？

後來，我終於被塞到武漢柴油機廠，從此當一名只做簡單計算工作的統計員。

1968 年，中共當局以「以反革命為目的偷越國境」罪判處我五年有期徒刑，送湖北沙洋勞改農場。刑滿後我又被強制留場「就業」，後回武漢柴油機廠勞動。

六，民主與自由對共產黨是有無的問題

五十年過去了，現在回過頭來看看，當時的要求無非就是民主與自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反對一黨專政和主張多黨化，這些要求到底合理不合理？現在實現了沒有？因提出這些要求而受到打擊，被貼上資產階級右派的標籤，屬於人民公敵的五類分子。千夫所指，降職、降薪，開除、勞教或勞改，弄得身敗名裂，甚至家破人亡，要不要後悔？人類的進步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問題是由誰來付出？

反右鬥爭是一場歷史意義極其深遠的運動，在這次運動之後整個神州真正變成了萬馬齊喑，不允許有半點不同的聲音，這才為所謂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創造了條件，結果造成了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古往今來，有哪一次災難會造成這麼多人的死亡？這場災難百分之百是由人禍引起的。通常卻把它稱為「三年自然災害」，這完全是胡扯，是說謊。劉少奇只因為為這場災難掩飾得不夠，他說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就引來了滅頂之災。劉少奇這個案件現在是平反了，但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真正的罪魁禍首，到現在一直沒有受到清算。

這個造成幾千萬人民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禍首，罪惡滔天。但他的畫像至今仍然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照片依然印在每一張鈔票上，中共領導人沒有像赫魯曉夫那樣去揭發和批判獨裁者的各種錯誤和罪行。他們不敢去鞭屍，而是仍舊想方設法維護那虛偽的形象，三十年來依舊恭恭敬敬地在頂禮膜拜。為什麼？毛澤東占有的是無邊無際的獨一無二的統治權，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而他手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員們則分享著大大小小不等的專制權力。他們對毛的形象的維護實際也是對自己專制權力的維護。

毛澤東創立的制度是一種封建獨裁制度，在這種制度內，統治者剝奪了人民應有的選舉政府各級工作人員的權利，剝奪了他們應有的言論自由和出版的權利，剝奪了他們集會結社組黨的權利。正如儲安平說過那樣：民主與自由，對國民黨是多少的問題，對共產黨是有無的問題。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仍然是不允許討論的。它說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義應該是代表最廣大、最無私的普通平民，而共產黨打著它的名義，實際上是一小撮封建獨裁者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專政，他們對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進行欺騙、剝削和壓榨，剝奪了他們許多應有的權利。

現在，社會主義陣營已經不復存在，蘇聯也已經瓦解。過去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俄羅斯的總統已經通過選舉產生。越南共黨的總書記也要通過兩人的競爭產生，這也是進步的表現。惟獨中國共產黨還是鐵板一塊，對輿論的控制，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的箝制，不但沒有放鬆，反而變本加厲。不過我深信，或遲或早毛澤東定會要受到清算，毛澤東創立的封建獨裁制度總有一天要被人民拋棄。（2007 年 5 月 5 日於洛杉磯）

——為 2007 年 6 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

「九死一生」話反右　　巫寧坤

一

今年六月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反右運動」五十周年。中共一貫用「反右擴大化」之類的說法掩蓋事實真相，企圖讓人們忘記這段血腥的歷史。但是，已經覺醒的人們是決不會忘記的。近年來，記述這段歷史的著作陸續出現，有宏觀的，有微觀的，頗值得關心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狀的人們注意。在這些近著中，最動人心魄的一部要數戴煌的回憶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戴煌，1928 年出生于江蘇阜寧縣溝墩鎮，父親是中醫。少小時擔任過學校抗日兒童團團長。十六歲參加新四軍，同年加入中共，隨軍轉戰蘇北，參加過白刃戰。1947 年，開始任新華社隨軍記者。進城以後，他不過二十來歲，先後作為戰地記者被派往朝鮮和越南採訪，工作一再受到表彰。年青有為，「又紅又專」，戴煌在紅色中國前程似錦。

可是，滿懷革命豪情壯志，戴煌念念不忘的並不是個人前途，而是黨和國家的命運。1956 年三月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傳達不僅粉碎了他心目中斯大林這尊偶像，而且使他痛感到中國也有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種現象「已對我們的事業和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有害的影響」。同年六月下旬，在上海的外事活動中，他親眼目睹了中共的「首長」們如何飛揚跋扈，享盡種種特權，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們又如何心安理得地乘機「海吃海喝」。而在蘇北故土，他卻看到這個飽經苦難的小鎮比當年更加荒涼破落，鎮內外鄉親們還有不少人貧苦不堪，受一群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新惡霸欺淩壓榨，有冤無處伸。

面對現實，戴煌憂心忡忡。回到北京不久，他大聲疾呼，無人理睬。一次，

在家吃晚飯時，多喝了兩口酒，談起家鄉土皇帝、新惡霸，越說越憤慨，他就向妻子說：「如果我們黨內有個類似革命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就好了，專門來革黨內弊端的『命』就好了。」妻子隨即把他呲了一頓，說他想入非非。

同年十月，蘇軍鎮壓波蘭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他認為，發生這樣的流血悲劇，最重要的因素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對蘇聯和本國的許多問題感到的不安和憤慨。他擔心，如果再不積極變革，中國也難免發生類似的悲劇。他「決心履行一名共產黨員的義務，向党的最高領導層敞露胸懷」，重點提出「神化與特權」的問題。於是，他著手給「毛主席並中央委員會的同志們」寫一封長信。這時聽到了全黨即將整風的報告，他覺得「這封信沒有寫下去的必要，而把振興黨風的希望寄託在即將到來的整風運動上。」但是，這希望很快就完全破滅了。

1957 年五月一日，「整風運動」大張旗鼓開場後，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熱烈響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號召，「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誰料到，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執筆的社論，公然背信棄義，吹響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號角。正當戴煌感到惶惑時，中共領導人彭真給北京市黨員幹部做報告，說甚麼「『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有意見照常提，這叫做『內外有別』」。他並代表黨中央保證，黨絕對不會把提意見的黨員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混為一談。

戴煌深受鼓舞，於是在一次又一次鳴放會上「把一年來鬱積於胸的種種思考和盤盡托。結論是：全黨、全國最嚴重、最危險的隱患，就是『神話與特權』。」當時他不可能知道，彭真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動員報告和保證，不過是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他自投羅網，當上了新華社僅次於李慎之的「大右派」。「一夜之間，新華社大院裏就糊滿了五顏六色的檢舉、揭發和責罵我的大字報。我的妻子也貼了一張大字報，說我要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接著就是沒完沒了的大會小會批判。」戴煌不服，主動拿出了那封還沒寫完的給毛澤東的長信，「以昭心跡」。他再次自投羅網，這份「萬言書恰恰成了他「反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他受到「二類處分」，撤銷原有職務，實行監督勞動；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剝奪軍銜。自 1958 年四月起，每月 155.75 元的工資改為 28 元生活費。

這時，戴煌已是兩個小女兒的爸爸，大的才三歲半，小的剛滿十個月。妻子

是十四歲就參軍入黨的戰友，現在提出離婚，小女兒歸她，大的歸爸爸。突然面臨妻離子散，戴煌也不得不同意，只待上級批准。小女兒隨外婆到大連去投親靠友，大的暫時跟媽媽。

四月中旬，戴煌和新華社另五位編輯難友到達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在農墾部王震將軍屬下的八五零農場雲山畜牧場第三生產隊，和先頭到達的一些中央部門的「右派」會合。這些「新相知」中，不乏知識界的精英和出生入死的革命軍人。其中有原東北魯迅藝術學院院長、畫家楊角夫婦，《人民畫報》副總編輯、漫畫家丁聰，美術評論家和書法家黃苗子，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王卓如，老《大公報》駐美特派員朱啟平，電影演員李景波、張瑩等。

戴煌用全書近一半的篇幅記敍了北大荒流放的全過程，字字血淚。「監督勞動」從一開始就是十分艱苦的。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風，樹枝編就的草炕擁擠不堪。吃的是窩頭、玉米渣子、黑面饃，沒甚麼菜，甚至連鹽都缺少。最初的勞動，是在完達山腳下的田野上，十人一組，像牛馬一般拉拽二十四行播種小麥。隨後就修築名叫「五一水庫」的土壩。刨土、抬土、打夯，勞動強度很大，每天十幾個小時。負責監督的指導員朱大麻子蔑視和踐踏人的尊嚴，開口閉口漫罵大家是「土匪」、「俘虜」，任意強迫大家餓著肚子延長勞動時間。耿直不改的戴煌建議停止強迫勞動和強制「放衛星」，朱麻子根本不理會，反而打擊報復。一天，由於凍土層太厚，五六個人一排猛打「排字鎬」，凍土也紋絲不動。眼看當天的土方任務無法完成，朱麻子決定爆破，匆匆派一人去給炸藥包安雷管，結果這個「右派」被炸得粉身碎骨。

正當其時，北大荒的太上皇王震發出號召：「進軍完達山，拿下二十萬方優等木材，保證首都十大建築的需要，向新中國建國十周年獻厚禮！」各大農場立即組織起三千多名復員專業官兵，挺進完達山林區。雲山畜牧場也派出一支由一百多名「右派」組成的伐木隊，深入完達山南麓的原始森林進行伐木大戰。「這些人中絕大多數都沒見過原始森林啥模樣，更甭說對又高又粗的大樹拉大鋸劈大斧了。」「党的領導」根本不顧「右派」的死活，倉促上馬，一味蠻幹，幾天之內就砸死了四個人，其中包括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經理劉琛，他是 1936 年東征中參加革命的。死者一律草草掩埋了事。

在朱麻子之類「党的領導」下，戴煌和「右派」難友們成了地地道道的奴隸。

口糧越來越少，勞動時間越來越長。耳邊聽到的是：「完不成定額，就不准吃飯，不准收工！」「就是天上下錐子，你們死也得死在這裏！」奴隸們被迫豁出命地從事力不勝任的勞動。戴煌常常仗義執言，頂撞「領導」，又對「三面紅旗」等一系列禍國殃民的方針政策有所非議。他「強烈憎恨那些殘酷無情地強迫我們這些人以垂危之身『挾泰山以超北海』的農場奴隸主式的人們，也同樣憎恨我們這支魚龍混雜的隊伍中出賣人性助紂為虐的鷹犬們！」他成了他們的眼中釘。多次受工傷，照樣強迫勞動。他們還一再組織批判會對他進行圍剿，威脅要送他去勞改，永遠不給摘「右派」帽子，等等。

1959 年 11 月 23 日，雲山畜牧場集中全場三四百名「右派」，開第一次摘帽大會。被摘帽的約占總人數的十分之一。戴煌得到的卻是對他最徹底的否定：「党把他培養了這麼多年，可是他從戰爭到和平，從國內到國外，沒給黨幹過一件好事，反而練出了一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領！」

這時每月的口糧已降到三十斤，人人不是苦幹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腫。夜盲、形呆、暈倒雪地、熏倒於炭窯，層出不窮。「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國家幹部、共產黨員、知識份子，現在通通變成了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奴隸！」他本人也得了浮腫病。有一次大便後，他就暈倒在自己拉出的那堆蓋滿了鮮血的糞便旁，幸虧被人及時發現，才沒有被凍成「冰乃伊」。但他還得照樣參加燒炭「搶窯」的危險勞動，一次次被熏倒在窯內還在冒煙的木炭旁。若不是同窯的難友急救，他「也許在昏厥中就離開這個『悲慘世界』了。」

1960 年 5 月，他們這幫一陣大風就能吹倒的人，又挑著沉重的行李和勞動工具轉移，途中由於不堪忍受的殘酷虐待又死了兩個人。一個是四十來歲的佟藹成，原一機部子弟學校校長。妻子和他離了婚，給他丟下幾個孩子在北京，他根本養活不了他們。他極為愧咎與哀傷，曾在一座空炭窯裏自殺未遂。這次，他是用自己的褲腰帶，在一棵小樹上吊死的。第二位叫趙琪，也是四十來歲，原交通部幹部、共產黨員，也是被妻子所拋棄的人。他倒在半路上的水窪地中，「領導」拒絕救援，他就死在風雨地裏了。

其後一個多月，陰雨連綿。奴隸們淋著雨，在稀巴爛的地裏搶挖排水溝，每天定額二十立方米。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帶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為「泡將」，剝奪吃飯權，甚至捆罰打罵。戴煌不顧一切在會議上公開反對，爭取改善全體奴隸

的命運。這時他本人沒有拐杖就不能挪步，每走一步，全身的骨節縫都痛如錐挖針刺。他悲觀絕望，疼得實在沒法忍受了，突然高舉起雙臂，瘋狂般地呼喊：「請黨來槍斃我吧！……黨如能早日結束我的生命，我將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大笑三聲……」

1960 年 6 月上旬，他應妻子的要求，辦了離婚手續，反倒感到平靜一些。七月又患起了痢疾，還拉血，「魁偉壯實的大漢成了一根細長杆兒，體重由一百九十六斤銳減到九十二斤」。醫生著急要他立即住院治病，奴隸主們就是不批，他也不能歇。這時，每天的口糧定量只有七兩帶皮的原糧了，到了見吃如命的地步。晚上一下了工，四處找野菜，挖蘆根，掏鼠窩。

國慶過後，雲山畜牧場場部決定在大雪封地之前，發起一場突擊收割大豆的「大會戰」，這種玩命的任務照例落在一百多名「老右」身上。饑餓浮腫的奴隸們挑著行李，踉踉蹌蹌地趕向小雲山，深夜才到達。十月三號這天是大會戰中的「大突擊日」，一天下來，「突擊隊」根本無力完成每人必須割完五畝大豆的「決死」令。直到天黑才收工，在風雪中東倒西歪地往回挪，一路上倒斃了七個人。其中有當年負責保衛天安門的高射炮營代理營長兼營參謀長孔祥忠上尉，還有在朝鮮戰場上立過戰功的馬競亮。七個「老右」的遺體捆在一輛平板馬車上，就拉到小平山的後坡去了，連張裹一裹屍體的草席都不給。

美麗的北大荒，一夜之間，成了慘無人道的死亡場。奴隸主們非但沒有從這大批死亡中吸取教訓，反而搬出老祖宗的家訓告誡奴隸們：「要鬥爭，就得有犧牲！這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會經常發生的！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壞人煽動！」他們繼續人性滅絕地作踐奴隸。與戴煌同屬一個班的共青團員羅相成已「三度浮腫」，醫生給開了病假條，排長卻逼迫他出工。小羅手裏拄根棍，在鵝毛大雪中慢慢向前挪。等他到達工地，已是開午飯的時間，排長破口大罵，不許他打飯。戴煌把自己少得可憐的口糧分給他一半，小羅還是奄奄一息，兩天以後「就長離人世，留下了他那在北京的懷著他時就守了寡的孤苦伶仃的老母親」。

小羅死後不久，雲山畜牧場許多「老右」相繼成為餓殍。有的倒斃在路上，有的活活地餓死在集體宿舍的大通炕上。其中有解放軍軍官，有歸國華僑。除了餓死的和因餓而病死的，還有不忍淩辱而自戕身亡的。死亡場上究竟死了多少人？農場始終沒有公佈過。僅據一個隊的統計員、「摘帽右派」楊崇道中尉說，光是在

他那個隊百十來名「右派」中，經他的手寫死亡報告的就有三十餘人，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1960 年十二月底，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共決定中央各部門的「右派」，不論摘帽與否，一律離開距烏蘇里江太近的農場。其中回北京原機關的人，表現尚可的，重新分配工作；表現特別不好的，將由原機關加重處罰。戴煌屬於後者，但是他畢竟死裏逃生，離開了這死亡之海。他的一些難友，本來已全身「三度浮腫」，有的在回北京途中就死在火車上，有的「摘帽」以後也一個接一個死去了。

二

戴煌回到北京之後，1961 年夏秋之間，被派到新華社國際部搞資料工作。1962 年一月，在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破天荒做檢討，承認這些年「幹了一些蠢事」，還說甚麼「讓人家講話，天塌不下來」。於是，黨中央重新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同時對黨內部份「右派」進行甄別平反。新華社黨組織動員戴煌寫材料，爭取甄別平反，作為對新華社總社近百名「右派」進行甄別平反的第一個「試點」。

戴煌深受鼓舞，懷著「不管如何也要革命到底」的決心，寫出了《回顧我這幾年所走過的道路》的材料，洋洋十萬言，重申了反對「神化與特權」的觀點，彙報了北大荒的遭遇與思考，並大膽闡述了對當前國內外主要問題的觀點。他相信毛主席和黨中央會「從善如流」，從此「改弦易轍」。黨組織對他慰勉有加，不久就通知他黨已決定對他進行甄別。國慶在天安門廣場上，他高舉紅旗，走在新華社隊伍的最前列，使他感到「無比興奮，無比溫暖」。誰料到，事隔僅僅一個月，毛澤東就再次背信棄義，徹底推翻了半年多前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檢討，聲嘶力竭地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打退翻案風」！戴煌再次自投羅網，他的「十萬言書」成了「翻案風」的典型罪證。經過六個月的準備之後，新華社從 1963 年「五一」到「七一」，舉行了一系列的大會小會，對戴煌進行了「再批判」。

在甄別平反有望的時刻，戴煌選中了一個出身貧寒、比他小十二歲的女工潘雪媛，準備重建小家庭。這個小有文化的姑娘當年曾從大字報上讀到過他關於「神化與特權」的論述，認為他並沒有錯，因此對他目前的境況並不計較，「只要人好，

就是一切」。「再批判」之後，他倆都感到大難即將臨頭，在前妻拒絕重婚後，她決定與他立即成家，以備在必要時能夠正式以繼母的身份撫養這時已讀小學二年級的他的大女兒。一個街道工廠的卑微小女工，竟敢冒黨天下之大不韙，以自己的青春與前途去和一個政治「賤民」同命運，共患難，不計得失，不顧後果，這是怎樣的道德勇氣，怎樣的愛心！新華社的某些人卻認為小潘「思想反動，硬要嫁給一個『老右派』」，便唆使二龍路噴漆廠解除了她的出納兼會計職務，強迫她到那個素來不讓孕婦沾邊的噴漆車間去「勞改」。

1964 年 4 月 23 日，這是戴煌參加新四軍二十周年的紀念日。再過一個來月，潘雪媛就要生孩子了。就在這一天上午十時半，戴煌接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兩年」的處分，並立即被押送德勝門外土城子監獄。妻子得到通知後，衝破新華社官方的阻撓刁難，帶著他的大女兒去探監，給他送行李，叮囑他「不要想不開。我和孩子等著你！」

兩年勞教期間，勞教所一再遷移。六五年五月，戴煌患急性胰腺炎，經搶救再次死裏逃生。六六年五月，在團河勞改農場解除教養，聽候處理。一個月後，「文革」爆發，新華社領導癱瘓，他的問題無人過問，於是他便成了一個「二勞改」的「留場就業人員」。六六年冬，又調到北京市管轄的清河農場，先在五八一分場勞動兩年。每天面對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彙報，三呼「萬壽無疆」和「永遠健康」。戴煌感到痛心疾首：「我們這個號稱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政黨，迷信墮落到如此地步！」

1969 年十月，林彪的「一號命令」下達。北京的大批幹部被驅趕到「五七幹校」，戴煌隨同其他「政治犯」，則被上面架著機關槍的一列列火車，送進了漫長而更加黑暗的隧道。

這隧道在山西。不是在監獄裏推土燒磚，就是在勞改工程隊當小工。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事件發生後，又被調到太原城內同一個工程隊的二隊，仍然做木工，又兩次負傷，在進入漫長的隧道之後，第一次正式得到工傷假條。「實際上，我們遠未能獲得人世間最起碼的自由權利，而只能在黑越越的似無盡頭的隧道中磕磕蹾蹾地向前摸。」他通過勞改系統上轉的申訴材料均石沉大海。1978 年在快速推土燒磚時，他的左肋又一次被打斷。

這十幾年中，在共和國的首都，在另一條暗無天日的隧道中，新婚的妻子潘

雪媛帶著孩子經受了人間罕見的磨難。1964 年 4 月 28 日，戴煌被關進監獄的第五天，她為了省住院費，一直拖到最後一刻才去產科醫院。「她一個人孤孤單單地躺在病床上，既不喊，也不叫，以極大的毅力忍受著劇烈的疼痛。」她失去了知覺，醒來時候孩子已經出世了，是一個早產一個半月、極度瘦弱的女嬰。子宮頸的血管在擠壓衣胞時斷裂，產床對面兩米多遠的白牆上已被噴射了一片鮮紅的血。她剛出院，新華社房管組就強迫她搬家，她和新生兒「為偉」就搬到一間九平方米的西曬的小屋，用磚頭支撐起幾塊長木板當床。

有一個月，孩子生病，雪媛陸續請了十幾天假，所以只領到十天的工資。她還去向同事們的借款，再繳新華社的一元零八分錢的房租和水電費，只剩下一塊六角二分錢了。靠這點錢，母女倆苦度了半個月。為了讓為偉每天還能喝飽棒子麵糊糊，雪媛每天中午或晚上在工廠食堂光喝那不要錢的米湯或麵湯，餓得臥床不起。這個小女工很要強，「我和孩子都要活得像個人樣，決不讓貧窮壓垮，決不給戴煌丟臉。」幸虧戴煌從勞教所休假回家，帶回了三個月積攢的工資，才度過危機。儘管這筆錢為數不多，這位富有愛心的妻子還從中拿出十元，匯給戴煌在家鄉的老母，幫老人家度過中秋節和自己的生日。

「文革」浩劫來臨，「大右派」家屬潘雪媛在工廠受到圍攻，「監督勞動」，她的日子就更難過了。她已二次懷孕，「照樣還得每天在露天下，清除醫用大洗衣機腿上的鏽，肚子大得蹲不下去而只得雙膝跪著。」一位老師傅實在看不下去，讓組長把她調進車間搖臂鑽上幹活，偏偏又給一個小夥子冒失鬼拿著調動火車的大手閘耍弄時打在肚子上，第二個女孩子就早產了，又一次危險地大出血。這時，戴煌還在太原勞改，便給孩子取名「晉京」。

小晉京一天天地大了，在這恐怖又貧病交迫的歲月，雪媛的身體卻越來越不行了。她在搖臂鑽上打眼時，經常暈倒。1978 年春節臨近，戴煌得知妻子病重，便請准了假趕回北京。回到家中，他發現妻子已有些神志不清，而兩個孩子在學校學習都名列前茅，卻因為父親是「大右派」受到歧視。同時，又得知家鄉的親人也受株連，慘遭荼毒。母親不勝悲憤而死，二哥也被人活活整死。戴煌不得不「一邊照料病重的妻子和兩個上小學的孩子，一邊到處上訪，力求儘快結束在漫長隧道的歲月以回到妻兒的身邊」，卻到處踫壁。

1978 年九月，感謝胡耀邦討回歷史的公正，中共中央發佈了「右派」改正的

文件，十二月，新華社才做了戴煌「被錯劃為右派的改正決定」，他從二十九歲到五十歲的長達二十一年的黃金歲月煙飛灰滅。

戴煌不是甚麼「階級敵人」，而是「雖九死而不悔的」忠貞不二的共產黨員。「九死一生」也決不是文學語言的誇張，而是這一苦難歷程的真實寫照。出版者不是甚麼「離經叛道」的小出版社，而是堂堂的中央編譯出版社。這部紀實文學的可信性是官方的宣傳部門也不可能質疑的。

《九死一生》不僅是戴煌個人和難友們錐心泣血的苦難史，而且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間地獄的全景。戴煌所熟悉的但丁的地獄固然觸目驚心，但畢竟是詩人想像的幻景。戴煌在其中長年受難的死亡場和漫長的、暗無天日的隧道，卻是現世不折不扣的赤色人間地獄。這也不是唯一的一座地獄，而是遍佈中華大地的連鎖地獄的一環。回顧北大荒兩年零八個月的殘酷流放，他感到「最富有想像力最反動的小說家，恐怕也很難想像出在我們這個又進行了整整十個年頭『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國家裏，會發生如此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黑暗與恐怖。」

當年左拉的《我控訴》勇敢地仗義執言，譴責一個製造德萊弗斯冤案的法國軍事當局，從而贏得了整個文明世界的崇敬。《九死一生》控訴的是一個刻意製造了千百萬件冤假錯案、置千千萬萬人於死地的專橫暴虐的極權體制。作者為當代中國歷史所作的血與淚的見證，其意義遠勝於《我控訴》，而足與司馬遷的巨著《史記》媲美，永為世世代代鑒戒！戴煌和潘雪媛，這對患難夫妻，是一個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扼殺人性的年代稀有的頂天立地的異物，不愧為「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光輝典範。

——為 2007 年 6 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

我們這些小右派　　巫一毛

今年，是反右運動五十周年。這個月初，我重訪了我出生的北京海淀醫院，在「娘家」過了四十九歲生日。今天，我們從世界各地聚集一堂，在自由民主的

土地上，在美麗如畫的洛杉磯，紀念反思研討這個對在座的每個人都有特殊意義的歷史事件。

1957 年，毛澤東以他特有的權術，指揮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將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打翻在地，由此帶來中共執政後的第一次全國性「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

文革結束後，中共官方爲他們公開承認的五十五萬右派進行了平反。而全國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各類「右派」分子的實際上在一百十萬以上。（參見《陽謀》（香港：開放雜志出版社，2007）第 318 頁。）這一百餘萬人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分子。由于反右運動前臺打手鄧小平成爲最高决策者，當局仍然堅持反右運動是正確的，錯誤僅僅是嚴重的擴大化。爲此官方還特意保留了五名右派沒有平反。這是多麼荒謬的獨裁邏輯，又是多麼冷酷的現實：五十五萬人與五人，當年居然就能達到既平反又堅持定論的效果，贏得了某些被平反者的感激涕零，甚至許多當年的大右派變成鄧小平的統戰花瓶！

反右已經五十年了，改革開放將近三十年了，中共現政權仍然堅持早已作古的鄧小平遺產，至今還是不承認反右運動是一場人權大灾難，繼續掩蓋歷史和壓制人們對反右運動的反思。

好在今日中國不再是三十年前的中國。值此反右五十周年之際，一批老右派站出來，發表了《爲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中共當局公開承認反右運動是完全錯誤的政治運動，對當年的受害者給予必要的物質賠償。這封已經有數百人簽名支持的公開信，其發起人都是當年的右派，是和我父親同時落難的人——戴煌、林希翎……。

他們那遲到了五十年的吶喊，讓我想起父母親和我自己。1957 年，雖然還未出生，我仍然成爲反右運動的受害者之一。可以說，我是在媽媽肚子裏當上小右派的。

我的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詳細講述了我在反右、大躍進、文革、上山下鄉等政治運動中僥倖生存成長的慘痛經歷，「真實而生動地重現毛時代史無前例的荒誕與殘暴，爲中國近代史作出獨特的見證（余英時）」。這本書的英文、中文、德文版已經出版，法文和丹麥文版即將問世，現已得到主流媒體多方好評并榮獲加州圖書館協會 2006 年最佳作品獎。

五十年前，反右運動在全國上下鬧得轟轟烈烈。父母親當時在曾爲中共政權的第一批「將軍大使」開辦培訓班，周恩來親自批准建校的中共中央調查部幹部學校（後改名爲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中國最重點的培養外交人員的高等學府工作。這樣一所政治挂帥的學校，當然無法逍遙在反右運動之外。

1951 年,父親巫寧坤放弃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的博士學位，應燕京大學聘請，回國任西語系副教授。當時，爺爺奶奶都過世了，伯父在臺灣，姑媽在香港，他在國內幷沒有什麼個人牽挂。他回國完全是爲了愛國，可是等著他的，是多年無妄的牢獄之灾，監外的無期徒刑，幷且始終累及妻兒。

當年他的同學和朋友李政道勸他不要回國，他不聽，結果 1957 年，父親戴上「極右分子」的帽子。

我在母親腹中就開始參加一場又一場批鬥會。父親的主要右派言論和定罪依據包括：

1. 肅反運動肆無忌憚的違犯民權，明目張膽的官方私刑。肅反運動本身是個錯誤，目的無非是壓制思想和言論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黨運動已經被赫魯曉夫揭發譴責了。

2. 防民之口勝于防川，防知識分子之口勝于防洪。在我們幾億人口中，知識分子少得可憐，十分寶貴，應當鼓勵他們作爲民族的良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不應當讓他們繼續當封建王朝那種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個人民的政府，一個掌握真理的政黨，給予知識分子言論自由，不會失去任何東西，而從無數開放的頭腦却可獲得集體智慧的無價之寶。

3.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强調政治標準第一，那是由于戰爭年代宣傳工作的需要，現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齊放」的精神加以補充。

4. 羅斯福總統四大自由（言論表達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免受恐懼的自由）是全世界的獨立宣言。人不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來有言論自由的。不自由，毋寧死！

重讀父親被定爲極右分子的「反動言論」，作爲女兒，仍然爲他驕傲自豪。父親對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强調，使他即便在當時上百萬的右派中，也可以歸入極少數先知先覺的行列。

中國具有古老的株連九族傳統，在以政治身份劃綫的毛澤東時代有過之而無

不及。父親或母親被打成右派分子，如果離婚，對方就可以免去變成右派的「臭老婆」、「臭丈夫」，而右派的孩子們則無法逃脫變成右派「狗崽子」的厄運。

1958 年 6 月 3 號我哭著出世時，父親已經在七個星期前被開除公職，發送北大荒勞改。等在海淀醫院產床邊的，不是父親的雙臂，而是那頂緊箍咒般一生也摘不掉的小右派帽子。母親因爲拒絕和父親劃清界限，幾乎失去工作、行乞街頭。幾個月後，母親在漫天大雪中抱著襁褓中的我，牽著三歲的哥哥，踏上長達 21 年流放安徽的坎坷路。

一百餘萬右派中，除了在校學生，大多數是爲人父母的人。這一百萬人中，即使按平均每人只有一個孩子計算，全國也有一百多萬個和我同命運的小右派。

我們的父母親受迫害，我們跟著倒倒霉。他們是冤枉的，是專制制度、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替罪羊。但他們或多或少說了點什麼，做了點什麼，可能某些話冒犯了官方定調，也可能是得罪了某位領導同事，甚至僅僅是某個親朋好友鄰居告密揭發，就被定爲政治賤民。換言之，他們的遭遇或多或少和他們自己的選擇有關。而我們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麼也沒說、沒做，什麼人也沒得罪，却受到和他們類似的身心靈迫害，種種淩辱和磨難給我留下終身難愈的創傷。我們在上學、就業、提職、分房、找對象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可思議的歧視，被貶低爲社會渣滓。

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身心是脆弱的，即便在祥和清明的境域也需要倍加呵護。而我們這些小右派，剛剛出生就要承受成人世界的殘忍，遠未成熟就必須面對連大人們都難以承受的血雨腥風。如果說，一個不尊重人權的社會是野蠻的，一個不保護孩子的社會就是加倍地野蠻，那麼，一個非但不保護孩子、反而還迫害孩子的社會，只能用人間地獄來形容。

畢竟父親當右派是他選擇愛國的結果。可我對我的小右派身份做了什麼選擇，有什麼選擇呢？沒有！一百萬小右派，有一個有任何選擇，做了任何選擇嗎？沒有！我們別無選擇地出生，又別無選擇地變成小右派，僅僅因爲作出選擇的父母。我們看著父母受難，和他們一起承擔苦難，忍受非人的折磨。我們用清純無暇、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紛亂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會底層含曲忍辱咬牙活著。

幼兒園阿姨是成年人，她們的職責是照顧好孩子們。文革初期，這些阿姨却歧視和虐待帶有政治賤民標記的孩子。她們每天把三歲的弟弟往墻角的小馬桶一

放了事，不許別的孩子和小右派玩。從此，弟弟變得沉默寡言。

幾年後，一位經常來家裏做客的醫生問，「巫老師，我問一個問題，希望你不在意。我也不是愛管閑事。因爲我是醫生，或許我能幫上忙。」

「沒關係，有什麼問題就問。周醫生，怎麼突然這麼客氣？」父親說。

「我想知道，」周醫生還是吞吞吐吐地問，「你的小兒子，嗯，是先天還是後天的啞巴？先天的很難治，後天的我可能有辦法。」

在政治歧視的環境下，我們從小就學會了沉默盲從和說謊，不再用自己的大腦思考問題，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說真話。因爲我們看到，如果不當一個專制政府的馴服工具，如果不「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我們的下場將與我們的父母一樣。反右運動不僅讓一代知識分子成爲後天的啞巴，也讓他們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啞巴。

九歲時，目睹父親在臺上挂大牌子挨鬥，我在台下簌簌發抖。一個多年經常來我們家，父母親的同事朋友張定鑫看見了。他拉住我的手，小聲說，「毛毛，這裏不好玩，跟我來。」 他把我帶到他的住處，給我糖吃，跟我玩「爭上游」撲克牌遊戲，然後强奸了我。被强奸的，不僅是我嬌弱的身體，更是我稚嫩的心靈。失去的，不光是我的童貞，更是我的童年。而那一百餘萬小右派，又何嘗不曾被强大的專制制度淩辱，在心靈上留下永遠的傷痕。

在學校裏，我背誦革命詩句，「爲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爲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人的身軀怎能從狗的洞子裏爬出！ 」

每天上學放學，我不能和別的小學同學一樣，從學校大門進出。如果紅小兵發現我，他們輕則辱駡嘲諷啐吐沫，重則拳打脚踢揪頭髮。我只能從學校圍墻上挖一個狗洞進出，還給它取了一個美麗浪漫的名字：月亮門。

一個小女孩、小右派，做人的尊嚴被剝奪，只剩下做狗的求生本能。與此同時，父母親都被關進了牛棚，成了比狗還不如的牛鬼蛇神。

我十歲時，爸爸還關在牛棚，媽媽帶著哥哥弟弟下放到農村。我在百里之外的一個房間裏自己過活。不知道多少天，我躺在草蓆上，高燒昏迷。等到我被偶然發現，已經病危。因爲父母不在，別人冒充我的父母才能送進醫院。 醫生說，「沒救，通知家屬辦後事。」

我獨自面對死亡，平靜安詳地告訴自己，「你要死了，你已經嘗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鹹，沒有什麼可遺憾的，死就死吧。」

這種本應是飽經滄桑後才能說出的話，該是出自十歲孩子的口嗎？

今年國內外還有許多不同組織群體個人要求共産黨和政府還原歷史真相，對這場人爲的灾難表示反省道歉賠償。當年林昭，遇羅克，張志新因爲對共産黨、對毛澤東有清醒的認識而被槍决。如今要求執政黨對其當年專制與扼制言論的作爲認罪，無异于要求劊子手將他自己的脖子套進繩套，這些要求，現在來說只不過是一厢情願而已。

中共維持其獨裁統治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通過獨占話語權來僞造歷史，通過强制灌輸來製造遺忘，製造爲我所用的歷史和民族記憶的空白，使那些死于暴政的生命永遠消失在黑洞中，也使中國人無法積累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其結果就是歷史呈現出原地踏步的惡性循環。再過五十年，別說當年的右派，就是小右派們也都將作古。如果幸存的右派、小右派再不出來爲歷史存證，歷史的悲劇就完全可能重演。

退一萬步說，即使共産黨和中國政府真的反省道歉賠償了，對那些風燭殘年的不足百分之一的幸存者，對那幾十萬、上百萬逝去的冤魂，有什麼意義，對那些失去的歲月破碎的家庭有何補？

和其他右派家庭相比，我們家還算幸運的，我和家人都活到了今天，都在享有四大自由的國土上安居樂業。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回顧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就像當初我寫自傳，不是爲了要活在過去，而是爲了汲取教訓、反省現在、爭取民主自由的未來，讓那些沒有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人們瞭解真實的歷史。

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都喜歡把祖國比作父親或母親。祖國是一個神聖的字眼，像父母一樣是每個人沒有選擇餘地的家人、親人。和同事朋友配偶的關係可以選擇，可以終止，和祖國，和父母親的關係，永遠不能斷掉。臍帶雖然在出生時就剪斷，但人們的身上流動的，永遠是父母的血。什麼樣的祖國，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政府，什麼樣的政黨，能够允許一百餘萬親生兒女無辜的靈魂長期受難，而且五十年過去了，依然不敢面對歷史，毫無認罪懺悔之意？

我們這些小右派，向誰去討公道、要賠償？誰來爲我們平反，向我們道歉？我們失去的童年、青少年、乃至生命，誰能够償還，用什麼償還？誰能撫平我們

心靈上永遠滴血的創傷？　　　(2007-6-13 加州家中)
——2007年6月29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曾經滄海身猶在 —— 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詩案」

一、 到底意難平

我的父親不是這個政權的人，我1950年參加革命工作後，是劃清了「界限」的。我是真心信任這個黨的，不是到共產黨這兒來投機的，不是想來撈個什麼的，想都沒這樣想。認為中國共產主義前途是光明的，我們要來，來就努力地工作。當時我才十九歲，我在黨報。工作是如何之賣力，如何之認真，而且還如何之愉快。覺得我們做這個工作很有意義，我們正在改變中國。我怎麼可能去仇恨這個黨？我怎麼可能去仇恨這個黨嘛！

我的父親和許多舊政權的人員一樣，死於1951年，被這個政權殺了的。我絲毫沒有為這個事情去仇視這個政權。但是呢，確有某種看法，這個有時是有的，總覺得當初用不著殺那麼多人。實際上我的父親，在舊社會不過就是普通的職員。他從來沒有對抗過共產黨，也沒有作過惡，很多人都曉得他們是乾乾淨淨的。但是，又回頭認為，好像革命就是這樣，一定要經過血的洗禮，不然怎麼產生新世界呢！覺得這個革命理論也站得住。但只是心中有所懷疑，絕無對這個政權有任何仇恨。而且當初我的工作的激情，表現的積極，是有目共睹，所有人都看得出來，覺得我極其信任這個黨。

但是後來為啥子又產生了懷疑呢——確實產生了懷疑，但是這個懷疑跟我的家庭無關。一個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惡。在赫魯曉夫的報告前一年，1955年，肅反。先是把胡風拿來批。批胡風我還是積極分子，寫了兩篇文章，文學理論的。後來，批胡風後來轉為肅反，所有的機關內部都設了變相的關押所。舊社會有歷史問題的都叫反革命了。四川省文聯集中攏來十多個，把人

家弄來關起。我是積極分子，還主動要跟這些人劃清界限，認為這些人黨都說要把他們揪出來，把他們叫老虎，一定是他們自身有嚴重問題——才進去了的。但是後來覺得，咋個這個運動，機關搞肅反越搞就越凶，機關裏設立了變相的法庭，把很多人弄去審，哎，我就有所懷疑。

因此在肅反的會上，我和另一個叫邱原的好友，我們都是熱愛黨的，心裏就不安逸，就跟他遞了個條子。寫起打油詩，填起詞，譏諷。李累（文聯領導）看見了，走來一把就條子抓過去，李累大怒。條子是將就《紅樓夢》中間薛寶釵那個「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我填的是，「縱然是加薪添錢，到底意難平」。李累拍桌吼問，「啥子意難平？」

多虧這個事情，我就沒有進入積極分子行列。本來是積極分子，後來我就被刮出來了，刮出來就只有資格去守老虎——去看守關起的那些人。每天二十四小時輪流，一個班兩個小時，坐到那裏守，守完了還要做記錄，觀察他們的各種動態——這個就比較「低級一些」了。有一次我做記錄：「牆外有人投一小石，屋瓦有聲。眾虎一齊抬頭仰面，觀望久之。」以戲謔的文字寫受屈的同志，心肝之黑，至今猶愧。

就這個時候，心中就有所懷疑。覺得咋能這樣子整呢。而且這些人整了，十個月以後，全部都沒得事了，又把工資補發，當初把人家弄得那樣慘。就覺得簡直胡亂整。覺得黨的這種做法——那個時候我們不曉得老同志們早在延安就這樣做了，我們不曉得，我們還以為是第一次這樣，雖然沒有整到我，你這樣整人總覺得不公道嘛。雖然心中不服，但是形不成理論。

第二年，1956 年 2 月，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傳遍全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惡。文匯報連載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寫的《斯大林時代》第八章《大瘋狂》，整黨咋個殺人，看了毛骨悚然。有問題！覺得。而且這個問題一定是在理論上面出了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理論就有這個問題，一旦形成專政必然會導致這個。但是，都沒有拿去跟我們家庭的各種遭遇聯繫起來。是出於熱愛黨，覺得這樣弄不好。

然後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齊放，要百家爭鳴，1956 年夏天提出的。我心中很受鼓舞，覺得對了，我們中國一定不會像斯大林那樣子搞了，我們毛主席實在了不起。提出這個口號是如何之偉大，覺得對這個党的未來如何之有信心，覺得中國

如何有了前途，如何的好呢。

我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覺得要聽黨的話，黨喊我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意見我們要講。像我這樣的人，詩歌藝術修養不高，但是宣傳熱情是很強烈的，理論熱情是很強烈的，就覺得那麼我們今後寫詩歌，就不能光是歌功頌德了。那時《人民文學》還發表了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使我大受鼓舞。

1956 年秋天，中共開了八大，宣佈階級鬥爭運動已經結束，從此之後是建設。我覺得党好英明啊。覺得這下中國終於好了，不再走階級鬥爭的路了，無產階級專政不會弄得像蘇聯那樣黑暗，不再弄得血翻翻的了。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今後面臨的是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真才實學頂用了，中國面臨的是美好的前景。這個時候，我就考慮寫詩是不是也要干預生活。劉賓雁已經有過一些報告文學，提出要干預生活。而蘇聯作家把干預生活四個字早就提出了，說作家應該有這樣的義務。在生活中有不好的東西，作家要表態，要與它鬥爭。

我就是在這個狀況下，在 1956 年 10 月，寫了個〈草木篇〉。1956 年 2 月到 8 月，我是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三期學員。在回成都的火車上，寫了〈草木篇〉。

這一組小詩內，我就考慮到，革命者的人格問題，革命者不能夠光是一個螺絲釘，光是聽話，革命者只要是正確的東西還要堅持。毛主席就那樣說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堅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諛逢迎就爬上去了，覺得這個黨不應該去溺愛這樣的人嘛。小人攀附到黨，把這個黨像藤纏樹一樣要把你纏死，你不能容許他們這樣嘛。因此在詩中間就牽扯到了這些。

回頭看自己，這樣的一些思想，實際上這都不是詩，我的這些思想遠離了詩的形象思維，都是一些宣傳熱情，宣傳熱情干預了我的詩。就這樣寫了〈草木篇〉。

那個時候就想，既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就不必創作了，不當這個專業。我就主動提出，我們來辦一個詩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邱原取的，叫「星星」。領導人李累他們也支持。就辦起來了。1957 年 1 月 1 日就出創刊號了，是新中國第一個官辦詩刊，北京《詩刊》比這個晚了二十五天。

《星星》創刊號上面就發了〈草木篇〉。

二、 因詩賈禍

鬧了半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斯大林的報告中國從未公開發表，但我們都知道。1956 年 10 月還發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達佩斯工人農民起來抗議暴政，波蘭也發生了工人農民起來抗議暴政。在黨內特別是在高幹內，把赫魯曉夫批斯大林的這個報告當作大敵一般的防備，我們年輕人不曉得這個，他們內部就傳達了。1956 年底，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因此這些領導們特別敏感，到處聞，看底下有沒得什麼氣味，回應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氣味。聞到了馬上就要報告上去。

我不曉得，這樣嚴重，如果曉得，〈草木篇〉我就不要發出來。但是不曉得，我仍然歡欣鼓舞，相信雙百方針一定會給中國帶來新面貌。

後來聞到了，是當時省委那邊聞到的。

元旦過了十三天以後，川報上就出現了批評。就說這些東西有嚴重問題。指到《星星》上有一首詩是色情（〈吻〉）。還有一首詩是有思想問題（〈草木篇〉）。

省委宣傳部有領導同志說，你這個〈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實味就是在延安為這個事情被殺了的。）

然後，〈草木篇〉的事情彙報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幾十篇文章，到外省，到北京上海都在批。但是，那是 1957 年春天，你批得那麼早，毛澤東都還沒有開始反右，毛澤東就不以為然。

毛主席在二月份跟三月就兩次講話。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還有一次是講人民內部矛盾。兩次講話都提到，一個提到王蒙，一個提到〈草木篇〉。毛澤東講的是，王蒙是思想問題，王蒙的小說叫《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是小資產階級思想，〈草木篇〉是「政治思想問題」。中間用了什麼樣的句子呢？「我們在民主革命的運動中，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殺父之仇，殺母之仇，殺兄之仇，殺弟之仇，殺子之仇的人，時候一到就會來一個草木篇。」——如何的嚴重！我的家底毛主席都知道了。

但是，毛主席又說了，你們現在這種批判，太粗暴了，你們沒有好生給人家講理。你們這種簡單粗暴的批判方式是要不得的。然後，毛主席說，我們今後是要團結五百萬知識份子——括弧，包括那個寫〈草木篇〉的人。最後說，我們要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把廣大知識份子，包括那個寫〈草木篇〉的，都

要團結起來。

他這樣一講，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來。1957 年 3 月的時候，毛澤東這個講話，通過各級機關傳達下來，傳達下來，而且傳達很詳細，是用講話稿子念的，要念整整半天。

現在還沒有開始反右。

不但沒有反右，連「陽謀」，喊大家出來大鳴大放都還沒有開始。後來好多人不瞭解，說是在反右中間批〈草木篇〉。哪里是，在反右的之前半年批的。

我經過這一場批呢嚇倒了。我的媽呀，他們批我的文章最初還說小資產階級思想，以後說反動思想，以後說反革命思想，最後說，這些詩都是反革命的叫囂，都是階級敵人的信號。我咋曉得我惹這麼大的禍呢。一句腔都開不起，我都嚇懾了。

批判停了以後，又過了一個多月後，黨中央就號召整風：我黨現在有三種不好的風氣，一是教條主義，二是主觀主義，三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就是死守馬列主義教條不曉得發展，主觀主義就是脫離實際，宗派主義就是排斥人家黨外人士，這種錯誤的。這是不好的，我們要動員全國人民來幫助我們黨整頓，整頓這壞的三風。開門整風，通過什麼方式呢，通過全體人民，首先是知識界，來大鳴大放，要出來爭鳴，要百花，要來放，還不能小鳴小放，要大鳴大放。

但是我是嚇倒了，還是一句話不敢說。不曉得前段時間為什麼批判得這麼凶，我還是個共青團員的嘛，而且我自認為我還熱愛共產黨。

我就不開腔，一句話不說。然後就有許多人來幫我說話了。說你們這麼弄要不得，不要一棍子打死。川大有一個教授張默生，山東人，江青的老師，說，從詩經起就有「詩無達詁」嘛，一首詩可以有多種解釋，你們怎麼能說〈草木篇〉就是反革命詩呢。李劼人，成都市副市長，老作家，川報記者去採訪他。他說〈草木篇〉算啥？中國文人都要寫這類托物言志的詩嘛。把花花草草拿來寫嘛。他說，但是，〈草木篇〉你寫是可以寫，但是你不要拿來發表嘛！你把它鎖到箱子裏嘛，你拿來發表就惹起麻煩！你們這麼多人在批，硬把一個小青年當成一回事情在那裏圍剿。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你們把流沙河找來，我只要兩個小時，就把他教育轉來，讓他去檢討，然後就過了。川大教授林如稷，在文聯來開會說，你們整人關起門整，整出問題了才把我們這些委員找來，當初為什麼先不來徵求一下

我們的意見，現在主席說了你們的批判粗暴，喊你們停了，弄出問題了，才想起來找我們貢獻意見。這是發牢騷。

天天開會大鳴大放，叫人家發表意見，人家有的忙，硬拿車去把人家拖來發表意見。張默生教授就是用車接來發言，後來當了大右派的。

這時候，全國各種意見全部都出來了。說得很鬧熱啊，報紙上都在給共產黨提意見。有些意見越來越尖銳，圍繞著官僚主義咋個腐朽，哪里整得要不得，哪里整人家農民，整得農民……全國的各種作品都出來了。就是那個時候的傷痕文學，指責這個政權不對的最早的傷痕文學。好多人都在寫。連艾青自己都寫了〈養花人的夢〉，後來批判他的時候，就說那是「艾青的草木篇」。

這個時候喊我發言，我都還不敢去。

然後省文聯的一個領導，常蘇民，是個老好人，他也不整人的。常蘇民看到我始終都不發言，就把我喊到他那兒去談，他就把毛澤東的講話全文，列印的，中文打字機列印的，他說你就在這兒讀。毛主席怎樣說的……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些內容。他說你看嘛，最後的結論，連主席都是說這樣子批判是粗暴了要不得。因此你要出來發言，四川這個地方要反對教條主義，你應該出來開第一炮。最初我認為他說的是真心話。多年以後我才悟到那是他的違心之言。作為一個領導人，在本單位揪不出右派來，他就犯險了，弄不好他自己就會被其上級指為包庇右派。他是來誆我鳴放啊。但是我原諒他，他無意整人，他也是不得已啊。

我又很信任他。終於我就出來發言了。呵，一發言各家報紙的記者詳細地記，記下來整整一版。成都日報四川日報全部登流沙河的發言。上海的文匯報也派記者來採訪我。我說你們前幾個月批我很凶，這樣子弄是不對的，你們這樣弄得我情緒也很難受。我說我個人固然是有很多缺點，思想改造不夠好，有各種小資產階級思想，但是我沒有要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們這樣子弄我是很不服的。

這時就得到很多人的回應。

到了 1957 年 6 月，突然一變臉說有階級敵人在破壞我們整風……

全國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牽連。說我有三個反革命集團，我是這三個反革命集團的首領。然後專案組去追查，凡有關係的，一網打盡。專案組來人說，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無知的情況下寫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現在你要把這封信交出來。我每天收那麼多信，裝一籮筐，我說我記不得，你們去查，最後我說

算了嘛，你們乾脆抬走。這一次他們就警告我，任何證據你不能毀，毀了將來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給我寫來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毀。何況我還記得有日記，日記我也不敢毀。

所謂三個反革命集團，全是我認識的，文學界的非文學界的，連常到我這裏來的中學生，全部都有嚴重政治問題，不准升大學，他們一輩子的人生道路都註定了。魏明倫，當時十四歲，化名給文匯報寫一封信，聲援流沙河，後來清查筆跡，查到他頭上，由於太小沒有資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給他杵了一個污點。周克勤遭學校開除也是與〈草木篇〉有關，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檔案材料擱在鄉政府再沒有打開過。好多人就為這個事情把一生的命運改變了。

整了那麼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類似，但是，受我株連的現象特別引人注目。全國類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後來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國到處有，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人來找我。到鄉下都有人來找我。說五七年你那個〈草木篇〉也牽涉到我，我當右派有一條罪狀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黨瘋狂進攻。還有被整死了，被殺了。

所以這個事情實質是怎麼回事，你就曉得了。

三、「沉到海底」

這個詩，是再普通沒有了。值不得拿來說。而是因為要搞運動，有意要去到處找，由於他們帶有有色眼鏡，出於革命的警惕性，時刻嚴防階級敵人，一看就看到這兒來了一個信號，就是來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他們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 1999 年，突然改變了說法。中國作協書記處的書記張光年，老革命，在 1999 年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周年，中央電視臺講建國五十年來的歷史，中間專門的一章，就是張光年談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變了。張光年說，當初我和另外三個中國作協的負責同志，去跟毛主席彙報，毛主席說，〈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麼能一鍋煮呢，其中有兩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間一首，又背了中間另一首，毛主席說，這兩首就可以嘛。

當初正式傳達的毛主席不是這樣說的，那時說是階級仇恨。那你說我該相信

其中哪一種說法？老同志在這點上是很謹慎的，我不認為人家張光年說錯了。不過當初風氣如此，今日紅花明日紫草，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純粹的實用主義。要搞運動，就說這是反映了階級鬥爭，對我黨有各種仇恨的人，才得寫〈草木篇〉這樣的作品。但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又是另一面，很講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張光年講這個，那哪里還有後來的運動呢，那就搞不起來了嘛。毛主席縱然這樣講過，但是從未傳達下來過，等於沒有講過。

實際上，就是小題大作。實際上，我是幫了反右派鬥爭的大忙，因為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規定所有的大中專院校，以至中學，所有各級政協直到縣政協，必須開座談會，座談會上，必須要「奇文共欣賞」，要把〈草木篇〉給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討論。如果不是這樣，哪個來讀你那個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讀不可，讀了喊人家發表意見。人家本來就毫無興趣的，也不得不表態。

你想我的那一組小詩，用中文打字機打下來，只要巴掌這麼點小一張紙，王蒙、劉賓雁那些毒草那麼長，哪個去讀呀。我那個拿來人手一張，一分鐘讀完。讀完發表意見。積極分子說，批得好，這個反動得很。如果有人說，這個算啥子嘛——對了，就劃成右派。用這個方法來劃右派，是「多快好省」，「節約鬧革命」。一分鐘就可以把右派抓出來。因此全國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組害人的詩有牽連，其數上萬。

所以，本人是給反右提供了一個文本。可以快速製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幫了大忙了。

我們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個詩拿來那樣批，不是這個詩了不起，不是這個詩寫得好，我從來都不那樣想。

這個落到哪個頭上，就該哪個先倒楣。我呢，不過是先落到我的頭上，先落到我的頭上，我就先倒楣。如果我不寫這個呢，我後來還是要當右派。是因為後來到了大鳴大放的時候，像我這樣一個又很信任這個黨，認為這個是光明磊落的，我們在黨的面前不應該有什麼保留，心頭有什麼我們可以提，這樣才是真正的熱愛黨。另外我們個人，處事也是光明磊落，有什麼就要說出來，那麼肯定後來也要當右派。但是呢不會當這麼大的右派。

後來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又一個事情。1980 年，在石家莊，劉紹棠來找到我說，老兄呢，1962 年毛主席曾經說到我們兩個你知不知道？我說我不知道。他說，

是這樣子說的。1962 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游泳，突然想起喊那個毛遠新來，毛遠新興沖沖地趕到北戴河來，找主席，說主席在海邊，到海邊去找到。主席說你下來嘛。毛遠新說我游不來水的嘛。毛主席說，游不來水你下來學。吃兩口水自然就會了。你看人家劉紹棠，也是游不來水呀，吃了兩口水，後來人家就學會游泳了。只有那個流沙河，才沉到海底下去了。

同樣都是右派，就有不同的出路。劉紹棠後來就摘了帽子了。我就當了二十年右派。到了 1978 年 5 月，胡耀邦喊把全國剩下的右派一風吹了，我作為最後一批右派摘了帽子。算來當右派只差六小時就整整二十年。

我說你咋個知道的，劉紹棠說，這是毛遠新談的。毛遠新把這件事情詳細講出來的，人家詳細記錄的。毛遠新咋個說，偉大領袖咋個說，然後就說到你我兩兄弟。我就說，真還是嚇人囉，他老人家還把我記著了。好險啊，我這條命就不曉得咋個撿來活的了。更可笑的是「文革」末期，北京《詩刊》復刊，當時的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裝模作樣批示說:「我們不怕出草木篇！」以示高舉革命旗幟。1957 年批鄙人，就有他嘛。我這毒草使好多人順著竿竿爬上去啊。

這個事情的全部經過就是這樣。

這一切事情，一萬個問題是一個問題，就是最高層的政治需要的問題，不是我個人有任何問題。

中國在反右以前，絕大部分知識份子，非常擁護這個政權，那個時候，是共和國的黃金時代。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傷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戰戰兢兢，深怕挨打。

你好生想，如果 1957 年不搞這個反右鬥爭，第二年的大躍進的胡亂搞絕對搞不下去，上千萬人就不會餓死了。若敢那樣搞，就會有很多知識份子出來說那樣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樣整了，愛叫的雞公都殺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澤東要怎樣搞大躍進，沒得人敢出來說了。這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中國人民的大不幸，也是我個人的小不幸。

這是大悲劇，誰是罪魁禍首呢？我自身其實也有罪。罪在 1957 年以前歷次運動，從一九五一年的三反運動起，我也當過積極分子打手，也兇狠地批判別人，也裝腔作勢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狀。這回自身被釘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頭，弄去拉車掃廁挑糞，現眼現報，也算是「天道好還」吧。

四、　老家避世

當了右派以後，只領生活費了。反右前我的工資還比較高，是七十七塊。反右後，人家那些右派都只領十五塊的生活費了，我是右派中間領生活費最高的，三十塊。我算是毛澤東都點了名了的人，我沒有被弄起走，猜想是領導擔心一會兒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說那個人在哪里啊？不好回答。其他的人送去判刑或勞教，勞改農場，受夠折磨，還有些進了枉死城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機關監督勞動。機關領導宣佈這件事情的時候說，毛主席說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員，每個單位都留那麼一兩個反面教員，來時刻教育我們這些左派，讓我們提高警惕。公平地說，省文聯對我還算很不錯。李累主持批鬥我，沒有罵過打過，還讓我坐著說。另一領導人也姓李，堅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勞改。因為反右運動前，他曾對我講真心話，大罵農村政權，竟說「該造反」之類的危險話。怕我爭取立功贖罪出賣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堅持照政策辦，不同意送勞改。我感謝李累。七年後，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來，留在省文聯整整九年。但是開除公職，開除共青團團籍，留機關監督勞動改造。比較起來，夠寬大了。

然後我就做各種體力勞動嘛，就在機關裏做。拉車子，我拉好多糧食，機關裏頭的煤、米、面。掃廁所我不知道掃了好多。留到機關就一直搞這個。後來又把我弄到圖書資料室去協助管理圖書資料。後來又把我弄到機關農場去，我光是植棉，從溫湯浸種，一直到最後把棉花用車拉到省裏邊去交，最後把棉花票領回來，就做了兩茬。這使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內行，油菜內行。

一直做到九年以後，文革爆發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成都青白江區城廂鎮。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兒就拿給他們打死了。

堅決要把我弄回老家去的，是人事科長，叫李彬，老幹部，她的丈夫就是那個老好人常蘇民，當初對我說你一定要出來放第一炮的。這個李彬所以對我好。弄我回去的時候，我就跟李彬說，我說我還不想回去呢，我看人家邱原就在成都，我又能夠拉這個車子。李彬說：「你別看邱原自由吶，危險得很哪流沙河，你回去的好。」我說好，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回去苦是苦，但是把一條命保到了。

九年在省文聯，沒有好苦。真正回到老家去那個才苦，累死人吶，五類分子管制起來不說，還要計件勞動，一天拉了下來（拉鋸）夠受。你想那個又是計件工，拉一尺才有一尺的錢。這樣弄下來這個人簡直累得不得了。往往都是天快要黑了看不清楚墨線了才把鋸子停了，然後趕快回去了。早晨天亮前就趕起來，還沒有走攏那個鋸木現場就開始脫衣褲了。兩個拉鋸子的人為了節省時間上廁所就一起。臘月三十都還在做，正月初二又在開始做了，這麼苦。期間累得幾乎每隔兩個月都要病一次。一年下來，勞動的累病，加之以恐懼——你想文革的時候，要是學生紅衛兵把我弄回成都去了，要往死處整吶。營養又很差，害了肺氣腫。

只拉了六年。把那個六年過了，還有六年就是釘包裝木箱。就是我的兒子協助我，他才六歲七歲，他已經開始做童工，釘包裝箱子的兩個檔頭，全部是他釘的。拿個釘錘，當當當。六年，我就在做這個，錢可以掙到四十元。而且要松活些了。兩個六年，十二年，文革都完了都還在做。

一直到 1978 年，全國摘帽子，我才有幸摘了，但是文聯這邊不要我回來，因為你是個摘帽右派，你還有三個反革命集團問題都還沒有解決還在那個懸起的。那麼就留在縣文化館工作了一年。

到 1979 年底，趙紫陽親自批示：必須把人家調回來，第二，必須給星星詩刊平反，復刊。兩件事情，形成中共四川省委的第 75 號文件。我就回來了。不然這裏掌權的人不得要我回來，因為這裏已經不是好人李彬掌權了，李彬已經死了。

我就說完了。（2006.9 于四川成都）

——為 2007 年 6 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

我的右派生涯　　　　　龔定國

大學畢業到東海艦隊

我 1930 年出生在長沙西鄉的書香世家，九歲喪母，十歲喪父。由姑奶奶龔慕蘭養大。

龔慕蘭是個教育家，曾任蘇州女師校長，抗戰時期，是國立十六中、國立女中校長。她雖然是國民黨員，但非常正派。從不因政治問題爲難員工和學生，例如學生吳咏琴將被國民黨傳訊，她事先通知叫吳逃走；又如王一之（化名楊代誠，後來是中共幹部子弟學校北京 101 中學的校長）在重慶風緊時，她聘請楊到女中任教，躲過風頭。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龔飲冰是她族兄，中國婦聯副主席、中共中紀委副書記章蘊是她表妹。總之，她絕對不是堅硬的反共人士，倒可能是共產黨的友人。

1946 年，我考入剛從四川樂山遷回武昌的武漢大學。1951 年被海軍招到東海艦隊，算是提前畢業。先在工程部幹了一年，後調軍械處，始建防化學科，五四年當了防化學科化驗室主任。

平時我對許多不合理的事，喜歡公開發表意見，得罪過一些人。例如：炎夏有半休，要青年搞各種活動，組織了歌唱、球隊、游泳、棋類等小組，組長都由各科長擔任，幷大肆宣傳，其實那些科長根本不內行也從未參加，我說是搞“形式主義”；政委廖雲台作報告時，把陳紹禹和王明說成兩個人，我在討論時指出，令他很惱火；又如，宣教幹事戴昶，爲了追求民立女中學生會主席，叫我們團支部多次與該校聯歡，我那時是團支部宣傳委員，公開表示反對，說他把我們當工具；計劃科員孫文昭，有一次被評爲“技術能手”，因他會開汽車，我說是「文不對題」，這類事例很多，成爲我後來挨整的伏綫。

肅反時成「階級异己分子」

肅反時，因去了臺灣的姑奶奶龔慕蘭與我通信，她還通過香港的朋友給我「撥」過兩次錢。我被挂上「階級异己分子」牌子挨鬥。因她當國立女中校長時，正值陳立夫當教育部長，就硬說她是 CC 份子，而我是她教養出來的，豈能清白？整天批鬥、審問，不能回家，不准外出，足足搞了半年多。不可理解的是：她的親生兒子龔曉嵐，當時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却平安無事！在等待結論期間，我的兒子出生，妻子阮正芳是上海第一醫學院政治課助教，在上海婦産醫院産後

大出血，只准我去探病一次，還派人押解監視。從那時起我感到，很多共産黨人不僅愚昧、霸道，還缺乏人性。

我原有寫日記的習慣，好幾年的日記都被抄去檢查，其中有四八年寫的共産黨是「在野黨」的話，硬說我罵共産黨是野黨！還有寫思想改造運動中，武大許多教授被罰跪太過份，還寫過「部隊只准結婚不准戀愛」，共産黨用人標準「無才便是德」等等，都是罪狀。肅反時派人對我「外調」多次，調查出不少無中生有的誣陷之事，更加辯不清楚。想必是被詢問者在壓力下胡說八道。幸好最後相信了武大地下党負責人的證詞，我從未參加過任何「反動派」組織的活動，這才作出結論「予以下降」，但從「階級异己份子」下降到甚麼份子，我至今也不知道。明白的是軍銜中尉、級別副連，比正常都壓低了一級。

肅反以後，我把多年的日記付之一炬，而且下决心永不再寫。

五七年五月，我被調到北京海軍軍械部，籌備全軍防化研究所。因暫時無任務，家還在上海，算是照顧，叫我回上海「幫助工作」。整風開始，我只參加過兩次鳴放會，第一次是東海艦隊知識分子座談會，我被選做所在小組的發言人，記錄大家發言，整理後向大會報告，其實我自己的意見并不多，但給領導層的印象肯定很壞，海軍政委蘇振華正好在上海蹲點，他總結座談會時，把某些批評意見痛斥一頓。第二次是在本單位全體座談，我提出，背後向領導打小報告，是「地下工作習氣的殘餘」。

其它還有：我和化驗室技術員崔以軍（他肅反也冤枉挨整，後來也成了右派）談過，「肅反搞錯了的，一定會平反」，明明是對党的信任，却被篡改成「肅反搞糟了，一定要平反」，變成了「猖狂進攻」；我和化驗員陳昭玉談論過儲安平的黨天下論，他說和尚是罵人的話，我說不是，因玄奘、法顯都是有名的歷史人物，當然我也認爲，十二個副總理全部是黨員，那是事實。于是我被認定爲「支持儲安平」。我說蘇振華聽不進知識分子的意見，是宗派主義，那就更嚴重，因爲蘇是中央委員，批評他絕對是反黨行爲。這些右派言論，因都是平時談話被人揭發出來的，遭到誇大、篡改、歪曲就毫不奇怪了。

九月，我回到北京。十一月，由上海派出三人到北京，把我揪出來批判，上邊所舉那些篡改、斷章取義、强加于人的罪名，根本不容許辯白。當然，有些平時談論的觀點，如外行領導內行、教授治校、幹部無才便是德等等，確實都是真

情，但跟反黨完全不沾邊。今天回顧歷史，右派與共産黨思想觀念上的分歧是客觀存在，右派把共産黨人當正常人看待，才會發議論、提建議，正義完全在右派這邊。毛澤東的陽謀，手段卑劣、理由荒謬，完全違法。共産黨那時已開始墮落成危害國家人民的、封建專制的利益集團，就他們的立場看，反右確實是必要的，不然，它將被逐步否定。

海軍大院右派班

肅反受冤枉的人，因表示不滿而成了右派，共産黨却說「很多右派，肅反中就有問題，說明肅反整得不冤」。共産黨的邏輯跟常人完全不同。因果顛倒。

五八年四月，右派定案後，我受開除軍籍，留隊監督勞動處分，每月只發 28 元生活費。海軍大院共留下十一名右派，組成一個班，他們是：黄源洛、裘純堅、張豐、江平、胡甲年、余榮富、朱位誠、呂恩誼、沈蘇斐、沈力成，還有我。這十一個人中，黄源洛是大型歌劇「秋子」的作者，是中國新音樂開拓者之一；呂恩誼是十大元帥油畫像的作者，從小參加革命，由部隊培養出來的畫家；裘純堅是海軍修造部的金字招牌工程師，1946 年交大畢業；沈蘇斐是部隊培養的女高音歌手；張豐是醫師，從僞滿時期東北醫科大學畢業；江平是老革命的版畫家；其他幾個，是 1949 年到 1953 年期間畢業的大學生。這些人因爲成了右派而聚合，實在奇特，打成右派似乎跟出身、經歷無關。

右派班成立後，先到十三陵水庫勞動了兩個半月，屬于海空支隊一大隊，別人半月換班，我們則常駐不換，直到完工慶祝會後，又修環湖公路，七月中旬才回大院。兩個多月中，每天收工後，要作小結，余榮富老是批判別人，他認爲右派之間不能團結，只能鬥爭。後來海軍統戰部長謝普生到帳篷來看我們，說：「你們現在是由此岸到彼岸，在過渡當中還要團結互助。」這才改變了老余的做法。如今看來，老余大概算錯劃的右派，他其實是真左派。

回大院後，花了十幾天作總結，十一個人還評定了好、中、差三等，我的評定是勞動好，情緒有抵觸，屬于「差」等，同等的還有黄和張，我和黄不大在意而張耿耿于懷。後來證明，這次評定毫無意義，摘帽早晚與評定結果幷無關係。1958 年夏到 1959 年夏，我們爲建大操場篩分了 600 多立方米爐渣，製造了三十

輛獨輪推車，參加了挖團結湖，製造了小高爐、小轉爐等搞了非土法的煉鋼，籌備布置技術文化革命展覽會，製造油畫畫框，爲文藝會演制道具布景，爲大院蘋果園挖樹坑、施底肥，日常負責打掃大院的公共環境等等，總之，我們是一小撮非常好使的、粗細活都能幹的馴服工具！我們直接歸海政機關協理員劉士品管，最大好處是政治學習不多，每天早上聽新聞和報紙摘要廣播，每周四下午學毛選或文件，由班長組織活動，比較簡單輕鬆。周末，有家的人可以回家。劉士品看准了我們幾個人都老實正派，不會出問題，他樂得少管。

1959 年五月，我被軍械部 602 倉庫政委李子琴要去，離開了右派班，在我之前已有幾個人回原單位，我走後，到九、十月份，右派班就解散了。當初海軍黨委留我們，大概想留下幾個有用之才，後來未能實現，說明即使位高權重如蕭勁光（海軍司令）、蘇振華等人，也難看清毛澤東操縱的形勢。

我到井陘 602 倉庫時，阮正芳從上海請病假帶著兒子來跟我在一起，準備共同承受煎熬歲月。李政委很照顧，安排了一間八平方米的房間，允許我們住下來。（兩年後，住房跟其他隨隊家屬一樣。）在 602 倉庫共呆了七年，開頭是教幹部們學文化，那時，彭德懷管軍隊，要求軍隊幹部都要達到高中畢業程度，文化教育成了重大任務，高中教師，并非各部門都輕易找得到，所以恰好用得著我，生活上適當寬待，他們覺得還是合算的。

隨後叫我培訓三十三名化驗員。用一年半時間，由初中程度到分析化學中專畢業，課程從數學、物理，到無機、有機、分析化學，加上火藥炸藥檢驗。除無機化學由技術員徐漢標擔任外，其餘課程我全包。這批人，後來大多成了海軍駐軍工廠的軍方代表。因一開始就沒有公開宣布我的身份，因此，1961 年摘帽時也未公開，僅通知本人了事。我被留下當「技術員」，定爲隨軍職工行政二十二級，1962 年又調整成二十級。這年我添了個女兒。

那幾年，我還作爲「主力」參與許多科技群衆運動:大搞超聲波，大辦小球藻，大挖腐植酸，群衆找礦，挖空心思大搞技術革新，等等勞民傷財，違背科學的事。在我主觀上是以帶罪之身服從命令，客觀上，却做了毛澤東狂妄胡鬧的幫凶和共犯。我越來越感到，毛澤東這個千古罪人，他造的孽，連我這類右派敵人都推不掉責任！

「摘帽右派」還是賤民

1963年決定我轉業，但因「摘帽右派」身份，沒有地方接受，只得留原單位待命，沒有固定的工作任務，有時打打雜、照常參加政治學習。從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開始，我全家又受岐視挨欺負。我的兒子才八歲，被有些當兵的抓住頭往墻上撞，罵他小右派！原來與我家關係很好的戰士們，都不敢再來往。當官的更沒有好臉色，大約看我反正要走，利用價值已不大，可以任意作踐而不會影響他們的烏紗。

1966年底，離開部隊，到甘肅省嘉峪關，農建十一師氮肥廠籌建處。文革之風剛剛吹到甘肅，已開始有點亂。我本行是化學，原該在技術組的工藝組，但土建組缺人，乃叫我當土建組長，手下幾個畢業不久的大學生，都不願好好幹活，幾乎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幹，除了出圖紙，還當甲方工地代表，天天跑工地。

1968年，十一師開始軍管，隨後清理階級隊伍，老右派自然逃不過。被「群衆專政」關牛棚九個月，每天在帶槍的「專政」打手押解下，從事超强度的勞動，吃不飽，睡眠不足，挨過打，每晚寫認罪書。家人也受盡虐待：阮正芳被停止工作。冬季零下三十多度，不給烤火煤，她只好帶著十二歲的兒子和六歲的女兒，在戈壁灘上挖駱駝刺，或到小酒鋼廢高爐邊掃焦炭渣來燒。我因吃不飽，家人節省下飯票，兒子偷著送給我。家裏有事須商量，只能偷偷傳紙條，有一次小女兒給我送信被發現，一群打手跑進我家，打罵他們。

1969年解除「專政」後，我被下放到工廠的副業隊（以種菜爲主），地處嘉峪關市城邊，我專職積肥，每天上午要打掃嘉峪關市的十一個公共厠所。冬天起糞要用鋼釺搗，下午再駕牛車把糞運到地裏。雖然又髒又累，但獨自幹活，不見那些黨棍虎倀，倒很自在。有一次，鄰近的十一師水泥廠要改建機修廠房，到本廠求援，廠長派我去，我幹了三天，提交了全套施工圖紙。廠長賣了人情，我却受苦，因爲他沒有安排人替工，三天後厠所糞已堆積很厚，我付出好幾天的加倍努力才清除完。

1970年，據說是怕蘇修侵犯，牛鬼蛇神「後撤」，我們一家人到了山丹農場。

山丹農場在著名的山丹軍馬場山下，全年無霜期只九十天，乾旱寒冷，以種春小麥爲主，只能種很少幾種蔬菜。那兒曾經是勞改農場，牛鬼蛇神較多，相對

而言右派不算稀奇，我家起初被放在地名餘定的七連，不通車、沒有電，吃用「澇池水」，牛馬也在池邊飲水，同時往池裏撒尿。全年無菜吃，只能白水煮麵條。我在蔬菜班勞動，種下的菜籽，幾乎沒有出過苗，天天做無效勞動。

1971 年我被調到場部，平田整地我管測量放綫；蓋房子我管設計和施工，而且當磚工；管過工副業，當過「皮匠」；還在農場自己的小煤礦當過出納。總之還是任人擺布的賤民。妻子經過幾年的寫信告狀，七三年恢復了工作，在農場子弟學校教書。兒子高中畢業，安排在農場就業，先當農工，後開拖拉機。女兒就在農場子弟學校上學。

那幾年，經歷了一打三反、批陳整風、九一三事件、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接二連三的運動，人心亂了，人心死了，道德敗壞了，我也更加清醒了。

「57 右派分子」是光榮稱號

1978 年，我和阮正芳一起調到張掖師專教書。1979 年，「改正」右派。給我的通知書說：龔某人當年的言論，雖有錯誤，但不是右派言論，屬于錯劃，現予以改正。我覺得很難過，明明我當年說的沒有錯，錯的是毛澤東、共産黨，右派言論其實代表真理，現在却說「不是右派言論」，一筆抹殺了愛國愛民的灼見真知，我又被冤枉了一回！

五十年過去了，共産黨離人民越來越遠，離真理越來越遠。現在有人要求它「平反」右派，而我認爲對于右派，不是甚麼錯劃、改正的問題，而是重新評價的問題。人們應該迫使它承認右派正確，「57 右派分子」是光榮稱號。很多右派言論，今天仍然切中時弊。反右是根本錯誤。當年積極反右的人，應該接受歷史的審判。如果共産黨頑固不化，不能糾正歷史錯誤，它的合法性將徹底喪失，畢竟人間還有天理在。

附，海軍總部大院「右派班」成員：

黃源洛，音樂家、大型歌劇《秋子》的作者

呂恩誼，畫家，十大元帥油畫像的作者

江　平，大尉，版畫家

沈蘇斐，女高音歌手

裘純堅，艦船修造部文職高級工程師

朱位誠，艦船修造部中尉技術員

沈力成，艦船修造部中尉技術員

龔定國，軍械部中尉技術員

胡甲年，工程部上尉技術員

張　豐，衛生部大尉醫生

余榮富，學校管理部上尉，海軍第三軍事學校教員

——為 2007 年 6 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

1957 年反右運動史料的收集與評價　　謝泳

反右運動史料範圍概述

1957 年發生的反右運動，是中國當代歷史上一個重要事件，它涉及中共上層對當時國內國際形勢的基本判斷，同時也涉及對當時中國知識份子思想狀況的一般認識，特別是對中國民主黨派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歷史地位以及民主黨派上層人物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要求等相關問題。

反右派運動對中國當代歷史產生了極大影響，特別是對中國知識份子的生存狀態以及後來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狀況影響深遠，特別是右派離開原有生活環境外，他們的命運使中國知識份子的心理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反右運動使中國傳統社會中作為「士」階層特有的精神氣質受到極大傷害，此後中國發生的許多變化，都與此次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打擊有密切關係。

目前學術界對於此次運動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關於此次

運動發生的原始檔案還沒有解密，特別是中共上層關於此次運動決策的原始檔案，在所有關於反右運動研究的文獻中還看不到。當下反右派運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幾個方面：

1、 關於反右派運動的始末。

2、 關於反右派運動中重要歷史人物的經歷和評價。

3、 右派個人的回憶。

4、 中共相關歷史人物回憶中透露出的有關反右運動的歷史資訊。

5、 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的變化。

6、 鄧小平在反右運動中的作用。

7、 反右運動的歷史影響及右派子女的命運等。

中國的反右運動是一個歷史事件，但同時也是一個現實事件，因為關於此次運動的影響及相關事實認定還在進行中，特別是在此次運動中受到傷害的歷史當事人，今天還在用自己的行動豐富這一歷史事件的相關資訊。本文所指的反右派運動史料，包括一切與此歷史事件相關的資訊，主要是較為集中的與此運動相關的文獻，特別是原始及較為稀見的文獻，取原料第一，次料第二的原則，在原料中包括文字以外的文物性史料。

本文對於成形的一般文獻，敍述較略，比如當時出版的《新華月報》、《人民手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以及各地方性日報中關於反右運動的記載，因為這些歷史文獻較為常見和研究者容易使用。另外各種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史性著作中有關反右運動的論述，因為多數為一般性敍述，較少獨立見解和新材料來源，本文也較少涉及，本文注意較多的反右運動史料，以中國大陸各類非正式出版物為主。港臺及西文反右運動史料，因為受收集條件限制，暫不涉及。

反右運動始末及相關史料

中國有檔案法，但對原始檔案的屆時解密，在事實上很少發生，特別是對與現實政治和相關歷史人物有關的歷史檔案，基本是在封鎖狀態下，這種現象直接影響了歷史研究的深度。目前對於中國反右運動的發生及完整運動始末的研究著

作有多部，這些著作的研究方法及著者對反右派運動的事實判斷雖不盡相同，但使用歷史文獻的方法及文獻來源大體一致。這些文獻的特徵一是已公開的中共檔及中共主要領導人的文稿，二是處在反右運動決策中心的歷史人物的回憶錄，三是當時公開出版的報刊，四是少量知識份子的日記。

需要說明的是，因為目前關於反右運動研究著作中還不可能使用原始檔案，所以關於反右運動的起源及後來的變化發展，較少存在分歧，下面這些史料基本構成了當前關於反右運動的基本文獻線索。

文件類有《毛澤東選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1 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等。

回憶類文獻有：《鳴放——重要經過報告書》（香港：當代出版社，1957），《鳴放——革命實錄史》（香港：當代出版社，1958），《鳴放回憶》（香港：自聯出版社，1966），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2），以及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葉篤義《我和民主同盟》（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以及蕭克、李銳、龔育之等人的《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等。

研究著作有：納拉納拉揚・達斯《中國的反右運動》（欣文、唐明譯，西安：華岳文藝出版社，1989），戴晴《儲安平・王實味・梁漱溟》（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丁抒《陽謀——反右前後（修訂本）》（香港：九十年代雜志社，1995），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葉永烈《反右派始末》（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胡平《禪機：1957》（ 廣州：廣東旅游出版社，1998），朱正《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汪國訓《反右派鬥爭的回顧與反思》（香港：國際學術文化資訊出版公司，2005），宋霖《論 1957 年「反右派鬥爭」應予徹底否定——由毛澤東與魯迅談起》（合肥：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04），謝泳《儲安平與〈觀察〉》（北京：中國社

會出版社，2004）等等。

在關於反右運動的起源問題上，因為研究者看不到原始檔案，所以對於從「鳴放」突然轉向「反右」的變化，多數研究者認為這是毛澤東的「陽謀」，起因是「鳴放」中知識份子的過激言論。但這個看法缺少內在的邏輯，因為對一個政治決策者來說，在決定「鳴放」以前，不可能對這一決策的後果沒有預期。

一般支持毛澤東「陽謀」說的研究者的主要根據是 1957 年 5 月 15 日毛澤東起草的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但這是一篇在二十年後才公開的文章。當時文章的題目是《走向反面》，毛澤東改為此題時特別注明「此文可登黨刊，但不公開發表」。此文原來的署名是「本報評論員」，毛澤東修改後為：「中央政治研究室」。6 月 12 日印發黨內時，毛澤東才將署名改為「毛澤東」。除了特別說明「內部文件，注意保存」外，毛澤東還加寫了以下文字：「不登報紙，不讓新聞記者知道，不給黨內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後，才考慮在中國報紙上發表。」直到 1977 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 5 卷時才公開了此文。

聯想到 1957 年 5 月 1 日，當時陳叔通、黃炎培給劉少奇、周恩來的信中提到過毛澤東自己建議下屆人大不再提他為主席人選時，信中特別提到：「昨毛主席于會上最後提到下屆選舉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並囑我們透露消息。」

毛澤東在陳、黃信上有幾處批示，其中一處是：「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幾十人的會上談過，大家認為可行。並且談到党的主席，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只是暫時還不可行。」

毛澤東還在信上特別說明：「請看末頁我寫的一段話及文中四處注解，都要印上。」這四處注解透露了毛澤東的一些心聲，其中一處說：「我仍存在，維繫人心的個人威信不會因不連任而有所減損。」1

幾乎同一時間，在陸定一報送中央的一份《高等學校整風的情況簡報》上，針對當時北京大學一個學生的文章《我的憂慮和呼籲》特別批示：「完全造謠，但值得注意」。這個北大學生的文章即注意到了當時中共高層的分裂。2

綜合當時的一些歷史細節和文革後毛澤東與劉、彭的衝突，應該說，由「鳴放」到「整風」的突然變化，確實與中共高層的分歧有關。朱正即根據批判錢偉長時有人說過：「錢說，鳴放搞不好，因為劉少奇到彭真這一條線是不主張鳴放的。」朱正推測「毛澤東決定放棄新方針而轉為反右，實際上是向劉、彭真『靠攏』」3

這個判斷現在看來是有事實依據的。朱正由此認為「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4，這個判斷大體也能成立。

「右派言論集」的史料價值

反右運動主要發生在國家機關和知識份子較為集中的團體中（如大學、各文化團體），因為反右運動在中國並不是一個可以自由研究的學術領域，所以相關歷史檔案的開放程度較低，高層歷史檔案由於涉及政治鬥爭，普通研究者基本沒有接觸機會。一般文化團體中，關於右派的檔案，也很難查閱，因為這些普通人物的檔案較多涉及個人隱私和具體個人恩怨，所以對研究者來說，直接接觸原始檔案的機會很少。所以近年來，完全依靠原始檔案進行的學術研究，還很少見到，而且越是有價值的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原始檔案，接觸的可能性就越低。在這種原始檔案基本封閉狀態下，要想深入研究反右運動，一個較為便利的史料來源是盡可能收集當時運動中出現的各種文字材料，比較常見的就是各種「右派言論集」。

反右運動發生的時候，中國社會的基本工業水平還不高，所以此類「右派言論集」，通常包括手寫、油印、鉛印三種類型。作為反右運動的基本史料，在原始檔案不容易接觸的情況下，此類文獻形式大體可以判定為是反右運動史料中的「原料」。

在反右運動中，出現了「大鳴、大放、大字報」這種形式，在這些形式中，原始「大字報」保留下來的可能不是很大，只有通過筆記或者印刷方式才得以保留。因為從「鳴放」到「反右」的時間很短，而且當時是中共號召並提倡的表達方式，所以就文獻形式而言，反右運動的文獻相對其他中國政治運動中的文獻算是較為豐富的。大約有這樣幾種類型：

1、從組織形式上說，當時各級機關都建立了整風領導小組，基本是一個工作機關，它屬下的各機關團體的「鳴放」和「反右」情況，通常都會以檔形式上報相應機構，而作為領導機關，這樣的機構通過創辦「整風簡訊、整風快報、學習材料」等內部形式的報刊來指導工作。這種類型的文獻，從理論上說，在相關機構中應當有完整的保留，但從目前關於反右運動研究者所接觸的史料判斷，這種文獻的使用還有較大難度。

2、從「鳴放」到「反右」期間，國家機關和各文化團體的機關報刊，通常較為集中出過各類形式的「專號、專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各專業性較強的團體中，也印刷過相當數量的此類文獻，比如一些自然科學研究機構中的當時出版物，也保留了許多史料。

3、學生雜誌和校刊的出現，也是反右時較為重要的一個文獻來源。特別是當時全國較為有名的高等院校中，許多系一級單位都辦有臨時性的報紙和雜誌。比如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紅樓》特刊，哲學系的《思想戰線》、《浪淘沙》、《論壇》，歷史系的《整風快報》等。

4、國家意識形態機關主辦的內部工作期刊，如中宣部的《宣傳通訊》和新華社的《內部參考》，這些期刊因為穩定連續出版，從保存史料的角度觀察，史料價值較高，特別是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因為依靠各地記者及相關機構以情報方式向中央彙報情況，所以保留了相當豐富的內部材料，特別是當時不能在全國大報及省級報紙公開的材料。《內部參考》中經常有讀者給《人民日報》的投稿被完整排印，作為情況動態向高層彙報。

5、反右運動後期，從中央到地方印刷過大量各種形式的「右派言論集」，供批判使用，在此類文獻中，除了中國人民大學編輯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參考資料選輯》一類較為成形的文獻外，大量零散的各類「右派言論集」時有出現，但目前還沒有一部此類文獻的完整目錄及索引，北京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也沒有完整收集此類文獻。

以上提到的各類文獻中，內部印刷品較為稀見，特別是如《宣傳動態》、《內部參考》一類當時就有發行限制的內部材料，對研究者來說更為寶貴。

1949 年後，中國是一個通過意識形態來管理的國家，所以在各級機關中，多數都習慣通過檔和內部設定發行級別的報刊來進行資訊傳達和管理，這種基本行政管理方式，直接導致中國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出現大量供內部參考或者批判使用的文獻，這些文獻基本保存了當時政治運動的大體運作模式，作為歷史研究的文獻形式它們所具有的價值是很高的，但研究者在使用此類史料時，應當對此類史料有一些基本判斷和辨別能力。

從目前對反右運動的研究來分析，大體可以認為，越往上的右派言論，越具備理論性和完整性，省級機關以下的右派，特別是不在專業領域以下的右派言論，

主要是一些表達個人意見的簡單看法，是對自己生活環境中不合理現實及對領導的批評意見。而且中國反右運動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在已積累大量矛盾的工作環境下，社會成員之間的正常矛盾，借反右運動的「政治正確性」得到合理清洗，在相當的範圍內，所謂「右派」，多數是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一個藉口，在最終的清洗過程中，以往的矛盾是關鍵因素，所謂不同政見，一般只是事後羅織的一些藉口。

中國省級以上的各級機關中，特別是高校和文化團體中，因為時代的突然變革，加之歷史的原因，通常有較為明顯的派系，較為嚴重的已形成宗派，這個特點在中國各民主黨派文化團體的反右運動中表現特別突出，無論左右，凡居於強勢者通常自然代表正確一方，借合法的政治運動清理正常工作環境下積累的衝突和矛盾，成為反右運動的真實狀態，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許多研究者發現「右派」其實多是「左派」，比如文藝界著名的右派丁玲、陳涌、江豐等等

大量「右派言論集」的形成，主要是當時處於強勢一面的力量編輯完成的，它所收集的所謂「右派言論」的真實性都會有一些問題，斷章取義、張冠李戴，道聽塗説，無限上綱是基本特點。另外「右派言論集」的編纂方式除了「右派言論」外，通常還會有一些批判文章和「右派」過去的歷史。因為「右派言論集」的編纂不會徵求「右派」的同意，所以作為史料使用時，對於書中涉及的事實，需要細加辨別和與真實的歷史事實相印證。

「右派言論集」作為文獻的最高價值，在於它所提供的歷史線索和部分矛盾的真實來源，雖然很多時候那些揭發和批判中提到的事實與真實的事實有相當距離，但這些文章中所涉及的事件及對人物個性甚至人格，特別是個人私生活方面的內容，對於瞭解歷史真實和判斷歷史關係還是有幫助。另外此類文獻中，對於所涉人物的基本經歷特別是當時作為反面材料涉及的歷史問題，多數對完整瞭解歷史事實，具有啟發作用。

就出版形式而言，1957 年前後出版的此類文獻分為內部印刷和公開出版兩種，公開出版的多數是知名右派和重大事件的材料，通常較為容易見到，一般圖書館也多有收藏。比較少見和一般圖書館難以完整收藏的是大量無名右派的「言論集」，就史料稀缺性判斷，越是無名右派的材料，越有收藏和保存價值，因為就中國右派的總人數而言，知名右派畢竟是少數。在國家無意統計右派真實數目的

情況下，這些「右派言論集」是將來統計右派人數的一個重要史料來源。撰寫過批判和揭發右派文章的那些作者，後來的人生也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變化，通過對此類歷史文獻的收集和研究，對於深刻認識那些知識份子的行為也有幫助。

「右派言論集」很多，僅我收集到的就有百餘種。例如中共中央黨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發言稿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學員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選輯》、《中國科學院右派分子言論材料彙集》、《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右派分子徐鑄成的言論作品選》、《章乃器反共三十年》、《蘭州大學右派言論彙集》、中共山西省委整風辦公室編《「鳴」、「放」選集》以及 1987 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編輯的《劉賓雁言論摘編》、《方勵之言論摘編》、《王若望言論摘編》等。

公開出版的批判右派言論的材料就更多了。例如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向右派開火》、《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等論文集》、《批判右派分子譚天榮等論文集》、群眾出版社刊印的《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聲討惡毒攻擊肅反的右派分子》、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雷海宗批判》、北京出版社的《首都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的巨大勝利》、遼寧人民出版社的《右派百醜圖》、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批駁工商界右派分子的謬論》、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印的《右派言論選集》、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資料室編印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彙集》、等等。

反右運動的影像史料

1957 年，反右運動發生時，因為技術手段的局限，這方面的影像史料較為稀見。主要有幾個方面：

1、當時新聞記者拍攝的黑白新聞照片，在一般報紙上偶有所見，但主要存在於當時中國有限的幾本畫報中，如《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及地方出版的畫報中。

2、美術作品（主要是漫畫），出現在當時的一些文藝性報刊，如《中國青年》、《新觀察》、《文藝月報》、《詩刊》、《美術》以及北京大學的學生雜誌《紅樓》、《浪淘沙》、《論壇》、《思想戰線》等雜誌上。

3、1958 年後，為了總結反右運動的成績，有些城市舉辦過有相當規模的「匯報展覽」，展覽後印製過一些畫冊，這些畫冊通常由照片、漫畫、實物、統計表格

等幾種類型組成。

4、新聞電影記錄片。

5、戲劇等文藝形式的圖像記錄。

部分反右運動影像史料有:

《自我改造彙報評比展覽會彙編—1957——1958》（畫冊），廈門市民革、民盟、農工、民建、工商界、宗教界、歸國華僑聯合舉辦，1958 年，廈門。

《上海市工商界整風運動展覽會彙編—1957——1958》（畫冊），上海市工商界整風工作委員會，1958 年，上海。

《天津市反右派鬥爭展覽會》，1958 年，天津。

中國美術家協會廣州分會?《反擊右派漫畫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57 年，廣州。?

《向右派鬥爭》，紀錄片。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出品。

話劇《百醜圖》，中央戲劇學院實驗話劇院演出，孫維世導演。上海滑稽劇團移植演出。

《尋找林昭的靈魂》，紀錄片，胡傑攝影、解說，2003 年製作。

許善斌《證照中國——1949—1966》（本書收有「批判右派分子儲安平大會」、「民盟北京市委會反右派批判大會」的入場券），華文出版社，2007 年，北京。

近二十年完成的右派回憶錄

1979 年後，中國對 1957 年的反右運動進行了重新評價，右派得到了改正，他們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社會生活中。一般流行的說法是當時中國共劃了 55 萬右派分子。這個統計來源於李維漢的回憶錄，這只是個大概的說法，具體的右派人數，只有將來在檔案開放的情況下，才能完全落實清楚，希望將來能有一本較為全面的「中國右派名錄」，這是建立「右派博物館」的基本內容。5

右派改正後，恰逢中國社會進行改革開放的時代，所以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多數右派重回工作崗位，加上對歷史認識的局限，所以寫作回憶錄的人很少，當時有條件從事這一工作的主要是一些作家，比如丁玲、劉賓雁、王蒙等，再加上一些學者及民主黨派的重要成員，如葉篤義、千家駒、費孝通等。

本人收集的右派回憶錄，一般不包括近二十年來被多次研究和有多種著作行世的知名右派，以及出版有全集的右派作家和學者，而主要偏重於長期在社會低層生活的小右派的回憶錄。

在本文作者的回憶錄概念中，包括一般出版的日記、自編年譜和紀念文集、較完整的個人簡歷等。但本文所列出的右派回憶錄，主要以完整的長篇回憶錄為主，包括右派本人去世後由家屬編纂的紀念文集。除特別重要者外，一般不列單篇的個人回憶或者相關研究文獻。也就是說，右派回憶錄，以作者本人的回憶為主（包括家屬編纂的紀念文集），研究者寫作的右派傳記只少量收入。

這些右派回憶錄分為公開和自費印刷兩類，自費印刷也包括雖有出版單位，但是以買書號方式完成的出版物（包括使用香港書號的出版品），中國近年來對於反右派運動的研究多有限制，這些出版物一般很難正常出版，所以許多作者選擇自費印刷的方式讓回憶錄問世。因為是自費印刷，這些低層右派的回憶錄反而更加真實反映了歷史，對於後人瞭解反右運動的對中國知識份子造成的傷害有很大幫助。而公開出版的右派回憶錄因為出版審查的原因，對於真實的歷史多有回避，而且在對歷史的認識的判斷方面也缺乏深度，比如王蒙的回憶錄歷史價值就不高。一般而言，凡自費印刷的右派回憶錄，歷史價值高於公開出版的右派回憶錄。

右派回憶錄有《風雨九十年——潘大逵回憶錄》、《葛佩琦回憶錄》、藍翎《龍捲風》、邵燕祥《沉船》、《陳銘樞回憶錄》、從維熙《走向混沌》、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徐鑄成回憶錄》、高兆忠《猙獰歲月愁——1957—1979》、溫濟澤《第一個平反的右派》、《風雨平生——蕭乾口述自傳》、何濟翔《滬上法治夢》、徐光耀《昨夜西風凋碧樹》、和鳳鳴《經歷——我的 1957 年》、劉皓宇《人・鬼・人》、吳永良《雨雪霏霏——北大荒生活紀實》、張僖《隻言片語——中國作協前秘書長的回憶》、李蘊暉《追尋》、茆家升《卷地風來——右派小人物記事》、邵燕祥《找靈魂》、倪艮山《沉思集》、吳弘達《昨夜雨驟風狂》、巫寧坤《一滴淚》等。

長篇小說中的右派史料

作文藝作品的表現內容，「右派文學」在中國文學作品中經歷過兩個階段。先

是在反右運動開始後，「右派」完全以反面形象出現，當時無論是詩歌、話劇、戲曲還是美術作品，右派都是丑角。在 1976 年以前的文學作品中，除了反右運動前後出現較多應景的「右派文學」外（主要是一些學生作品，如北京大學張鍾以魯遲名義發表的《阿 0 外傳》，常宏《林希翎右史演義》、魏可《右派現形記》，吳天惠《夢幻曲》）。6 作為文學作品的題材，右派形象在文學作品中並不多見。

「右派」作為文學作品中的正面形象是伴隨「右派」在政治上獲得改正後出現的現象。余易木的中篇小說《初戀的回聲》，較早表達了「右派」的真實生活，到了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電影《巴山夜雨》（葉楠）、《苦戀》（白樺）出現後，「右派」在中國文學作品中的形象已發生了完全改變，接著張賢亮的《靈與肉》《綠化樹》等一系列作品，在表現「右派」真實生活處境方面又向前跨進一步。

整個八十年代，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右派」生活的基本都是「右派」作家，他們在思考反右運動和「右派」人生經歷中，思想還沒有完全解放，對於導致「右派」命運的真實歷史還缺乏拷問歷史的勇氣，所以這個階段的「右派文學」所達到的水平並不高，這可能與當時「右派作家」重新回到體制內並獲得主流認可有關，特別是丁玲、王蒙、張賢亮、從維熙、唐達成、李國文等「右派作家」，基本構成了當時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主體。在這一代「右派作家」中，劉賓雁和邵燕祥的選擇比較獨特，他們保持了獨立思考的勇氣，特別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他們主動自覺和體制保持了分離姿態。

進入二十世紀後，作為文學題材的「右派」主題，一度獲得作家的重視，但這次承擔「右派」題材回歸文學的作家，主要不是原來的「右派」，雖然王蒙在九十年代初期創作了《失態的季節》，但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幾部以「反右運動」為主題的長篇小說中，王蒙這部作品並不特別引人注意。在深刻表現反右運動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傷害程度，並同時表達對現實政治深刻絕望方面，楊顯惠關於「夾邊溝」的系列作品，尤鳳偉、方方的長篇小說，都比王蒙的小說更引人關注，因為這些雖然沒有經歷過「反右運動」的作家，在對「反右運動」的認識和思考方面超越了現實政治的制約。

長篇小說中的右派生活，並不能作為一種真實的史料來看待，但因為虛構文學的來源有史料基礎，同時作家在敍述反右運動的生活時，也涉及對反右運動史料的選擇和評價，所以也構成了反右運動史料的一個方面，特別是對後人瞭解這

一段歷史，反映右派生活的文學作品，有可能也成為另外一種史料，也就是史學研究中常提到的間接材料，或者不經意的材料。

以右派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有王蒙《失態的季節》、方方《烏泥湖年譜》、楊顯惠《夾邊溝記事》、尤鳳偉《中國一九五七》、趙旭《大饑餓》等。

方志中的右派史料

在近二十多年的時間內，新修方志是中國文化建設中的一個基本內容，至少縣級以上的行政單位，多數都完成了這一工作。本文的方志概念中包括了高等院校、文化團體、科研單位編纂的各種類型的機構史。

方志是中國保存歷史的一個傳統，真實、完整和系統是它的基本要求，但因為當代中國還不可完全擺脫意識形態對專業和學術的制約，所以新修方志的總體水平並不高，特別是對反右運動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通常會採取輕描淡寫、避重就輕的方法，不可能完全承擔保存史料的歷史責任。但作為方志，總還在相關方面有一些線索，特別是右派的履歷及右派的人數統計等方面，畢竟還是一個史料來源，在這方面，一些高等院校的校史及科研、文化單位的機構史相對嚴肅一些，在名人履歷中把右派經歷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記錄。丁抒《陽謀》一書中，較為重視使用方志中的反右運動史料，特別是對於基層社會反右運動的真實情況，通過對方志中相關文獻的梳理，經常會有新史料的發現，在反右檔案不能公開使用的情況下，這個獲取史料的方法應當重視。

中國政府對反右運動的態度，非常耐人尋味。一方面對這個運動基本做了否定評價，但另一方面卻不願意正視歷史事實。這種態度導致許多右派改正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的人，對於自己的這段經歷採取有意回避態度，比如朱鎔基、費孝通、王蒙以及一些高校校長，在正式履歷中，一般不提自己的右派經歷。這種現象說明，在中國社會現實中，雖然右派獲得了改正，但右派的社會地位並不高。我認為這與兩個事實有關，一是反右運動的具體當事人鄧小平本人，對這一歷史事件並沒有深刻的懺悔，雖然在主觀上承認了這一運動的完全錯誤，但在事實上並沒有徹底改變對原來右派的認識和評價。二是 1976 年後， 中國政治生活雖然發生了變化，但基本意識形態並沒有轉換，這一事實決定了他們對待歷史的基本態度，

在中共幾任總書記中，真正對反右運動有深刻認識的只有胡耀邦一人。

具體到中國社會現實中，基本情況是，早年負責反右運動的領導人，並沒有因為主流意識形態部分改變了對反右運動的評價而成為這一歷史的責任承擔者，他們依然占居中國社會的主要領導地位。這種「我打你右派，我給你改正」的事實，直接影響了整個社會對反右運動的基本判斷，除了在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右派基本獲得了正面評價外，越往社會下層，右派的真實社會形象，並沒有發生完全的改變。

從全國範圍內觀察，右派改正後，他們的政治地位並沒有顯著變化，除了朱鎔基、費孝通、王蒙、鍾沛璋等少數右派能回到主流政治中心外，右派基本還是一個邊緣群體。由反右運動造成的「精英淘汰」事實，大體還發生作用。

???? 精英淘汰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人才流動的主要機制，它的發生與時代政治文化密切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建立時，它的主要領導層，以造反起家的人為多，凡造反成功以後，必然論功行賞。在這個機制中有相當一批人是以造反為自己主要才能的，但在一個沒有反可造的時代裏，這些人的才能就發揮不出來，這是其一。其二是在和平時代裏，造反的才能已退到第二位，所以觀察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總是沒有才能的人在整有才能的人，而沒有才能的人通常都居於高位，比如1957年，當時共青團省委副書記以上被打成右派的人，基本都是大學生。名單如下：7

共青團省委副書記以上幹部受開除黨籍、留黨察看處分人員簡況

姓　名	當時年齡	成　份	當時職務
陳　模	35	學生	中青報副總編
鍾佩璋	33	學生	中青報副總編
陳緒宗	39	學生	中青報總編
李 庚	41	學生	中國青年出版社總編
彭子岡	44	學生	旅行家雜誌主編
劉賓雁	32	學生	中青報工商部主任
吳一鏗	39	學生	中青報文藝部主任
譚西山	38	學生	上海團市委副書記
董學隆	32	學生	雲南團市委副書記

賀惠君	29	學生	四川團市委副書記
郭永澤	32	學生	哈爾濱團市委書記
項　南	39	學生	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王　正	34	學生	江蘇團市委副書記
仇作華	34	學生	廣東團市委副書記

右派的上書文獻

上書是傳統中國知識份子表達政見的一種方式。在傳統社會，上書的主要對象是皇帝。上書的直接動機來源於法律、新聞的缺位。上書形式有兩種，一是單獨的個人行為，二是聯名上書。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依靠上書解決問題的事實非常多。就是在毛澤東時代，依靠上書解決問題的現象也很常見，比如李慶霖關於知識青年生活處境的上書，張天民關於電影《創業》的上書，都是明顯的例子。在現代傳媒出現（以電子傳媒為標誌）前，上書是真正的上書，而到了現代傳媒出現後，上書其實只是一種表達方式，它的核心意義並不是一定要讓上書的真實物件看到自己的意見，雖然這個願望始終存在。傳統上書的預期建立在偶然性上，所以上書的方式除了正常渠道外，主要依靠私人關係，因為私人渠道在一個非常態的社會中反而會保證資訊的對稱，所以一般能發生作用的上書行為，通常都有私人背景。

本文提到的右派上書，專指近年來為了呼籲對反右運動歷史的重新認識和研究，一些具有右派身份（包括右派子女）的人，以上書形式表達政見的行動。這種行動的主要對象其實是新聞媒體和大眾。

採取上書的方式，只說明對高層解決問題有一種期待，並不完全相信高層對會此作出明確回應，事實上高層在看待右派上書問題方面，資訊是不對稱的，他們沒有把上書者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看待，所以右派上書，目前它的意義還只在表達政見的層面上。右派上書起源於 1987 年 2 月由許良英、劉賓雁和方勵之發起的「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術討論會通知」，其他以個人名義向本單位上級領導尋求人個問題解決的表達方式，並不在本文所謂右派上書的意思中。

右派上書統計:

《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1987 年，北京。

《重慶「改正右派」呼籲書》，2003 年，重慶。

史若平：《反右受害者及家屬子女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補償物質和精神損失》，2005 年，濟南。

蔣文揚：《重慶 116 名右派給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公開信》，2005 年，重慶。

彭志一：《給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和申訴信——要求國家對右派分子正式道歉並給予經濟補償》，反右運動受害者及家屬子女　2007 年，

任眾：《為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2007 年，北京。

《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屬敬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2007 年，杭州。

周國興：《新疆右派上書中央》，2007 年，烏魯木齊。

任眾等《必須徹底否定「反右派鬥爭」的錯誤政治運動——致國家主席胡錦濤》，2007 年，北京。

結語

反右運動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深遠，但關於反右運動的史料來源又非常有限，在研究者獲得原始檔案相當困難的情況下，首先意識到收集反右運動史料的意義是學術研究的關鍵，近年來中國學者已在這方面作了很多準備，比如冉雲飛編輯的《右派資料知見錄》，已有了較為開闊的思路和基本收藏，隨著網上「反右博物館」的建立和影響，可以期待反右運動研究的學術性將會得到提高 8

一個時代學術研究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材料的發現和新方法的運用。反右運動，作為學術研究物件具備相當的豐富性，在相關檔案不開放的歷史現狀下，依靠社會各界力量，有計劃有系統完成反右運動史料的收集，並編纂成形的研究文獻是迫切的學術基礎工作。

目前反右運動研究的史學地位還不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反右運動研究中，

原始文獻的使用率較低，多數研究依賴零散的第二手文獻，所以史料先行，應當成為反右運動學術研究未來前途的必備條件。成熟的學術研究，應當建立在較為完備的史料基礎上，不然很難提升反右運動研究的學術水平並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所以建立反右運動史料學，應當成為當下重要的學術工作。

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之學術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1957年的反右運動研究，隨著史料的不斷發現，有可能成為今後中國當代史研究的新潮流。（2007年4月23日于太原）

——為2007年6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

注釋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57、459頁。

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493頁。

3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九十年版，第618頁。

4 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田園書屋2007年版，第120頁。

5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40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頁。

6 《戰鬥的聲音——首都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文藝文藝作品選輯》，第80、102頁，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第80、102頁。學生的反右派文藝作品，原發刊物以學生雜誌為主，張鍾、吳天惠等人的作品最初都有發表在《紅樓》和《浪淘沙》等雜誌上。

7 《共青團省委副書記以上幹部受開除黨籍、留黨察看處分的決定彙編》，共青團中央組織部編，1959年內部印刷。

8 反右博物 http://www.observechina.net/Data/Editors/fanyou/0000.html。

關於建立「1957 年學」的思考　　錢理群

建立「1957 年學」：歷史的責任，學術的追求

今年是反右運動五十周年，中國與世界因此有了一個機會，來集中審視 1957 年中國發生的事情。我要討論的問題是，在歷史的失誤與苦難面前知識份子的責任。我們不能只限於表示義憤與譴責，而應該通過嚴肅的思考，科學的研究，達到思想的飛躍與昇華，追究歷史失誤的原因，總結教訓，超越經驗事實，達到更為普遍性的認識，使「苦難真正轉化為一種精神資源」。1

對於我個人，還有一個倖存者的責任。1957 年我正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二年級的學生，由於年齡太小，沒有什麼言論，就有幸逃脫了那場劫難。我很清楚，1957 年的受難者中有許多人，其才能是遠遠超過我的，是歷史的錯誤剝奪了他們自由發展的權利，而且他們中許多人至今也還屬於「沈默的大多數」，沒有任何發言權。而我卻陰差陽錯成了一個學者、教授，擁有了一定的言說權利，而這樣的權利又是這些先驅者用自己的生命換來的。我如果不出來說話，是無法面對這些歷史祭壇上的犧牲者，也無法面對自己的良知的。

提出建立「1957 年學」，就是期待進行更自覺、也更具規模的系統研究，設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研究中開闢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以至學科，不僅集中研究 1957 年反右運動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本身，而且研究反右運動所造成的社會組織結構，經濟體制，法律制度，社會倫理，人際關係，思想觀念，以至國民心理素質，思維方式，言說方式-----的深刻變化，深遠影響，簡言之，即中國社會和人的變化。這對理解以後中國所發生的事情，以及今天的中國，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這必然是多學科（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經濟學，倫理學，哲學，文學，語言學……）的綜合研究。

提出建立「1957 年學」，自然是出於對 1957 年這段歷史的重要性與複雜性的學術判斷。

我想從兩個方面來說——

校園裏的民主運動：1957 年的思想史意義（略）

（參看錢理群：《1956——1966 中國大陸民間思潮個案研究》）

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關鍵環節

（一）高饒事件—反胡風—肅反運動—1957 年整風、反右—1958 年反右傾

我們不妨作一點歷史的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于 1949 年成立，在新政權基本穩定以後，從 1953 年開始，進入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的時期，即所謂「治國」時期，這就面臨著一個治國路線的選擇問題。1954 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並明確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居住與遷徙等廣泛的自由，強調「必須更加發揚人民的民主，擴大我們國家民主制度的規模」，這都似乎預示著中國將走向一條依憲治國的道路。

但在此以後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卻使中國的歷史發生了新的轉折。首先是黨內出現了所謂「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問題。毛澤東將高、饒事件看作是「我國現階段激烈的階級鬥爭的一種尖銳的表現」，並因此提出要「準備對付突然事變，準備對付反革命復辟，準備對付高、饒事件的重複發生」的警告。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面臨被顛覆危險，復辟的威脅主要來自三方面：一是「包圍我們」的「帝國主義勢力」，二是「國內反革命殘餘勢力」，三是黨內的官僚集團和反對派勢力。2 這是一個關係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性判斷，可以看出，在此之後，始終籠罩著毛澤東的，就是這樣的統治合法性遭質疑，政權被顛覆的危機感；而「帝國主義」、「國內反革命」與「黨內反對派」就成為始終如一的三大打擊對象。

由此而產生的，是所謂「階級鬥爭邏輯」，其核心是要在公民中（也要在黨內）「劃分敵我」，而「敵人」的確定，不是依照憲法與法律，而是出於階級鬥爭發動者的主觀意志與需要，甚至連「敵人」的數目也是可以預先規定的，而一旦被宣佈為「敵人」，就要對之實行不受憲法、法律制約的群眾專政。這樣的「階級鬥爭邏輯」，顯然是與「憲法（民主、法制）邏輯」相對立的：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治

國邏輯與路線。

應該說，1955 年 5　月（距離憲法公佈不到一年）發動的打擊「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以及隨即開展的「肅反運動」即是自覺地用階級鬥爭邏輯治國的最初嘗試。毛澤東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按語》中宣佈，對被群眾揪出來的「敵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並且實行「輿論一律」，讓他們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地怕挨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3 在這樣的群眾專政下，就不可避免地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同時也造成社會恐怖氣氛，知識份子更是謹小慎微，人人自危。

因此，1957 年的鳴放，集中在對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的質疑，這當然不是偶然的。有不少人旗幟鮮明地反對「不尊重人權」的階級鬥爭邏輯，自覺地要求重建國家憲法的至高地位，回到「依憲治國」的道路。

但掌握最高權力的毛澤東，無論是開始發動整風運動，還是後來發展為反右運動，他都始終堅持他的階級鬥爭邏輯，他的眼睛始終盯著他的三大「敵人」：外國帝國主義，國內反革命與黨內官僚集團、反對派，他始終堅持著他的維護專政體制的「底線」，時刻準備「對付突然事變，對付反革命復辟」。他應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發生的波蘭、匈牙利事件所提出的所謂「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的學說，正是將前述以在公民中「區分敵我」為核心的階級鬥爭邏輯理論化，也是他發動整風運動與反右運動的前後一貫的指導思想。區別僅在於鬥爭重心與策略的不同，由此而構成了三個階段，也可以叫做三部曲：在發動整風運動時，他試圖利用民主黨派、知識份子打擊黨內官僚集團與他心目中的反對派；而當他主觀上認定民主黨派、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有可能聯合起來威脅他的專政體制時，就反轉過來，與黨內官僚集團聯合，將一百十萬公民（據丁抒先生的研究），打成「右派」或「中右分子」，宣佈他們是「反革命」，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在反右運動大獲全勝以後，他又趁其餘威，反轉過來，警告黨內那些曾經提出「反冒進」的當權者，威脅說他們已經離「右派」不遠，從而使其徹底臣服。

這一時期的毛澤東，將他的階級鬥爭哲學與邏輯發揮得淋漓盡致，可以說是「橫掃一切敵人」，而建立起了他所嚮往的「君臨一切之上」的「聖人加帝王」（他自稱為「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絕對統治地位。而在反右運動中在全體公民中劃分「左，中，右」，提出的「對各級黨組織領導及党的積極分子提意見就是反黨」的

右派標準，以血統論、出身論為核心的所謂「階級路線」，以及所制訂的相應的法律、法規、制度，等等，都在實際上建立了新的等級制度，極度強化了高度集權（各單位與地方權力集中于「第一把手」，全黨與全國權力集中於毛澤東一人之手）的體制。

（二）反右運動以後所建立或強化的社會體制，結構和秩序

這裏有幾個關鍵词。

一是「組織」：一切歸於黨組織，一切交給黨組織，一切聽從黨組織的安排。所謂「一切」並非誇大之詞，而且確乎如此，並且有實質性的內容與制度性的保證。

二是「領袖」。「組織」是需要實體來體現的。首先是「領袖」。他是組織的代表，化身，他集中了組織的意志和權力，這既是具體的，實質性的，又是象徵性的。他的操作性的實際影響主要體現在上層；對於底層的普通民眾，他是可望不可及的，因此，就更具有象徵的意味，可以說是組織的「神體」。

三是「領導」。各級組織的「領導」，即是組織的「肉身」。這正是反右運動所要反復強調的：組織不是虛的，必須落實到每一個單位的具體領導，特別是「第一把手」。因此，聽從組織也要落實到聽從單位領導；而每一個等級上的領導，又要聽從上一層領導，即所謂「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這又是和等級授權制相一致的：各級組織的權力來自上級領導的任命，自然有服從的責任。這樣，個人和組織的關係，最後就落實為個人和某個具體領導的關係，並且極其容易形成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關係。各單位在領導之下，還在群眾中劃分左、中、右，形成「第一把手——領導班子其他成員——左派（積極分子）——中間派（一般群眾）——右派」的等級結構。

由此而形成「單位體制」。單位組織實際上是代表党和國家對其成員實行從思想到行動的全面控制。反右以後制訂的一些法律、法規就是為了強化這樣的單位控制。如《勞動教養條例》，除了為懲罰右派提供合法性外，還規定如不服從單位的分配、安置和調動，或被單位開除，就要送去勞教，以至勞改，對之實行專政。這樣，全體中國人，就只有一個選擇：安心於單位的控制，無條件地聽從基層黨組織的命令，就可以獲得基本的生活和發展條件；否則不但本人，連同自己的家人的基本生存都沒有保障。反右以後更強化了單位檔案管理，制訂了《高等學校

畢業分配工作的幾項原則規定》，對每個畢業生進行政治鑒定，並將審查結論裝入檔案。同時規定，人的一切行動，外出乘車購票，在旅館投宿，以至在報刊發表文章，都要「單位證明」，說明政治身份和可靠程度。

四是「群眾專政」。毛澤東宣佈，要將右派「陷落在勞動群眾的汪洋大海中，他們不想變也得變」，這就是「群眾專政」。它以空前的思想控制力和社會政治動員力，煽動起全民的仇恨和鬥爭狂熱，用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階級鬥爭，參加者以千人、萬人、數十萬人、數百萬人計的群眾鬥爭大會遍佈中國每一個角落，把全民訓練成衹會撕咬同類的嗜血的政治動物，在近乎瘋狂的政治警惕性的背後，隱藏著普遍的恐懼心理和不安全感。同時號召「劃清界限，大義滅親」，把「專政」深入、落實到被專政者的家庭、親屬、朋友內部，將其置於孤立無援，走投無路的絕境。

這就是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以後布下的「天羅地網」：全中國，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地方，全在控制之下，無一漏網：它極其嚴密，甚至達到了精緻的地步，用高度集中的權力，動員了一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法規、政策、道德、觀念、輿論……的力量，將社會每一個成員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以至最隱蔽的私生活，都控制得嚴絲密縫，少有疏漏。而且有嚴厲的監控、懲治體制，不僅有監獄、勞教所、收容所這樣的專政、准專政的國家機器，還有群眾專政的系統，將「鑽網」的一切努力消滅于萌芽狀態之中，如有試圖「破網」者，更是嚴懲不貸，一切掙扎、抗爭都顯得無用和無效，所需要的只是「絕對服從」。——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極權統治。

反右以後：大躍進—大饑荒—文革—「六・四」

在毛澤東通過反右運動構建了嚴密的統治網，獲得了人世間不受監督、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以後，他轉而開始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發動了「大躍進」。所謂「大躍進」，就是「向地球開戰」。單從用語就可以看出這實際上仍然沿用了戰爭的思維與邏輯，也就是階級鬥爭的思維與邏輯，不過這回的對象是大自然。但如果說在剛剛結束的反右運動中他在征服人方面暫時獲得了全勝，現在他要來征服自然，在取得短暫的虛假的「勝利」以後，大自然很快就予以報復：不到一年，

1959—1961 年就出現了三年大饑荒。但承擔災難的卻是普通百姓：中國民政局官員在 2005 年 9 月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三年自然災害」的數字「我們不掌握」；但許多專家卻提供了一系列雖無法確認、卻也令人驚心動魄的數字：從 1000 萬到 4000 萬，總在千萬以上。4

應該說，這也是反右運動結出的惡果，不僅因為此時已被流放的右派本身就是這三年大饑荒的直接受害者，近年來為人們所矚目的夾邊溝事件不過是一個典型事例；更重要的是，反右運動所強化的權力集中一黨、一人之手的體制，使得執政黨與其領袖一旦出現了決斷、決策上的失誤，由於沒有有效的監督與制約機制，就不可能及時得到糾正，即使全國與全黨多數人發現了錯誤也無能為力，只能任其發展到極端，由執政黨或領袖自身提出，才有改正的可能。大饑荒之愈演愈烈，其原因即在於饑荒發生之初，引起了人們（包括彭德懷這樣的高級領導人）對「大躍進」的懷疑，毛澤東卻按照他的階級鬥爭邏輯於 1959 年發動「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毛澤東自己也說這是反右鬥爭的繼續），仍然堅持「大躍進」，大饑荒終於不可收拾。

但毛澤東仍然堅持他的階級鬥爭邏輯，在大躍進事實上的失敗被迫稍作退步以後，又於 1962 年再度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並逐漸將其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對所謂「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和平演變」的高度警惕，毛澤東做出了「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的嚴重判斷 5，這是繼發動反右運動之後又一次錯誤分析形勢，過分誇大「敵情」。——毛澤東幾乎每到關鍵時刻都要誇大「敵情」，並因而錯下決心，造成嚴重後果，這其中的緣由，是很值得琢磨、研究的。

而在獲得了反右運動全面勝利的毛澤東看來，六十年代的中國，能夠構成對他的統治威脅的，已經不是右派，而是掌握著實權的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內官僚集團與他所認定的反對派，他稱之為「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以及在思想文化領域依然保持著強大影響的知識份子，他稱之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構成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兩大革命對象，也是他發動的四清運動與思想文化領域的批判運動，以及最終發動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對象。

另一方面，如前所說，反右運動後構建了一個有著多層等級關係的單位體制，每一個基層組織都代表党和國家對其成員實行從思想到行動的全面控制；作為這

樣的控制的必然反彈，同時就形成了基層受壓制的群眾和各級黨組織關係的極度緊張。再加上反右以後強化的或以家庭出身（革命家庭，反動家庭，一般家庭）劃分，或按出生地（農業人口，非農業人口）劃分的等級身份制，從而形成兩大制度性歧視，這也同樣造成了社會關係的極度緊張。因此，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各級黨組織，一些受壓制的群眾起而響應，紛紛「造反」，正是這樣的社會矛盾的反映。

而劉少奇等從一開始就試圖將文化大革命變成新一輪的反右運動，正是在他們的領導下，文革初期，在全國各單位都抓了一批「右派」。但這回毛澤東不再與黨內官僚集團合作，而是同樣借助群眾（主要是紅衛兵與所謂「造反派」）的力量，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造反運動與奪權運動，將他們統統「拉下馬」。但到運動的後期，又將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重新請回，而將不聽使喚，還想繼續造反的紅衛兵與造反派鎮壓下去。這其間的策略變化，與當年的整風、反右運動，幾乎同出一轍。在這個意義上，實際上也可以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反右運動的延續。

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對歷史問題的處理上，新的執政者卻採取了兩種態度：文化大革命被全盤否定，反右運動則只承認「擴大化」，而依然堅持其「正確性」與「必要性」；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僅徹底平反，而且進行了經濟補償，對「右派」則只「改正」不「平反」，而且不予經濟賠償。這當然不是偶然的。這表明，執政者仍然堅持反右運動的兩大邏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一黨專政」的邏輯，和時刻警惕「復辟」，在公民中劃分「敵我」的階級鬥爭的內在邏輯，儘管已經將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為中心」改變為「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轉變自然是有意義的，但又是不徹底的。這樣，在 1989 年的「六·四」事件的處理中，人們再一次發現反右運動的陰影，就幾乎是必然的：同樣是將青年學生與群眾「反腐敗，反特權」（這也是 1957 年大學生們的口號）的呼聲，看作是企圖顛覆紅色政權的「反革命叛亂」，再一次誇大和主觀製造了「敵情」，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同樣是為了維護一黨專政體制，不惜對行使憲法賦予的民主權利的公民行使不受憲法和法律制約的「鎮壓之權」；同樣是由於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缺乏監督、制約的機制，使得全體公民與全體黨員在關鍵時刻都無力制止最高領導人的錯誤判斷與決策，以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而且至今不得改正。而由此

引發的後果，也與反右運動的後果，驚人的相似，而且有了新的發展：同樣是強化了一黨專政的體制，政治民主改革與建設嚴重滯後於經濟改革與發展，腐敗之風與兩級分化更是遠遠超過了五十年代後期；而在隨後的經濟發展中，也同樣對大自然施行空前的掠奪性開發，導致嚴重的污染與生態失衡：這同樣是大自然的「報復」。其結果依然是對人性的內在惡的誘發，人與人關係，人與自然關係的極度惡化與緊張。

1957 年是一個「綱」，「綱舉而目張」

從以上簡要而不免粗疏的歷史回顧中，不難看出，反右運動在 20　世紀後五十年中國歷史發展的鏈條中，是一個關鍵性的環節：它向上承續反胡風、肅反運動，往下與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以至「六・四」，都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而且其所產生的影響是既深遠又廣泛的，幾乎涉及到政治、社會、經濟、法律、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等各個領域。或許正因為如此，反右運動和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六・四」風波，一起成了要強制遺忘的四大禁區，成了歷史的死結。——巴金先生曾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館，其實如果真要吸取歷史教訓，打開歷史死結，是應該建立「四大博物館」的，也就是要以敢於正視歷史的科學態度來進行四大歷史研究。在我看來，反右運動正是一個解結、解扣的關節點，因為歷史正是由那裏開始的。可以這樣說，要瞭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1957 年是一個綱，中國有句話，叫「綱舉而目張」，抓住 1957 年這個綱，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就「拎」起來了。

可以期待，對 1957 年歷史的研究，必將帶動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而對 1957 年歷史的考察，也必然是多學科的綜合研究，而且也會促進相關學科的研究：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提出「1957 年學」這個概念的原因與理由。

——2007 年 7 月 7 日在紐約區圖書館的演講（摘要），7 月 19 日整理、補充。

注 釋

1 錢理群：《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壓在心上的墳》，5 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出版。

2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5 卷，140 頁，153 頁，人民出版社，1977 年出版。
3 毛澤東：《駁「輿論一律」》，《毛澤東選集》5 卷，158 頁，159 頁，人民出版社，1977 年出版。
4 參看王珍：《三年大饑荒的數字之謎》，載 2005 年 11 月 18 日《文匯讀書週報》。
5 毛澤東 1964 年 6 月 8 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轉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出版。

「一九五七年學」方法談

魏紫丹

現在離開 1957 年已經五十年了，在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我認為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對推動下一步的研究是有好處的。為此，我想就著寫作拙著《還原 1957》談一些心得體會。我先提出三個主要的方法，一方面向朋友們請教；另一方面想以我的「磚」引出朋友之「玉」。

第一「總分法」要求，既見樹木，又見森林。

總分法就是在從對「現象」到「本質」，從「部分」到「總體」的認識基礎上，再利用對「本質」與「總體」的把握來理解「現象」與「部分」。

前時臺灣舉行了毛澤東的影展，據說他「微笑」的魅力傾倒了觀眾，甚至於有的認為，他還是有人性的，不應該把他妖魔化。這使我認為，蔣中正先生實在對不起這些臺灣人，使他們沒能親身領受毛主席的「微笑」。但我希望人們都來分享右派的感受。著名右派作家從維熙在《走向混沌》中說：「張滬（作者的也劃了右派、自殺未遂的妻子）和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命運的悲劇，正深藏在你那嘴邊慈愛的笑紋之中呢！」1 用總分法就會看出那「微笑」滴瀝著億萬人的血淚！臺灣這部分觀眾就是一葉遮目，缺乏對毛的總體認識。

言歸本題。經過五十年的研究，我們得出一個對反右運動的總體認識。郭羅

基教授指出：

「1956 年在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這種社會主義叫做主觀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1957 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對黨主，反對黨主操縱的主觀社會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一個正確的命題。」2 反右派和後來鄧小平的「反右必要論」，不僅是站在歷史的錯誤的方面，而且是倒行逆施，開歷史倒車。

至於說發動反右的手段是陰謀，是陽謀，或是沒有預謀，那只是臨門一腳的問題。方勵之教授已從總體上對此問題作了論斷：「現代科學的實證精神和方法並非僅僅與中共一兩個政策相矛盾，而是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君臨一切之上是難於共存的。所以，一批傾向自由主義的青年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之間的離異，或遲或早是註定要發生的，反右運動只是加快了離異的進程。」3 這個「難於共存」，就是共產黨所說的「與右派是敵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鬥爭。」「1957 年學」就是要研究右派前瞻性的大鳴大放是如何推動歷史前進，和共產黨發動反右派是如何開歷史倒車的。這是一個總的大前提。古人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4

當然，也不能忽略對某一部分，甚或某一微小細節的研究。這裏，可以與《論語・子張》中子夏的話比照讀解：「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比如，胡平先生說：「作為毛的醫生，李志綏能夠觀察到毛的情緒的起落。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後矛盾的講話更能說明問題。李志綏觀察到在 57 年的 5 月中旬，毛的情緒很壞，『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5 胡平是擅長於講道理的，包括這次，都很令人信服。但是，這倒引發我深思：如果「陰謀論」成立，這時候毛何以會情緒如此呢？

經過研究，我發現這並不完全是李志綏的觀察，而是「林克的看法，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6 林克說：「當時毛的確因為患感冒而身體不適，並不是李志綏捏造的我所說的『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而形體衰弱，精神憂鬱』。」7 雖然我們不能確定誰說得對，但也不能確定誰說的不對。

總分法是正確認識毛澤東和中共的科學方法。俗話說：「問路問來人。」司馬璐就是過來人。他說：「研究中共黨史的一個最大困難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經

過權力鬥爭，或路線改變的影響，時時被否定或篡改。甚至毛澤東本人的著作，經過一再刪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說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鑒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偽，足夠的原始資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關中共的全面知識，以及閱讀的判斷能力尤為重要。」8 這充分說明運用「總分法」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你認清了毛澤東從來就是品質惡劣，性格暴戾，作風專橫跋扈，從大殺 AB 團、延安整風、鎮反、肅反、三反、五反、破口大罵梁漱溟、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革——從肉體上消滅意見相異者李文林、袁文才、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從《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得知，毛用癌細胞害死周）、直到小人物田家英，可知，他是決不許可「哪個蟲兒敢出聲」的。難道他會許可他早已認定是美帝國主義第五縱隊、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知識份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幫助共產黨整風嗎？這絕對不可能是真的！真的是一場陰謀。

實際上，除掉毛 1957 年春季為了「引蛇出洞」而拋出「雙百方針」，對知識份子好到反常的程度外，你把他的骨頭砸碎也是砸不出真正的「雅量」呀，「寬容」呀，「開明」呀，以及「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因素來的。

鄧小平說：「1957 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9 如果國人把握住鄧小平的雙手沾滿右派的鮮血這一基本事實，和李銳說的鄧和毛一樣左這一總體評價，以及國學大師牟宗三說的鄧和毛「是一丘之貉」，那麼對鄧的胡言亂語就自然會認識透徹了。

毛澤東沖著鄧小平左得過人，才說那個小個子：「很有發展前途。」10

所謂「還原歷史」，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地還它以原貌。就著總分法來說，就是有總有分：有分無總，只見樹木；有總無分，只見森林。

以柯慶施作為例子。許多寫關於反右的文章，涉及到上海，都寫那一位「毛主席的好學生」如何如何緊跟，好象他表現得最惡劣。但我認為，對壞人也不能冤枉。柯在反右中還沒實行他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他在反右中比不上鄧小平、彭真壞。

柯否定了不少下面送來報批的內定右派。譬如《勞動報》總編輯馬達，文匯報黨組書記欽本立、唐海，解放日報副總編馮崗。柯慶施說：「這幾個同志是缺少經驗的問題。他們是有錯誤，不能做現在的工作了，給他們一點處分也是應該的，但不要劃右派。右派劃多了不好。」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的外事系統沒有劃一名右派。上海市第二商業局整個局裏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商業二局局長裴先白說：「我們是搞食品供銷的，有的同志講些怪話我們就沒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沒有問過我。」

當時的上海科委主任舒文回憶說：「市委召開一次常委會議，柯老主持。會上發了兩個科學家的材料。從當時看來，他們的言論超過劃右派的標準。……柯老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把這些人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還是不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二、這些人都是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建設的。……他們絕不會反黨。……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響是，科委系統的研究人員一個右派都沒劃。」

還有，關於在大學生中抓右派的問題，柯慶施告訴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柯慶施還說過：「某些單位經過實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後，如果確實沒有發現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進行反右派鬥爭。」在當時能喊出這麼一句，是有千鈞之力的。上海雖然劃了 15,419 名右派，但是，相對數還是比別處明顯「落後」。11 比如說，河南省，官方數字是 70,869 人。

同理，陳伯達在反右中就沒有胡喬木表現惡劣，起碼他沒為《人民日報》寫過一篇反右的社論，而胡喬木卻是反右社論寫得最多，最惡毒的一個！

我們既然認為，對壞人也不應該冤枉，那麼，對毛澤東也當然不應該妖魔化。實際上，毛澤東之兇惡，之邪惡，之醜惡，之罪惡滔天，遠遠超出常人的想像，直到現在，有關資料仍大量密封于黑箱裏，只存在估計不足的問題，尚不存在妖魔化的情況。相反是對他的妖魔性缺乏認識；尤其是面對著官方的美化與神化缺乏抵制。總分法要求從總的傾向與個別表現相結合地看問題，而不要抓住芝麻丟掉西瓜。「妖魔化」論者就是對總體缺乏明確的認識。為什麼德國和俄國就沒有人出來說「妖魔化」斯大林、希特勒呢？中國人呀中國人！劉賓雁生前曾氣憤地說：「活該受統治！」12

第二，「內外法」要求，研究問題時要入乎其內、出乎其外。

所以需要「入乎其內」，是因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例如，作家黃秋

耘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家得知一個政治資訊——邵放下電話，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由此，他便對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陰謀得出判斷：

「這個『急剎車』的措施可能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直到5月中旬才決定下來。周揚那一級的高級幹部(他當時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至早也到5月中旬稍晚一些時候才確知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後，一天也沒有耽擱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當天(5月18日)晚上就暗示給我。」「先見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於敏銳的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於準確的、及時的情報。比方那一個『轉』字，哪怕我是個『小諸葛』，5月18日晚之前，也是無法想得出來的。只不過由於偶然聽到的一個電話，才『頓悟』起來。」13

這為「入乎其內」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證。

但是，如果僅僅入乎其內而沒能出乎其外，就會「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李志綏之所以認為毛發動知識份子幫助共產黨整風是想借知識份子的刀，殺向那班「反冒進」的「黨內的敵手」，而不是預謀反右。結果毛感到上了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當。原由就是他當時根本不瞭解外情。

我和許多右派對於反右派鬥爭，也可以說是「入乎其內」的，但我們「入」的「內」太小。我們只知道挨鬥爭的過程和感受，對全國的總形勢也只限於讀到的報紙和聽到的報告；受到勞動教養處分後，和勞教、勞改的右派互通資訊，擴大了我的「內」的範圍。到海外之後，才接觸到一些右派朋友的，和當年是反右積極分子現在良心發現了的朋友的回憶錄；也讀到一些這方面的國內外學者的論述和論著，其中《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鴻》、《晚年周恩來》、《陽謀》和徐平華的文章《九死一生二十年》等給了我較深的印象。我們右派所需要的「出乎其外」是，要通曉中外學者對「1957年學」的研究成果。如果是不能「出乎其外」的「入乎其內」，則必然會「陷乎其內」而不能自拔。李志綏就是「陷乎其內」而難見廬山真面目。

所謂「內外」，以國分，有中國與外國；以黨分有中共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派分有左中右。如果沒能入乎其內，那就會「不是個中人，不解此中情」。比如，斯諾這個洋大人是個中國通，先別說他對共產黨的隱情通曉得怎樣，僅憑他把毛澤東說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翻譯成打著傘旅行的「孤獨的和尚」，就可

知這個「中國通」是多麼可憐了。天知道他在世界上散佈了多少諸如此類的以訛傳訛、扭曲事實的故事？作為鄭重的學者，一個局外人，一個外國人，既要認清自己具有出乎其外，「旁觀者清」的優勢，又要認清自己具有「洋鬼子看戲」的劣勢。仍以「和尚打傘」為例，就算洋大人知道了這個歇後語的意思是「無法無天」，但因你自幼就浸泡在法制教育和法制環境中，這就使你很難能領略到浸泡在帝王術中的毛澤東說的「無法無天」的語意方面的皇權無邊、老子天下第一和語感方面的「我是政治流氓，我在乎什麼？」的原汁原味。這和毛澤東不解地問基辛格「為什麼你們國內對『水門事件』這個屁事那麼在乎？」有點兒異曲同工。無獨有偶，英國記者麥克法詩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說什麼毛實行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是「自由化政策」；說什麼吳晗揭發批判「章羅同盟」的發言是反毛的；以及對毛和劉、周等之間關係的描寫，簡直純屬一派「海外奇談」。在這一點上，許良英先生是最權威的見證人。他說：

1973年出版的英國記者（後任哈佛大學教授，曾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八十年代已出了兩個中譯本。由於作者被認為是英美中國問題研究權威，他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課又曾作為哈佛大學的基礎課，我不得不認真去讀這本書。可是讀後，不僅十分失望，而且有被愚弄的感覺。請聽他在《引言》中所說的：「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裏有辯論，主席也可能被擊敗，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劉少奇「對機遇和個人使得党的領導權落入毛的手中的情況有些忿忿不平。」他把「雙百」方針和鳴放說成是「自由化政策」，在《結束語》中說：「毛的自由化政策試驗的失敗，是對他領袖威信和權威的沉重打擊。」「毛不現實地設想通過整風的形式就可實現黨員品行上面的任何長期性的轉變。」他認為文化大革命起源於毛澤東與劉少奇於1957年的「不和」，其主要證據竟出於我的口。他引用了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報》上我的右派言論：「中央分裂了，劉少奇、彭真壓制毛主席。」事實上，這句話並非我說的，而是清華大學一位朋友對我說的，我並不相信，只是向哲學所黨支部彙報過，想不到他們把它捅給《人民日報》，變成是我最嚴重的右派言論，「美聯社」也當作新聞報導了。這純屬誤會，麥克法詩爾卻把它當真，作為「毛劉不和」的主要根據。這種效法所謂「克里姆林宮學」寫出來的中國歷史，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值得懷疑的。九十

年代初，我曾給他本人去信，指出他不瞭解中國內情，對報上宣傳的都信以為真，難免上當。我告訴他，毛澤東 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足以說明「鳴放」絕非自由化，不過是一種「引蛇出洞」的計謀，他無法理解。中國帝王的權術謀略太「深奧」了，頭腦簡單的西洋人確實難以理解，我自己也是被蒙蔽了十七年之後才恍然大悟的。14

這個內外法的道理，余英時教授在寫給《當代中國研究》的出版祝詞中，說得清楚明白：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中英文刊物之所以在西方能別樹一格，主要的原因是它們的作者群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大陸，但同時又在西方受到了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較長期的訓練。他們是在中國大陸成長的，因此有來自生活經驗中的內在知識；他們已熟悉西方學術界的操作方式，因此又能超越主觀的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最近演變做客觀的瞭解和深入的分析。這種主客交融、能所兩忘的境界正是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他們竟能自然的結合了起來，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1989 年以後，許多過去親自參加過中國大陸開放改革的知識份子也大批地來到了西方。他們和八十年代起先後進入西方學術主流的中國留學生匯合在一起，更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研究隊伍。他們將對於當代中國的研究作出特殊重要的貢獻是可以預期的。我個人尤其高興看到他們今後能通過《當代中國研究》，將研究成果直接傳佈給海內外的中國讀者。」

「本刊的作者並不是「隔岸觀火」式的所謂「中國觀察家」(China Watchers)，他們都有為中國大陸的繼續開放和改革貢獻一份力量的意願。歷史已一再證明，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由於種種不得已的原因暫時寄居海外，往往能發揮意想不到的學術和思想上的效用，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今天已不是傳統的時代，世界已縮小為一個「地球村」了，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也不會再興「遠托異國，昔人所悲」的慨歎。相反的，他們大可以把」異國」當作為中國儲才之地，潛心研究，一起在更長遠的意義上報效中國。」

余教授反復強調這個內外法的運用，他為阮銘《鄧小平帝國》一書作序，寫道：「從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文獻而言，《鄧小平帝國》顯然和一般置身事外者的客觀研究並無不同，但是我們通讀全文，便會發現作者本人最初也曾參與了這個帝

國的創建。作為一個參與者，他是身在廬山之中的，然而作為這部帝國興衰史的撰寫人，他卻能跳出廬山之外，因而看清了廬山的真面目。這樣主客統一的著作確是不多見的。這是此書最能吸引讀者的所在。」

許良英說：「不少人，包括李維漢和陸定一，以及鄧小平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論述鳴放、反右歷史時，都重複毛澤東 1957 年 5 月以後那種自欺欺人的論調。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為『自由化分子』的阮銘，直至八十年代還持這種觀點。甚至 1994 年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竟也附和這種顛倒是非的說法，說什麼毛澤東「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李醫生顯然不瞭解外界實情，輕信了毛澤東自編的由頭。」15

其實，何止阮銘！王若水說是「急轉彎」16；趙紫陽說「陽謀」是「托詞」17；胡耀邦說「引蛇出洞只是短時間。」18 在識破這一陰謀上，有先見之明的，劉賓雁說，只有鄧拓一人 19，我認為吳宓教授也該算一個；有後見之明的，有李慎之，許良英，劉賓雁，王若望……就多了。

總分法和內外法，是相互為用的。要想做到從總體上、本質上把握人和事物，就必須用內外法；而入乎其內和出乎其外在一個人身上，在某一方面往往不能雙全其美，就會產生偏差，而糾偏就要借助於總分法。當然，還需運用下面要講的「前後法」。

第三，「前後法」是探明事物發生因果和主觀動機的不二法門。

右派老祖宗章乃器先生說：「實踐檢驗真理；時間解決問題。」20

1979 年，胡耀邦要發動一場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遭到胡喬木的陰謀反對。胡找到黨中央主席華國鋒。華已領教過真理標準討論的滋味，當然不喜歡這個「生產目的」的討論。胡喬木又到鄧小平那裏，說華國鋒不贊成「生產目的」的討論。鄧小平採納了胡喬木的意見。胡喬木又把鄧小平和華國鋒的意見端給胡耀邦。這樣一來，討論中途夭折。《中國思想運動史》的作者李洪林事後想，如果那時經過討論摸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規律，中國轉向市場經濟的步子，大約會提前十幾年。李洪林說：「有些事情，當時未必清楚，過些時候回頭再

看，就清楚了。」21 當然，這些話屬於經驗之談。正是經驗之談，使它具有了哲理性。

「前後法」既順藤摸瓜，尋求來龍去脈；又順瓜摸藤，順藤尋根，由果推因，由終返始。站在今天看昨天，我們就能夠看得一清二楚。

例如有人說，毛發動整風是真心要除「三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可是右派的進攻破壞了整風。這是當年中共昭告國人的。當年懷疑者甚少；而至今相信者仍大有人在。

要使歷史真相大白，只能在反右之後看反右。反右之後看到了什麼呢？大躍進。大躍進不是整掉了「三害」，而是「三害」發了瘋！有人說毛是真心想通過整風克服政治弊端，若不是右派進攻，文革會提前十年。好吧，文革過了，我們總算從文革的「革命委員會」中看到毛克服了什麼樣「政治弊端」。這中間，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餓死數千萬人，受迫害的人，以億為單位。從文革看反右，從大躍進看反右，我們看清反右不僅是卑鄙的陰謀，而且是毒謀。

從反右往前推，毛笑容可掬，信誓旦旦，號召「知無不言」；再之前，在黨內對匈牙利事件定性為有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對中國出洞的螞蟻，要採取後發制人，要左派做好準備。再往前推，堅決催促 1956 年蘇聯出兵匈牙利鎮壓民眾，而且「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了的時候再動手。」22 再往前推，劉少奇主持起草的中共八大政治報告，原稿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與「黨內的自我批評」和「勞動人民的監督」等同看待，而毛澤東改寫為：後兩者的批評監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23

既然「勞動人民的監督」是主要的，毛澤東爲什麼不主要號召工農鳴放，幫助黨整風？甚至于連次要也沒有呢？難道他居心祇想聽「從右的方面」提的意見？難道居心祇想讓「右派」幫中共整風？

「陰謀論」是確鑿無疑的。

要弄清毛爲什麼要反右，毛個人的「動機」、「目的」、「居心」，這是不能光憑猜測的。

——2007 年 6 月 30 日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注 釋

1　從維熙《走向混沌》（第一部）作家出版社 1989 年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 87 頁。

2　郭羅基（推翻「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論），見「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

3　見「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

4　《孟子。告子上》

5　胡平《毛澤東為何發動反右》「中國人權論壇」網。

6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 187 頁。

7　林克《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第 58 頁。

8　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第 418 頁。

9　《鄧小平文選》二卷第 345 頁

10　林偉《毛澤東評鄧小平：精明能幹，有才華》「軍政線上」網

11　鄧偉志《如何評價柯慶施》，《黨史縱覽》2003 年第 9 期

12　王康《劉賓雁的遺產》：「劉賓雁厲聲譴責中國人遭受專制是‘活該！’中國人先在毛澤東統治下淪為狂熱、極端愚昧的政治性物種，後在鄧小平、江澤民權錢聯盟裏，集體墮落，乃是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歷史大倒退。」（《劉賓雁紀念文集》第 520 頁）

13　黄秋耘《風雨年華》

14　許良英《關於反右運動的片段回憶和思考》《北京之春》1997 年 2 月號》

15　同上。

16　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第 275 頁。

17　參見「議報論壇」網站：柳萌《鄧小平是反右運動的特大劊子手！》

18　《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212 頁。

19　劉賓雁為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一書作序：《毛澤東一手定乾坤》

20　章立凡《章乃器的三次「摘帽」》（摘自《章乃器與中共領袖們》）

21　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第 280、306 頁。

22　轉引自李丹慧、沈志華《1956 年十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

2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散見 136—212 等頁。

本書作者簡介（以論文順序排列）

林培瑞 / Perry Link

哈佛大學博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著名漢學家，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董事長。教授有關中國的課程二十餘年，著有《倔強的野草：文革後流行的和引起爭鳴的文學》、《北京夜話》、《天安門文件》等中英文專著十多種。

許良英

浙江臨海人，1920 年出生。1942 年畢業于浙江大學物理系。曾任中共（地下黨）浙大支部書記和杭州工委委員，中共杭州市青委學生部長。1952 年調中國科學院，負責《科學通報》編輯工作。1956 年調哲學研究所，研究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1957 年被打成「極右分子」，回老家當了二十年農民。1962 年開始編譯《愛因斯坦文集》。1978 年回科學院，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近、現代科學史，以及民主的歷史和理論。曾主編《愛因斯坦文集》、《20 世紀科學技術簡史》、《愛因斯坦研究》等專著。

邵燕祥

1933 年出生于北京。詩人、散文家。1946 年開始發表詩歌、散文和雜文。1957 年被打成右派，1979 年恢復政治名譽。有多種詩集、文集出版，近作有《別了，毛澤東》。

杜　光

原名林道茂，浙江溫嶺人，生于 1928 年。1948 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傳訊、通緝，遂改名換姓，以迄于今。1958 年被劃爲右派分子，1979 年後曾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科研辦公室主任，1988 年參與籌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任研究會幹事長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雙月刊主編。1989 年因支持學生運動被撤消黨內外一切職

務。後參與撰寫《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史》和《楊獻珍傳》，另有時評一百餘篇。

郭羅基

1932 年出生于江蘇無錫。1948 年參加中共地下工作。1949 年後歷任科長、團委書記、黨委書記等職。1955 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1958 年起在北大哲學系任教。1982 年，作爲「資產階級自由化冒尖人物」，被鄧小平發配至南京大學。1989 年「六・四」以後被清除出黨。九十年代流亡美國，先後爲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資深研究員。近著有《歷史的漩渦》。

陳奉孝

山東濰坊人，1936 年出生。1954 年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1957 年因組織「百花學社」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集團」罪首，判刑十五年幷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前後經歷了北京監獄、興凱湖勞改農場、大興安嶺采伐大隊等五六個勞改單位。受過各種酷刑折磨。1972 年刑滿後被强迫留勞改單位繼續「改造」。1979 年「反革命」罪平反，1984 年右派「改正」。著有個人回憶錄《夢斷未名湖》。

劉賓雁

祖籍山東，1925 年出生于吉林長春，作家。1944 年加入中共。1957 年任中國青年報編委兼記者時被打成右派。1979 年「改正」後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87 年被中共指「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再次開除黨籍。1989 年因公開反對中共當局的武力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被禁止返國，開始海外流亡生活。2005 年在美國新澤西州病逝。著有特寫《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人妖之間》等。

吳國光

1957 年出生于山東臨沂，1982 年獲北京大學文學學士，1984 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新聞學）碩士，1995 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與亞太關係講座教授，專研當代中國政治變遷及中國對外關係，著有英文著作兩種、中文著作十四種，中、英文論文約百篇。

齊　戈

國內自由撰稿人，《新世紀》網站特約評論員。

李慎之

1923 年出生于江蘇無錫。1948 年加入中共。1957 年在新華通訊社國際部副部長任上被毛澤東點名，定爲「極右分子」。1973 年回京任新華社參編部翻譯、校對。1979 年右派被「改正」，恢復黨籍。1985 年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1990 年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長和黨組成員職務。1999 年發表〈風雨蒼黃五十年〉。2003 年在北京病逝。

丁　抒

祖籍江蘇東台，1944 年出生于四川小城合川。抗戰勝利後隨家人遷居上海。1962 年入清華大學。1968 年赴安徽丹陽湖農場勞動。1970 年任職遼寧某研究所。1979 年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翌年赴美，入紐約市立大學。1986 年獲博士學位後以授課爲業，現為諾曼岱社區學院物理教授。餘暇研究中國當代史，著有《陽謀》、《人禍》。

張成覺

1939 年出生于香港。1956 年畢業于廣州市六中，入交通大學(上海、西安)，反右時被劃爲右派。1960 年至 1982 年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做農工、任文化教員、英語教師。1982 年回廣東，先後任中學、廣播電視大學教師。1988 年至 1994 年任香港王寬誠教育基金會中文秘書。在兩岸三地及海外報刊共發表《在那遙遠的地方——新疆回憶錄》、《筆底風雲——二戰名記者朱啓平傳》等各類文字二百餘萬。

葉永烈

1940 年出生于浙江溫州，著名作家。主要從事政治性長篇紀實文學創作。1957 年入北京大學。1960 年出版第一本著作，現已出版近二百部著作。關于「反右派運動」的著作有《沉重的1957》、《歷史悲歌——「反右派」內幕》、《撥開歷史的迷霧》、《反右派始末》、《離人泪》等。

姚監復

1932 年生于江蘇南京，籍貫爲安徽省宿松縣。1957 年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到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工作，任工程師。文化革命中曾被定爲「反革命分子」，在湖南西洞庭湖農場「隔離審查」。1982 年調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先後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農業生產力研究室主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協作研究員。

方勵之

祖籍浙江杭州。1936 年生于北京。1948 年在北京四中加入中共地下外圍組織。1956 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1956-1957 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實習研究員。反右運動後被中共開除黨籍。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先後任助教、講師、教授及第一副校長。1986 年學生運動後被撤職，第二次開除黨籍。1987-1989，任北京天文臺研究員。1989 天安門學生運動後移居美國。1992 年起任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及天文系教授。現爲國際相對論天體物理中心的指導委員會主席。

程映虹

1959 年出生于江蘇蘇州。1982 年畢業于蘇州大學歷史系，1988 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系碩士， 2001 年獲美國東北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爲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興趣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國際影響。在中外學術刊物上有文章多篇發表，出版專著有《卡斯特羅傳》和《西窗東眺》、《塑造新人——從啓蒙運動觀念到社會主義現實》。

張軼東

1931 年出生于江蘇南京。1952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1959 年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文化革命期間曾因言獲罪入獄九年。1981-1991 年間爲黑龍江省綏化師專(現綏化師範學院)外語系教師，講師和副教授。1991 年退休。有中、英、俄三種文字著譯多種。2007 年出版新著《毛澤東的最後二十年》和回憶錄《從列寧格勒大學到新肇監獄》。

陳　彥

1955 年出生于湖北隨州，1981 年武漢大學歷史系世界史研究生畢業。1982 年任教武漢大學。1987 年獲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執教于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巴黎東方語言文明學院、巴黎第七大學。現任職于法國國際電臺，法國政治與思想史研究中心。近著有《中國的覺醒－改革以來中國思想演變進程》、《穿越中國當代思想世界的旅程》（法文）等。譯著有汪德邁《新漢文化圈》。

朱　正

1931 年出生于湖南長沙。作家、歷史學家。1949 年任《新湖南報》編輯。1955 年肅反運動中被「鬥爭審查」一年。1956 年出版《魯迅傳略》。1957 年被劃爲右派，送「勞動教養」。1962 年解除「勞動教養」後以體力勞動維持生計，勞動之餘寫有《魯迅回憶錄正誤》、《魯迅手稿管窺》。1970 年因「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勞改」三年。1979 年平反後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著有《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周氏三兄弟》、《朱正書話》等。

高　瑜

1944 年出生于重慶。1962 年入中國人民大學。八十年代在中國新聞社專稿部任記者，1988 年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輯，兼香港和海外中文報刊專欄作家。因報道 1989 年北京民主運動，撰寫時政評論，兩次入獄，失去自由長達七年。後以自由記者身份繼續從事中國新聞報道，曾獲多次世界新聞獎。

陳奎德

1946 年出生于江蘇南京。 1985 年獲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歷任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文化研究所所長，上海《思想家》雜志主編。1989 年應邀訪美，歷任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民主中國》雜志主筆，《觀察》 網站主編等。現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有哲學史、科學哲學、政治哲學、文化研究以及政論等多種著述，如《中國大陸當代文化變遷（1978-1989)》、《海耶克》、《煮酒論思潮》等。

戴　晴

1941 出生于重慶，1966 年畢業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66-1978 在航天部和公安部從事技術工作。1979 開始寫作。1982-1989 任光明日報記者。1989 年後言論被封殺，爲自由職業者。作品有小說集，雜文集，社會紀實《當代中國女性系列》、《長江長江》，以及歷史紀實《儲安平與黨天下》、《王實味 儲安平 梁漱溟》等。

章立凡

1950 年出生，中國近代史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爲北洋軍閥史、中國社團黨派史、中國現代化問題及知識分子問題等。曾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長期參與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的撰稿。著有《風雨沉舟記》、《都門謫居錄》、《長夜孤燈錄》等文史作品，結集作品有《君子之交如水》；編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等。

陳斯駿

1930 年出生于上海，1936 至 1943 年先後在香港九龍、廣西桂林求學。1943 至 1948 年在四川灌縣空軍幼年學校受訓。1950 年參加工作，1954 年入北大歷史系，1958 年被劃爲右派，1959 年被派往內蒙古師範學院任教。1964 年被迫退職，在廣州任代課教師和街道工人十餘年。文革期間三次偷渡香港未遂。1979 年右派「改正」後，在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任教。退休前爲該系教授。

邵　江

1985-1989 在北京大學數學系就讀。曾參與組織 1986，1988 和 1989 年學運。六四後被捕入獄 17 個月。後數次被捕和被監視居住，1997 年輾轉流亡海外。曾就學于威斯敏斯特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現爲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在讀博士生。研究領域包括政治和媒體，比較政體和國際關係，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

錢理群

1939 年出生于重慶。1960 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1978 年師從王瑤、嚴家炎先生攻讀中國現代文學碩士學位，1981 年獲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碩士學位，留中文系任教。退休前爲北京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知識分子精神史、當代思想史研究。著有《周作人傳》、《心靈的探尋》、《與魯迅相遇》等。近作有《拒絕遺忘》、《「1957 年學」研究筆記》。

徐　賁

1950 年出生于江蘇蘇州，美國麻薩諸塞州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現任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從事思想史和文革研究。著有《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 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分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爲》，《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等。

胡　平

1947 年出生于北京，七歲入川，1966 年高中畢業，適逢文革。下鄉插隊五年，返成都後當臨時工五年。1978 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獲哲學碩士學位。1980 年參加自由競選，被選爲北京大學海淀區人民代表。1987 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課程，1988 至 1991 任中國民

主團結聯盟主席。現居紐約，任《北京之春》主編。著有《我國經濟改革的哲學探討》、《哲思手札》、《給我一個支點》、《中國民運反思》等十餘種。

朱學淵

原籍江蘇贛榆，1942 年生于廣西桂林， 1965 年畢業于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在四川、南京兩地任中學教員多年，1978 年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1980 年移學美國，1983 年獲博士學位，專長理論固體物理，1985 年起從商，并從事歷史語言研究，已出版《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等學術專著。

沙尚之

1939 年出生，1963 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八十年代初作爲訪問學者到澳大利亞 CSIRO 和新南威爾士大學作化學研究。1986 年起任上海輕工業研究所所長，現退休。從事技術創新管理與改革工作，業餘學習與研究中共黨史，近年編纂出版的書籍有《沙文漢詩文選集》、《陳修良文集》、《記孫冶方》等。

杜　高

1930 年出生于湖南長沙，戲劇影視評論家。十二歲參加抗日救亡演劇活動，後進報社工作，開始寫作。1949 年出版第一本文藝評論集。1955 年牽涉于「胡風反革命」案，1957 年被劃爲右派，被送「勞動教養」十二年。1979 年恢復工作。先後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戲劇出版社總編輯等職。近年因《杜高檔案》的出現，出版了回憶錄《又見昨天》。

葉國榮

1931 年出生于越南的一個華僑家庭，1946-1949 年就讀于廣西，1951 年畢業于越南河內中華中學。1953 年泅渡中越邊境的北侖河，到達廣西。同年入武漢大學。1957 年被劃爲「極右分子」，在學校和農場「監督勞動」。後到武漢柴油機廠當統計員。1968 年因「以反革命爲目的偷越國境」罪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在湖北沙洋農場勞改。1979 年到法國探親，1988 年定居美國。

巫寧坤

1921 年出生于江蘇揚州。1941 年西南聯大外文系肄業。1948 年畢業于美國曼徹斯特學院，

1949 年獲芝加哥大學文碩士，1949-1951 年爲芝加哥大學博士生。1951 年應燕京大學聘請回國任教。1957 年被劃爲「極右分子」， 送北大荒興凱湖勞改農場「勞動教養」。1962 至 1966 年在安徽大學當臨時教師。1970 年下放農村。1974 年任教于安徽師範大學。1980 至北京國際關係學院，1991 年退休。其間曾在美國加州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等校任訪問學者、客座教授。著有英文回憶錄 A Single Tear ,詩文小集 Always Remembering, Chimes of Solitude ,中文版《一滴泪》,散文集《孤琴》。

巫一毛

1958 年出生于北京。美國聖母大學英美文學學士,金門大學企業管理碩士。曾任美國矽谷數家電腦公司高級主管。中英文作品發表在多種報刊雜志上，并被選入多本詩歌、散文、小說集中。著有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參與演出紀錄片《上山下鄉》。現居美國加州。

流沙河

原名余勛坦。1931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漢族，蒙古裔。十七歲發表習作。1949 年秋入四川大學，1950 年到川西農民報任副刊編輯。1952 年調到四川省文聯任創作員，又任《群衆》雜誌及《星星》詩刊編輯。1958 年被劃爲右派，留成都做多種苦役。1966 年被押回老家，鋸木六年，釘箱六年。監管勞役共二十年。1978 年摘右派帽子，任金堂縣文化館館員。1979 年被「改正」，不算右派，復任《星星》詩刊編輯。作品出版有《流沙河詩集》、《鋸齒嚙痕錄》等二十六種。

龔定國

1930 年出生于湖南長沙，1946 年入武漢大學。1951 年畢業到東海艦隊，任軍械處化驗室主任。1958 年定爲右派，受開除軍籍留隊監督勞動處分。後發配甘肅生產建設兵團。1966 年底到甘肅省嘉峪關農建十一師氮肥廠籌建處。1968 年被「群衆專政」關牛棚九個月。1969 年解除「專政」，專職打掃公共厠所。1970 年到山丹農場。1978 年調張掖師專教書。1979 年接獲通知，說右派屬于「錯劃」，予以「改正」。

謝　泳

1961 年出生于山西榆次（現晋中市）。1983 年晋中師英語專業畢業後留校做學報編輯。1985

年任職山西省作家協會《批評家》雜志社。後任《黃河》雜誌副主編。現爲厦門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問題研究。著有《禁錮下的吶喊——1976 至 1989 年中國的報告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的微觀研究》、《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等十餘種。

魏紫丹

1933 年出生于河南北蒙縣農村。1956 年畢業于平原師院，1957 年于北蒙中學劃「極右派」，勞動教養 5 年，農村監督勞動 16 年。1978 年恢復工作。1993 年退休于教育學院教育系主任崗位。著有教育理論書文若干。

————————————

出版印行：田園書屋

地址：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56 號 2 樓

電話：852-2385 8031

傳真：852-2770 2484

電郵：gfbook@netvigator.net

初版一刷：2007 年 11 月

國際書號：/ISBN962-339-069-6
